乌云毕力格 / 主编

MANCHU ARCHIVES AND STUDIES ON FRONTIER AND ETHNIC GROUPS IN QING DYNASTY

满文档案与清代边疆和民族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MANCHU ARCHIVES
AND STUDIES ON
FRONTIER AND ETHNIC GROUPS
IN
QING DYNASTY

本书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illegible]员的论文集。数位作者直接利用大量的满文档案，探讨清代蒙、满、藏等民族史和蒙古、西藏、东北等边疆地区史，内容丰富而新颖。大量满文档案的介绍和利用，丰富了清史研究的资料，拓展了清史研究的领域。

www.ssap.com.cn

ISBN 978-7-5097-4752-0

定价：98.00 元

乌云毕力格/主编

MANCHU ARCHIVES AND STUDIES ON FRONTIER AND ETHNIC GROUPS IN QING DYNASTY

满文档案与
清代边疆和民族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文档案与清代边疆和民族研究/乌云毕力格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097-4752-0

Ⅰ.①满… Ⅱ.①乌… Ⅲ.①满语-档案研究-文集
②少数民族-民族历史-中国-清代-文集 ③边疆地区-
地方史-中国-清代-文集 Ⅳ.①G270-53 ②K28-53
③K92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5342 号

满文档案与清代边疆和民族研究

主　　编 / 乌云毕力格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责任编辑 / 赵　薇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责任校对 / 岳中宝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31.25
版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字　　数 / 423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752-0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
“满文、满文文献与清史研究”（批号：11JJD770019）成果之一

前　言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以满洲人为主体建立的政权。满语满文，因此被清朝称为“清语”“国语”“清字”“国字”等，被视作清朝“立国之本”之一。满文自它被创制的1599年到现在，已经历400多年的历史，其间，在不同的范围和不同的场合，满文从未停止被使用。尤其是在清朝（1636～1911）统治中国近三百年间，无论在国内抑或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满文均得到长期使用。特别是清朝鼎盛时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满文地位极其重要。一方面，清代内部重要的政府文书、国史馆编纂的大型史书等皆大量使用满文，同时，对外国书、条约等正式文件也将满文作为国语使用。乾隆朝以后，满文的使用在内地虽然渐至衰落，但并没有被抛弃，从国家中央机构到边疆地区的地方政府机构以及民间，满文仍然是很重要的语言文字。如今，仍有不少清朝后期的档案文书保留。因此，满文文献是研究清代历史的重要史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我们认为，满文档案和文献在清史研究中的不可代替的独特史料价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首先，满洲统治者在清朝的统治地位决定了满文文献在清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清朝是满洲人建立和统治的国家，满洲人是清朝的统治民族。因此，满语和满族文化在清朝具有很高的地位。从皇帝的诏谕到大臣的题本奏折，从政府的公文到私人记述，都普遍使用满文。尤其是清朝前期，许多

政府部门的文件只有满文而没有汉文，权威性的文件只有满文。这些文件所涉及的内容，不仅仅是满洲人，也不仅仅是边务，而是整个清朝国政的方方面面。如不懂得满文，就无法全面了解当时清朝政府的运作方式，无法全面、准确地认识当时的历史进程。满文文献的广泛利用，还能够填补因缺乏汉文史料而出现的空白，从而推动清史研究工作全面系统的开展。其次，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满文文献的重要性。清代是近代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极其重要的阶段，可以说，清史一半以上的内容就是所谓的民族史和边疆史。清代的民族史和边疆地区史是清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半的清史。满文档案对研究清代民族关系、民族政策和边疆地区历史有其独特的价值。如果仅仅把中原内地的历史视为某一朝代的"正史"，而将周边的民族和地区之历史与内地历史分开对待，甚至认为是这一时期"正史"的附属内容，那么将会歪曲历史，小化中国，矮化中华，这无疑是大错特错。就清代而言，清史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今天的边疆地区和在那里的各民族的历史，而要研究清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必须依靠大量的满文档案。因为，在这个领域，满文资料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官方史料。这是客观事实。在清代，办理民族和边疆事务的基本上都是八旗出身的大臣，而清朝规定，满洲大臣办理满、蒙、藏等事件时，必须使用满文题奏。到乾隆十一年，这一规定终于制度化。结果，满文书写的题本、奏折、朱批奏折和谕旨成为研究边疆地区和民族的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再次，满文档案的史料性质决定了它的重要性。关于史料的基本分类，学界向来有不同看法，而根据史料产生时的特性，可将之分为"遗留性史料"与"记述性史料"。两种史料间差异很大，但作为文字材料，归根结底，是以其产生时是否即意图作为史料而区别。所谓"遗留性史料"，就是在其产生之初并无传承历史信息和历史知识之意图的材料，如考古遗存、档案文件等。记述性史料则不同，在其诞生之

初，便以记载、保留和传承历史为目的。满文文书档案，都是当时处理政务和具体案件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它不是为讲述历史而形成，它本身就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所以，作为“遗留性史料”，满文档案可以用来鉴别传世文献记载的真伪和正误，以此接近恢复历史原貌的目的。在清史中，包括官方编纂的历代《实录》《起居注》《会典》《列传》等编年、会典、传记类史书，以及私人撰述的各类史书，都属于记述性史料。两相比较，后者系统性强，体现了一个时代官私两方史家的时代意志，构成了彼时历史过程、历史思想的主体框架，但因为突出某种“意志”，往往经过删改、取舍、编排甚至杜撰；前者则无意识地保留了很多历史真实。正因为这样，满文原始档案的史料价值远比清朝国史馆和清代官吏、文人所编纂的其他各种史书要高很多，两者不能同日而语。

近二十年来，国内满文文献的挖掘整理、编译和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这些成果仍只是现存满文史料中的冰山一角，远远不能体现其重要价值，也难以满足各类研究者的需要。从国内研究队伍来看，直接利用这些珍贵档案文献的学者仍然屈指可数，对满文文献的资料价值和文化意义，学界的认识也远不充分。国内清史学界满文人才奇缺，以至于影响到中国清史研究的整体形象和学术地位。因此，培养和锻炼一批通晓满文的人才，促进清史研究中满语人才的培养，加强满文资料库的建设，激发国内学术界对满文档案和文献的重视，推动对满文史料的进一步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拓展清史研究领域，成为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于 2012 年 5 月成立了满文文献研究中心，在清史研究基地开展“满文、满文文献与清史研究”的科研项目，力求提升清史研究所的满文水平，拓展清史研究领域。

本论文集就是该研究中心部分专职研究人员和兼职研究员新撰写和近年发表（收入本书时做了部分修改）的一批论文，内容包括满文档案研究、满文档案与清代蒙古研究、满文档案与西藏研

究、满文档案和满文地图与东北边疆研究等内容。我们希望，以本书为开端，将来在清史研究所满文文献研究中心诸位专职和兼职研究人员的积极参与和热烈支持下，发表更多的满文档案与文献研究的新成果，把我们的清史研究更上一层楼！

乌云毕力格

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满文文献研究中心

2013 年 3 月 28 日

目　录

前　言 …………………………………………………………………… / 1

清代满文档案述论 …………………………………………… 吴元丰 / 1
清代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及其史料价值 ………………… 吴元丰 / 19
清代新疆历史满文档案概述 …………………………… 吴元丰 / 47
关于清代内扎萨克蒙古盟的雏形
——以理藩院满文题本为中心 ……… 乌云毕力格　宋　瞳 / 62
关于清代著名蒙古文人乌珠穆沁公滚布扎卜的
几点新发现 ……………………………………… 乌云毕力格 / 78
清初北方战略考
——以顺治十二年前后理藩院应对喀尔喀措施为中心
………………………………………………………………… 宋　瞳 / 89
顺治十二年清朝与喀尔喀蒙古会盟考 ………………… 宋　瞳 / 116
外藩蒙古内扎萨克四十九旗考 ………………………… 宋　瞳 / 141
鄂飞满文奏折笺注 ……………………………… 乌云毕力格 / 160
论康熙末年清军入藏及阿拉善和硕特的作用 ……… 齐　光 / 217

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

及其研究价值 …………………………………… 吴元丰 / 244

清朝边疆政策

——以唐努乌梁海纳入清朝版图及特楞古特、塔本、

科勒萨哈勒、柯尔克孜等移住黑龙江为中心

………………………………… 敖其尔·乌云扎尔噶拉 / 261

满文《乌喇等处地方图》考 ………………………… 承　志 / 284

尼布楚条约界碑图的幻影

——满文《黑龙江流域图》研究 ………………… 承　志 / 378

清代满文档案述论

吴元丰*

满文档案是清朝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在处理公务过程中形成的，以一定顺序归档，并以满文缮写的各种公文的总称。档案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原始记录，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与其他文献相比更为翔实可信，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对现实发展，还是对历史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利用和研究价值。本文拟就清代满文档案的由来、保存状况、整理编目、编译出版及价值作一论述。

一 清代满文档案的由来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历时290余年之久。清统治者为了加强其封建专制统治，在政治机构的设置方面，除仿照明制外，还进行了必要的创制。在中央，除仿照明制设立了内阁、六部、宗人府、都察院和大理寺等机构外，还创设了军机处、内务府和理藩院等机构。在地方仍仿照明制采用行省制度，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研究馆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满文文献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设立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知县等员治理，边疆地区除创设将军、参赞大臣、办事大臣、总管等员外，还在一些民族居住地区设立盟长、扎萨克、伯克、土司等官员治理。在职官的设置方面，充分体现了民族特色，特别是在中央各机构中一般都分设满汉额缺。起初，同一官职的满汉额缺的品级、职权都有差别，后虽然有改变，但满洲官员仍保持着一定的地位和特权。

早在清入关前，清太祖努尔哈赤为了适应满族社会的发展，于明万历二十七年命额尔德尼、噶盖二人以蒙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满文，因草创的满文无圈点，故后人称之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这种满文通行30余年后，发现“上下字无别，故‘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不分，均如一体。若平常语言，按其音韵，尚可易于通晓。至如人名地名，则恐有误”。[①] 清太宗皇太极遂于天聪六年正月，命达海改进老满文，在原字母旁添加圈点加以区别，并新增一部分拼写外来语的字母。自此之后，满文定型，再无变化。经过达海改进的满文，后人称之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

有清一代，定满语为国语，称满文为清字。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满蒙官员，特别是承办八旗事务及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满蒙官员，一般都用满文缮写公文，不准擅自使用汉文，否则重者治罪，轻则训饬。与此相适应，有关诰敕、谕旨、寄信及各部院的行文，也都用满文书写。乾隆十一年，因西宁办事大臣莽古赉、驻藏办事大臣傅清二人用汉字缮折奏事，故乾隆帝降旨曰：“驻扎西宁办理青海番子事务之副都统莽古赉、驻藏办事之副都统傅清，尔等陈奏事件，莽古赉每次俱用汉折，傅清亦间用汉折，各省督抚提镇内，有满洲大臣用汉折奏事者，原因办理地方民情及

① 《满文老档》，天聪六年正月。

绿营事务。今莽古赉、傅清系满洲大臣，且系办理蒙古、唐古忒事务，所有事件，理应用清字奏折。伊等竟仿效外省大臣，用汉字奏折，殊属非是，著饬行。嗣后奏事，俱著缮写清字奏折，并寄谕众佛保知之。"① 另外，管理宫廷和陵寝事务官员也不能随意用汉文缮折奏事。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因管理东陵事务贝子允祺用汉折奏事，故乾隆帝降谕给军机大臣曰："顷贝子允祺为修葺陵墙事，用汉字缮折具奏。此事应清字缮折具奏，而允祺用汉字折，殊属非是。倘奏销时清字繁多，欲用汉字尚可，用清字奏销亦可。著饬行允祺等，嗣后凡关系陵寝事宜，皆令缮写清字折具奏，不准用汉字缮字。此次所奏汉字折，着即销毁，以清字注册。"② 办理边疆和少数民族事务的官员，除向皇帝请示汇报一般都用满文奏疏外，与中央各部院和有关地方官员行文时，并不一定都用满文，而视不同的情况，用汉、蒙古、藏、维吾尔等文字行文。如归化城副都统，"报部文件止用清文，不用汉字。迨后内地民人渐集，汉文风气一开，蒙人遂多肄汉书，凡有公文案件，报部则用清文，咨各扎萨克旗则用蒙文，移道厅均用汉文"。③ 因此，在清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中形成了大量的满文公文，主要包括皇帝颁发的制、诏、诰、敕、谕、旨、寄信，臣工呈进的题本、奏折、揭贴、表、笺、启，各官府衙门移行来往的咨文、移会、照会、札付、交片、牌文、咨呈、呈文、申文、关文、详文，等等。

清代中央和地方各级衙门对其处理政务过程中形成的公文十分重视，不仅将原件按一定的顺序排列保存，而且将其中重要的文书按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逐件抄录成册，以备案查和修史之用，并设有专门的机构、官员进行保管。

---

① 《清高宗实录》卷258，第1页。

② 《军机处满文寄信档》，乾隆二十六年二月。

③ 《土默特志》卷4，第2页。

二　清代满文档案的现存状况

由于历史的战乱、灾害等诸多原因，清代的满文档案，几经厄运，并没有完全保存下来。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圆明园内保存的公文档案全部被烧毁。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清朝各部院文书档案全部都被掠夺或烧毁。1921 年，发生了“八千麻袋事件”，使大量的“大内档案”散失到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除这些清代中央机构的公文档案遭到严重损失外，还有绝大多数地方的总督、巡抚、将军、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总管等衙门的公文档案均遭厄运，未能保存下来。其中，就有大量的满文档案。

然而，保存至今的清代满文档案仍为数量巨大，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满文档案就有 200 万件（册）。另外，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黑龙江省双城市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档案馆、土默特左旗档案馆和阿拉善旗档案馆，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研院史语所等单位，都保存着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现将其中主要档案分别简要介绍如下。

（一）内阁满文档案

内阁是辅助皇帝办理政务的中枢机关之一。天聪三年设立文馆，崇德元年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顺治十五年改内三院为内阁，顺治十八年改内阁为内三院，康熙九年复改内三院为内阁。宣统三年四月责任内阁成立后，内阁即被撤销。内阁满文档案历史悠久，数量浩繁，文种繁杂，内容丰富。

1. 题本

题本是清代官员向皇帝请示汇报问题的重要文书之一。题本又称“红本”，分部本和通本两种，在京各部院呈进者称为部本，各地方官员进呈者称为通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满文题本104万件，其中绝大部分为残题本，共计96万件，完整题本8万件。完整题本的起止时间为顺治元年至光绪二十四年。

2. 黄册

黄册是随题本进呈的附件之一，因以黄绫作封面而得名。现存满文黄册3500余件，起自顺治二年，止于光绪二十九年。

3. 秘书院档

该档是抄录秘书院缮拟颁发的制、诏、诰、敕和祭文、祝文、碑文，以及本院进呈的启奏本章和王、公、贝勒、贝子的贺表等文书而成的簿册。

4. 票签档

该档是抄录题本事由及其所奉谕旨而成的档簿。起自顺治二年六月，止于顺治九年九月，一般一月或半月为一册，共计102册。

5. 史书

史书是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抄录题本事由及批红而成的档簿。起自顺治四年十月，止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每月为一册。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史书，绝大部分是满文，而且抄录的事由也越往后越简略。仅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史书就有3275册。

6. 秘本档

该档是抄录官员进呈的秘本而成的档簿。起自顺治十一年正月，止于康熙十九年正月，每月或半月为一册，共计153册。

7. 清折档

该档又正称别样档，是抄录军机处转交内阁传抄与在京各部院

办理的奏折及其所奉上谕而成的簿册。起自乾隆元年，止于嘉庆九年，乾隆朝的清折档按季为册，嘉庆朝则按月为册，共计 102 册。

8. 俄罗斯档

该档抄录有关官员办理与俄罗斯国交涉事务过程中呈进的题本奏折和发行的咨文，以及俄罗斯国来文而形成的档簿。起自顺治十二年五月，止于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不按年月而视其厚度装订成册，共计 24 册。

9. 八旗世袭谱档

该档是记录八旗世职官员的世系及家谱而成的档簿。起自顺治朝，止于光绪朝，共计 119 册。

10. 蒙古堂档

该档是内阁蒙古堂（即蒙古房）抄录有关文件而成档册总称，抄录的文件主要有内外蒙古王公、西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少数民族僧俗首领的奏书，以及颁给他们的诏、诰、敕等。其封面所书名称极不统一，如诏档、诰敕档、敕奏档、来文档、和图档等。起自顺治十三年，止于乾隆五十一年，共计 110 册。

11. 满文老档

该档是用无圈点满文记录清入关前各项活动的编年档册。起自明万历三十五年，止于清崇德元年。满文老档的原档 37 册，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乾隆四十年、四十二年以无圈点和有圈点满文分别重抄的草本、正本各两套，每套 26 函，180 册。

12. 国史院档

该档是记录清入关前后各项活动的编年体档册。起自天聪七年正月，止于顺治十八年六月。天聪、崇德朝的档案，或一年为一册，或数月为一册；顺治朝的档案，每月为一册，共计 122 册。

（二）军机处满文档案

军机处是雍正八年为办理西北军务而设立的专门机构，后来逐渐总揽国家机要政务，实际上成为清朝的中枢机构。宣统三年责任内阁成立后，军机处即被撤销。现存军机处满文档案数量较多，公文种类整齐，保存比较完好。

1. 月折包

满文月折包是清代军机处按一定秩序打包保存的满文公文档案的总称。军机处每天承接办理的各种公文中，奏折数量最多。经皇帝朱批的奏折，称朱批奏折。军机处将朱批奏折发还给具奏者之前，照抄一份，称之为录副奏折。由于录副奏折每月或半月为一包归档存查，故名月折包。另外，军机处每日接办的咨文、呈文以及奉旨缮拟的谕旨、查复议奏等文件，也按月归入各该月的月折包内存查。但其中录副奏折仍占绝对多数。月折包内文件有 4500 余卷（盒），18 万余件，起自雍正八年，止于宣统三年。

2. 月折档

该档是按编年体抄录录副奏折而形成的档簿。因按月为册，故名月折档。现存满文月折档，起自雍正八年，止于宣统三年，共计 2480 余册。乾隆二十九年的月折档分军务和寻常两项装订成册，军务项集中反映有关军务，而寻常项集中反映有关庶务。

3. 上谕档

该档是抄录军机处承宣的上谕而成的档簿。上谕档分大本和小本两种，小本为原始抄录而成者，大本则为后来转抄而成者。小本上谕档共有 386 册，起自雍正九年，止于宣统二年。大本上谕共有 615 册，起自雍正八年，止于宣统三年。大上渝档乾隆二十九年前分军务和寻常两项装订成册，小本上谕档则不分。

4. 议复档

该档是按编年体汇抄军机大臣遵旨议奏和办理公务过程中请示汇报事宜所进奏折、奏片以及所奉谕旨而成的档簿。共有 731 册，起止时间为雍正八年至宣统二年。其中大本 439 册，小本 292 册。在乾隆二十九年前大本分军务和寻常两项装成册，小本则不分。

5. 准噶尔档、夷使档、熬茶档、北路军务档、西路档

此五种档虽然名称和形成的时间各不相同，但汇抄的文件种类和内容基本一致，都是汇抄有关准噶尔问题的奏折、上谕、寄信、奏书等文件而成的档簿，起止时间为雍正九年至乾隆十九年。其中准噶尔档 9 册，熬茶档 4 册，北路军务档 2 册，夷使档 18 册。

6. 土尔扈特档

该档是抄录有关土尔扈特蒙古东归及其安置事宜的奏折、上谕、寄信和议复等文件而成者。起自乾隆三十六年，止于乾隆三十七年，共计 24 册。

7. 西藏档、巴勒布档、郭尔喀档

该三种档是抄录有关处理西藏事务，出兵击退郭尔喀侵藏军队，以及办理善后事宜的奏折、上谕、寄信和议复等文件而成的档簿。起止时间为乾隆十五年至五十八年，其中西藏档 13 册，巴勒布档 4 册，郭尔喀档 8 册。

8. 班禅事件档

该档是抄录有关官员办理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入觐事务过程中进呈的奏折和所奉上谕，以及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贡单和乾隆帝赏单等文件而成的档簿。起止时间为乾隆四十五年至四十六年，共计 10 册。

9. 金川档

该档是抄录清廷派兵平定大小金川的有关奏折、上谕、寄信等文件而成的档簿。起止时间为乾隆三十四年至四十一年，共计 15 册。

10. 年班来京回番档、回子土司郭尔喀档、回子伯克档

此三种档虽然名称不一，但其所记内容基本相同，是抄录接待年班来京朝觐的新疆伯克、四川土司、郭尔喀使臣等人员的有关奏折、上谕、贡单、赏单等文件而成的档簿。年班京回番档 10 册，起止时间为乾隆十三年至嘉庆二十四年。回子土司敦尔喀档 5 册，起止时间为道光二年至光绪十六年。回子伯克档 4 册，起止时间为道光二十二年至咸丰元年。

11. 俄罗斯档

该档按编年体汇抄与俄罗斯交涉事宜的奏折、上谕、寄信、议复、咨文等文件而成的档簿。起止时间为乾隆朝至光绪朝，共计 91 册。

（三）内务府满文档案

内务府是专门管理宫廷事务的机构。清初设立，顺治十年裁。设御用监、内官监、尚衣监等十三衙门。顺治十八年废十三衙门，重设内务府。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后，虽然清朝被推翻，但内务府仍继续存在，至 1924 年溥仪被驱逐出宫时，才最终废除。现存内务府满文档案，文种之繁杂，数量之庞大，仅次于承办国家政务的内阁和军机处。

1. 奏销档

该档是汇抄内务府以奏本、题本、奏折、绿头牌、口头等形式所奏事件及所奉谕旨而成档簿的总称。此档名称极不统一，如“右司奏事档”“乾清宫等处奏本档”“本府口奏绿头牌白本档”“本府白本奏销档”等。从雍正朝开始，才有“奏销”二字。现存奏销档起自顺治十一年，止于宣统六年，共计 938 册。

2. 上传档

该档是总管太监、御前太监等所传谕旨和内务府大臣进呈的奏

折等文件而成的档簿。起止时间为顺治十六年至咸丰十一年，共计186册。

3. 红本档

该档是按编年体汇抄内务府题本及其批红而成的档簿。起止时间为顺治十七年至咸丰七年，共计156册。

4. 行文档

该档按编年体汇抄内务府咨各部院等处之文而成的档簿。起止时间为顺治十七年至咸丰七年，共计156册。

5. 来文档

该档是抄录各部院等处来文而成的档簿。起止时间为顺治十五年至雍正十三年，共计44册。

6. 钱粮册

它是内务府所属上三旗造送隶属各佐领下官员、兵丁和鳏寡孤独等人领取钱粮清册。起止时间为康熙朝至宣统朝，共计1356册。

7. 消费档

该档是内务府广储司登记宫中各处领取物品的清册。起止时间为乾隆朝至光绪朝，共计1193册。

（四）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

黑龙江将军衙门是清代管理黑龙江地区军政事务的机构。康熙二十二年设立，光绪三十三年始建行省，改将军为巡抚，撤销将军衙门。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现存12858册，起自康熙二十三年，止于光绪二十六年。其中绝大部分是按兵、刑、户、工四司分类，并以时间为序，抄录黑龙江将军的题本、奏折，与京城各部院、邻近地方将军、副都统、总管等衙门的来往文书，以及下属各官员呈文等

文件而成的档簿。另外，还有一部分所属地方驻防八旗官兵户口册、八旗各佐领比丁册和各官庄民户人口册等。所有这些档案大部分以满文书写，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档案基本上都以满文缮写，从嘉庆朝开始兼有汉文。

（五）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是清代管理宁古塔地方军政事务的机构。顺治十年，在宁古塔（即今黑龙江省宁安）设昂邦章京 1 员、梅勒章京 2 员，总理吉林、宁古塔、珲春、三姓、阿拉楚喀等处地方军政事务。康熙元年，改昂邦章京为将军，梅勒章京为副都统。康熙十五年，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改称吉林将军，宁古塔则设副都统，专管宁古塔地方军政事务，受吉林将军管辖。光绪三十三年，始建行省。宣统元年，撤销宁古塔副都统门。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是按编年体汇抄宁古塔副都统的奏折、咨文、札付，以及中央各部院、邻近地方将军、副都统等来文和下属官员呈文等文件而成的档簿。另外还有该地方驻防八旗和官庄官员造送的官兵户口册、比丁册、官庄民户人口册等。起止时间为康熙十五年至光绪二十六年，共计 1268 册。其中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档案基本上以满文书写，嘉庆至光绪五朝的档案满汉文兼有，越往后汉文越多，但满文档案仍占多数。

（六）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是清代为管理土默特蒙古左右两旗事务而专门设立的机构。土默特蒙古又称归化城土默特蒙古。明隆庆年间，土默特蒙古阿勒坦汗受封顺义王后，兴建呼和浩特城，即归化城。归化城副都统衙门就设在该城内。乾隆初年，于归化城东北五里地方新建一城，名为绥远城。不久，右卫建威将军移驻绥远城，并改称绥远将军。清初，土默特蒙古被编为左右两旗，各设都统 1 员、

副都统2员管理旗务。乾隆二十八年四月，裁都统1员，留副都统1员管理土默特两旗事务，移副都统1员驻绥远城协助将军管理该城驻防八旗事务。归化城副都统隶属绥远将军。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现存满文档案共有折件9513件、档簿271册，起止时间为雍正六年至民国3年。折件主要包括归化城副都统衙门与中央各部院、绥远将军、邻近各扎萨克旗之间的来往文书，以及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所属各机构、各牛录官兵旗民的呈文等。档簿则多为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收发文登记簿，各牛录呈送的草场、地亩、人口清册和户司行文档。

由于篇幅所限，对现存清代满文档案不能再一一细述。除上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内阁、军机处、内务府、宁古塔副都统衙门，以及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黑龙江将军衙门、土默特左旗档案馆保存的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外，现存的清代满文档案，还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宫中各处、宗人府、阿拉楚喀副都统衙门、珲春副都统衙门，以及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盛京内务府、三姓副都统衙门，黑龙江省双城市档案馆保存的双城堡协领衙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档案馆保存的呼伦贝尔总管衙门的阿拉善旗档案馆保存的阿拉善旗扎萨克衙门等机构的满文档案。

三　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和翻译出版

现存的清代满文档案数量庞大，无论是整理编目，还是翻译出版，其工作任务都极为艰巨。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经过几代满文档案工作者的艰苦不懈努力，清代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和翻译出版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到目前为止，所有清代满文档案，经过初步整理，基本上做到

了“有目可查，有规可循”。为了保持历史档案内在的联系和原貌，便于保管和利用，在档案整理的过程中，首先按全宗原则进行划分档案。全宗是一个机关或著名人物在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档案。将各个全宗视为相对独立的整体，依此作为划分档案的标准，力求各个整体内的档案完整性和整体间的档案不易混杂，这便是全宗原则。按照这一原则，现存的清代满文档案划分为内阁、内务府、宗人府、宫中各处、盛京内务府、黑龙江将军衙门、宁古塔副都统衙门、三姓副都统衙门、阿拉善旗扎萨克衙门、呼伦贝尔总管衙门、双城堡协领衙门、归化城副都统衙门、阿拉善旗扎萨克衙门、呼伦贝尔总管衙门等全宗。每一全宗内的档案，又按其不同的类别，采取了不同的整理方法。一般来讲，档簿类的档案，采用文种—朝年的原则整理，逐册登记编目。目录填注之项有档号、档册名称、时间和册数。折件类的档案，采用文种—朝年，或文种—问题—朝年的原则整理，逐卷逐件登记编目。逐件登记编写的目录填注之项有档号（包括卷号和件号）、文件作者、时间和件数，而逐卷登记编写的目录填注之项有档号（即卷号）、案卷名称、卷内文件起止时间和件数。这种整理主要是档案实体的顺序整理，虽然便于保管和按时间查找利用，但不便于按问题、人物、地区查找利用，要查找利用某一专题档案文件，则需要将有关档案逐件逐册从头到尾翻阅一遍，既费时耗力，也不利于保护档案原件。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随着档案实体的顺序整理工作的基本完成，为了适应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和更好地向社会提供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选择利用率较高的档案，根据《档案著录规则》和《明清档案著录细则》，采用文件级卡片式著录格式，对档案进行著录工作。著录是“在编制档案目录时，对档案的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分析、选择和记录的过程”。[①] 满文档

① 《档案著录规则》，第1页。

案的规定著录项目有分类号、档号（即由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和文件诸号组成，各号之间，以“—”号相隔）、胶片号（包括卷号和拍号）、题名（即文件摘由）、责任者（即文件作者）、文种、文件形成时间、附注（包括语种、件数、档案实体状况）、主题词等十项。现已完成了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宫中上谕和部分内阁题本的著录工作，共计著录卡片20余万张。从1999年下半年起，开始将这些著录卡片录入计算机，准备建立满文档案数据库，以期向社会各界提供更多的信息服务。另外，又利用著录卡片编制了两部专题目录，一为《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共收录档案条目12万余条，共计900万字，精装12册，1999年4月由广西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二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与藏事档案目录》（满文部分），共收录档案条目12000余条，共计100万字，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满文档案不同于汉文档案，通晓满文并且能直接利用满文档案者寥寥无几，客观现实需要满文档案工作者不仅整理好档案，而且要翻译出版档案。因此，满文档案工作者除整理编目外，一直重视翻译工作。到目前为止，编译出版的满文档案主要有：清代中俄关系满文档案约计100万字，编入《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共分五编），其中第一编和第三编分别于1981年3月和1979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崇德七年奏事档》约计2万字，编入《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1辑，198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一册，共计34万字，1984年12月由辽沈书社出版；《盛京刑部原档》一册，共计15万字，1985年3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清雍正朝镶红旗档》一册，共计9万字，1985年4月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选择光绪朝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32件，共计37000字，编入《清代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选编》两册，1986年10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雍乾两朝镶红旗档》一册，共计17万字，1987年2月由天津古

籍出版社出版；《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一册，约计19万字，1987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一册，共计21万字，1988年2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锡伯族档案史料》上、下两册，收录档案742件，其中满文档案647件、汉文档案95件，共计60万字，1989年7月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中、下三册，共计100万字，1989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满文老档》上、下两册，共计100万字，1990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入关前形成的满文木牌和盛京吏、户、礼、兵四部满文档案等文件，共计244件，全部汉译，约计12万字，冠以《盛京满文旧档》之名，编入《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辑，1990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四册，共计130万字，其中汉译收录的满文题本占有一定的数量，分别于1989年9月和1992年4月，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汇编》上、下两册，共计82万字，其中从辽宁省档案馆藏顺治年间档、黑图档和盛京内务府档内选择的满文档案不少；《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一册，共计40万字，1994年4月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出版；《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私卖玉石案满文档案》共计8万字，编入《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第一册，1994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汉译有关清代西藏的满文档案21万字，编入《元以下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1994年10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一册，共计30万字，翻译收录有关满文奏折195件，1995年8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册，收录朱批满文奏折4297件，包括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所有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共计270万字，1996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六世班禅额德尼入觐档案史料》一册，翻译收录了有关满文档案工

8 万字，1996 年 11 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下两册，收录满文朱批奏折 5434 件，也包括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所有雍正朝的满文朱批奏折，共计 469 万字，1998 年 12 月由黄山书社出版。另外，还有《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档案史料选编》一册，翻译收录有关满文档案 15 万字；《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一册，翻译收录有关满文档案 5 万字。

除以上编译成书的各种满文档案史料外，还有 20 余种小型专题的满文档案史料，经翻译后，均发表在《历史档案》季刊上。主要有：《新发现的查抄李煦家折单》（1981 年第 4 期）、《满文国史档选译》（1982 年第 4 期）、《康熙年间吉林至爱珲的驿站》（1982 年第 3 期）、《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家世档案史料》（1984 年第 1 期）、《顺治年间甘肃回民起义史料》（1986 年第 4 期）、《有关多尔衮史料选译》（1987 年第 3 期）、《乾隆五十四年中俄贸易史料选译》（1987 年第 3 期）、《台湾朱一贵抗清史料》（1988 年第 2、3、4 期）、《查访土尔扈特回归奏折选译》（1988 年第 2 期）、《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1988 年第 4 期）、《朱一贵余部抗清斗争史料》（1989 年第 4 期）、《顺治十七年招抚赫哲等部族之人史料》（1995 年第 2 期）、《祖大寿家族中的一起袭职之争》（1995 年第 2 期）、《康熙朝山西巡抚噶礼满文奏折选译》（1995 年第 4 期）、《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圆寂前后史料选译》（1995 年第 4 期）、《两广总督傅拉搭密陈于成龙劣迹满文奏折》（1996 年第 3 期）、《两江总督阿山参劾张鹏翮满文奏折》（1996 年第 3 期）、《宗札布案满文译稿》（1997 年第 1 期）、《清初划一升斗史料》（1997 年第 2 期）、《乾隆初年修建沈阳故宫史料选译》（1997 年第 2、3、4 期）。

清代满文档案的翻译出版，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鲜而翔实的材料，得到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好评。

四　清代满文档案的价值

清代满文档案可谓包罗万象，涉及面极为广泛，且所反映的内容多不见于汉文档案和其他文献，具有重要的利用和研究价值。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研究清代通史和各种专史的第一手资料。满文档案作为清朝统治者在处理政务过程中形成的公文，具有可靠的凭证作用，它是研究历史的最原始、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清实录》《清朝文献通考》《清会典事例》及各种官修方略、地方志等书，虽然都根据档案编纂，所记载的史料也很丰富，但毕竟属第二手材料。这些书由于受作者立场观点和篇幅所限，有不少史料被简略或删除。档案则不同，它是国家各级机关处理公务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同时较清楚地反映事物发展的全过程。换句话说，围绕某一问题，往往形成几件甚至十几件或上百、上千件公文，详尽反映这一问题的起因、发生、变化和结果。这就是说，档案史料的详尽程度远远胜过其他文献史料，对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清代满文档案的开发利用，能使历史研究更加系统完善；可以更正以往研究中出现的偏差，恢复历史的原貌；可以补充有关史籍记载之不足，使历史研究更加趋向深入细致。

其次，是研究满语文的取之不尽的宝库。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语文作为我国多民族家庭中满族曾经使用的语言文字，在历史上为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由于历史上的诸多原因，现在满族基本上不使用其语言文字，而是使用汉语文。所以，语言学家要研究满语文，多以文献资料为依据。清代满文档案与其他文献比较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特别是地方机构形成的满文档案，语言朴实，很少有

修饰，有一定的口语化成分，为满语文研究提供了更为原始并且丰富的材料。

再次，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历时290余年，曾有过“康雍乾盛世”，国力强大，社会安定，文化繁荣。19世纪中叶，清政治走向腐败，社会矛盾加剧。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列强乘机入侵，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中国社会沦落为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社会。在外侮面前，我国各族人民开展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斗争，出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代表人物。通过整理出版，撰写文章，或开办展览等形式，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最后，满文档案中有关水文、气象、地理、矿产等方面的文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治理江河，可利用有关水文资料，查找历史上江河水流量的变化和水灾治理情况，从而为制定正确的方案提供重要依据。又如兴建大型建筑，则可利用有关地震、地质方面的资料，以便选定合适的地点和建筑结构。

清代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及其史料价值

吴元丰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明清两朝档案1000余万件，绝大部分是清朝档案。其中满文档案200余万件，占整个馆藏档案的1/5。这些满文档案分属内阁、军机处、宫中各处、内务府、宗人府以及宁古塔副都统衙门、阿拉楚喀副都统衙门、珲春协领副都统衙门等全宗。满文月折包是军机处按一定秩序打包保存的满文公文档案的总称，属于军机处全宗的档案。满文月折包的保存状况较好，基本上保留了历史原貌，而且文件数量之巨大，内容之丰富，时间跨度之长，均居其他满文档案之首，具有重要的利用和研究价值。本文仅就满文月折包的形成、特点、主要内容及其与相关满文档案的关系和史料价值等诸问题，做一概述，谨请各位同人赐教。

一　满文月折包的形成及其特点

军机处是清代办理军机事务处之简称，雍正八年（1730）设立，宣统三年（1911）撤销。军机处是清代皇权高度集中的产物，是承

旨出政、综理全国军政要务的中枢机关。军机处内部分设满军机处和汉军机处，俗称满屋和汉屋，分掌其职。军机处设军机大臣，由满汉大员内拣派入值；军机章京满汉十六人，分为两班，每班满汉各八人，其中一人为领班。据《枢垣纪略》记载："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复奏议，系清字者，皆由满洲章京办理，系汉字者，皆有汉章京办理。"这就是说，军机处的文书处理制度，按"清字"和"汉字"两种文字分别处理归档。另外，从现存的军机处档案状况来看，满文档案和汉文档案就是分开归档保管的，自成一个体系。

清朝定满语为国语，称满文为清字。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满蒙官员，特别是承办八旗事务及边疆事务的满蒙官员，一般都用满文缮写公文，不准擅自使用汉文，否则，重者治罪，轻者训饬。与此相适应，有关谕旨、寄信及各部院的行文，也都用满文书写。因此，有清一代形成了大量的满文公文档案。

军机处作为中枢机关，每天都承接办理各种公文，其中最多的属奏折。奏折是清代官员向皇帝请示汇报事宜的重要文书之一。皇帝用朱笔批阅的奏折，称朱批奏折。军机处在收发朱批奏折过程中，照朱批奏折抄录一份，称之为录副奏折。由于录副奏折按月或半月为一包归档保存，故名"月折包"。此外，军机处还接受办理在京各部院和外省驻防将军、大臣等官员的咨文、呈文等，并奉旨缮拟谕旨，查复议奏。这些文件，也按月归入各该月的月折包内保存。因此，满文月折包内保存的公文种类比较多，主要包括录副奏折、录副奏片、议复奏折、议复奏片、上谕、寄信、咨文、移文、呈文，以及作为奏折附件呈进的履历、口供、图纸、清单、清册和少数民族首领用本民族文字缮写的奏书、呈文等。从各种公文的数量上来看，录副奏折、录副奏片及作为其附件呈进的履历、口供、图纸、清单、清册占绝大多数，咨文、移文、呈文次之，议复奏折、议复奏片、上谕、寄信再次之。

军机处在处理公文的过程中，凡皇帝用朱笔批阅过的奏折，除

请安折外，其他内容的奏折、奏片均逐件抄录，而后存入月折包，原折发还给具奏者。在抄录朱批奏折时，不抄录随折呈进的履历、口供、图纸、清单、清册等附件，将其原件直接存入月折包。至于在京部院和外省官员的咨文、移文、呈文，以及军机大臣的议复奏折、议复奏片和负责起草的谕旨底稿等，也不另行抄录，将其原件直接存入月折包。这样，在满文月折包内保存的文件，除录副奏折、录副奏片为抄件外，其余均属原件，不少咨文、移文、呈文和清册上均钤有官印。

乾隆二十五年（1760）前的满文月折包分“军务包”和“寻常包”两种。众所周知，乾隆二十五年前，西北战事频繁，来往文件较多。军机处在处理文件的过程中，为了便于日后查考，就将有关西北军务的文件集中起来，按月打包，称之为“军务包”。与此同时，将一般公务的文件也集中起来，按月打包，称之为“寻常包”。“军务包”和“寻常包”并不分别排列保存，而是按年月顺序混合排列保存。当西北战事结束后，就不再分“军务包”和“寻常包”。但遇有重大事件时，还是将有关文件集中起来，视其数量之多寡，一月或若干月为一包，在包裹纸上用汉文注明某某档。如有关平定金川文件的包上，注明“金川档”；有关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入觐文件的包上，注明“班禅事件档”；有关土尔扈特东归文件的包上，注明“土尔扈特档”。所有因重大事件而形成的月折包，一般统称为“专档包”。“专档包”按月为序排列后，置于每年“寻常包”之末。

满文月折包内文件具有一定的排列顺序。其中录副奏折均按朱批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在奏折封底右上角用汉文的小写数字编写顺序号，并按一定的厚度，将若干件奏折用纸条扎成箍，称为一箍。随奏折呈进的各种附件，若系满文，则附在各该奏折之后排列，并给予单独的编号；若系汉文或其他文字，则不挨着各该奏折之后排列，而另行抽出，在其封底左上角用汉文写明各该奏折的朱

批时间、作者名称、顺序号和附件的名称后，集中置于该月录副奏折之末；若系察哈台文、藏文、托忒文等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和俄罗斯文、缅甸文等外国文字，也不挨着各该奏折之后排列，而是另行抽出，用纸条打箍，并在打箍的纸上用满文写明其作者和文书的名称后，置于该月录副奏折之末。凡满汉合璧的奏折，一律拆开，满文部分按一般满文录副奏折进行排列编号，而汉文部分照汉文附件方式进行处理。其余上谕、寄信、议复奏折、未奉朱批奏折、咨文、呈文等文件，均合在一起，用纸打包，上书汉文“杂包”字样后，又置于该月录副奏折之末。

录副奏折与朱批奏折比较，有其一定的特点。除照朱批奏折逐字逐句全部抄录外，还要标注每件奏折的事由、朱批时间、处理结果等项。雍正朝和乾隆初期的满文录副奏折的最末一扣背面或正面贴有汉文纸签，上书朱批时间、具奏者姓名、文件事由、附件名称件数和文件的处理结果，并在奏折之末尾用满文缮写朱批时间。其说明文件处理结果的文字极为简单，凡奉旨需要议复者，写“议”字；需要移交有关部院办理者，写“交”字。乾隆初期以后的满文录副奏折，在其封面上用满文缮写具奏者姓名、文件事由，用汉文缮写朱批时间、附件名称件数和文件的处理结果。凡需要在京各部院处理的奏折，在其封底右下方，用满文或汉文缮写“将此交某某部院”字样。另外，在录副奏折打箍纸条上，用汉文注明该箍录副奏折的朱批时间、作者姓名的第一个字、件数、扣数、附件名称及其抄录核对者姓名等项。

二　与满文月折包相关的几种满文档案

清朝各部门都有完善的公文归档和保管制度，特别是在公文的运转过程，除做好收发文的登记和原件的保存工作外，还要按一定

的原则抄录副本存档。据《枢垣纪略》记载：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起，“凡本处（即军机处——引者注）清字、汉字档，每届五年由军机大臣奏请另缮一份，以备缺失。清字档令方略馆译汉官缮写，汉字档令内阁中书缮写，皆派本处章京二人校对”。在每次另行缮写工作结束后，新旧档案一同保存。这样，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档案内，就有一部分与满文月折包相关的档案，其中既有原件，也有副本。为了进一步认识军机处满文月折包的形成特点及其研究价值，有必要了解与满文月折包相关的满文档案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一）朱批奏折

奏折作为公文使用，始于清康熙年间。当时，皇帝用朱笔批阅的奏折都发还给呈进奏折的官员，遵照朱批办完有关事宜后，就归各该官员自行处理，并不缴回集中保存。俟雍正登极后，特颁谕旨，令全国各级官员缴回所有康熙帝和自己批阅过的奏折。从此，缴回朱批奏折成为一项定制。凡有奏事权限的官员，当接到朱批奏折并处理完有关事宜后，均将其打包密封定期缴回，集中存放在皇宫内。这些缴回的朱批奏折，原先基本上以包为单位保存，在包上注明缴回者姓名，故称之为“人名包”。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朱批奏折，共有 2684 包、1787 卷（即后人整理组卷者），约计 10 余万件。起止时间为康熙至宣统年间。朱批奏折与录副奏折比较，朱批奏折是原件，而录副奏折是抄件，两者内容大致相同，没有多大差异。所不同的是：朱批奏折只有具奏时间，而录副奏折既有具奏时间，也有朱批时间；军机处成立后的朱批奏折内均无附件，其附件都随录副奏折保存在月折包内；朱批奏折内有请安折，而月折包内则无请安折；在朱批奏折上没有任何记注性的文字，录副奏折则不然，有不少记注性的文字，如文件事由、顺序编号、附件名称及数目等。

（二）月折档

此档系军机处按编年体汇抄月折包内的录副奏折及其附件而成的档簿。该档封面上书写的名称为“奏折档”，但因按月装订成册，故又名“月折档”。其页面尺寸为 40cm × 28cm。在封面上用满文书写档案的形成时间和名称。如乾隆四十三年正月的月折档，封面正中书写“abkai wehiyehe dehi ilaci aniya aniya biya”，汉译为“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左上方书写“wesimbuhe bukdari i dangse”，汉译为“奏折档”。现存满文月折档 2480 册，起自雍正八年（1730）二月，止于宣统三年（1911）七月。乾隆二十五年（1760）前的月折档分“军务”和“寻常”两项装订成册，并在封面上用满文分别写明“coohai nashūn i baita”和“ani jergi baita”，汉译为“军机事务”和“寻常事务”。军务项档簿集中抄录有关军务方面的文件，寻常项档簿则集中抄录有关庶务方面的文件，而且军务项档簿视其厚度数月订成一册，与寻常项档簿每月订成一册的情况不同。此档以奏折的朱批时间为序编排装订，附件均随各该正件之后排列。月折档与录副奏折比较，两者均属奏折的副本，内容差异无几。所不同的是：月折档只有朱批时间，而录副奏折既有具奏时间，也有朱批时间；月折档内没有作为附件的图纸，而月折包内就有随奏折呈进的各种图纸。

（三）上谕档

此档系军机处按编年体汇抄明发上谕而成的档簿。明发上谕是指由军机大臣撰拟，经皇帝审阅后通过内阁颁发的上谕。此种上谕转交内阁颁发之前，军机处均抄录存档，按一定的厚度装订成册，乾隆二十五年（1760）前分“军务”和“寻常”两项装订成册。满文上谕档分大小两种，小本系原始抄录者，大本则系后来照小本抄录而成者，两者内容相同。小本页面尺寸 27.5cm × 25.5cm，现

存386册，起自雍正九年（1731），止于宣统二年（1910）六月。在封面上，用汉文书写档案形成时间和“明发”二字。大本页面尺寸39.8cm×28.5cm，现存615册，起自雍正八年（1730）三月，止于宣统三年（1911）四月。在封面上，用满文书写“dergi hesei dangse”，汉译为“上谕档”。另外，还用满文书写档案形成的时间，并有一些记注性的汉字。将上谕档与月折包核对后发现，月折包内的上谕远远少于上谕档内抄录的上谕，而且月折包内的上谕多为字迹潦草或涂改过的底稿。这就说明，月折包内保存的只是部分上谕的草稿，并不包括所有明发上谕。上谕的原件起初也不缴回保存，至雍正登极后才有规定，定期缴回，集中存放在皇宫内。上谕档与上谕原件比较，内容相同，凡皇帝用朱笔改过之处，也都照样抄录，而且注明“fulgiyan fi”，汉译为“朱笔”。所不同的是正副本之别，且作为副本的上谕档内记注文书处理情况及抄录和校对者姓名。这种记注性的文字，一般都写在各文件之末，但在内容上，大小本之间有区别，小本无抄录和校对者姓名，大本则无具体交办者姓名。如，小本“erebe coohai jurgan aniya aliha gūsade afabu seme dorgi bithesi bešeo de afabuha”，汉译为“已交付中书伯寿，将此交兵部、值年旗”；大本“erebe coohai jurgan aniya aliha gūsade afabuha. lingcun araha，šuwenggui acabuha”，汉译为“将此交兵部、值年旗。灵春抄录，双贵校对”。

（四）寄信档

寄信系寄信上谕的简称，又称“寄谕”“字寄”“廷寄”。寄信上谕是指由军机大臣撰拟，经皇帝审阅后以军机大臣之名通过寄信方式发出的上谕。此种上谕发出之前，军机处也都抄录存档，按一定的厚度装订成册。满文寄信档也分大小两种，小本系原始抄录者，大本则系后来照小本抄录而成者，两者内容相同。小本页面尺寸27.5cm×25.5cm，现存93册，起自乾隆十五年（1750）二月，

止于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在封面上，用汉文书写档案形成时间和“寄信档”三字。大本页面尺寸 39.8cm × 28.5cm，现存 228 册，起自乾隆十五年（1750）二月，止于同治八年（1869）四月。在封面上，用满文书写“hesei jasigan dangse”，汉译为“寄信上谕档”。另外，还有档案形成时间。将寄信档与月折包核对后发现，月折包内的寄信远远少于寄信档内抄录的寄信，而且月折包内的寄信多为字迹潦草或涂改过的底稿。这就说明，月折包内保存的只是部分寄信上谕的草稿，并不包括所有通过寄信方式发出的上谕。寄信上谕原件也定期缴回，集中存放在皇宫内。寄信档与寄信上谕原件比较，内容相同，凡皇帝用朱笔改过之处，也都照样抄录，而且注明“fulgiyan fi”，汉译为“朱笔”。所不同的是正副本之别，且作为副本的寄信档内记注文书处理情况。如，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军机大臣发给伊犁将军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等员寄信，在其正文之末，用满文记注“erbe juwu ubu sarkiyafi，emu ubu be yungboo i bukdari sasa unggiheci tulgiyen，emu ubu be dorun gidaha dobton de tebufi kuilin sede unggihe”，汉译为“将此抄录两份，除其中一份随永保奏折一同发行外，一份装入封套钤印，发给奎林等”。又如，“erbe emu ubu sarkiyafi，dorun gidaha dobton de tebufi coohai jurgan de afabufi，duin tanggū ba bilafi feksibume si ning de unggihe”，汉译为“将此抄录一份，装入封套钤印，交付兵部，四百里驰递西宁”。

（五）议复档

此档系按编年体汇抄军机大臣遵旨议奏和办理公务过程中具奏的折片及其所奉谕旨而成的档簿，按一定的厚度装订成册，乾隆二十五年（1760）前分“军务”和“寻常”两项装订成册。满文议复档也分大小两种，小本系原始抄录者，大本则系后来照小本抄录而成者，两者内容相同。小本页面尺寸 27.5cm × 25.5cm，现存

292册，起自雍正八年（1730），止于宣统二年（1910）。在封面上，用汉文书写档案形成时间和“议复档”三字。大本页面尺寸39.8cm×28.5cm，现存439册，起自雍正八年（1730），止于宣统二年（1910）。在封面上，用满文书写“gisurefi wesimbuhe dangse”，汉译为“议复档”。此外，还写档案形成时间。议复档与月折包内保存的议复折片比较，二者内容相同。有所不同的是，议复档内记注文书处理情况及抄录和校对者姓名。这种记注性的文字，一般都写在各该文件之末，但在内容上，大小本之间有区别，小本无抄录和校对者姓名，大本则有。如，小本“erebe coohai jurgan beidere jurgan de afabu seme dorgi bithesi šuwangboo de afabuha”，汉译为“已交付中书双保，将此交兵部、刑部”；大本“erebe coohai jurgan beidere jurgan de afabu seme dorgi bithesi šuwangboo de afabuha. lingcun araha，šuwenggui acabuha”，汉译为“已交付中书双保，将此交兵部、刑部。灵春抄录，双贵校对”。

（六）日记档

此档系满军机处值班日记，按季装订成册。在封面上，除用汉文书写档案形成时间外，还书写“日记”或“日记档”等字。页面尺寸为17.5cm×7.5cm。现存日记档620册，起自乾隆二十三年（1758），止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该档按日记录值班日期、值班者姓名和收发公文的名称、作者、事由，以及公文处理情况等事项。如，乾隆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记载：“juwe biyai orin jakūn. fusembu，šanggan ○canggiyūn bortu dabagan be wecefi haršar de mariha babe wesimbuhe bukdari de saha seme pilehe. sarkiyaha，afabuha；○geli haršar i jergi bade duleke aniya tuweri ambarame nimaraha babe wesimbuhe bukdari de saha seme pilehe. sarkiyaha，afabuha；○arigūn sei baci wesimbuhe funggala da masangga muktene be juwan i da sindaha babe wasimbuha hese；○yūn nan de isinaha

manggi hacihiyame ulabure babe umesi oyonggo obufi sain gūnin tebukini seme fekjime dasara amban fu de jasire hese。”汉译为：“二月二十八日，富森布、尚安 ○常钧奏闻祭毕博尔图岭返回哈喇沙尔情形折，朱批：知道了。钦此。已抄、已交。○又奏闻去年冬哈喇沙尔等地降大雪情形折，朱批：知道了。钦此。已抄、已交。○上谕为著将阿里衮所奏翎总玛桑阿穆克特讷补授护军校事。○寄信经略大臣傅〔恒〕为俟抵达云南后所有宣示事项作为要务尽心尽意事。”若某日无事，则除登记日期和值班者姓名外，还要写“baita akū, amba sain”或“baita akū, amba urgun”等字，汉译为“无事，大吉”或“无事，大喜”。实际上，日记档既是满军机处的值班日记，也是月折包、月折档、上谕档、寄信档、议复档等档案的目录。

（七）清折档

此档又名“别样档”，是内阁抄录军机处转交有关奏折及其所奉谕旨而成的档簿。乾隆朝档按季装订成册，嘉庆朝档则按月装订成册，页面尺寸为41.5cm×28cm。在封面上，除用汉文书写档案形成时间外，还书写“清折档”或“别样档”等字。现存清折档102册，起自乾隆元年（1736），止于嘉庆九年（1804）。在清折档内抄录的奏折，主要是应交在京各部院等机关处理的奏折，并不包括所有的录副奏折。清折档的抄录方式，也不同于录副奏折，而是进行摘抄，各件的摘抄详略不一，有的比较简略，有的比较详尽。凡奉朱批“即有旨”或“另有旨”的奏折，均将所颁谕旨抄录在清折档内有关奏折之后，而录副奏折和月折档就不如此抄录，而是只抄朱批的内容。另外，在清折档内，还有一些具有其自身特点的记注性文字。清折档按接到文件的时间为顺序抄录，在抄录每天接到的文件前，都要先写明日期和送来文件者官职、姓名。如，“duin biyai juwan duin de jungšu tung i i benjihe”，汉译为“四月十四日，中书佟怡送来”。而后，才逐件抄录当日收到的文件。在文

件的末尾，还记注交给相关部门的情况。这种记注性的文字，或用汉文书写，或用满文书写。用汉文书写的有“班上交户工兵理讫”“班上交兵当月旗讫”“班上交吏兵礼工户内务府理当月旗讫”等字，用满文书写的有“erebe iduci monggu jurgan boigun i jurgan de afabuha”“erebe iduci coohai jurgan boigun i jurgan biya aliha gūsa de afabuha”“erebe iduci biya aliha gūsa coohai jurgan beidere jurgan de afabuha”等文字，汉译为“将此，班上交理藩院户部讫”“将此，班上交兵部户部当月旗讫”“将此，班上交当月旗兵部刑部讫”。

介绍与月折包相关的满文档案后，我们可进一步了解到满文月折包，当可称为军机处满文档案的总汇，是现存满文档案内最珍贵的一部分档案，具有十分重要的利用和研究价值。同时，了解满文月折包及其相关的档案，也有助于系统地利用档案资料，开展学术研究。

三　满文月折包的主要内容

满文月折包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面亦极广，包括雍正八年至宣统三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地理、外交等诸方面，无所不及，可谓包罗万象。现将其主要内容分类介绍如下。

（一）宫廷事务方面

主要反映：皇帝登极、大婚、巡幸、行围、丧葬和后妃的挑选、册封、丧葬；皇宫、行宫、园囿、陵寝、寺庙的修建、维修和警卫等情况。

（二）职官方面

主要反映：在京中央各部院和各地驻防将军、都统、副都统、

参赞大臣、办事大臣、总管等衙门的设置、变更、裁汰，各地驻防将军、都统、副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和新疆驻防八旗协领、总管、副总管、佐领、防御、骁骑校等员的补放、升迁、考核、引见、朝觐、奖赏、抚恤、处分、请假、休致、丁忧、病故，以及铸颁印信、收发公文、进贡方物、祭祀典礼等情况。

（三）军务方面

主要反映：密云、热河、盛京、熊岳、锦州、山海关、吉林乌拉、伯都纳、宁古塔、三姓、阿拉楚喀、齐齐哈尔、墨尔根、呼伦贝尔、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绥远城、宁夏、西安、庄浪、凉州、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喀什噶尔、阿克苏、叶尔羌、喀喇沙尔、西宁、成都、江宁、京口、杭州、乍浦、荆州、青州、广州、福州等重镇要塞驻防八旗兵丁的挑选补充、裁汰解退、奖赏惩处、操演技艺、驻守台站卡伦、巡查边界、奉调出征，修补兵器、供给粮草、喂养马匹，以及建修黑龙江、吉林乌拉、天津、乍浦等地战船等情况。

（四）民政方面

主要反映：盛京、吉林、黑龙江、外蒙古、内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等地区设立义仓，青黄不接之际，开仓接济；各地遭受灾害，发给钱粮赈济，减免赋税；调解各地界址纠纷，重新划定地界；设立养济院等机构，收养鳏寡孤独等人，以及移民安置、查禁流民、风土人情、火灾消防等情况。

（五）司法方面

主要反映：制定各种法律条文、条例；从内地各省发遣罪犯到黑龙江、吉林、新疆等地，并分地安置和管理；查办盛京、吉林、黑龙江、外蒙古、内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等地区私铸钱币、私酿酒曲、

偷伐林木、偷挖矿产、偷挖人参、私熬盐硝、私贩物品、设场赌博、传播邪教、拐卖人口和偷入围场狩猎等违禁事务；审理拐卖人口、打架斗殴、偷盗抢劫及土地、房屋、债务、强奸等刑事案件的情况。

（六）财政方面

主要反映：按年调拨银两，作为驻防八旗官兵、蒙古汗王、维吾尔族伯克等俸禄、饷银和公费银两发放使用；盛京、吉林、黑龙江、外蒙古、内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等地库存银两、钱文、绸缎、布棉、茶叶和仓存粮食等物品的旧管、新收、开支、实在四项数目的奏销；征收各地房基地、店铺、地亩租银和各项贸易税银；各地驻防八旗设置滋生银两，按期收取息银，养赡鳏寡孤独，发放红白喜事银，以及报销各项工程费用和办公费用等情况。

（七）农业方面

主要反映：盛京、吉林、黑龙江、外蒙古、内蒙古、宁夏、青海、西藏、新疆及热河、宣化等地的禾苗长势，收成分数，粮食时价，兴修水利，扑灭蝗虫，消除鼠灾；哈密、辟展、喀喇沙尔、乌鲁木齐、巴里坤、昌吉、玛纳斯、呼图壁、库尔喀喇乌苏、精河、伊犁、科布多、拉林、呼兰等处，设置兵屯、民屯、旗屯、遣屯、回屯及其沿革、管理、生产、纳粮；禁止内地民人擅自到边疆地区开垦种田，查明驱逐私垦种地民人回籍等情况。

（八）畜牧业方面

主要反映：张家口外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场、达里冈爱牧场、太仆寺牧场、礼部牧场、上三旗牧场、盛京养息牧牧场、大凌河牧场牲畜的分群牧放、定期查核数目、遭灾倒毙、分拨各地使用、变价出售，以及奖惩牧场官兵和青草长势、牲畜膘分；在乌里雅苏台、乌鲁木齐、巴里坤、伊犁、塔尔巴哈台、博罗塔拉等地设置孳生牧

厂和备用牧厂，分交当地驻防官兵牧放，定期委派官兵查收孳生牲畜，查看牲畜膘分，酌情奖惩官兵；各地八旗驻防官兵马匹的喂养和补充等情况。

（九）矿产方面

主要反映：每年春秋两季派人到叶尔羌、和阗地方山川开采玉石，并运送皇宫使用；在乌鲁木齐、伊犁等处开设铁厂，采挖铁矿冶炼，打造各种铁器；在乌什、伊犁等处开设铜厂，采挖铜矿冶炼，分送各钱局铸造钱文；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库尔喀喇乌苏、奎屯、呼图壁、阿拉善旗等处开采黄金；盛京、吉林、黑龙江、外蒙古、内蒙古和新疆等地煤炭和银、锡、铅等矿的勘探采掘、冶炼加工，以及熬制盐硝等情况。

（十）贸易方面

主要反映：准噶尔部派人到哈密、肃州贸易及赴藏熬茶途中在青海东科尔地方贸易；在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三处与哈萨克进行贸易，用丝绸、布匹、茶叶换取马、牛、羊；在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乌什等处设置官办贸易，将丝绸、瓷器、茶叶、药味等货物，出售给回子、布鲁特等人；喀尔喀蒙古到巴里坤、乌鲁木齐贸易，图伯特、拉达克人到叶尔羌贸易，回子商人到伊犁、哈密、塔尔巴哈台、恰克图、布鲁特等处贸易，察哈尔都统派人赴恰克图采买物品，科布多参赞大臣派人赴归化城采买茶叶，土尔扈特人到塔尔巴哈台、乌梁海等处贸易；在归化城、多伦诺尔、乌什等处设立集市，制定抽税章程，定期进行贸易；内地商人赴边疆地区时领取贸易执照，并查禁非法贸易事宜；在八旗驻防地方，设立官铺，出售物品给官兵等情况。

（十一）货币方面

主要反映：叶尔羌钱局、阿克苏钱局、乌什钱局、宝伊局的设

立、铸造钱文、兑换旧钱销毁；各地货币流通、钱价变化、稳定钱价措施，以及查办私铸钱文等情况。

（十二）交通运输方面

主要反映：盛京、吉林、黑龙江、外蒙古、内蒙古、西藏和新疆等地区军台驿站的设置变更，转运物品，接送公差人员；漕运船只在山东、直隶二省境内运行护航；盛京盖平、牛庄、锦州等处至天津间通过海路运输物品；以及疏通河道，设置摆渡船只和修建道路桥梁等情况。

（十三）工程方面

主要反映：在盛京、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外蒙古、新疆等八旗兵驻地，修建城池、官署、兵房、寺庙、粮仓、店铺、先农坛、监狱、箭亭等工程情况。

（十四）文化教育方面

主要反映：在京师、盛京、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八旗兵驻地，设置旗学、官学、学堂，教八旗官兵子弟学习满洲语、蒙古语和翻译；在伊犁设置俄罗斯官学，从京城俄罗斯馆调来教师，教满洲八旗子弟学习俄罗斯文，并考试录用；在各地定期举行文武童生考试；以及实录、本纪、方略、通志、辞书等官修书籍的编纂刊印，以及乾隆朝“钦定新清语”的推广使用等情况。

（十五）天文地理方面

主要反映：盛京、吉林、黑龙江、外蒙古、内蒙古、青海、西藏、新疆及东陵、西陵、宣化、热河、天津等地的雨、雪、雹、风、霜，以及地震、河道水文、地图测绘、日月食等情况。

（十六）宗教方面

主要反映：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大活佛的圆寂，挑选灵童，赏师学经，坐床传经；在京城、热河和西藏、外蒙古、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地，修建寺庙，御赐匾额，请喇嘛念经，赏给布施；给喇嘛发放度牒，加强管理，查办各种违禁行为；各地僧俗人员赴西藏、五台山等佛教圣地熬茶烧香时，办给路票，并妥善看护管理；以及乾隆年间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进京朝觐祝寿和举行佛事活动等情况。

（十七）民族事务方面

主要反映：蒙古族、满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苗族、哈萨克族、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怒族、索伦（今鄂温克族）、赫哲族、锡伯族、鄂伦春族等少数民族首领、官员的升迁调补，奖赏抚恤，纠参处分，年班朝觐，进献贡品，以及各少数民族的农业生产、畜牧生产、渔猎采集、兴修水利、商业贸易、审理刑事案件等情况。此外，还有涉及少数民族重大事件的文件。如：平定准噶尔，平定大小和卓，平定大小金川，珠尔墨特纳木扎勒事件，招抚乌梁海部，厄鲁特三车凌归附，厄鲁特达什达瓦部归附，土尔扈特东回安置，青衮扎布之乱和乌什维吾尔族起义等。

（十八）外交关系方面

主要反映：清政府与俄罗斯、朝鲜、安南、缅甸、廓尔喀、布鲁克巴、巴达克山、巴勒提、乾竺特、博洛尔、什克南、克什米尔、罗善、萨尔浑、瓦罕、爱乌罕、浩罕、哈萨克、布鲁特、安集延等国家和地区的交聘往来、商业贸易、会勘边界、拿送逃犯等情况。

四　满文月折包的整理与编目

满文月折包原整理编目基础较差，包内文件，除录副奏折及其附件编有顺序号外，其余的议复奏折、上谕、寄信、咨文、呈文等均无编号，而且只有以包为单位登记编号的目录。此目仅仅记载月折包的顺序号和朝年月份，别无他项，不要说包内文件的顺序，就连包内文件的总数都未记载。满文月折包的这种整理编目状况，对保管利用工作极为不便，特别是经过长期以来成捆成包地提调利用，包内文件原有顺序也被弄乱，很有必要重新整理、著录和编目，以期为档案的保管利用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一）满文月折包的整理

1964 年，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民语系满文班学生到档案馆毕业实习时，整理了乾隆二十年（1755）前的月折包。此次整理打破月折包原有的内在联系，逐件摘由，而后按内政、军务、财政、农业、水利、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工程、文教、法律、外交、民族事务、宗教事务、自然现象、镇压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侵略、综合十八大类，对档案实体进行直接分类，每类下再分若干项，在项下按问题组卷装盒，编有案卷级目录。此目录标有案卷号、案卷标题、卷内文件的起止时间和件数。用此方法整理的档案，共计 1537 卷、16581 件，占整个满文月折包内文件总数的 9.2%。

此后，因种种原因，在近 20 年时间内，未开展满文月折包的整理工作。1986 年 10 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安排 11 名满文专业人员，开始整理满文月折包，历时一年零两个月，于 1987 年 11 月，完成了满文月折包实体的整理工作。此次整理档案共计

181074 件，编制档案实体顺序目录 70 册。

这次整理工作，吸取以往历史档案整理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以尽量维护档案历史原貌和内在联系为基本宗旨，对乾隆二十年以后仍以原月折包形式保存的档案，未采取按“十八大类”直接去分类整理档案实体的方法，改用了另一种整理办法。这种办法是，以月为单位，按文种—时间为原则，排列文件顺序，逐件装袋编号，并以一定数量组卷装盒，编制文件级档案实体的顺序目录。凡随奏折呈进的附件及有文字的封套、包裹纸和夹条，均不随意抽出处理，而与相关文件合装一袋。与此同时，考虑到历史档案整理的特殊性，特别是为了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利用档案原有整理基础，以免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对已按“十八大类”整理的档案，未按新的整理方法进行重新整理，而按一定的原则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过去按“十八大类”整理的档案，没有编制统一的案卷号，而是分类编制，存在案卷号重复的问题，不符合当今档号编制的唯一性原则。故此次整理时，在保持原来整理基础的前提下，统一编制案卷号和文件号，重新制作文件级档案实体的顺序目录。

（二）满文月折包的著录

在月折包的整理工作结束后，所编制的目录并非档案的内容目录，而是档案实体的顺序目录，主要用于档案的保管、缩微、修复等项工作，对档案的利用工作不甚适用，只可以按时间检索查找文件。所以，为了便于档案的利用工作，亟须编制档案内容目录，或建立档案内容检索的数据库。

在编制档案目录时，对档案的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分析、选择和记录的过程，称为“档案著录”。要编制档案内容目录和建立档案内容检索数据库，首先要进行档案的标准化著录工作。为了规范全国档案的著录工作，国家有关职能部门制定《档案著录规则》和《明清档案著录细则》，并作为行业标准施行。为了搞好满文月

折包内文件的著录工作，依据行业标准的基本原则，并结合满文月折包的特点，特制定《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著录方案》，规定满文月折包内文件的著录采用文件级卡片式著录格式。其格式如下：

分类号	档案馆代号
档　号	缩微胶片号
题　名·—责任者·—文种·—文件形成时间	
·—附注	
主题词	

著录的项目包括分类号、档号、档案馆代号、缩微胶片号、题名、责任者、文种、文件形成时间、附注和主题词 10 项，并用汉文著录。

分类号，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标示类项，以英文大写字母和若干阿拉伯数字构成；第二部分标示地区，即省份，以两位阿拉伯数字和“〔〕”符号构成。依据《中国档案分类法》所附《清代档案分类表》标著，不准超过 3 组。

档案馆代号，目前尚无全国统一的档案馆代号，暂空未标。

档号，由全宗、目录、案卷、文件号组成，各号之间以“—”符号相隔，并规定全宗号为二位数，目录号为三位数，案卷号为四位数，件号为三位数。

缩微胶片号，由各该档案文件的胶片盘号和首拍号组成，两者之间以“—”符号相隔。

题名，即系档案文件的摘由，每份文件的题名不准超过 30 个汉字。

责任者，即系档案文件的作者，多责任者的文件，最多标著 3 个，其余在附注项内标著。经考证标著的责任者，均加“〔〕”符号。

文种，即系公文的种类，按公文档案名称正确标引，不准超过4个汉字。

文件形成时间，即指文件的缮写时间，并非朱批或收文时间，经考证标著的时间，均加“〔〕”符号。在标著时间时，首先标著原纪年，而后标著公元纪年，并加“（）”符号。原纪年的标著，也用阿拉伯数字，雍正至宣统朝的年号，分别以不同的阿拉伯数字代替，依次为雍正→06、乾隆→07、嘉庆→08、道光→09、咸丰→10、同治→11、光绪→12、宣统→13，并省略“年”“月”“日”三个字。如，乾隆十年九月二十六日，标著为071009026（17451021）。

附注，共有六项，依次为时间、语种、载体形式、责任者、载体类型标识、档案实体状况，各附注项之间，用“;”符号分隔。附注项标著的总字数，不准超过25个汉字。在语种注内，除以汉字缮写的文件外，其他文字缮写的文件，均注明语种。

主题词，对档案文件进行主题分析后，依据《清代档案主题词表》标著主题词，不限数目。

为了进一步说明满文月折包内文件的著录格式和项目，特举实例如下：

D221.01〔62〕

03－196－3555－036　　163－0709

为奏请补放伊犁满洲营佐领等员缺事/保宁（伊犁将军）·—录副奏折·—080111015（17961213）·—080112010；满文；2件；附满文履历单

伊犁　满洲营　满族　佐领　任官

满文月折包内文件的著录工作，自1988年3月开始，历时七年零一个月，于1994年12月完成，形成著录卡片156500张。因

奏折的附件不另行著录，所以著录卡片的总数与档案文件的总数不一致。

（三）满文月折包的编目

由于历史上的诸多原因，造成了社会上懂满文者极少，能够到档案馆直接利用满文档案的学者更是寥寥无几，只有通过汉译出版，才能使广大学者阅览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直重视满文档案的汉译出版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绩，同时也受到史学界同人的高度重视和好评。但应清醒地意识到，目前汉译出版的满文档案史料与现存的满文档案在数量上比较，真可谓微乎其微，仍有大量的满文档案不被人们了解和利用。所以，除继续重视和加强满文档案汉译出版工作外，还应该注意满文档案目录的编译出版工作，从而加大满文档案信息提供的广度和深度，以期人们更加了解和重视满文档案，引起更多的有志之士学习和掌握满语文，使满文档案发挥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满文月折包的著录工作结束后，经初步统计发现，在 156500 张著录卡片中，有关边疆事务的著录卡片近 12 万张，占著录卡片总数的 76%。这就是说，满文月折包内的绝大多数文件都涉及边疆事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经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商议，就合作出版清代边疆专题目录事宜达成共识，认为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内有关边疆史料，长期以来，鲜为人知，基本上未曾公布和利用；为了挖掘和利用这部分清代边疆满文档案史料，满足国内外广大学者的需求，推动清代边疆史研究，并促进清史、民族史和满学研究的发展，有必要选编出版边疆专题目录。于是，从 1995 年 1 月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作组织人力和物力，利用满文月折包的著录卡片，开展《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的编辑工作，历时四年零四个

月，于 1999 年 4 月完成全书的编辑工作，并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收录条目的原则是，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内，凡涉及清代边疆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和外交等诸方面内容的文件，均在收录范围之内。清代边疆分为陆疆和海疆，陆疆包括盛京、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乌里雅苏台、新疆、广西、云南、西藏等省和地区，海疆包括盛京、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的沿海地区，以及台湾、海南和南海诸岛。所有收录的条目，按地区分类，而后再按文件形成时间排列。收录的档案多系录副奏折，其中绝大部分文件的作者未写职衔，只写“aha”，汉译为“奴才”。为了便于读者查阅，在编辑过程中，尽量在查考有关工具书后，逐一填写作者职衔。凡有两个以上作者的文件，只选录第一作者，并在作者名称后加“等”字。无法查考的职衔，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一律不填写。收录条目共计 12 万条，起止时间为雍正八年至宣统三年，精装 12 册，900 万字。

另外，又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作编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 · 满藏文部分》。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内阁满文老档、国史院档、蒙古堂档、题本，军机处上谕档、录副奏折、议复档、熬茶档、金川档、西藏档、班禅事件档、巴勒布档、廓尔喀档、月折档，以及宫中朱批奏折、内务府奏案、理藩院档等项档案内，挑选有关西藏和藏事的满藏文档案，编译成汉文目录，共计 13334 条，其中满文档案条目 13040 条、藏文档案条目 294 条，起自天命七年（1622），止于宣统三年，1999 年 12 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1 册，100 万字。所收录的条目内，无论是满文档案，还是藏文档案，绝大部分都选自满文月折包内文件，而且利用了已有的著录卡片。该目录先按语种分类，而后再按文件形成时间排列。书后附“分类索引”，共设重大事件、职官、

宗教事务、财政、农牧业、商业贸易、矿产、政法、文教卫生、军务、涉外事件 11 类，类下设若干项，便于检索查阅。

在满文月折包的 156500 张著录卡片内，先后挑选 125200 张，编入《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满藏文部分》出版，尚未编辑出版的著录卡片 31300 张，占著录卡片总数的 20%。除此之外，现已出版的目录中，虽然选用了大量的满文月折包的著录卡片，但未选录著录卡片上具有重要检索意义的分类号和主题词。当今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特别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人们处理各种信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等各方面条件成熟时，计划将所有满文月折包的著录卡片输入计算机，建立专门的数据库，为社会各界提供更加便利的检索途径。

五　满文月折包的史料价值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依据，要开展历史研究工作，必须从史料的发掘、收集和整理着手，这是历史研究工作的基本规律。同时，不断地发掘和收集新史料，并用新史料进行研究，已成为当今历史研究的基本趋势。满文月折包内档案是清朝中枢机关——军机处在办理公务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记录，具有原始性、客观性、可靠性和系统性，是第一手史料，对历史研究而言，更具有其他任何史料都无法替代的重要价值。

（一）满文月折包内档案是第一手史料，可以解决以往历史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分歧

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由于史料缺乏或收集不全，对一些历史事实的判断，往往出现误差，或者产生分歧。如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

族的来源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今居住在黑龙江地区的柯尔克孜族在宗教信仰方面与居住在新疆地区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柯尔克孜族差距甚大，不信奉伊斯兰教，而是信奉佛教，同时在语言方面还保留一定的特色。从20世纪40年代起，不少中外学者研究其来源，但分歧较大，各持己见，互不认同，并无定论。概括起来讲，主要有四种说法：一为来自新疆帕米尔高原天山一带；二为来自新疆阿尔泰山一带；三为来自阿尔泰山和杭爱山地区；四为来自叶尼塞河上游。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点是各家都未掌握直接的、可靠的、翔实的史料，一般都是依据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的传说、语言、宗教和风俗，并参考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这样所得出的结论，必然带有一定的推论，缺乏说服力。后来笔者从满文月折包内查到有关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地区的奏折数件，为搞清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的来源提供了第一手史料。根据这些新史料，经过认真研究，得出如下结论：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来自叶尼塞河上游，并非来自新疆帕米尔高原天山一带，至于阿尔泰山和杭爱山地方，是他们东迁黑龙江地区之前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而且他们是从特斯河和厄得勒河流域启程迁往黑龙江地区的，该两河流域正好处于阿尔泰山和杭爱山北部一带。所以，在他们后人的传说中必然会保留阿尔泰山和杭爱山的名称，但因此而确定他们来自阿尔泰山和杭爱山一带，也是不准确的。这一观点，目前已被学术界认同，从而解决了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的来源问题。

（二）满文月折包内档案作为第一手史料，也可以更正官修史书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弥补其不足

《清实录》是一部大型官修编年体史书，现已成为清史研究主要依据的史料之一，内容丰富，查阅方便，但毕竟属第二手史料，与作为第一手史料的清代公文档案相比，在真实性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如乾隆五十年十月绥远城官学调整一事，《清实录》和满文

档案的记载就有差异。

据《清实录》记载：乾隆五十年十月初五日，军机大臣等“议复，绥远城将军积福奏称，绥远城额设满洲官学五处，各选教习四员，教训养育、闲散兵丁，现在子弟日多，不甚有益，且止学清文，于考取笔帖式及书写汉字文移，俱不得人，请将五学裁汰，于将军衙门内，设立翻译官学五处，每学额设教习二人、学生三十名，即以原设五学公费支给。应如所请。从之”。

而据月折包内满文档案记载：“领侍卫内大臣·协办大学士·尚书·臣和珅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乾隆五十年十月初一日，绥远城将军积福等奏，裁汰现有五处满洲官学，改设清汉翻译官学一处等事宜，遂奉上谕：著军机大臣等议奏。钦此。钦遵。臣等议得，据积福等奏称，在绥远城原设清汉翻译官学，考取教习二名，教育八旗幼丁二十名，俟三年后，果能当差勤谨，育人成才，即将该教习保奏，记名挑补骁骑校缺。后裁汰翻译官学，改设满洲官学五处，每学各选教习四员，教育养育、闲散兵丁等。现每学学生均多至百余名，徒有虚名而已，并不学好，甚无裨益，反被耽误，且自裁汰翻译官学以来，于考取笔帖式及书写汉字文移，渐次竟不得人。现在修缮将军衙门内空闲房十五间，选取八旗英俊幼丁近三百名，编设官学五处，挑选干练教习，每日教清语及马步骑射外，请将八旗原设五处满洲官学概行裁汰，仅留一处官学房屋，仍照旧例，作为满洲翻译官学考取翻译教习二名，挑选八旗成长英俊子弟三十名，教清汉语翻译。原设五处官学每年所有公费银两，即支给新设翻译官学及将军衙门内设立五处官学使用。其裁汰之四处官学房屋，饬交同知变价等语。查得，各省将军与地方官吏相互行文，确需要汉字，理合教翻译，且官学学生甚多，教习管教不周，亦不能学好。今积福等奏称，现有五处官学，每学各有学生百余名，不能学好，且止学清文，于考取笔帖式及书写汉字文移，俱不得人。故在将军衙门内设立官学五处，为便于教育起见，教清语及马步骑

射外，请将八旗原有五处官学裁汰，改设清汉翻译官学一处，考取教习二名，教育挑取之八旗子弟三十名。此乃教育清汉翻译人员，有利于公务之见，相应即照积福所奏办理。每年需要公费银两，仍按旧例支给，不必添支，亦照积福所奏办理。至空出官学房屋，亦照积福所奏，饬交同知，按数变价，拨归正项。是否妥当，恭候降旨，钦遵施行。为此谨奏，请旨。乾隆五十年十月初五日奉旨：著依议。钦此。”

从《清实录》和满文档案的记载来看，对同一个历史事实的记载，确实存在较大差异。以《清实录》为依据，即可认为，此次绥远城官学的调整，先裁撤八旗原有五座满洲官学，而后在将军衙门内重新设立五座翻译官学，每学额设教习 2 人、学生 30 名，共计教习 10 名、学生 150 名。以满文档案为依据，则可认为，先在军衙门内设立五座官学，招收 300 名八旗子弟，教授清语和骑射，而后裁撤八旗原设五座满洲官学，改设满汉翻译官学一座，额设教习 2 人、学生 30 名。众所周知，现存满文档案是清代国家机关办理公务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原始记录，未经后人任何修改，具有高度的可信度和凭证作用。《清实录》则不同，它是根据档案编纂而成的，因篇幅所限，对绝大部分档案并未全文收录，而是经删节后收录。在删节过程中，因编者水平等诸多因素，难免出现差错。在官修史书中出现的类似差错，用原始档案来更正最为可靠，而且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三）满文月折包内档案的记载详尽而系统，有助于历史研究工作全面深入的开展

满文月折包内的文件是清代各级国家机关处理公务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比较清楚地反映事物发展的全过程。换句话说，围绕某一问题，往往形成几件甚至十几件或上百、上千件公文，详尽反映某一事件的起因、发生、变化和结果。围绕某一事件形成的各种公文

档案，基本上都保存在其中，而且保留着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查找利用极为方便。在反映某一历史事件的详尽程度上，满文月折包内档案的记载远远胜过史书。如有关乾隆年间张家口外察哈尔蒙古官兵携眷移驻伊犁的历史资料，据统计，在《清实录》中仅有16件，满文月折包内共有122件，两者相比，数目悬殊。另外，《清实录》记载的16件史料内容，在满文档案内都有反映，且比《清实录》详尽。仅以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军机大臣傅恒议奏筹办察哈尔官兵携眷移驻伊犁事项一折为例，满文月折包内保存的这件奏折，经汉译后共计1529字，十分详细地反映有关筹办事项。在《清实录》内也记载这件奏折，但只有112字，极其简略，并没有全面反映历史事实。以上两组数据的统计和比较，可以充分证明满文月折包内档案史料确实详尽而系统，其他文献资料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如此详尽而系统的满文档案史料，随着它的开发和利用，必将会推动历史研究工作深入系统的发展。

（四）满文月折包内档案的内容丰富而稀见，有利于开拓历史研究的新领域

满文月折包内的档案，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比较稀见，特别是涉及盛京、吉林、黑龙江、外蒙古、内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等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史料，在其他文献资料内罕见。如乾隆年间新疆乌鲁木齐铁厂史料，在满文月折包内保存不少，而且非常完整而系统，反映铁厂的创设、沿革、管理、生产以及产铁的使用情况。按当时定例，乌鲁木齐都统每年都奏报铁厂的生产经营状况，并随折呈进汉文清单。据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十五日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随折呈进的清单记载："乌鲁木齐铁厂，自四十一年四月初一日起，至本年三月底止，在厂出力遣犯一百五十名，遵旨原奏每日额造荒生铁三百斤，一岁除小建六日不算外，共计三百五十四日，应造正额荒生铁十万六千二百斤，今造获荒生铁

十四万三千七百斤，计多获三万三千五百斤。又四十一年以前厂存正余荒生铁十二万六千九百七十四斤九两，连前通共正余荒生铁二十七万零六百七十四斤九两内：一、除交仓农具器具需要生铁七千六百八十斤、熟铁六千八百十八斤八两，照例熟铁按十五斤合荒生铁一百斤，生铁按七十二斤合荒生铁一百斤计算，共需荒生铁五万六千一百二十三斤四两；一、除仓交备用玛纳斯城工熟铁二千斤，按十五斤合荒生铁一百斤，共需荒生铁一万三千三百三十三斤五两；一、除各营打造加钢农具熟铁五千八百四十六斤十三两零，按十五斤合荒生铁一百斤，共需荒生铁三万八千九百七十八斤十四两；一、除巴里坤调取炮子需用生铁一百四十斤零十两，按七十二斤合荒生铁一百斤，共需荒生铁一百九十五斤四两；一、铁厂一岁粘补器具需用荒生铁四千斤。以上通共用过荒生铁十一万二千六百三十斤零十一两，实存荒生铁十五万八千零四十三斤十四两。”如此详细的统计数据，无论是官修史书，还是地方志，都无记载，只有在档案内才能查到。在满文月折包内，的确保存着一部分稀见史料，迄今尚未得到系统的发掘和利用。这些新鲜史料的开发利用，必将有利于开拓清代通史、边疆史、民族史和八旗制度研究的新领域。

另外，满文月折包作为满军机处公文档案的总汇，迄今保存完好，基本上保持着档案原貌。这对研究军机处的设置、沿革和职掌，以及文书处理制度，都具有重要的利用和参考价值。同时，满文月折包内的公文档案，也是满语文研究的资料宝库。

（原载《满语研究》2007 年第 2 期）

清代新疆历史满文档案概述

吴元丰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要保存明清两代中央国家机关的公文档案，计1000余万件，其中满文档案200余万件，占整个馆藏的1/5。在这些清代满文档案中，有相当数量的新疆历史资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

清朝是以满族上层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封建专制政权，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历时290余年之久。在中央，除仿照明制设立了内阁、六部、宗人府、都察院和大理寺等机构外，还创设了军机处、内务府和理藩院等机构。在地方仍仿照明制采用行省制度，设立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知州、知县等员治理。在边疆地区，则创设将军、参赞大臣、办事大臣、总管等员，并在一些民族居住地区设立盟长、扎萨克、伯克、土司等官员治理。在职官设置方面，充分体现了民族特色，特别是在中央各机构中一般都分设满汉额缺。起初，同一官职的满汉缺的品级、职权都有差别，后来虽然有所改变，但满洲官员仍保持着一定的地位和特权。

早在清入关前，清太祖努尔哈赤为了适应满族社会的发展，于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命额尔德尼、噶盖二人以蒙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满文，因草创的满文没有圈点，故后人称之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这种满文通行30余年后，发现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使用起来非常不便，清太宗皇太极遂于天聪六年（1632）正月命达海改进老满文，在原字母旁添加圈点以区别不同发音，并新增一部分字母用于拼写外来语。至此，满文定型，再无变化。经过达海改进的满文，后人称之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

清朝定满语为“国语”，称满文为“清字”。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满蒙官员，特别是承办八旗事务及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满蒙官员，一般都得用满文缮写公文，不得擅自使用汉文，否则重者被治罪，轻则被训饬。与此相适应，有关诰敕、谕旨、寄信及各部院的行文，也都得用满文书写。因而，在清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中形成了大量的满文公文。在清代，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关对其处理政务过程中形成的公文十分重视，不仅将原件按一定的顺序排列保存，而且将其中重要的文书按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逐件抄录成册，以备案查和修史之用，并设有专门的机构、官员加以整理保管。

17世纪中叶，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建立起全国性的中央政权之后，与西部准噶尔蒙古的关系极为复杂，时而和缓贸易、迎送熬茶、谈判划界，时而兵戎相见、相互征战，一直未能实现统一。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不懈努力之后，清廷最终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统一了新疆天山南北，继而开始往全疆各地派兵驻防屯田，设置机构和官员进行管理，从而巩固了统一局面，实现了对新疆地区的有效管理。

清朝对新疆的治理主要采用军府制，在伊犁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地方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统辖新疆天山南北地区军政事务。在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哈密、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及和阗等地分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官员，分管各该地区军政事务。同时，因地制宜，因人而

治，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居民，推行不同的行政管理方式。在伊犁和乌鲁木齐等八旗携眷官兵驻防地区施行八旗制，分设满洲、察哈尔、索伦、锡伯、厄鲁特等营，选授协领、总管、佐领等员管理各该营军政事务；在天山南部和伊犁维吾尔族居住地区施行伯克制，挑选本地维吾尔族人任命为伯克，负责管理各该地方行政事务；在哈密、吐鲁番维吾尔族居住地区和天山南北蒙古族居住地区施行盟旗制，由各该地方的维吾尔族和蒙古族王公担任盟长、扎萨克等职，负责管理各该地方行政事务；在乌鲁木齐和伊犁等汉族居住地区施行郡县制，由内地选派中举候缺人员担任知府、知州、知县等职，负责管理各该管辖范围内的行政事务。

清代新疆的地方官员一般都没有直接向皇帝请示汇报的权力，都得通过驻防将军、大臣等才能请示汇报。而伊犁将军，或分驻各地的大臣等员，则都有用书面形式直接向皇帝汇报和请示的权力。这些驻防将军、都统和办事大臣等员，一般都由中央各部院及京城八旗官员内选派，定期轮换，而且多为满洲或蒙古官员。所以，他们多用满文书写公文，向皇帝请示汇报。皇帝也用满文撰写谕旨，颁给有关官员。另外，新疆的驻防官员与中央各部院之间的来往公文，也多用满文书写。因此，在清代中央国家机关的满文公文档案中保存下来了大量的新疆历史资料。

二

在现存的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满文档案中，军机处满文“月折包”的保存状况比较完整，基本上保留了历史原貌，文件数量之巨大，内容之丰富，时间跨度之长，均居其他满文档案之首。满文月折包是军机处按一定秩序打包保存的满文公文档案的总称，其中涉及新疆历史的档案不在少数。

军机处是清代办理军机事务处之简称，雍正八年（1730）设立，宣统三年撤销。军机处本为应对西北战事而临时设置的机构，后因功效显著，成为一个常设的中枢机关，其职责是承旨出政，综理全国军政要务。军机处内部分设满军机处和汉军机处，俗称满屋和汉屋，分掌其职。军机处设军机大臣、章京等职，由满汉官员内拣派入值。据《枢垣纪略》记载："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复奏议，系清字者，皆由满洲章京办理，系汉字者，皆有汉章京办理。"这就是说，军机处的文书处理制度，按"清字"和"汉字"两种文字分别处理归档。另外，从现存的军机处档案状况来看，满文档案和汉文档案就是分开归档保管的，各自成体系。

军机处作为中枢机关，每天都承接办理各种公文，其中最多的当属奏折。奏折是清代官员向皇帝请示汇报事务的重要文书之一。皇帝用朱笔批阅的奏折，称朱批奏折。军机处在收发朱批奏折过程中，照朱批奏折抄录一份，称为录副奏折。由于录副奏折按月或半月为一包归档保存，故名"月折包"。此外，军机处还接受办理在京各部院和地方驻防将军、大臣等官员的咨文、呈文等，并奉旨缮拟谕旨，查复议奏。这些文件，也按月归入各该月的月折包内保存。因此，满文月折包内保存的公文种类比较多，主要包括录副奏折、录副奏片、议复奏折、议复奏片、上谕、寄信、咨文、移文、呈文，以及作为奏折附件呈进的履历、口供、图纸、清单、清册和少数民族首领用本民族文字缮写的奏书、呈文等。从各种公文的数量上来看，录副奏折、录副奏片及作为附件呈进的履历、口供、图纸、清单、清册占绝大多数，咨文、移文、呈文次之，议复奏折、议复奏片、上谕、寄信再次之，而少数民族首领用本民族文字缮写的奏书、呈文等则又次之。

军机处在处理公文的过程中，凡皇帝用朱笔批阅过的奏折，除请安折外，其他内容的奏折、奏片均逐件抄录，而后存入月折包，原折则发还给具奏者。在抄录朱批奏折时，对随折呈进的履历、口

供、图纸、清单、清册等附件，不再另行抄录，直接将原件存入月折包。至于在京部院和地方官员的咨文、移文、呈文，以及军机大臣的议复奏折、议复奏片和负责起草的谕旨底稿等，也不另行抄录，也将原件直接存入月折包。这样，在满文月折包内保存的文件，除录副奏折、录副奏片为抄件外，其余均属原件，不少咨文、移文、呈文和清册上均钤有官印。

乾隆二十五年（1760）前的满文月折包[①]分“军务包”和“寻常包”两种。缘于乾隆二十五年前，西北战事频繁，来往文件较多。军机处在处理文件的过程中，为了便于日后查考，就将有关西北军务的文件集中起来，按月打包，称之为“军务包”。与此同时，将一般公务的文件也集中起来，按月打包，称之为“寻常包”。“军务包”和“寻常包”并不分别排列保存，而是按年月顺序混合排列保存。当西北战事结束后，就不再分“军务包”和“寻常包”。但遇有重大事件时，还是将有关文件集中起来，视其数量之多寡，一个月或若干个月为一包，在包裹纸上用汉文注明某某档。如有关土尔扈特东归文件的包上，注明“土尔扈特档”。所有因重大事件而形成的月折包，一般统称为“专档包”。

军机处满文月折包与其他文种档案比较，除具有保存完整、公文种类多、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等特点外，尤当重视的应是其中数量最多的录副奏折。这些录副奏折，虽然只是朱批奏折的抄件，但利用和研究价值远高于朱批奏折。军机处抄录朱批奏折时，只抄录奏折，不抄录随折进呈的各种附件，而是将这些附件直接随录副奏折归档存查。因此，查阅现存朱批奏折，根本无法查到随进的附件。而我们知道，这些附件，不仅仅是对正件内容的补充，而且有些内容根本不会在正件里反映。例如，地方官员奏报财政管理、屯田收成和官员补放等方面的情况时，所进奏折的内容极为简略，有

---

① 有关满文月折包还请参考拙作《清代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及其史料价值》一文。

关的数据和履历均在附件内缮写。将录副奏折与朱批奏折比较，发现录副奏折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朱批奏折只有具奏时间，而录副奏折除具奏时间外，还有朱批时间。对研究某一历史事件来讲，准确地掌握具奏和朱批时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三

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内所存公文档案共计 18 万余件，其中有关新疆历史的公文档案有 6 万余件，占总数的 1/3。这部分新疆历史档案史料，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极广，可谓包罗万象。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 17 个方面的内容。

（一）职官方面

主要反映：伊犁、塔尔巴哈台、库尔喀喇乌苏、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吐鲁番、哈密、辟展、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英吉沙尔等处驻防办事的将军、都统、大臣，以及伊犁惠远城满洲营、惠宁城满洲营、索伦营、锡伯营、厄鲁特营、察哈尔营、乌鲁木齐满洲营、古城满洲营、巴里坤满洲营、吐鲁番满洲营的协领、总管、副总管、佐领、防御、骁骑校和天山南北各地回子伯克等官员的补放、升迁、考核、引见、朝觐、奖赏、抚恤、处分、休致、丁忧、病故等情况。另外，还有以上官员的增添裁撤、划定职权、铸颁印信、进贡方物、致祭山川，以及土尔扈特蒙古、和硕特蒙古和回子汗、王、公、贝勒、贝子、台吉等承袭封爵、支领俸银、请假探亲、病故治丧、定亲成婚等情况。

（二）军务方面

主要反映：从黑龙江、盛京、宁夏、察哈尔、河北承德、陕西

西安、甘肃庄浪、凉州等处八旗抽调满洲、蒙古、锡伯、索伦、达斡尔官兵，携眷移驻伊犁、博罗塔拉、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吐鲁番等地，分设驻防八旗各营，以及营制沿革、挑补兵丁、支放钱粮、操演技艺、修补兵器、供给粮草、喂养马匹、驻守台站卡伦、巡查边界、奉调出征和定期赴塔尔巴哈台、天山南部各城换防等情况。另外，还有从内地邻近各省抽调绿营官兵，携眷移驻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精河、玛纳斯、昌吉等地，分设提标、镇标各营，以及从内地定期派八旗、绿营官兵到新疆重镇要地换防，严禁驻防八旗官兵饮酒听戏，制定奖惩兵丁条例，严加惩治逃兵等情况。

（三）民政方面

主要反映：清廷平定准噶尔部之前，厄鲁特蒙古人前来投诚，分别送往东北三省、呼伦贝尔、乌梁海、科布多、察哈尔、京城、天津、青州、杭州、江宁、京口等地安置；平定准噶尔部之后，逃往哈萨克、布鲁特游牧地方的厄鲁特蒙古人纷纷返回后，支给钱粮牲畜，分别拨入伊犁厄鲁特营和察哈尔营安置；在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乌什等地设立义仓，每年青黄不接之际，开仓拨粮，借给贫困回子、民人等；各地军民遭受灾害，发给钱粮赈济，减免应征官粮和租税；从天山南部各城和甘肃、陕西等处大量移民到天山北部种地，伊犁厄鲁特蒙古迁到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放牧；雍正年间划定厄鲁特和喀尔喀游牧地界，吐鲁番、哈密回子迁居安西、瓜州；赏给回子、蒙古和各驻防军营内七旬老人银两；从天山南部回子内，挑选金银、玉石、绘画等项匠人，携眷迁往京城当差；制定土尔扈特和硕特人等赴阿尔泰山地方探亲条例、土尔扈特与回子贸易结亲等项事宜章程和土尔扈特和硕特部众管理条例，以及发给土尔扈特和硕特蒙古人路票，前往西藏、青海、科布多等地拜佛、熬茶、治病、探亲等情况。

（四）司法方面

主要反映：制定回律、驻防官兵拟罪条例、驻防官兵脱逃处置条例、由新疆往内地押送犯人章程等法律条文；从内地各省发遣罪犯到新疆，并分地安置和管理；查禁偷挖矿产，私熬盐硝，私铸钱币，私贩大黄、枪支、玉石，传播邪教，拐卖人口等事务；审理偷盗、抢劫、害命、强奸等刑事案件的情况。

（五）财政方面

主要反映：按年从内地调拨银两，作为驻防官兵、蒙古汗王等的俸禄、饷银和公费银发放使用，各地库存银两、钱文、绸缎、布棉、茶叶和仓存粮石等物品的旧管、新收、开支、实存四项数目的奏销；伊犁、乌鲁木齐、塔尔巴哈、阿克苏、喀喇沙尔、库车、巴里坤、辟展、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城征收房基地、店铺、菜园租银和贸易税；满洲、锡伯、索伦、厄鲁特、察哈尔各营设立滋生银两，按期收取息银，养赡鳏寡孤独者，分发红白喜事银两；各地居民缴纳各项贡赋和报销各项工程费用等情况。

（六）农业方面

主要反映：在伊犁、塔尔巴哈台、精河、库尔喀喇乌苏、昌吉、玛纳斯、呼图壁、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木垒、托克逊、哈密、吐鲁番、辟展、喀喇沙尔、乌什等处，设置兵屯、民屯、遣屯、回屯、旗屯及其沿革、管理、生产、纳粮等情况。另外，还有天山南北各地的雨水苗情、兴修水利、收成分数、粮食时价、扑灭蝗虫、消除鼠灾，以及在各屯田地区试种菜籽、胡麻、水稻，并加以推广种植等情况。

（七）牧业方面

主要反映：从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太仆寺、喀尔喀等

牧场调拨牲畜，在伊犁、博罗塔拉、塔尔巴哈台、巴里坤等地设置孳生牧厂和备用牧厂，分交厄鲁特、察哈尔、锡伯、索伦等营军民牧放，定期委派官员查收孳生牲畜，拨入备用牧厂牧放，调往各处使用，变价出售，以及制定牧厂官兵奖惩条例，每年定期查看各牧厂牲畜膘分，酌情奖惩牧厂官兵情形。另外，还有各地驻防官兵马匹喂养，定期补充屯田耕畜等情况。

（八）矿产方面

主要反映：每年春秋两季派人到叶尔羌、和阗地区山川开采玉石，并运送皇宫制作器物；在乌鲁木齐、伊犁分别设置铁厂，采挖铁矿冶铁，打造农具；在乌什、伊犁设置铜厂，采挖铜矿冶炼，分送钱局铸造钱文；在伊犁、库尔喀喇乌苏、奎屯、塔尔巴哈台、呼图壁等处开采黄金；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玛纳斯、喀喇沙尔、沙雅尔、库尔勒、布固尔、阿克苏、乌什、库车等处熬制硝磺，配制火药使用；在伊犁、喀喇沙尔等处地方开采铅矿冶炼，以及在喀什噶尔试采铜矿冶炼、喀喇沙尔试炼铁沙和在乌什、阿克苏、喀喇沙尔、库车地方探获金银矿试炼等情况。

（九）贸易方面

主要反映：准噶尔部派人到哈密、肃州贸易及赴西藏熬茶途中在青海东科尔地方贸易；在乌鲁木齐、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三个地方先后设立官办贸易，用丝绸、布匹、茶叶与哈萨克易换牲畜；在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乌什等地设置官办贸易，将丝绸、瓷器、茶叶、药味等货物，卖给回子、布鲁特等人，收取银两、钱文；在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等地设立官铺，每年特派官兵赴内地采购货物，卖给各该地方驻防八旗兵丁，以及喀尔喀蒙古到巴里坤、乌鲁木齐贸易，图伯特、拉达克人到叶尔羌贸易，回子

商人到伊犁、哈密、塔尔巴哈台、恰克图、布鲁特等处贸易，喀什噶尔城内杂居商人迁到城外另建房屋居住，土尔扈特从精河往伊犁贩卖食盐，土尔扈特赴塔尔巴哈台、乌梁海地方贸易，在乌什设立巴杂尔定期进行贸易，制定回子商人出卡伦经商条例，发给回子商人往来贸易执照，禁止驻卡官兵、回子与哈萨克、布鲁特自由贸易和土尔扈特人赴喀尔喀贸易等情形。

（十）货币方面

主要反映：叶尔羌钱局、阿克苏钱局、乌什钱局、宝伊局的设置过程、调取工匠、鼓铸钱文、兑换旧钱、钱文流通、钱价变化、稳定钱价，查办私铸钱文案件，以及严禁宝伊局所铸钱文在天山南部地区流通和内地纸钱进入新疆等情况。

（十一）文教卫生方面

主要反映：在乌鲁木齐等三城建立学校，教驻防官兵子弟学习；在伊犁建立八旗官学，教驻防官兵子弟学习满洲、蒙古文字；在伊犁惠远城设立俄罗斯官学，从京城俄罗斯馆调来教师，教八旗子弟学习俄罗斯文字；在乌鲁木齐等地定期举行文武童生考试；从肃州调来医生给喀什噶尔等地回子治病，查访回医药品配方，特派医生给土尔扈特汗等人治病，在乌鲁木齐开设药铺等情况。

（十二）宗教方面

主要反映：厄鲁特达什达瓦部迁居热河后，将该部喇嘛拨归普宁寺安置和管理；在伊犁修建普化寺，请京城堪布达喇嘛住持念经，并三年一换；在土尔扈特游牧地方修建寺庙，御赐寺名，请喇嘛念经；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副达喇嘛的挑选、发放钱粮、圆寂；从科布多请喇嘛到喀喇沙尔念经，以防土尔扈特部众出痘；给土尔扈特、和硕特蒙古喇嘛颁发路票，前往西藏熬茶进香；禁止内

地和西藏喇嘛到新疆各地活动；乌什所辖奎巴克村麻扎归拜城莫罗管理，并赏给地亩赡养等情况。

（十三）地理方面

主要反映：从京城派人员包括西洋传教士在内的宫廷画师等到新疆绘制地图，以及乾隆三十年（1765）伊犁、精河等处，乾隆四十六年（1781）伊犁，乾隆五十二年（1787）伊犁、乌什、阿克苏、喀什噶尔等处和道光二十三年（1843）巴里坤等新疆地区各次地震等情况。

（十四）交通运输方面

主要反映：新疆各地之间驿站的设置、裁撤、增添、拨补车辆牲畜，传送物品，派人修理穆苏尔岭道路，在伊犁河、湖玛喇克河、玛纳斯河上设置摆渡船只，以及通过伊犁河水道，用船运固勒扎仓存粮到惠远城等情况。

（十五）工程方面

主要反映：派工匠到伊犁、叶尔羌，分别刻立平定准噶尔、回疆纪功石碑；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库尔喀喇乌苏、精河、玛纳斯、昌吉、呼图壁、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木垒、济木萨、吐鲁番、哈密、辟展、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方，修建城池、官署、兵房、寺庙、粮仓、先农坛、牢房、箭亭等工程情形。

（十六）藩属国及部落关系方面

主要反映：哈萨克、浩罕、巴达克山、巴勒提、乾竺特、瓦罕、博洛尔、什克南、克什米尔、罗善、萨尔浑、布鲁特等国和部落，投书归服、请命册封、遣使朝觐、进贡方物、受赏谢恩、按例

请安、互市贸易、求取物品、拿送罪犯，以及清廷派遣官员册封或补授藩属国和部落首领、调解纠纷、祭奠藩属国和部落已故首领等情况。

（十七）外交方面

主要反映：中俄两国相互遣送逃犯、互市贸易、会勘边界和解决边界地区纠纷等情况。另外，还有爱乌罕、温都斯坦等国遣来使臣和禁止英国商人经叶尔羌赴布噶尔贸易等情况。

除以上各方面内容外，还有一部分档案，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征战准噶尔、大小和卓、张格尔，以及昌吉屯田遣犯起事、土尔扈特回归、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贩卖玉石案、乌什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

四

1964 年至 1987 年间，满文月折包的整理工作基本完成。[①] 在满文月折包的整理工作结束后，除对档案进行修复和缩微拍照外，还采用文件级卡片式著录格式进行著录，著录项目有分类号、档号、档案馆代号、缩微胶片号、题名、责任者、文种、文件形成时间、附注和主题词 10 项。此项著录工作，自 1988 年 3 月启动，先后有 9 人参加，历时 7 年多，至 1994 年 12 月完成，形成著录卡片 15 万余张。因奏折的附件不另行著录，所以著录卡片的总数与档案文件的总数有出入。

经初步统计发现，在这 15 万余张卡片中，涉及边疆事务的约 12 万张，占著录卡片总数的 76%。为了给国内外读者提供清代边

① 满文月折包的整理工作详情，请见拙文《清代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及其史料价值》。

疆满文档案史料的信息和检索途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商议决定，三个单位合作，从著录卡片内挑选有关边疆内容的卡片，编辑出版一部清代边疆专题目录。此项工作从 1995 年 1 月起，开始组织人力和物力，利用满文月折包的著录卡片，开展编辑工作，历时 4 年多，于 1999 年 4 月完成，冠以《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之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共收录档案条目 12 万余条，精装 12 册，按地区分类，其中第 6 册至第 11 册共 6 册，都是新疆地区的档案条目，合计 6 万余条，占整个目录的 1/2。

《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的编辑出版，首次系统地介绍了清朝治理边疆过程中形成的满文档案信息，向读者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检索工具书。其中有关新疆事宜的档案，更引起读者的关注，渴望早日公布利用，发挥其应有的学术研究价值。至 2005 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企划组织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项目“新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工作启动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向该项目专家委员会提交立项申报书，申请将清代新疆满文档案编辑出版工作纳入“新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特别项目。当年 5 月 28 日接到“新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办公室的立项通知书，清代新疆满文档案编辑出版工作经专家委员会评审获准立项，列为“新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档案资料整理系列的子课题，课题编号为 D2004 - 01，最终成果形式为资料集，名称为《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9 月 20 日课题责任书的签订，标志着清代新疆满文档案编辑出版工作正式启动。

全体课题组成员共同努力，勤奋工作，经过近 5 年时间，圆满完成了从整个满文月折包中逐件挑选有关新疆事务文件，以及复印、编辑、拼版、摘译标题和审校书稿等项浩繁琐杂的工作，形成书稿 283 册，共收录档案 72812 件，其中正件 63925 件、附件 8887 件，时间起自雍正八年（1730）十二月，止于宣统三年五月，长

达181年，其中乾隆朝的档案文件最多，约计4万余件。为“存真”起见，该书收录的档案文件，均按原件影印，尽量保持原貌，未作任何修改，唯受印书开本和篇幅所限，适当缩小，制成上下双栏版式印刷。在编辑体例上，采用编年体例，按文件形成时间顺序编排，无形成时间者，以收文或朱批时间编排。凡收录的档案文件，均逐件撰拟汉文标题，编制分册目录，置于各该册正文之前，以便读者查阅。

该书收录的档案文件，主要有奏折、奏片、上谕、寄信、咨文、咨呈、呈文，及其附件清册、清单、履历、口供等文件，公文种类比较多，其中奏折、奏片及其附件占绝大多数。从这些公文的责任者来看，除皇帝颁发的上谕、寄信外，其他公文的责任者有伊犁将军及各营领队大臣、乌鲁木齐都统及办事大臣、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及领队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巴里坤办事大臣及领队大臣、哈密办事大臣、辟展办事大臣、叶尔羌参赞大臣及办事大臣、乌什参赞大臣及办事大臣、阿克苏办事大臣、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库车办事大臣、和阗领队大臣、英吉沙尔领队大臣、吐鲁番领队大臣、古城领队大臣、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回子王公及伯克、蒙古汗王及贝勒、军机大臣、各部院尚书及侍郎、京旗都统及副都统、钦差统兵将军及大臣、各省督抚及提督等员，其中绝大部分是新疆驻防办事大员，涉及地区极为广泛，涵盖了新疆的所有地区。另外，从其内容来看，包括了职官、军务、民政、司法、财政、农业、牧业、矿产、贸易、货币、文教卫生、宗教、地理、交通运输、工程、外交等诸多方面，涉及面十分宽泛。加之这些档案文件是第一手原始史料，内容全面且成系统，绝大部分属首次公布。它的正式出版发行，不仅对清代新疆地方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利用价值，而且对清代官职、驻防八旗、绿营兵、民族、货币、屯田、官牧厂、玉石、丝绸贸易，以及与中亚地区国家和部落的交往关系等专门史研究也有很高的价值。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的编辑出版，体现了满文档案工作者长期默默无闻、辛勤耕耘、乐于奉献的品质。若无长达十几年满文月折包的整理编目基础，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规定的时限内根本无法完成选材编辑工作。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长期真诚合作，成果丰硕。《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是双方继《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和《珲春副都统衙门档》之后的又一个合作项目，而且是最大的一个项目。数年前出版的《珲春副都统衙门档》共238册，而如今的《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达283册之巨，可以说，出版如此大部头的满文档案汇编，在近百年的满文档案出版史上还是首次，而且按照档案原件复制影印，尽量保持历史档案的原貌，对抢救和保存历史档案文献，加强中国边疆历史学科的基础建设，推进满语文的研究和教学，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原载《满语研究》2010年第2期）

关于清代内扎萨克蒙古盟的雏形

——以理藩院满文题本为中心

乌云毕力格　宋 曈*

一　引言

众所周知，清代外藩蒙古管理制度的核心是所谓“盟旗制度”。研究者向来对此问题十分重视，有不少论及该问题的专著和相关论文。① 然而，有关盟旗制度的内容，《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等清代政书虽有记述，但均为后人编纂，为该制度已臻完善后的状况，从中难以窥见其自清初至乾隆朝逐步发展的过程。故此，

* 乌云毕力格，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满文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宋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满文文献研究中心。

① 相关文献如：〔苏〕弗拉基米尔佐夫著《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日〕田山茂著《清代蒙古社会制度》，潘世宪译，商务印书馆，1987；〔日〕冈洋树：《清代モングル盟旗制度の研究》，东方书店，2007；杨强：《清代蒙古族盟旗制度》，民族出版社，2006；阎光亮：《清代内蒙古东三盟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王湘云：《内扎萨克的建立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86 年第 1 期；达力扎布：《清初内扎萨克六盟和蒙古衙门建立时间蠡测》，载达力扎布《明清蒙古史论稿》，民族出版社，2003；赵云田：《清朝治理蒙藏地区的几个政策》，《中国社会科学》1994 年第 3 期；乌力吉：《试论清代盟旗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 年第 3 期；陈国干《清代蒙古盟旗制度的来源和性质》，《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1 年第 1 期；李婧：《清代的盟旗制度》，《前沿》2006 年第 7 期；牛海祯：《简论清代蒙古族地区的盟旗制度》，《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2 期。

根据此类后世文献进行的研究，实际上都只能分析达到完备的盟旗制度，其研究成果并不能套用到清初至乾隆朝各个时期。总之，前人研究多受制于史料欠缺，因而对清初蒙古盟旗制度语焉不详。

近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并影印出版了《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一书。[①] 其中，关于清顺治时期漠南蒙古会盟有全新史料发现，从而得以对前人研究成果做出补充、完善。本文就是利用这些崭新的"遗留性史料"，探讨清朝顺治年间的内蒙古六盟的雏形问题。

二 顺治朝理藩院满文题本中相关新资料

现存顺治朝理藩院题本中，顺治十年（1653）前的内容全部散佚，故无法据此对顺治初年的理藩院制度进行探讨。根据现存题本，我们仅仅可以推知，在清崇德年间（1636~1643），内蒙古地区就已有会盟，而且会盟已有审案、比丁等职能。[②] 但此时是否已有定期盟会，该会盟与日后盟旗制度中的"盟"是否同一性质，何等人员、于何范围、在何地点、如何会盟等，均无记载。这类问题的解决尚有待于相关档案文书的发掘与研究。本文就现有顺治朝关于蒙古会盟的六份理藩院满文题本，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题本一[③]

朱批：da an i geneci acambi，genere ambasa be tucibufi wesimbu.

---

① 乌云毕力格、吴元丰、宝音德力根主编《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23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② 如《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所收录的卷1第6本（第6页）、卷1第27本（第9页）均提到崇德年间会盟时上诉审案一事。

③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卷1第77本，第119页。

题本：wesimburengg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tulergi monggoi haha，celere jalin. tulergi goloi monggo de ilan aniya oho manggi，weile gisureme，haha celeme，culgan genembihe. ilan aniya oho. da an i genereo，nakareo，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aci aniya ninggun biyai orin sunja.

aliha amban šajidara/ ashan i amban sidari/ ashan i amban šaštir/ aisilakū hafan gobiltu./ aisilakū hafan nikacan./ ejeku hafan mala.

朱批：应照例举行，着选派遣大臣后奏报。

题本：题奏

理藩院尚书沙济达喇等谨题：为外藩蒙古比丁事。外藩蒙古每三年为议罪、比丁而会盟，今三年已到，照例举行抑或停止？为此谨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六月二十五

尚书沙济达喇/侍郎席达礼/侍郎沙世悌尔/员外郎葛毕勒图/员外郎尼喀禅/主事马拉

达力扎布《清初内扎萨克六盟和蒙古衙门建立时间蠡测》一文指出："会盟之事始之清太宗，但是三年一盟的制度始于清朝入关以后，即顺治末、康熙初，康熙初年才有三年一盟的确切记载。在此之前似未定期。"[①] 达力扎布发表该文时，顺治朝题本档案尚未公布，因此才有此推论。但是，通过这份题本，我们可对此推论做出修正：至迟至顺治中期，蒙古地区三年一盟，理藩院选派大臣前往参加已成定例。因为，该顺治十二年（1655）所写题本称，

① 达力扎布：《明清蒙古史论稿》，第285页。

"外藩蒙古每三年为审案、比丁而会盟，今三年已到"，可见至迟在顺治九年时三年一盟的制度已经形成。

题本二①

朱批：ere culgan de isara juwan emu gūsa，abunai cin wang ni jakade isakini.

题本：wesimburengg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culgan isara ba i jalin. daci korcin i ergide culgan isabumbihede korcin i juwan gūsa be tusiyetu cin wang ni jakade. cahar，juwe jalut，juljaga efu jiyūn wang，juwe barin，juwe ongniot，aohan，naiman，kesikten，ere juwan emu gūsa be bai dulimbade，juwe karacin，juwe tumet be ineku bai dulimbade isabumbihe ijishūn i dasan i uyuci aniya，cahar i gurun i efu abunai cin wang be（＋）hesei culgan isarade isakini sehe be dahame，te ere culgan de ere juwan emu gūsa be ujulaha wang be dahame gurun i efu abunai cin wang ni jakade isabureo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aci aniya nadan biyai juwan.

aliha amban šajidara/ ashan i amban sidari/ ashan i amban šaštir/ ejeku hafan mala.

朱批：此次十一旗会盟，着于阿布奈亲王处聚会。

题本：题奏

署理理藩院尚书沙济达喇等谨题：为召集会盟之地事。向例，往科尔沁之地会盟者，召集科尔沁十旗于土谢图亲王处。察哈尔、扎鲁特二旗、额驸珠尔扎噶郡王、巴林二旗、翁牛特二旗、敖汉、

---

①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卷1第78本，第120页。

奈曼、克什克腾，此十一旗于（各旗）适中地点会盟，喀喇沁二旗、土默特二旗亦于（各旗）适中地点会盟。顺治九年，察哈尔固伦额驸阿布奈亲王曾奉旨召集会盟，此次会盟，因固伦额驸阿布奈亲王为该十一旗为首之王，故是否仍于彼处召集会盟？为此谨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七月初十

尚书沙济达喇/侍郎席达礼/侍郎沙世悌尔/主事马拉

该题本史料价值非常重要，首先，它提到了前次会盟发生于顺治九年的事实。顺治九年后，时隔三年，即题本提及的顺治十二年会盟，可见三年一盟已为定制。其次，该题本中提到了三组不同的会盟的地点与旗分构成，从中可以看出后世内蒙古东三盟的形成时间，与各盟构成旗分的演变。清代中后期的内蒙古东三盟为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三盟，但时至顺治十二年，该三盟还没有正式成立。题本指出，“向例，往科尔沁之地会盟者，召集科尔沁十旗于土谢图亲王处”，这当然是后世哲里木盟的雏形。但直到此时，并无“哲里木盟”一名，其会盟地点可能在土谢图汗旗临时择地举行。题本还提到，察哈尔、扎鲁特二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二旗、翁牛特二旗、敖汉、奈曼、克什克腾等十一旗，以及喀喇沁二旗、土默特二旗等四旗各于各旗“适中地点会盟”。其中，前十一旗会盟为后来的昭乌达盟①雏形，而后四旗会盟则为卓索图盟②前身。如题本所记载，当时一同会盟的各旗分已有规定，但并无具体的会盟地点，也没有固定的会盟名称。例如，日后的昭乌达盟，因其会盟地点于昭乌达地方，故因此得名，但直到顺治十二年，相关十一旗始终于察哈尔会盟，其会盟地必在今通

① 察哈尔一旗在康熙十四年（1675）布尔尼反清叛乱后被消灭。

② 康熙后，该盟成员有所增加。

辽市库伦旗境内。[①] 正因如此，理藩院尚书诸臣以该题本题报皇帝，就本年度会盟地进行请示。对此顺治皇帝钦裁，依前次成例，由察哈尔阿布奈亲王主持，于彼地进行会盟。根据该档案可以推知，当时虽有盟会，但制度性不强，多为随形势调整。

题本三[②]

朱批：gisurehe songkoi obu.

题本：wesimburengg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tulergi monggo de culgan tucire jalin. neneme wesimbuhe de，（+）hese korcin i ergide，aliha amban šajidara se culgan gene，isinjiha manggi. tehe hontoho i ashan i amban sidari se ujumucin i ergide culgan genekini sehe bihe. korcin i ergide culgan genehe. aliha amban šajidara se isinjiha. te ujumucin ci ordus de isitala culgame，ashan i amban sidari se genembi. ilan bade culgambi. kooli be dahame，ilan ba i culgan de selgiyeme hūlara.（+）hesei bithe，ilan ere seme，dorgi bithei yamun de afabureo.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aci aniya juwan biyai ice ilan.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ashan i amban，amban sidari/ ashan i amban，amban šaštir/ mujiren bahabukū，amban naige. / weilen ejeku hafan，amban jiman. / ejeku hafan，amban mala.

朱批：依议而行。

题本：题奏

① 参见乌云毕力格《清初“察哈尔国”游牧地考》，载乌云毕力格《十七世纪蒙古史论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②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卷 1 第 81 本，第 124 页。

署理理藩院尚书臣沙济达喇等谨题：为外藩蒙古会盟事。前此所题，上谕，科尔沁处，令尚书沙济达喇等前往会盟。到达后，令住管之侍郎席达礼等往乌珠穆沁会盟。前往科尔沁会盟之尚书沙济达喇等已到。今将在自乌珠穆沁至鄂尔多斯等处会盟，侍郎席达礼等前往。三地会盟，依例应于会盟地宣谕，故所需圣旨，是否交由内秘书院依例拟写？为此谨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十月初三

尚书臣沙济达喇/左侍郎臣席达礼/右侍郎臣沙世悌尔/启心郎臣鼐格/主事臣济满/主事臣马拉

这份题本同样为处理顺治十二年会盟，当中记载了清廷派遣大臣参与会盟，及当众宣读圣旨事。该题本的特殊意义在于其中含有的关于清代内蒙古西三盟的信息。题本明确指出，将在从乌珠穆沁到鄂尔多斯的三个地方进行会盟。这应该就是后世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和伊克昭三盟之雏形。但是，何旗于何地进行会盟并不清楚。锡林郭勒盟前身的会盟地点，当时并非锡林郭勒河岸，而远在东北部的乌珠穆沁境内。

顺治十二年会盟接续顺治九年，按三年一盟时间，下次会盟应发生于顺治十五年，但根据题本，会盟时间提前一年，于顺治十四年即已举行。

题本四[①]

朱批：gisurehe songkoi obu.

题本：wesimburengg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

①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卷1第126本，第206页。

hese be baifi, yamun i efujehe garjaha babe dasaki sere jalin. amban be tuwafi ninggun jurgan de ciyaliyang bisire be dahame, meni meni yamun i efujehe garjaha be wesimbufi dasahabi. amban meni jurgan de ciyaliyan akū be dahame, efujehe garjaha babe dasarangge mangga. doigon de dasarakū oci, labudu efujehe manggi dasaci ciyaliyang baiburengge labdu ombi. amban be ere aniya (+) hesei culgan tucike babe, tulergi monggo i waliyabuha ulga be jafafi, ududu aniya ejen takrakū ulga bi. daci ere jergi ejen takarakū ulga be, amban meni jurgan de benjihe manggi. morin, temen oci, cooha i jurgan de afabufi icihiyambihe. ihan oci, dorolon i jurgan de afabufi icihiyambihe. amban be ere ejen takarakū ulga be, cooha i jurgan. dorolon i jurgan de afabure be nakafi, amban meni jurgan uncafi baha hūda de yamun i efujehe garjaha babe dasaki sembi. amban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gingguleme wesimbuhe (+)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duici aniya jorgon biyai juwan jakūn.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sidar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šaštir.

weilen ejeku hafan bime,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malu.

朱批：依议而行。

题本：题奏

理藩院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等谨题：为请旨修缮官署损毁处事。臣等之见，因六部各有钱粮，故自行题报官署损毁、予以修缮。臣部并无钱粮，故难以为此。然若不预先修缮，则损毁日增，故请益钱款。臣等本年奉旨看视会盟时，见所获外藩蒙古之遗失牲畜，多年无主认养。向例此等无主牲畜，送交本部，若为马、驼，则交兵部处理，若为牛，则交吏部处理。臣等敢请：可否将此无主牲畜停交兵、礼二部，而由本部售卖，所得钱款，用以修缮官署？

臣等不敢擅专，谨题请旨。

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十八

左侍郎加一级臣席达礼/右侍郎加一级臣沙世悌尔/主事加一级臣玛鲁

该份题本报于顺治十四年末，并非直接叙述会盟事，但其中明确提及“本年奉旨看视会盟”，足以说明会盟已提前一年。此次会盟时间发生变动，因此，本应于顺治十八年举行的下次会盟，也因此情况而提前一年，于顺治十七年举行。若以此次顺治十四年会盟计算，顺治十七年会盟仍然时隔三年。这一事实说明，虽然因突发情况，会盟时间不免发生变化，但原则上三年一盟已是定制。

题本五①

朱批：gisurehe songkoi obu.

题本：wesimburengge

○dorolon i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si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tulergi goloi monggo de, weile beideme, haha celeme culgan genere jalin. amban be baicaci, dorgi haha celere aniya, tulergi goro i monggo de, weile beideme, haha celeme, culgan genembihe.（原档残缺）aniya, juwan biyai dorgi de tulergi golo（原档残缺）yendehebi. tuttu bime, yadara irgen muribuha weile be（ya－）mun de, habšame jiki seci monggo i ba goro ofi isinjirengge mangga. erei anasi aniya indeme culgan tuciki seme wesimbufi（＋）hesei toktobuhabi. ere genere de korcin i juwan gūsa,

①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卷1第142本，第233页。

cahar i emu gūsa ohan i emu gūsa, naiman i emu gūsa, barin i juwe gūsa, ongniyot i juwe gūsa aru korcin i emu gūsa, jarut i juwe gūsa, karacin i juwe gūsa, tumet i juwe gūsa, kesikten i emu gūsa, ere orin sunja gūsa de culgan genefi, isinjiha manggi. hinggan i amargi ujumucin i juwe gūsa, duin jusei emu gūsa, aru korcin i emu gūsa, (原档残缺) -gan i emu gūsa, (原档残缺) ilan gūsa. ordus i ninggun gūsa. hu-(原档残缺) ere orin juwe gūsa de culgan genembihe (原档残缺) celembi. tutu bime, (+) hesei, aniya indeme, culgan tuci seme toktobuha be dahame, amban be (+) hese be baifi, ere aniya tulergi monggo de, weile beideme, haha celeme toktoho songkoi neneme korcin i ergi de culgan geneki sembi. amban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gingguleme wesimbuhe (+)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nadanci aniya juwe biyai tofohon.

dorolon i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sidari

dorolon i jurgan 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šaštir

weilen ejeku hafan bime, emu jergi (原档残缺)

朱批：依议而行。

题本：题奏

礼部左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衙门事务臣席达礼等谨题：为令外藩蒙古审案、比丁、会盟事。臣等查，内地比丁之年，外藩蒙古亦审案、比丁、会盟。(原档残缺) 年十月内，外藩 (原档残缺) ……举行。然贫民若欲因被冤枉前来衙门上诉，蒙古地广难至。此后相隔两年会盟一次。经题报，圣旨钦定，此次举行(会盟)，科尔沁十旗、察哈尔一旗、敖汉一旗、奈曼一旗、巴林

二旗、翁牛特二旗、阿鲁科尔沁一旗、扎鲁特二旗、喀喇沁二旗、土默特二旗、克什克腾一旗。此二十五旗已行会盟。抵达后，兴安岭以北之乌珠穆沁二旗、浩奇特二旗、阿巴噶二旗、苏尼特二旗、四子一旗、阿鲁科尔沁一旗、（原档残缺）一旗、（原档残缺）三旗、鄂尔多斯六旗、（原档残缺），此二十二旗业已会盟。（原档残缺）……比丁。然有旨，相隔两年会盟。臣等请旨，本年于外藩蒙古审案、比丁，依前例，率先会盟于科尔沁一方。臣等不敢擅专、谨题请旨。

顺治十七年二月十五

礼部左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衙门事务臣席达礼/礼部右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衙门事务臣沙世悌尔/主事加一级（原档残缺）

这份题本残缺较严重，但史料价值极大。

首先，关于三年一盟制度的形成过程。根据该题本，最初，外藩蒙古的会盟时间与内地的计丁时间一致。可惜，题本的关键性一词残缺，原文不知是每年十月内，还是每隔一年后第二年的十月内，将举行会盟。但根据清初文献记载，应该是每年一次。然而，因为蒙古地广，贫困百姓即令有欲申诉之事，恐亦难至会盟场所。因此之故，朝廷下令，改会盟时间为“相隔两年会盟一次”，即所谓“三年一盟”。这个制度始于何时，题本没有明确交代。但是，前引理藩院尚书沙济达喇等顺治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题本中提到，“外藩蒙古每三年为议罪、比丁而会盟，今三年已到，照例举行抑或停止”云云，可见三年一盟至少在顺治九年时已成定制。

其次，关于后世六盟两班制度的由来。依后世《大清会典》中关于理藩院的资料记载，乾隆二年“将六会分为两班。锡林郭尔、乌兰察布、伊克昭三会为一班，哲里穆、召乌达、卓索图三会

为一班，各班以大扎萨克为盟长，各于会内均齐预备”。[①] 这种六盟两班制度，源于顺治年间。两班之分缘于地理情况，以兴安岭为界，住牧于兴安岭以南和以东的蒙古各旗被划入东三盟，而岭北、岭西则被划入西三盟，此为清朝袭用蒙古制度的结果。蒙古人历来不以大漠划南北界，而以大兴安岭为分界线，岭南称“斡尔格蒙古”（岭南蒙古），岭北称“阿鲁蒙古”（岭北蒙古）。

最后，该题本点到了当时已经建立的内扎萨克蒙古四十七旗的名称。因为题本残缺，其中几旗的名称不可见。在兴安岭以北（以西）二十二旗中，“ - gan i emu gūsa”应该为“moominggan i emu gūsa”（茂明安一旗），“ - ilan gūsa”必定为“urad i ilan gūsa”（乌拉特三旗），而“ku - ”肯定为“kuku hoton i tumed i juwe gūsa”（归化城土默特二旗）。有意思的是，“阿鲁科尔沁一旗”在兴安岭南北两翼的东西会盟中同时出现，因而构成了四十七旗。其实，岭西的“阿鲁科尔沁一旗”应该是“杜尔伯特一旗”之误，所以四十七旗总数并无错误。另值得注意之处是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当时仍在内扎萨克会盟之列。

题本六[②]

朱批：gisurehe songkoi obu.

题本：wesimburengge

○dorolon i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sidari

---

① 赵云田点校《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第31页。关于该书，点校者误将其作为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据达力扎布《关于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四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一文考证，该史料所用底本，应为乾隆朝编纂之《大清会典》中关于理藩院之材料，并非理藩院自身所纂《理藩院则例》。

②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卷1第144本，第236页。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culgan de (+) hesei bithe gamara jalin. daci culgan tucimbihe de, (+) hesei bithe arafi, culgan ishan bade, (+) hesei bithe hūlame selgiyembihe. te ere genere culgan de selgiyeki serengge, kalka, ūlut be dahafi, doro acaha seme, coohai ahūra be heoledeme dasarakū ojorakū. kemuni neneme toktoho songkoi niyengniyeri, bolori juwe jergi coohai ahūra be tuwame, an i gabtabu. te tulergi goloi mango de, hūlha holo yendehebi sere. ere gemu kadalara ursei sula heolen de kai. meni meni jasak i wang, beile, beise, gung se, jai fejergi de oci, teisu teisu kadalara gūsai ejen, meiren i janggin, jalan i janggin, nirui janggin, juwan booi da bikai. ciralame fafulafi, hūlha be baicame isebure ohode, ai de hūlha holo yendembi seme, ere songkoi culgan isaha geren de selgiyeki sembi. (+) hese wasinjiha manggi. ilan bade culgan isara be dahame, ilan (+) hesei bithe ara seme dorgi yamun de afabureo. amban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gingguleme wesimbuhe (+)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nadanci aniya ilan biyai juwan uyun.

dorolon i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sidari

dorolon i jurgan 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šaštir

weilen ejeku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yahūn.

weilen ejeku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hūsiba.

朱批：依议而行。

题本：题奏

礼部左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衙门事务臣席达礼等谨题：为奉旨召集会盟事。向例举行会盟，皆有圣旨传往会盟处。当众宣读传谕。本次盟会传谕者：因喀尔喀附会厄鲁特，欲统一政令、整修兵

器，不可怠慢。故仍依前例，于春秋两季检视兵器，照常射箭。今于外藩蒙古，盗贼频出，此皆管辖之人懈怠所致。又各扎萨克之王、贝勒、贝子、公等，及至下属各管辖之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牛录章京、什长等，应传令禁止、严惩盗贼。何处盗匪多发，则于此次会盟依此传谕。圣旨下后，应传往三处会盟地，故圣旨需恭拟三份，交由内阁办理。臣等不敢擅专，敬题请旨。

顺治十七年三月十九

礼部左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衙门事务臣席达礼/礼部右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衙门事务臣沙世悌尔/主事加一级臣雅浑/主事加一级臣胡世巴

该份题本提及分三处会盟，但没有说明兴安岭以北还是以南。但联系题本五看，这里应指兴安岭以南二十五旗的会盟。

三 结语

根据以上顺治年间理藩院满文题本的记载，及以此做出的分析结果，也许可以提出以下几个观点。

其一，会盟制度是蒙古固有制度，并非清朝发明，它来源于蒙古传统中各部首领会盟议决大事的习惯制度。但是，蒙古入清之后，清廷派遣理藩院尚书、侍郎等大臣参与会盟，宣读皇帝圣旨，主持审案，监督比丁，会盟已经成为清朝监督和管理蒙古地区事务的一种制度。从清朝角度而言，该制度在太宗皇太极时期开始形成。清朝入关以后，内扎萨克蒙古的会盟，参照内地计丁时间，每年举行。但是，因当时条件限制，会盟无法如期举行。因此，清世祖定制，在内扎萨克蒙古中“相隔两年会盟一次”，于是形成了三年一盟制度，此事件应发生于顺治中期。然而，实际是否举行会

盟，仍需由皇帝最终裁定，因而也有提前或推后举行的实例。作为一种制度，会盟在顺治朝仍处于初步形成阶段。

其二，根据后世编纂《大清会典》与《理藩院则例》，内扎萨克蒙古分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六盟，而六盟均为“国初”所建。《大清会典》“理藩院”条记载：“国初定，每会设盟长一人，各于所属三年一次会盟，清理刑名，编审丁籍。”[①] 但根据以上理藩院档案记载，迟至顺治十七年，只有分六处进行会盟之制，而并无明确的六个盟，即并无盟长、固定会盟地点及固定名称。题本中可见，终顺治一朝，会盟是一种制度，而非后世的一种行政建制。同样终顺治一朝，会盟始终没有由朝廷任命的盟长。题本二提到，因察哈尔旗阿布奈亲王身为四周各旗王公之首，所以指定由他主持会盟。这毫无疑问属于临时性质。当时历次会盟举行之前，理藩院均需题报请旨，经由“圣裁”，决定会盟是否举行，同时裁定举行地点、举行时间及主持人选。完全可以肯定，在顺治朝只有分六处会盟的初步制度，它虽然是后来内扎萨克蒙古六盟的雏形，但作为“盟旗制度”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体系的一环，会盟远没有制度化、固定化和规范化。

据前人研究，清廷盟旗制度正式形成，纳入成文规章，见于乾嘉时期所编纂之《大清会典》。而盟名称正式出现于雍正十二年（1734），首次全部出现，则迟至乾隆二年（1737）。[②] 我们认为，在清朝统治框架下的内扎萨克蒙古，会盟作为一个政治制度，萌芽于清太宗时代，而初步形成为清世祖顺治中期的三年一盟之制。随着清朝在蒙古地区统治的稳定和蒙古各旗游牧地的最后形成，会盟从一个政治制度过渡到一个行政建制。这时候，盟有了由大扎萨克兼任的盟长和副盟长，有了固定的成员旗、固定的游牧边界、固定

①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第 29 页。

② 达力扎布：《明清蒙古史论稿》，第 281～282 页。

的会盟场所和固定的名称，盟长的职责越来越明确。这一切意味着，作为清朝对蒙古最基本的政治和行政制度的一环，盟此时才真正形成与规范化。

（原载《清史研究》2011 年第 4 期）

关于清代著名蒙古文人乌珠穆沁公滚布扎卜的几点新发现

乌云毕力格

清代蒙古著名文人滚布扎卜（Gümüjab，汉文文献又作古木布扎布、古穆布扎普等）生于乌珠穆沁扎萨克亲王家族。他通晓蒙、满、藏、汉四种语言，撰写过《恒河之流》《汉地佛教史》等蒙藏文史书，参加翻译了佛教经典《丹珠尔》经，研究过蒙藏文，编纂过藏蒙文辞书。滚布扎卜曾任京师官学唐古特学总监。①

本文根据清代满文档案资料和实录，论述有关滚布扎卜的几件事情。

一　清廷对滚布扎卜先世的册封

滚布扎卜的先世是蒙古察哈尔万户八大鄂托克之一的乌珠穆沁（又作乌朱穆秦，Üjümüčin）鄂托克贵族。达延汗分封诸子时，察哈尔归其长子兀鲁斯摆户（Ulus bayiqu）。兀鲁斯摆户子不地汗（Bodi alaγ qaγan）第三子翁衮都喇尔（Ongγun durqal）掌控乌珠

① 参见乔吉《滚布扎卜及其〈恒河之流〉》（蒙古文），滚布扎卜：《恒河之流》（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穆沁鄂托克。翁衮都喇尔六子，幼子多尔济车臣济农。[①] 滚布扎卜就是多尔济车臣济农的玄孙。

1627 年底，林丹汗西征，率察哈尔部征讨右翼三万户。这时，察哈尔的一些鄂托克脱离林丹汗，向北投靠了喀尔喀左翼的硕垒达赖济农。这些鄂托克包括乌珠穆沁、浩齐特和苏尼特。据《王公表传》载，多尔济车臣济农携其长兄之子北迁，到了喀尔喀左翼贵族硕垒处。“多尔济，号车臣济农，与察哈尔同族，为所属。以林丹汗不道，多尔济携绰克图（即蒙古文史书中的伊勒库巴图尔——引者注）子色棱徙牧瀚海北，依喀尔喀。”[②] 多尔济与色棱率乌珠穆沁北迁，显然与林丹汗的西征有关。林丹汗的西征始于 1627 年十月，[③] 所以乌珠穆沁等三部的北迁应在此后不久。乌珠穆沁的北迁，指的是离开原住牧地今蒙古国达里岗嘎一带到喀尔喀左翼硕垒达赖济农管辖之内的克鲁伦河流域。

乌珠穆沁等察哈尔万户分支投奔硕垒之后，与硕垒属部和阿巴噶、阿巴哈纳尔等一同，推举硕垒达赖济农为“共戴马哈撒嘛谛车臣汗”（Olan-a ergügdegsen maq-a samadi sečen qaγan），从此，喀尔喀始有三个汗。[④] 此后，乌珠穆沁部的活动均与车臣汗有关。如，1635 年，车臣汗通过呼和浩特土默特人与明朝贸易的商队里就有乌珠穆沁人。1635 年底，喀尔喀硕垒汗、乌珠穆沁部多尔济车臣济农以及苏尼特、浩齐特、阿巴噶等部大小诺颜，迫于爱新国

---

① 滚布扎卜：《恒河之流》（蒙古文），第 109 ~ 110 页；答里麻：《金轮千幅》（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第 204 ~ 205 页；喇西朋楚克：《水晶数珠》（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第 857 ~ 858 页。《大黄史》（蒙古文）记载，不地汗的第三子翁衮都喇尔诺颜，其子巴颜代诺颜，其子多尔济车臣济农，伊勒库巴图尔诺颜（《大黄史》，民族出版社，1983，第 124 页）。《大黄史》把长子和幼子的顺序颠倒了，而且多出名叫巴颜代诺颜的一代，多尔济成为翁衮都喇尔的孙子，完全不可信。

② 《钦定回部蒙古王公表传》卷 34，武英殿刊本，“乌珠穆沁部总传”。

③ 乌云毕力格：《喀喇沁万户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第 68 页。

④ 乌云毕力格：《喀尔喀三汗的登场》，《历史研究》2008 年第 3 期。

的压力，派卫征喇嘛为首的百余人的使团到盛京，献方物，与爱新国建立了友好睦邻关系。1636 年初，天聪汗遣卫寨桑出使车臣汗部，在致书硕垒汗的同时，天聪汗还分别致书车臣汗所属乌珠穆沁等部首领。致乌珠穆沁部多尔济车臣济农的书云："Sečen qaγan-u jarliγ bičig. Sečen jinong-du ilegebe. ilegegsen bičig-ičinu. bi üjebe. qalq-a-du tüsigsen kümün-i γajar-yin qola č a yambar-i medejü kelem bide. aliba yabudal-iyen učir-i ta medenem-i-a."（汉译："天聪汗旨令。致车臣济农。来书尽悉。至于投附喀尔喀之人，我等在此远方安知其心而有所言？凡尔等所行之事，惟尔等自知耳。"）[①] 该文书显示，天聪汗对多尔济车臣济农北迁投附喀尔喀表示不满，并表达了威胁和拉拢的双重意思。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爱新国派往车臣汗的使臣卫寨桑等同车臣汗部使团一起抵盛京。车臣汗部使团中，乌珠穆沁部纳木浑津为使团首脑之一。[②] 从此以后，天聪汗积极拉拢原察哈尔属部，要他们南下，投靠爱新国。如，崇德二年（1637）五月，遣往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等部的使臣卫征囊苏、祁他特塔布囊、宜巴礼率蒙古使臣来朝，多尔济车臣济农和浩齐特、苏尼特的使者们在崇政殿向崇德皇帝行三跪九叩礼，进献马匹。[③] 在这种背景下，是年十一月，多尔济车臣济农"闻上惠养国人，恩意周至，率其贝勒三十人举部来归"。[④] 这样，乌珠穆沁自喀尔喀克鲁伦河南下，投附了清朝。

清廷特别重视乌珠穆沁部的来归，给予多尔济车臣济农以很高的待遇。据载，崇德皇帝在亲征南下呼和浩特的喀尔喀扎萨克图汗的途中，在朵云地方（朵颜温都尔山）接见了新附的车臣济农，设黄幄，列仪仗，皇帝亲率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

---

① 《旧满洲档》，台北，1969，蒙古文原件载第 4638 页。

② 《清太宗实录》卷 32，崇德元年年十一月己酉。

③ 《清太宗实录》卷 35，崇德二年五月壬申、乙酉。

④ 《清太宗实录》卷 39，崇德二年十一月丁丑。

贝子、文武群臣并车臣济农及其臣属拜天。礼毕，皇帝还御黄幄，接受车臣济农率所部诸贝勒及臣属朝见，车臣济农等行三跪九叩礼，一起进宴。车臣济农以下诸台吉、塔布囊以及阿巴噶、苏尼特、浩齐特等部贵族各献马、驼、鞍辔、甲、胄等物。[①] 这是一次很高规格的接见。到崇德六年（1641），清廷特封多尔济车臣济农为"扎萨克车臣亲王"。崇德帝封多尔济车臣济农的诰命中这样写道："Dorjiči ijaγur mongγol-unčaqar-un qaγan-u törül büged：üjümčin ayimaγ-un noyan bülüge：čaqar-un qaγan törül törügsen-iyen ölü tanin ulus irgen-i jobaγaju törü-yi ebden yabuqui-dur. či jayilaju. Qalq-a-yin aq-a degü-degen neilegsen bölüge. bičaqar ulus-i oruγuluγsan-u qoin-a. čičaγ učir-i medeged. öber-ün qariyatu ulus-iyan abun. nadur oruju irelüge：tegüber bičimai jasaγ-un sečenčin wang bolγan ergübe."（汉译："尔多尔济乃蒙古察哈尔汗族，乌朱穆秦之诺颜也。因察哈尔汗不认亲戚，祸国殃民，破坏国政，尔避之，与喀尔喀兄弟会合。后朕征服察哈尔国，尔审时度势，遂率所属之民来归。故册封尔为扎萨克车臣亲王。"）[②] 多尔济成为乌珠穆沁右旗扎萨克之祖。

顺治三年（1646）三月，清廷还册封了与多尔济车臣济农一起投靠清朝的色棱。色棱为多尔济长兄伊勒库巴图尔长子，是滚布扎卜的族曾祖父。顺治皇帝给色棱的敕命文为："Serengči ijaγur mongγol-unčaqar-in qaγan-u törül büged：üjümčin ayimaγ-un tayiji bülüge：čaqar-un qaγan. törül törügsen-iyen ölü tannin. ulus irgen-i jobaγaju. törü-yi ebden yabuqui-dur. či üjümčin-ü sečenčin wang dorji luaγ-a jayilaju. qalq-a-yin aq-a degü-degen neilegsen bölüge. Taitzung qaγančaqar ulus-i oγoγuta ebdegsen-ü qoin-a. čičaγ učir-i medeged. qalq-a-yin aq-a degüben oγorču. sečenčin wang luγ-a öber-ün qariyatu

---

① 《清太宗实录》卷 40，崇德三年二月辛酉。

②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第 1 辑，"崇德帝封乌珠穆秦部多尔济为扎萨克车臣亲王之诰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第 303～305 页。

ulus-iyan abun. nadur oruju irebe：tegüber bičimai törü-yin erdeni noyan bolɣan ergübei."（汉译："尔色棱多乃蒙古察哈尔汗族，乌珠穆秦之台吉也。因察哈尔汗不认亲戚，祸国殃民，破坏国政，尔与乌珠穆秦车臣亲王避之，与喀尔喀兄弟会合。后太宗皇帝征服察哈尔国，尔审时度势，弃尔喀尔喀兄弟，遂与车臣亲王一道率所属之民来归。故册封尔为多罗额尔德尼诺颜。"）[①] 色棱成为乌珠穆沁左翼旗首任扎萨克。

顺治三年，多尔济车臣亲王去世，命其子垂僧格之子察罕巴拜袭车臣亲王爵位。[②] 察罕巴拜卒于顺治十四年（1657）。察罕巴拜有子六人，长郭尔图台吉，次苏达尼，次苏玛迪，次苏不迪，次吴达礼（又作乌达喇希，即滚布扎卜之父），次阿达礼。[③] 顺治十五年（1658），察罕巴拜次子苏达尼承袭车臣亲王爵位。康熙元年（1662）七月初一日，清廷册封察罕巴拜之妻、苏达尼之母博尔吉锦氏为"扎萨克车臣亲王之扎萨克母福晋"，册文中说："Jasaɣ-un čečen čin wang-un eke qatun oboɣ inu borjigin. činu törülki töb sayin. setgil kičiyenggüi ayumtaɣu. ögedegsi ger-tür törüjü. dotuɣ-a-du keb yosun-i daɣan ese dabajuqui. wang-dur učaraju. qaduɣtai-yin yosun-i bürin-e tegüsgejüküi. tüsiy-e tulɣ-a-yin erdem ketürkei ilete aldarsiɣsn inu. maɣad todunulan yekete tusalaɣsan-u tula. tegüberčimayičečenčin wang-un jasaɣ-un eke qatun kemen ergüjüče bičig suyurqaba."（汉译："扎萨克车臣亲王母后，博尔吉锦氏，尔禀性正直，谨慎小心。生于名门，遵行妇人之道，未曾逾越。适于王之后，尽夫人之道。彰显辅佐之德，真切抚爱大力辅佐，故封尔为车臣亲王扎萨克母后，

①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第 2 辑，"顺治皇帝封乌珠穆秦部色棱为多罗额尔德尼诺颜之敕命"，第 116 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 29，顺治十二月丁酉。

③ 答里麻：《金轮千幅》（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第 206 页；衮布扎布：《恒河之流》（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第 110～111 页。

赐册书。")[①] 康熙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清廷又册封苏达尼之妻博尔吉锦氏为"扎萨克车臣亲王之扎萨克大福晋"，[②] 册文基本同上（只换了被册封人名）。清廷对乌珠穆沁部的重视和优待可见一斑。

二 衮布扎布承袭辅国公爵位

康熙二十九年（1690）八月，车臣亲王苏达尼卒。[③] 这一年，乌珠穆沁部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

1689 年，准噶尔汗国噶尔丹汗率大军侵入喀尔喀，次年六月越过清朝边界，侵入乌珠穆沁境内，在乌尔会河大败阿喇尼率领的清军。第二年五月，清朝根据阿巴噶部台吉奔塔尔的告发，审理了乌珠穆沁亲王苏达尼之妻、扎萨克车臣亲王之扎萨克大福晋博尔吉锦氏附噶尔丹一案。据兵部尚书马齐疏奏，"苏达尼之妻及台吉车根、阿穆尔、充科、阿达里、罗雷、喇扎布等，顺附噶尔丹是实，俱应即行处斩。苏达尼之妻应革封号，撤去所属之人。苏达尼已故，应革去亲王，不准承袭。二等台吉博托和、喇扎布、阿喇西、博罗特及为向导绰克图等，曾送马匹牲畜，顺附噶尔丹是实，俱应即行处斩，妻子入官。拨什库阿尔塔等为噶尔丹指路，往来问讯，送骆驼马匹皆实，俱应即绞，其妻子应作何处治，交与该部议奏。博罗特乃应行正法之人，护卫巴扎尔、伊白葛尔将博罗特明知故纵，使之逃走，应照律即行处绞。贝勒毕鲁瓦，将重罪之博罗特不

---

①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第 6 辑，"康熙皇帝封乌珠穆秦扎萨克车臣亲王寡居福晋之册书"，第 122～124 页。

②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第 7 辑，"康熙皇帝封乌珠穆秦扎萨克车臣亲王苏大尼大福晋之册书"，第 170～172 页。

③ 《清圣祖实录》卷 148，康熙二十九年八月丙戌。

交付的当之人，严行看守，应罚俸一年。博罗特应传谕四十九旗严行查究，获日即行正法。得旨：车根等应俱依议治罪，从宽免籍没家产及撤所属之人，惟将本身正法。苏达尼并未知情，从宽免革亲王，仍与伊子承袭。巴扎尔、伊白噶尔俱从宽免死并籍没，著穿耳鼻示众，鞭一百。毕鲁瓦罚俸一年。余如议”。[①]

这次事件重创了乌珠穆沁旗。车臣亲王苏达尼之福晋被革封号，车根等10位台吉，向导1人，拨什库1人，共12人被处死，1位台吉被通缉。在这10位台吉中，阿达礼（Adari）为滚布扎卜的叔父。

清廷严厉打击乌珠穆沁叛逆势力的同时，也注意拉拢乌珠穆沁王室，其一，不追究已故亲王苏达尼，宽免革爵，仍令其长子色登敦多布于康熙三十年（1691）继车臣亲王爵位；其二，对苏达尼福晋虽然“顺附噶尔丹是实”，但仍免死，并宽免籍没家产及撤所属之人，仅撤封号而止；其三，在乌珠穆沁又封了一位辅国公，这就是滚布扎卜公爵之由来。

次年即康熙三十一年（1692），苏达尼弟、乌珠穆沁旗协理台吉吴达礼（Udari，清代汉文文献作“乌达喇希”或“邬达喇希”）之妻与其子滚布扎卜上书理藩院，乞求叙吴达礼不附噶尔丹和首告这次事件之功。据《清圣祖实录》载，“理藩院遵旨议覆，乌朱穆秦故协理扎萨克事务台吉邬达喇希之妻同伊子古木布扎布告称：前不附噶尔丹之人，俱蒙恩议叙。邬达喇希首告其事，尚未邀恩，恳请议叙。应将邬达喇希赠为辅国公，以其子古木布扎布袭爵，从之”。[②] 因为吴达礼已去世，滚布扎卜承袭了这个新赠的辅国公爵位。这就是“滚布扎卜公”之称的由来。

在《清圣祖实录》中有辅国公滚布扎卜几次朝见皇帝的记载。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七月，“乌朱穆秦辅国公滚布扎

---

① 《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壬辰。

② 《清圣祖实录》卷157，康熙三十一年十月壬寅。

卜来朝";[1] 四十四（1705）年七月，"乌朱穆秦辅国公滚布扎卜来朝";[2] 四十五（1706）年七月，"乌朱穆秦辅国公滚布扎卜来朝";[3] 次年（1707）七月，"苏尼特多罗杜楞郡王达礼扎卜、辅国公阿必大、乌朱穆秦辅国公滚布扎卜等来朝，赐袍褂、缎匹等物";[4] 四十八（1709）年八月，"鄂尔多斯固山贝子拉希扎木素、乌朱穆秦辅国公滚布扎卜、郭尔罗斯镇国公巴图、和托挥特辅国公博贝、厄鲁特扎萨克辅国公多尔济色卜腾等来朝"。[5]

三　滚布扎卜的婚姻与革退公爵

在乌珠穆沁叛附噶尔丹事件以后，滚布扎卜不仅承袭了辅国公爵位，而且在若干年后，还与清朝宗室联姻。雍正元年（1723）正月二十四日，理藩院具奏了一份满文奏折，其内容如下："理藩院谨奏：为请旨事。窃查外藩公主、格格来京，皆给廪食安置住所，俟报起程，廪食则撤……奉移梓宫时，公主、格格内，命谁留候，命谁起程之处，乞伏上裁。为此将公主、格格名号列于后。"这些公主、格格的名单中有"原乌珠穆沁公古木布扎布之妻、公之女格格"。[6] 这个"原乌珠穆沁公古木布扎布"就是吴达礼（乌达喇希）之子、清代著名蒙古文人滚布扎卜。这件事可以在记载清朝皇室系谱的《玉牒》中得到确认。据该《玉牒》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之玄孙奉国将军威塞的第五女封乡君，

① 《清圣祖实录》卷 212，康熙四十二年七月丁卯。
② 《清圣祖实录》卷 221，康熙四十四年七月丙戌。
③ 《清圣祖实录》卷 226，康熙四十五年七月癸未。
④ 《清圣祖实录》卷 230，康熙四十六年七月己巳。
⑤ 《清圣祖实录》卷 238，康熙四十八年八月壬寅。
⑥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黄山书社，1998，第 16 页，第 29 号档案，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四日折。

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四月嫁给“乌珠穆泰氏公古穆布扎普”。这里的“泰”为“秦”之误写，“乌珠穆泰”即“乌珠穆秦”。[1]根据《清史稿》“皇子世表”，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九子巴布泰，巴布泰长子噶布喇，噶布喇长子辉塞，辉塞长子即威塞，封三等奉国将军。[2]

根据上引理藩院奏折，雍正元年时滚布扎卜已不再是辅国公。那么，滚布扎卜何时何故被革退了呢？在康熙朝宫中档朱批奏折中，有一则非常重要的史料。这是一份康熙五十四年（1715）七月初八日的理藩院奏折。其原文如下：“wesimburengge：tulergi golo-be dasara jurgan-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dergi hese-be gingguleme dahara jalin. ujumucin-i gung bihe gumbujab-i alibuha bithede，bi weile baha niyalma，bahaci cooha-de genefi faššaki sembi. jai coohai-baita-de aisilame morin tofohon jafambi. ere babe wesimbureo sehe bithe-be elhe taifin-i susai duici aniya nadan biyai ice nadan-de giyan cing men-i lamun funggala rasi sede bufi ulame wesimbuhede，hese，jurgan-de afabufi gisurefi wesimbu sehebe gingguleme dahafi，baicaci，gung bihe gumbujab weilei turgunde gung-ci nakabuha niyalma，te cooha-de faššaki，tofohon morin aosilaki sehebe dahame，gumbujab-be weilengge ursei jergi-de faššame yabukini，ini aisilaha tofohon morin-be gumbujab gamame genefi，fiyanggu sede afabufi，baitalara ba bici baitalakin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be baimbi. elhe taifin-i susai duyici aniya nadan biyai ice jakūn. hiya kadalara dorgi amban bime aliha amban-i baita-be kamcifi icihiyara gung amban alingga，icihiyara hafan amban tegut，ejeku hafan amban tujen，ejeku hafan amban tosi。”汉译：“奏折：理藩院谨奏：据原

---

① 《玉牒》第 28 号，第 205 页，参见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第 128 页。

② 《清史稿》卷 169，中华书局标点本，《皇子世表二》。

乌珠穆沁公滚布扎卜呈称：我系获罪之人，如获准，愿前往军中效力。再为协助军需，捐马十五匹，请将此等处具奏。等语。该文于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初七日交乾清门蓝翎喇锡等转奏，奉旨：交院议奏，钦此钦遵。查得，原公滚布扎卜系因罪革退公（爵）之人，今既愿前往军中效力，并捐马十五匹，拟将滚布扎卜遣往将军费扬古等军中，于罪犯等中效力行走可也。伊所捐之马十五匹，著滚布扎卜带去，交付费扬古等人，倘有可用之处，使用可也。为此谨奏，请旨。领侍卫内大臣兼理尚书事务、公、臣阿灵阿，郎中、臣特古忒，主事、臣图詹，主事、陶锡。"康熙皇帝的朱批为："gumbujab-be unggiçi ojirakū [ojorakū], nakakini!"汉译："滚布扎卜不可遣往，著停止（遣往）。"[1] 可见，滚布扎卜在康熙五十四年或比这稍早的时候，因罪被革退公爵。但是，目前还不清楚滚布扎卜犯了何罪。根据该奏折，滚布扎卜为了戴罪立功，自愿提出到军中效力，并献 15 匹马赞助军需。理藩院同意了滚布扎卜的请求，但有意思的是，康熙皇帝否决了理藩院的决定，没有将他充军。这说明，一方面，滚布扎卜所犯之罪可能情形不很严重，另一方面，康熙皇帝大概还顾及处理车根等叛附噶尔丹事件以后的乌珠穆沁旗的稳定性。

滚布扎卜被革退公爵以后，没有变成白身。扎鲁特人答里麻著《金轮千幅》称滚布扎卜为"吴达礼公之子入内地的唐古特学首席大臣头等台吉通晓四种语言的滚布扎卜"。[2] 巴林人喇西朋楚克的《水晶数珠》称他为"吴达礼之子唐古特学总监头等台吉滚布扎卜"。[3] 巴林左翼旗人答里麻达赖著《白莲数珠》称滚布扎卜为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朝朱批奏折胶卷，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初八日理藩院领侍卫内大臣兼管理尚书事务公阿灵阿奏折，参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 1035 页，第 2636 号档案，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八日折。

② 答里麻：《金轮千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第 206 页。

③ 喇西朋楚克：《水晶数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第 858 页。

"唐古特学总监头等台吉额驸滚布扎卜"。[①] 可见，滚布扎卜被革退辅国公爵后，又被封为头等台吉了。但是，滚布扎卜被封为头等台吉的经过，目前还没有具体资料可以说明。

因为家庭和自身的种种问题，滚布扎卜与仕途无缘了。在雍正、乾隆年间，滚布扎卜一心著书立说，编撰史书，编纂辞书，翻译佛经，研究语文学，成为蒙古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学者。他著《恒河之流》反对当时十分流行的蒙古皇室起源于印度、西藏的说教，歌颂"受天命而降生"的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把蒙古皇统比作源源不断的恒河之流，呼唤清朝统治下蒙古人的民族自豪感。滚布扎卜的史学思想与他的遭遇和民族思想有密切关联。

① 转引自参见乔吉《滚布扎卜及其〈恒河之流〉》，《恒河之流》，第9页。

清初北方战略考

——以顺治十二年前后理藩院应对喀尔喀措施为中心

宋　瞳

一　引言

在清代历史中，顺治时期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崇德时期，满洲政权对自身政治体系、运作模式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大大完善了行政体系。[①] 1644 年清军入关，从东北一隅发展为君临中原的帝国，虽然故明疆土尚未全部征服，但通过一系列军事、怀柔措施刚柔相济，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清朝业已站稳脚跟，整个国家行政也有条不紊地开始运转。时至多尔衮逝世、顺治帝亲政，从大势而言，清朝统一南北只是时间问题。

但在具体战略层面，顺治帝所面临的是南北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南方南明政权、故明余部仍在，且拥有相当军事实力，占据半壁江山。而在北方，通过入关前后金—清朝政权多年苦心经营，虽然相对稳定，但漠北喀尔喀始终未曾宾服，甚至于顺治三年（1646）挑起“腾机思事件”，试图釜底抽薪，引发了清朝出兵漠北的军事行动。[②] 在这种情

① 参见刘小萌《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② 关于腾机思事件的经过与结局，可参看齐木德道尔吉《腾机思事件》，载《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第 2 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况下，清朝因时而动，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制定了灵活的战略方针，总体可概括为八个字——“北和诸蕃、南剿南明”，从而确保了最终胜利。本文试图通过《理藩院满文题本》中相关档案，围绕顺治十二年清朝确认喀尔喀扎萨克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及理藩院与清廷的应对措施，结合当时南北双方向的军事、政治局势，分析顺治朝“北和诸蕃”的具体情况与方法。

顺治一朝的北方策略，实则在相当程度上沿袭了自皇太极以来后金—清时期的相关做法。随着努尔哈赤的征战，满族成为东北首屈一指的强权，至皇太极时期，开始准备与明廷的全面对抗。但清朝作为偏居一隅的部族政权，若要直接挑战明朝，必须确保腹背无虞。因此，清廷采取“远交近攻”战略。首先，对明廷属国朝鲜，持续用兵，迫使其投降。[①]对蒙古诸部同样如此，对近在肘腋之漠南蒙古，清廷一方面竭力打击察哈尔部，另一方面分化拉拢，使得周边各部归附，最终建立了漠南蒙古四十九旗。[②]对鞭长莫及之漠北蒙古，皇太极则采取通使、互市等怀柔手段，与其保持良好关系。[③] 作为清廷重视蒙古地区的表现，蒙古衙门（崇德三年改称理藩院）应运而生，其中供职人员，均为精通蒙古事务之臣。[④] 从当时的基本形势来看，漠南蒙古建旗之初，需要有效的行政管理，而针对的战略重点，无疑是尚未宾服的漠北喀尔喀诸部。

在喀尔喀与清朝关系史上，顺治一朝可谓至关重要。先是喀尔喀有感于清朝的强大，一改双方保持的友好关系，在 1640 年结成

① 《满文老档》太宗朝第 4 册，天聪元年四月。

② 关于清初外藩蒙古十三旗建立时间与过程，参见达力扎布《清初“外藩蒙古十三旗”杂考》，收于达力扎布《明清蒙古史论稿》，民族出版社，2003。

③ 齐木德道尔吉《1640 年以后的清朝与喀尔喀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4 期。

④ 〔日〕村上信明：《清朝前期における理藩院の人員構成》，《満族史研究》第 4 期，满族史研究会，2005。

喀尔喀—卫拉特联盟，双方开始趋于对抗，顺治三年腾机思事件发生后，清廷与喀尔喀更是进入了事实上的敌对状态。而通过清朝张弛有度、恩威并施的一系列针对性政略，顺治十二年，喀尔喀左翼首先主动遣使通好，双方恢复睦邻关系。[①] 最终，清朝于此年对喀尔喀原有的两翼八扎萨克从官方角度予以承认，这成为清廷渗透喀尔喀内政的重要标志。

清廷得以插手喀尔喀内政，无疑表明其北方政策取得了巨大成果，通过本次事件，清朝开始对喀尔喀进行政治渗透，为日后清朝解决喀尔喀问题提供了跳板。然而，关于此次事件发生前后的具体过程，相关史料并无具体记述，上引《藩部要略》《清实录》中相关记载极为简略。大致有："甲寅，喀尔喀部落毕席勒尔图汗、俄木布额尔德尼、并子胡土克图等、以从事抢掠巴林部落，上表引罪，并求和好。进献驼马"；"顺治十二年。乙未。三月。丙戌朔。喀尔喀部落丹津喇嘛车臣汗等、贡驼马方物。宴赉如例"；"辛丑，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下喇嘛塔尔达尔汉诺颜等，遣使贡马宴赉如例。初定例：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车臣汗、丹津喇嘛、墨尔根诺颜、毕席勒尔图汗、鲁卜藏诺颜、车臣济农、坤都伦陀音此八扎萨克"。[②]

由此可见，《实录》记载，几乎如流水账面，平铺直叙，只有结局而无过程。如照此分析，似乎双方关系无甚波澜，建旗过程一番平顺。但需知，喀尔喀与清朝其时处于实质上的敌对状态，对于喀尔喀突然通好，清朝方面如何应对，最终收此效果，个中曲折，我们可以通过专司外藩事务的理藩院当时对此题奏的题本中看出端倪。

① 具体过程，见齐木德道尔吉《1640 年以后的清朝与喀尔喀的关系》。

② 《清世祖实录》，顺治十二年正月甲寅，顺治十二年三月乙未，顺治十二年十一月辛丑，中华书局，1986。

二　相关题本翻译与分析

甲：事件发生

顺治十二年正月，理藩院连续题奏两本，报告喀尔喀方面出现异动（以下遵循莫伦道夫转写法则，翻译为笔者自译，+为原文挪抬一格）。

题本一①

朱批：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araha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i ukanju i jalin. kalkai cecen han i abhanar i daibung erdeni i boboro sunja morin yalufi, gūwa i booi emu monggo haha be gajime, narat konggoro gebungge baci ukame jime, sunit i dureng jiyūn wang ni gurun de isinjiha be. gūsai ejen bodung, dureng jiyūn wang ni cooha tucifi tehe bade, alanaci goro ofi goidambi seme, niyalma tucibufi, boboro be jurgan de benjihebi. boboro de aika mejige bio seme fonjici, tusiyetu han, dalai lama de elcin unggihe bihe. tere elcin amasi jifi, dalai lamai gisun, suweni doro de facuhūn ojorakū, duin taiji jio sehe be dahame, duin taiji be unggifi daor aca sehe seme alanjiha manggi. nadan gūsa acafi, jorgon biya de culgaha. duin taiji be unggimbi seme gisurehe be dongjiha. amba taiji, buya taiji jidere be sarkū. bi（+）ejen

---

①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第96~97页。

be baime ukame jihe. mini eyun, sunit i dureng jiyūn wang ni ūljei taiji de bi. (+) dergici gosici, mimbe, mini eyun de acabureo sembi. jurgan i gisurehengge, ere gese (+) ejen be baime ukame jifi tulergi monggoi wang, beile de, ini niyaman hūcihin bi. niyaman hūcihin de banjiki seci acabumbihe. uttu ofi boboro de, toktobuha songkoi monggorokū sindaha sujei sijigiyan emke, mocin jakūn šangnafi, ini eyun de acabume, ūljei taiji de bu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 hese be baimbi seme (+) dele wesimbuhe (+) hese, ere baime ukame jihe be dahame, neneme toktobuha songkoi burengge jaci komso, ereci amasi, ere gese ukame jihe niyalma de nonggime burebe umesi toktobume gisurefi wesimbusehe. daci kalka ci ukame jifi tulergi goloi wang, beile se de bisire, niyaman hūncihin de banjiki sere niyalma de ukame jihe doroi monggorokū sindaha sujei sijikiyan emke, mocin jakūn šangnafi, ini sere, wang , beile se de. sargan akū niyalma de sargan, ulga, bume gosime jui seme hendufi unggimbihe. te (+)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kalkai ukanju de šangnara be unggime gisurehengge, suje juwe, mocin jakūn, mahala, gūlha nonggifi, suje juwe, mocin juwan ninggun. tuweri oci narhūn hocin dokoi monggorokū sindaha sujei sijikiyan icehe sekei mahala, juwari oci monggorokū sindaha sujue sijigiyan. boro. wase jibsihai šempilehe sarin i gūlha šangname gisurehebi. ereci amasi ere gese ukame jihe niyalma de ere songkoi šangname toktobureo.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aci aniya aniya biyai juwan ninggun.

aliha amban šajidara.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aisilakū hafan toolai.

aisilakū hafan ursan.

ejeku hafan jiman.

朱批：依议而行。

题奏

已办

理藩院尚书沙济达喇等谨题：为自喀尔喀部来归之逃人事。喀尔喀部车臣汗旗下阿巴哈纳尔之戴本额尔德尼处之博博洛，携马五匹，及别家蒙古男丁一名，自纳喇特康果洛逃归，已至苏尼特杜棱郡王之地。杜棱郡王率部出征，固山额真博敦恐如至驻军处往告，则路途遥远、耽误行程，故令人将博博洛送交我部。部臣讯及博博洛：可知晓何信息？答曰：土谢图汗遣使达赖喇嘛，后使者归，传达赖喇嘛口信曰：尔等败盟，恐为不妥，可令四台吉前往。故遣四台吉前来议盟。后于十二月，七旗会盟，听闻所议，将派四台吉前来，而大台吉及布颜台吉不知来否。吾逃归主上，有一姊于苏尼特杜棱郡王旗下奥尔斋台吉处。不知主上可否开恩，令吾姐弟团聚否？云云。部议：如此来归我朝之人，如在外藩蒙古王、贝勒处有亲族者，则遣送令与亲族团聚。如此，依定例赏博博洛镶领袖缎袍一件、佛头青布八匹，送与其姊处，交奥尔斋台吉。为此敬题请旨。奏后，上谕：此等来归者，如依前例，赏赐偏少，今后似此等来归之人，应增益所赏，尔等切实商定，再行上奏。而以往自喀尔喀逃来者，如言在外藩蒙古王、贝勒处有亲族，从而来归，则以礼赏镶领袖缎袍一件、佛头青布八匹，而生活于王、贝勒处者，如尚未娶妻，则令其恩养，使之娶妻成家，给予牲畜，遣人报知。今谨遵上谕，赠给自喀尔喀来归者之赏：缎二匹、佛头青布八匹及暖帽、靴子，增至缎二匹、佛头青布十六匹。如时值冬季，则赏细羊皮里子镶领袖缎袍、染貂皮暖帽。如时值夏季，则赏镶领袖缎袍、凉帽、袜子、重夹沿斜股皮靴。此后，似此等来归者，以此定例赏赐。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正月十六

尚书沙济达喇

启心郎鼐格

员外郎陶赖

员外郎乌尔善

主事济满

题本二[①]

朱批：inu. 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araha

○ecike hošoi ujen cin wang jirgalang sei gengguleme wesimburengg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hengge, tulergi monggoi cooha tucifi tehe jalin. ijishūn dasan i juwan emuci aniya, juwan biyai juwan ilan de, huhu hoton i noyan ombu i šabi biliktu band ii alanjiha gisun. bi noyan ombu i emgi, ūlet i abalai noyan de genehe bihe. noyan ombu be, turgūt i sihur daicing hanjifi gamaha. bi jidere de, abalai noyan i gisun. bi ahai cuhur i jakade genehe bihe. kalkai jasaktu han, juke jafaha manggi, ordus, tumet be coohalambi. cooha aisila seme, ahai cuhur de elcin takūraha bihe. minde geli cooha aisila seme hendure jakade. bi togmok gurun, mini gurun be feksifi, emu minggan isime boo be gamahabi. bi baru coohalambi seme jabufi unggihe. ere gusun be ordus, tumet de ala seme hendufi unggihe seme alajiha manggi. (+) dele wesimbuhe, (+) hese,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acafi, kimcime gisurefi wesimbu sehe, (+)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acafi gisurehengge, tulergi goloi monggo be ujunucin ci, ordus de isitala, gurun be dosi majige ibka. wang, beile, beise gung se,

---

①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第 98～100 页。

taijisa ci fusihūn, janggin, uksin ci wesihun, ilan ubu de, juwe ubu cooha tucifi, gurun i dubede saikan seremšeme tebu. tehe jai emu ubui wang, beile, beise, gung, taijisa ci fusihūn, janggin, cooha ci wesihun, saikan serešeme bisu. coohai agūra be dasata seme takūraki. jai musei dorgi janggin, cooha be acara be tuwame tucibufi, jase i dolo sahū keo i dukai šurdeme tebuki sembi seme, (+) dele wesimbuhe, (+) hese tulergi cooha be, wang sei gisurehe songkoi tucifi tekini, hūdun takūra. dorgi cooha be uthai weihukeleme, ašašaci ojorakū. te majige tuwaki sehe. (+)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tulergi cooha be, ilan ubu de, juwe ubu be tucibufi tebuhe bihe. te kalkai cecen han i abahanar i daibung erdeni ci ukame jihe boboro i alarangge. tusiyetu han, dalai lama de elcin unggihe bihe. tere elcin amasi jifi, dalai lamai gisun, suweni doro de facuhūn ojorahū, duin taiji jio sehe be dahame, duin taiji be unggifi, doro aca sehe seme alanjiha manggi. nadan gūsa acafi, jorgun biya de culgaha. duin taiji be unggimbi seme, gisurehe be donjiha seme alambi. uttu ofi jurgan i gisurehengge, tucifi tehe juwe ubui cooha be. boo de bihe emu ubui cooha be halabure. halaburakū uthai gocifi gajire, ba amba be dahame,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 hese be baime seme, (+) dele wesimbuhe, (+) hese halame tebuneci acara, gocici acara babe,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acafi gisurefi wesimbu sehe. (+)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meni geren i gisurehengge, tucifi tehe cooha be, emu ukanju i gisun de, uthai gocici ojorakū. tucifi tehe juwe ubui cooha be gocifi. boo de bihe, emu ubui cooha be halabuki. ilan biya de isitala umai mejige akū oci, tere fonde fisurefi wesimbu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 hese be baime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aci aniya aniya biyai orin.

ecike hošoi ujen cin wang jirgalang.

doroi beile šangšan.

dorgi amban, hebei amban, be sonin.

hebei amban hasitun.

hebei amban gūsai ejen ildei.

hebei amban gūsai ejen jolo.

hebei amban gūsai ejen arjin.

hebei amban hafa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uksun i handai

taidzi taiboo hebei amban boigo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gioroi bahana.

taidzi taiboo hebei amban dorgi gurun i suduri yamun i aliha bithei da esehei.

hebei amban sohon.

hebei amban lobi.

hebei amban jukungge.

hebei amban gancuha.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ejeku hafan jiman.

朱批：是，依议而行。

题奏

已办

叔郑亲王济尔哈朗等谨题：理藩院尚书沙济达喇等曾谨题：为外藩蒙古兵丁出驻事。顺治十一年十月十三，归化城之诺颜鄂木布旗下僧人毕力克图班第来报：吾与诺颜鄂木布同去往厄鲁特之阿巴赖诺颜处。诺颜鄂木布被土尔扈特部舒库尔戴青请去，吾将动身时，阿巴赖诺颜言道：吾去往阿海楚琥尔时，闻喀尔喀扎萨克图汗欲待冰封之时，兵犯鄂尔多斯、土默特，二部遣使至阿海楚琥尔处求援。又向吾言搬兵之事，吾遣人告之曰：托克马克国侵犯吾国，

夺近千户（人家）。吾将出兵讨伐之。臣等遣使，以此言通告鄂尔多斯、土默特，后上奏。上谕：令议政王、贝勒、大臣等会议后上奏。臣等谨遵上谕，议政王、贝勒、大臣等议，外藩蒙古，自乌珠穆沁部至鄂尔多斯部，各将游牧向内地略作收缩。令各部王、贝勒、公等，及台吉以下；章京、披甲以上诸人，分为三班。两班领军出兵，于牧地边界严密驻防。驻留一班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人以下，章京、兵丁以上，谨慎留守。并命其整修兵器。另，令边内章京集合军队，待机而出，驻守边内杀虎口。奏上，上谕：命外藩兵，速依王等所议出驻。而边内军队，不可即刻妄动，令其暂观形势。谨遵上谕，令外藩军队分为三班，以二班出驻。今喀尔喀车臣汗部阿布哈纳尔旗下戴本额尔德尼处之博博洛，逃归来告：吾闻：土谢图汗遣使达赖喇嘛，使臣回归，传达赖喇嘛之言曰：尔等不宜背盟，可令四台吉前往议盟。故此，喀尔喀七旗于十二月会盟，欲派四台吉前来。对此部议：令原出驻之二班军，与原留守之一班换防；抑或不予换防，即刻撤回，兹事体大，臣等不敢擅专，因此敬题请旨。奏上，上谕：换防或撤军何者适当，着议政王、贝勒、大臣等会议上奏。谨遵上谕，臣等众人议曰：出驻之军，若仅凭一逃人之言则撤回，甚为不妥。可令原驻防之两班兵丁，与留守之一班换防。若至三月仍无信息，彼时再议再奏。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

叔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尚善

内大臣议政大臣伯索尼、议政大臣哈什屯、议政大臣固山额真伊尔登、议政大臣固山额真卓洛、议政大臣固山额真阿尔津、议政大臣吏部尚书臣宗室韩岱、太子太保议政大臣户部尚书臣觉罗郎球、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内国史院大学士额色黑、议政大臣索浑、议政大臣罗璧

议政大臣朱孔格、议政大臣噶楚哈、启心郎鼐格、主事济满

由上可见，理藩院于顺治十一年正月，通过不同渠道，收到了关于喀尔喀方面的两份情报，一报喀尔喀即将来朝，一报喀尔喀提兵欲战，两份情报引起了理藩院及皇帝的极大重视，于四天之内做出了相关部署。对于截然不同的两种奏报，皇帝、理藩院及各议政王、大臣等做出分析决断如下：首先，为保边患安全，无论喀尔喀入侵属实与否，先调动外藩蒙古军队布防，以防万一；其次，由于情况不明，内地军队做出戒备，但暂且观望，按兵不动；最后，通过对情报及时局的分析，做出基本判断，认为喀尔喀入侵的可能性不大，故暂且只做戒备，不予行动。

通过上引题本可见，理藩院与议政王大臣会议之所以在战争疑云密布之际敢做出这种反应，其根源在于对西北局势的清晰认识。

其一，对外藩蒙古（即漠南蒙古）的信任。对此问题，曾有学者提出："当时漠南蒙古已经归属于清朝，可是清朝对它的统治还不十分稳固。所以喀尔喀左翼利用漠南蒙古的混乱和与它们之间地理位置的邻近，而继续向南扩张自己的势力。"[①] 并引罗布桑普棱列《第一世哲布尊丹巴传》证明当时漠南蒙古有暗地前往喀尔喀朝拜哲布尊丹巴其事。但事实上，朝拜作为宗教活动之一，是否能与暗通款曲等同尚且存疑。况且从这两份题本中可以看出，喀尔喀本部亦不断有来投清朝之逃人。[②] 而清廷所得喀尔喀进犯消息的传递者，本身就是归化城土默特旗人，其消息本源，更是与喀尔喀有同盟关系的厄鲁特蒙古阿巴赖诺颜。虽然日后发展证明此消息并不准确，但不难看出，当时的漠南蒙古与清廷关系已相当密切，究

---

① 〔韩〕金成修：《明清之际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26页。

② 仅顺治十一年九月到该题本上奏的顺治十二年正月，理藩院的奏本中就提到逃人来投案两例，来盗马被抓者一例，见《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第1册，第90、91、94～95页。

其实，清廷对漠南蒙古的怀柔羁縻，相比于喀尔喀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令人接受。正是出于这种紧密关系，中枢决策层才能放心只利用蒙古军队进行防御准备。

其二，对西部西藏、青海政策的成功。题本一中，清廷得到喀尔喀即将来朝的信息，而事件起源正是达赖喇嘛对土谢图汗做出的劝谕。顺治十年，清廷邀请五世达赖来京，此事很多学者都已撰文进行分析，也指出了其中的种种含义。[①] 不过对于清朝方面，此次会见的重要意义就是借助这位藏传佛教教主的威望，对宗奉同教派的蒙古施加影响。这也是清自太宗时期便开始着手的国策之一。[②] 至此，达赖喇嘛在该事件中的立场完全符合清廷的期望。相反，喀尔喀方面虽然与厄鲁特达成了同盟关系，但双方始终貌合神离，难以采取统一行动，厄鲁特自与清朝贸易中获取利润，同时在清廷与喀尔喀的冲突中采取了中立的态度。[③] 对于清朝来说，解除了来自西北方的后顾之忧。

乙　事件经过

理藩院与议政王大臣会议经过分析，定下了静观其变的解决之道，而在随后的二月到三月间，喀尔喀使臣抵达张家口。理藩院再次题奏。

---

① 如李保文《顺治皇帝邀请第五世达赖喇嘛考》（《西藏研究》2006 年第 1 期）一文认为达赖喇嘛求得了清廷对自身地位的承认，也促成了北方外蒙的归附。日本学者池尻阳子认为，清朝迎请达赖喇嘛，是为了宣示承继自元明两朝的正朔地位。见〔日〕池尻陽子《入関前後における清朝のチベッド仏教政策——ダライラマ五世招請活動を中心に》，《滿族史研究》第 3 号，（日本）滿族史研究会，2004。

② 马汝珩、成崇德：《伊拉古克三史事考辨》，《民族研究》1986 年第 5 期；达力扎布：《清太宗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史实考略》，《中国藏学》2008 年第 3 期；李保文：《唐古特·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考》，《中国藏学》2005 年第 2 期。

③ 达力扎布：《清朝初期与厄鲁特诸部的关系》，载达力扎布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 3 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题本三①

朱批：ere kalka ci jihe duin taiji se be dosimbu.

wesimburengg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 i tusiyetu han，cecen han i duin taiji jihe jalin. jang jiya keo duka ci benjihe bithe de，（＋）dele alban benjihe，kalka i tusiyetu han i lamatar darhan noyan i jui erke daicing. danjin lamai jui erdeni nomci. cecen han i jui munjang mergen cūhur. mergen noyan i jui isihi erdeni taiji. dalai kūtuktui beye. erei dorgi de kūtuktu，lama，taiji，tabunang sei elcin inu bi sembi. esei uheri hoki emu minggan，sunja tanggū niyalma jimbi seme，tese ini elcin，uyun niyalma be，musei karun be dosifi gal i bira ci neneme takūrafi jihebi. juwe biyai tofohon ci dosi jang jiya keo duka de isinjimbi sembi. ere uyun niylama be，duin jusei dahan joriktu jiyūn wang ni juwe niyalma，gemu beilei juwe niyalma，benjime jifi jang jiya keo duka de bi sehebi，jurgan i gisurehengge，dosimbure，dosimburakū，ba amba，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hese be baime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aci aniya juwe biyai juwan juwe.

aliha amban šajidara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朱批：此自喀尔喀前来之四台吉人等，准予放行。

题奏

理藩院尚书沙济达喇等谨题：为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之四台吉前来事。自张家口赍书中曰：前来纳贡之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拉玛塔尔达尔汉诺颜之子额尔克戴青、丹津喇嘛之子额尔德尼诺木

①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第100页。

齐、车臣汗之子穆章莫尔根楚琥尔、莫尔根诺颜之子伊什希额尔德尼台吉，并达赖呼图克图本人、及各呼图克图、喇嘛、台吉、塔布囊等人之使臣在内，一行共一千五百人前来。彼等入卡伦前，先遣使九人，自 gal 河前来。于二月十五抵张家口。此九人，由四子部卓里克图郡王处二人、顾穆贝勒处二人送至张家口。部议：放行与否，兹事体大，非臣等所能擅专，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二月十二

尚书沙济达喇、启心郎鼐格

经过一个月的等待，喀尔喀左翼四台吉于二月抵达张家口，致书称贡，从题本中不难看出，喀尔喀左翼实权人物都派出了自己的亲族，可见喀尔喀对此次出使的重视。而理藩院方面对此未敢擅动，一方面题奏皇帝，另一方面也在出谋划策，针对此次喀尔喀人入关，做出相关安排防范。具体行动就是理藩院于三月发出了对蒙古各旗的一份晓谕。

题本四[①]

朱批：gisurehe songkoi ciralame selgiye.

wesimburengg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 hese be baifi selgiyere jalin. daci kalka，ūlet de，niyalma，coohai agūra be uncaburakū bihe. te ere kalka，ūlet i jihe ucuri be dahame，niyalma，coohai agūra，uksin saca，loho，gida，bari，sirdan be，kalka，ūlet de ume uncara. jasak i wang，beile，beise，gung se，gūsai ejete meni meni gūsa de ciralame fafula. uncafi nambure. hetu niyalma gercilere oci nirui janggin，juwan booi da

①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第 101 页。

de suwaliyame weile seme hinggan i amargi tulergi goloi monggo, jakūn gūsai nuktere monggo de selgiye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aci aniya ilan biyai ice uyun.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aisilakū hafan buida.

aisilakū hafan caki.

ejeku hafan jiman.

朱批：依议传谕严禁。

题奏

理藩院启心郎鼐格等谨题：为请旨传谕事。本朝一向不售人丁、兵器与喀尔喀、厄鲁特。今逢两部前来，故人丁、兵器、盔甲、刀枪、弓箭等应一律禁止出售。扎萨克王、贝勒、贝子、公等，及各固山额真，应于各自旗中严令禁止。若私下出售被拿获，或旁人出首告发，则牛录章京、什长等一并治罪。以此传谕兴安岭以北外藩蒙古、及八旗游牧蒙古。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三月初九

启心郎鼐格、员外郎布伊达、员外郎查吉、主事济满

由此可见，理藩院确实针对喀尔喀的来访进行了精心准备，而这也正说明双方此刻确实处于非常微妙的关系中，清廷在没有确切得知喀尔喀的意图前，一切小心谨慎。顺治皇帝也完全赞同理藩院的做法，一方面，准予喀尔喀来使入卡伦，另一方面，严禁漠南蒙古交通喀尔喀，可以说，在对边策略中，清廷确实做到了张弛有度、恩威并施。

丙：事件解决

本次危机的解决方案题奏于是年三月末，经过理藩院会同议政

王大臣会议的讨论，决定遣使探问其来朝缘由，并由此得知了喀尔喀的确切来意。

题本五[①]

朱批：kalka feksifi gamaha barin i ulga be waliyafi niyalma be toodabuci，（原档残损，难以辨认）be dahame，duin taiji（原档残损），hengkileme jihe be dahame（原档残损）

wesimburengge

○ecike hošoi ujen cin wang jirgalang sei gengguleme wesimburengge，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kalkai tusiyetu han，cecen han i duin taiji jihe jalin. jiang jiya keo duka i ci benjihe bithe de，（+）dele alban benjihe kalkai tusiyetu han i lamatar darhan noyan i jui erke daicing. danjin lamai jui erdeni nomci. cecen han i jui munjang mergen cūhur. mergen noyan i jui isihi erdeni taiji. dalai kūtuktui beye. erei dorgi de kūtuktu，lama，taiji，tabunang sei elcin inu bi sembi. esei uheri hoki emu minggan，sunja tanggū niyalma jimbi seme，tese ini elcin，uyun niyalma be，musei karun be dosifi gal i bira ci neneme takūrafi jihebi. juwe biyai tofohon ci dosi jang jiya keo duka de isinjimbi sembi. ere uyun niylama be，duin jusei dahan joriktu jiyūn wang ni juwe niyalma，gemu beilei juwe niyalma，benjime jifi jang jiya keo duka de bi sehebi，jurgan i gisurehengge，dosimbure，dosimburakū，ba amba，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hese be baimebi seme，（+）hese be baimbi seme（+）dele wesimbuhe，（+）hese，ere duin taiji，geren elcin，teni jidere be dahame，hebei wang，beile，ambasa gisurefi wesibu sehe seme，taidzi taiboo aliha

①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第 103 ~ 106 页。

bithei da ceki, ben be gajime jifi,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be isabufi, geren i gisurehengge, neneme unggihe (+) hesei bithe de, barin i eden niyalma be benjire, ulga i jalin, duin taiji hengkileme jidere ohode dosimbumbi sehe bihe. (+) hesei songkoi, duin beile alban benjime, hengkileme jidere be dahame dosimbuki. coohai jurgan,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juwete hafan tucibufi duka de okdofi, jihe turgun be fonjifi, wesimbume gajiha bithe b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emu hafan juleri gajikini seme gisurefi (+) dele wesimbuhe, (+) hese gisurehe songkoi juwe jurgan i hafan ba, ecike hošoi ujen cin wang, tuwame tucibufi takūra sehe, (+)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aisilakū hafan ursan, šahūn se be unggifi, duin taiji de jihe turgun be fonjici jaburengge, duin gūsai, duin taiji jio sehe, (+) hese be dahame, meni duin taiji, beye, beile se, taijisai elcin se, aniyai alban, duin uyun i ulga beijime, ai (+) hese wasimbuci (+) hese be dahafi seme jihe, barin i eden niyalma, darhan cin wang, meni juwe siden de, emu udu niyalma bihe. ebsi genehe be sarkū. jai kalkai han, beilese, taijise, lama sai uheri, (+) dele alban benjihe tahi ilan, morin emu minggan, juwan nadan. temen sunja. sahaliyan dobihi jakūn. šanggiyan dobihi juwe. weihun seke emke. sekei dahū juwe. seke emu tanggū orin. silun i dahū emke. tashari dethe juwan juwe bi sembi. ere duin taiji i hoki emu minggan, sunja tanggū niyalma, juwan uyun de, jang jiya keo duka be dosika. orin ninggun de isinjimbi sembi. erebe (+) dele donjikini seme gingguleme wesimbuhe. (+) hese saha, meni meni jurgan sa sehe. (+)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jurgan i gisurehengge, ere jihe duin taiji de, doroi jalin gisurere, jai barin i eden niyalma, darhan cin wang se de orin ilan niyalma bi. ere orin ilan niyalma, jai kalka de bisire eden niyalmai jalin gisurere ba amba,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 hese be baimbi, seme (+) dele wesimbuhe (+) hese,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acafi, acara be tuwame gisurefi wesimbu sehe. (+)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dorgi amban dorji darhan noyan,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uju jergi hiya mookitat, coktu se be unggifi, kalkai duin tiji de, suweni jihe turgun be, (+) hesei fonji sehebi, seme fonjici, jaburengge, duleki aniya, erdeni nomci de, (+) dergi hesei, kalkai duin gūsai, duin beile jio sere jakade, meni tubai han, beile, uheri amba, ajige beise se gisurefi, (+) hese be dahame, aniyai alban, duin gūsai duin uyun i ulga be benjime, ai (+) hese wasimbuci, (+) hese be dahaki seme, meni duin nofi be ujulafi, han, beile sei elcin be, uttu unggihe sembi. uttu oci duleke aniya, erdeni nomci jihede, (+) dergi hesei, barin i eden niyalma be yooni benju. ulga i jalin, ujulaha duin beile hengkileme jio sehe bihe kai. suwe (+) hese be dahame, duin taiji i beye, aniyai alban, duin uyun i ulga be benjime jihe kai. barin i eden niyalma be gaihao seme fonjici, jaburengge, mende bisirei teile be, gemu ashan i amban biliktu sei genehe fonde unggihe. gūwa niyalma ukame ubade amasi jihengge inu bi. ukara be amcafi wahangge inu bi. nimeku de bucehengge inu bi. ūlet de uncahangge inu bi. seme jabufi unggihe bihe. jai duleke aniya, erdeni nomci jihe de, barin i eden niyalma be yooni benju sehe be, ainci bucehe, wabuha, uncaha niyalma be waliyaha dere seme, bisire niyalmai teile be baicaci, damu emu hehe bihe. ini eigen gamame ukakabi. ere tašaraha waka minde bi. absi obuci, (+) dergi ciha, te bicibe, barin be feksire de, darhan cin wang, joriktu jiyūn wang, erke cūhur, ere ilan nofi feksihe bihe. te darhan cin wang, joriktu jiyūn wang ubade jihebi. erke cūhur i teile mende bi. ere eden niyalma be yooni membe tooda sembio. feksihe ilan nofi be uhei toodabumbio. aikabade uhei toodabure gese oci, darhan cin wang, joriktu jiyūn wang

se de fonjifi, cende bihengge udu niyalma ukaka. udu niyalma wabuha. udu niyalma bucehe. udu niyalma uncaha. ton be baha manggi. erke cūhur de geli udu niyalma funcembi. ere toodabume ton be mende bureo sembi. uttu ofi, meni geren i gisurehengge, barin i gaibuha eden ilan tanggū dehi ilan niyalma be feksihe, ilan nofi de, ilan ubu sindafi, muse de jihe, darhan cin wang, joriktu jiyūn wang de juwe ubu goibume, erke cūhur i emu ubu be, waha, uncaha niyalma be toodabume. nimeku de bucehe niyalmai jalin, erke cūhur i jušen be saliha beile be gashūbume, ulgai jalin, (+) hese be dahame, aniyai albanbenjime, duin taiji i beye, jihe be dahame, waliyaki seme gisurehebi. 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aci aniya ilan biyai orin juwe.

ecike hošoi ujen cin wang.

doroi beile šangšan.

doroi beile dulan.

dorgi amban, hebei amban, be sonin.

dorgi amban dorji darhan noyan.

hebei amban gūsai ejen ildei.

hebei amban gūsai ejen jolo.

šooboo bime taidzi taiboo kamciha hebei amban boigon jurgan i aliha amban gioroi bahana.

šooboo bime taidzi taiboo kamciha hebei amban dorgi gurun i suduri yamun i aliha bithei da esehei.

šooboo bime taidzi taiboo kamciha hebei amban dorgi gurun i suduri yamun i aliha bithei da ning wan o.

hebei amban tui janggin cerbu.

hebei amban lobi.

hebei amban jukungge.

mujilen bahabukū naige.

uju jergi hiya mookitat.

uju jergi hiya coktu.

朱批：喀尔喀所劫掠之巴林牲畜，不予追究，命其将所抢之人送还，（原档残损）故四台吉（原档残损）前来陛见，故（原档残损）

题奏

叔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等敬题：前理藩院启心郎鼐格等谨奏：为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车臣汗处四台吉前来事。自张家口赍书曰：前来纳贡之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拉玛塔尔达尔汉诺颜之子额尔克戴青、丹津喇嘛之子额尔德尼诺木齐、车臣汗之子穆章莫尔根楚琥尔、莫尔根诺颜之子伊什希额尔德尼台吉，并达赖呼图克图本人、及各呼图克图、喇嘛、台吉、塔布囊等人之使臣在内，一行共一千五百人前来。彼等入边卡前，先遣使九人，自 gal 河前来。于二月十五抵张家口。此九人，由四子部卓里克图郡王处二人、固穆贝勒处二人已送至张家口。部议：放行与否，兹事体大，非臣等所能擅专，为此敬题请旨。奏上，上谕：此四台吉及众使者方至，故命议政王、贝勒、大臣等议奏。太子太保大学士车奇，挑选得力之人，会同议政王、贝勒、大臣等共商。先前颁旨述及命送还巴林被抢之人及相关牲畜等事，故若四台吉来陛见，则允放行。遵旨，因四贝勒携供赋陛见，故令其入边。兵部、理藩院各遣二员，出关迎接。且问其所来缘由，命其将所携奏书交理藩院一员带回，议后上奏。上谕：依议，二部官员事，叔郑亲王视后派出则可。谨遵上谕，遣员外郎乌尔善、沙浑等往，探问四台吉来此缘由，其答曰：四旗（鄂托克）令臣等前来，乃遵旨由臣等本人，贝勒、台吉等之使臣，送交年供四九牲畜而来。若有何旨意颁下，自当遵行，是故前来。巴林所缺之人，有数人曾居于达尔汉亲王与本部之间，然是否

前来不知也。又，喀尔喀汗、诸贝勒、台吉、喇嘛等，送纳贡赋。计野马三匹、马一千一十七匹、骆驼五头、黑狐皮八张、白狐皮两张、活貂一只、貂皮端罩两件、貂皮一百二十张、猞猁狲皮端罩一件、皂雕箭翎十二羽。云云。此四台吉一行一千五百人，于十九日自张家口入边，二十六日可抵达。云云。敬奏所闻，旨下：知道了、晓谕各部令知。遵旨部议：此四台吉言为政事而来，又，巴林所缺之人，有二十三名于达尔汉亲王处，此二十三人，以及其所云尚在喀尔喀部者，事关重大，非敢擅专，为此敬题请旨。奏上，上谕：由议政王、大臣等会议，视所当行之举上奏。谨遵上谕，遣内大臣多尔济达尔汉诺颜、启心郎鼐格、一等侍卫毛齐塔特、绰克图等前往，奉旨询问喀尔喀四台吉所来之由。四台吉答曰：去年，额尔德尼诺木齐传旨，命喀尔喀四旗之四贝勒前来，敝处之汗、贝勒及大小贝子等议决：谨遵圣旨，由四台吉奉纳年供四九牲畜，且如有旨下，愿奉遵行。故命臣等四台吉为首，携汗、贝勒等使臣前来。云云。又问：若此，额尔德尼诺木齐去年来朝，曾颁旨命其将巴林所缺之人尽数送还。而牲畜等事，则命以四贝勒为首前来陛见时商讨。尔等遵旨而行，令四台吉亲带四九牲畜缴纳年供，而巴林所缺之人，可曾带来？答曰：尚在本部之人，已尽其所能，悉数于侍郎毕力克图等来时交还。其余人等，来此后逃走者有之，于逃跑时被追杀者有之，病故者有之，卖于厄鲁特处者亦有之。后又遣人报：额尔德尼诺木齐去年来时，传谕悉数送还巴林所缺之人，想来病故、被杀、被卖者不在其列，尽力探求幸存之人，唯一女子而已，其夫于捉拿时逃走，此乃臣等之过，如何发落，听凭上意。劫掠巴林时，达尔汉亲王、卓里克图郡王、额尔克楚琥尔此三人参与。今达尔汉亲王、卓里克图郡王来此，额尔克楚琥尔独在我部，是否曾言将所缺之人归还？一并令此参与劫掠三人归还否？设若一并归还，则询问达尔汉亲王、卓里克图郡王，几人逃至其处，几人被杀，几人病故，几人被卖。计数后，尚有几人在额尔克楚琥尔

处？此命其归还人数是否告知臣等？云云。故此臣等议：巴林被掠共三百四十三人，于此三人处者，可三分之，来我处者，分与达尔汉亲王、卓里克图郡王三分之二，而额尔克楚琥尔之处之三分之一，及令其归还者中被杀、被卖、病故之人，由额尔克楚琥尔之属民承担，令其贝勒起誓。牲畜之事，因四台吉遵旨亲携年供而来，故赦免。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三月二十二

叔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尚善、多罗贝勒杜兰

内大臣议政大臣伯索尼、内大臣多尔济达尔汉诺颜、议政大臣固山额真伊尔登、议政大臣固山额真卓洛、少保兼太子太保议政大臣户部尚书臣觉罗巴哈纳、少保兼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内国史院大学士额色黑、少保兼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内国史院大学士宁完我、议政大臣护军统领车尔布、议政大臣罗璧、议政大臣朱孔格、启心郎鼐格、一等侍卫毛齐塔特、一等侍卫绰克图

可以说，上引之长奏本，表明了清朝对喀尔喀的基本态度。虽然原档朱批处有些字句难以看清，但基本可确认，在查实喀尔喀确无敌意后，清廷提出了“巴林事件”的陈年旧账。此事乃“腾机思事件”的遗留问题，也有学者约略提及。[①] 但通过清廷一系列的行动来看，此问题的关键绝非“人畜归还”，实则是清廷要保持对喀尔喀压力的重要借口，以及清廷宣示自身作为“天下之主”地位的一种手段。从题本中可以看出，喀尔喀左翼对此也百般推脱，试图淡化其影响。但对于清廷来说，只要喀尔喀接受了清廷的归还令，是否真正“人畜归还”则不成问题。于是乎，此事最终不了了之，成为清朝显示宽大的又一手段也就不奇怪了。

同时，本次危机事件也就此解决，清廷于该年六月开始商议与

① 〔韩〕金成修：《明清之际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第123～127页。

喀尔喀的会盟事宜，经过一系列的部署与讨论，最终达成了设立八扎萨克的初步成果。关于会盟的商定过程与结果，同样经理藩院处理，具体细则，当另撰文分析。

三　事件的发生背景与解读

顺治十二年喀尔喀正式设旗前的这次危机处理，可以说非常典型地表明了清初对喀尔喀的策略，即羁縻为主、主动防御，但不采取主动进攻手段。顺治三年腾机思事件是这种“主动防御”战略的开始，也奠定了十余年间漠北无事的军事基础。但就顺治十二年来说，喀尔喀方面也绝非无懈可击。是年，车臣汗位发生变化，“巴布继其父硕磊称汗”。[①] 在车臣汗位的继承中，喀尔喀右翼进行了激烈争斗，以至硕磊死后五年左右，巴布方顺利继位。[②] 作为腾机思事件的幕后推手，硕磊之死无疑对清廷是个有利情况，加之车臣汗部内硕磊诸子，以及喀尔喀左右两翼对权力分配的争夺，清廷此时如进行主动渗透、进攻，也能收效颇丰。

尽管清廷恐怕于其时并不知晓喀尔喀的内乱，但从题本五提到的来朝使臣中“车臣汗之子穆章莫尔根楚琥尔”看来，至少其对车臣汗位易手心知肚明。文中分析的边境异动示警，是否因清廷掌握了此次车臣汗位变化，才使得理藩院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处理过程中如此谨慎，目前尚无足够证据。不过即令情报不足属实，也充分说明清廷此时的战略重心并不在北方。数年后，康熙帝再次面对

① 《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53，传第37。

② 关于硕磊汗的死期与喀尔喀内部关系，见乌云毕力格《车臣汗汗位承袭的变化——以〈蒙古堂档〉满蒙文史料为中心》，载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7；后收入作者论文集《十七世纪蒙古史论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车臣汗位问题时，彼时的清廷在情报、外交等手段上都全面转向喀尔喀，从而一举将漠北彻底收服。[①]

另外，当时清朝确实存在实际上的军事困境，对南方局势的担忧，是其不敢轻启北方边衅的重要原因。顺治一朝尚处入关之初，立足未稳，作为清朝的战略重点，南方“汉贼不两立”的对立情绪与南明小朝廷、故明余部的武装反抗，才是其心腹大患。而在顺治十二年前后，南方对清廷的军事牵制，也应是考察当时中枢策略的重要依据。

顺治皇帝亲政后的顺治七年到十二年，南方战局云谲波诡，牵扯了顺治皇帝几乎全部注意力。顺治七年，张献忠大西军余部出滇，开始与南明合流抗清。[②] 顺治八年，大西军李定国、孙可望部率军攻打桂林，随后进兵湖南，在一系列辉煌胜利后占据了广西、湖南全境。清军统帅、清初四王之一定南王孔有德以及敬谨亲王尼堪都死于其手。这次大败，对清廷震动极大，可以说自清军南下，伤亡之惨、失地之众，莫此为甚。顺治皇帝之后不断增兵江南，并派遣宿将统率，但收效甚微。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对此评价为：“清朝入关以来损兵折将、被拖住时间最长又最无战果的一次军事行动。”[③] 劳师糜饷的直接后果是清军大量兵力投入江南，并且随时准备再度增援，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理藩院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始终强调“内地兵马不可擅动出边”了。

从顺治十二年的史籍相关记载来看，相比记述喀尔喀的寥寥数语，南方局势却是史不绝书。大西军仍然活跃，清廷已经投入了包括王、总督、固山额真等诸多大员围剿。“壬子，侍读学士雷护、护军统领常敏等，自广东奏报击败贼渠李定国捷音。至是还军中赍

① 参见乌云毕力格《车臣汗汗位承袭的变化——以〈蒙古堂档〉满蒙文史料为中心》。

② 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第638页。

③ 关于此次战役的具体进程，参见顾诚《南明史》，第704~715、843页。

敕，谕靖南将军固山额贞朱玛喇等曰：尔等率兵前往。会同两王及总督李率泰，将已入广东贼兵多方制胜，阵斩无算，深可嘉悦。但既已统兵前往，仍会同两王及总督李率泰，相机安抚被贼地方人民，再行报闻。"① 而更加令清朝担忧的，是占据江南沿海、精通水战的名将郑成功："都察院左都御史龚鼎孳奏言：海贼郑成功，旋抚旋叛，攻陷漳泉。浙闽总督刘清泰剿抚无能，藉病息肩，宜加处分。同安侯郑芝龙，不能训子革心，又不束身待罪，早宜防范，以肃清内外。下部密议。"②

同样作为清朝重要档案的内国史院档，现存顺治十二年档案唯独二月。对比上引理藩院题本中日期，喀尔喀右翼来朝恰恰发生于该月，但在内国史院档中，对此事只字未提；相反，却详细记载了二月初四与二月初七两日，对南方统帅洪承畴、耿继茂、尚可喜下发的敕谕；而针对郑成功，更为兴师动众。该档案载顺治十一年腊月二十一，顺治皇帝任命世子济度为帅，辖多罗贝勒巴尔楚浑、固山贝子吴达海等宗室出征，专讨郑成功，并详细记录了随军将领名单。在这份长达三页的名单后，顺治皇帝特谕："兹郑成功劳累朕躬甚多，尔等殚忠竭力。钦此。"③

史籍记载当然有其选择性，但是不录入其内的事件也有其启示意义。具体到喀尔喀事件，就是清廷通过分析比对，显然对喀尔喀的威胁做出了非常低的评估，而在顺治皇帝心中，南方战局更为紧要。理藩院作为清朝国家机器的一环，在独立运作的同时，明显服膺于国家战略，因此在事件发生后，无论是应对方法，抑或谨慎程度，理藩院都能审时度势、拿捏尺度，这充分说明了清初政体组织结构已趋于完整与高效。

---

① 《清世祖实录》，顺治十二年正月壬子。

② 《清世祖实录》，顺治十二年正月戊申。

③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第 343 ~ 344、336 ~ 339、340 页。

四 总结

清朝自关外一隅渐至入主中原，除得益于时局与个人能力，与其富有战略眼光的大局观及延续而不失弹性的策略实施有极大关系。后者，以今日概念看，便是所谓“国家战略”。自后金至清朝，满族与蒙古、西藏、明朝、朝鲜等势力的关系，始终被研究者从不同领域加以研究。但不同于后世研究者截取事件作为剖面，一个完善、有效的政权，必须从宏观角度、整体方面对自身所处的时局、情势加以分析，随即做出主次之分，再进行合理应对。而在清初政体中，皇帝决策前，理藩院、六部、议政王大臣会议等部门所担负的，正是此职。

回到本文讨论之主题，从理藩院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理藩院作为处理外藩事务的专职机构，其运转并非独立于政体之外，一旦涉及职务交叉，便迅速通过上奏与六部关联各处取得联系，必要时甚至提交议政王大臣会议，会商讨论，一体定夺。同时，作为整体政策执行者，理藩院虽专司外藩事务，但由本文所述可见，相关人员对国家战略都有具体概念，因此在决策时，也与整体战略并行不悖。

文中分析的南方格局，虽然与理藩院职责无涉，但通过比较，不难看出理藩院绝非自我封闭，独立运行，而是服膺时局战略，对涉及部门职责的层面，做出最有利于整体的处理。顺治十二年喀尔喀来朝事件，无论史料记载抑或处理方式，似乎都略显敷衍、虎头蛇尾。即令此后清朝完成了喀尔喀设旗，也表现出一种权宜之计的意味。

实则，此次事件，既不能说明清廷对喀尔喀以往敌对行为的不了了之，也不能被看作清朝针对北方“恩威并施”的具体表现。

归根结底，此次事件是理藩院等部全面考虑当时清廷面临之南北两大问题的紧迫性等要素，对突发事件采取了最符合整体利益的处理方式。它既非双方对峙的彻底终结，也远非双边关系的最终确认。康熙帝即位，清廷彻底解决南明、三藩等南方大患后，才真正将战略重心移到了北方与西北，插手车臣汗继位、库伦伯乐齐尔会盟、用兵准噶尔等一系列事件彻底奠定了清王朝的大一统局面，而大一统的形成，也最终表明了清廷国家战略的地位与成功。

（原载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5辑，科学出版社，2012）

顺治十二年清朝与喀尔喀蒙古会盟考

宋　瞳

一　引言

清朝入关之初，在战略上面临两大挑战：南方，南明朝廷、郑成功、张献忠余部等反清势力仍然强大，且有联盟抗敌之势，对清朝构成了主要威胁；北方，虽然漠南蒙古业已归附，但漠北喀尔喀蒙古、西北卫拉特，以及西藏仍在清朝版图之外。对于清廷来说，反击南方攻略为主，安抚北方边疆为辅，成为这一时期的根本国策。而与喀尔喀部的活动往来，便是在此政策框架内折冲樽俎的结果。

入关之前，喀尔喀左翼车臣汗图谋迎请蒙古汗室，被清廷挫败，并迫使其与清朝建立睦邻关系，继而，清朝对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图汗进行军事威胁，与之长期对抗。崇德末至顺治初年，喀尔喀对于清朝坐大心怀顾忌，故而在1640年联合西北卫拉特部，结成喀尔喀—卫拉特联盟，双方关系趋于全面对立。① 顺治三年，发生了对双边关系影响重大的腾机思事件，清廷与喀尔喀就此进入了事

---

① 此过程具体参看乌云毕力格《喀尔喀三汗的登场》，原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后收入作者论文集《十七世纪蒙古史论考》，以及乌云毕力格《清太宗与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图汗素班第的文书往来——兼谈喀尔喀—卫拉特联盟的形成》，原载《西域研究》2008年第2期，后同样收入《十七世纪蒙古史论考》。

实上的敌对状态。而通过清朝张弛有度、软硬兼施的一系列针对性政略，顺治十二年，喀尔喀左翼首先主动遣使通好，双方恢复睦邻关系。

在清朝与喀尔喀的双边关系中，不难看出顺治十二年是重大转折点，而清朝后世史家追述此事时，也无不于此留书一笔，作为“四夷宾服”的重大凭证。代表了清朝官方视角的官修《实录》中，对此事记作：“丙子，以喀尔喀部落俄齐赖土谢图汗、那门额真、车臣汗、岱青台吉等、遣使请好。命多罗安郡王岳乐、同其使臣于宗人府酹酒约誓。”[①] 而晚清史家祁韵士在其《皇朝藩部要略》中，记为：“十二年夏，土谢图汗衮布子察珲多尔济，车臣汗硕磊子巴布，并既其父称汗……冬，土谢图汗等复遣使乞盟。许之，赐盟于宗人府。是年，设喀尔喀八扎萨克，仍分左右翼。”[②]

这些后世记载，或以讹传讹，或加以粉饰，以祁韵士所记为例，当时所谓“设喀尔喀八扎萨克”，无非为因时而动，以“扎萨克”之名，名义上由清廷确认了该部原有势力分布而已。[③] 故此，“记述性史料”中虽然呈现了一幅“外藩来朝、德化远人”的太平图景，但并未揭示双方在长期敌对中突然转变态度的原因及应对策略。自剑拔弩张至并坐盟誓，其间双方是否有相应的斗争与让步？还是像官方记载等“记述性史料”中所言般波澜不惊？以往研究中，因史料阙如，难以探究此事详细的始末缘由。而近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与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整理的《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中，发现了一批当时理藩院对此事件的题本。借由这些珍贵的“遗留性史料”，可以对此事件做更为真实的研究还原。

---

① 《清世祖实录》，顺治十二年十二月丙子，中华书局，1986。

② 祁韵士：《清朝藩部要略稿本》，包文汉整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43页。

③ 〔日〕岡洋樹：《清朝とハルハ八扎薩克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第五十二卷第二号，平成五年（1993）。

二 题本中关于此事始末记载

此次喀尔喀与清朝议盟，始于顺治十二年三月。该月，喀尔喀首先向清朝派遣使团，《实录》中对此亦有记载："顺治十二年，乙未，三月，丙戌朔。喀尔喀部落丹津喇嘛车臣汗等、贡驼马方物，宴赉如例。"① 对此，题本中亦有相关材料，其前因后果，笔者曾另文论述，② 兹不详述。而《实录》中此后未有关于使臣往来记载，实则是年十二月双方盟誓前，理藩院题本中另有关于使臣之事。

题本一③

朱批：inu.

wesimburengg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i tusiyetu han i weijeng noyan i wesimbuhe jalin. （+） han i genggiyen de weijeng noyan bithe wesimbuhe. （+） han i genggiyen elhe bidere, be ubade sain. bithe i beleng sunja morin bi seme （+） dele wesimbuhe，（+） hese, morin be gaisu, adarame šangnara babe gisurefi wesimbu, meni meni jurgan sa sehe. （+）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jurgan i gisurehengge, beleng jafaha morin be gaifi boigon i jurgan be afabuha be dahame, morin i

① 《清世祖实录》，顺治十二年三月丙戌。

② 宋瞳：《清初北方战略考——以顺治十二年前后理藩院应对喀尔喀措施为中心》，未刊稿。

③ 乌云毕力格、吴元丰、宝音德力根主编《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卷 1 第 94 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第 145 页。

jalin šangnara babe boigon i jurgan de afabuki. jihe elcin de meni jurgan i toktobuha songkoi šangnaki se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eci aniya jorgon biyai ice ilan.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mujilen bahabukū amban naige.

weilen ejeku hafan amban minggai.

朱批：是。

题奏

理藩院尚书臣沙济达喇等谨题：为喀尔喀土谢图汗处卫征诺颜书报事。卫征诺颜呈报明主：想必陛下圣躬安康，臣等此处无恙。见书之礼马五匹。奉上后得旨：马匹接受，予何赏赐，着议奏。各部知之。部议：献礼之马匹已接受，并交至户部。故回赏马匹事亦应转户部办理，来使由我部按定例赏赐。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三

尚书臣沙济达喇、启心郎臣鼐格、主事臣名盖

喀尔喀于顺治十二年三月主动遣使清朝，主要原因是车臣汗汗位更迭，引发了内部动荡，腾机思事件时的车臣汗硕磊亡故，“巴布继其父硕磊称汗”。[①] 在车臣汗位的继承中，喀尔喀右翼进行了激烈争斗，以至硕磊死后五年左右，巴布方顺利继位。[②] 由此可见，喀尔喀左翼迫于内部形势不稳，急于以改善外部关系转移矛盾。在这种背景下，喀尔喀使团来京，无疑属于长期敌对中欲通好

① 《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 53，传 37。

② 关于硕磊汗的死与喀尔喀内部关系，参见乌云毕力格《车臣汗汗位承袭的变化——以〈蒙古堂档〉满蒙文史料为中心》，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 1 辑，及作者论文集《十七世纪蒙古史论考》。

前的试探。在当时，双方相互刺探，气氛剑拔弩张。而十二月，双方基本确定了和解意向，因此题本中所见此次来往，相对平和。同日另一份题本中，也涉及了清朝与喀尔喀关系。

题本二①

朱批：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i tusiyetu han i cahar daicing ni wesimbuhe jalin. （+）han i genggiyen de cahar daicing bithe wesimbuhe. beleg emu juwaran morin, jai emu morin bi, uheri i（+）han ejen de, buyehe seke i sijigiyan wesimbuhe. genggiyen de sakini seme（+）dele wesimbuhe，（+）hese，morin be gaisu，adarame šangnara babe gisurefi wesimbu，meni meni jurgan sa sehe.（+）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jurgan i gisurehengge，ijishūn dasan i nadaci aniya，cahar daicing ni elcin jifi，be šolo be tuwafi ubašame jiki sembi seme wesimbure jakade（+）hesei bithe，cahar daicing taiji be ujulafi taijisa de unggihe. suweni ahūta，deota gemu ubade bikai，ebsi jiki sere gūnin bici suwe jio. suweni anggala we jicibe amasi burakū，unenggi jici ainu gosirakū seme bithe unggihe bi. jai kalkai yaburakū fonde，ijishūn dasan i juwanci aniya，ineku ere cahar daicing bi cahar inu waka，kalka inu waka，juwe siden de bikai，bi ubade jiki genggiyen sa seme bithe wesimbume elcin jihe manggi，hebei wang，beile，ambasa acafi gisurehengge，cahar daicing，ijishūn dasan i nadaci aniya jiki seme wesimbure jakade，（+）hesei jio sehe bihe，suwe tere fonde uthai jici acambihe，te bicibe jiki seci hūdun jio，suweni anggala yaya be jihe

①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卷1第95本，第146页。

seme amasi burakū. ubašama jihe niyalma be gosime ujire be suwe inu sambikai seme gisurefi（+）dele wesimbufi ere songkoi jihe elcin de hendufi, an i šangnafi unggihe bihe. uttu juwe jergi ukame jiki seme elcin unggifi šolo, be tuwafi ukame jihekū holtoho turgunde, eri baiha seke i sijikiyan be šangnaci acarakū. erei jafaha morin be dolo gaiha be dahame, gaiha morin i jalin de šangnara be dorgi jurgan de afabuki, jihe elcin de meni jurgan i toktobuha songkoi šangnaki se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eci aniya jorgon biyai ice ilan.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mujilen bahabukū amban naige.

weilen ejeku hafan amban minggai.

朱批：依议而行。

题奏

理藩院尚书臣沙济达喇等谨题：为喀尔喀土谢图汗部察哈尔戴青书报事。察哈尔戴青书报明主。奉礼走马一匹、常马一匹。吾所望之貂袍，敬求共主赏赐。上谕：马匹接受，予何赏赐，着议奏。各部知之，谨遵圣旨部议：顺治七年，察哈尔戴青使臣前来，曰，吾等将趁隙来归。报上，遣书于彼曰：圣旨。遣书于察哈尔戴青为首诸台吉。尔之兄弟诸人，皆在此地。尔等若有意前来，则当为之。非只尔等，若有余人，但凡来者，必不遣回，倘诚如此，何故不予怜爱？以此致书。又，顺治十年，尚与喀尔喀无所来往，此察哈尔戴青称曾有书报：吾身陷喀尔喀、察哈尔之是非中，故欲前往，望祈明鉴。使臣到后，议政王、贝勒、大臣等会议题报：察哈尔戴青于顺治七年书报来归，奉旨命之前来。则彼时尔等应即刻动身。今尔等若欲前来，则应速行。非只尔等，若有余人，但凡来者，不予遣回，来归之人，则予恩养。此等情形，尔等亦知晓。以

此题报，并告来使，照例赏赐。如此遣使书报再，曰欲来归，然未照行。实属欺瞒，故所求貂皮袍，不应赏赐。其所带马匹，已于大内收取。为此，赏赐一事，令交内阁办理。来使由我部依例赏赐。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三

尚书臣沙济达喇、启心郎臣鼐格、主事臣名盖

该题本中涉及清喀双边关系中重要事件之一察哈尔逃人事件。引致双方敌对的腾机思事件，即因车臣汗收留察哈尔逃人而起。此后数年间，清廷以喀尔喀收容察哈尔流亡人等，以及劫掠巴林部人畜两大事由，不断对喀尔喀施压，同时采取接纳喀尔喀逃人等一系列措施进行反制。而清廷对自喀尔喀来投之人，也尽量给予优待，这点在题本中也多有反映。[①] 察哈尔戴青身为察哈尔部上层之一，其来归请求在敌对期间自然也引起清廷重视，由题本二可见，其顺治七年、十年两次致书，都得到了清朝方面的鼓励。但此次再行请赏，却被清廷以反复无常、言而无信为由拒绝，这固然与此人首鼠两端有关，但恐怕更为关键之处在于：清朝行将与喀尔喀议盟，作为修复双边关系的一环，对此等行为不再予以积极鼓励，以此向喀尔喀释放友好信号。

此事9个月后，即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双方开始正式商谈议盟过程。会盟方式由喀尔喀方面率先提出。

---

① 例如顺治十年："授予巴雅思呼朗二等爵位，其妻，其家中四儿四女，以及有牛两头之庄屯，派给一男一女，为苏拉杂役，并赐马二匹、牛二头、狐皮端罩、羊皮里缎袍、新貂帽、股皮靴、缎三匹、佛头青布二十匹、银三百两、股皮马鞍一只，并将其安置于缺少男丁之旗。"（bayashūlang be jai jergi obufi, sargan, tere boo duin haha, duin hehe, juwe ihan i tokso emke, sula takūrara emu haha. emu hehe, juwe morin, juwe ihan, dobihi dahū, honci dokoi sujei siyigiyan, icehe sekei mahala, sarin i gūlha, ilan suje, orin mocin, emu tanggū yan menggun, sarin i soforoi engkemu emke bufi, haha ekiyehun gūsa de buki sembi.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卷1第23本，第25页。

题本三[①]

朱批：kalka muse de dahafi, neneme akdun gisun i gashūfi, musei wang se be gashūbureo seme baihengge, cohome ajige gurun i tosome olhoro gūnin, ceni nenehe waka be feteme, musei wang se gashūrakū oci, tulergi gurun de akdun be tuwabume elhe oburengge waka ayoo. kemuni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kimciha gisurefi wesimbu.

wesimburengge

○doroi akdun giyūn wang don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i tusiyetu han se wesimbuhe jalin. oot suwasdi sidat (+) han i genggiyen de ocirai tusiyetu han, nomon ejen, cecen han, daicing taiji bithe wesimbuhe. (+) han i hese be dahafi toktobuha doro de, ere songko be, be deribume ehe araci, abka, na membe wakalame tuwakini seme cacul, cacume akdun gisun i gashūha. honin aniya nadan biyai orin ninggun de. meni elcin se be tuwabume, (+) han hese wesimbufi, wang se be akdun gusun i gashūbureo. sain inenggi jurambuhe seme (+) dele wesimbuhe, (+) hese,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acafi, acara be tuwame gisurefi wesimbu sehe. (+) hese be gengguleme dahafi meni geren i gisurehengge, muse daci cende ehe akū elcin yabubume bisirede tenggis be farhaha cooha de tusiyetu han, cecen han, darji lama, daicing taiji cooha okdome jifi musei emgi afafi (+) abka cembe wakalaha. amala juwe cūhur jifi musei barin be feksifi gamaha, muse cende sain be efuleme ehe araha, necehe ba akū (+) dergeci oncodome barin i eden niyalma, ulga be yooni waliyaha. toroi jalin cembe akdulame gashū gashūci, gashūha inenggici amasi ceni ukanju jici alime gaijarakū seme (+) hesei lashalaha ba bi. uttu ofi musei wang se gashūci ojorakū se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

①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卷 1 第 96 本，第 147 ~ 148 页。

wesimbuhe, (+)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eci aniya jorgon biyai ice ilan.

doroi akdun giyūn wang amban doni.

doroi elhe giyūn wang amban yolo.

doroi beile amban`šangšan.

gurun be dalire gung ni jergi gūsai ejen amban uksun i basha.

šooboo bime taidzi taiboo kamciha hebei amban boigo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gioroi langkio.

šoofu bime taidzi taifu kamciha hebei amban dorgi gurun i kooli selgiyere yamun i aliha bithei da amban gioroi bahana.

šooboo bime taidzi taiboo kamciha. hebei amban dorgi gurun i suduri yamun i aliha bithei da amban esehei.

taidzi taiboo hebei amban dorgi gurun i kooli selgiyere yamun i aliha bithei da bime beidere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tuhai.

hebei amban, amban gung lobi.

hebei amban, amban jukungge.

hebei amban, amban gacuha.

hebei amban, amban hutu.

hebei amban, amban jisi.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mujilen bahabukū amban naige.

朱批：喀尔喀宾服本朝，先以信实之言盟誓，且求请本朝诸王与其共誓，此特小国防畏之心也。若追究彼等先前之非，不令本朝诸王盟誓，恐难见信外邦，使其心安。故仍着议政王、贝勒、大臣等详议题报。

题奏

多罗信郡王多尼等谨题：为喀尔喀土谢图汗等题报事。愿吉

祥：额齐赖土谢图汗、诺门额真、车臣汗、戴青台吉上书。遵奉钦定之礼，吾等已宣誓如此：若吾等先行作恶，天地谴责。洒酒献祭、信言为誓。羊年七月二十六，于吾等使臣目下，陛下可否下旨，令诸王以信言盟誓。吉日遣发。题上，上谕：议政王、贝勒、大臣等会商，着议适当对策题报。臣等诸人谨遵上谕议曰：本朝与彼等，向未为敌，且有使臣往来。然兵逐腾机思时，土谢图汗、车臣汗、丹津喇嘛、戴青台吉出兵迎战，袭击本朝，此天责之。后两楚琥尔入境，劫掠巴林。故断其往来，与之交恶。本朝所为，并无侵犯，且皇帝有旨：将其所掠巴林人口、牲畜悉数不论。令其以礼起誓，若起誓，则自盟誓之日起，彼处逃人概不收留。故此议决，不可令本朝诸王盟誓。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三

多罗信郡王臣多尼、多罗安郡王臣岳乐、多罗贝勒臣尚善、镇国公固山额真臣宗室巴思哈、少保兼太子太保议政大臣户部尚书臣觉罗郎球、少傅兼太子太傅议政大臣内弘文院大学士臣觉罗巴哈纳、少保兼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内国史院大学士臣额色黑、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内弘文院大学士刑部尚书臣图海、议政大臣臣公罗璧、议政大臣臣珠孔格、议政大臣臣噶楚哈、议政大臣臣胡图、议政大臣臣济世、尚书臣沙济达喇、启心郎臣鼐格

上引题本可以廓清几个问题。首先，喀尔喀此次并非“无条件宾服”，而是完全自主的“有条件议盟”，按照蒙古习俗进行盟誓则是谈判条件之一。因此，议政王大臣会议与理藩院双方会同研究喀尔喀一方提出的要求后，遵循前例，以喀尔喀挑动事端、巴林人畜被掠为由予以拒绝。但顺治皇帝审时度势，认为此乃解决喀尔喀问题的不二良机，故驳回议政会议与理藩院之议，命其再行定夺。言下之意则是接受对方要求，做出一定让步，朱批中“若追究彼等先前之非，不令本朝诸王盟誓，恐外藩不安，难以见信”，

应该是顺治帝真正担心的问题。而所谓“宾服本朝”“小国防畏之心”等语，出于维护清朝对外形象之故，也为议政大臣与理藩院随后的定策指出了方向。

议政大臣与理藩院相关人员都是处理外藩政务的专业人员，对皇帝之意当然心领神会，十天之后，即十二月十三日题本中，理藩院即改议，题请全面接受喀尔喀要求，准备遣使议盟。

题本四①

朱批：wang sa gashūci acara, ambasa gashūci acara babe dasame giwurefi wesimbu. ere ben te gurun i sere hergen fulu ohobi. halame dasa.

wesimburengge

○taidzi taiboo, hebei amban, hafa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uksun i handai sei gingguleme (+) wesimburengge. doroi akdun giyūn wang amban doni sei gingguleme wesimbuhengge kalkai tusiyetu han se wesimbuhe jalin. oot suwasdi sidat (+) han i genggiyen de ocirai tusiyetu han, nomon ejen, cecen han, daicing taiji bithe wesimbuhe. (+) han i hese be dahafi toktobuha doro de, ere songko be, be deribume ehe araci, abka, na membe wakalame tuwakini seme cacul, cacume akdun gisun i gashūha. honin aniya nadan biyai orin ninggun de. meni elcin se be tuwabume, (+) han hese wesimbufi, wang se be akdun gusun i gashūbureo. sain inenggi jurambuhe seme (+) dele wesimbuhe, (+) hese,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acafi, acara be tuwame gisurefi wesimbu sehe. (+) hese be gengguleme dahafi meni geren i gisurehengge, muse daci cende ehe akū elcin yabubume bisirede tenggis be farhaha cooha de tusiyetu han, cecen han, darji lama, daicing taiji cooha okdome jifi musei emgi afafi (+) abka cembe

---

①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卷 1 第 97 本，第 149～151 页。

wakalaha. amala juwe cūhur jifi musei barin be feksifi gamaha, muse cende sain be efuleme ehe araha, necehe ba akū (+) dergeci oncodome barin i eden niyalma, ulga be yooni waliyaha. toroi jalin cembe akdulame gashū gashūci, gashūha inenggici amasi ceni ukanju jici alime gaijarakū seme (+) hesei lashalaha ba bi. uttu ofi musei wang se gashūci ojorakū se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 hese be baimbi. seme (+) dele wesimbuhe (+) hese, kalka muse de dahafi neneme akdun gisun i gashūfi, musei wang se be gashūbureo seme baihangge, cohome ajige gurun i tosome olhoro gūnin. ceni nenehe waka be feteme musei wang se gashūrakū oci, tulergi gurun de akdun be tuwabume elhe oburengge waka ayoo. kemuni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kimcime gisurefi wesimbu, sehe. (+)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meni geren i gisurehengge, kalka ce ajige gurun, doro sarkū ofi, (+) hesei lashalaha be akdarakū, musei wang se be gashūbureo seme baime wesimbuhebi, monggo kooli de gashūrakū oho de akdun akū gūnimbi, tutu bime geli muse elbire be dahame wang se be gashūbuci inu acambi se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eci aniya jorgon biyai juwan ilan.

taidzi taiboo hebei amban hafa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uksun i handai.

šoboo bime taidzi taiboo kamciha hebei amban, boigon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gioroi langkio.

šoofu bime taidzi taifu kamciha hebei amban dorgi gurun i kooli selgiyere yamun i aliha bithei da amban gioroi bahana.

hebei amban gūsai ejen amban ildei.

taidzi taiboo hebei amban dorgi gurun i kooli selgiyere yamun i aliha bithei da bime beidere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tuhai.

hebei amban dorolo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enggedei.

hebei amban amban gung lobi.

hebei amban tui janggin amban be cerbu.

hebei amban amban ibai.

hebei amban amban sohon.

hebei amban amban jukungge.

hebei amban amban gancuha.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mujilen bahabukū amban naige.

朱批：应诸王盟誓或诸大臣盟誓，着改议题报。此本中“gurun-i”一词多余，着改之。

题奏

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吏部尚书臣宗室韩岱等谨题：前多罗信郡王多尼等谨题：为喀尔喀土谢图汗等题报事。愿吉祥：额齐赖土谢图汗、诺门额真、车臣汗、戴青台吉上书。遵奉钦定之礼，吾等已宣誓如此：若吾等先行作恶，天地谴责。洒酒献祭、信言为誓。羊年七月二十六，于吾等使臣目下，陛下可否下旨，令诸王以信言盟誓。吉日遣发。题上，上谕：议政王、贝勒、大臣等会商，着议适当对策题报。臣等诸人谨遵上谕议曰：本朝与彼等，向未为敌，且有使臣往来。然兵逐腾机思时，土谢图汗、车臣汗、丹津喇嘛、戴青台吉出兵迎战，袭击本朝，此天责之。后两楚琥尔入境，劫掠巴林。故断其往来，与之交恶。本朝所为，并无侵犯，且皇帝有旨：将其所掠巴林人口、牲畜悉数不论。令其以礼起誓，若起誓，则自盟誓之日起，彼处逃人概不收留。故此议决，不可令本朝诸王盟誓。为此敬题请旨。题报后上谕：喀尔喀宾服本朝，先以信实之言盟誓，且求请本朝诸王与其共誓，此特小国防畏之心也。若穷究彼等先前之非，不令本朝诸王盟誓，恐难见信外邦，使其安然。故仍

着议政王、贝勒、大臣等详议题报。臣等诸人谨遵上谕议曰：喀尔喀小邦，不知礼义，不听圣裁，报求本朝诸王可否共誓。依蒙古例，若不起誓，则为无信。然则本朝欲行招抚，遣诸王共誓亦为可行。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三。

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吏部尚书臣宗室韩岱、少保兼太子太保议政大臣户部尚书臣觉罗郎球、少傅兼太子太傅议政大臣内弘文院大学士臣觉罗巴哈纳、议政大臣固山额真臣伊尔登、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内弘文院大学士刑部尚书臣图海、议政大臣礼部尚书臣恩格德、议政大臣臣公罗璧、议政大臣护军统领臣伯车尔布、议政大臣臣伊拜、议政大臣臣索浑、议政大臣臣珠孔格、议政大臣臣噶楚哈、尚书臣沙济达喇、启心郎臣鼐格

清朝文书制度中，但凡议复题本，均需将前文及朱批原文照抄，此题本中，多数内容原文照录题本三，而最后议复方案："喀尔喀小邦，不知礼义，不听圣裁，报求本朝诸王可否共誓。依蒙古例，若不起誓，则为无信。然则本朝欲行招抚，遣诸王共誓亦为可行"云云，则是完全秉承上意之作。既以言语点明本朝"天朝上国"之威，又表明虽然接受对方要求而行，但此举纯系"招抚开恩"的从权之为。可谓春秋笔法、滴水不漏。顺治帝对此当然无异议，随后又对会盟参与者的等级提出疑问。而理藩院则在六天之后，即十二月十九日对此做出议复。

题本五[①]

朱批：inu，gashūci acara wang sei gebu be arafi wesimbu.

wesimburengge

①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卷1第99本，第155~156页。

○doroi elhe giyūn wang amban yolo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doroi akdun giyūn wang don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taidzi taiboo, hebei amban, hafa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uksun i handa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kalkai tusiyetu han sei wesimbuhe jalin. oot suwasdi sidat (+) han i genggiyen de ocirai tusiyetu han, nomon ejen, cecen han, daicing taiji bithe wesimbuhe. (+) han i hese be dahafi toktobuha doro de, ere songko be, be deribume ehe araci, abka, na membe wakalame tuwakini seme cacul, cacume akdun gisun i gashūha. honin aniya nadan biyai orin ninggun de. meni elcin se be tuwabume, (+) han hese wesimbufi, wang se be akdun gusun i gashūbureo. sain inenggi jurambuhe seme (+) dele wesimbuhe, (+) hese,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acafi, acara be tuwame gisurefi wesimbu sehe. (+) hese be gengguleme dahafi meni geren i gisurehengge, muse daci cende ehe akū elcin yabubume bisirede tenggis be farhaha cooha de tusiyetu han, cecen han, darji lama, daicing taiji cooha okdome jifi musei emgi afafi (+) abka cembe wakalaha. amala juwe cūhur jifi musei barin be feksifi gamaha, muse cende sain be efuleme ehe araha, necehe ba akū (+) dergeci oncodome barin i eden niyalma, ulga be yooni waliyaha. toroi jalin cembe akdulame gashū gashūci, gashūha inenggici amasi ceni ukanju jici alime gaijarakū seme (+) hesei lashalaha ba bi. uttu ofi musei wang se gashūci ojorakū se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 hese be baimbi. seme (+) dele wesimbuhe (+) hese, kalka muse de dahafi neneme akdun gisun i gashūfi, musei wang se be gashūbureo seme baihangge, cohome ajige gurun i tosome olhoro gūnin. ceni nenehe waka be feteme musei wang se gashūrakū oci, tulergi gurun de akdun be tuwabume elhe oburengge waka ayoo. kemuni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kimcime gisurefi wesimbu, sehe.

(+)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meni geren i gisurehengge, kalka ce ajige gurun, doro sarkū ofi, (+) hesei lashalaha be akdarakū, musei wang se be gashūbureo seme baime wesimbuhebi, monggo kooli de gashūrakū oho de akdun akū gūnimbi, tutu bime geli muse elbire be dahame wang se be gashūbuci inu acambi se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 hese be baimbi seme (+) dele wesimbuhe. (+) hese, wang se gashūci acara, ambasa gashūci acara babe dasame gisurefi wesimbu, ere be de gurun sere hergen fulu ohobi halame dasame sehe. (+)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meni geren i gisurehengge, musei yargiyan i akdun be tuwabure be dahame, wang se gashūci acambi, se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eci aniya jorgon biyai juwan uyun.

doroi elhe giyūn wang amban yolo.

doroi beile amban šangšan.

šoboo bime taidzi taiboo kamciha hebei amban, boigon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gioroi langkio.

šoofu bime taidzi taifu kamciha hebei amban dorgi gurun i kooli selgiyere yamun i aliha bithei da amban gioroi bahana.

šooboo bime taidzi taiboo kamciha. hebei amban dorgi gurun i suduri yamun i aliha bithei da amban esehei.

taidzi taiboo hebei amban dorgi gurun i kooli selgiyere yamun i aliha bithei da bime beidere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tuhai.

hebei amban dorolo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enggedei.

hebei amban amban sohon.

hebei amban amban jukungge.

hebei amban amban hutu.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朱批：是，若有适合盟誓之王，题报其名。

题奏

多罗安郡王臣岳乐等谨题：多罗信郡王臣多尼等曾谨题：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吏部尚书臣宗室韩岱等谨题，为喀尔喀土谢图汗等题报事。愿吉祥：额齐赖土谢图汗、诺门额真、车臣汗、戴青台吉上书。遵奉钦定之礼，吾等已宣誓如此：若吾等先行作恶，天地谴责。洒酒献祭、信言为誓。羊年七月二十六，于吾等使臣目下，陛下可否下旨，令诸王以信言盟誓。吉日遣发。题上，上谕：议政王、贝勒、大臣等会商，着议适当对策题报。臣等诸人谨遵上谕议曰：本朝与彼等，向未为敌，且有使臣往来。然兵逐腾机思时，土谢图汗、车臣汗、丹津喇嘛、戴青台吉出兵迎战，袭击本朝，此天责之。后两楚琥尔入境，劫掠巴林。故断其往来，与之交恶。本朝所为，并无侵犯，且皇帝有旨：将其所掠巴林人口、牲畜悉数不论。令其以礼起誓，若起誓，则自盟誓之日起，彼处逃人概不收留。故此议决，不可令本朝诸王盟誓。为此敬题请旨。题报后上谕：喀尔喀宾服本朝，先以信实之言盟誓，且求请本朝诸王与其共誓，此特小国防畏之心也。若穷究彼等先前之非，不令本朝诸王盟誓，恐难见信外邦，使其心安。故仍着议政王、贝勒、大臣等详议题报。臣等诸人谨遵上谕议曰：喀尔喀小邦，不知礼义，不听圣裁，报求本朝诸王盟誓。依蒙古例，若不起誓，则为无信。然则本朝欲行招抚，遣诸王共誓亦为可行。为此敬题请旨。题报，上谕曰：应诸王盟誓或诸大臣盟誓，着改议题报。此本中“gurun-i”一词多余，着改之。臣等谨遵上谕议曰：本朝示之诚信，故当令诸王与其盟誓。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九

多罗安郡王臣岳乐、多罗贝勒臣尚善、少保兼太子太保议政大臣户部尚书臣觉罗郎球、少傅兼太子太傅议政大臣内弘文院大学士臣觉罗巴哈纳、少保兼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内国史院大学士臣额色

黑、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内弘文院大学士刑部尚书臣图海、议政大臣礼部尚书臣恩格德、议政大臣臣索浑、议政大臣臣珠孔格、议政大臣臣胡图、尚书臣沙济达喇

本题本依然是几乎照录前文，但确定诸王参与一事，等于完全接受了喀尔喀所要求。喀尔喀要求派遣王一级人员参与盟誓，无疑是以与清朝平等之地位自居。从清廷反应看，其对此心知肚明，但倘若只以大臣参与，势必难以达成目的，故而自议政大臣会议、理藩院至皇帝本人，对此都无更多纠缠。因此，最后唯一问题是选派何人参与盟誓。对此，十二月二十五日，由议政王大臣会同理藩院商议的最终结果出炉，经由理藩院题报。

题本六[①]

朱批：doroi elhe giyūn wang gashūkini.

wesimburengg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doroi elhe giyūn wang amban yolo sei gingguleme wesimbuhengge. taidzi taiboo, hebei amban, hafa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uksun i handai sei gingguleme wesimbuhengge kalkai tusiyetu han se wesimbuhe jalin. oot suwasdi sidat（+）han i genggiyen de ocirai tusiyetu han, nomon ejen, cecen han, daicing taiji bithe wesimbuhe.（+）han i hese be dahafi toktobuha doro de, ere songko be, be deribume ehe araci, abka, na membe wakalame tuwakini seme cacul, cacume akdun gisun i gashūha. honin aniya nadan biyai orin ninggun de. meni elcin se be tuwabume,（+）han hese wesimbufi, wang se be akdun gusun i gashūbureo. sain inenggi

①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卷1第103本，第164~166页。

jurambuhe seme (+) dele wesimbuhe, (+) hese,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acafi, acara be tuwame gisurefi wesimbu sehe. (+) hese be gengguleme dahafi meni geren i gisurehengge, muse daci cende ehe akū elcin yabubume bisirede tenggis be farhaha cooha de tusiyetu han, cecen han, darji lama, daicing taiji cooha okdome jifi musei emgi afafi (+) abka cembe wakalaha. amala juwe cūhur jifi musei barin be feksifi gamaha, muse cende sain be efuleme ehe araha, necehe ba akū (+) dergeci oncodome barin i eden niyalma, ulga be yooni waliyaha. toroi jalin cembe akdulame gashū gashūci, gashūha inenggici amasi ceni ukanju jici alime gaijarakū seme (+) hesei lashalaha ba bi. uttu ofi musei wang se gashūci ojorakū se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 hese be baimbi. seme (+) dele wesimbuhe (+) hese, kalka muse de dahafi neneme akdun gisun i gashūfi, musei wang se be gashūbureo seme baihangge, cohome ajige gurun i tosome olhoro gūnin. ceni nenehe waka be feteme musei wang se gashūrakū oci, tulergi gurun de akdun be tuwabume elhe oburengge waka ayoo. kemuni hebei wang, beile, ambasa kimcime gisurefi wesimbu, sehe. (+)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meni geren i gisurehengge, kalka ce ajige gurun, doro sarkū ofi, (+) hesei lashalaha be akdarakū, musei wang se be gashūbureo seme baime wesimbuhebi, monggo kooli de gashūrakū oho de akdun akū gūnimbi, tutu bime geli muse elbire be dahame wang se be gashūbuci inu acambi se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 hese be baimbi seme (+) dele wesimbuhe. (+) hese, wang se gashūci acara, ambasa gashūci acara babe dasame gisurefi wesimbu, ere be de gurun sere hergen fulu ohobi halame dasame sehe. (+)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meni geren i gisurehengge, musei yargiyan i akdun be tuwabure be dahame, wang se gashūci acambi, seme, gisurehe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 hese be baimbi. seme (+) dele wesimbuhe, (+) hese inu, gashūci acara wang se gebu be arafi wesimbu sehe, (+)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 meni geren i gisurehengge, ere gashūre de, hebe de dosika be dahame, doroi akdun giyūn wang, doroi elhe giyū wang, ere juwe wang ci emke be gashūbuci aca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eci aniya jorgon biyai orin sunja.

doroi akdun giyūn wang amban doni.

doroi elhe giyūn wang amban yolo.

gurun be dalire gung ni jergi gūsai ejen amban uksun i basha.

taidzi taiboo hebei amban hafa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uksun i handai.

šoboo bime taidzi taiboo kamciha hebei amban, boigon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gioroi langkio.

šoofu bime taidzi taifu kamciha hebei amban dorgi gurun i kooli selgiyere yamun i aliha bithei da amban gioroi bahana.

taidzi taiboo kamciha hebei amban dorgi gurun i suduri yamun i aliha bithei da amban esehei.

hebei amban dorolon i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enggedei.

hebei amban amban ibai.

hebei amban amban jukungge.

hebei amban amban jisi.

hebei amban amban hutu.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朱批：着多罗安郡王盟誓。

题奏

理藩院尚书臣沙济达喇等谨题：多罗安郡王臣岳乐等谨题：太

子太保议政大臣吏部尚书臣宗室韩岱等谨题：为喀尔喀土谢图汗等题报事：愿吉祥：额齐赖土谢图汗、诺门额真、车臣汗、戴青台吉上书。遵奉钦定之礼，吾等已宣誓如此：若吾等先行作恶，天地谴责。洒酒献祭、信言为誓。羊年七月二十六，于吾等使臣目下，陛下可否下旨，令诸王以信言盟誓。吉日遣发。题上，上谕：议政王、贝勒、大臣等会商，着议适当对策题报。臣等诸人谨遵上谕议曰：本朝与彼等，向未为敌，且有使臣往来。然兵逐腾机思时，土谢图汗、车臣汗、丹津喇嘛、戴青台吉出兵迎战，袭击本朝，此天责之。后两楚琥尔入境，劫掠巴林。故断其往来，与之交恶。本朝所为，并无侵犯，且皇帝有旨：将其所掠巴林人口、牲畜悉数不论。令其以礼起誓，若起誓，则自盟誓之日起，彼处逃人概不收留。故此议决，不可令本朝诸王盟誓。为此敬题请旨。题报后上谕：喀尔喀宾服本朝，先以信实之言盟誓，且求请本朝诸王与其共誓，此特小国防畏之心也。若穷究彼等先前之非，不令本朝诸王盟誓，恐难见信外邦，使其心安。故仍着议政王、贝勒、大臣等详议题报。臣等诸人谨遵上谕议曰：喀尔喀小邦，不知礼义，不听圣裁，报求本朝诸王盟誓。依蒙古例，若不起誓，则为无信。然则本朝欲行招抚，遣诸王共誓亦为可行。为此敬题请旨。报上，上谕：应诸王盟誓或诸大臣盟誓，着改议题报。此本中“gurun-i”一词多余，着改之。臣等谨遵上谕议曰：如本朝示信，则当令诸王盟誓，为此敬题请旨。报上，上谕：是，若有适合盟誓之王，题报其名。臣等谨遵上谕议曰：此次盟誓，因与议政之故，故多罗信郡王、多罗安郡王，应自此二王中择一令往盟誓。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

多罗信郡王臣多尼、多罗安郡王臣岳乐、镇国公固山额真臣巴思翰、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吏部尚书臣宗室韩岱、少保兼太子太保议政大臣户部尚书臣觉罗郎球、少傅兼太子太傅议政大臣内弘文院大学士臣觉罗巴哈纳、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内国史院大学士臣额色黑、

议政大臣礼部尚书臣恩格德、议政大臣臣伊拜、议政大臣臣珠孔格、议政大臣济世、议政大臣胡图、尚书沙济达喇

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与理藩院的磋商，提出了信郡王多尼、安郡王岳乐两大人选，而顺治皇帝朱批，钦点岳乐为参与盟誓之人。关于盟誓人，理藩院题报时明确说明，此二人乃与议政之王，即议政王大臣会议中成员，可见对此次议盟，清廷给予了极大重视。推选最高决策层成员，而非闲散王族，也充分说明了清廷于彼时承认喀尔喀与其有对等地位。该二王在顺治年间均为举足轻重之人，顺治皇帝二择其一，也颇见心思。

多尼为太祖之孙，多铎次子，顺治六年袭其父和硕豫亲王爵，八年改信亲王，顺治九年追降多铎为郡王，多尼亦降为多罗信郡王。顺治七年即与议政，即令降爵，仍于一月中复议政之位。且其王爵仍为世袭罔替之爵，即俗称之“铁帽子王”。[①] 而岳乐同为太祖之孙，乃饶余郡王阿巴泰第四子。顺治八年袭父郡王爵，改号为安。观其至盟誓时履历，顺治三年随豪格征讨张献忠，五年驻防大同，九年掌工部、参与议政，十年又受封宣威大将军，驻归化城，专司处理喀尔喀事务，十二年八月掌宗人府。[②]

两相比对，多尼之爵位、家世相对尊荣，参与议政也相对较早，而安郡王岳乐有更丰富的政务、军务、外事经验。多尼见诸史籍之参与政事记载，为顺治十五年出兵云南，攻南明桂王朱由榔。虽无法据此断言此前他未亲自掌管过重大政务，但相比岳乐，仍稍显不足。岳乐不但有掌管工部、宗人府的政务处理履历，更关键的是曾驻防大同、归化城，专司防御喀尔喀之事。这种经历无疑使岳乐对西北局势、满蒙关系有更为直接、清晰的了

① 《清史列传·宗室王公传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第 43 页。按：《清史稿》卷 218 称其为多铎长子。与本文无涉，故不论。

② 《清史列传·宗室王公传二》，第 87～88 页，《清史稿》卷 217。

解。同时，作为针对喀尔喀事务的驻外军事将领，他也更了解喀尔喀内部形势。

此外，顺治一朝，岳乐在顺治皇帝心目中的地位非同寻常。甚至有学者认为，顺治皇帝去世前，曾考虑传位于一位从兄弟，而其属意人选，很可能就是岳乐。[①] 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属实，但岳乐在顺治一朝，由辅国公至亲王，除才能突出、功勋卓著外，与皇帝关系良好应是不争的事实。

综上所述可见，在挑选盟誓人选时，自理藩院到皇帝，是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与精心选择的。首先，应喀尔喀方面要求，需要派出王一级重臣，以示诚意。而多尼与岳乐二人，均符合这一要求。其次，所派之王，应有充分的政务经验与处理蒙古事务经验，还需为皇帝心腹。多尼与岳乐，均为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参与议政多年，且岳乐更是直接与喀尔喀兵锋相对。论关系，岳乐为顺治皇帝的绝对心腹，可见此次与喀尔喀盟誓虽非军事行动，但是倾注了清廷的良苦用心。

三 结论

最终，如本文开篇所引，喀尔喀与清朝盟誓顺利举行，只是由题本中所见的一番折冲樽俎，与《实录》中的宾服远人大异其趣。甚至可以说，清朝因时因势，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才促成此事。从题本中可见，清朝对喀尔喀的既定国策，一来要保持“天下共主”之身份，不与所谓“外邦小国”对等往来，二来始终通过“巴林事件”对其施压，取得道义优势。实则理藩院在事件最初，也是依据此基本策略，对喀尔喀所提要求予以拒绝。但在顺治皇帝亲自

① 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学苑出版社，2003，第6页。

介入下，不但应允了喀尔喀派遣诸王共同盟誓这种实质上的对等邦交行为，同时放弃了索取巴林被掳人畜的权利，且与喀尔喀达成共识，双方均不再收留对方逃人。

究其实，清廷之所以做出上述让步，绝非仅仅因喀尔喀问题而发，而是与其面临的整体形势息息相关。顺治十二年，清廷在中原可谓立足未稳，不但南明朝廷尚未平定，西北、西南、东南沿海的反清势力也甚为活跃。就在此次盟誓前，顺治十一年十一月，东南沿海郑成功“率官兵，战船百余艘，南下勤王……并持书会西宁王李定国”。[①] 至顺治十二年十一月，郑军不但连下漳州、安平等重镇，且于十二年七月“遣中提督甘辉、右提督王秀奇统兵北上；遣前提督黄廷、后提督万礼统兵南下”。[②] 此外还收留鲁王朱以海，联络西北李定国与南明朝廷，东西两路反清武装大有合围夹攻之势。

清廷面临南方战局吃紧，首先需要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而对北方喀尔喀蒙古，奉行羁縻怀柔、防御为主，以避免双线作战为要务。而在此关头，喀尔喀车臣汗部内乱频仍、新汗即位，需要转移视线，寻求近邻承认，故此遣使通好，此举正合清廷之意。因此顺治皇帝一改先前国策，亲自制定并参与了与喀尔喀盟誓的政策制定过程，不但暂时解决了北方后顾之忧，还开启了清廷干涉喀尔喀蒙古事务之先河，为日后归并喀尔喀埋下了伏笔。通过形式上的让步，获取了巨大实效，可谓枉尺直寻、临机应变，也让人充分认识了顺治时期清廷政务处理的灵活与成熟。

总而言之，后世记述性史料中，为了凸显清朝的地位与武功，开国初年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外交较量，被大量隐没于轻描淡写的叙述中。故此，在后世看来，虽然史实具备，事件完整，但其过

---

① （清）夏琳：《闽海纪要》卷1，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第30页。
② （清）夏琳：《闽海纪要》卷1，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第35页。

程、冲突直至双方的实际关系等，却完全经过了符合清朝官方口径的“处理”。而理藩院题本这种“遗留性史料”的面世，使我们能更加真实、更加充分地了解当时实际情况，也为我们更好地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必要的资料。

（原载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Mongolian Cultures: Qua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 Ⅶ，Tokyo，2011）

外藩蒙古内扎萨克四十九旗考

宋 曈

清朝漠南蒙古内扎萨克旗数量与编旗时间，是清代蒙古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长时间受到学术界关注。但因资料有限、记载互异，始终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而在新出《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中，也有相关材料涉及此问题。且清代题本属于“遗留性史料”，相比于后世纂修的《实录》《会典》《方略》以及各类传记，其记述更具实效性与真实性，同时理藩院在清代初期直接处理蒙古相关诸问题，因此理藩院文件在蒙古相关事务上具有无可置疑的准确性、权威性，从而使得该题本史料价值极高。本文即在理藩院题本史料基础上，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漠南蒙古扎萨克旗数量与演变做一探讨，庶裨补缺漏、有所助益。

关于扎萨克旗建立时间与流变，以及自建立之初，至外藩旗制最后确立的过程，中外都有学者加以探讨。其中自扎萨克旗甫建至崇德年间《实录》中出现“外藩二十七旗”，① 其间流变，学者撰

---

① 《清太宗实录》，崇德七年正月辛未。

文分析较为清晰。[1] 且题本中未涉及相关时期，故不予赘述。而自二十七旗至清代所称外藩蒙古四十九旗，虽有探讨，但终未定谳，且自题本中所见，与目前研究成果颇有出入，因此以此为重点。

一 顺治朝：外藩内扎萨克蒙古四十七旗确立

外藩蒙古四十七旗确立时间，学者多主张康熙元年说，[2] 其根据则为《清圣祖实录》康熙元年二月："理藩院题、请差大臣往科尔沁、乌朱穆秦等四十七旗会盟。得旨、著内大臣尚书博罗色冷、侍郎绰克托前往。"[3] 不过根据题本所提供资料，外藩蒙古四十七旗早在顺治十二年就已存在。

题本一[4]

朱批：aniya doroi jidere de, geli emu idui wang, beisi jikini.

wesimburengg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ijishūn dasan i juwan ilaci aniya, aniya doroi jidere tulergi goloi wang beilesei jalin. 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eci aniya, aniya doroi jidere idu cahar i gurun i efu abunai cin wang,

① 例如：达力扎布《清初内扎萨克旗的建立问题》，《历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达力扎布《清初"外藩蒙古十三旗"杂考》，《民族史研究》第 3 辑，民族出版社，2002。以上两文后皆收入达力扎布论文集《明清蒙古史论稿》，民族出版社，2003。〔日〕田山茂著《清代蒙古社会制度》，潘世宪译，商务印书馆，1987，第 64～78 页。

② 〔日〕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第 76 页；达力扎布：《明清蒙古史论稿》，第 272 页。

③ 《清圣祖实录》，康熙元年二月辛亥。

④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卷 1 第 84 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korcin i joriktu cinwang, jasaktu jiyūn wang, erdeni jiyūn wang, bingtu jiyūn wang, barin i gurun i efu sebten jiyūn wang, aohan i mergen baturu jiyūn wang, naiman i darhan jiyūn wang, sunit i dureng jiyūn wang, duin jusei darhan joriktu jiyūn wang, hoocit i garma jiyūn wang, kalkai joriktu jiyūn wang, abagai šakšsengge jiyūn wang, ujumucin i sereng erdeni beile, sunit i samaja efu beile, jarut i kitat beile, jalait i darhan, hošooci beise, ongniyot i seose beise, barin i oncon beise, abagai cobonui darhan beise, ordus i erincen beise, šakca beise, kalkai bumbsihi beise, gorlos i jalbu gung, angga gung, jarut i mookitat gung, urat i duba gung, karacereng i cagandai gung, tumet i gumu gung, karacin i sereng gung, ese bihe. dolo olhoto baita ambula ojoro jakade, (+) dele hesei esei dorgi eshun wang, beile sei jidere be nakabu. urehe wang, beilesei teile jikini sere jakade, urehe be dahame damu korcin i jasaktu jiyūn wang, ordus i erincen beise, tumet i gumu gung, karacin i sereng gung ni teile jihe. gūwa gemu eshun ofi nakaha bihe. te ijishūn dasan i juwan ilanci aniya, aniya doroi jidere de eshun seme nakabuha wang, beilese jikinio. geli emu idui wang, beilese jikinio. amban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gingguleme wesimbuhe, (+)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eci aniya juwan biyai juwan.

aliha amban, amban šajidara.

mujilen bahabukū amban naige.

weilen ejeku hafan, amban mala.

朱批：年班者，着另一班王、贝子前来。

题奏

理藩院尚书臣沙济达喇等谨题：为顺治十三年年班来朝之外藩王、贝子等事。顺治十二年年班来朝之一班：为察哈尔固伦额驸阿

布奈亲王、科尔沁卓哩克图亲王①、扎萨克图郡王②、额尔德尼郡王③、冰图郡王④、巴林固伦额驸色布腾郡王⑤、敖汉墨尔根巴图鲁郡王⑥、奈曼达尔汉郡王⑦、苏尼特杜棱郡王⑧、和硕额驸珠尔扎噶郡王、鄂尔多斯额璘臣郡王⑨、四子达尔汉卓哩克图郡王⑩、浩奇特噶尔玛郡王⑪、喀尔喀卓哩克图郡王⑫、阿巴噶沙克沙僧格郡王⑬、乌珠穆沁色棱额尔德尼贝勒⑭、苏尼特额驸萨穆扎贝勒⑮、扎

---

① 初封科尔沁卓哩克图亲王乌克善，崇德元年受封。(《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1)

② 一次袭拜司噶勒，初封科尔沁扎萨克图郡王布达齐长子，顺治二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1)

③ 科尔沁多罗郡王额尔德尼，初封科尔沁达尔汉亲王满珠习礼从子奇塔特之长子，顺治十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1)

④ 一次袭额森，初封科尔沁扎萨克多罗冰图郡王洪果尔之长子，顺治三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1)

⑤ 初封巴林扎萨克多罗郡王色布腾，顺治五年封扎萨克辅国公，七年晋多罗郡王，诏世袭罔替。(《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3)

⑥ 一次袭敖汉扎萨克多罗郡王墨尔根巴图鲁温布，初封班第之长子，顺治四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3)

⑦ 一次袭阿罕，初封奈曼扎萨克多罗达尔汉郡王衮楚克之次子，顺治十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3)

⑧ 一次袭沙希岱，初封苏尼特杜棱郡王叟塞之次子，顺治四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4)

⑨ 初封鄂尔多斯扎萨克多罗郡王，顺治六年受封，诏世袭罔替。(《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6)

⑩ 一次袭巴拜，初封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卓哩克图郡王鄂木布之长子，顺治十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5)

⑪ 初封浩齐特扎萨克多罗郡王噶尔玛色旺，初封浩齐特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郡王博罗特从弟。顺治十年受封，诏世袭罔替。(《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4)

⑫ 初封喀尔喀右翼多罗卓哩克图郡王衮布，初封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和硕达尔汉亲王本塔尔之从子，顺治十年受封。(《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5)

⑬ 一次袭阿巴噶扎萨克多罗郡王，初封阿巴噶扎萨克多罗郡王都思噶尔之长子，顺治十一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4)

⑭ 初封乌珠穆沁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贝勒。初封阿巴噶扎萨克和硕车臣亲王多尔济从子，顺治三年受封，诏世袭罔替。(《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4)

⑮ 初封苏尼特多罗贝勒。顺治六年受封，诏世袭罔替。(《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4)

噜特奇塔特贝勒[①]、扎赉特达尔汉和硕齐贝子[②]、翁牛特叟赛贝子[③]、巴林温春贝子[④]、阿巴噶绰博和达尔汉贝子[⑤]、鄂尔多斯额琳沁贝子[⑥]、沙克扎贝子[⑦]、喀尔喀本巴什希贝子[⑧]、郭尔罗斯扎尔布公[⑨]、昂哈公[⑩]、扎噜特茂奇塔特公[⑪]、乌喇特图巴公[⑫]、喀拉齐哩克察罕泰公[⑬]、土默特固穆公[⑭]、喀喇沁色棱公[⑮]。以上诸人。上

① 二次袭扎噜特扎萨克多罗贝勒。初追封扎噜特多罗贝勒内齐之长孙，其父一次袭尚嘉布顺治五年领扎萨克，顺治十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3)

② 一次袭扎赉特固山贝子色棱。初封蒙衮之长子，其父于天命九年受达尔汉和硕齐号，顺治五年袭爵、号并领扎萨克。(《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1)

③ 二次袭翁牛特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岱青。初封翁牛特多罗达尔汉岱青栋岱青之次子，顺治十一年袭爵，寻封固山贝子。(《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3)

④ 一次袭巴林固山贝子。初封色棱之长子，顺治五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3)

⑤ 一次袭阿巴噶固山达尔汉贝子。初封多尔济之长子，顺治十一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4)

⑥ 初封鄂尔多斯扎萨克固山贝子。初封鄂尔多斯扎萨克多罗郡王额璘臣之从子，顺治六年受封，诏世袭罔替。(《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6)

⑦ 初封鄂尔多斯扎萨克固山贝子。初封鄂尔多斯扎萨克多罗郡王额璘臣之从弟，顺治七年受封，诏世袭罔替。(《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6)

⑧ 初封喀尔喀右翼固山贝子。初封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和硕达尔汉亲王本塔尔之弟，顺治十年受封，诏世袭罔替。(《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5)

⑨ 一次袭郭尔罗斯扎萨克镇国公，初封布木巴之长子，顺治十一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1)

⑩ 二次袭郭尔罗斯扎萨克辅国公，初封固穆之长子，顺治七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1)

⑪ 一次袭扎噜特镇国公。初封扎噜特镇国公玛尼长子，顺治五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3)

⑫ 初封乌喇特扎萨克镇国公。顺治五年受封，诏世袭罔替。(《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5)

⑬ 一次袭翁牛特镇国公，初封翁牛特镇国公，原喀喇齐哩克台吉噶尔玛长子，顺治五年袭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3)

⑭ 初封土默特扎萨克固山贝子。顺治五年封扎萨克镇国公，后于康熙二年晋固山贝子，诏世袭罔替。(《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2)

⑮ 初封喀喇沁扎萨克镇国公。初封喀喇沁扎萨克多罗杜棱贝勒固噜思奇布族祖，初为喀喇沁塔布囊。天聪九年授扎萨克，顺治五年封镇国公，诏世袭罔替。(《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2)

谕：此中人等，王、贝勒等未出痘者[1]勿来、已出痘者尽量令入。故遵谕，命已出痘之科尔沁扎萨克图郡王、鄂尔多斯之额琳沁贝子、土默特之固穆公、喀喇沁之色棱公尽可能前来，其余因未出痘，止其前来。今顺治十三年年班将至，此未出痘令止之王、贝勒等，是否命其前来？或令另一班王、贝勒等前来？臣等不敢擅专，为此敬题请旨。

顺治十二年十月初十

尚书臣沙济达喇、启心郎臣鼐格、主事臣马拉

达力扎布文提出，“外藩二十七旗之说一直沿用到顺治十三年”。[2] 所引证文献则为实录：“宴朝贺元旦外藩贝勒扎萨衮杜棱等、及二十七旗官于礼部。”[3] 对此，上引题本恰好可提供顺治十三年年班情况。据后世《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记载，至顺治十年，外藩基本已有四十六旗（实则应有四十七，茂明安一旗较为特殊，下文详述）。而该题本足以证明，实录所载并不能证明外藩蒙古彼时仅有二十七旗，而是因清朝蒙古岁时朝集制度所导致的理解失误。

外藩蒙古岁时“年班”之名，确立于乾隆朝，但其雏形自顺治朝便已肇端，田山茂更是精确地将顺治三年认为年班制度之始。[4] 此处不拟探讨年班制度之发端，唯借此指出：蒙古王公岁时年班，并非悉数前往，而是分为两班，分别前来。上引题本主要内容为顺治十二年十月对次年年班人员加以确定，其中提到了顺治十二年前来之一班，其成员名称已具体开列，涉及旗分则为：察哈尔

---

① 原文 eshun，直译为生熟之“生”，为 eshun i beye（生身子）的略写，清代习称未出痘者（即得天花者）为“生身子”，反之，已出痘者称为 urehe i beyen，即“熟身子”，即下文所写 urehe。

② 达力扎布：《明清蒙古史论稿》，第 271 页。

③ 《清世祖实录》，顺治十三年正月戊子。

④ 〔日〕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第 204 页。

一旗、科尔沁三旗、巴林一旗、敖汉一旗、奈曼一旗、苏尼特一旗、鄂尔多斯二旗、四子一旗、浩齐特一旗、喀尔喀右翼一旗、阿巴噶一旗、乌珠穆沁一旗、扎鲁特一旗、扎赉特一旗、翁牛特一旗、郭尔罗斯二旗、土默特一旗、喀喇沁一旗、乌喇特一旗，共二十三旗。此二十三旗除掌旗扎萨克王公外，还有非扎萨克王爵。另外单列附牧于翁牛特之喀喇齐哩克，无疑此时该部并未设旗，唯独说明该部当时在翁牛特部仍颇有影响。

题本朱批为皇帝上谕，充分证明除此等人外仍有另一班王公，结合《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中扎萨克封授时间表推论，则另一班中所涉及旗分为：科尔沁三旗、巴林一旗、苏尼特一旗、鄂尔多斯四旗、浩齐特一旗、阿巴噶一旗、乌珠穆沁一旗、扎鲁特一旗、翁牛特一旗、土默特一旗、乌喇特二旗、喀喇沁一旗、杜尔伯特一旗、阿鲁科尔沁二旗、克什克腾一旗，共二十二旗。两班合计共四十五旗。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阿鲁科尔沁，在清代后世形成的外藩四十九旗中，阿鲁科尔沁仅有一旗，但此时通过下引题本二，可以看到阿鲁科尔沁有两旗，且该两旗截然不同，其中之一应为后世茂明安旗，下文详述。不过总数应为四十五旗无疑。此外，还有较为特殊者，即归化城土默特两旗。此二旗在乾隆二十八年成为内属旗，[①] 而此时虽已编旗，但未设置扎萨克，故不参与年班，[②] 加上这二旗，总计恰好为四十七旗。

另外，如以题本所言，顺治十三年所来另一班，应为二十二旗，仍与实录所谓“二十七旗”不符。对此，达力扎布教授曾提出一种说法：“据清代史籍所载，顺治初年外藩蒙古扎萨克旗数又增加了近二十个，所以外藩二十七旗也不是顺治年间的实有旗数，

① 王玉海：《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内属问题》，《蒙古史研究》第 5 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达力扎布：《明清蒙古史论稿》，第 280 页；

② 〔日〕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第 77 页。

可能与外藩十三旗之称一样，也是朝觐纳贡的单位。”① 此结论大体无误，唯独旗数与题本不合，但考虑到实录乃后修，很可能史官沿袭成例而书，其中所记年节宴赉，与会盟时旗分并不相符。同时题本中还有佐证。

题本二②

朱批：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dorolon i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si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tulergi goloi monggo de, weile beideme, haha celeme culgan genere jalin. amban be baicaci, dorgi haha celere aniya, tulergi goro i monggo de, weile beideme, haha celeme, culgan genembihe.（原档残缺）aniya, juwan biyai dorgi de tulergi（原档残缺）yendehebi. tutu bime, yadara irgen（原档残缺）weile beidehe de, habšame jiki seci monggo i ba goro ofi isinjirengge mangga. erei anasi aniya indeme culgan tuciki seme wesimbufi（+）hesei toktobuhabi. ere genere de korcin i juwan gūsa, cahar i emu gūsa ohan i emu gūsa, naiman i emu gūsa, barin i juwe gūsa, ongniyot i juwe gūsa aru korcin i emu gūsa, jarut i juwe gūsa, karacin i juwe gūsa, tumet i juwe gūsa, kesikten i emu gūsa, ere orin sunja gūsa de culgan genefi, isinjiha manggi. hinggan i amargi ujumucin i juwe gūsa, duin jusei emu gūsa, aru korcin i emu gūsa,（原档残缺）gan i emu gūsa,（原档残缺）ilan gūsa. ordus i ninggun gūsa, ku（原档残缺）ere orin juwe gūsa de culgan genembihe（原档残缺）celembi. tutu

① 达力扎布：《清初“外藩蒙古十三旗”杂考》，《明清蒙古史论稿》，第279页。

②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卷1第142本。

bime, (+) hesei, aniya indeme, culgan tuci seme toktobuha be dahame, amban be (+) hese be baifi, ere aniya tulergi monggo de, weile beideme, haha celeme toktoho songkoi neneme korcin i ergi de culgan geneki sembi. amban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gingguleme wesimbuhe (+)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nadanci aniya juwe biyai tofohon.

dorolon i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sidari

dorolon i jurgan 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šaštir

weilen ejeku hafan bime, emu jergi (原档残缺)

朱批：依议而行。

题奏

礼部左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衙门事务臣席达礼等谨题：为令外藩蒙古审案、比丁、会盟事。臣等查，内比丁之年，外藩蒙古应审案、比丁、会盟。(原档残缺) 年十月内，外 (原档残缺)，然贫民若因审案前往上诉，蒙古地僻难至，此后应暂息会盟一年。题报，圣旨定，此次参与，科尔沁十旗、察哈尔一旗、敖汉一旗、奈曼一旗、巴林二旗、翁牛特二旗、阿鲁科尔沁一旗、扎鲁特二旗、喀喇沁二旗、土默特二旗、克什克腾一旗。此二十五旗前往会盟。兴安岭以北之乌珠穆沁二旗、浩奇特二旗、阿巴噶二旗、苏尼特二旗、四子一旗、阿鲁科尔沁一旗、(原档残缺) 一旗、(原档残缺) 三旗、鄂尔多斯六旗、(原档残缺)，此二十二旗前往会盟 (原档残缺)，然有旨命暂息，会盟抑或按旨意行事，臣等请旨定夺，且本年外藩蒙古审案、比丁，是否依前例会盟于科尔沁？臣等不敢擅专，敬题请旨。

顺治十七年二月十五

礼部左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衙门事务臣席达礼

礼部右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衙门事务臣沙世悌尔

主事加一级（原档残缺）

该题本的最大价值，无疑是其中提到的外藩蒙古会盟的相关内容，乌云毕力格教授与笔者曾撰文研究；[1] 而另一个重要之处，则在于明确提出了漠南蒙古共有四十七旗。原档残缺处，乌云毕力格教授加以补齐："-gan i emu gūsa 应为 moominggan i emu gūsa（茂明安一旗），– ilan gūsa 必定为 urad i ilan gūsa（乌拉特三旗），而 ku – 肯定为 kuku hoton i tumed i juwe gūsa（归化城土默特二旗）。有意思的是，'阿鲁科尔沁一旗'在兴安岭南北两翼的东西会盟中同时出现，因而构成了四十七旗。其实，岭西的'阿鲁科尔沁一旗'应该是'杜尔伯特一旗'之误，所以四十七旗总数并无错误。另值得注意之处：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当时仍在内扎萨克会盟之列。"[2]

这里首先详述前文所提，即茂明安一旗问题。根据后世记述，茂明安部车根长子僧格，康熙三年方授扎萨克，[3] 如若此说属实，则此处不应有茂明安旗。但乌云毕力格教授与笔者前引文中，认为对照后世旗分，缺少喀尔喀右翼一旗与茂明安旗，对此本文再次加以查补更正。

根据题本三，本年度蒙古旗分数量为四十七当无疑问，但对比《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及《清实录》等文献，题本中所述旗分名称有所不同。其一，阿鲁科尔沁在题本中为两旗，而后世文献为一旗；其二，题本无茂明安旗，核《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记载，茂明安于康熙三年始编旗。对于这个差异，笔者

① 乌云毕力格、宋瞳：《内扎萨克蒙古盟的雏形》，《清史研究》2011 年第 4 期。

② 乌云毕力格、宋瞳：《内扎萨克蒙古盟的雏形》，《清史研究》2011 年第 4 期。

③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 40。

推断，因茂明安归附甚早，与之同时来投者基本均已编旗，且茂明安部向无大过，为何不予编旗？而茂明安原属阿鲁蒙古，很可能当时清廷编旗称呼茂明安亦为“阿鲁科尔沁”，与后世不同，至康熙三年方改称茂明安旗，重授扎萨克。这里笔者也要更改一个前引文章的错误，“杜尔伯特一旗”应包含在“科尔沁十旗”之列，故旗数不变。关于喀尔喀右翼一旗，引文中笔者曾将所缺档案补充为 gan i emu gūsa，不过根据满文字母形制，此文也很可能为 lka i emu gūsa，若此，此处应指喀尔喀右翼旗一旗。

关于此时蒙古旗分的名称，仍有查考空间，但本题本与下文引题本三均为同年题本，而两本都明确提出了蒙古共有四十七旗，因此旗数应无疑义。

另外此题本再次提到了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因此该二旗参加会盟，但不参与年班，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文献中出现的“四十七旗”与“四十九旗”等概念中存在的差异，而题本中确实存在证据证明这种差异。那么，有否佐证证实这种说法，在题本中是有其例的。

题本三[①]

朱批：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dorolon i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sidar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aniya doroi jidere wang，beilei jalin. tulergi goloi wang，beile se be aniya doroi hengkileme jidere de juwe idu banjibufi yabure de，daci tuweri ujui biya seme，tulergi goloi dehi sunja gūsai niyalma mejige gaime jihe manggi. jidere idui wang beile se

①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卷 1，题本 148。

be jidere, nakara be, (+) hese be baifi, juwan biyai mejige i niyalma de selgiyembihe. amban meni gisurehengge, baita tucike aniya, tutu bime tulergi goloi gungju, gege, wang, beile, beise, gung se yooni baita de acanjime jifi, ciyanliyang hafirahū be dahame, ere aniya, aniya doroi hengkileme jidere idui wang, beile, beise, gung, taiji sa be jidere be nakabureo sembi. amban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gingguleme wesimbuhe, (+) hese be baimbi.

ijishūn dasan i juwan nadaci aniya juwan biyai ice ilan.

dorolon i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sidari.

dorolon i jurgan i ici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bim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yamun i baita aisilame icihiyara amban dahata.

weilen ejeku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yahūn.

朱批：依议而行。

题奏

礼部左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衙门事务臣席达礼等谨题：为即将前来年班之王、贝勒事。外藩王、贝勒等年班来朝，令编为两班。向例，冬季首月，外藩四十五旗听事之人来后，令将到之班次王、贝勒等动身。如若令其停往，则请旨于十月传谕听事人。臣等议：今有事之年。然外藩公主、格格、王、贝勒、贝子、公等若悉数前来，钱粮迫乏，故本年年班陛见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可暂停，臣等不敢擅专，敬题请旨。

顺治十七年十月初三

礼部左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衙门事务臣席达礼

礼部右侍郎加一级，协办理藩衙门事务臣达哈塔

主事加一级臣雅浑

题本三与题本二同为顺治十七年所上，前者时间尚且晚于后者，然而除再次提到年班分为两班外，着重提出了听事参与年班者仅有四十五旗，与参与会盟四十七旗有所差异。在康熙朝《大清会典》中，记载了康熙六年方对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做出年班要求，[①] 归化城土默特因不参与年班，自然不派遣听事人，故此处遗漏两旗，无疑为归化城土默特二旗。综上，可以得出两条结论：1. 顺治时期，至迟至顺治十二年，外藩蒙古已有四十七旗，虽然具体旗分需要再行考证，但数量无疑问；2. 此时期史料中提到的旗数，在会盟、年班、听事等不同情况下有所差异，不可一概作为当时漠南蒙古的全部旗数加以引用。

二　康熙至乾隆朝：从“四十七旗”到“四十九旗”

在展开论述之前，需要先对“四十七旗”与“四十九旗”做出概念上的明确区分。标题所谓“四十七旗”，包括了后被拆散的“察哈尔旗”，和后为内属旗的“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后者在乾隆二十八年内属前，始终列入外藩旗数，有学者已提出此点，当为注意。[②] 而标题所谓“四十九旗”，则是乾隆朝最终确立之四十九旗，其中已不包括察哈尔旗与归化城土默特旗。不过，旗数演变并非单纯增加或减少，在扎萨克数量最终确立前几经波折，当中包括所谓“外藩”旗概念的变化，以及出于政治原因的增删，最多时扎萨克

① 《康熙朝大清会典》载：“康熙六年题准：年节来朝，令归化城土默特二都统轮流、四副都统轮流同来。”见《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第 189 页。

② 达力扎布据雍正朝《大清会典》，证明此说。见《明清蒙古史论稿》，第 279 页。

旗数超过五十。其间的过程则是本节将重点考证者。

康熙三年，原属喀尔喀部的衮布伊勒登率众投奔清朝，于是年受封扎萨克多罗贝勒，诏世袭罔替。为与顺治十年来投、已封授扎萨克的喀尔喀部本塔尔相区别，该旗被称为喀尔喀左翼旗。[①] 清朝此时有四十八旗。次年即康熙四年，阿巴哈纳尔部栋伊思喇布携众两千余投至喀尔喀右翼牧地，清廷封其扎萨克固山贝子，世袭罔替。[②] 至此，外藩蒙古已有四十九旗，当然仍包括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在题本中，康熙六年有如下记载。

题本四[③]

朱批：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dorgi amban bime，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aliha amban，amban karantu sei gingguleme（+）wesimburennge.（+）hese（原档残缺）mejige gaime jihe niyalma de silgiyere jalin. tu（原档残缺）baya seme，toktobuha songkoi tulergi monggoi dehi nadan gūsai niyalma mejige gaime jihebi，amban（原档残缺）（+）hese（原档残缺）dain cooha akū seme coohai ahūra be dasatarakū heolederahū，uksin i morin be yalume macuburahū seme selgiye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hese be baimbi.

elhe taifin i sujaci aniya，juwan biyai ice ninggun.

dorgi amban bime aliha amban amban karantu.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coktu.

icihiyara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minggai.

icihiyara hafan emu jergi nonggiha amban nandahai.

---

①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 3、卷 33。

②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 38。

③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卷 1 第 199 本。

朱批：依议

题报

内大臣兼理藩院尚书、臣喀兰图等敬题。为传谕奉旨前来听事人事。(原档残缺) 依定例外藩蒙古四十七旗前来听事者，臣（原档残缺）传谕，不可言无兵戎，致兵器不修。不可怠惰，且所用军马不得掉膘。为此敬题请旨。

康熙五年十月初六

内大臣兼尚书喀兰图

左侍郎加一级臣绰克图

郎中加一级臣明盖

郎中加一级臣南达海

该题本题报时间为康熙五年，康熙朝《大清会典》有记载为："又题准：归化城土默特，亦于每年四季，各旗遣一人来听事。"①这条记载前接康熙四年，那么是否说明康熙四年开始，归化城土默特已开始听事？如此，则"四十七旗"应指顺治十七年时的四十五旗加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如若不然，则当中所谓"四十七旗"，仍是前述除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外参与年班、听事之旗分。但当中有一疑问，同一典籍所载归化城土默特至康熙六年始参与年班，并非康熙四年，与此条有出入。

如依照后说，由顺治十七年的"四十五旗"变为"四十七旗"，则增添了两旗。但如果依《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茂明安康熙三年设旗，加上喀尔喀左翼一旗与阿巴哈纳尔一旗，则此时外藩蒙古扎萨克听事旗应增加三旗，至四十八旗。但从题本二、三、四叙述一脉相承、互为佐证来看，内扎萨克旗数量不会有误，由此只

① 《康熙朝大清会典》，见《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第 189 页。

能暂作推论：或为《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记载有误；或如前文所述，茂明安一旗在得此名号前，很可能已以阿鲁科尔沁为名设立扎萨克。而同年，阿巴哈纳尔部另一重要人物，前述栋伊思喇布之兄长色棱墨尔根也携众投奔清朝，并于次年即康熙六年受封扎萨克多罗贝勒，世袭罔替。此时外藩扎萨克数量已达到五十。

依照前说也有同样问题：如果此时四十七旗包括归化城土默特，则新归附之喀尔喀左翼、阿巴哈纳尔两旗均尚未参与听事（考虑其归附未久，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在前述四十五旗、此本所谓四十七旗（包括归化城土默特）数量仍然确定的情况下，茂明安旗还是难以安排入内。因此，四十七旗旗分目前可以两说并存，但数量不会有变。

康熙十四年，察哈尔旗扎萨克亲王布尔尼借三藩之乱谋叛，遭到清军迅速镇压，在善后处理中，察哈尔旗遭到严厉惩处，老弱被籍没为奴赏与平叛伤员，壮丁被打散编入满洲、蒙古八旗，察哈尔旗作为外藩之一就此消亡。[①] 而清朝外藩蒙古扎萨克数量再次回到了四十九旗。理藩院题本中，康熙朝题本大量散佚，但康熙三十六年一份题本提到了此事。

题本五[②]

朱批：gisurehe songkoi obu

wesimburengg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amban mamp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mejige gaime jihe niyalma de selgiyere jalin. amban meni jurgan i toktobuha kooli de, tulergi monggoi dehi uyun gūsa, jai kalka sebe aniyadari duin forgon de gūsa

① 察哈尔旗建立到消亡的具体过程及察哈尔人去向，见达力扎布《清初察哈尔设旗问题考略》，《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1 期。

②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卷 1 第 275 本。

tome emte, niyalma jibufi, mejige gaibumbi, mejige gaime jihe niyalma de coohai niyalma be gabtabure, agūra be dasatabure, morin be macuburahū seme bithe unggifi selgiyehe be dangse de ejehebi. te dehi uyun gūsa, jai kalka sa, tuweri ujui biya seme mejige gaime jihebi. amban meni gisurehengge, tulergi dehi uyun gūsa, jai kalka sa, tuweri ujui biya seme gūsa uome, emte niyalma mejige gaime jihe be dahame, mejige gaime jihe niyalma de kooli songkoi meni meni gūsai coohai niyalma be gabtabu, coohai agūra be saikan tuwame dasatabu, heolederahū, coohai niyalma i morin be yalume macuburahū seme gūsa be kadalara jasak i wang, beile, beise, gung, taiji sede bireme selgiyeki sembi, amban meni cisui gamara ba waka ofi, gingguleme wesimbuhe, (+) hese be baimbi.

elhe taifin i gūsin ningguci aniya, juwan biyai ice jakūn.

hashū ergi ashan i amban, amban mampi.

icihiyara hafan juwe jergi nonggiha amban bodu.

aisilakū hafan, amban narda.

aisilakū hafan, amban cangsan

ejeku hafan, amban sahaliyan.

朱批：依议

题报

理藩院左侍郎臣满丕等谨题，为传谕听事人事。臣等依部中定例，令外藩蒙古四十九旗及诸喀尔喀，于每年四季各派一人前来听事。令其遣书，使兵士习射、整治军械、保养马匹，且所传谕令记入档册。今四十九旗及诸喀尔喀，于冬季首月前来听事，臣等议：外藩四十九旗及诸喀尔喀，于冬季首月各派一人前来听事，故告听事人，依例令各处兵士习射，军械悉心勘查，不可怠惰。骑行军马，不得掉膘，各管旗扎萨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一概传

谕。臣等不敢擅专，敬题请旨。

康熙三十六年十月初七

左侍郎臣满丕

员外郎加二等臣博都

员外郎臣纳尔达

员外郎臣常三

主事臣萨哈廉

前述《会典》所载康熙六年起，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开始参与年班，因年班与否需由听事人传达，故题本五中康熙三十六年所谓外藩蒙古，是包括该二旗在内的所有扎萨克，除却被取消的察哈尔旗，此时扎萨克数量为四十九可确定无疑。及至康熙四十四年，清廷增设喀喇沁一旗，以杜棱贝勒固噜思奇布曾孙塔布囊格埒勒领之，授扎萨克。[①] 此时外藩扎萨克再度达到五十旗。最晚出现的一旗是鄂尔多斯第七旗，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记载，乾隆元年，定咱喇什受封扎萨克。[②] 至此外藩蒙古达到五十一旗。达力扎布教授曾指出此为“当时内扎萨克旗的实数”。[③] 所言无误。之后乾隆二十八年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内属，至此，清廷内扎萨克“四十九旗”最终定型。

三 结论

通过对满文题本与传记、文献资料的综合使用，本文勾勒出

①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2、卷23。

②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6、卷43。

③ 参见达力扎布《清初“外藩蒙古十三旗”杂考》，《民族史研究》第3辑，民族出版社，2002。

一幅外藩蒙古内扎萨克旗变化的图景，最终可以确定，内扎萨克旗数量几经变化，于顺治十年左右达到四十七，康熙三年达到四十八，康熙四年达到四十九，康熙六年达到五十旗。此后，康熙十四年，察哈尔旗被取消，旗数再降为四十九，康熙四十四年、乾隆元年又增设两旗，达到了清朝内扎萨克数量最多时的五十一旗。乾隆二十八年归化城两旗内属，后人所谓“四十九旗”最终成形。

在使用题本资料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任何制度的形成都经过了漫长、复杂的演变历程，不可能一以概之。通过研究分析题本这类“遗留性史料”，很多已有结论将受到质疑乃至被推翻。因此，拣择史料，利用史料学知识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清代理藩院对蒙古问题的认知和处理都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使有关题本资料真实可信，从而推进了相关研究。

鄂飞满文奏折笺注

乌云毕力格

一 清朝宫中档满文朱批奏折与鄂飞奏折的价值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的西藏史极其重要而复杂。但是，这段历史在藏文、汉文和蒙古文各种第二手资料中有不同的记载，各有明显的倾向性。因此，利用在当时历史过程中形成并保留至今的“遗留性史料”，深入研究这段历史，尽量再现历史本来面貌，具有重要意义。清朝的满文“宫中档”就是这类“遗留性史料”之一。

所谓的“宫中档”，全称“宫中各处档案”，是指紫禁城乾清宫内所藏各类档案。1925 年，故宫文献部在清理这些档案时，认为这些档案，“系统虽异，地点均在内廷”，故此名之。“宫中档”大致分三类：第一类是官员缴存的朱批奏折及谕旨等；第二类是官员履历单、片及进呈诗文；第三类为奏事处的档案。[①] 这些档案既有汉文，也有满文。

“宫中档”中，朱批奏折及谕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清初之文书制度，沿袭明代旧制，题本和奏本相辅而行。题本

① 秦国经：《中华明清珍档指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 48 ~ 53 页。

用于内外各衙门奏报公事，奏本则是臣工上奏本身私事之用。无论题本与奏本，皆须投送通政司传递。到了康熙中叶，清朝出现了奏折制度，在乾隆十三年（1748）十一月正式废除奏本[①]后，奏折制度终于完全取代了奏本制度。所谓的“奏折”，是一种机密文书，简单说，是清朝臣工进呈皇帝的秘密报告。奏折，又称折子、奏帖、折奏等，满语作 Wesinburengge，意即“呈上者”，多用无格白折纸制成。清代最早的奏折，源于传统的奏本，出自明朝投降爱新国文武臣工之手。他们进呈皇太极的奏本，较当时明朝通行的奏本更简化，后成为清朝奏折的蓝本。现存最早的正式奏折，出现于康熙十二年（1673）。无论在内容方面，还是进呈程序上，奏折与奏本都有所不同。其一，奏折内容不分公私，“凡涉及机密事件，或多所顾忌，或有滋扰更张之请，或有不便显言之处，或虑获风闻不实之咎等，俱在奏折之列，其奏报的内容，非常广泛，不受公私事件的限制，臣工对于地方利弊，民情风俗及大小事务，凡有见闻，必须据实奏闻”。[②] 其二，奏折例应密封直达御前阅览，不经通政司传递。因此，奏折内容涉及面广，可信度大。

奏折经皇帝用朱砂红笔批阅后，叫“朱批奏折”。朱批奏折在康熙皇帝在位时发还原奏人，还没有缴回内廷之例。雍正皇帝即位后，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谕令“所有皇父朱批旨意，俱著敬谨查收进呈”，“嗣后朕亲批密旨，下次具奏事件内务须进呈”。[③] 从此，缴批成了定例，在宫中形成了大量的档案。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朱批奏折 50 万多件，台北故宫博物院存 158000 余件。[④] 除了朱批外，皇帝的命令还有

---

① 《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三年十一丙子。

② 庄吉发：《故宫档案述要》，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1983，第 11 ~ 12 页。

③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转引自庄吉发《故宫档案述要》，第 12 页。

④ 秦国经：《中华明清珍档指南》，第 49 页；庄吉发：《故宫档案述要》，第 12 页。

多种，如谕、旨和朱谕等。谕和旨一般都通过内阁“明达”，不同于后来的廷寄，即通过军机处密发“密达”。朱谕，是皇帝亲笔起草的命令，内容多为机密要务。这样，朱批、谕、旨和朱谕都是当时办事的直接产物，不同于后人根据这些档案重新编纂的史书，反映了事情发生和发展的真实过程。

就研究蒙藏地区史和民族史而言，满文朱批奏折和谕旨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首先，满洲人是清代的统治民族，满语是清朝的国语。清朝虽说是多语言并用的国家，但实际上满语清字具有独尊地位。中央和地方的重大事情，大部分都经满洲皇帝和满洲大臣办理，重要国事文件也就成为满文文件了。其次，清代有明文规定，满洲大臣办理满、蒙、藏等事件时，必须使用清文折。到乾隆十一年，这一规定终于制度化。① 本文研究的满文档案，就是办理西藏事务时形成的。因为满臣必须使用清字折，所以当时没有出现与此有关的汉文或其他文种的奏折。这样，当时满文书写的奏折、朱批奏折和谕旨成为研究边疆地区和民族的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最后，清代官书中虽然有不少翻译和引用满文档案文书，但是，正如庄吉发先生所言，“一方面由于体例的限制，一方面由于隐讳润饰的习惯，原始史料多经增删润饰，或窜改”，② 已面貌全非，不能轻信。③ 只有满文原文原件，才是真正的“文字遗留”史料。

现存康熙朝满文宫中档有5000余件，起自康熙十二年十一月，止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分别保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1977年，台湾影印出版了《康熙朝宫中档朱批奏

---

① 《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一年二月丁酉朔。

② 庄吉发：《故宫档案述要》，第64页。

③ 笔者在拙作《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满文文书档案流传史》（德文）中，详细对照康熙皇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的满文原文文书和《朔漠方略》满文本引用部分以及其汉译，发现三者之间有巨大区别（乌云毕力格，1999）。

折》，其中第8册和第9册为满文朱批奏折。1996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内容基本包括北京、台北两处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但是汉译者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奏折译文极佳，有些则译文之错谬、内容之脱落随处可见，如不参照原文，无法引用。[①]

本文探讨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朝朱批奏折中的一件，呈奏人是鄂飞等议政大臣，文种为满文。奏折呈奏时间为康熙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705年2月9日）。1705年，西藏发生了严重事件，拉藏汗执杀第巴桑结嘉措，六世达赖喇嘛身份的真伪出现问题。是年底，康熙皇帝着议政王大臣会议西藏事宜，以便制定应对事件的对策。于是，以鄂飞为首的议政大臣们搜集当时西藏、青海方面呈上的奏疏和清朝使节的奏折以及使者们耳闻目睹的资料，向皇帝提出了初步意见。鄂飞等人的奏折里引用了拉藏汗、五世班禅呼图克图、六世达赖喇嘛、青海王扎西巴图鲁、清朝使者荐良等人的奏疏、书信、奏折和口述内容。1705年西藏爆发战争时，清朝使者荐良正在西藏，往返拉萨和日喀则之间，见到了拉藏、班禅、达赖喇嘛随从以及其他相关人员。鄂飞等人全文引用各方奏疏内容，试图尽量客观地反映西藏事件的真相，以便得出应对善策，所以其可信度很强。

该奏折在汉译时参考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相应内容。[②] 奏折原文不分章节，也不分段落。为了研究方便起见，本文将原奏折分为八个段落，并加了标题。但在罗马字音写时，保留原文原貌，以阿拉伯数字表示行数，逐行音写，并把抬写等文书格式一一标出。

---

① 关于《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存在的问题，请参考白新良《已刊康熙朝满文奏折正误》，《清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②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399～404页。

二 鄂飞奏折产生的历史背景：拉藏汗时期的和硕特汗廷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是西藏历史上相当重要的时期。1637 年，西蒙古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征服青海，1642 年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和硕特汗廷”。关于这段历史，国内外有不少研究论著。[①]和硕特汗廷的拉藏汗与第巴桑结嘉措之争，是西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蒙藏关系史上的重要一幕。

拉藏汗是和硕特汗廷的最后一位汗王。他继位的 18 世纪初期，正是西藏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以拉藏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和以第巴桑结嘉措为代表的西藏僧俗贵族两派政治势力，逐鹿高原，为争夺统治西藏的实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和硕特汗廷形成的重要前提之一，是西藏格鲁派对和硕特蒙古人的军事、政治依赖。1642 年，格鲁派依仗和硕特蒙古人的刀枪，在西藏得到了不可冒犯的神圣地位，蒙古汗王则登上藏王宝座，君临雪域，两者都如愿以偿。但是，昔日号令西藏佛教诸宗的噶玛噶举派被赶下台以后，长期不甘心失败，召聚自己的信徒和施主们一再暴动，他们把矛头指向达赖喇嘛与和硕特蒙古汗。在域外强敌中，不丹法王兼国王的主巴噶举首领时附时叛，拉达克也为之助兴壮胆。西藏内外反对势力的活动，倒给蒙藏贵族联盟延长了寿命，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双方保持着密切友好

① 如杜齐《西藏画卷》，1949，罗马；伯戴克：《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1950，莱登；王尧：《第巴桑结嘉措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 1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陈庆英：《历辈达赖喇嘛生平形象历史》，藏学出版社，2006；等等。

的关系。

然而，到17世纪七八十年代，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顾实汗、达延汗和达赖巴图尔等和硕特汗王的经营，后藏复辟势力已经完全溃败，格鲁派在西藏的地位十分巩固，加之1681～1683年蒙古军远征拉达克，打击和征服了域外反对势力，收复阿里地区，西藏呈现出稳定的局势。和硕特蒙古人打击和压服了西藏格鲁派集团的内外敌人，铲除了他们独立自主、自行其是的一切障碍。对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寺院领主及其西藏世俗支持者来讲，和硕特人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于是，蒙藏贵族联盟趋于瓦解，双方对西藏实权的争夺日趋激烈。

对蒙古汗的夺权活动，在1671年达赖汗继位前后已开始。1668年初，顾实汗之子达延汗去世后，由其六弟达赖巴图尔行使汗权。是年5月，第巴丕凌列札木苏去世，由于没有汗，按照汗廷的惯例，第巴之位也空悬了一年。但蒙古汗位久虚，第巴不能不设，于是1669年8月，五世达赖喇嘛乘机命其崔本罗桑图多布为第巴。达赖汗于1671年即位后只好予以承认。第巴是汗廷最重要的官职，管理西藏的行政事务，以前一直由蒙古汗选定和任命。任命第巴之权的旁落，是汗权的一大损失，也是双方斗争公开化的开始。

1679年，五世达赖喇嘛任命桑结嘉措（1653～1705）为第巴。此人是第巴丕凌列札木苏的侄子，八岁时被送进布达拉宫，由五世达赖喇嘛亲自培养，据传是五世达赖喇嘛的私生子。五世达赖喇嘛专门颁发一份文书，向僧众介绍他的德行，说明他是一位有才华的贵族。[①] 桑结嘉措不愧为是五世达赖喇嘛一手扶植的显贵，很有权谋，不久即成为西藏政治的中心人物。于是和硕特汗对西藏的君临已近乎形式了。

---

① 王尧：《第巴桑结嘉措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1集，第191～192页。

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这无论在政界还是佛教界都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但是第巴桑结嘉措采取了“匿丧”的手段，宣布五世达赖喇嘛“入定”，除第巴外不见任何人。这样一来，唯有桑结嘉措一人能“觐见”达赖喇嘛，别人不得接近，达赖喇嘛的“法旨”由桑结嘉措传达，实际上等于桑结嘉措自己做了达赖喇嘛。结果，在达赖喇嘛圆寂后的不利形势下，第巴不仅保住了他们的一切既得权势，而且变本加厉地干涉西藏政教各界。和硕特汗权完全旁落。

当时，在西藏同外界的关系中，第巴左右和硕特汗廷，以西藏首脑人物的姿态出现。桑结嘉措掌权时，准噶尔和清朝之间发生了战争，第巴支持噶尔丹，暗中为他出谋划策。但是，1690年噶尔丹败于乌兰布通，他援助噶尔丹的事实被公开。第巴在外交上十分失利，于是他另想他法，以求困境中自拔。1693年第巴派人到北京，以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请求：“吾国之事皆第巴为主，乞皇上给印封之，以为光宠。”[①] 清廷前已承认和硕特汗的君主地位，由他们“为主”，如今不能再封一个汗。但达赖汗这个人正如伯戴克所说，是“被人忘却的，死气沉沉的”平庸之辈，失权于第巴。所以清廷对第巴也不能置之不理。1694年清廷赐第巴以“掌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布忒达阿白迪之印”。[②] 这个称号和印玺意味着第巴只是一个掌教的法王。实际上第巴不仅是法王，而且是藏王，这是他自己取得的权威。

第巴对五世达赖喇嘛秘不发丧，长达16年之久。1696年，康熙帝在昭莫多打败噶尔丹，从那里获悉五世达赖早已圆寂，于是派人去拉萨责问第巴。但是当时清朝对西藏事务鞭长莫及，能做到的不过是痛斥和威胁而已。第巴对康熙皇帝的责问一一做了辩解，并

---

① 《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辛未。

② 《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三年四月丙申。印上的“布忒达阿白迪”系梵文，意为“佛海”，藏文即桑结嘉措。

上奏新达赖已经15岁，准备1697年坐床，在此之前请朝廷保密。清朝只好承认既成事实，不仅为他保密，还承认了新达赖喇嘛。于是第巴在公开为五世达赖喇嘛发丧的同时，把15岁的仓央嘉措迎入布达拉宫坐床。第巴通过这次交涉，不仅没有丧失以往的权力，而且继续控制达赖喇嘛，平安地度过了“台风区”，更大胆地投入了新的搏斗。和硕特汗廷的统治面临严重威胁。

第巴的大权独揽，使和硕特汗被置于无权地位，蒙藏贵族之间的裂痕日趋扩大。1703年，达赖汗次子拉藏汗即位。拉藏即位后，对西藏政治表现出极高的热情，为挽回达赖汗所失去的权势积极活动。汗与第巴之间的公开冲突已不可避免。

拉藏汗要恢复顾实汗时期蒙古汗的一切权势，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第巴不肯放弃既得利益，而且拥有实力。拉藏汗和桑结嘉措互不相让，因为前者不满于形同虚设的汗位，后者不肯听命于蒙古汗。于是，1705年发生了本文涉及的重大事件。事件发生后，消息传到北京，康熙皇帝下令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奏如何应对西藏事变。

议政王大臣议事制度是清初到乾隆末年中央国家机构中的重要制度，又称“国议”。该机构在雍正中期成立军机处之前在国家事务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满洲贵族内部事务和边疆、民族事务的处理，是议政王大臣的主要使命。1705年西藏事变发生以后，为了采取应对措施，康熙皇帝命令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奏。在这样的背景下，鄂飞等17名议政大臣研究西藏各方面的秘奏和清朝使节的报告资料，最后呈上了这份奏折。

三　议政大臣鄂飞奏折：罗马字音写、汉译、注释与分析

技术说明：满文奏折的罗马字音写遵循了莫林多夫（P. G.

von Möllendorff）音写法。原文中的句首圆圈以圆形符号“○”代替，抬写以加号“+”表示。汉译坚持忠实原文，注释力求全面，对每段进行分析与总结。

第一段拉藏汗奏疏

一 罗马字音写

1：+ Wesimburengge，2：○ hebei amban，hiya kadalara dorgi amban，amban uksun-i ofi sei gingguleme 3：+ wesimburengge，4：+dergi hese-be gingguleme dahara jalin，ladzang-ni wesimbuhe bithede，5：ejen-i genggiyen-de wesimburengge，nenehe geren jalan-i onggolo sain 6：yabun-i hūturi-be yongkiyaha boobai fujurungga beye sumir 7：alin-i gese akdun tob sain tacin šajin-i ergengge-be 8：taifin-i wehiyere abka-i gese 9：+ manjusiri ejen-i umuhun-i genggiyen-de niyakūrafi 10：wesimbumbi. onco hafu sara genggiyen abka-i dulimbade gosin 11：jilangga šun enteheme eldembure jakade šajin ergengge-be 12：taifin-i šu ilha ilame neibuhe. rasiyan-i gese sain 13：+ hese-de，gubci bai geren urgunjeme aliha. 14：+ dergi amba ejen-i gosingga hūsun，juwe enduringge-i adisdit-de 15：nikefi，taifin-i sain-i bimbi. majige 16：wesimbure turgun，nenehe sain-i bederehe dalai lama，17：+ ejen han-i sain hese-de akdafi，šajin ergengge-be tetele 18：jirgabume bisirede，ere diba-i turgun，neneme eiten yabuha 19：ehe yabun-be，20：+ ejen genggiyen-i bulekušecibe，mini gūnin-be akūmbume getukeleme 21：wesimbumbi dergi dzungk'aba-i šajin-be jenduken-i efuleme，22：iletu dalai lama-i doro šajin-be jafaha ūklige 23：ejete，dalai lamai sidende jakanabume，dalai lama-be 24：gidašame，

ini gūnin cihai yabume, lamai tuwakiyan-be efulehe 25: babe gisureci wajirakū bicibe, šošome wesimbuhe. te diba-i 26: ere ehe yabun-de bi kirici ojorakū ofi, efujen 27: banjinafi, mini dahabuhangge-be, gūnihakū sidende takuraha 28: niyalma bucebure-de isibuhabi. uru waka-be adarame obure 29: babe, amba onco mederi gese bulekušereo. ereci amasi 30: dzungk'aba-i šajin-be badarambure, dalai lama-i se ajigen 31: ofi, 32: + ejen han, dzambutib-be uheri ejelehe-be dahame, wehiyeme wesihun 33: sain obure-be bulekušereo. buya niyalma bi, sain gūnin-i 34: tusa araki secibe, oyomburakū, duibuleci šajin ergengge-be 35: tusa arara 36: + ejen han-i bodohon funiyagan, asha yongkiyaha daipeng gasahai 37: deyere songko-de, cecike-i deyere-be duibulehe 38: adali. meni tusa ajigen ofi, 39: + ejen han amba gosingga duka ci dzungk'aba-i šajin-be 40: juwan ergide badarambure, juwe enduringge-i sain baita 41: yabun-be an-i badarambume, nenehe-ci wesihun obure-be 42: bulekušereo. funiyagan bodohon 43: + colgoroko manjusiri han-de, ulhicun akū buya niyalma bi 44: jombume wesimbure-de mangga bicibe nenehe jalan-i salgabun-i 45: kesi-de, agai sabdan mederi-de tusa ojoro gese 46: bolgo gūnin-i wesimbuhengge-be, waka bici, oncodome guwebume 47: bulekušereo. jai fucihi-i šajin bime oyonggongge dzungk'aba-i 48: šajin. šajin-de tusa ojoro, juwe enduringge, šajin-be 49: jafaha ūklige ejete-be isabufi, ere diba-i ehe 50: waka yabun-i urkin-de dain cooha, hūlha holo labdu 51: oho babe 52: + ejen han, sain hese wasimburakū oci, ergengge šajin taifin elhe 53: bahafi

banjirakū jalinde, ishun aniya nadan biyai ice-de, 54: ere fucihi bade amba culaga isabufi, tede sain 55: + hese tacibume wasimbure-be bulekušereo. ergengge šajin-be 56: jirgabume, šajin-be jafaha uklige ejete ishunde hūwaliyara, 57: + ejen han, juwe enduringge-i baita-de, jalan wajitala faššara 58: hūturi fengšen, enteheme akdun obure-be bulekušereo. hūba, 59: šuru erihe, ashara jebele, enggemu hadala tohoho morin, 60: sehebi.

二 汉译

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臣宗室鄂飞[①]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拉藏[②]奏疏内称：启奏皇上明鉴。在历代前世以来善行福祉齐备、宝贝文雅之身稳健如须弥山、以正善学法安抚生灵、如天曼殊师利大皇帝[③]足前跪奏。因仁慈之日常照无边清空，故教法生灵之安详如莲花盛开。因良旨如甘露，率土之民欣慰承接。仰赖大皇帝仁慈之力与二圣者[④]

---

① 据《清圣祖实录》载，鄂飞为镇国公马尔图子，康熙六年正月甲午被封为三等奉国将军，三十三年闰五月辛未任镶蓝旗蒙古副都统，三十八年九月戊午调任正红旗蒙古副都统，三十九年十二月壬戌改任正黄旗满洲副都统，四十年二月丁卯升为汉军都统，四十年九月壬子调任正黄旗满洲都统，四十一年九月己酉朔升任领侍卫内大臣，四十六年六月丙午袭其弟辅国公爵，五十二年十月卒。据此奏折，康熙四十四年时，鄂飞以领侍卫内大臣兼议政大臣。

② 1642 年，和硕特蒙古首领顾实汗征服西藏，登上藏王宝座。1655 年，顾实汗去世，1658 年其长子达延汗即位，1668 年去世。1671 年达延汗之子达赖汗即位，1701 年去世。1703 年其子拉藏即位，成为和硕特汗廷最后一位汗。1717 年被准噶尔远征军所杀。

③ "曼殊师利大皇帝"是西藏奏疏中专指清朝皇帝的称呼，此处指康熙皇帝。

④ 指达赖喇嘛和班禅呼图克图。

之护持，我安然无恙。略奏之缘由：先仙逝之达赖喇嘛，[①] 仰赖皇帝良旨，使教法生灵享福至今。该第巴[②]之情由，其前一切劣迹，虽蒙皇上睿鉴，但竭尽本意奏明。[第巴] 暗中破坏宗喀巴教法，公然离间达赖喇嘛下主持政教之施主与达赖喇嘛，欺侮达赖喇嘛，任意妄行，败坏喇嘛之操守之处，虽言之不尽，但已汇奏。今因第巴此等劣迹，我忍无可忍，招致反目，以致我所派遣随行人员不料身死。其是非如何为之，请予海鉴。嗣后，因弘扬宗喀巴教法之达赖喇嘛年齿尚幼，[③] 皇帝为总统赡部洲之共主，扶之为荣贵之处，请予明鉴。小人我虽欲以善心做有益事，但无济于事。譬喻造福教法生灵之皇帝之谋略度量，如同羽翼丰满之大鹏飞翔，不能使之与小雀之飞相比，我等之益处甚小。皇帝由大慈悲门兴广宗喀巴教法于

① 指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1617~1682）。罗桑嘉措于1617年生于前藏琼结地方。1642年和硕特蒙古顾实汗征服西藏，推翻噶玛政权统治，拥立五世达赖喇嘛建立噶丹颇章政权。藏传佛教格鲁派得到西藏佛教统治地位，五世达赖喇嘛遂成为全西藏佛教领袖。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来到北京与顺治皇帝会晤，顺治皇帝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但喇达赖喇嘛”，授金册金印。1682年圆寂，第巴桑结嘉措秘不发丧，直到1697年才公开发丧。

② 藏文 sde pa，本指部落头目或地区行政长官，又作 de srid（音译为第悉、第司等）。和硕特汗廷时期，第巴为西藏总理政事者，开始时由和硕特蒙古汗任命。顾实汗之子达延汗去世后，和硕特汗权衰微，五世达赖喇嘛乘机掌握了任命第巴之权，1669年任命了和硕特汗廷第三任第巴罗桑图多布。1675年，又任命第四任第巴罗桑津巴。1679年，罗桑津巴卸任，五世达赖喇嘛任命桑结嘉措（1653~1705）为第五任第巴（1679~1705）。桑结嘉措1653年生于拉萨北郊的娘地方，8岁开始师从五世达赖喇嘛学习佛法显密宗，精通佛学、文学、医学、天文历法，有《黄琉璃》《白琉璃》《蓝琉璃》等多部著作。在任期间，维修和扩建布达拉宫，建造五世达赖喇嘛肉身灵塔，校正刊刻《医学四续》。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第巴“秘不发丧”长达16年之久。其间，他找到并秘密培养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1705年，在与和硕特蒙古战争中被俘遇害。

③ 达赖喇嘛指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1683~1705）。仓央嘉措1683年生于藏南门隅之宇松地方。1697年被迎入布达拉宫坐床。1705年第巴被杀后，1706年拉藏汗将仓央嘉措押往北京。一般认为，仓央嘉措行至青海湖畔病逝。

十方，照常弘扬二圣之善事善行，使之较前荣贵，请予明鉴。无知小人我向度量谋略超卓之曼殊师利大皇帝启奏虽难，但倚前世恩缘，犹如雨水有益于海水之上涨，以清白之心具奏，若有非是，请予鉴谅。再，佛法而要者为宗喀巴法。如不召集济法二圣者与持教诸施主，在此第巴行恶之机，干戈相寻，盗贼蜂起，如皇帝不下良旨，则众生灵不获安生。为此，于来年七月初一日，[①] 于此佛地大会盟，届时颁下良旨训示，请予明鉴。众生安居乐业，持教诸施主彼此和睦，为皇帝与二圣者终世效力之福禄得以巩固之事，请予睿鉴。敬进琥珀、珊瑚数珠、佩带撒袋、备鞍辔马。

三 分析与总结

鄂飞奏折里首先引述了西藏、青海方面重要政教人物的几分奏疏，第一个被引的便是上述拉藏汗的奏疏。拉藏汗于 1705 年执杀第巴后，向清廷陈奏事件缘由。拉藏汗称，第巴暗中破坏宗喀巴教法，公然离间达赖喇嘛与蒙古汗王，欺侮达赖喇嘛，任意妄行，败坏喇嘛之操守。同时，拉藏汗向清廷提出了两个要求：一、六世达赖喇嘛年齿尚幼（时 22 岁），恳请康熙皇帝予以扶持，意即恳请不要问罪于达赖喇嘛。这说明，拉藏汗虽然和六世达赖喇嘛与第巴矛盾重重，但是最初还没有把六世达赖喇嘛交给清廷处理的意愿。毕竟，达赖喇嘛在西藏僧俗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拉藏汗不敢轻举妄动，担心对达赖喇嘛的草率处置会破坏他军事胜利带来的成果。二、拉藏汗计划于丙戌年七月初一日（1706 年 8 月 8 日）在拉萨举行蒙藏僧俗大会，希望康熙皇帝届时颁下良旨，也即恳请清廷支持和保护拉藏汗。

---

① 指康熙四十五年（1706）。

第二段：班禅呼图克图奏疏

一 罗马字音写

60：(sehebi.) bancan kūtuktu bithesi norbu-de bufi wesimbuhe bithede, 61： + dergi amba han gosin jilan-i bulekušefi, 62： + tacibure hese-be hanci bisire bithesi norbu ulame wasimbuha 63： + hesei karu wesimburengge, ere ningguci dalai lama bai niyalma-i yabun-i 64：yabume, lama waka, bi neneme 65： + dergi han-i aisin genggiyen-de sume getukeleme wesimbure bithe-be sahahūn 66：honin aniya, ubaci si ning-de hūdašame genehe sukban-de bufi, 67：dorji lama ulame wesimbuhe bihe. te bicibe geli gosin jilan-i 68： + gūnin-de waliyarakū, ambarame gosire 69： + tacibure hese-be lakcarakū gosire-be bulekuše, bulekuše. bithe 70：wesimbure doroi belek šufa suwaliyame alibuha sehebi.

二 汉译

班禅呼图克图①经笔贴式诺尔布②（2）转奏之疏内称：大皇帝仁慈洞鉴，命近随笔贴式诺尔布传宣谕旨，至是回奏。该六世达赖喇嘛行止如凡人，非喇嘛矣（3）。我前于大皇帝金颜前奏明之疏，于癸未年③（4），交付由此赴西宁贸易之苏克班，已转交多尔济喇嘛④（5）上奏。

① 此处之班禅呼图克图，指五世班禅罗桑益喜（1663～1737）。1663 年生于后藏托布加（今西藏自治区南木林县境内）地方。1668 年在扎什伦布寺坐班禅法床。1670 年赴拉萨，拜五世达赖喇嘛为师。

②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庚寅记载，诺尔布曾以理藩院主事身份出使喀尔喀。据《清内阁蒙古堂档》记载，诺尔布曾经出使西藏。《实录》不载此事。

③ 指康熙四十二年（1703）。

④ 指商南多尔济喇嘛。据《清圣祖实录》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癸酉记载，商南多尔济在实录中第一次以“得木齐商南多尔济”身份出现，随同扎萨克喇嘛垂木珠尔拉木扎木巴、副都御史拉笃枯等出使达赖喇嘛。此后多次出使达赖喇嘛和噶尔丹，后作为“驻扎西宁喇嘛”常驻西宁，办理西藏和青海蒙古事。

如今［皇上］仁慈之心又未抛弃我。伏请不断颁赐训旨，大加体恤。鉴之！鉴之！以奏书礼呈进礼物及哈达。

三 总结与分析

1582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第巴“秘不发丧”，对班禅也保密。据《五世班禅传》载，火牛年七月初四日（1697年8月20日），第巴桑结嘉措给班禅来信，说“五世达赖喇嘛业已圆寂多年，我因奉达赖喇嘛遗嘱，秘而为宣。今年我派尼麻唐夏仲进京，向皇上报告了达赖喇嘛圆寂以来的情况。不久六世达赖灵童将经过浪卡子，迎接到布达拉宫坐床”。五世班禅这才知道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多年。九月，班禅到浪卡子（sNa dkar rtse，位于拉萨西南），为仓央嘉措授沙弥戒，与其建立了师徒关系。[①] 但是，仓央嘉措厌恶修道，不听第巴和班禅的教诲，在被要求受比丘戒时，不仅不同意，反而把原先所受沙弥戒也还给了班禅，并公开声称自己不认为自己是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在《清内阁蒙古堂档》中，保存了不少有关此事的珍贵档案。比如，班禅五世给青海和硕特蒙古首领扎西巴图鲁的信中提到，仓央嘉措说：“自我从母胎中降生后说过各种应验的话语等，均为我父母及当地人所言，我不知晓。即使略约记事之后，也绝无［自己为］识一切达赖喇嘛转世之念。因第巴出于某种原因找来［前世］信物品等让我认领，并交给我班禅所撰记载［达赖喇嘛］历代转世之经卷，所以我才到此地步。如照五世达赖喇嘛而行，将合第巴以及内外众人之意。虽说我为转世，但我不好经卷。小时候，照第巴之指教，剃了发，并在班禅面前受戒。此后在班禅和甘丹池巴处学经。在我尽我所能学习应学之各种东西之时，策妄阿拉布坦以降众人都说我变成前世达赖喇嘛一样很难，并向上面大皇帝呈

---

① 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第64页。

奏各种事宜。班禅因未出痘不能迎合皇帝之意而前往［北京］一事，说成是因为第巴和这里的人劝阻所致。所以不颁给我圣旨，而再三给第巴下严厉诏书。众人虽然将这等事向我奏闻，但我称不知道而不接受，［因此］人们说我不听第巴之言。我本无占据五世达赖喇嘛之位之意，亦无骗人讲经授戒之意。所以对修学之事不甚用心。我虽玩各种游戏，但对戒律无碍。心思将来会酿成大过失，故瞒着第巴而来，将［所受之］戒在班禅额尔德尼面前退还。这虽不合第巴以降众人之意，但如此变化之因在郎喇瓦口中甚明。五世达赖喇嘛虽说过第巴与他自己无异，但现在第巴终非达赖喇嘛转世，亦非其根源，此事现在明显。”① 班禅在另一封信中又说，1702 年，达赖喇嘛为受格隆戒（即比丘戒）之事来到藏地。但是，达赖喇嘛向班禅说：“将退还从前所受之沙弥戒。如不答应，我将谢世。此二者中必选其一，然后做答。”班禅无法定夺。达赖喇嘛还将其不仅不受格隆戒反而弃绝从前所受法戒一事写成书，交给了班禅。② 六世的这些奇特行为，自我剥夺了神性，也被当时的政治斗争所利用。

根据此次经诺尔布转奏的文书，班禅喇嘛断言，仓央嘉措“行止如凡人，非喇嘛矣”，这等于宣布仓央嘉措是假达赖喇嘛。这说明，当时班禅和第巴、达赖喇嘛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否则作为西藏佛教头面人物，五世班禅不会向清朝如此轻易和清楚地否定仓央嘉措的达赖喇嘛身份。

第三段：侍读学士荐良奏折

一　罗马字音写

70：（wesimbure doroi belek šufa suwaliyame alibuha sehebi.）

---

① 《清内阁蒙古堂档》第 17 卷，第 68 ~ 71（满文）、71 ~ 75（蒙古文）页。

② 《清内阁蒙古堂档》第 17 卷，第 75 ~ 77（满文）、77 ~ 78（蒙古文）页。

adaha 71: bithei da jiyanliyang sei wesimbuhe bithede, aha-be 72: + ejen-i akūmbume tacibuha hese-be gingguleme ejefi, nadan biyai ice-de, 73: ladzang-ni tehe dam sere bade isinafi, ladzang-ni mergen batur 74: sere jaisang jifi, diba ladzang-ni baru eherefi, ere aniya, aniya 75: biyai tofohon-de, diba, dalai lama-i gisun seme, meni ladzang-be 76: joo-i bade ume bisire, sini akūn deo-de acafi tere, eici 77: aibade genefi terengge sini ciha oso, hasa tuci seme 78: bošoro-de, meni hūsun niyere, sujaki seci muterakū, 79: arga akū ofi hara usu sere bade tucifi tehe 80: manggi, diba ojorakū ofi, geli bošoro-de hafirabufi hara 81: usu bade bisire dalai lama-i suruk-be gaifi joo-i baru 82: dosifi, diba-i coohai emgi ilan mudan afafi gemu 83: diba-i cooha-be gidafi, tanggū niyalma isime waha. 84: diba gelefi dobori dulime burulame tucifi cuwan-de 85: tefi galjoo muren sere bira deri šig'a gungg'ar sere 86: hoton-de genefi tehebi. ladzang ne cooha gaifi joo-i 87: hanci tehebi. ladzang minde afabuhangge, 88: + amba ejen han-i elcin-de gemu diba-i hara usu baci giyamun 89: yalubufi joo-de isibumbihe. te diba burulame tucike-be 90: dahame 91: + amba ejen han-i elcin-be tookabuci ojorakū, elcin isinjiha 92: manggi, ulga tucibufi, niyalma dahalabufi, joo-de isibu, 93: elcin sei yalufi jihe ulga-be bargiyame gaifi sain 94: ongko-de sinda. joo-de isinjiha manggi, bi dalai 95: lama-i baru gisureki sehe seme meni ulga-be alime 96: gaifi ceni ulga-be mende yalubufi nacin sere 97: niyalma-be tucibufi membe beneme nadan biyai ice 98: uyun-de joo-de isinaha. joo-de isinaha inenggi, 99: ladzang ini jaisang hasiha sere niyalma membe okdobume 100: takūrafi 101: + ejen-i elhe baifi alarangge,

ladzang-ni gisun, 102: + amba ejen han-i elcin aika mini jakade dosici ojoroo 103: sehe manggi, be, jaisang hasiha-de enenggi yamjiha 104: jabdurakū, cimari genefi acaki seme alafi unggihe. 105: ladzang ini jaisang hasiha-be geli takūrafi mende 106: + amba ejen han-i elcin-be dahame, muse emu beye adali, 107: ai manggašara babi, udu yamji seme urunakū jidereo 108: sere jakade, be genefi ladzang-de acafi ladzang-de 109: + enduringge ejen membe bancan-de takūrahabi. mini jidere-de 110: + hese membe sinde dosifi aca, wesimbure gisun bici bithe 111: arafi wesimbu seme alaha-de, ladzang mende, be umesi 112: buya aiman urse 113: + ferguwecuke manjusiri amba ejen han mimbe niyalma obume tuwame 114: suwembe minde aca seme gosime 115: + hese wasimbuhangge, bi hukšeme urgunjehe seme wajirakū sefi 116: bancan-de takūraha turgun-be fonjifi, mende diba 117: umesi koimali jalingga ehe niyalma, 118: + amba ejen han-de ududu mudan weile baime yabuha bime, 119: dzungk'aba-i šajin efuleme, fulgiyan mahala-be wesihuleme 120: dalai lama-be hacin hacin-i ehe tacibume yabucibe, 121: + ferguwecuke amba ejen han, umesi gosingga onco ofi geren 122: ergengge-be joburahū seme diba-be utala aniya 123: bibuhe. te mimbe waki seme mutehekū ofi mimbe 124: bošoro-de hafirabufi dalai lamai suruk adun-be gaifi 125: cooha tucibufi diba-i cooha emgi ilan mudan afafi, 126: gemu diba-i cooha-be gidafi kejine waha. diba 127: gelefi burulame tucifi šig'a gungg'ar sere hoton-de 128: genefi tehebi. ne diba meni juwenofi baita kemuni 129: wajire unde, suwe bancan-i bade genefi jidere sidende, 130: eici wajimbi dere. amasi jihe manggi, jai wesimbure 131: turgun-be

suwende alaki seme membe sarilaha. jai 132: inenggi geli membe solifi sarilaha. sarilara-de 133: ladzang mende neneme suweni elcin sede gemu diba 134: giyamun yalubumbihe. te diba burulame tucike-be 135: dahame, bi dalai lamai baru gisureki, dalai lam̃a burakū 136: oci mini ulga-be yalubuki seme hendufi lobdzang 137: keibšun-be hūlafi, meni juleri ere jergi gisun hendufi 138: + amba ejen han-i elcin-be tookabuci ojorakū. si 139: hūdun genefi dalai lame-de ala seme takūraha manggi, 140: jai inenggi lobdzang keibšun meni jakade jifi dalai 141: lama-i gisun, 142: + amba ejen han udu minde takūrahakū bicibe, elcin-be 143: ai gelhun akū tookabumbi. yalubure ulga yaya jaka-be 144: gemu nenehe songkoi bu. geli adarame kunduleci acara 145: babe, si acara-be tuwame kundule seme minde afabufi 146: geli minbe suweni sasa gene seme tucibuhebi seme alaha. 147: nadan biyai juwan duin-de ladzang boo-i baru genembi seme 148: budala-de genefi dalai lama-de hengkilefi juraka. amala 149: ladzing-be booi baru genehekū, cooha gaifi diba-be 150: jafaki seme genehe sembi seme donjifi, orin emu-de 151: dalai lama beye coohalambi seme ceni tubed urse teisu 152: teisu uksin saca etufi amargi baru jurafi genehe. jai 153: inenggi wang jasi batur-i hojihon dzuntar meni jakade 154: jifi mende ladzang beye cooha gaifi diba-be jafame genehe, 155: minde susai niyalma afabufi diba-i tehe bai cala unggifi, 156: diba, diba-i juse, aika burulame tucici dosifi jafa, 157: jafame muterakū oci miyoocalame wa seme unggihe bihe. diba, 158: diba-i juse sargan-be ladzang jafafi taiji darijab 159: hošooci, jai gendun sere emu niyalma ceni juwenofi-de 160: afabufi booi baru gamara-de, darijab

hošooci gendun 161: jugūn-de diba-be sacime waha. diba-i jui awing 162: rincen burulame genere-be dzuntar bi awang rincen erei 163: sargan-be gemu jafafi ladzang-ni baru gamame generede 164: dalai lama beye ududu tanggū niyalma gaifi mimbe amcame 165: genefi awang rincen, erei sargan-be gemu durime gaiha 166: seme alaha. jai wang bihe dalai daicing-ni niyalma 167: jaisang honjin jifi mende diba-be wara-de ini beye 168: sabuha seme dzuntar-i emu songkoi alambi. aha be dalai 169: lama-i ulga-be yalufi bancan-i bade isinafi, bancan 170: +ejen-i elhe baiha manggi, bancan-de 171: +hesei bithe-be afabufi, bancan-de 172: +enduringge ejen-i hese mukden-i fonci sakda dalai lama bancan 173: kūtuktu amasi julesi elcin takūrame utala aniya yabuha. 174: dalai lama akū oho ci, diba umesi jalingga koimali ofi 175: urui holtome yabume emu yargiyan ba akū, kūtuktu sini 176: wesimbuhengge seme inu diba-de ergelebufi wesimbuhengge ofi, 177: ere udu aniya elcin takūrahakū. kūtuktu si daci 178: minde hing seme gūnime yabuhai jihe. uttu ofi, bi 179: inu simbe kemuni gūnime cohome kūtuktu sini jakade 180: saimbe fonjibume takūraha seme 181: +hese wasimbuha manggi, bancan meni baru mini eiten babe 182: +ferguwecuke amba manjusiri ejen han gemu bulegušehebi, 183: +amba ejen han daci mimbe umai teisu akū gosihai jihe. 184: te geli mini saimbe fonjibume takūrahangge urgunjehe seme 185: wajirakū seme membe sarilaha. jai inenggi ini dzumbun-be 186: takūrafi mende 187: +amba ejen han, membe elcin takūra sehebio akūn seme 188: fonjiha-de, be 189: +enduringge ejen-i hese suwe elcin takūraci, membe gajime 190: jio sehe seme alaha. bancan membe geli ududu

mudan 191: sarilaha. meni amasi jiderede bancan mende 192: + amba ejen han mimbe gosime mini sain-be fonjibume 193: + sain hese wesimbuha-de bi uthai 194: + ejen han-i elhe baime elcin takūraci acambihe. meni ubaci 195: daci emgeri, dalai lama-ci enculeme elcin takūraha 196: ba akū, 197: + ejen han inu bulekušembi. dalai lama-i emgi hebešefi dalai 198: lama takūraki seci, te ladzang, diba-i baita-de meni 199: tubed-i urse ambula joboro jakade, niyalma, ulga, inu 200: laka seme baharakū-be dahame, de elcin takūrame 201: banjinarakū, ere turgun-be 202: + amba ejen han-de wesimbureo. mini wesimbure bithe, jafare 203: fucihi, šaril, šuru erihe, hiyan, cengme-be gamafi wesimbureo 204: seme mende bure-de, be bancan-de 205: + enduringge ejen-i hese suwembe elcin takūraci gajime jio 206: sehe. umai wesimbure bithe, jafara jaka-be gajime 207: jio sehe ba akū. uttu-be dahame, be gamaci 208: ojorakū sehe manggi, bancan mende 209: + amba ejen han mimbe debali gosime, 210: + sain hese wesimbuhangge, bi damu 211: + ejen-i tumen tumen sei jalin inenggi dobori akū jalbarime 212: ging hūlara debala, heni karulame muterengge waka, jaka-be 213: + hese akū seci nakaki, fucihi šaril-be, bi 214: + ferguwecuke amba manjusiri ejen han-i jalin hing seme jalbarime 215: jafarengge-be dahame, wesimbure bithe suwaliyame urunakū 216: gamarao seme dahūn dahūn-i baire-de, aha be 217: ayusi fucihi emke, šaril sunja, wesimbure ilan bithe-be 218: gajiha. bithe-be tuwaci, 219: + elhe-be baime ladzang, diba-i turgun-be donjibume, jai 220: + dele jafara jaka-be, membe 221: + hese akū seme gajihakū sere jergi gisun-i arahabi 222: be jasi lungbu-ci tucifi

joo-de isinjiha manggi, dalai 223: lama jasi cering sere niyalma-be, lobdzang keibdzun-i sasa 224: takūrafi mende alahangge, 225: + dergi ejen-i elhe baireo, jai diba umai ladzang-be 226: oktolohakū bime, ladzang imbe diba oktoloho seme 227: eherefi afandufi, geren-be jobobure-de, bi ladzang, diba-I 228: baru geren ergengge-be ume jobobure, bi diba-be 229: joo-ci tucibufi šig'a gungg'ar -de taka tebufi suweni 230: ere turgun-be 231: + dergi ejen han-de wesimbufi adarame 232: + hese wasimbuci tere songkoi oki seme gisurere-de, ladzang diba 233: gemu dahafi 234: + dergi-ci gosime diba-de buhe doron ejehe-be budala-de 235: asarafi diba-be taka šig'a gungg'ar-de tebuhe. ladzang 236: booi baru genembi seme minde hengkilefi juraka bihe. gūnihakū 237: ladzang jalingga ehe gūnin tebufi mimbe holtofi dobori dulime 238: genefi diba, diba-i hehe juse-be suwaliyame jafafi 239: diba-be waha. bi umesi bucehe adali gūnimbi. 240: meni tubed-i urse elemangga mimbe ladzang-ni emgi 241: hebešefi diba-be waha dere seme gisurerengge bi sembi. 242: uttu ofi bi geren miyoo-i lamasa-be gemu isibufi 243: diba-i jalin ging hūlabufi, bisire akū jaka-be gemu 244: lamasa-de salbume buhe. 245: + ferguwecuke ejen han daci sunjaci dalai lama meni tubed-i 246: geren urse-be gosihai jihe-be dahame, bi se asigan 247: ulhicun akū bicibe, nenehe dalai lama be-gūnime meni 248: tubed urse-be adarame gosirengge 249: + ferguwecuke ejen han bulekušereo. ere turgun-be mini jalin-de 250: wesimbureo seme, mende cengme-i jergi jaka benjihe-be, 251: aha be, jihe niyalma-de 252: + dergi ejen membe umai suweni dalai lama-de takūrahakū-be 253: dahame, be

suweni ere gisun-be wesimbuci ojorakū, 254: meni jihengge suwende umai baitakū-be dahame, suweni jaka-be 255: gaira ba akū seme hendufi, benjihe jaka-be bederebuhe. 256: tuwaci tubed-i urse gemu ladzang-de umesi gelembi. 257: dalai lamai baita-be fujurulame mejige gaici, dalai 258: lama, diba-i sargan jui-de latufi yabure-de, 259: dalai lama-be dahara haha jui lawang inu latufi 260: yabure jakade, diba, junggin danjin ombo, awang namjun, 261: doronai, gajinaba, teibun se-i emgi hebešefi, lawang-be 262: waki seme tašarafi, lawang-ni dahaha haha jui-be waif, 263: geli lawang-be amcafi, lawang-ni meiren-be sacifi lawang 264: bucehekū. dalai lama ere baita-be ududu biya baicafi 265: teni bahafi ladzang-de afabufi, junggin danjin ombo-i 266: jergi sunja niyalma-be wara-de, ere sunja niyalma gemu 267: diba-de umesi sain ofi, diba ese-i ergen-be 268: guwebureo seme baiha-de ladzang ohakū wara jakade 269: erci kimulefi ladzang-be oktolohu ba yargiyan sembi. 270: duleke aniya ts'ewang rabtan, ini akba sere emu 271: lama-be, bancan, ladzang, dalai lama, diba se-i 272: saimbe fonjime ayuki-be dailafi etehe turgunde, ging 273: hūlabume takūraha sembi. meni joo-de isinaha ucuri, 274: ts'ewang rabtan geli, ini cagan danjin sere niyalma-be 275: takūrahabi. mejige gaici, ladzang, diba-i emgi ehereke-be 276: donjifi mejige gaime, bancan, ladzang, dalai lama se-i 277: sain-be fonjibume takūraha sembi. ladzang ini jaisang 278: tegus-be cagan danjin-i sasa ts'ewang rabtan-de takūrahabi. 279: dalai lama arki nure omime hehesi-de balai yabume ojoro 280: jakade tubed-i urse gemu ladzang, diba-i baita-de meni 281: tubed urse

wabugangge wabuha, jocihangge jociha, dalai 282: lama seci gūnin cihai balai yabumbi, geren miyoo-i lamasa 283: tafulame jombucibe, geli gisun gairakū, eici meni jocire giyan 284: ofi, uttu dere seme ambula gasandonbi. Joo-ci dam-de 285: jifi tuwaci, ladzang inu dalai lama-de genehunjeme, ini fejergi 286: urse-be gemu emu bade bargiyafi tebuhebi. ini fejirgi urse 287: inu ambula geleme seremšembi. meni amasi jiderede, ladzang 288: mende diba mimbe han obufi, dalai lama-be cakir badun han-i 289: besergen-de tebufi, ini sargan jui-be dalai lama-de bufi, 290: dalai lma-be salifi yabuki seme minde umesi sain bihe. 291: cara aniya dalai lama-be dahara haha jui lawang-be 292: diba waki seme junggin danjin ombu sede afabufi sacibuha 293: turgun-de, dalai lama minde afabufi, junggin danjin ombu 294: sebe waha. ereci diba minde kimulefi mimbe waki seme oktoloho. 295: jabšan-de emci dangmunai-i-de dasabufi sain oho. bi 296: diba-be jafara jakade, absi obure babe 297: + dergi ejen-de wesimbufi 298: + hese-be dahame yabuki seme gūnifi mini fejergi gendun sede 299: afabufi, boo-i baru gamara-de, gendun se kimun-be gūnime 300: diba-be waha. diba-i juwe sargan, ilan haha jui, emu 301: sargan jui mini jakade bi. diba-i ahūnga jui masur ts'ewang, 302: buruleme tucike. jacin jui awang rincen-be jafafi gajire-de, 303: dalai lama durime gaifi, ne budala-de bi. mini ere 304: turgun-be 305: + dergi ejen gosime bulekušerio. jai dalai lama se asigan, sakil-be 306: bufi bai niyalma ofi balai yaburengge, geren-i gūnin-de 307: acarakū, ere gemu dib-i ehe tacibuhangge. 308: + detgi ejen bulekušehe akūngge akū. 309: + ejen gosime dalai lama-de

tacibure 310: + hese wasimburakū oci, tubed-i urse-de tubentele ergere inenggi 311: akū ombi. bi ere jergi turgun-ne 312: + dergi ejen-de ishun aniya culgan acafi, dalai 313: lama-be adarame obuci acara-be 314: + genggiyan-i bulegušefi gosime tacibure 315: + hese wesimbure-be baime wesimbuki sem, mini fejergi erke 316: sere taiji-be suweni sesa 317: + dergi ejen-i elhe baime bithe wesimbume belek jafame 318: takūrambi. 319: + hese adarame wasimbuci dahame yabuki. bi ts'ewang rabtan-i 320: elcin cagan danjin-de 321: + ferguwecuke amba ejen han muse-be uherilehe 322: + ejen-be dahame, uhei hukšeme nikefi jirgame banjiki 323: seme alafi, 324: + ejen-de wesimbure turgun-be inu alafi unggige. meni 325: ere jergi turgun-be, mini jalin sume wesimbureo. 326: seme membe sarilame kundulefi, ini erke sere 327: taiji-be mini sasa takūrahabi. Bancan, ladzang-ni 328: wesimbure bithe, jafaha fucihi šaril-be si 329: ning-de isinaha manggi, wesimbume unggire-ci 330: tulgiyen erei jalin 331: + donjibume wesimbuhe sehebi.

二 汉译

侍读学士荐良[①]等奏折内称：奴才等谨记皇上尽心教诲之旨，于七月初一日行抵拉藏驻所达木地方。[②] 拉藏属

① 荐良出身不详，康熙四十四年前任内阁侍读学士，并奉命出使西藏。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四十六年六月癸未升“内阁侍读学士荐良为理藩院右侍郎”。四十九年九月丙辰“予故理藩院右侍郎荐良祭葬如例”，大概在此前不久去世。

② 乙酉年七月初一日（1705 年 8 月 19 日）。达木草原位于拉萨以北 150 公里，境内有著名的腾格里湖（纳木错湖），属今西藏当雄县境。和硕特汗王的夏营地位于当雄，这里是在藏蒙古人的主要根据地。

下斋桑墨尔根巴图鲁至，言第巴与拉藏交恶，于今年正月十五日，第巴指称达赖喇嘛之言，令我拉藏勿居招地，与尔兄弟合住或去何地居住，悉听尔便，快出去。以此催逼。时我等力弱，欲敌不能，无奈移住哈喇乌苏[①]地方后，第巴不肯，复又催逼，故被迫取在哈喇乌苏地方之达赖喇嘛所属畜群向招地进发，与第巴兵交战三次，击败第巴兵，斩近百人。第巴惧，星夜逃出，乘船由噶尔招木伦[②]河至日喀贡噶尔城[③]以居。拉藏现率兵驻招地附近。拉藏吩咐我言：大皇帝使臣至，皆由第巴之哈喇乌苏地方乘驿送往招地。今第巴已逃出，然则不得耽误大皇帝之使臣。等使臣至，拨乌拉人畜送之到招地。收取使臣等乘来牲畜，牧以良好水草。到招地后，我向达赖喇嘛言之。遂收我等牲畜，以其牲畜与我等乘骑，派那钦者送我等，于七月九日至招地。抵招地之日，拉藏派其斋桑哈锡什哈来迎我等，请皇上安毕，报称：拉藏言，大皇帝使臣可进我处欤？我等语斋桑哈什哈曰：今天色已晚，来不及，明日去见。言毕遣之。拉藏复遣其斋桑哈什哈报我等曰：既为大皇帝使臣，我等视同一体，何必作难，虽晚亦务必来。我等遂去见拉藏，并语之曰：圣

① 哈喇乌苏，又称黑水，藏名 Nag chu。“澜沧之西为喀喇乌苏，即《禹贡》之黑水，今云南所谓潞江也。其水自达赖喇嘛东北哈喇脑儿流出，东南流入喀木界，又东南流入怒、彝界，为怒江，入云南大塘隘，更名潞江，南流经永昌府潞江安抚司境，入缅国。”即今西藏那曲河，怒江上游。

② 噶尔招木伦即热振藏布。源于嘉黎县，上游段称麦地藏布，流入拉萨河。拉萨河在曲水县驻地附近流入雅鲁藏布江。根据《清实录》，当时人对自麦地藏布至雅鲁藏布江的河流也通称噶尔招木伦。“雅鲁藏布江从南东流，经藏、卫地，过日喀贡噶尔城旁，合噶尔诏母伦江。”（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

③ 日喀贡噶尔城，藏语 gzhi ka gong dkar，明译公哥儿寨，今属于贡嘎县。县政府所在地离拉萨 96 公里。贡嘎县中部为雅鲁藏布江谷地，故第巴乘船由雅鲁藏布江去日喀贡噶尔城。

主遣我等赴班禅处。我来时谕我等进见尔，若有言启奏，则缮疏上奏。拉藏对我等言：我等为小部落之人，蒙神圣曼殊师利大大皇帝将我当人看待，颁恩旨令尔等见我，我不胜感激，喜之不尽。又询问派往班禅处缘由毕，对我等言：第巴极为奸恶之徒，得罪大皇帝数次，且毁坏宗喀巴教法，崇尚红帽，教唆达赖喇嘛种种。神圣大皇帝至仁宽大，惟恐众生受苦，遂留第巴数年。今欲杀我而不能，是以驱逐我，我被迫取达赖喇嘛属下畜群，派兵与第巴兵交战三次，击败第巴兵，俱斩之。第巴惧，逃至日喀贡噶尔城以居。今第巴我二人事尚未完结，尔等至班禅处返回期间，抑或完结耳。迨返回后，再将上奏缘由报尔等知之。言毕，设筵宴我等。次日又宴请我等。宴时，拉藏谓我等言：前尔使臣至，皆由第巴拨驿马乘骑，今第巴已逃出，然则我向达赖喇嘛言之。若达赖喇嘛不与，则我与我处驿马乘骑。言毕，召罗卜藏柯依布尊至，当我等面言上述之语。又言大皇帝使臣不可耽误，尔作速往报达赖喇嘛。言毕遣之。次日，罗卜藏柯依布尊来我处报称：达赖喇嘛言，大皇帝虽未派使臣到我处，但岂敢耽误使臣，其所乘牲畜诸物，俱照前拨给，又应如何款待之处，尔酌情款待之。以此言嘱咐我，复派我与尔等同行。于七月十四日，拉藏称回宅第，赴布达拉叩谒达赖喇嘛毕，起程。后闻拉藏未回其宅第，率兵往捉拿第巴等因以去。二十一日，达赖喇嘛亲征，其所属土伯特[1]等人纷纷擐甲胄起程北去。次日，王扎西巴图鲁[2]之婿樽塔尔来我处报我等曰：

---

① 土伯特指西藏和西藏人，这里指藏人。

② 扎西巴图鲁是顾实汗末子，被清廷封为和硕亲王。樽塔尔是扎西巴图鲁的女婿。

拉藏亲率兵往缉拿第巴，交付我五十人派往第巴驻地，命我，如第巴及其诸子逃出，则进而执之，若不能捉拿，则枪杀之。拉藏擒获第巴及其妻子后，交付台吉达里扎布和硕其及根顿二人押回时，达里扎布和硕其、根顿[①]于途中斩杀第巴。第巴之子阿旺林臣逃，樽塔尔我俱执阿旺林臣及其妻押往拉藏处时，达赖喇嘛亲率数百人追我去，将阿旺林臣及其妻子皆抢取。又原有王爵之达赖戴青属下人斋桑浑津来报我等言：杀第巴时我亲见之。所报与樽塔尔同。

奴才等乘骑达赖喇嘛所给乌拉牲畜行抵班禅处后，班

① 关于第巴被杀，伯戴克根据藏文史料说，蒙古军在贡噶宗抓到了桑结嘉措，押到推龙谷地觉摩隆寺附近，拉藏汗夫人策凌达什下令让巴尔卓喀和硕其杀死了他〔伯戴克（1950），第12页〕。藏文的《第一世嘉木样协巴传》和蒙古文史书《水晶鉴》（相关记载译自藏文的嘉木样协巴传记）记载，一世嘉木样协巴听说桑结嘉措被抓后带往堆龙，立即和哲蚌寺喇嘛们前去向拉藏汗求情。当他赶到堆龙浪孜时，策凌达什告诉他，第巴已被杀，嘉木样活佛非常恼怒（《第一世嘉木样协巴传》，第95～96页；《水晶鉴》，第528页）。但是，拉藏汗始终没有提到嘉木样活佛。根据荐良的报告，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之间的某一天，拉藏汗擒获第巴及其妻子，交付台吉达里扎布和硕其及根敦二人押回时，达里扎布和硕其、根敦二人于途中斩杀了第巴。青海达赖戴青属下人斋桑浑津亲眼看见第巴被杀。另外，根据青海贝勒朋楚克派往西藏使者初呼拉报告：初呼拉到拉藏汗处后，拉藏汗立刻出兵征讨第巴，在拉萨东一日之程的郎坦（应为郎唐）地方，命台吉松塔尔、达里扎布等率军征第巴。台吉松塔尔到时，藏军已列好阵形。双方激战，藏军不敌而逃。第巴闻讯，率其妻儿，避居日喀贡噶尔城。拉藏迅即率五百人部队，并带策旺阿拉布坦使者察罕丹津和初呼拉二人，赶到日喀贡噶尔城，捕获第巴，将其交与辉特台吉伯依巴和达里扎布等，命他们送往其夫人策凌达什处。伯依巴等到拉萨附近的囊其（即囊孜）地方把第巴交给了策凌达什，她命伯依巴等杀死了第巴，取第巴的首、心、胆和两个大腿骨，收藏在拉藏处（《宫中朱批人名包》，档号：4－1－282）。据甘丹寺四十八任主持敦珠嘉措传记记载，第巴被杀的确切日期为七月十九日〔1705年9月6日，伯戴克（1950），第12页〕。综合各方面的资料信息，拉藏汗率五百人在日喀贡噶尔城地方抓获第巴，达里扎布等人把第巴带到拉萨西郊堆龙河谷（今堆龙德庆县堆龙河与拉萨河交汇处以西）的囊孜地方，受拉藏汗夫人之命，将第巴杀害，并取其首级、内脏和大腿骨送至拉藏处。第巴受害时间可能是1705年9月6日。

禅请皇上安，我等将敕书交付班禅毕，宣谕班禅：奉圣主谕旨。自盛京始，老达赖喇嘛、班禅呼图可图往返遣使已有多年。自达赖喇嘛圆寂，因第巴极奸宄，竟欺诳行事，无一实处。即言呼图克图尔所奏，亦为第巴所逼而具奏，故数年未遣使臣。呼图克图尔向来为朕笃行，故朕亦思念尔。是以特遣使赴尔呼图克图处问好。钦此。宣谕毕，班禅对我等言：凡事皆蒙神圣大曼殊师利大皇帝睿鉴。大皇帝向来格外仁爱我，今又蒙遣使问好，喜之不尽。言毕宴我等。次日，遣其属下人祖木本来我处问曰：大皇帝令我等遣使与否！我等语之曰：圣主有旨，尔等若遣使，则令我等携之来。班禅又宴我等数次。我等返回时，班禅对我等言：蒙大皇帝仁爱，颁良旨垂问我好，我应即刻遣使恭请皇帝安，但除达赖喇嘛外，我处从未另遣使臣一次，凡此谅皇帝亦鉴之。欲与达赖喇嘛商议，由达赖喇嘛遣使，然今遇拉藏、第巴之事，我土伯特人众甚苦，故不获适当人畜，今不便遣使。请将此情由，奏报大皇帝。将我奏书、所贡佛尊、舍利、珊瑚数珠、香、氆氇，带往呈进。我等谓班禅曰：圣主有旨，尔等若遣使则带来，并无谕令将奏书及贡物携来。既然如此，则我不可携往。班禅屡求我等言：我蒙大皇帝格外仁爱，颁良旨，我惟为皇上万万岁昼夜祈祷诵经耳，纤毫非能报答者。至于物品，若谓无旨则罢，而其佛尊、舍利，乃我等进神圣曼殊师利大大皇帝者，务请将奏书一并带去。奴才等带来阿育西佛一尊、舍利五个、奏折三件。阅其书，内书有请皇帝安、奏闻拉藏与第巴缘由以及呈进皇上之物因无旨而我等未带去等辞。

我等自扎什伦布行至招地后，达赖喇嘛遣扎西车棱与罗卜藏柯依布尊同至我处报称：请皇上安。又，第巴

未向拉藏下毒，而拉藏以为第巴给他下了毒，于是反目相战，[1] 以害众人。时我对拉藏、第巴曰：勿害众生灵。我将第巴移出招地暂驻日喀贡噶尔，将尔等之情由启奏大皇帝，若蒙颁旨，则照办之。时拉藏第巴俱从。遂将皇上恩赐第巴之印敕存于布达拉，第巴暂驻日喀贡噶尔；拉藏称回归宅第，向我叩毕起程。不料拉藏心怀奸诈诳我，星夜往擒第巴并其妻子，斩杀第巴。我心甚失望。我土伯特人众反言我与拉藏谋杀第巴。是以我召各寺庙喇嘛等齐集，为第巴诵经毕，将所有之物散给诸喇嘛。五世达赖喇嘛、我土伯特之众向蒙神圣皇帝体恤至此。我虽年幼无知，但念前世达赖喇嘛，如何惠爱我土伯特人，请神圣君主皇帝明鉴。恳将此情由代我转奏。言毕，送给我等氆氇等物。我等向来人曰：皇上未将我等派往尔达赖喇嘛处，尔等之言我等不可启奏。我等来此，于尔等无涉，故不便受尔等之物。遂退回其所送之物。

看得土伯特人众皆甚畏惧拉藏。访达赖喇嘛事，据言达赖喇嘛与第巴之女犯奸，跟随达赖喇嘛之男童拉旺亦犯奸，故第巴与钟锦丹津鄂木布、阿旺那木准、多罗鼐、噶济纳巴、特依本等商议，欲杀拉旺，而误杀跟随拉旺之男童，复追砍拉旺肩，拉旺未死。达赖喇嘛查此案数月，才破获，将钟锦丹津鄂木布等五人交付拉藏处死。因此五人俱与第巴亲昵，

---

① 第巴通过拉藏汗内侍下毒的事情，各种文献和档案均有记载。这里仓央嘉措否认此事，不符合实际情况。据拉藏汗派往青海的使者特古斯、青海亲王扎什巴图鲁派往西藏的使者萨罕其布等人的报告，他们在西藏时拉藏汗被下毒，后经治疗转好，到达木去疗养，时间在 1704 年（《宫中朱批人名包》，档号：4－1－282）。据藏文嘉木样协巴传记载，是嘉木样活佛治愈了中毒的拉藏汗及其大臣们（《第一世嘉木样协巴传》，第 95 页）。根据拉藏汗自己的说法，治愈他的是名叫当木鼐的额木其（额木其，蒙古语借词，意为医生），这应该是可信的（此人也许是哲蚌寺嘉木样活佛属下）。

故第巴恳求免其身命，拉藏不肯，杀之。从此结仇，用药毒害拉藏事实。[①] 据言，去年策妄阿喇布坦[②]遣其属下喇嘛阿克巴一人问班禅、拉藏、达赖喇嘛、第巴等好，并以征阿玉奇获胜故诵经。我等至招地之际，策妄阿喇布坦复遣其属下察罕丹津。据打听得消息：闻拉藏与第巴交恶，遂遣人问班禅、拉藏、达赖喇嘛等好，以打听消息。拉藏遣其属下斋桑特古思与察罕丹津同往策妄阿喇布坦处。以达赖喇嘛嗜酒好色，妄行无忌，故土伯特人众皆怨言：为拉藏、第巴案，我土伯特人众被杀者被杀，破败者破败，达赖喇嘛则肆意妄行，各寺庙喇嘛等劝谏启发，但又不听，或是我等应该破败，以致如此耳。自招地至达木地方看得，拉藏亦怀疑达赖喇嘛，收其部人等同住一地，其部人等亦大惧以防范之。我等返还时，拉藏谓我等言：第巴欲立我为汗，让达赖喇嘛坐察奇尔巴顿汗（转轮王）[③] 之床，以其

① 第巴派其党羽钟锦丹津鄂木布等人谋杀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男童拉旺，仓央嘉措破案后，令拉藏汗杀死钟锦丹津鄂木布等五人。这事在《宫中档人名包》商南多尔济奏折里也被提及：达赖喇嘛夜里领六七人从他所住布达拉宫到一里以外的招地妄行，突然遭到十余人袭击，达赖喇嘛身边受宠的随从塔尔占鼐被害，其尸骨被扔到路边。塔尔占鼐之弟也被刺伤。达赖喇嘛幸免，逃到第巴家，说如无第巴之命，那些人不敢如此大胆，令第巴查出嫌犯交给达赖喇嘛。第巴虽然答应了，但事后告知达赖喇嘛，嫌犯未能查出。此后达赖喇嘛与第巴交恶（档案号：4-1-282）。这里提到的塔尔占鼐应该是荐良所说“跟随拉旺之男童”，而被刺伤的人正是拉旺，是塔尔占鼐之弟。此事确实发生过，拉藏汗曾向荐良亲口讲过此事。

② 策旺阿拉布坦为准噶尔汗国噶尔丹兄子。噶尔丹东侵喀尔喀时，占据准噶尔故地，与噶尔丹作对。噶尔丹病故后，策旺阿拉布坦继任准噶尔汗国首领。17世纪初，他正在策划侵入西藏，推翻和硕特汗廷，控制达赖喇嘛，以号令蒙古。

③ 察齐尔巴顿（Cakir badun），是梵语 Cakravatin 的蒙古口语形式，意即“转轮”；“汗”是蒙古语的 qaγan。所以，“察齐尔巴顿汗”就是“转轮王”的意思。转轮王的思想起源于古代印度。根据佛典，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由四大洲构成。转轮王降生时，天降宝轮，转轮王依次征服四大洲。征服四大洲者称金轮王，三洲者称银轮王，二洲者称铜轮王，只征服一洲者则称铁轮王。菩萨转世

女与达赖喇嘛，[①] 以控制达赖喇嘛。故曾与我甚为友善。前年，第巴欲杀跟随达赖喇嘛之男童拉旺，交付钟锦丹津鄂木布等砍之，故达赖喇嘛将钟锦丹津鄂木布等交付我杀之。从此第巴与我结仇，欲杀我而下毒，幸为额木其当木鼐治愈。我想既执第巴，如何处置之处，经奏请皇上，遵旨施行。是以交付我属下根顿等押回家时，根顿等念仇将第巴杀之。第巴之二妻三子一女在我处，第巴之长子玛苏尔策旺已逃出，执次子阿旺林臣解来时，达赖喇嘛抢取，现在布达拉。将我此情由，请皇上恩鉴。又，达赖喇嘛年幼，退还戒律，如凡人妄行，与众意不合。此皆第巴教唆所致。皇上无所不明鉴者。皇上若不颁发达赖喇嘛以训示

---

* 在这样的转轮圣王家族里，作为转轮王，引导众生于佛教十善福业之道。著名的伏藏《玛尼全集》中讲到，西藏本是一个没有人类的未经调伏的雪域。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把调伏雪域的重任托付给了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于是亲自幻化而衍化出西藏人类。他为了尽快让有情众生摆脱轮回之苦，必须建造一个安定有序、公平合理的社会。而能够创造这种理想社会的往往是勇武无敌、不输文采的国王、君主，所以菩萨必须化身为转轮圣王，以世俗统治者的面目引导他的臣民皈依正法，走上救赎、解脱的道路。西藏出现的第一位转轮圣王就是吐蕃帝国的赞普松赞干布。但是，西藏历史发展到后来，再没有出现像松赞干布统治下的吐蕃帝国一样统一、强大的世俗政权，西藏社会逐渐走向了全民的宗教化。正因为如此，后世被认为是观音菩萨转世的再不是世俗的政治领袖，而更多的是宗教大德。松赞干布以后的第一位观音菩萨化身是噶当派创始人仲敦巴（1004～1064）。到了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巴桑结嘉措时代，除了吐蕃帝国的赞普以外，被认为观音菩萨转世的无一例外是宗教大德（以上见沈卫荣《一世达赖喇嘛传》，蒙藏委员会编，台北，1996，第198～201页）。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被认定为观音菩萨转世，此后历代达赖喇嘛自然成为观音菩萨转世。由此看来，“转轮王”在西藏有两层含义：一、他是观音菩萨的转世；二、他又是引导众生于佛教十善福业之道的王。仓央嘉措作为达赖喇嘛本来就是公认的观音菩萨转世，那么，第巴让他做转轮王，就是再给他赋予王者的权力。也就是说，让他做西藏政教领袖。这条史料具有重要意义，它透露了第巴的政治计划。

① 据拉藏汗此说，第巴将女儿嫁给了仓央嘉措。前文说仓央嘉措与第巴之女“犯奸”。第巴之女与仓央嘉措有特殊关系大致没有问题。这又说明，仓央嘉措为第巴私生子的说法不属实。

敕书，则土伯特之众将终无宁日。我本欲来年会盟时，将此等情由并应如何处置达赖喇嘛之处，奏请皇上明鉴，恩颁敕谕。故我将遣我属下台吉额尔克与尔等同往奏书请安，呈进礼物。若蒙颁旨则将遵行。我语策妄阿喇布坦使者察罕丹津言：神圣大皇帝既为统驭我等之主，则共同拥戴，赖以安居乐业。又告知启奏皇上之缘由毕，遣之。请将我等上述情由，代我启奏。设宴款待我等毕，遣其属下台吉额尔克与我同行。将班禅、拉藏奏书、所进佛尊、舍利等，除行抵西宁后赍奏外，为此闻奏。

三　总结与分析

侍读学士荐良等于康熙四十四年七月初一日（1705 年 8 月 19 日）行至拉藏汗所住达木地方，于七月九日（8 月 27 日）至拉萨，在那里见到了拉藏汗和他的大臣们以及六世达赖喇嘛的随官。就在荐良他们在拉萨的时候，拉藏汗执杀第巴，收其部人同住一处，拉萨的气氛相当紧张。荐良等从拉萨到日喀则，见了五世班禅喇嘛；自日喀则回来后，又见了拉藏汗和他的大臣、青海亲王的女婿以及六世达赖喇嘛的人。荐良所见的人都是 1705 年事件的当事人，而事件就发生在荐良等人在西藏时。

据拉藏汗说，当初第巴对拉藏十分友善，是第巴推举拉藏为汗的。后面的资料将证实，第巴甚至给拉藏汗起了“成吉思汗”名号。过去人们一直认为，第巴与拉藏向来有尖锐的矛盾，拉藏毒死其兄旺扎勒而称汗，桑结嘉措料到双方矛盾即将上升，于是把第巴职位让给了他儿子，自己暂时退到幕后。看来这种说法不尽正确。第巴于 1703 年临时退位是真。据商南多尔济的一份奏折，是年六月十四日，六世达赖喇嘛遣使青海诸台吉告知，“第巴与众人不合，且年纪已老，故将其第巴之职革退，令其子任第巴。达赖汗之位，欲令其子丹津旺扎勒继承，然伊有病，不明事理，故令其弟拉

藏继位”（《宫中人名包》，档号：4－1－282）。据此，旺扎勒被拉藏毒死是谣言，其实拉藏继位时他还在世（旺扎勒死于1704年）。桑结嘉措退位，不是因为与拉藏的矛盾，而是为了缓和与青海诸台吉的矛盾。我们有理由认为：第巴桑结嘉措为了继续掌控大权，拉拢和麻痹拉藏汗，支持立拉藏为汗，实际上希望他做一名傀儡汗。桑结嘉措的如意算盘可能是，让六世达赖喇嘛做“转轮王”，名义上掌握西藏的宗教和世俗权力，实际上，他自己借“转轮王”达赖喇嘛之名控制西藏政教两界。但是，拉藏汗不甘心做像他父亲达赖汗那样一位无所作为的汗，第巴的计划全部落空。

第巴和拉藏汗矛盾的公开化，是在1703年。当时，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与第巴之女有特殊关系，跟随仓央嘉措的男童拉旺也有染，故第巴与他的同党钟锦丹津鄂木布、阿旺那木准、多罗鼐、噶济纳巴、特依本等人准备除掉拉旺。行动中，拉旺未死，拉旺之兄塔尔占鼐被杀。仓央嘉措经数月调查，破了案，将钟锦丹津鄂木布等五人交付拉藏处死。因五人皆为第巴同党，故第巴为他们请命，但拉藏汗未予理睬，处死了钟锦丹津鄂木布五人。这件事情充分说明，拉藏汗根本不把第巴放在眼里。1704年，第巴企图谋杀拉藏汗，在他食物里投毒，可是仍未得手。1705年正月十五日，第巴指称达赖喇嘛之命，驱逐拉藏汗离开西藏。拉藏汗在拉萨没有足够多的军队，无力反抗，故先退出拉萨，移住那曲河一带。到达那曲河后，从达木根据地召集蒙古军，夺取达赖喇嘛所属畜群，向拉萨进发。蒙古军与第巴藏兵在拉萨附近交战三次，击败第巴兵，斩近百人。后经六世达赖喇嘛调解，第巴将清朝所颁给的印敕存于布达拉宫，避居日喀贡噶尔城，拉藏汗居住招地。七月十四日，拉藏汗赴布达拉叩谒达赖喇嘛后，谎称回宅第，率五百人部队，并带策旺阿拉布坦使者察罕丹津和初呼拉二人，赶到日喀贡噶尔城，捕获第巴，将其交与达里扎布转送到其夫人策凌达什处。在囊孜（今堆龙德庆县堆龙河与拉萨河交汇处以西），策凌达什下令杀死

了第巴，并取第巴首级、内脏和两个大腿骨，送到拉藏那里。据甘丹寺四十八任主持敦珠嘉措传记记载，第巴被杀的确切日期为七月十九日（1705 年 9 月 6 日）。

第四段：班禅呼图克图奏疏

一　罗马字音写

332：bancan kūtuktu-i wesimbuhe bithede，333： + abka niyalmai ujui miyamigan，dergi manjusiri 334： + enduringge han-i umuhun-i genggiyen-de hing seme unenggi 335：gūnin-i niyakūrafi 336：wesimburengge，goro akū，te-i ere forgon-de dzambu-i 337：g'albaras moo-i iletu fujurungga yangsangga，ere amba 338：tib-i šajin ergengge uheri-de sain-i mutebuhe，339： + dergi horon algika，abka na-i erhetu manjusiri 340： + enduringge han，juwe sain isabun-i ferguwecuke yabun，mohon 341：akū untuhun-i dorgici banjinaha beye mandal，aisin 342：alin-i erhetu，tumen tumen šun-i elden-i eldembufi，343：horon hūsun-i ele badaraka gese urhurakū aisin 344：muduri-i aliha 345： + wesihun soorin-de akdun bifi 346： + han-i doro nadan hacin-i boobai-ci banjinaha，aisin 347：kurdun ambarame badarambuha，akdun 348： + hese fafun-i abka na-i gubci-be uherilefi ejelehe，toloci 349：wajirakū sain isabun-i genggiyen，iletu wesihun untuhun 350：dorgici 351： + hese-i bithe，saimbe fonjire belek saikan boconggo juwan 352：gulhun suje-be gosime šangnaha-be，amban jiyaliyang，353：lama lobdzang donrub gelung juwe elcin-be unggihengge，354：isinjire jakade，duibuleci ojorakū 355： + ferguwecuke sain hese-be bahafi alimbaharakū urgunjehe. 356：nimanggi noho bade tehe šigemuni fucihi-i

enteheme 357: doro-be dahame, ging giyangname, hūturi-be baime, bi 358: šajin ergengge jalin, unenggi sain mujilen-i buyeme 359: isanjiha geren lamasa-i emgi ging hūlame, 360: + enduringge amba han-i jalafun-i jalin heulederakū kiceme 361: jalbarime bi. 362: + elhe-be baimbi. tacibume wasimbuha 363: + hese-i songkoi akdacun manjusiri, lama dzungg'aba-i šajin, jai 364: nenehe dalai lama meni uheri 365: + bokda han-ci ebsi, jilame gosime lakcarakū 366: + hese-i bithe, elcin unggime, gosime wehiyeme hūwašabure-de 367: akdafi, meni nimanggi noho bai šajin ergengge gubci 368: elhe taifin-i sebjeleme jiragame bisirede, ere sidende 369: hacingga baita turgun banjinaha-ci ebsi, 370: + hese-i bithe, elcin amasi julesi yaburangge lakcara jakade, 371: mini mujilen ambule jobušocabe 372: + enduringge manjusiri han, fulingga mujilen-i dalibun-be geterembuhe, 373: + genggiyen yasa-i getuken-i sabuha adali, šuwe hafu safi, 374: nememe ambula gosime cohotoi minde saimbe fonjire 375: + hese-i bithe, šangnara jaka elcin-de bufi unggire jakade, 376: enteheme jirgara sebjelere ten-iba baha gese, alimbaharakū 377: urgunjeme ele hukšeme gūnime, 378: + hesei baili umesi wesihun oho. 379: + enduringge han daci dubeda isitala gosihai bihe. bi inu 380: + enduringge han-de, mini gūnin-be tucibume ulame wesimbuhe-be 381: inu bi. jai nenehe sain-i gese, lakcarakū šajin 382: ergengge oyonggongge, manjusiri lama dzungg'aba-i endeheme doro 383: meni gubci isaha lama sei feniyen-be, 384: + enduringge han šumin onco amba gosingga jilangga-i šar sere 385: mujilen-i atanggi bicibe, waliyarakū gūnime tacibure

386：+hese gosin-i isabun-ci，g'angg'a giyang-ni eyen-i adali enteheme 387：lakcarakū，jilame gosire-be bulekuše，bulekuše，bithe wesimbure 388：doroi belek mohon akū jalafun-i etehe ferguwecuke 389：ulhisungge，ayusi fucihi-i beye，hūturingga lima-i 390：enetke-i dulimbai ba-i faksisa-i weilehe adistid-i 391：fujurungga elden badaraka，soorin nikeku etuku nisihai 392：gubci-be karmara，tusa yongkiyaha boobai šaril sunja-be 393：fempilefi niohon coko aniya jakūn biya-i ice hūturingga 394：sain inenggi alibuha sehebi. geli wesimbuhe bithe-de cohome 395：wesimbure turgun，396：+dergi amba han gosime tuwame saimbe fonjime，wasimbuha 397：+hesei bithe-i karu wesimbure，doroi belek-be，nenehe songkoi 398：dahūn dahūn-i juwe elcin-de alibume bucibe，399：+dergi ejen-i hese wasimbuha bade，ubaci elcin unggici 400：gajime jio sehe. umai belek-i jaka-be gajime jio 401：sehe ba akū sere jakade，wesimbure bithe-ci 402：tulgiyen，belek hacin-be jafame mutehekū，buyeme 403：+amba han-i elhe baime wesimbume elcin unggiki seme gūnicibe，404：ere sidende，tubed-i bade efujen oho bime，geli 405：amala absi ojoro-be sarkū ofi，elcin unggire jalin，406：dalai lama-de donjiburakū，uthai ubaci elcin unggici 407：ojorakū-be dahame，408：+elhe baire doroi belek hacin-i gamaci acara jaka-be，elcin 409：sede turgun-be alame buci，wesimbure bithe，fucihi，410：šaril-ci dulgiyen，gūwa jaka-be gamahakū，mini ser 411：sere gūnin-be akūmbume jafara majige belek-be 412：+dele jafame mutehekū ofi，ambula korsocibe，413：+amba han-i genggiyen-de wesimbure oci，mini dolo teni elhe 414：ombi. 415：+

ejen-i gosin umesi šumin onco-be dahame, kemuni giruburakū, 416: + elhe baire doroi majige belek jaka-be jafabureo. ereci amasi 417: kemuni 418: + gosime jilame atanggi bicibe enteheme waliyarakū 419: + genggiyen-i bulekušereo. Sehebi. geli wesimbuhe bithede, cohome wesimbure 420: turgun, ere aniya tubed bai baita, ladzang-ni beye, 421: dalai lama, diba-i emgi ishunde acarakūngge. ladzang 422: diba-be dzungg'aba-i šajin, jai yaya baita-be urui 423: efuleme yabume ofi, ambula korsofi, ishunde eherenduhe-be, 424: bi hūwaliyambuki seme bolgo sain gūnin-i henducibe, diba-i 425: salagabuha giyan ofi, bucehe. ere jergi baita-be, juwe 426: elcin inu saha dere. sehebi.

二 汉译

班禅呼图克图疏曰：在天人顶饰曼殊师利大圣主足前诚敬跪奏。不远之今时，像瞻部如意宝树堂而皇之、成全此大州全体教法生灵、御威宣扬、天地自在之曼殊师利大圣主，二善道之奇行生自无尽苍穹，御体金山自在，犹如以万道日光照耀，威力愈盛，稳坐金海不偏宝座。皇上道统成自七宝，金轮广大，以信实旨法总统天下。自无数集善之明、崇高之上空赐敕问好，恩赏礼物绚丽整缎十匹，遣荐良、喇嘛罗布藏顿鲁布格隆二使臣至。接得无比神圣之良旨，不胜喜悦。谨遵雪地释迦牟尼佛之常道，阐经求福。我为众生，诚心愿与至此诸喇嘛诵经，为神圣大皇帝之寿，勤勉不怠以请上安。照依所颁敕书，可信之曼殊师利大喇嘛宗喀巴之教法及前世达赖喇嘛等，自博克达汗[①]

① 指清太宗皇太极。

以来，荷蒙体恤，颁敕遣使不断，仰赖矜悯扶育，我雪地众生咸安居乐业。此间百案丛生，敕书及使臣往来遂断。我心虽甚忧戚，但蒙神圣曼殊师利大皇帝以天心削弭隔阂，明察秋毫，愈加体恤，特遣使颁敕问好、赏物前来，如获永享安逸之地，不胜喜悦，愈加感念，以皇恩致尤尊。圣主始终轸恤，我亦将愚意转奏于圣主之事亦有之。又如前好，以众生为要，将曼殊师利大喇嘛宗喀巴恒业、我等聚集之喇嘛群，圣主宽大仁慈恻然之心，终究轸念不弃，不断颁敕集仁，犹如恒河之水，长流不息。望鉴之！鉴之！以奏书之礼，备办礼物无量寿胜神惠阿育锡佛身，有福利玛之梵中地方匠役等所造闪耀阿迪斯特懿光连位靠衣裳，保群全益之宝舍利五个封固，于乙酉年八月初一日[①]呈进。等语。

又有疏称：特奏缘由。蒙天朝大皇帝轸念颁旨问好，以回奏之礼，照前备办礼物，屡次呈给二使臣，但言大皇帝有旨，从此处遣使则带来，未令带礼物来。是以除奏书外，未能进礼物，虽欲愿遣使奏请大皇帝安，但此期间，土伯特地方败敝，且又不知日后如何。至于遣使事，若不报达赖喇嘛知之，便不可从此处遣使去，故为请安之礼，备办应带礼物，交付使臣等，并报告其缘由，但除奏书、佛尊、舍利外，余物未带去。将我聊表微意而进之些许礼物，未能呈进皇上，故甚懊悔。但能启奏大皇帝，我内心才安矣。皇上之仁至深极宽，请准仍以请安之礼呈进些许礼物。嗣后仍予矜悯，终究不弃。请明鉴之。

又有疏称：特奏缘由。今年土伯特地方之事，拉藏自身与达赖喇嘛、第巴不睦。以第巴破坏宗喀巴之法及其诸

① 即康熙四十四年八月初一日（1705年9月18日）。

事，拉藏甚恨之，故相与交恶，我欲调和，以善意说之，但第巴命中注定，遂死。将此等事，二使臣亦知之矣。

三 总结与分析

清朝派荐良和喇嘛罗布藏顿鲁布格隆二使臣到拉藏汗和班禅喇嘛处，而有意未向六世达赖喇嘛遣使，显然是为了孤立第巴及其所立达赖喇嘛。早在1693年，清廷就正式遣使延请五世班禅喇嘛到北京，后来又多次召请，但因为第巴的阻挠，五世班禅未能成行〔五世班禅未能晋京原因，请参考冯智（1998）〕。五世班禅对清朝使者表示，因为第巴的缘故，清朝曾中断了给班禅喇嘛颁给敕书和派来使节，但至此清廷“赐敕问好，恩赏礼物”，使他不胜喜悦。同时，班禅喇嘛表示，他不能越过达赖喇嘛单独派使臣到清廷，所以恳请清朝使者能给康熙皇帝带上他的“请安之礼”。至于拉藏汗与第巴交恶的原因，班禅明确说“第巴破坏宗喀巴之法及其诸事，拉藏甚恨之”，所以第巴之死是“命中注定”的。五世班禅的立场与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完全相反，他实际上是站在拉藏汗一边的。

第五段：达赖喇嘛给扎西巴图鲁与青海诸台吉书

一 罗马字音写

426：（elcin inu saha dere. Sehebi.）dalai lama sere niyalma, wang 427：jasi batur-de unggihe bithede, jasi batur taiji-de 428：unggihe. Ere aniya ladzang, tubed-de coohalaha turgun, 429：diba ladzang-be, joo-I baci bošoro jakade, tereci 430：kimutulehe. Bi daci ladzang-de ehe akū ofi, ladzang 431：coohalame hanci isinjifi, minde ehe koro arahakū bicibe, 432：bi, diba-i emgi emu ofi, tereci adarame encu ume 433：mutembini. Ladzang-ni emgi kimutulehemgge, ladzang ehe waka 434：baita deribuhe

bime, iletu ladzang, mini gisun-be gaihakū, 435: elemangga mende aten ehe gisun nikebure jakade, membe ehe-i 436: ten-de isibuha. Jai diba-be waha jergi baita-de, 437: mini emgi ereci amasi jalan halame kimun oho. Ladzang, dalai 438: lama-i šang suruk-i ulga-be gemu tabcilaha. Oyonggongge, 439: sini ama mafa-I yabuha sain baita-be efulehe-ci 440: tulgiyen, ladzang yaya bade bici, mende koro arara-ci 441: tulgiyen, tusa ojoro ba akū, uttu ofi, yaya 442: baita-be doigonde bodome gūninjaci acambi. Ere jergi 443: turgun-be, dorji lama-de ulame alafi, 444: + dele wesimbufi donjibuci ojoroo. Akdun-i gosingga mujilen-de 445: tebuhe. Ildun-de saimbe lakcarakū jasireo. sehebi. Dalai 446: lama sere niyalma huhu noor-i geren taijisa-de unggihe 447: bithede, geren amba ajigen ūklige ejen-de unggihe. 448: ladzang-be dalai han-i oronde tebuhengge, tubed-de 449: tusa ojorao seme gūnifi tebuhe bihe. Diba-i waka 450: yabun-de anagan arame tubed-de coohalaha. Geren-be 451: wahangge-be waha, giohoto obuha. Iletu diba, ladzang-be 452: dalai han-i oronde tebure jakade, tereci horon hūsun 453: yongkiyafi, yaya jaka-be ejeleme yabuha bime, mimbe daburakū 454: diba-be jafafi waha. Te bicibe tubed-de coohalambi 455: sere-be dahama, ladzang-be bai sindaci, tubed-i ba 456: toktorakū-be dahame, suweni da gūnin yargiyan oci, 457: te tusa arara erin oho. akdun-i gosin mujilen-de 458: tebuhe. sehebi.

二 汉译

有称达赖喇嘛之人致书于王扎西巴图鲁云：致扎西巴

图鲁台吉。今年征土伯特之缘由：第巴由招地驱逐拉藏，故从此结仇。我向与拉藏无嫌隙，拉藏发兵至近处，虽未伤害我，但我与第巴一心，岂能离之耶？所以与拉藏结仇，是因拉藏滋启衅端，且显然不听我言，反以种种恶言诬我，致使我等处于极恶之境。再于杀第巴事，嗣后与我结为世仇。拉藏尽掠达赖喇嘛商①上牲畜。要紧者，除破坏尔父祖辈所行善事外，拉藏无论在何地，除伤害我等外，别无益处。是以凡事应预先想好。将此等情由，请转告多尔济喇嘛，可以奏闻皇上。信之仁记于心，乘便不断寄信问好。

有称达赖喇嘛之人致书于青海众台吉②云：致众大小施主。所以令拉藏继达赖汗位，是念及于土伯特有益，故令即位。以第巴恶行为借口，发兵土伯特，将众人杀者杀之，[沦为乞丐者] 沦为乞丐。显系第巴令拉藏继达赖汗位，从此威力全备，凡事专擅，且不令我干预，执第巴杀之。如今扬言发兵征土伯特，若白放过拉藏，则土伯特地方不得安定。尔等本意若实，则今正值效力之时。信之仁记于心。

三　总结与分析

这两封信大概没有盖印，所以被说成“有称达赖喇嘛之人”写的。如果真的是出自仓央嘉措之手，那么，该信的内容关系重大。据此信，仓央嘉措告诉青海蒙古上层贵族，“拉藏无论在何地，除伤害我等外，别无益处”，“尔等本意若实，则今正值效力之时”。他显然意欲煽动青海蒙古人起兵推翻拉藏汗。

---

① 商，藏文文献中以此泛称西藏地方政府。

② 青海众台吉，以顾实汗诸子“西海八台吉”为首的青海和硕特蒙古。

第六段：商南多尔济奏折

一　罗马字音写

458：（tebuhe. sehebi.）lama šangnan dorji-i narhūšame wesimbuhe 459：bithede，460：+ donjibume wesimbure jalin，ere aniya omšon biyai juwan uyun-de，461：cin wang jasi batur，ini dasi sere niyalma-be takūrafi，462：dalai lama-i hūbilgan，wang-de unggihe juwe tanggūd-i 463：bithe-be gajime，si ning-de isinjifi alarangge，taiji 464：dzungtar，meni wang-ni niyalma mamut-de narhūšame anggai 465：jasiha gisun，si wng-de ala，ladzang，ts'ewang rabtan-i 466：baru ambula sain，ishunde niyalma takūrame yabumbi. baita 467：boljoci ojorakū，ishun aniya niyanciha tucime gorokon 468：karun sindame seremšeci acambi sehebi.

二　汉译

喇嘛商南多尔济秘奏内称：为奏闻事。于今年①十一月十九日，亲王扎西巴图鲁遣其属下人达西携带遗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及王之唐古特文②书二件至西宁报称：台吉樽塔尔托我王属下人马木特密传口信曰：尔转告王，拉藏与策妄阿喇布坦甚好，彼此遣人往来，事将叵测。俟来年青草萌发，应略远设哨兵以防之。

第七段：达赖喇嘛给青海诸王台吉书

一　罗马字音写

468：（karun sindame seremšeci acambi sehebi.）jai dalai

① 指1705年。

② 即藏文。

lama-i 469：hūbilgan, ini dural sere jaisang-be k'am-i jugūn deri 470：takūrafi, huhu noor-i wang, geren taijisa-de ala sehe 471：gisun, ladzang, meni tubed- i gurun-de jifi umai emu 472：sain baita yabuhakū. diba juwenofi ishunde acarakū turgunde, cooha 473：ilifi tubed-i gurun-be dailaha. šang-ni suruk, ulin-i jergi jaka-be 474：yooni tabcilame gaiha. geli mimbe eiterefi gaitai dobori dulime ši 475：k'a gungg'ar hoton-de genefi, diba-be jafafi waha. te kemuni meni 476：tubed-i urse-be ergemburakū jocibuki sere gūnin bi. ere jergi babe, wang si 477：+ dergi ejen-de wesimburakū oci, tubed-i gurun gubci bahafi ergerakū 478：ombi. suwe minde aisilaki sere gūnin bici, te aisilaci acambi. akū 479：oci, bi yaya emu bade jailame genefi tere ci tulgiyen, bi inu 480：karmame teci ojorakū ohobi. Wang, si dorji lama-de alafi, ulame 481：+ dergi ejen-de donjibureo sehebi. ere gisun-be mimbe inu dorji 482：lama-de ala sehe bihe. te mini beye nimerengge unjen, 483：yabuci ojorakū-be dahame, wang, niyalma takūrafi alanaci 484：ojoroo seme alanjihabi.

二 汉译

再，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遣其属下斋桑杜喇尔由喀木路往报青海王、诸台吉曰：拉藏至我土伯特，未行一善事，第巴二人彼此不和，故兴师征土伯特部，尽掳商上牲畜财货等物。又诳我星夜突至日喀贡噶尔城，执第巴杀之。今仍有不令我土伯特人众安逸，以陷于困境之意。将此等事，王尔若不启奏皇上，则全土伯特将不得安宁。尔等若有助我之意，则今应助我，否则，我除避往某一地以驻外，我亦不能驻此保护。请王尔以报告多尔济喇嘛，并

转奏皇上以闻。曾令我将此言亦报告多尔济喇嘛。今我身病重不能行，可否王遣人往报。

三　总结与分析

仓央嘉措的这封信说明，前文提及的所谓“有称达赖喇嘛之人”应该就是仓央嘉措本人。因为两封信的主旨完全一致，就是希望青海蒙古能够支持他。上一封信里说，“尔等本意若实，则今正值效力之时”，而在这封信里则写道：“尔等若有助我之意，则今应助我。”可见，在1705年事件以后，仓央嘉措曾经策划争取青海蒙古，武力推翻拉藏汗的统治。

第八段：议政大臣鄂飞等议奏

一　罗马字音写

484：（ojoroo seme alanjihabi.）aha bi，kimcime gūnici，jaka 485：+ enduringge ejen-i gala-i arafi wasimbuhangge，ladzang，ts'ewang rabtan-i 486：fiktu baire-de sengguwerakū sere ba akū，gūwa gūnin-be boljoci 487：ojorakū bicibe，ainahai ehe gūnin bini sere 488：hese-de acanambi. baita yargiyan dasan boljoci 489：ojorakū bicibe，wang cohome niyalma takūrafi alanjiha-be 490：tahame，wesimburakū oci ojorakū. uttu ofi，dalai lama-i 491：hūbilgan，wang jasi batur-de unggihe tusu gidaha tanggūd-i 492：bithe emke，huhu noor-i geren taijisa-de unggihe 493：tanggūd-i bithe songkoi sarkiyame araha bithe 494：emke-be，suwaliyame narhūšame gingguleme 495：+ donjibume wesimbuhe sehebi. elhe taifin-i dehi duici 496：aniya，jorgon biya-i orin ilan-de，497：kiyan cing men-i hiya rasi se-i ulame 498：+ hese wasimbuhangge，ladzang-ni wesimbuhe baita-be hebe-i 499：ambasa kimcime tuwafi gisurefi

wesimbukini, jai ladzang-ni 500: elcin huhu noor-i wang beile beise gung taiji sei 501: elcin uheri-de, hebe-i ambasa suwe hese-be ulame wasimbu. te 502: ladzang, diba-be wafi ilinjahangge, dalai lama yargiyan 503: tašan-be sarkū turgunde lasahalame muterakū ofi baime 504: wesimbuhebi. te ladzang-de diba-i buhe cinggis han 505: sere gebu-be halafi, ini amai dalai han-i colo bure. 506: dalai lama-be ubade benju. dalai lama yargiyan, tašan-be 507: bi tuwafi, eici cakir badun han obure, eici dalai 508: lama obure babe tuwafi toktobuki seme ohode, suweni 509: taijisa uthai hese-be dahafi benjimbio. elcin sa suwe 510: buya niyalma adarame lasahalame mutembi, suwe gūnici ai 511: sembi seme, suwe uhei fonjifi wesimbu sehebe gingguleme dahafi, 512: amban meni uhei acafi gisurehengge, ladzang-ni wesimbuhe 513: bithede, nenehe sain-i bederehe dalai lama 514: + ejen han-i sain hese-de akdafi, šajin ergengge-be 515: tetele jirgabume bisire-de, diba, dergi dzungk'aba-i 516: šajin-be efuleme, ini gūnin cihai yabuha babe 517: gisureci wajirakū. bi kirici ojorakū ofi, efujen 518: banjinafi, mini dahabuhangge-be gūnihakū sidande 519: takūraha niyalma bucebure-de isibuhabi. Uru, 520: waka-be adarame obure babe, amba onco mederi 521: gese bulekušereo. ereci amasi dzungk'aba-i šajin-be 522: badarambure, dalai lama-i se ajigen, 523: + ejen han dzambutib-be uheri ejelehe-be dahame, wehiyeme 524: wesihun sain obure-be bulekušereo. buya niyalma bi, 525: sain gūnin-i tusa araki secibe oyomburakū, 526: + ejen han amba gosingga duka ci dzungk'aba-i šajin-be 527: juwan ergide badarambure, juwe enduringge-i sain baita 528: yabun-be an-i

badarambume, neneheci wesihun obure-be 529: bulekušereo. jai dzungk'aba-i šajin-de tusa ojoro, 530: juwe enduringge šajin-be jafaha ūklige ejete-be 531: isabufi, diba-i ehe waka yabun-i urkin-de, dain 532: cooha hūlha holo labdu oho babe, 533: + ejen han sain hese wasimburakū oci, ergengge šajin 534: taifin elhe bahafi banjirakū jalin-de, ishun aniya 535: nadan biyai ice-de, amba culgan isabufi 536: tede sain 537: + hese tacibume wasimbure-be bulekušereo sehebi. 538: kiyan cing men-i hiya rasi sei ulame 539: + hese wasimbuhangge, ladzang-ni wesimbuhe baida-be, hebe-i 540: ambasa kimcime tuwafi gisurefi wesimbukini. jai ladzang-ni 541: elcin, huhu noor-i wang, beile, beise, gung sei elcin, 542: uheri-de hebe-i ambasa suwe hese-be ulame wasimbu. te ladzang 543: diba-be waif ilinjahangge, dalai lama-i yargiyan tašan-be 544: sarkū turgunde lasahalame muterakū ofi baime wesimbuhebi. 545: te ladzang-de, diba-i buhe cinggis han sere 546: gebu-be halafi, ini ama-i dalai han-i colo bure. 547: dalai lama-be ubede benju. dalai lama-i yargiyan 548: tašan-be bi tuwafi, eici cakir badun han obure, 549: eici dalai lama obure babe tuwafi toktobuki seme 550: ohode, suweni taijisa uthai hese-be dahafi, 551: benjimbio. elcisa suwe buya niyalma adarame lasahalame 552: mutembi. suwe gūnici ai sembi seme suwe uhei 553: fonjifi wesimbu sehebe gingguleme dahafi fonjici, elcin sei 554: gisun, 555: + ejen-i hese-be meni geren taijisa daharakū sere ba 556: akū. 557: + hese ai seci uthai ai dabala, damu dalai lama sere 558: gebu bisire-be dahame, meni jergi buya urse, 559: adarame bahafi sambi. cinggis han sere gebu, diba-i 560: buhe gebu. 561: + enduringge ejen

gosime ladzang-ni amai dalai han-i colo-be 562: buci, ereci wesihun ningge geli bio sembi. amban be 563: gingguleme gūnici, 564: + ferguwecuke ejen-i hese wasimbuhangge umesi akūmbuha-be dahame, 565: gemu 566: + dergi hese-be gingguleme dahafi yabubuci acambi. jai 567: bancan kūtuktu, bithesi norbu-de bufi wesimbuhe 568: bithede, ere ningguci dalai lama, bai niyalmai yabun-i 569: yabume, lama waka sehebi. musei elcin jiyaliyang, 570: norbu sei donjihanggi, diba, ladzang-ni coohalaha-be 571: donjifi, diba ini beye coohalafi, emu bithe arafi, 572: ini juwe šanggun-de bufi, ši g'a dze sere 573: hoton-de diba darba-de bu, bi ladzang-be 574: gidaci, suwe bancan-be jafafi joo-de benju, 575: rasi lungbu miyoo-i geren lama sabe wa seme 576: afabuha bithe-be tašarame bancan-de benehe. 577: bancan donjifi ūyo sere bade jailafi tehe 578: sehe sembi. baicaci, dalai lama sere niyalma, eiten 579: ehe facuhūn-be yabume, šajin-be gūtubume, 580: gaiha sakil-be bederebufi, hehe gaiha bime, 581: ladzang diba-be waif, diba-i jui awang rincen sebe 582: oljilaha-be, i cooha gaifi awang rincen sebe 583: turime gaifi ujiha-be tuweci, dalai lama sere 584: niyalma juwedere ba akū, diba-i jui yargiyan, 585: dalai lama sere gebu, geren monggoso-de holbobuha ba 586: amba, ainaha seme tubade bibuci ojorakū. kemuni 587: tubade, amala urunakū suwayan-i šajin-be 588: facuhūrame, baita dekdebume, geren tubed-be jobobumbime, 589: ladzang-ni beyede inu jobolon ombi. Ladzang, diba-be 590: wafi ilinjahangge dalai lama-i yargiyan tašan-be 591: bisire-be dahame, joo, rasi lungbu-i jergi geren tse 592: miyoo-i

lamasa-be kemuni da an-i ging hūlabume, 593: eiten elcin ūklige-i ejete-be yabubure hūdašabure 594: babe gemu nenehe songkoi obuki. ede amban emke 595: tucibufi, huhu noor-i wang, beile, beise, gung, taijisai 596: elcin sei dorgi feksime mutere sain niyalma-be 597: emte tucibufi, giyamun yalubufi, huhu noor-de 598: unggifi, wang, beile, beise, gung, geren taijisa-be 599: isabufi, ere jergi turgun-be getukeleme alafi, 600: gūnin-be emu obume gisurefi, bithe arafi, 601: ere genehe hafan-de afabufi emu derei wesimbume, emu derei 602: ladzang-i jakade genefi, dalai lama sere niyalma-be 603: benjibure. turgun-be tucibume 604: hesei bithe-be gamame genemkini. 605: ede takūraci acara amban hafan lama-be harangga 606: jurgan-ci 607: + dele tuwabume wesimbukini. jai huhu noor-i wang, geren 608: taijisa, ladzang, gemu gusi han-i juse omosi-be 609: dahame, dalai lama sere niyalma-be benjire-de, 610: ladzang-ni hūsun hamirakū oci, huhu noor-i wang, 611: taijisa-i dorgi-be we-be aisilame genekini sere ba-be 612: hese-be baime wesimbukini. geli baicaci, adaha bithei da 613: jiyaliyang se wesimbuhe emu bithe, bancan kūtuktu 614: + hesei bithe wasimbuha, šang kesi suje gosime šangnaha jalin 615: wesimbuhe emu bithe, bancan ini jafaha belek-be 616: giruburakū kemuni gosireo seme wesimbuhe emu bithe, 617: ladzang diba-be šajin-be efuleme yabuha seme 618: ishunde eherendufi, diba-i salagabuha giyan ofi bucehe 619: seme wesimbuhe emu bithe, lama šangnan dorji dalai 620: lama sere niyalma huhu noor-i wang taijisa-de 621: bithe unggihe-be 622: + donjibume wesimbuhe emu bithe, dalai lama sere

623: niyalma huhu noor-i wang jasi batur geren 624: taijisade, ladzang yaya bade bici, mende horon 625: arara-ci tulgiyen, tusa ojoro ba akū seme 626: unggihe juwe bithe, ere uheri nadan bithe. encu 627: turgun akū-be dahame, gemu gisurere ba akū. erei 628: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629: + hese-be baimbi. 630: + elhe taifin-i dehi duici aniya, jorgon biyai orin ninggun. 631: hebei amban, hiya kadalara dorgi amban, amban uksun-i ofi. 632: hebei amban, gūsai ejen, amban uksun-i teksin. 633: hebei amban, dorgi amban, namban mingju. 634: hebei amban, gūsai ejen, amban sunjaci. 635: hebei amban, boigon-i jurgan-i aliha amban, amban kaimbu. 636: hebei amban, hiya kadalara dorgi amban, heo amban bahūndei. 637: hebei amban, hiya kadalara dorgi amban bime tulergi 638: golo-be dasara jurgan-i aliha amban-i 639: baita-be kamcifi icihiyara, gung, amban alingga. 640: hebei amban, gūsai ejen, amban cungguri. 641: hebei amban, coohai jurgan-i aliha amban, amban margan. 642: hebei amban, beidere jurgan-i aliha amban, amban ambulu. 643: hebei amban, gūsai ejen, amban sungju. 644: hebei amban, dorolon-i jurgan-i aliha amban, amban silda. 645: hebei amban, weilere jurgan-i aliha amban, amban unda. 646: hebei amban, gūsai ejen, amban udacan. 647: hebei amban, hafan-i jurgan-i aliha amban, amban dumbai. 648: hebei amban, hafan-i jurgan-i hashū ergi asaha-i amban, amban fugišu. 649: hebei amban, uheribe baicara yamun-i alifi baicara amban, amban hifene. 650: tulergi golo-be dasara jurgan-i 651: hashū ergi asahai amban, amban mandu. 652: ici ergi asahai amban, amban idao.

二　汉译

奴才谨思，顷奉圣主亲笔谕旨：拉藏于策妄喇布坦之寻衅不无恐惧，另有他意虽难料，但未必有恶意。事与此旨相合。事之实虚虽难料定，但王既特遣人来报，则不能不奏。是以将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致王扎西巴图鲁之用印唐古特文书一件、照抄致青海诸台吉之唐古特文书一件，一并谨密行奏闻。于康熙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乾清门侍卫喇锡等传宣谕旨：拉藏所奏之事，著议政大臣等详阅议奏。再对拉藏之使者、青海王、贝勒、贝子、公、台吉之使者等，议政大臣尔等传宣谕旨：今拉藏杀第巴后受阻，不知达赖喇嘛之真假，不能裁决，所以奏请。今更改第巴给拉藏之成吉思汗名，给予其父之达赖汗之号①，送达赖喇嘛至此，朕观达赖喇嘛之实虚后，或立为察奇尔巴顿汗，或封为达赖喇嘛之处，观后决定。② 如此，则尔台吉等即遵旨送来耶？使者尔等小人安能裁决！尔等作何感想。尔等同问毕奏来。

臣等会议得：拉藏疏言，先仙逝之达赖喇嘛，仰赖皇帝良旨，使教法生灵享福至今。但第巴破坏宗喀巴之法，其任意妄行之处，言之不尽，我忍无可忍，招致反目，以致我所派遣随行人员不料身死。其是非如何为

---

① 前引文中，拉藏汗自己说，“第巴欲立我为汗”，“故曾与我甚为友善”。史料显示，第巴还给他起了“成吉思汗”号。伯戴克曾据藏文文献说，拉藏汗执杀第巴后称“丹津成吉尔王”（bsTan `dsin Jing gir rGyal po）。“成吉尔 Jing gir”是“成吉思 Jing gis”之误（藏文里 r 和 s 形近，很容易混淆），“丹津成吉思王”就是“持教成吉思汗”。伯戴克的说法显然不正确，这个汗号本来是第巴给拉藏汗起的。第巴死后，清朝取消了拉藏汗的成吉思汗名号。

② 康熙皇帝没弄明白察齐尔巴顿汗为何意，所以说他观仓央嘉措之后再决定是否让他做察齐尔巴顿汗。如果明白其中的奥妙，康熙皇帝无论如何是不会同意这个方案的。

之，请予海鉴。嗣后，因弘扬宗喀巴教法之达赖喇嘛年齿尚幼，皇帝为总统瞻部洲之共主，扶之为荣贵之处，请予明鉴。人我虽欲以善心做有益事，但无济于事。由君主大慈门兴广宗喀巴法于十方，照常推兴二圣者之善事善行，使之较前荣贵，请予明鉴。再济法之二圣者召集执法诸施主，乘该第巴行恶之势，干戈相寻，盗贼蜂起，君主若不下良旨，则众生灵不获安生。为此，于来年七月初一日，召集大会盟，颁温谕训示之。请予明鉴。乾清门侍卫喇锡等传宣谕旨：拉藏所奏之事，著议政大臣等详阅议奏。再对拉藏之使者、青海王、贝勒、贝子、公、台吉之使者等，议政大臣尔等传宣谕旨：今拉藏杀第巴后受阻，不知达赖喇嘛之真假，不能裁决，所以奏请。今更改第巴给拉藏之成吉思汗名，给予其父之达赖汗之号，送达赖喇嘛至此，朕观达赖喇嘛之实虚后，或立为察奇尔巴顿汗，或封为达赖喇嘛之处，观后决定。如此，则尔台吉等即遵旨送来耶？使者尔等小人安能裁决！尔等作何感想。尔等同问毕奏来。遂询问之，使者等言：皇上谕旨，我等诸台吉无不遵奉者，即照旨意办耳。但［他］有达赖喇嘛之名，我等小人何以得知。成吉思汗之名乃第巴所起，蒙圣主仁爱，若赐拉藏其父之达赖汗号，则岂有比此尊者。

臣等谨思，圣主颁旨甚为周详，俱应谨遵上谕施行。又，笔帖式诺尔布转奏班禅呼图克图疏云：该六世达赖喇嘛行止如凡人，非喇嘛矣。据我使臣荐良、诺尔布等闻得，第巴闻拉藏发兵，第巴亲征，并写一书付其部下二商衮，并令转交日喀则城内第巴达尔巴曰：我若击败拉藏，则尔等执班禅送来招地，将扎什伦布寺之众喇嘛等尽诛之。其书误送班禅。班禅闻之，

避驻无尤地方。[①] 今查得，达赖喇嘛其人行恶辱法，退所受戒律而娶妻，且拉藏杀第巴后，抢掳第巴之子阿旺林臣等，伊率兵抢取阿旺林臣等养之。由此观之，达赖喇嘛其人无二，第巴之子是实。[②] 夫达赖喇嘛之名，对于众蒙古关系甚巨，断不可留于彼处，则日后必乱黄教，滋生事端，以劳众土伯特人，亦害及拉藏本身。拉藏杀第巴后受阻，达赖喇嘛有虚实之处，故令招地、扎什伦布等各寺庙喇嘛等照常诵经，准众使者、施主照前通行、贸易，派大臣一员，于青海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之诸使者中遣能驰善人各一名，乘驿赴青海，召集王、贝勒、贝子、公、众台吉，明示上述缘由，劝其心归一致，并写文交付已前去之官员，一面俱奏，一面赴拉藏处，著送达赖喇嘛其人前来，陈述缘由，赍敕以去。其应遣大臣、官员、喇嘛等，由该部奏上阅视。又，青海王、众台吉、拉藏俱为顾实汗之子孙，送达赖喇嘛其人前来时，若拉藏力所不及，则于青海王、台吉等中谁协济前往之处，具奏请旨。

又查侍读学士荐良等奏疏一件、班禅呼图克图为颁书、恩赏缎匹而奏疏一件、班禅请将其所贡礼物不辱赐纳

---

① 无尤即今乌郁（'od yug），西藏南木林县驻地以东一个村，旧为无尤宗。据说第巴欲执杀班禅，故班禅避居无尤地方。这是谣言，不可信。据《五世班禅传》载，班禅听到拉藏汗率军到达拉萨北部以后，七月初九日轻骑简从，前往拉萨，准备亲自出面调停。到无尤地方后，先派人到拉萨，向达赖喇嘛询问前方情况。仓央嘉措给班禅回信，劝班禅暂时不要来拉萨，等候消息。因此，班禅在无尤住了十多天。七月十九日，班禅接到达赖喇嘛来信，说拉藏汗已经占领拉萨，第巴退往贡噶地方，拉藏汗已经派兵去捉拿第巴。班禅决定到贡噶调解，先派一人去贡噶。但此人到达时，第巴已被杀害〔牙含章（1987），第72页〕。可见，班禅不是避居无尤地方，而是去调解拉藏汗与第巴时在那里住过。

② 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前文提到，仓央嘉措与第巴之女有特殊的男女关系，仅凭这件事可以肯定仓央嘉措不可能是第巴的私生子。

而奏疏一件、拉藏以第巴破坏教法，故相与交恶，第巴命该如此，因而殒命等因奏疏一件、喇嘛商南多尔济奏闻有称达赖喇嘛之人致书于青海王、台吉等之文书一件、有称达赖喇嘛之人致书青海王扎西巴图鲁众台吉，称拉藏无论在何处，除向我等施威外，别无益处等因书二件，共计书七件。既无别情，故皆毋庸议。为此谨奏。请旨。

康熙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①

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臣宗室鄂飞、议政大臣都统臣宗室特克新②、议政大臣内大臣臣明珠③、议政大臣都统臣孙渣齐④、议政大臣户部尚书臣凯音布⑤、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侯臣巴浑德⑥、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兼协办

---

① 即1706年2月9日。

② 温良郡王孟峩庶出子。据《清圣祖实录》载，康熙二十六年正月甲辰，被封为奉国将军。三十八年六月辛丑，任正蓝旗蒙古副都统。三十九年三月甲寅，升正白旗蒙古都统。三十九年十月甲子兼管本旗护军统领。四十年十月戊午，调镶黄旗满洲都统。何时兼任议政大臣不详。四十五年十月癸巳以病致仕。

③ 明珠，满洲正黄旗人，姓纳喇。康熙三年，由内务府郎中擢内务府总管。七年，授刑部尚书。八年，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十年十一月，迁兵部尚书。十四年，调吏部尚书。十六年授武英殿大学士。二十八年，授明珠为内大臣。四十七年四月卒。何时兼任议政大臣不详。见《八旗通志·初集》卷151，《人物志》31，第2551～2552页。

④ 据《清圣祖实录》载，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庚辰，孙渣齐自护军参领升任镶红旗满洲副都统。三十五年六月己亥升护军统领。四十年十月辛未，升镶红旗蒙古都统，仍兼管护军统领事。四十四年九月癸未，任正黄旗满洲都统。五十五年五月乙酉，任工部尚书。五十七年四月甲午，调为户部尚书。雍正元年十月癸酉，调为工部尚书。二年十月己丑，缘事革职。

⑤ 姓觉罗，满洲正黄旗人。康熙二十八年，任正黄旗汉军副都统。三十三年，转满洲副都统。三十九年，改礼部侍郎，命往广东审理苗族事，授议政大臣。四十年，擢户部尚书。四十五年，以老病乞休，着以原官致仕。雍正元年十二月卒。见《八旗通志·初集》卷150，《名臣列传》10，第3834页。

⑥ 舒穆禄氏，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十九年，擢正黄旗蒙古都统。二十一年，调正黄旗满洲都统。三十五年十一月，复任正黄旗满洲都统。三十五年三月，管领正黄旗，授议政大臣。四十年，擢领侍卫内大臣。雍正元年卒。见《满名臣传》卷33，第948～949页。

理藩院尚书事臣阿灵阿①、议政大臣都臣统崇古礼②、议政大臣兵部尚书臣马尔汉③、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兼理藩院尚书刑部尚书臣安布禄④、议政大臣都统臣蒿祝⑤、议政大臣礼部尚书臣席尔达⑥、议政大臣工部尚书臣温达⑦、

---

① 满洲镶黄旗人。康熙三十年，任镶黄旗蒙古都统。三十一年，调镶黄旗满洲都统。三十五年，授一等侍卫。三十九年，迁正蓝旗蒙古都统。四十年，擢领侍卫内大臣。四十四年，授理藩院尚书。五十五年卒。见《满名臣传》卷32，第942～943页。

② 据《清圣祖实录》载，康熙三十三年闰五月丙子，升护军参领崇古礼为镶黄旗蒙古副都统。三十四年六月己酉，调镶黄旗满洲副都统。三十八年九月丙辰，升镶白旗蒙古都统。四十一年三月癸未，调正白旗满洲都统。据康熙朝朱批奏折，康熙五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崇古礼仍以"议政大臣、都统"名义上奏（《康熙朝朱批奏折全译》，第1153页）。

③ 满洲正白旗人，姓兆佳氏。康熙三十三年四月，迁翰林院侍讲学士，七月，擢兵部侍郎。三十八年六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十月，迁兵部尚书，寻充经筵讲官，兼议政大臣。四十六年，调吏部尚书。四十八年正月致仕。五十七年十二月卒。见《满名臣传》卷20，第551～553页。

④《清圣祖实录》载，康熙三十九年十月乙丑，升理藩院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安布禄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四十年十一月辛亥，以左都御史安布禄为刑部尚书。四十五年十一月甲戌，以老病致仕。五十四年卒。

⑤ 满洲镶蓝旗人，姓赫舍哩。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任护军统领。四十年九月，迁正黄旗汉军都统。四十二年九月，调正红旗满洲都统。四十八年二月，署奉天将军。五十年十月，迁礼部尚书。五十一年四月，授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雍正五年八月，革职、罢任。十三年卒。见《八旗通志·初集》卷179，《人物志》59，第3151～3154页。

⑥ 满洲镶红旗人，董鄂氏。康熙三十六年，升都察院左都御史，九月，转兵部尚书。三十八年六月，以兵部尚书署理川陕总督事务，十一月转礼部尚书，仍署川陕总督。三十九年十月，转吏部尚书兼礼部尚书，仍署川陕总督。本年，又兼管西安将军事。四十一年九月，以吏部尚书管礼部尚书事。四十五年卒。见《八旗通志·初集》卷192，《名臣列传》52，第4526～4530页。

⑦ 满洲镶红旗人，姓费莫氏。康熙十三年，升都察院都事。三十五年，升兵部督捕右理事官。三十六年十二月，升内阁学士。三十八年，升户部右侍郎。以原衔兼议政大臣，转吏部左右侍郎。充经筵讲官，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四十三年三月命为工部尚书。四十六年十二月，特命入赞机务，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五十三年正月，以原官致仕。十二月，着仍任大学士。五十四年五月卒。见《八旗通志·初集》卷186，《名臣列传》46，第4431～4433页。

议政大臣都统臣吴达禅①、议政大臣吏部尚书臣敦拜②、议政大臣吏部左侍郎臣傅继祖③、议政大臣都统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希福讷④、理藩院左侍郎臣满笃⑤、右侍郎臣伊道⑥。

三　总结与分析

根据西藏各方的奏疏和荐良等清朝使者的报告，议政大臣会议讨论，拿出了以下对策草案：1. 达赖喇嘛之名，对于众蒙古关系甚巨，所以绝不能把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留在西藏。如留他于藏地，日后必乱黄教，滋生事端，连累藏人，亦害及拉藏汗本身，故著拉藏汗将达赖喇嘛押送到京师来，若拉藏汗力所不及，则令青海

---

① 满洲正白旗人，姓纳穆都禄氏。康熙三十五年五月，任正白旗满洲副都统。三十九年，授前锋统领。四十年，列议政大臣。四十一年，迁镶黄旗蒙古都统。四十四年十月，调正蓝旗满洲都统。四十八年，以原品致仕。五十一年十月卒。见《满名臣传》卷 18，第 504 ~ 505 页。

② 据《清圣祖实录》载，康熙三十九年十二月丙子，升内阁侍读学士敦拜为工部右侍郎。四十年正月甲寅，转为左侍郎。四十年十月甲子，列为议政大臣。四十年十二月辛未，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四十一年九月己巳，升为吏部尚书。四十五年十月乙酉朔，解吏部尚书任。

③ 据《清圣祖实录》载，康熙三十年二月乙丑，升内阁侍读学士傅继祖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三十年九月戊辰，调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三十四年八月丙午，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三十九年十月丁亥，为吏部右侍郎。四十年正月丁巳，充经筵讲官。四十年十月甲子，列为议政大臣。四十七年闰三月甲辰，解吏部左侍郎任，以原品办理该管王府事。

④ 据《清圣祖实录》载，康熙三十五年七月戊辰，任大理寺卿。四十年正月乙卯，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四十四年正月庚申，升吏部右侍郎。四十四年九月癸未，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四十五年十月己丑，升左都御史希福为工部尚书。四十六年正月庚午，为户部尚书。四十九年九月辛亥，因贪污罪，革职。

⑤ 据《清圣祖实录》载，康熙三十八年闰七月乙丑，升内阁侍读学士满笃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三十九年七月乙卯，充经筵讲官。三十九年十月乙巳，升理藩院右侍郎。四十八年十一月辛卯，调为兵部右侍郎。五十年十一月壬辰，升都察院左都御史。五十一年四月乙亥，为工部尚书。

⑥ 据《清圣祖实录》载，康熙三十四年十月壬子伊道始以内阁侍读学士身份见于记载，四十一年三月辛亥升为理藩院右侍郎。康熙四十六年三五月升为镶白旗蒙古副都统。

王、台吉予以协助。2. 令拉萨、扎什伦布等各寺庙喇嘛等照常诵经，准众使者、施主照前通行、贸易。3. 派大臣一员，召集青海蒙古王、贝勒、贝子、公、众台吉，劝其心归一致。历史证明，清廷采纳了议政大臣们的建议，不久派人到拉萨，要求拉藏汗将仓央嘉措押解到京师。1706 年，拉藏汗宣布仓央嘉措为假达赖喇嘛，并往北京押送，据说仓央嘉措到青海湖畔后病逝。拉藏汗替清朝除掉了第巴桑结嘉措，得到清廷的赞赏和支持。拉藏汗又立了一位他控制下的六世达赖喇嘛，紧紧掌握西藏的政权和教权，和硕特汗廷在西藏的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好景不长，在短短 11 年后的 1717 年，和硕特汗廷土崩瓦解。

（原载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Mongolian Cultures：Qua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 Ⅲ，Tokyo，2007）

论康熙末年清军入藏及阿拉善和硕特的作用

齐　光*

一　前言

康熙朝是清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时期，而自康熙三十五年（1696）击败噶尔丹后起始的康熙朝后半期，则是其承前启后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这一时期，清朝针对割据在西北边疆的青海和硕特、达赖喇嘛地方政权和准噶尔的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就，并最终成功实现了进军西藏。那么，当时的西北边疆形势具体如何，清朝又是实施怎样的方针政策来拓展了自身利益的呢？由此，笔者关注到了阿拉善和硕特的存在。

为了明确问题的来龙去脉，首先需要介绍康熙朝前半期青海和硕特、达赖喇嘛地方政权、准噶尔及阿拉善和硕特的概况。

1636年，游牧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塔城等地的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首领图鲁拜琥[①]，在准噶尔巴图尔台吉的协助下，南

---

*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满文文献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①　1606年，图鲁拜琥成功调解喀尔喀与卫拉特两个蒙古势力之间的冲突，被喀尔喀蒙古首领和东科尔呼图克图授予“大国师”（Mon. dai guuširi）封号。固始汗之称，即来源于此。

下一举歼灭了盘踞在青海的喀尔喀蒙古绰克图台吉部。接着，他又横扫黄教①等其他政敌，征服了整个青海和西藏。1642 年，图鲁拜琥仿效元朝大汗忽必烈赐封八思巴领地的传统，将卫藏地方布施给了五世达赖喇嘛，并颁布法律、设置第巴职务，建立了达赖喇嘛地方政权。图鲁拜琥则被五世达赖喇嘛册封为“持教法王”（šasin-i bariγči nomun qa an，bstan ’dzin chos kyi rgyal po），成为当时保护和扶持五世达赖喇嘛的最有力施主。从此，固始汗及其长子一系的汗王，带领少数属民，驻扎于拉萨北部的达木一带，以保护和协助达赖喇嘛地方政权。而固始汗长子一系以外的子孙，则占据青海和巴尔喀木地区，对当地的番、回等民众征收赋税，还时常骚扰清朝的四川、陕西、甘肃边境，被称为“青海和硕特或青海厄鲁特”。青海和硕特，作为保护达赖喇嘛地方政权的大后方，其首领经常为打击黄教政敌而率兵攻打云南中甸、尼泊尔及不丹等地。此外，固始汗的兄弟们依然游牧于原来的天山北路草原，成为当地卫拉特蒙古的核心力量。固始汗侄子厄齐尔台吉，不仅富于战争谋略，而且还是个虔诚的黄教教徒。1666 年，五世达赖喇嘛授予厄齐尔台吉“车臣汗”（čečen qan）”封号，从此，其被称为“厄齐尔图车臣汗”。

除和硕特之外，卫拉特蒙古中还存在准噶尔、土尔扈特、杜尔伯特、辉特等相对较大的游牧集团。但自 17 世纪 20 年代土尔扈特西迁伏尔加河流域之后，杜尔伯特、辉特等逐渐被游牧在阿尔泰山麓的准噶尔所支配。准噶尔的强大，始于巴图尔台吉协助固始汗平定青海，被五世达赖喇嘛授予“额尔德尼巴图尔洪台吉”（erdeni baγatur qong tayiji）封号之后。巴图尔洪台吉之长子僧格，继承父

① 指宗喀巴所创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因其僧侣头戴黄色法帽而被称为黄教。自 1578 年阿拉坦汗（俺答汗）召请索南嘉措始，格鲁派受到蒙古土默特蒙古勒津、鄂尔多斯、永谢布此右翼三万户，及喀喇沁、喀尔喀、卫拉特方面的广泛信仰。

志，继续经略天山南北，至其弟噶尔丹成为首领时，依仗发达的军事和对外贸易，准噶尔俨然成为清朝西北边疆一支强大的势力。

1677 年，噶尔丹袭击厄齐尔图车臣汗，成为天山南北卫拉特蒙古的盟主。厄齐尔图车臣汗势力土崩瓦解，部众四处逃散。属下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和啰理，率领所剩的一部分族众，迁移至今内蒙古自治区最西部、甘肃省北部一带，后被称为“阿拉善和硕特”或“阿拉善厄鲁特”。和啰理，是固始汗第四子巴延阿布该阿玉什的第四子。厄齐尔图车臣汗出生之前，固始汗将自己的亲子巴延阿布该阿玉什，作为养子送给了其兄长拜巴噶斯。阿拉善和硕特，作为卫拉特蒙古诸部中最早服属清朝的一个特殊集团，其服属过程纷繁复杂，前后延续了将近 20 年，最终于康熙三十六年被编为扎萨克旗。关于其服属经过，请参见拙稿《服属清朝时的阿拉善和硕特部和西北局势》。①

对以上这些蒙古势力及其内部关系，清朝廷在康熙朝前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清朝真正积极施展其政策，还是始于对噶尔丹战争（1688 ~ 1696）时期。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亦请参考拙稿《服属清朝时的阿拉善和硕特部和西北局势》。康熙三十五年五月，清军在昭莫多战役中，重创噶尔丹率领的厄鲁特军队，一举歼灭了噶尔丹势力。战役之后，为阻止噶尔丹逃往拉萨，清朝又动员阿拉善和硕特兵，驻扎额济纳、布隆吉尔河流域。康熙帝又要求青海和硕特捕获噶尔丹，将其引渡给清朝。为此康熙帝还特意邀请青海和硕特首领到北京觐见。康熙三十六年十一月，青海和硕特领袖扎西巴图尔，率领部分首领到达北京，受到康熙帝的隆重接待。康熙帝授予扎西巴图尔亲王爵位，以示优待。但是，作为达赖喇嘛地方政权的保护者，青海和硕特不仅对西藏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且还与准噶尔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因此，青海和硕特与清朝之间关系的发

---

① 载日本《满族史研究》第 6 号，2007 年，第 64 ~ 87 页。

展，并非一帆风顺。此后，清朝的西北边疆局势变得波澜起伏。经过一系列事件，准噶尔军队最终于康熙五十六年远征西藏，杀害了当时达赖喇嘛地方政权的实际统治者拉藏汗，占领了拉萨。对此，清朝于康熙五十七至五十九年，两度挥师进军西藏，在驱逐准噶尔军队的同时，也削弱了青海和硕特在西藏的势力。康熙朝后半期的西北边疆局势具体如何，清朝为什么要进军西藏，进藏时康熙帝做了哪些部署，其中阿拉善和硕特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等等问题，即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关于清朝进军西藏，赵珍利用《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探讨当时清朝对青海和硕特所采取的政策，认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青海蒙古对清朝西藏战略的成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 比较客观地叙述了康熙五十七至五十九年清朝的西北边疆局势，以及青海和硕特对清朝的贡献。但是，赵珍在文中没有注意到这些边疆势力的内部联系，更没有注意到阿拉善和硕特的特殊存在。此外，梁丽霞在其专著《阿拉善蒙古研究》一书第五章“阿拉善蒙古军事活动研究”中，利用《清实录》等清朝官方编纂的文献，简要介绍了时任阿拉善和硕特扎萨克的阿宝在清朝进藏时的活动情况，但内容简单，没有充分阐明阿拉善和硕特在清军入藏时期的具体行动及其所发挥的作用。这可能与梁丽霞没有利用最能反映当时史实的满蒙文档案有关。

本文利用最详细记录当时史实的满文“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满文《王抚远大将军奏档》、藏文“七世达赖喇嘛传”，及蒙古文《清内阁蒙古堂档》等史料，在阐明康熙朝后半期清朝、青海和硕特、达赖喇嘛地方政权、准噶尔之间的关系变迁基础上，论述了当时的清朝对青海和硕特所实施的政策，并详细讨论了清朝进

① 赵珍：《论康熙末年清军两次入藏的战略选择》，《清史研究》2002 年第 4 期，第 94～103 页。

藏过程中支配阿拉善和硕特的问题。

以下简要介绍一下本文所利用的史料。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该史料是康熙朝的大臣、官员上奏给康熙帝的满文奏折，及康熙帝用满文下达的上谕的总称，共计存有 5000 余件。自康熙十二年十一月起，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为有效应对西北边疆局势，康熙帝与驻屯边境的清朝大臣、官员，多利用满文奏折来交换情报，并据此制定方针政策。该史料真实地反映了康熙朝后半期的西北边疆局势，及清朝针对当时形势而实施的政策，是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6 年 7 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之书名出版。但是，汉译本在相关蒙古、西藏名称及正确理解满文原意等方面，稍有不足。另外，汉译本也没有编译所有满文原件。因此，除该书外，本文利用了日本国立筑波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的满文原件缩微胶卷。

《王抚远大将军奏档》：该史料是全权负责清军进藏事宜的总指挥皇十四子允禵上奏给康熙帝的满文奏折集成。自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至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该史料详细记载了当时西北边疆势力的现状、清军的动员情况、青海和硕特首领的言行、清朝的相关对策、清军进藏途中发生的问题、与准噶尔军队的交战情况、进藏后的善后处置等内容。毋庸置疑，它是了解当时西北边疆局势和清军进藏实情的最珍贵史料。原件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库，典藏号 NC/4662 - 8/2138，2 函 20 册，线装本。原藏于北洋政府蒙藏院，受当时的总裁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指示，1918 ~ 1927 年曾被翻译成汉语。后吴丰培参考《清实录》等史料修正了汉译内容，并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以《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为书名，于 1991 年出版发行。但由于汉译水平有限及受吴丰培订正的影响，汉译内容或多或少已失去满文原意，让人很难正确理解当时的史实。因此，本文利用的是北京大学

图书馆特藏库所藏的满文原件。

“七世达赖喇嘛传”（*Rgyal ba'i dbang po thams cad mkhyen gzigs rdo rje 'chang blo bzang bskal bzang rgya mtsho dpal bzang po'i zhal snga nas kyi rnam par thar pa mdo tsam brjod pa dpag bsam rin po che'i snye ma*）：该史料是记录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毕生经历的藏文传记。乾隆二十四年（1759）由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著述。除一些宗教活动之外，主要记载了康熙四十六年至乾隆二十二年，噶桑嘉措与藏区的各派寺院、藏人官僚、青海和硕特首领、清朝皇帝，及蒙古各游牧集团首领之间的关系往来。虽然著者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长期驻扎北京，与清朝皇帝有着深厚的交情，但他与七世达赖喇嘛也交往频繁。该传记详细记载了被青海和硕特右翼保护时的噶桑嘉措的处境，及进藏结束后七世达赖喇嘛与蒙古各游牧集团之间的外交活动。另外，还详细记录了蒙古各游牧集团首领及其所派的使者，为进献礼品及布施而觐见达赖喇嘛的具体情况。可以说，这是一部探讨达赖喇嘛地方政权和蒙古各游牧集团关系的珍贵史料。“七世达赖喇嘛传”，其北京版藏文原件，现藏塔尔寺，共1115叶。1989年，该藏文原件由蒲文成译成汉语后，由西藏人民出版社以《七世达赖喇嘛传》之书名出版发行。但是，汉译本对相关蒙古、满洲名称的翻译，稍有不当之处。因此，本文在利用TBRč数字化的哲蚌寺（1945年）版藏文原件外，仅相应参考了蒲文成译的《七世达赖喇嘛传》。

《清内阁蒙古堂档》（*Dai čing gürün-ü dotoγadu yamun-u mongγol bičig-ün ger-ün dangsa*）：该史料是蒙古各游牧集团首领、达赖喇嘛、摄政、班禅喇嘛等，呈给康熙帝和理藩院的题本、信札的抄本大集成，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康熙帝所下达的敕书、上谕和理藩院所下达的行文抄本。为处理蒙古事务，清朝的内阁设有专门处理蒙古文书的蒙古堂（或称蒙古房），内设有侍读学士、侍读、中书等官员。该史料，因是经过内阁蒙古堂的接收、翻译、上奏、草

拟、处理等程序，在蒙古堂誊录并保存其录副的，所以被称为《内阁蒙古堂档》。其中绝大部分是反映康熙十年至康熙六十一年期间，清朝与喀尔喀蒙古、青海和硕特、阿拉善和硕特、准噶尔、达赖喇嘛地方政权等西北边疆势力之间的关系，及记录优待赏赐内扎萨克蒙古王公、台吉事例的文书。康熙十年至康熙十九年之间的文书，全部为蒙古文（含少量托忒蒙古文）题本和敕书。自康熙二十年起，逐渐开始在蒙古文上附加满文翻译。但是，有个别蒙古文原件抄本残缺不足，只能利用满文，所以有必要掌握蒙古文和满文两种语言进行分析和利用。该史料切实地反映了康熙年间的西北边疆局势，及各势力与清朝的关系和清朝的方针政策，因此它又被称为是“研究清朝与内陆亚洲关系的第一级史料”。[①] 原件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005 年 12 月，该史料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合作编辑，并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

二　康熙朝后半期的清朝西北边疆局势

康熙三十六年十月，在达赖喇嘛地方政权摄政桑结嘉措的保护下，仓央嘉措作为第六世达赖喇嘛，正式被迎请至布达拉宫。众所周知，五世达赖喇嘛于康熙二十一年既已圆寂，其后桑结嘉措遵照五世遗嘱，在秘不发丧的同时，开始秘密地认定和养育转世灵童。同时，桑结嘉措又假借五世名义诱导噶尔丹进攻清朝，以致其身败名裂。在准噶尔，从其叔父噶尔丹处逃走的策旺阿拉布坦，在伊犁重整旗鼓，于康熙三十三年被达赖喇嘛封为“额尔德尼卓里克图

① 参见〔日〕涉谷浩一《研究清朝与内陆亚洲关系的第一级史料》，日本《东方》第 313 号，2007 年，第 31 ~ 34 页。

洪台吉”（Mon. erdeni joriγtu qong tayiji），噶尔丹去世后，其成为准噶尔的新一代领袖。起初策旺阿拉布坦势单力薄，试图与清朝保持和平相处。为此，在截断噶尔丹逃亡伊犁、送交噶尔丹遗骨等问题上，策旺阿拉布坦积极响应了康熙帝的要求。青海和硕特方面，康熙三十六年十一月，扎西巴图尔率领纳木札勒额尔德尼、朋素克等少数首领到北京觐见康熙帝，强化了双方关系。1655年固始汗去世后，以达赖巴图尔洪台吉为首的青海和硕特，依然重视与准噶尔、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谨慎地处理与清朝发生的纠纷。[①] 但到了康熙三十五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强大的噶尔丹势力被清朝所灭，五世达赖喇嘛早已圆寂的消息也被桑结嘉措公之于众之后，青海和硕特与达赖喇嘛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变得稍微有些疏远。在此背景下，青海和硕特开始与成功平定三藩之乱、察哈尔布尔尼之乱和噶尔丹势力的康熙帝接近。清朝方面也通过噶尔丹战争，认识到了青海和硕特的重要性。自康熙三十六年起，康熙帝便派遣自己的亲信喇嘛商南多尔济驻扎西宁，在监视青海和硕特的同时，搜集青海和硕特、达赖喇嘛地方政权和准噶尔的情报。[②]

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身为青海和硕特左翼台吉的拉藏，开始带领其属民移居西藏。不久，康熙四十年，保护达赖喇嘛地方政权的达赖汗去世。此达赖汗，是固始汗长子达延汗的长子，1671年被五世达赖喇嘛册封为“持教达赖汗”（Mon. šasin-i bariγči dalai qa an）。[③] 达赖汗的就任仪式和达延汗一样，其程序是先由青海和硕特众首领推选，然后才由达赖喇嘛册封为汗王。[④] 所以说，达延汗、达赖汗应是青海和硕特的汗王，而非西藏汗王。但自固始汗

① 参见拙稿《服属清朝时的阿拉善和硕特和西北局势》，第70～71页。

② 参见〔日〕楠木贤道《康熙帝的亲信商南多尔济奏折》，日本《历史人类》第34号，2006年，第167～200页。

③ 参见阿旺洛桑嘉措著《五世达赖喇嘛传》下，《丹增达赖汗继任藏王和小昭寺的培修情况》，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第55页。

④ 参见《五世达赖喇嘛传》上，《丹增达延汗即汗位》，第307页。

起，青海和硕特历代汗王都直接或间接支配过达赖喇嘛地方政权，因此史料上往往将其记载为“汗王”（rgyal po）、“藏王”或“土伯特汗”（tübed qaγan）。

康熙四十一年九月，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亲赴扎什伦布寺，向班禅喇嘛奉还了沙弥戒，表示要放弃宗教特权。① 当时，仓央嘉措身为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宗教领袖的达赖喇嘛，经常出没拉萨市街，沉溺酒色，倾心恋爱诗歌，对宗教事务并无太大兴趣。② 尽管如此，拉萨僧俗民众仍然认为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对他依然是虔诚地信奉和膜拜。③

康熙四十二年，滞留在拉萨的拉藏，被名义上仍然是六世达赖喇嘛的仓央嘉措授予汗王封号，继承了其父达赖汗的汗位。④ 但是，拉藏汗继续驻屯拉萨，触犯了摄政桑结嘉措的利益。为了消灭拉藏汗，桑结嘉措于康熙四十三年，欲投毒杀害拉藏汗。⑤ 其阴谋失败后，又驱逐拉藏汗出拉萨。⑥ 桑结嘉措的种种恶劣行径，终于惹怒了拉藏汗。撤退到达木一带的拉藏汗，迅速召集军队返回拉萨，打败和俘虏桑结嘉措，并将其杀害。⑦ 长期支配达赖喇嘛地方政权，以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诱导噶尔丹等蒙古势力对抗清朝的摄政桑结

---

① 参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案卷号 282，康熙四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商南多尔济奏折。

②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案卷号 282，康熙四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商南多尔济奏折记载，“闻达赖喇嘛自其住处布达拉宫领六七人，夜里来至召地（拉萨市街——引者注），胡乱为所欲为”。

③ 参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案卷号 282，康熙四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商南多尔济奏折。

④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案卷号 282，康熙四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商南多尔济奏折记载，据青海和硕特首领扎西巴图尔的报告，“（六世达赖喇嘛）于达赖汗之位，已立丹增旺札尔之弟拉藏”等语。

⑤ 参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案卷号 282，康熙四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商南多尔济奏折。

⑥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 227，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丁亥条。

⑦ 参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案卷号 282，康熙四十四年十月月二十一日，商南多尔济奏折。

嘉措的死，对康熙帝来说，显然是件好事。康熙四十五年，考虑到达赖喇嘛地方政权及西北边疆的稳定，康熙帝册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šasin-i tedkügči kičiyenggüi jokiyaltu qaγan），[①] 并要求拉藏汗将被废黜的仓央嘉措引渡给清朝。[②] 康熙四十九年，按照拉藏汗的请求，康熙帝册封阿旺益西嘉措为新的第六世达赖喇嘛。[③]

康熙帝与拉藏汗的接近，招致青海和硕特右翼扎西巴图尔等首领们的不满。为保护自身利益，扎西巴图尔等右翼首领，开始拥立现身理塘的转世灵童为达赖喇嘛。[④] 康熙五十三年扎西巴图尔临终前，向“济农（察罕丹津）和罗卜藏丹津等人留下遗嘱，一再告诉他们要尽快请来化身（转世灵童），对此要不惜一切”。[⑤] 不久，察罕丹津就以“今真五世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即已显出，我等拟将伊公同迎至青海，所有缘由，奏请睿鉴。此呼毕勒罕如何照五世达赖喇嘛赐封之处，伏祈神奇弘大天佑圣主睿鉴”为由，[⑥] 请求康熙帝册封理塘转世灵童。对康熙帝来说，自己已册封的拉藏汗所立的达赖喇嘛依然健在，不可能另行再册封察罕丹津所保护的转世灵童。但若直接拒绝察罕丹津的请求，青海和硕特右翼很有可能就与清朝对立。为此，优先考虑西北边疆稳定的康熙帝，通过与察罕丹津的和平交涉，于康熙五十五年，将理塘转世灵童迎至塔尔寺，暂

---

① 参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案卷号 282，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八日，商南多尔济奏折。

② 参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案卷号 282，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商南多尔济奏折。

③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 241，康熙四十九年三月戊寅条。

④ 四川西部接近打箭炉的地方，康熙朝当时曾经是青海和硕特右翼的领地。雍正元年，罗卜藏丹津之乱后，暂时受达赖喇嘛地方政权的支配。乾隆朝大小金川战役后，改为理塘司，开始受成都将军制约。

⑤ 《七世达赖喇嘛传》第二章，“自东方渐次行进至布达拉宫坐床（一七〇八年至一七二〇年）”，第 20 页。

⑥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机构包，康熙五十三年九月十八日，理藩院满文朱批奏折（《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2497，理藩院奏请验看五世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折，第 974～975 页）。

时化解了矛盾。另外，为了牵制察罕丹津，康熙五十五年，康熙帝还特意召请罗卜藏丹津至北京，授予其亲王爵位。

在围绕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真伪，康熙帝、拉藏汗与扎西巴图尔、察罕丹津等青海和硕特右翼首领对立期间，察罕丹津秘密与准噶尔策旺阿拉布坦取得联系，并制订计划，准备一同将理塘转世灵童送至拉萨，坐床为新的达赖喇嘛。按照这一计划，准噶尔于康熙五十四年，佯攻已成清朝藩属的哈密，迷惑清军注意力之后，康熙五十六年，由大策凌顿多布率领的军队越过喀喇昆仑山，从西面侵入西藏，打败拉藏汗蒙藏联军，占领了拉萨。① 当时，清朝已经封锁了天山山脉东部—嘎斯口②—柴达木盆地—青海草原—木鲁乌苏③—喀喇乌苏④—拉萨的通道，所以准噶尔军队只能冒险从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的伊犁盆地—塔里木盆地—喀喇昆仑山—羌塘高原—拉萨一路前进。

听到准噶尔军队已占领拉萨的康熙帝，立刻下令动员青海和硕特，与其一同进藏，驱逐准噶尔。⑤ 但是，当时的清朝与青海和硕特之间的关系，远没有达到共同协力以对抗准噶尔的地步。动员青海和硕特首领，便成了清朝的一项重要负担。因为急于求成，西安将军额伦特和侍卫色楞，自信清军实力，于康熙五十七年，亲率部队向西藏进发，结果在怒江上流的喀喇乌苏之地，遭到准噶尔军队的夜袭而全军覆没。⑥ 额伦特所率的西安驻防八旗，曾在伏击噶尔丹的昭莫多战役中立过战功，此次进藏的准噶尔士兵也同为厄鲁特

---

①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78，康熙五十六年四月辛巳条。

② 指青海北部柴达木盆地以西之嘎斯淖尔，自16世纪中期始，成为卫拉特蒙古诸部南下赴藏的必经之地。

③ 木鲁乌苏，指长江源头之通天河。

④ 喀喇乌苏，怒江上流，流经西藏北部那曲草原，是从青海一路进藏的必经之所。自元朝时期始，部分蒙古部落开始进入这一流域游牧。

⑤ 参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机构包，康熙五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理藩院满文朱批奏折（《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129，议政大臣巴浑德等奏报策旺阿拉布坦侵掠拉藏汗情形折，第1257～1260页）。

⑥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81，康熙五十七年九月甲辰条。

人，因此额伦特过于自信也是情有可原的。关键是额伦特疏忽了青海、西藏交界处的地形和对方的具体驻扎位置，而被惯于野战的准噶尔军队打得大败。这即是清朝的第一次进军西藏。

可以看出，在康熙朝后半期的清朝西北边疆局势中，保护达赖喇嘛地方政权的青海和硕特，在清—藏、清—准关系上，有着特殊的地位。那么，这一时期，清朝与阿拉善和硕特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三　康熙朝后半期的阿拉善和硕特

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帝巡幸西安，接见并宴请了青海和硕特的扎西巴图尔等首领。一同出席酒宴的蒙古王公中，还有阿拉善和硕特的第一任扎萨克多罗贝勒和啰理。不难理解，在固始汗家族中，作为第四子巴延阿布该阿玉什第四子的和啰理，与固始汗第十子扎西巴图尔等青海和硕特首领，有着很近的亲族关系。在这次宴会上，康熙帝可能首次发觉或再次确认了青海和硕特与阿拉善和硕特之间的这种关系。随即，康熙帝开始赏赐和优待阿拉善和硕特。据蒙古文《阿拉善史料 3》记载，在这次接见中，康熙帝赏赐和啰理属下的每一位士兵，并任命和啰理的各位公子为旗内官员。[①] 接着康熙四十三年，康熙帝又把清朝和硕公主[②]赐婚给和啰理的第三子阿宝，封阿宝为和硕额驸，后来又命其在御前行

① 参见《阿拉善史料 3》，第 13 页。阿拉善左旗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阿拉善史料 3》（蒙古文），罗巴特尔编辑翻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9。

② 此公主乃康熙帝堂兄和硕庄亲王博果铎之女。博果铎是太宗皇太子之子和硕承泽亲王硕塞之子，顺治十二年封和硕庄亲王。再，关于这门婚姻康熙帝还命甘肃巡抚在阿拉善之地给公主建造了豪华宅邸。参见杜家骥著《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第 157 ~ 158 页，及《八旗通志初集》卷 133，承泽亲王硕塞部分。乾隆四年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走。[①] 显而易见，康熙帝优待和啰理、阿宝父子，是针对将来的西北边疆政策的变化，准备要利用作为卫拉特蒙古一员的阿拉善和硕特。

康熙四十六年，和啰理去世。康熙四十八年，康熙帝封自己的近侍阿宝为多罗贝勒，作为第二代扎萨克，令其返回阿拉善任职。[②] 康熙五十四年，准噶尔军队进攻哈密，清朝立即调动阿拉善和硕特兵500名，令阿宝亲自率领，驻防巴里坤。[③] 此次动员的清军，主要由黑龙江打牲乌拉、索伦、达斡尔、察哈尔、归化城等地八旗，及内扎萨克喀喇沁、鄂尔多斯、乌拉特和阿拉善和硕特兵组成。[④] 扎萨克蒙古兵内，除阿拉善和硕特是康熙三十六年服属清朝的以外，其他皆是清朝的旧有藩属，关系牢固，易于调动。另外，相对阿拉善和硕特，清朝在此次布防中并没有动员早于阿拉善和硕特服属的喀尔喀蒙古兵。可见，清朝动员阿拉善和硕特兵，与阿宝是清朝和硕额驸，曾被康熙帝养育在宫中有很大关系。又，阿宝乃和啰理第三子，在康熙四十三年当时，和啰理长子巴图已早逝，第二子玉木楚木在昭莫多战役中立功，已被封为辅国公，不适合养育宫中。康熙帝选择阿宝，正是因阿宝的年龄适合于养育宫中，易于建立人格上的从属关系。继和啰理之后，清朝没有任命玉木楚木，而是任命阿宝为扎萨克，不能不说这与阿宝是康熙帝养育宫中的子弟有密切关系。康熙帝意图让值得信赖的阿宝掌握阿拉善和硕特的扎萨克兵权，以备西北边疆上的防务。如此，将蒙古王公子弟养育宫中，赐婚给清朝的公主、格格，令其担任御前行走、乾清门行走等侍卫职务，父亲去世后使其返回领地并任命为扎萨克的例子，在

---

① 参见《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80，传64，扎萨克多罗贝勒和啰理列传。

② 参见《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80，传64，扎萨克多罗贝勒和啰理列传。

③ 参见《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80，传64，扎萨克多罗贝勒和啰理列传。

④ 参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机构包，议政大臣，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议政大臣公苏努等奏折（《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2582，议政大臣苏努等议复于归化城推河备兵事折，第1003～1004页）。

康熙朝后半期以后频频出现。可以说，阿宝是最早的例子。①

康熙朝后半期的清朝西北边疆局势，随着达赖喇嘛地方政权政局的变动而不断地发生波动。康熙帝在接见青海和硕特首领的宴会上，偶然发现阿拉善和硕特与青海和硕特之间的亲族关系，随即开始重视阿拉善和硕特。赐给阿宝清朝的和硕公主，将其养育宫中，构筑起亲密的人格从属关系，显然是为了将卫拉特蒙古一员的阿拉善和硕特，作为清朝对青海和硕特、达赖喇嘛地方政权、准噶尔政策的一个环节来争取和利用。

四　清军入藏时期的西北边疆局势和阿拉善和硕特

清军第一次进藏失败后，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康熙帝任命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重整旗鼓，决定第二次进军西藏。当时，准噶尔军队正占领西藏，若策旺阿拉布坦与察罕丹津共同推戴理塘转世灵童为新达赖喇嘛的计划得以成功实施，此时，尊崇达赖喇嘛权威的蒙古各个游牧集团，尤其是刚服属清朝不久的喀尔喀蒙古，就有被挟持新达赖喇嘛的策旺阿拉布坦所操纵的危险。因此，对自称是达赖喇嘛及黄教大施主的康熙帝来说，② 从西藏驱逐准噶尔，在自己名义下保护达赖喇嘛，对保持自身面子及属下众蒙古的稳定

① 在阿宝之前，康熙帝曾经养育过康熙三十一年跟随母亲投奔而来的喀尔喀蒙古的策凌。康熙四十五年，康熙帝赐策凌清朝公主，使其返回牧地。但是，任命策凌为扎萨克，还是康熙六十年的事情。参见《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 70，传 54，扎萨克和硕超勇亲王策凌列传。

② 据《清内阁蒙古堂档》第 20 册，蒙古文第 141 ~ 144 页，满文第 137 ~ 140 页，“下赐厄鲁特策旺阿拉布坦之敕书” 记载，康熙帝在斥责策旺阿拉布坦时言道，“因此乃非达赖喇嘛之呼必勒罕（转世灵童）而否定达赖喇嘛，则大为不妥。此事乃全体青海台吉、西藏、安多、喀尔喀及四十九扎萨克之众施主商定之事也。朕虽是教与政之大主，朕亦不可轻言裁决，因是如此策旺阿拉布坦汝亦为何擅自断言乎”。该敕书于康熙五十八年十月月二十六日录于蒙古堂。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赵珍总结清朝第一次进军西藏失败的原因，认为其“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清朝‘救援西藏’的行动目标没有得到青海蒙古和西藏民众的理解和呼应”。[①] 清军第一次进藏时，康熙帝曾以青海和硕特首领与拉藏汗同为固始汗后裔为由，努力说服其进藏驱逐准噶尔军队。[②] 但结果是，青海和硕特“寻找口实不但没有出兵。反而掠夺我等（清朝）军马”。[③] 所以，第二次进藏，清朝有必要重新调整针对青海和硕特的政策。此外，青海和硕特在清朝与准噶尔的关系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为了与准噶尔周旋，清朝不得不重视它。当时，以达赖喇嘛及黄教真正保护者自居的康熙帝和策旺阿拉布坦，表面上都在主张“弘扬教法”，以此强调各自军事行动的正当性。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康熙帝向策旺阿拉布坦派遣使者，[④] 传达了“札嘎布尔之呼毕勒罕（在藏准噶尔军队保护下的转世灵童）与塔尔寺之呼毕勒罕（青海和硕特保护下的理塘转世灵童），此二呼毕勒罕，将谁置于达赖喇嘛之位，封谁为持教法王，再如何弘扬教法，望早做商定”的旨意。[⑤] 与此同时，康熙帝还将策旺阿拉布坦的使者阿旺达希派遣到西宁抚远大将军允禵处，以求直接商议隆兴黄教的问题。[⑥] 如前所

① 赵珍：《论康熙末年清军两次入藏的战略选择》，第 98 页。

② 参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机构包，康熙五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理藩院满文朱批奏折（《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129，议政大臣巴浑德等奏报策旺阿拉布坦侵掠拉藏汗情形折，第 1257～1260 页）。

③ 《王抚远大将军奏档》第 1 函，第 1 册，康熙五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奏折。

④ 据〔日〕涉谷浩一《温科夫斯基使节团与一七二〇年代前半期的准噶尔、俄罗斯、清之间的相互关系》第 112～113 页中的相关考证，此次所派的使者为侍读学士殷札纳。

⑤ 《清内阁蒙古堂档》第 20 册，蒙古文第 113～118 页，满文第 28～32 页，“下赐厄鲁特台吉策旺阿拉布坦之敕书”。该敕书于康熙五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交付蒙古堂，于二十九日译成。

⑥ 参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机构包，康熙五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理藩院满文朱批奏折（《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332，议政大臣巴珲德等奏请阿旺达希入京城折，第 1363～1365 页）。

述，在塔尔寺的理塘转世灵童由青海和硕特保护着，“持教法王”也应从固始汗后裔中选拔，隆兴黄教的事业急需青海和硕特的参与。因此，争取与青海和硕特一同进藏，因涉及清朝与准噶尔的外交关系，所以是康熙帝优先考虑的重要问题。

那么，康熙帝是怎样争取和拉拢青海和硕特的呢？关于这次的拉拢政策，石滨裕美子总结道，“青海和硕特的出兵西藏，是康熙帝招待察罕丹津和罗卜藏丹津这两位青海和硕特领袖，几番请求出兵西藏后最终实现的结果”。[①] 然而，这两位领袖只不过是青海和硕特右翼首领，他们难以代表全体青海和硕特，若要动员全体，想必还需进行更加妥当和具体的工作。以下，按时间顺序，阐明清朝拉拢青海和硕特的具体政策。

1. 向青海和硕特承诺进藏成功后，在固始汗子孙内册封“护教法王”

康熙五十七年秋，康熙帝在热河召见察罕丹津，向其下达了“固始汗之位，应封谁为好”的谕旨。对此，察罕丹津以亲王罗卜藏丹津是当前青海和硕特最有实力的首领，且年纪较轻，在西藏也有其属民为由，推荐了罗卜藏丹津。但在此次接见中，康熙帝并没有明确答复察罕丹津，也没有具体指名哪位。[②] 察罕丹津返回青海后，定将这一消息传达给全体青海和硕特首领。康熙帝意图让青海和硕特的全体首领得知此次的承诺，让全体首领对“持教法王”的继承人保持期待。如前所述，“持教法王”的册封，关系到青海和硕特、准噶尔、达赖喇嘛地方政权和清朝的根本利益，是当时各势力最为关心的大事。

2. 军事威慑

康熙五十八年三月十一日，抚远大将军允禵率领京畿八旗到达

---

① 〔日〕石滨裕美子：《藏传佛教世界的历史研究》，日本东方书店，2001，第301页。

② 参见《王抚远大将军奏档》第2函，第14册，康熙六十年二月二十三日奏折。

西宁。此前既已滞留在西宁的宗室奉国将军延信[①]，担心青海和硕特会像往常一样，将清军情报秘密输送给准噶尔，为此建议要传播清朝已在青海周边驻扎 30 万军队的谣言，试图武力胁迫青海和硕特出兵西藏。[②]

3. 抚远大将军允禵亲自鼓励青海和硕特首领，同时声言要严惩拒不从军者

当初，青海和硕特大部分首领都不赞同协助清朝出兵西藏。[③] 抚远大将军允禵为了拉拢和动员全体首领，召见了罗卜藏丹津和阿喇布坦鄂木布，鼓励他们为重建父祖所立之黄教事业奋勉。同时允禵还强调，作为康熙帝的代理人，他会严惩拒不从军者。[④] 其中阿喇布坦鄂木布是青海和硕特左翼首领，血缘上接近拉藏汗，很适合说服左翼领主。通过罗卜藏丹津和阿喇布坦鄂木布在青海和硕特会盟上的说服和疏导，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众首领一致同意出兵 10000 名，协助清军进藏。[⑤] 至此，清朝在进军西藏一事上成功地拉拢到了青海和硕特。

得知青海和硕特已经答应协助清军一同进藏消息的康熙帝，于康熙五十八年九月召集延信、楚宗、公策旺诺尔布[⑥]、常

① 太宗皇太极长子豪格第五子猛峩第三子。康熙三十七年起任康熙帝侍卫，康熙四十年十月迁任正蓝旗满洲都统。康熙五十七年被派往西宁。康熙五十九年三月被任命为平逆将军，从青海一路指挥进藏军队，十一月从拉萨撤回。雍正五年被断罪为允禵同党。参见《清史列传》第 3 卷，《宗室王公传 3》，延信部分，王锺翰校，中华书局，1987。

② 参见《王抚远大将军奏档》第 1 函，第 1 册，康熙五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奏折。

③ 参见《王抚远大将军奏档》第 1 函，第 1 册，康熙五十八年四月十六日奏折。

④ 参见《王抚远大将军奏档》第 1 函，第 1 册，康熙五十八年六月十三日奏折。

⑤ 参见《王抚远大将军奏档》第 1 函，第 1 册，康熙五十八年七月二日奏折。

⑥ 公策旺诺尔布，喀尔喀蒙古赛音诺颜部扎萨克镇国公，从小被康熙帝养育于宫中，历任侍卫、内大臣、正黄旗蒙古佐领等职。康熙五十一年任为扎萨克王爷，使其返回牧地。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元年，活跃于清朝和青海和硕特、达赖喇嘛地方政权之间，雍正四年任副盟长，参见《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 72，传 56，《扎萨克镇国公托多额尔德尼列传》。

寿[①]等军前将领进京，以商讨军机事宜。[②] 经过一番商议，康熙帝最终交代了进军前后的要务。此次康熙帝所交代的内容，在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兵部满文朱批奏折、上谕中记载如下。[③]

> 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为大军三路进发等议政所议事，议政大臣等面奏时，自三路军前来之大臣等奉敕谕……策凌敦多布等在我军威前必败走。败走即好。败走即因是由我军将其败走而声威大矣。取召地后我等此兵丁如何〔安置〕，赴军中之大臣等详议。应防守之需要留驻〔一些〕兵丁，将其余兵丁，或由西宁路，或由云南、四川路撤回等处，汝等甚加详虑后撤回才好。再，青海兵，依朕之意将其〔编于〕大军前与我蒙古兵一同效力。敌弱则击破之，〔敌〕强则将其与我大军会同〔一处〕攻破。如此，则益于事。再，额驸阿宝率兵，在队尾护卫，以警惕贼寇。抵达战场后，务必将其与前队之青海兵一同编制为好。倘若青海蒙古兵一路杀败敌人，取召地成功，即功矣。以此我将军大臣〔怨言〕，"设满洲兵，却让蒙古兵立功，我兵只等闲呼"，若存此意，即非也。功成，乃全体之功。即青海兵在前效力，立功取召。倘若伊等以，"土伯特之国与教法，皆我祖父固始汗所立，地方皆属我等。仰赖圣主大军之声威，以攻取各个地方，主子之

① 理藩院侍郎常寿，蒙古旗人官僚。康熙四十年起从事清朝对准噶尔、青海和硕特、达赖喇嘛地方政权的工作。康熙五十四年派往西宁，频繁面会青海和硕特领主，与其交往密切，深知青海和硕特内部详情。

②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85，康熙五十八年九月乙未条。

③ 汉译内容可参考《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479号，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月二十三日，康熙帝谕西征军大臣同心协力取召地（拉萨）事，第1442页。但是，汉译文将满文原件中康熙帝假设青海和硕特首领的话语，错误地翻译成了康熙帝本人的谕旨。

远来之兵，为何为守召地而辛劳驻扎，因我兵理应驻守而仅以我兵驻守即可也”。〔如此〕伊等欲驻守也好，以此我大臣等驻扎少量兵丁，即已完事。今朕降此敕谕，若日后以朕未曾谕及而翻悔，则断然不可，朕于众人之前颁此谕也。我大军前去取召地，此非平常之功，功大矣。钦此。

归纳康熙帝的意思大致有以下几点。1. 进军西藏一事成功，可以助长清朝的军威，事成之后，要在西藏驻扎少量清军。2. 战斗开始之前，要将青海和硕特军队编制在清军前方，要使青海和硕特军队与准噶尔军队直接战斗。清军只做应援。3. 动员阿拉善和硕特额驸阿宝，令其在途中护卫达赖喇嘛，战斗开始之前，要将其与青海和硕特一同编制在清军前方。即，康熙帝首先要让阿宝护卫达赖喇嘛，然后让阿宝和青海和硕特首领们一同与准噶尔军队战斗，以此达到进军西藏结束后，让阿宝带领少数清军驻扎西藏的目的。如史料记载，进藏成功后，青海和硕特很有可能不希望清军驻扎西藏。如果青海和硕特果真如康熙帝预测的那样，要求清军全部撤回，那么，为了继续维持和青海和硕特之间的关系以牵制准噶尔，清朝不得不答应其要求，只能从西藏撤军。在此前提之下，康熙帝积极动员与青海和硕特首领有近支亲族关系的阿宝，巧妙地让其带领少数清军驻扎西藏。依照康熙帝的这一意图，议政王大臣们也商定如下："若贼策凌顿多布等败回伊之故地，欲驻留我阿宝额驸之兵五百、察哈尔兵四百，及满汉兵两千、青海兵两千。"①

带领这些兵丁的清军将领中，唯有阿宝是外藩蒙古王公，其余只不过是八旗都统或绿营总兵官而已。另外，从青海和硕特方面来看，阿宝也是固始汗子孙，是与各位首领有浓厚血缘关系的

① 《王抚远大将军奏档》第2函，第12册，康熙六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奏折。

亲族，并在驱逐准噶尔的战役中并肩战斗过，有足够的条件和权利驻扎西藏。如此，清朝利用阿宝，意图顺利地让少数清军驻扎西藏。

康熙五十九年二月，清朝从巴里坤调阿宝至西宁，给阿宝属下兵丁更换了马匹。① 同年三月，阿宝亲赴塔尔寺，拜见了刚被康熙帝册封为达赖喇嘛的噶桑嘉措。此前不久，康熙帝正式册封了在塔尔寺受青海和硕特保护的理塘转世灵童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声言要护送他到布达拉宫坐床。② 虽然清朝这次尊重青海和硕特的意见，册封了理塘转世灵童噶桑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但西藏僧俗民众一贯认为仓央嘉措才是真正的六世。后来，乾隆帝也尊重西藏方面的意见，于乾隆四十八年，册封噶桑嘉措的转世灵童强白嘉措为第八世达赖喇嘛，更正了达赖喇嘛的转世系谱，意味着清朝也间接承认了噶桑嘉措的七世达赖喇嘛身份。为此，本文称理塘转世灵童噶桑嘉措为七世达赖喇嘛。

康熙五十九年三月一日，康熙帝任命延信为平逆将军，公策旺诺尔布为参赞大臣，由二人任前线指挥官，统领清朝、青海和硕特联合军团，作为主力从青海一路进藏。③ 四月二十日，抚远大将军允禵亲临塔尔寺，将康熙帝的册封文和印章，交授给了新达赖喇嘛噶桑嘉措后，进军西藏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④ 四月二十二日，允禵带领少数清军从西宁出发，五月二十四日到达青海中部的索罗穆之地。⑤ 二十七日，延信率领清军主力也到达此地。但是，青海和硕特军队却迟迟没有按照预定时间到达索罗穆。为了按计划与四川、云南一路进发的清军顺利会师，允禵率领清军主力，于六月初

① 《王抚远大将军奏档》第1函，第6册，康熙五十九年二月九日奏折。
② 参见《七世达赖喇嘛传》，第57、56页。
③ 参见《王抚远大将军奏档》第1函，第6册，康熙五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奏折。
④ 参见《王抚远大将军奏档》第1函，第7册，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奏折。
⑤ 索罗穆，指黄河源头之琐力麻川流域。此地有查灵海、鄂灵海两大湖泊，水草丰茂，自元朝时期起便是蒙古各部通往西藏的必经之地。

从索罗穆之地出发，二十日到达青海南部的木鲁乌苏之地。[1] 然而到了六月十五日，青海和硕特左翼军队还是没有到达预定的索罗穆之地。抚远大将军允禵强令延信，让其带领已经到达索罗穆的青海和硕特右翼军队迅速赶到木鲁乌苏，与允禵等会合。[2] 七月九日，罗卜藏丹津等青海和硕特右翼首领率领部分兵队到达木鲁乌苏之后，抚远大将军允禵与他们举行了会谈。关于会谈内容，《王抚远大将军奏档》第1函第9册，康熙五十九年七月十日奏折，记载如下：

> 七月初九日，将军延信领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郡王察罕丹津、贝子喇查布、丹仲、公敦多布达什、亲王罗卜藏丹津之女婿墨尔根诺彦等至兵营。臣我支立帐房，派护卫、章京引亲王罗卜藏丹津等入内，互献哈达问好，于帐下西侧铺坐褥将伊等入座。众皆坐后，臣我问伊等："汝等之兵皆已完全到着与否"等语。罗卜藏丹津等答道："我等自身先至索罗穆之地，等候我左翼兄弟，一直在将军身旁。本月初接准大将军王字寄，我等各自见机领兵急进，与将军同来，其余兵丁皆照顾马畜续后而来"等语。臣我又问伊等："我等从前议定，到达木鲁乌苏后三路前行，于土呼勒托罗亥会合而一同进发。今我自身较汝先至木鲁乌苏，我内属满洲兵，本月十五日始皆已渡河完毕。汝等之兵，亦照此各自渡河，于何地滞留，如何设置哨卡，如何放养及收回马匹等处，汝等应全体商议才是。续后赶来之人，我必定陆续使其渡河，遣送追及汝等"等语。

---

① 参见《王抚远大将军奏档》第1函，第8册，康熙五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奏折。
② 参见《王抚远大将军奏档》第1函，第9册，康熙五十九年七月十日奏折。

罗卜藏丹津等答道："先前所奉圣主谕旨中曾有'黄教，乃汝等祖辈所立。汝等理应全体同心奋勉效力才是'等再三教导之处。今大将军王亦仁慈叮嘱我等之处，务必将其挂念于肺腑，应不惜性命，以死效力。只我等众兄弟皆未赶来。若使然，待我兄弟等前来一同进击，想必兵力强大。不管如何，遵大将军王指示行事"等语。臣我又问伊等："我四川兵捕获陶克陶等三名准噶尔人，又布尔部落头人所献两名准噶尔人供称：'准噶尔军只两千八百余。'汝等青海兵已至者近六千，因与我内属兵丁、额驸阿宝兵、扎萨克兵、察哈尔兵、绿旗兵一同前进，故攻破彼等小贼，无丝毫难处。惟黄教乃汝等祖父所立之道，因是汝等家事，将汝等置于前，只为使汝等尽为黄教效力，刷洗汝等之雪耻，以得尊严而已。将军率大军在汝等之后，遇敌，若能以汝等之兵力破之，即以汝等之道理行事。若敌强，汝等不能破之，则告知将军，我大军上前将其攻破。抵达战场，我内属兵丁绝无让人之礼，汝等还未与我内属兵丁同行，而不知其罢。此间，公策旺诺尔布乃一喀尔喀人，此即已知晓。将军其身与汝等同行，全体一心善处，则益于事。将汝等所熟知之处告之，按将军所言行事，即按我所言行事矣。汝等之内，若有切实效力之人，我必定奏闻。若有逃脱退缩之人，已有汝等祖父所定之禁律，我断然不予饶恕"等语。众皆跪言："我等愚思，待与我兄弟等同进，则思兵力强大。今大将军王即有如此警言，我等才知其含义，不管如何，谨遵将军王指示行事"等语。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木鲁乌苏以南之地，便是准噶尔军队的设

防范围。所以，允禵在这次会议上谨遵康熙帝的谕旨，将青海和硕特右翼军队编制在了清军前方，表明要以青海和硕特的兵力来攻击准噶尔军队。当时，自青海路进藏的清军主力人数并不比准噶尔军队少，甚至超出很多。那么，康熙帝和允禵为什么要让青海和硕特军队充当前锋，以其兵力进击在藏的准噶尔军队呢？这与第一次进藏时清军遭准噶尔军队的夜袭以致全军覆没的教训有关。一方面，清朝从内地调集的八旗、绿营兵，虽然人数多，但没有在青藏高原战斗的经验。机动性相对较高的察哈尔八旗和喀喇沁、翁牛特等内扎萨克蒙古兵①人数有限，以他们单独的兵力也很难抵挡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准噶尔军队的进攻。欲打败惯于野战的准噶尔军队，必须积极利用经常往来于西藏和青海之间的青海和硕特军队。另一方面，从战略角度讲，在此次进藏战争中让青海和硕特军队打击准噶尔军队，以此离间和分化两者，达到牵制和孤立当时清朝最主要的敌人准噶尔的目的。为此，抚远大将军允禵作为皇子，以康熙帝代理人的名义，召见青海和硕特右翼首领，尊重蒙古礼仪互换哈达，让首领们坐在蒙古包内右侧的贵宾席上。又以“黄教乃汝等祖父所立之道，因是汝等家事，将汝等置于前，只为使汝等尽为黄教效力，刷洗汝等之雪耻，以得尊严而已”为由，加以鼓励。再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帝还经常以“黄教，乃汝等祖辈所立。汝等理应全体同心奋勉效力才是”为由，鼓励青海和硕特。这可能是康熙帝为了动员全体青海和硕特首领而颁下的谕旨。为了拉拢和动员青海和硕特进藏，康熙帝不得不接受和承认达赖喇嘛地方政权乃青海和硕特所立政权的事实。而清朝与青海和硕特的联合，只有在尊重这一前提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允禵领会父皇康熙帝的意思，始终贯彻这一宗旨，把青海和硕特编制在了清军前方。允禵在从京师到西

---

① 参见《清内阁蒙古堂档》第20册，蒙古文第157～170页，满文第147～157页，“下赐厄鲁特台吉策旺阿拉布坦之敕书”。该敕书于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在蒙古堂录制后，令交给滞在巴里坤的准噶尔使者喀什喀。

宁的路上还经常向康熙帝询问，“闻青海人等至此问候我。伊等来至仰赖汗父（康熙帝）洪恩，若向我献礼，臣我收受与否。收何种礼物，回送何种礼物之处，奉汗父敕谕”。[①] 由此可知，允禵在与青海和硕特部首领来往时，一直在请示康熙帝。允禵作为康熙帝的皇子，相对于其他宗室王公及侍卫大臣更具有号召力，这也可能是康熙帝派允禵出征的首要原因。

按照允禵的部署，在实际作战中，青海和硕特和阿拉善和硕特兵作为联合军团的前锋，3 次打败准噶尔军队的进攻，使其败走。[②]

清朝、青海和硕特联合军团，成功驱逐了在藏的准噶尔势力，于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十五日，将新达赖喇嘛送到了拉萨布达拉宫的宝座上。关于此次联合军团的拉萨入城仪式，藏文“七世达赖喇嘛传”第 145 叶，记载如下。[③]

> 铁阳（庚）鼠年（1720），蒙古历九月二十五日，水星与二十八星宿之境域缝合，年在接近的吉兆特殊日子。黎明时起开始奏乐，持伞、宝幢、飞幡等宝贝装饰品，回转政教二转轮之大王……喇嘛身后领队的是从南北而来的守护世间的大将军，其后依次是文殊菩萨大汗的大臣、侍读学士、都统等，宣扬教法之土观呼图克图、甘珠尔大喇嘛，以及成吉思汗的后裔喀尔喀的敦多布王和公策旺诺尔布、台吉阿旺扎木素，持教法王固始汗的子孙额驸阿宝、亲王罗卜藏丹津、郡王噶勒丹额尔德尼济农、额尔德尼额尔克、额尔德尼达赖博硕克图、墨尔根戴青、青洪台吉、额尔德尼济农之子季克吉德扎布、额尔德尼博硕克图、噶

① 《王抚远大将军奏档》第 1 函，第 1 册，康熙五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奏折。

② 《王抚远大将军奏档》第 1 函，第 10 册，康熙五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奏折。

③ 汉译请参照《七世达赖喇嘛传》第二章，“自东方渐次行进至布达拉宫坐床（一七〇八年至一七二〇年）”，第 61 ~62 页。

勒丹达什、戴洪台吉、格勒济农等。

史料中，“回转政教二转轮之大王”指的是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达赖喇嘛虽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最高转世法王，但自1642年，固始汗亲自将征服到手的卫藏之地献给五世达赖喇嘛时起，达赖喇嘛也就变成了卫藏地区（除班禅喇嘛领地外）的世俗领袖。而史料中达赖喇嘛身后的两位大将军则指的是从青海路进军的平逆将军延信和从四川、云南路挺进的定西将军噶尔弼。他们作为清军的前线指挥官，走在了队伍的最前头。其次是侍读学士常寿等清军将领和土观呼图克图、甘珠尔大喇嘛等康熙帝所派的格鲁派高僧。走在他们之后的，是内外扎萨克蒙古的代表，喀尔喀蒙古的额驸敦多布道尔吉、公策旺诺尔布和内扎萨克乌珠穆沁部的台吉阿旺扎木素。[①] 而被排在队伍最后的，却是作为固始汗子孙的和硕特首领，其中阿拉善和硕特的阿宝又被安置在了队列的最前头。如前所述，青海和硕特和阿拉善和硕特兵，作为此次进藏军队的前锋，与准噶尔军队直接作战，清军只做了后援。但在欢送达赖喇嘛至布达拉宫坐床的拉萨进城仪式中，清朝的将军、大臣、军官们被安排在队伍的最前列，其后是内外扎萨克蒙古的代表，最后才是阿拉善和硕特和青海和硕特的首领。显然，队列是由清军将领策划组织的。这是为了让参加入城仪式的拉萨僧俗民众，从队伍的前后顺序认知远征军的高低贵贱，彰显清朝的地位。再有，将阿拉善和硕特的阿宝和罗卜藏丹津等青海和硕特首领安排在同一队列中，且让阿宝走在最前面，是为了让七世达赖喇嘛、青海和硕特首领和拉萨民众，更加明确和相信阿宝是固始汗子孙，清朝也是如此认定阿宝身份的事实。

① 参见《清内阁蒙古堂档》第20册，蒙古文第233～255页，满文第216～232页，“下赐厄鲁特台吉策旺阿拉布坦之敕书”。该敕书于康熙六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在蒙古堂录制。

五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一、自康熙三十五年起始的康熙朝后半期的清朝西北边疆局势，随着达赖喇嘛地方政权的政局变动，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考虑到西北边疆的稳定，以黄教大施主自居的康熙帝，虽密切监视青海和硕特、达赖喇嘛地方政权和准噶尔的动向，但还是难以防止各势力间的联络和较量。

二、康熙帝逐渐认识到，青海和硕特在对达赖喇嘛地方政权的稳定，及清朝与准噶尔的关系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康熙帝在监视青海和硕特的同时，为了能够对将来的青海和硕特及达赖喇嘛地方政权施加影响，注意到了阿拉善和硕特和青海和硕特之间的亲族关系，开始重视和优待阿拉善和硕特，将幼小的阿宝养育宫中，构筑起了深厚的人格主从关系。

三、康熙五十八至五十九年第二次进军西藏之际，争取和拉拢与准噶尔有密切关系的青海和硕特，成为当时清朝西北边疆政策的重中之重。因此，康熙帝派皇十四子允禵到西宁，以康熙帝代理人身份尊重蒙古礼仪，游说和胁迫青海和硕特出兵西藏。康熙帝还册封被青海和硕特保护的理塘转世灵童为达赖喇嘛，并约定进藏结束后从固始汗子孙内册封拉藏汗继承人，以此得到了青海和硕特的协助。其后，康熙帝又为了防备进藏结束后青海和硕特要求清军全体撤退的尴尬局面，巧妙地调动阿拉善和硕特的阿宝到进藏前线，使其在保护达赖喇嘛的同时与青海和硕特首领并肩战斗，让达赖喇嘛和青海和硕特首领了解阿宝的战斗功绩，借此达到在西藏驻扎少量清军的目的。这样，清朝不仅可以避免与青海和硕特的关系破裂，又可以孤立

和削弱准噶尔。

关于进藏成功后，针对当时的西北边疆局势，清朝如何支配阿拉善和硕特的问题，请参见拙稿《清军驻藏与阿拉善和硕特的关系》。[1]

（原载《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4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第147～161页）

① 齐光：《清军驻藏与阿拉善和硕特的关系》，《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5辑，2012，第139～155页。

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及其研究价值

吴元丰

1979 年秋，笔者作为一名满文档案工作者，乘出差到东北之便，特意到富裕县三家子村考察满语的使用现状，同时了解到与三家子村相邻的五家子屯为柯尔克孜族聚居村。但因诸多原因，至今未能到五家子屯考察，甚为遗憾。不过欣慰的是，从 1979 年始，笔者不仅留心查阅有关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历史的研究文章，而且在整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满文档案过程中注意发现和收集有关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档案史料，最终撰写成《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地区考实》一文，发表在《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 年第 1 期上，被评为该刊物年度优秀论文。此后，有关方面的学者和人士都十分关心新发现的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史料，并希望全面了解。现就新发现的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及其研究价值做一论述，谨请各位同仁赐教。

一　黑龙江柯尔克孜族历史研究状况及其史料的缺憾

柯尔克孜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清代称之

为“布鲁特”或“吉尔吉斯”。今中国境内的柯尔克孜族主要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另有少部分人聚居在黑龙江省富裕县五家子屯等地。

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引起世人的关注，始于20世纪40年代。1940年日本占领东北当局《关于兴安省四蒙旗土地报告书》中指出，该旗地界内居有“柯尔克孜八户，人口四十九，原现住地是龙江县”。[①] 1943年，日本人田村陪同和田清、岛田好两位日本学者调查东北地区蒙古部落时，又发现了富裕县五家子屯柯尔克孜族，并在《齐齐哈尔报》上撰文介绍。1944年，日本人楢原正人专程到富裕县五家子屯对柯尔克孜族进行调查，并写成调查报告《访柯尔克孜族》一文，发表在《北方圈》1945年5月号上。楢原正人在调查报告内指出：“西部蒙古族（厄鲁特族）的一部依克明安旗是由新疆迁来的，清高宗乾隆二十年准噶尔部阿睦尔萨纳叛乱之际，土尔扈特部酋长巴桑在伊犁投降清军并当向导有功，清廷任命辅国公。后来请求移住于现在的呼伦贝尔索伦旗，后来又有一部移到现在的依克明安旗。与原地较近的柯尔克孜族可能与他们同时移来的。”[②]

1958～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全国各少数民族社会和历史进行了普遍调查。当时，对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社会和历史也进行了专门调查，并写成调查报告《黑龙江省富裕县柯尔克孜族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分历史沿革、经济、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四大部分，较为详尽。调查报告指出：“黑龙江省嫩江草原的柯尔克孜人，来源于新疆。他们原居新疆帕米尔高原天山一带。柯尔克孜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世代以牧为业。乾隆二十年（1755），清朝征服额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落，俘其首领达瓦齐，后

① 〔日〕楢原正人：《访柯尔克孜族》，《黑龙江民族丛刊》1986年第2期。
② 〔日〕楢原正人：《访柯尔克孜族》，《黑龙江民族丛刊》1986年第2期。

释之，封和硕亲王。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平定了另一个首领阿睦尔萨纳叛乱之际，为了防止其残部的反抗，把一部分被俘者迁到黑龙江来。其中就有一部分柯尔克孜人。"[①] 从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讲，1940～1961年期间，虽然没有有关研究成果问世，但毕竟进行了社会和历史调查，形成了两份调查报告，为以后研究工作的开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后因众所周知的缘故，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历史研究工作也处在停顿状态。自1983年起，不少学者和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研究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的历史、经济、文化和风俗，成绩斐然。先后发表的学术论文主要有：胡振华先生的《黑龙江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及其语言特点》，朱国忱先生的《关于富裕境内柯尔克孜族的迁徙原因、年代和路线问题》，张泰湘等先生的《来自叶尼塞河畔的黑龙江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白永贵先生的《富裕县五家子柯尔克孜族村贫困分析及其对策》，杨志军、于学斌先生的《嫩江流域柯尔克孜族源考》，葛若玉先生的《浅谈黑龙江省经济发展进程》、《柯尔克孜族风俗》和《柯尔克孜族》等。综观各位先生的论文，除经济、文化和习俗三方面外，主要涉及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来源、东迁原因、过程和安置四方面内容。

关于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来源，概括起来讲，主要有四种说法。除《黑龙江省富裕县柯尔克孜族调查报告》内提出的来自新疆帕米尔高原天山一带之说外，其余三种说法，一为来自新疆阿尔泰山一带。葛若玉先生认为，"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十三年（1758年）部分柯尔克孜族人从新疆阿尔泰山一带迁到沃野千里人烟稀少的黑龙江"。[②] 二为来自阿尔泰山和杭爱山地区。胡振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丛刊编辑组编《柯尔克孜族社会历史调查》，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第99页。

② 参见葛若玉《柯尔克孜族风俗》，陈伯霖主编《黑龙江少数民族风俗》，中央大学出版社，1993。

华先生认为，“富裕县的柯族，是清朝平定准噶尔部俘其首领达瓦齐时，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由阿尔泰山、杭爱山一带被充军迁来的”。[①] 三为来自叶尼塞河上游。张泰湘等先生认为，“富裕县的柯族来源于叶尼塞河上游的柯尔克孜人”。[②]

关于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的原因，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随准噶尔部参加反清叛乱，后作为叛民发配。杨志军、于学斌先生认为，“柯尔克孜族很早就隶属于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时期（1635 ~ 1653 年），他们就是准噶尔部统治下的民族之一，他们每年必须向准噶尔部上缴实物税，而且在军事上也受准噶尔部的调遣。从柯尔克孜人屡次受准噶尔调遣的事实可以判断，柯尔克孜人参与了准噶尔部的军事行动，而且很有可能作为一支军事力量为其冲锋陷阵。正因如此，柯尔克孜族才认为自己是达瓦齐的子民。他们被迁入东北就是因为参与了达瓦齐的反清割据活动”，“从而作为叛民发配到东北”。[③] 二为随准噶尔部参加反清战争，后作为俘虏流放。朱国忱先生认为，雍正十年，清廷再次对厄鲁特进行战争。“这次战争使厄鲁特受到一定打击，清军俘虏了一部分准噶尔人，流徙于黑龙江地区。”另外，“在乾隆二十至二十三年间的对准噶尔战争中，成千上万的准噶尔人（包括厄鲁特蒙古、柯尔克孜等），被俘虏迁散。有一部分被迫流迁黑龙江等地。嫩江地区的柯尔克孜族就是其中的一部分”。[④]

关于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的过程，主要在东迁的时间和路线

---

① 胡振华：《黑龙江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及其语言特点》，《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 年第 2 期。

② 张泰湘等：《来自叶塞河畔的黑龙江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黑龙江民族丛刊》1991 年第 1 期。

③ 杨志军、于学斌：《嫩江流域柯尔克孜族源考》，《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 年第 3 期。

④ 朱国忱：《关于富裕境内柯尔克孜族的迁徙原因、年代和路线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1986 年第 1 期。

上存在分歧。东迁的时间，主要有三种说法。一为雍正十年（1732）说。该说认为，在雍正十年，清廷与厄鲁特发生战争，“这次战争使厄鲁特受到一定打击，清军俘虏了一部分准噶尔人，流徙于黑龙江地区。这里包括柯尔克兹族”。[①] 二为乾隆二十年或二十一年（1755 或 1756）说。该说认为，“如果像调查的口碑资料指出的那样，富裕县的柯族是达瓦齐的部属，在他们传说中没有阿穆尔撒纳和清朝的战争，可见东迁是在这次战争之前，即达瓦齐失败之后，乾隆二十年（1755）或二十一年（1756）”。[②] 三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说。该说认为，“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由阿尔泰山、杭爱山一带被充军迁来的”。[③] 另外，关于其迁徙路线，主要有两说：一为北路，通过漠北喀尔喀蒙古草原进入黑龙江地区；[④] 二为南路，通过河西走廊和北京等地进入黑龙江地区。[⑤]

关于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后的安置，目前基本上不存在分歧，都认为当初东迁黑龙江地区的柯尔克孜族人，分别被安置在爱珲、卜奎（即齐齐哈尔）、海拉尔（即呼伦贝尔）、呼兰、巴彦苏苏等五处，并编入正红、正蓝、正白、镶蓝四旗。

通过归纳以往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历史研究状况，可以看到，对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的来源及其迁徙原因、过程等，众说纷纭，分歧较大，并无定论。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点是，各家都

---

① 朱国忱：《关于富裕境内柯尔克孜族的迁徙原因、年代和路线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1986 年第 1 期。

② 张泰湘等：《来自叶塞河畔的黑龙江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黑龙江民族丛刊》1991 年第 1 期。

③ 胡振华：《黑龙江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及其语言特点》，《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 年第 2 期。

④ 张泰湘等：《来自叶塞河畔的黑龙江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黑龙江民族丛刊》1991 年第 1 期。

⑤ 朱国忱：《关于富裕境内柯尔克孜族的迁徙原因、年代和路线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1986 年第 1 期。

未掌握直接、可靠、翔实的史料，一般都是依据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的传说、语言、宗教和风俗，并参考相关的文献资料后，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这样所得出的结论，必然带有一定的推论，缺乏说服力。换句话说，以往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历史的研究始终存在一种缺憾，就是缺乏直接、可靠、翔实的史料。有学者曾撰文提出："嫩江流域柯尔克孜族的来源问题一直是民族史学界长期探索而不得其解的难题，其难处就在于史无明确记载，靠历史文献、地方志资料探寻柯尔克孜族的来源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① 这就说明，仅仅依靠目前已知的文献资料，根本无法解决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的来源问题，必须去发掘新的史料。

二　黑龙江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的由来及其内容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以满族上层为主体联合其他民族的上层建立起来的封建专制政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历时 290 余年之久。有清一代，定满语为国语，称满文为清字。清代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满蒙官员，特别是承办八旗事务及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满蒙官员，一般都用满文缮写公文，不准擅自使用汉文，否则重者治罪，轻则训饬。与此相适应，有关诰敕、谕旨、寄信及各部院的行文，也都用满文书写。另外，管理宫廷和陵寝事务的官员也不能随意用汉文缮折，而是用满文缮折奏事。因此，有清一代，除大量的汉文档案外，还形成了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 1000 万件清代档案中，就有 200 万件满文档案。

① 杨志军、于学斌：《嫩江流域柯尔克孜族源考》，《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 年第 3 期。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满文档案中，目前查到的有关柯尔克孜族历史的档案共26件，起自雍正十年（1732）五月十八日，止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二月十三日。这26件满文档案，分别从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和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内查出，其中奏折7件、咨文10件、札付5件、呈文4件。为了便于全面了解有关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的情况，现将这部分档案的形成时间、事由及出处列表，如表1所示。

表1　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概览

序号	时　间	事　　由	出　处
1	雍正十年五月十八日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委派官兵护送吉尔吉斯人迁往厄鲁特郡王色布腾旺布游牧居住折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	雍正十一年三月十六日	靖边大将军锡保奏请将厄鲁特郡王色布腾旺布属下吉尔吉斯人迁往齐齐哈尔等处折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3	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靖边大将军锡保为委派官兵护送吉尔吉斯人迁往齐齐哈尔等处事致黑龙江将军札付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4	雍正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署黑龙江将军卓尔海为吉尔吉斯人迁到齐齐哈尔后如何安置事致军机处咨文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5	雍正十一年六月初九日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议奏吉尔吉斯人迁到齐齐哈尔后安置事宜折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6	雍正十一年八月初五日	署黑龙江将军那苏图为吉尔吉斯人迁到并核查人口数目事致靖边大将军锡保咨文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7	雍正十一年八月初六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委派官兵护送吉尔吉斯人到黑龙江城事致署布特哈总管硕尔泰札付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8	雍正十一年八月初六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委派官兵护送吉尔吉斯人到黑龙江城事致墨尔根副都统咨文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9	雍正十一年八月初六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委派官兵护送吉尔吉斯人至墨尔根城事致署布特哈总管硕尔泰札付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10	雍正十一年八月初八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造送移驻黑龙江墨尔根二城吉尔吉斯人户口册事致黑龙江副都统咨文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11	雍正十一年八月初十日	署布特哈总管硕尔泰为委派官兵转送吉尔吉斯人到黑龙江城事致黑龙江副都统呈文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续表

序号	时　间	事　　　　由	出　处
12	雍正十一年八月初十日	署布特哈总管硕尔泰为委派官兵转送吉尔吉斯人到墨尔根城事致黑龙江将军衙门呈文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13	雍正十一年八月十九日	墨尔根副都统多奇纳为将吉尔吉斯人编入旗佐并支给粮石事致黑龙江将军衙门咨文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14	雍正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署黑龙江将军那苏图等奏报吉尔吉斯人抵达并分地安置情形折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15	雍正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酌选吉尔吉斯人充当披甲并造送披甲名册事致墨尔根副都统咨文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16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四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查核吉尔吉斯人口数目并支给银两米石事致军机大臣咨文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17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四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从吉尔吉斯人内挑取披甲分驻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三城事致兵部咨文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18	雍正十一年十月初六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将吉尔吉斯披甲渐次补充为额定披甲事致黑龙江副都统咨文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19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初四日	署定边左副将军为将居住在喀尔喀地方吉尔吉斯人赏给索伦等为奴事致黑龙江将军咨文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20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初六日	署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扎布奏遵旨将居住在喀尔喀地方吉尔吉斯人解往黑龙江赏给索伦等为奴折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1	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将吉尔吉斯等人酌情分赏给索伦等为奴事致署呼伦贝尔总管阿必西克等札付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22	乾隆二十二年八月初八日	署呼伦贝尔总管阿必西克等为吉尔吉斯等人抵达并分赏索伦等为奴事致黑龙江将军衙门呈文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23	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署布特哈总管佛齐保等为报吉尔吉斯等人分赏本处索伦达斡尔为奴等情事致黑龙江将军衙门呈文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24	乾隆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吉尔吉斯等人所带牲畜不必另行抽出分赏事致署布特哈总管佛齐保等札付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25	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	黑龙江将军绰尔多奏报吉尔吉斯等人分赏呼伦贝尔布特哈二处索伦达斡尔为奴情形折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6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定边左副将军成滚扎布奏请免乌梁海宰桑鄂诺木官职其部众与吉尔吉斯合编一鄂托克交巴彦管束折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表1使我们可以全面系统地了解有关黑龙江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的基本内容，概括起来讲，它们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厄鲁特郡王色布腾旺布所属和居住在喀尔喀地方的吉尔吉斯人东迁黑龙江地区的原因，以及筹办东迁的具体过程；两批吉尔吉斯人分别迁往黑龙江地区的时间、行走路线和委派官兵护送情况；迁到黑龙江地区的吉尔吉斯人户口数目、分别挑取披甲和赏给索伦达斡尔为奴、分地安置，以及挑取披甲者发给银两米石情况；仍留居于乌梁海地方的一部分吉尔吉斯人，与乌梁海宰桑鄂诺木属下人合编一个鄂托克，并任命吉尔吉斯人巴彦为宰桑管理鄂托克事务等情况。

以上26件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的内容，在其他文献资料中均不见记载，是研究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历史十分罕见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而且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

三　黑龙江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的研究价值

档案是人们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原始记录，具有原始性、可靠性、客观性和系统性，对历史研究而言，更具有其他史料无法替代的研究价值和作用，是十分珍贵的史料。从已查到的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内容看，集中反映了柯尔克孜族人先后分两批东迁到黑龙江地区的全过程，而且较为系统和详尽，为研究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历史提供了新资料，有助于解决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疑难问题，推动研究工作更加深入系统的开展。

（一）有助于进一步研究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来源

以上已提及，关于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来源，众说纷纭，莫衷

一是，共有四种不同的说法。这次查到的满文档案内就有一件奏折，对研究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来源具有重要价值。现将该满文奏折汉译如下：

雍正十年五月十八日，靖边大将军·和硕顺承亲王·臣锡保等谨奏，为奏闻事。臣等查得，厄鲁特王色布腾旺布所属吉尔吉斯人二百余户，原先在厄得勒等处地方住牧。伊等由于远离其主而居，不暗法纪，尚未开化。去岁，在贼兵临近之际，喀尔喀部众游牧均已内迁，唯吉尔吉斯人等往外移至特斯之科果尔托罗海地方住牧。臣等曾晓谕察哈尔游牧官兵防范看护。今喀尔喀部众游牧皆已内移，仅吉尔吉斯百余户人居住在外，倘有事端，极为不利。是故，本处咨文该王色布腾旺布，将其属下吉尔吉斯人或移至贝勒班第游牧附近居住看管，或移往尔王附近地方居住，悉听尔王定夺。若移至尔王附近地方居住较妥，则由尔处多派干练员弁前往吉尔吉斯游牧地，将伊等迁移。等因前去。色布腾旺布派其侍卫车凌扎布、阿穆呼郎等致文内称：为迁移吉尔吉斯人等，我处理应多派人员，但我等游牧即将内移，难以多派，仅委派侍卫车凌扎布、阿穆呼郎等前往。此等吉尔吉斯人，如何迁到我处同住，请大将军·王等裁定。等语。王色布腾旺布因其游牧即将内移，不能多派人员，故臣等召来吉尔吉斯宰桑等加以晓谕，酌派驻防蒙古兵、喀尔喀兵，会同色布腾旺布之侍卫车凌扎布、阿穆呼郎等前往吉尔吉斯游牧，监督迁移，途次加以防范看护，送至喀尔喀游牧。由喀尔喀各游牧依次派兵送至王色布腾旺布游牧居住。为此谨具奏闻。[1]

---

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1507－002。

该奏折内提到的这部分吉尔吉斯人，后经清廷再三考虑，被迁到黑龙江地区居住。因此，可以肯定今日居住在黑龙江省境内的柯尔克孜族先人中有一部分是从特斯河流域迁移而来的。同时，该奏折内也提到，在特斯河流域居住的吉尔吉斯人，原住牧在厄得勒等地，并归厄鲁特郡王色布腾旺布管辖。这不仅确定了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地区之前的居住地，而且为进一步搞清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有助于澄清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地区的原因

关于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地区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作为叛民发配，二是作为俘虏流放。在这次查到的满文档案内，也有一件奏折，从中可以了解到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的原因。现将该满文奏折汉译如下。

雍正十一年三月十六日，靖边大将军·和硕顺承亲王·臣锡保等谨奏，为请旨事。据厄鲁特王·额驸色布腾旺布呈称：为请转奏事。我所辖之吉尔吉斯人，其兄弟、亲戚多半在噶尔丹策零地方，因而伊等原本心存二意，不愿迁来我处。去岁，大将军洞悉此情，拨给台吉罗布桑达西、理事官高良等三百名兵，看护吉尔吉斯人迁移，不料中途叛逃。圣主悯爱奴才色布腾旺布，又将逃剩吉尔吉斯人赏我。圣主屡施鸿恩，奴才不能还报于万一，唯叩感皇恩外，无言以奏。现钦遵上谕，遵奉大将军·王札付，委派本旗协理台吉乌巴什、王府长史沙布都克等，拨兵六十名，前往迁移赏我之吉尔吉斯博霍依、巴岱等人。吉尔吉斯博霍依、巴岱等男女人众共同呈告协理台吉乌巴什等曰：我等不去，去亦唯死而已。等语。此等吉尔吉斯人，去岁派兵迁移时遁逃，今拟令迁移，又出此言。伊等本系

心存二意不可信赖之人，我蒙古草原并无墙院，且今正值军机之际，噶尔丹策零事宜尚未完结，即便强行迁来我处，伊等作为对我不满妄行之人，恐仍复滋生事端，请将伊等进献圣主。乞请大将军·王悯爱我色布腾旺布，将此情转奏。等因前来。查得，此项吉尔吉斯人理合钦遵圣旨，跟随色布腾旺布委派之员迁往，然伊等意欲留居喀尔喀地方，恐仍有他意。而今正值军机之际，将伊等兼归喀尔喀居住，亦不便管束。臣等谨请仍照原先乌梁海特楞古特等移居齐齐哈尔等处之例，派遣蒙古官兵，沿途严加看管，送至齐齐哈尔，转交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等。其如何安置之处，请令该将军议定具奏。为此谨奏。请旨。①

据此可见，柯尔克孜族人的东迁，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在清统治者的强制下进行的。东迁的柯尔克孜族人，既不是“叛民”，也不是“俘虏”，而是随厄鲁特诸部台吉、宰桑等内迁归附清廷后被安置在喀尔喀地方的。当时，清廷还未彻底解决西部准噶尔问题，战争时有发生。柯尔克孜族所居住的地方处于双方交战的前沿一带，而且他们原为准噶尔属民，其兄弟、亲戚中仍有不少人居住在准噶尔控制的地方。清廷为了加强控制和防止滋生事端，将这部分柯尔克孜族人迁居黑龙江地区。这便是雍正年间第一批柯尔克孜族人东迁的真正原因。

另外，乾隆年间第二批柯尔克孜族人东迁的原因，与第一批有些区别，但也不是作为“叛民”和“俘虏”迁移的。在满文档案内，也有详尽的记载。

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1480－001。

（三）有助于确定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的具体时间和路线

关于东迁的时间，主要有三种说法，一为雍正十年说，二为乾隆二十年或二十一年说，三为乾隆二十六年说。据满文档案记载，柯尔克孜族人分两批东迁到黑龙江，第一批于雍正十一年四月底起程，当年八月初抵达黑龙江将军驻地齐齐哈尔；第二批于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初起程，当年七月底抵达黑龙江呼伦贝尔地方。由此可见，以往关于柯尔克孜族东迁时间的三种说法都不准确。在查到的26件满文档案内，有关柯尔克孜族东迁过程的文件较多。现仅选其中涉及第一批人起程事宜的札付一件，汉译如下。

> 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靖边大将军·和硕顺承亲王·臣等札付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等，为送往事。据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英诚公丰盛额等奏准咨称：我等具奏，为遵旨议奏事。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靖边大将军·和硕顺承亲王等奏请色布腾旺布属下吉尔吉斯人移居齐齐哈尔地方一折，奉旨：著军机大臣等议奏。钦此。钦遵。臣等议得，据顺承王等奏称，厄鲁特王·额驸色布腾旺布呈称，尊奉大将军·王札付，委派本旗协理台吉乌巴什等，拨兵六十名，前往迁移赏给我之吉尔吉斯博霍依、巴岱等人。吉尔吉斯博霍依、巴岱等男女人众共呈告：我等不去，去亦唯死而已。等语。伊等本系心存二意不可信赖之人，我蒙古草原并无墙院，且今正值军机之际，即便强行迁来，对我不满，恐仍复滋生事端，请将伊等进献圣主。等因前来。吉尔吉斯人兼归喀尔喀居住，亦不便管束，相应谨请仍照原先乌梁海特楞古特等移居齐齐哈尔等处之例，派遣蒙古官兵，沿途严加看管，送至齐齐哈尔，转交黑龙江将军等。其如何安置之处，请令该将军

> 议定具奏。等因。查得，吉尔吉斯人未开化，今色布腾旺布呈称，伊等可疑，请迁居他处。故请照顺承王所奏，将吉尔吉斯人迁居齐齐哈尔等处地方。由顺承王处委派聪明干练员弁告诉伊等曰：尔等不愿迁往色布腾旺布地方，为尔等永久安逸，兹蒙圣主恩准，迁往东部地方，给食钱粮，拨给资产，安居乐业。彼处地方，水草丰美，有利于牲畜繁殖，且林木茂盛，禽兽颇多。先前移居之巴尔虎、乌梁海人等已各臻富裕，俟尔等抵达后即可知晓。现尔等脱离所辖之主，已成为皇上属民，惟当感激皇恩，遵守法纪，勤奋当差，则直至子孙后代永得安逸。若不安分守己，擅自逃亡躲避，滋生事端，则自蹈重罪。等语。在晓以利弊后，将吉尔吉斯人分编三队，沿途依次多派官兵护送。俟至齐齐哈尔，交付黑龙江将军等，照原先安置乌梁海特楞古特等人之例，拨给资产安置，请令奏闻。为此谨奏。请旨。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五日奏，奉旨：著依议。钦此。钦遵。等因咨文前来。故由我处委派和托辉特贝勒班第旗协理台吉罗布桑达西、喀尔喀扎萨克彭楚克拉布坦旗台吉巴勒达及蒙古兵，一路看管吉尔吉斯人迁移，送至尔处。俟抵达后，所有吉尔吉斯人如何安置及分住何处情形，著恭查上谕钦遵办理外，将接收吉尔吉斯人之处，出具印结，交给协理台吉罗布桑达西等送达可也。为此札付。[1]

以上所译的档案文件，不仅概括地说明了第一批柯尔克孜族东迁事宜的决策过程，而且比较详细地反映了其分编队伍、规劝东迁及委派官兵护送等迁徙过程的具体细节。至于第二批柯尔克孜族的东迁

---

①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1－1733。

过程，在档案内也有详细的记载。可以说，依据档案记载，完全可以搞清楚两批柯尔克孜族东迁的整个过程及其有关细节。

另外，关于其迁徙路线，主要有两说：一是通过漠北喀尔喀蒙古草原进入黑龙江地区，二是通过河西走廊和北京等地进入黑龙江地区。根据档案记载，第一种说法是准确的，即经漠北喀尔喀蒙古草原抵达黑龙江地区。

（四）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东迁柯尔克孜族的人口数目、安置地区及其地位待遇

以往研究者都认为，当初东迁的柯尔克孜族人有二十七八户，200 口左右，分别被安置在爱珲、卜奎（即齐齐哈尔）、海拉尔（即呼伦贝尔）、呼兰、巴彦苏苏等五处，并编入正红、正蓝、正白、镶蓝四旗。他们被限定活动范围，派官兵监视，地位和待遇都非常低下。

现从满文档案来看，史实并非如此。为了便于说明起见，首先挑选一件涉及其人口数目、安置地区和地位待遇的满文奏折，汉译如下。

雍正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署理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印务·奉天将军·臣那苏图谨奏，为奏闻接收吉尔吉斯人情形事。于八月初二日，靖边大将军·和硕顺承亲王·臣等委派协理台吉罗布桑达西等，将吉尔吉斯人送到后，经臣等查看，男丁五十一名，连同家眷共二百七十六名，均已接收，并遵奉军机处大臣等奏准咨行之文，每人各赏银三两。而后，明白晓谕吉尔吉斯人众曰：蒙圣主施恩，将尔等迁来本地，编入旗佐，挑充披甲，每月给食钱粮，谋以永久之生计，故尔等唯当感激皇恩，遵守法纪，勤奋当差，则直至子孙后代永得安逸。若不安分守己，擅自脱逃

> 躲避，则自蹈重罪。等语。吉尔吉斯男女老幼望阙合掌叩拜曰：仰承圣主宽免我等奴婢不愿迁往色布腾旺布附近地方之罪，又施鸿恩，迁来赏银，编入旗佐，给食钱粮，谋以直至子孙后代永久安居乐业之道，焉能报答，唯时刻感激圣主隆恩，于一切差使，如同犬马竭尽效力，以期报答于万一。等语。是故，将伊等分别派驻三城（指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三城——译者注），充当披甲。所有赏赐银两及接收时多出人口数目，另行报军机大臣、户兵二部。为此谨具奏闻。①

这件档案是署理黑龙江将军印务奉天将军那苏图为报告柯尔克孜族人安置事宜专门呈进的奏折，其中提到第一批迁到的人口数 276 名，分别安置在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三城，充当披甲当差，每月给食钱粮。这与以往研究者所得出的结论有一定的差异。另外，通过这件档案还可以看出，东迁柯尔克孜族的安置情况在满文档案内记载得较为清楚。

据满文档案记载，东迁柯尔克孜族人被安置在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呼伦贝尔和布特哈五处，并无呼兰、巴彦苏苏，其地位和待遇，并非都非常低下，而是前后两批人之间有差别。第一批人被安置在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三城，编入各城驻防八旗内，挑选年轻力壮者充当披甲，给食钱粮，承应官差，享有旗人的身份和待遇。第二批人被安置在呼伦贝尔和布特哈，分别赏给索伦、陈巴尔虎、达斡尔官兵为奴役使，身份低下，毫无自由。至于东迁柯尔克孜族人的总人口数，从档案中无法知道确切的数目。这是因为，档案内除明确记载第一批人口数 276 名外，对于第二批人口，因与厄鲁特人数混合记载，故不知其具体数目。但从厄鲁特、

---

①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2－1733。

吉尔吉斯人混编三队起程时的各队人数来看，第二批人口数不会超过第一批人口数，估计有百余人。据此估计，两批总人口数在 400 名左右。

总之，满文档案作为清朝统治者在处理政务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公文，具有可靠的凭证作用，它是研究历史的最原始、最直接的第一手材料。另外，还能比较清楚地反映事物发展的全过程。换句话说，围绕某一历史事件，往往形成几件甚至十几件或上百、上千件公文，全面反映历史事件发生的起因、发展过程以及结果。这就是说，档案史料的详尽程度远远胜过其他文献史料，对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有关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地区满文档案的发现和利用，使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历史的研究更加系统完善；且可纠正以往研究中出现的差错，恢复历史的原貌；又能补充有关史籍记载之不足，使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历史研究更加深入。

（原载《满语研究》2004 年第 1 期）

清朝边疆政策

——以唐努乌梁海纳入清朝版图及特楞古特、塔本、科勒萨哈勒、柯尔克孜等移住黑龙江为中心

敖其尔·乌云扎尔噶拉*

满洲大清国为了详细划定喀尔喀北部边界，与俄罗斯进行过定界谈判，并于1727年签订了条约。按照该条约，划定了东自额尔古纳河东岸的阿布盖特山脉，西至萨彦岭沙必乃达巴汉为止的国界[①]。而此满洲大清国—沙皇俄国间的边界，划在漠北蒙古或巴尔虎、喀尔喀、库苏古尔泊，及唐努乌梁海游牧地的北部，实际上奠定了今蒙古国北部国境线的基础。

当时，清朝不仅和俄罗斯，还与准噶尔进行过边界谈判。上述三国，皆有意将居于唐努、克木、克木齐克一带的乌梁海或图瓦[②]

---

* 蒙古国立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满文文献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① 关于此次双方条约所划定的边界及其哨卡、敖包等，请参见 Б. Цэдэн-Иш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хил хязгаар бүрэлдэн тогтсон түүхээс” （《蒙古国边境定形史》），УБ，1997，т. 154 – 166。Ж. Гэрэлбадрах “Монголын нутаг дэвсгэр，хил хязгаарын түүх” （《蒙古版图与边境史》），УБ，2006，т. 83 – 99.

② 狩猎生活于唐努、萨彦、库苏古尔周边森林中的人众，曾被统称为“乌梁海”(uriyangqai，或称吴梁海)，是今俄罗斯联邦及蒙古国图瓦人的前身。关于乌梁海的族源及其分布，请参见 Г. Е. Грумм-Гржимайло. Западная Монголия и Урянхайский край，

(大概即今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领土)纳入自身版图,但最终结果,对全部这些地区,清朝皆以是其领土为由,成功地让俄罗斯及准噶尔予以承认。然而,直至 1715 年以后清朝军队进驻阿勒泰山脉以北的唐努岭招抚乌梁海为止,它们一直受准噶尔的支配。当时,清朝不仅使乌梁海,还使特楞古特、塔本、科勒萨哈勒等部归顺了自己,其中除以和罗尔迈为首的乌梁海之外,将其他各部皆迁移至黑龙江。关于此,笔者亲自查阅了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日本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的"黑龙江将军衙门档"内的相关资料。于此,利用这些档案资料,论述 18 世纪初期满洲大清国对唐努岭周围地区所实施的政策,及如何招抚居住在该地区的诸部集团,又如何将其迁移至各地的问题。

一　招抚博贝乌梁海

康熙三十六年(1697)哈密归顺清朝之后,驻扎在那里的清军向前一步进驻巴里坤、乌鲁木齐等地,并于 1720 年占领了吐鲁番。与此同时,北路军或驻扎喀尔喀的清军,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推进至阿尔泰山脉的北部地区。利用清朝大军的这一推

т Ⅲ, вып Ⅰ, 1926。"С. Бадамхатан. Хөвсгөлийн дархад ястан"(《库苏古尔的达尔扈特族》), *Этнографийн судлал*, Tomus Ⅲ, Fasc Ⅰ, УБ, 1965, т. 13 - 22。А. Очир "Урианхай нарын угсаа-түүхийн асуудал"(《乌梁海们的族谱与历史问题》), *Түүхийн судлал*, Tomus XXXII, Fasc1-19, 2000, т. 20-32。Ц. Гантулга "Алтай урианхайчууд"《阿勒泰乌梁海人》) УБ. 2000。关于清朝时期的唐努乌梁海,请参见李毓澍《唐努乌梁海佐领考》,《外蒙政教制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台北,1962。В. А. Моисеев "Цинская империя и народы Саяно-Алтая в XYIIIв" Москва, 1983。樊明方:《唐努乌梁海历史研究》,《西北民族研究丛书》,2001。Ц. Цэрэндорж "агна урианхайн засаг захиргааны зохион байгуулалтын асуудалд/XYIII-XX зууны эхэн/"(《关于对初设乌梁海行政组织的问题:18 ~ 20 世纪初期》), Түүхийн судлал, Tomus XXXIII, Fasc10, 2002, т. 100 - 105。

进步伐，和托辉特公博贝上奏言称：“请招抚乌梁海及策旺阿喇布坦所属厄鲁特，都尔伯特丹津一千户人，若伊等抗拒不服，即行攻取等语。”对此，康熙帝谕旨：

> 似此动作，以张声势，甚是。其间设有不睦，致相仇敌，闻博贝之兵前往，以为大将军至，纷纷扰乱，便不得彼真信。虽策旺阿喇布坦兵来救援，地方亦远，更有阿尔台岭之雪拦阻，不能前进矣。①

以此给予鼓励。接着，

> 又据博贝奏。臣有兵一千五百，度已足用，若圣意以为尚应添兵，则有根敦、扎萨克罗卜藏所属翁牛特兵，扎萨克济纳米达兵、扎萨克台吉阿里雅兵，俱善于攻战，可以破敌。将此三扎萨克兵添给，足矣。著照博贝所请，将三扎萨克兵，添给博贝，带领前去。遣人往乌梁海处，以好言招抚。若不归顺逃入树林深密处，亦无关紧要，相机行事可也。②

此奏意即率领自身所属1500名及喀尔喀扎萨克等的兵丁，前去招讨乌梁海。于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九月，博贝上奏关于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2，康熙五十四年七月甲午（一日）条。

②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2，康熙五十四年七月甲午（一日）条。此处所言“三扎萨克”之阿里雅、济纳米达，乃是当时的土谢图汗部，即后来的赛音诺彦部所属扎萨克。请参见《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74，传58，扎萨克一等台吉阿哩雅列传，及卷76，传60，扎萨克一等台吉济纳弥达列传。而另一位管辖翁牛特兵之罗卜藏，似是车臣汗叔父，同在一起之根敦上级阿里雅叔父之子。参见《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60，传44，扎萨克一等台吉罗卜藏列传，及卷75，传59，扎萨克一等台吉萨木济特列传。

"招抚乌梁海悉归顺"事。博贝所招抚的乌梁海首领和罗尔迈，此前曾于康熙五十年因越界狩猎而被哨兵擒获，后据康熙帝谕旨放回。然而此次和罗尔迈乘策旺阿喇布坦发兵进攻哈密不备之机，为归顺清朝而遣其子至，因此博贝"不发一枪一炮"便将其招抚。① 此事以后，曾在吹河一带的和罗尔迈，移至乌梁海唐努岭南麓特斯河或和托辉特西边居住，虽逃走过一次，但最终被博贝擒回。②

博贝，乃是1662年硕垒渥巴什之侄第三代阿拉坦汗罗卜藏额璘沁与喀尔喀相争被打败后向西逃窜时，领有和托辉特的根敦养子。1688年，噶尔丹攻略喀尔喀时留在故地的根敦，比其他喀尔喀领主要稍后，或于康熙三十三年服属清朝，被授予扎萨克贝勒爵位。③ 其生于康熙三十六年的嗣子是苏津僧格，康熙四十三年养子博贝袭爵。④ 换言之，博贝是16世纪后期逐渐强大起来，占据东自色楞格河、塔米尔河上游，西至阿尔泰山脉，即今俄罗斯联邦克拉斯诺戈尔斯克范围内地方，从居住在叶尼塞河流域的突厥系人群收取贡赋的阿拉坦汗的后裔⑤。

想必博贝因此才提出了招抚当时受准噶尔支配的乌梁海的建议。为此，他还于康熙五十九年跟随清朝征西将军祁里德军，招抚了400名乌梁海人，并因此功绩被授予贝勒爵位，获赏准噶尔降人，⑥ 这400名乌梁海人也交给博贝，让其护视。⑦

---

① 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3，康熙五十四年九月己酉（十七日）条。

② 参见《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63，传47，扎萨克多罗贝勒根敦列传。

③ 参见《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63，传47，扎萨克多罗贝勒根敦列传。

④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22，康熙四十四年九月丙寅（五日）条。

⑤ 参见 С. Пүрэвжав "Хотгойдын угсаа гарал ба түхийн асуудалд"（《关于和托辉特的祖源及其历史问题》）УБ，1970，т. 34－35。

⑥ 参见《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63，传47，扎萨克多罗贝勒根敦列传。

⑦ 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7，康熙五十九年八月癸丑（十九日）条。

雍正四年（1726）和罗尔迈再次逃走时，博贝子额璘沁将其擒获,[1] 可知乌梁海人经常逃走。于是，雍正八年（1730）四月，博贝奏言：

> dzengdzu ejen da minde afabufi tuwakiyabuha ujiha uriyanghai horolmai sei emu minggan emu tanggū funcere anggala bihe. cara aniya amba dulin ukafi fargame gajiha manggi donjibume wesimbuhede ejen genggiyen i bulekuššefi būbei membe weile arahakū oncodofi elemangga meni kalkai cooha de faššaha geren jasak sede šang... jergide kesi aliha.
>
> 圣祖主子原交与我协管养育之乌梁海和罗尔迈等，曾有一千一百余口。前年其大半逃走，擒获后奏闻时，主子明鉴，不但不治罪于我博贝，豁免且赏赐给于我喀尔喀军前效力之诸扎萨克等（残缺），施恩矣。[2]

如此可知，和罗尔迈等乌梁海 1100 人，曾由博贝协管。且清朝在雍正四年以后，又公然允许博贝从乌梁海收取贡赋及人头税。关于此，《钦定蒙古回部蒙古王公表传》记载：

> [Найралт төвийн] dörbedüger on ... [товчлов] ... tere kiri-dur uriyangqai-yin arad tangnu aγula, jici kem kemciγ qoyar-tur solilju saγuγad altai-yin qaraγul-dur oyir-a bülüge. qaγan teden-i ijaγur-aca qalq-a jici jegün γar-un qariyatu aγsan kemen jarliγ-iyar ceringwangbu jici qalq-a-yin beyile bübei-dür qubiyan jakirγan tusiyaju tedeger-ece caling

① 参见《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 63，传 47，扎萨克多罗贝勒根敦列传。

②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2-1729，雍正七年四月七日户部致黑龙江将军呈文。

abqu bülüge.

［雍正］四年（中略）。有乌梁海者错处唐努山及克木克木齐克，近阿尔台汛，上以旧为喀尔喀及准噶尔属，诏车凌旺布及喀尔喀贝勒博贝分辖之，征其赋。[①]

如此，史料所载的车凌旺布，乃是噶尔丹博硕克图近族丹津阿喇布坦或阿喇卜坦之子。为此，与准噶尔及俄罗斯进行边界协商的雍正四年，大清国将居住于唐努、克木、克木齐克等地的乌梁海人，以“旧为喀尔喀及准噶尔属”为由，分别让博贝及车凌旺布管辖，且正式允许其收取贡赋。

二　边界协商

于此，简述边界协商，及博贝与车凌旺布所属乌梁海等问题。如果说康熙帝与准噶尔之间的相争有其明确目的话，那么其继承者雍正帝刚一即位，便撤回了驻扎在西藏、阿尔泰、巴里坤的军队，决定与准噶尔建立友好关系，战争暂时有所缓和。如此与准噶尔达成了和平的雍正帝，为协定边界，于雍正三年三月对策旺阿喇布坦下达了如下谕旨：

上谕曰，前岁台吉遣使根敦陈奏，情词恭顺，朕实嘉之，曾遣使答谕。今览尔使博罗瑚尔噶齐奏，及口奏之词，知尔仰副朕旨，永息兵戈，共修和好，兴教逸民，出自诚心，朕甚欣悦。顾欲修和好，不可不计久远。议定疆

① 《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77，传61，厄鲁特扎萨克多罗郡王阿喇布坦列传。

界，以杜争端，乃垂久远之道也。朕去岁遣使与尔定议疆界，大概以阿尔台山岭为界，原未实指地名。今尔奏称，以唐努山阴之克木、克木齐克地方为词，又有哈噶斯地方，系喀尔喀、厄鲁特之界。哲尔格、西喇呼鲁苏地方，系会集之所。哈济尔地方，系索林齐居住等语。此尔但陈奏其故，并未执意争求，应无庸议外，今姑以科卜多、乌兰古木等处言之。喀尔喀、厄鲁特未构兵时，原混杂住牧。今喀尔喀西境，直抵阿尔台山岭，筑城种地。自唐努山阴之克木、克木齐克，至博木地方，现有策凌旺布、博贝乌梁海居住。今定疆界，自洪郭垒、汗和屯、阿尔呼特、阿勒坦淖尔等处，为尔疆界。自哈道里以及克木之博木地方为我疆界。[1]

即是说，面对要以阿尔泰为界的雍正帝，策旺阿喇布坦建议以唐努岭南麓的克木、克木齐克勘定边界。但是，雍正帝却以居住在克木、克木齐克一带的乌梁海人是车凌旺布及博贝的所属为由，认为乌梁海地方应划入清朝版图，因此双方之间产生了分歧。因而策旺阿喇布坦对使者声言："克木、克木齐克乌梁海地方，原系伊（策旺阿喇布坦）所属，被丹津喇卜坦侵占，仍欲得此地方"，[2] 要求返还乌梁海。对此雍正帝答复，归蒙古扎萨克管辖的乌梁海地方，与伊等扎萨克一并，皆归清朝所有。对于乌梁海人，认为因他们归清朝所属的蒙古王公管辖，所以必须对其加以保护。其宣谕如下：

---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15，雍正三年四月己卯（十二日）条。

② 据《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16，雍正四年三月辛丑（九日）条载，"上谕军机大臣等曰，据遣往策旺阿喇布坦处众佛保等奏称，策旺阿喇布坦以克木、克木齐克乌梁海地方，原系伊所属，被丹津喇卜坦侵占，仍欲得此地方等语"。

尔乌梁海人，世居树内，以打牲为生，遇力强者，即为纳赋，由来旧矣。今尔等既纳贡赋与蒙古王、贝勒等，即为朕之属国。所居与俄罗斯、准噶尔边界甚近。据今差往准噶尔使臣回奏，策妄阿喇布坦云，克木、克木齐克地方之乌梁海人等，向俱为伊之属下，甚恨尔等。皇帝恐尔等受伊侵害，故特遣大臣传谕，预为防备，且施恩赏赐尔等。嗣后远设营哨，尽心防御。策妄阿喇布坦所属之乌梁海，与尔等接壤宜不时探。再，俄罗斯亦与尔等甚近，倘伊国人等侵尔边界，造屋种地，立即报知汛地，转报将军。即使策妄阿喇布坦侵害尔等，将军早闻，便可发兵救助①。

如此以乌梁海人是清朝所属为由加以宣谕的同时，还赏赐给了丝绸、布帛、茶叶等物品。在此之前，例如 1724 年将军祁里德曾"借饷一万八千余两，买牲"，以分给乌梁海人，使其"各得产业，今胜于昔"。② 此外，还减免乌梁海人交纳博贝、车凌旺布等的贡赋，缺额处添补赏赐给了牛羊。关于此，与博贝、车凌旺布一同前往乌梁海地方的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后来上奏如下：

geli ceringwangbu, sebtenwagbu, būbei sei baru gisurefi emi aniya emi boigon meni meni ejete de bure sunja seke alban be juwe seke ekiyembuhebi. beile būbei i uriyanghai emu minggan dehi sunja boigon, ekiyembuhe seke juwe minggan uyunju. wang seringwangbu, sebtenwangbu i uriyanghai gemu ilan tanggū jakūta boigon, ekiyembuhe seke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16，雍正四年三月辛丑（九日）条。

② 《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 63，传 47，扎萨克多罗贝勒根敦列传。

gemu nadan tanggū gūsin ninggute. ere ekiyembuhe juwete seke i ubu de cende angnara babe gisurehede... [товчлов] ... ceringwangbu, sebtenwagnbu de uniye jakūnjuta, hehe honin jakūta tanggū. būbei de uniye emu tanggū, hehe honin emu minggan juwe tanggū angnaha be dansede ejehebi.

再，与车凌旺布、色布腾旺布、博贝等相议。每年每户给其各自主子五张貂皮之贡赋，将减其二。贝勒博贝所属之乌梁海共一千零四十五户，减貂皮两千零九十张。王车凌旺布、色布腾旺布所属乌梁海共三百八十户，共减貂皮七百三十六张。所减两张貂皮处，商议赏赐时（中略）。车凌旺布、色布腾旺布应赏奶牛八十头，母羊八百只。博贝应赏奶牛一百头，母羊一千二百只。将赏赐之处，记录在案。①

可知，乌梁海内的1045户向博贝，380户向车凌旺布、色布腾旺布，每年要缴纳五张貂皮的贡赋。

关于乌梁海，《恰克图条约》第三条讲道：“双方就关于缴纳五张貂皮的乌梁海，仍留给其各自领主。关于跨双方边境而居缴纳一张貂皮的乌梁海，签订边界后，则使其永不缴纳貂皮贡赋。”②乌梁海所缴纳的贡赋，受“领主—属民关系”的支配，互相有所不同。例如，对其领主每年需要缴纳五张貂皮的贡赋，而对虽不是其领主，但居住在其领地、受其保护的一方，提供一张貂皮。不仅

① 《奏折包》1059-005，023-1282，乾隆七年二月十九日御览，大学士鄂尔泰等奏折。

② 参见〔日〕吉田金一《近代露清関係史》（近代俄清关系史），近藤出版社，1974，第137页，及 О. В. Боронин. Двоеданничество в Сибири XYII - 60e-XIXв, Барнаул, 2002, т. 131。

是乌梁海，叶尼塞的柯尔克孜、阿尔泰的特楞古特等，也普遍存在同时向俄罗斯、准噶尔、和托辉特之阿拉坦汗三方缴纳贡赋的情况。[①] 于是，雍正五年按照《恰克图条约》内容，俄罗斯与清朝（蒙古王公）双方约定，对向某一方纳五张貂皮之贡的乌梁海，仍照旧使其领主管辖，而对各自纳一张貂皮之贡于两方或不知其确切领主的乌梁海，予以不收取任何贡赋。

即，俄罗斯与清朝双方于雍正五年互相承认了将曾经向准噶尔与和托辉特王公等纳五张貂皮之贡，已承认是其属民的乌梁海人，仍旧让作为蒙古王公子孙的博贝、车凌旺布等管辖，按照其传统收取贡赋的事实。但是清朝朝廷减轻了乌梁海人应缴纳其领主们的贡赋，缺额处添补给了牛羊牲畜。此事是为防止乌梁海人逃向准噶尔及俄罗斯而实行的措施，应视为是将其居住地纳入自己的版图以强化边疆的政策。

仍是康熙帝，将车凌旺布、色布腾旺布二人与其侄女等联姻，授予和硕额驸，使彼等居住在了北京。色布腾旺布之妻亡故后，雍正四年，兄弟二人返回其游牧地或喀尔喀河，奏请将其属民等编立佐领。[②] 换言之，一直在北京居住至1726年的兄弟二人，于三国间边界协商正在紧密进行而涉及居住唐努等处的乌梁海问题之际返回喀尔喀成为扎萨克的事情，并不是偶然的。先前曾给其父祖缴纳贡赋的乌梁海人，要给当时居住在北京的兄弟二人纳贡，怎么说也使人有点难以置信，实际上是雍正帝将他们遣回至喀尔喀，任命为扎萨克之后再遣往乌梁海，“使其与属民相遇”的。

雍正帝将居住在喀尔喀、准噶尔、俄罗斯三国边界地带的乌梁海分给博贝、车凌旺布等管辖的同时还给他们赏赐物品，就连缴纳其领主的贡赋也予以减免，这种政策结果是，雍正五年和乾隆五年

---

① 上述 О. В. Боронин，т. 209。

② 参见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第169～170页。

(1740) 先后使俄罗斯、准噶尔承认了乌梁海地方属于满洲大清国，与各方签订了边界条约。

三 将色布腾及其辖民迁往黑龙江

康熙四十四年，为了解决前进至阿尔泰山脉北部一带的清朝兵队的军粮供应，振武将军公富尔丹下令于科布多、乌兰固木等地开始屯田，[1] 建造城屋。[2] 振武将军公富尔丹与征西将军祁里德等所率领的满、蒙、汉士兵 9000 名，及喀尔喀 3000 名阿尔泰路军，虽然没有与准噶尔军队交战，但在阿尔泰山脉北部唐努岭附近进行侦察时，招抚了准噶尔所属乌梁海。例如，1720 年 7 月，即招抚了色布腾寨桑所领的两千余人。关于此，将军祁里德当时上奏如下：

> 祁里德疏言（省略），复于七月二十九日，率兵自铿格尔河进侦，厄鲁特寨桑塞卜腾（即色布腾）等率贼众赴铿格尔河，据山守险。臣遣人招降，贼恃险拒敌，我师分两道夹击之。贼众大溃，窜守山麓。次日复遣人往，宣布圣主威德，寨桑塞卜腾等，率两千余人降。所获马驼牛羊万余只。其寨桑塞卜腾等，俟师还，遣官兵解送京师。

对此，康熙帝指示将色布腾等头人送往京城。[3]

---

① 据《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2，康熙五十四年七月辛酉（二十八日）条记载，公富尔丹领 1000 名土默特兵，开始在科布多、布彦图屯田。而乌兰固木屯田最初的收成，似获得于康熙六十年（1721）。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9，康熙六十年十月乙亥（十六日）条。

② 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5，康熙五十七年闰八月乙卯（十五日）条。

③ 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7，康熙五十九年八月癸丑（十九日）条。

清廷将色布腾及其辖民于雍正元年迁至察哈尔，编为两个佐领。后雍正十年，又迁移至呼伦贝尔索伦八旗内。关于此，日本学者柳泽明已有过研究。色布腾辖民内，包括有厄鲁特、乌梁海、特楞古特、科勒萨哈勒等，且其中的一部分，在色布腾迁至察哈尔之前，即已不归其管辖。例如，与色布腾同时归顺的两千余人之内，只有 217 户 711 人与其一同迁移至呼伦贝尔，而被称为“旧厄鲁特”，其余则不明。[①]

但是笔者从“黑龙江将军衙门档”内，发现了有乌梁海、特楞古特、科勒萨哈勒[②]等的一些资料。例如，雍正二年五月，理藩院委以黑龙江将军向科勒萨哈勒、塔本[③]、乌梁海、特楞古特等赏赐牲畜的呈文内称：

---

① 参见柳泽明《フルンブイルのウールド（ogeled）人の来歴について》（《关于呼伦贝尔厄鲁特人的来历》），《早稲田大学モンゴル研究所紀要》2，2005，第 1～19 页。

② 上述柳泽氏所查档案记为：ker saka 或 ker sakal。笔者所查档案则记为：ker sahal。虽不完全相同，但因是指同一部族，故可视为一。俄罗斯文书馆 17 世纪档案中曾有：“кергасагальскую волость”或“керсагальскую волость”（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1636-1654, Составители М. И. Гольман, Г. И. Слесарчук, Москва, 1974, т. 242, 249, 274）。科勒萨哈勒属图瓦一支，17 世纪 70 年代曾居住于白河东岸、哈屯河口或鄂毕河上游流域，后可能移居至萨延岭、克木、克木齐克一带（Л. П. Потапов. Этнический состав и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Алтайцев, Ленинград, 1969, т. 111）。图瓦人中亦有“karasal”敖布库（Г. Е. Грумм-Гржимайло. Западная Монголия и Урянхайский край, т III, вып 1, 1926, т. 22－23），且科勒萨哈勒的 82～95 户人，曾居住于查旦河流域（В. И. Дулов. Социально-е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вы XIX- начало XXв, Москва. 1956, т. 137）。今蒙古国图瓦人中也有科勒萨哈勒敖布库，且他们属于喀喇索颜的一支，曾居住在喀喇噶尔纳特河流域（Монгол улсын угсаатны й 3, Эрхэлсэн С. Бадамхатан, УБ, 1996, т. 303）。据此看来，被称为 kersagal 或 kerjal、karasal、qarsaqal 等的族群，居住在萨延岭、克木、克木齐克一带。

③ 在此依满语 tabun 一词，仍将其称为塔本。据 Дашрамд дурдахад 称，图瓦人中有被称为“tabu”的雅孙（В. И. Дулов. Социально-е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Тувы XIX- начало XXв, Москва. 1956, т. 118, 134），但其与本文所指塔本有何关联，不甚明确。

baicaci, elhe taifin i susai uyuci aniya jorgon biyade sula amban bazar sebe telenggut aiman i ilan tanggū sunja anggala be guribume gamafi cicigar hoton de tebuhe. tucibuhe anggala bodome ihan honin be bahabuha bihe. duleke aniya nadan biyade, jiyanggiyūn furdan, kilidei i baci ker sahal, tabun aiman i ninggun tanggū gūsin nadan anggala be cicigar hoton de benebuhe. sula amban norbu i baci ker sahal aiman i tofohon anggala be cicigar hoton de benebuhe. umai honin šangnaha ba akū. te jiyanggiyūn centai se ne fusembume sindaha ninggun minggan sunja tanggū susai ninggun honin be ici guribume gajiha ker sahal, tabun aiman i urse de šangnafi, funcehe honin be jalgiyanjifi neneme guribume gajiha telenggut aiman i urse de šangnaci ejen i ujen kesi be bahafi glimbi.

据查，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散秩大臣巴咱尔等将特楞古特部三百零五口迁移至齐齐哈尔城居住，并按所记人口数施以牛羊。去年七月，自将军公富尔丹、祁里德处，将科勒萨哈勒、塔本、乌梁海等部六百三十七口，送至齐齐哈尔城。自散秩大臣诺尔布处，将科勒萨哈勒部十五口，送至齐齐哈尔城。毫无赏赐羊只处。现将军陈泰等，将已繁殖成年之六千五百五十六只羊，赏给新近迁移之科勒萨哈勒、塔本等部众。并将剩余羊只，若设法赏给前已迁移来之特楞古特部众，则能感戴主子之隆恩矣。[1]

据此可知，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二月，散秩大臣巴咱尔将特楞古特部305人，1722年7月，将军公富尔丹、祁里德等将科勒

①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3－1723，雍正元年五月二十日黑龙江将军衙门致理藩院呈文。

萨哈勒、塔本等部 637 人，及察哈尔散秩大臣诺尔布将科勒萨哈勒 15 人，共计 957 人，分别迁移至齐齐哈尔城。

色布腾自己所言："我所管厄鲁特、乌梁海、特楞古特、科勒萨哈勒等部众，共有两千余名"，其中"以特楞古特部众不可信而将其移住至他处"，即可能在指上述康熙五十九年迁移至齐齐哈尔城的特楞古特部众。而关于雍正元年所迁移的诸部，同年 12 月 18 日，理藩院致黑龙江将军行文内称：

> sula amban badzar i unggihe bade, bayan jurke ci guribume gajiha ulet hiya sebten sei sasa uriyanghai, ker sahal, tabun i aiman i haha šogo i jergi tofohon niyalma, tangdu sere kubun i jergi sunja niyalma be benjihebi. ulet sei hehe juse boigon anggala be benjime isinjiha manggi, baicame tuwaci, esei hehe juse akū. sebten i alarangge. erei dorgi kubun, eremsu juwe niyalma de hehe jise akū. cihanggai mimbe dahame ubade banjiki sembi. kubun, eremsu be bi akdulafi ukamburakū semen alambi. uttu ofi kubun, eremsu be sebten i nirui hahai ton de dosibufi icihiyaha ci tulgiyen ... [товчлов] ... baicaci ulet hiya sebten i sasa benehe ker sahal, tabun sebe guribure de sasa cicigar de guribume benehebi. ulet hiya sebten i sasa benehe uriyanghai i hehe juse jai hiya itegel i benehe uhani, sariyakū i hehe juse be gemu gung būbei i niyalma de afabufi uriyanghai sasa guribume neneme bargiyaha uriyanghai horolmai sede acabume benehebi. jurgan ci esei beyede fonjibufi, ker sahal, tabun aiman i niyalma oci cicigar de benebure, uriyanghai oci gung būbei i tuwakiyaha uriyanghai horolmai de acabume benjibureo sehebi. sula amban norbu de fonjici mini jakade bisire

horolmai de unggire uriyanghai i niyalma ilan, cicigar de unggire telenggut i niyalma tofohon sembi.

散秩大臣巴咱尔致言：与自巴彦珠尔克迁移至此之厄鲁特侍卫色布腾一同，曾遣乌梁海、科勒萨哈勒、塔本等部壮丁勺高等十五人，及称唐都之库本等五人。厄鲁特等之妻儿、户口皆到来后，经查，彼等无妻儿。据色布腾言：当中库本、额尔木苏二人无妻儿，实言自愿跟我在此过活。我担保库本、额尔木苏，不至于逃走，等语，故收留之。为此，将库本、额尔木苏，编入色布腾苏木壮丁名簿内，已受理。除此之外（中略），经查，与厄鲁特侍卫色布腾同时发遣之科勒萨哈勒、塔本等，迁移伊等时曾一同发遣至齐齐哈尔。而与厄鲁特侍卫色布腾同时发遣之乌梁海妻儿，及侍卫伊特格尔所遣乌哈尼、萨里亚库之妻儿，皆已交给公博贝下人，使其与乌梁海同时发遣，前已收之，相见乌梁海和罗尔迈等，发遣之。部（理藩院）已问过伊等自身，若是科勒萨哈勒、塔本等部人，发遣至齐齐哈尔。若是乌梁海，发遣至公博贝所辖乌梁海和罗尔迈等处，使其相聚，等语。问散秩大臣诺尔布时答曰：在我处应发遣和罗尔迈之乌梁海三，应发遣至齐齐哈尔之特楞古特人十五，等语。①

如此可知，1722年将色布腾从喀尔喀领地巴彦珠尔克地方迁移至察哈尔时，科勒萨哈勒、塔本部共有20人跟着前去。其中，将色布腾担保的2人编入其佐领，留在了察哈尔；而将特楞古特及科勒萨哈勒15人迁移至齐齐哈尔；又将剩下的3名乌梁海人，发遣至

①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1-1723，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理藩院致黑龙江将军行文。

喀尔喀公博贝所辖和罗尔迈等处。

至此，清廷让色布腾驻在察哈尔，将特楞古特与塔本、科勒萨哈勒等迁移至齐齐哈尔，将乌梁海留在了喀尔喀。关于此，柳泽氏认为，清廷是在准噶尔军队自阿尔泰挺进，喀尔喀地方战火纷飞的情况下，为防备色布腾人之逃亡，才将其迁移至呼伦贝尔，以受索伦八旗节制。在此需要加一句，可能是因为其属民分散于多个地方，常受近邻警戒，所以为了防备色布腾的逃走，才采取了将其迁移至呼伦贝尔的策略了吧。

与色布腾等一道归顺清朝的科勒萨哈勒、特楞古特、塔本等部，于康熙五十九年至雍正元年的期间，被迁移到了齐齐哈尔，但是他们迁移的过程有些模糊。以下，考察迁移乌梁海、柯尔克孜等的问题。

四　迁移乌梁海、柯尔克孜等至黑龙江

清朝所招抚的乌梁海人，不全是博贝、车凌旺布等的辖民。例如雍正八年，对于居住在自己旗地内的乌梁海人，贝勒博贝上奏如下。

gajirak sei jergi duin tanggū gūsin emu anggala uriyanghai sebe mini gūsai nukte i dolo taka karmatame tuwašatame tebuheci ilan aniya hamika. uriyanghai se daci gemu buthašara de akdafi banjire urse. te meni nukte i šurdeme gurgu yooni aksafi buthašaha semen inu gurgu baharakū ohobi. esede udu ulha niyeceteme bucibe inu gemu fafi jetereci tulgiyen fuhali fusembume ujime baharakū. karun i tule gurgu bisire bade guribuci esei gūnin be geli akdaci ojorakū bime. mini nukte jecen i ergide bifi atanggi bicibe ukara sujure akdulame muterakū.

> 将噶吉喇克等四百三十一户乌梁海暂置在我旗地照料，已近三年矣。乌梁海等本是赖狩猎而生之民。现我领地内外，野兽皆已远遁，即使行狩，亦不再获猎物。以此曾分给伊等牲畜，然除宰杀口食完了之外，丝毫不会饲养。欲迁移至卡伦外野兽出没之地，但伊等之心又不可信，且居住我领地边陲，其何时又将逃遁，亦不可知也。[①]

据此，理藩院认为，若将这些乌梁海人与和罗尔迈之乌梁海人居于一处，或将其迁移离博贝旗地稍远一些地方，则恐其易于逃向其旧地。为此，仿照先前将军公富尔丹等处理乌梁海问题的事例，决意将他们迁移至树木茂密、野兽繁多的齐齐哈尔。[②] 接着，迁居齐齐哈尔的乌梁海居此两年后，因猎物变得稀少，便按照“旧乌梁海”或康熙年间迁居的特楞古特、科勒萨哈勒、塔本及巴尔虎[③]的事例，分别被编入驻防黑龙江、吉林、奉天的八旗内，发给俸禄。[④]

乌梁海之后，仍迁居至齐齐哈尔的柯尔克孜等，曾是郡王色布腾旺布的属民。[⑤] 居住色毕河、叶尼塞河流域，属突厥系的柯尔克

---

①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2－1729，雍正七年四月七日户部致黑龙江将军行文。

②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2－1729，雍正七年四月七日户部致黑龙江将军行文。

③ 所属喀尔喀车臣汗部的一部分巴尔虎在噶尔丹进攻喀尔喀之际，向东逃向黑龙江将军所辖地方。先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黑龙江将军所收编的巴尔虎被分别派驻盛京、吉林将军辖区内的多个城塞。其后，康熙三十三年（1694）将大兴安岭巴尔虎内之有牲畜者，驻牧于齐齐哈尔周边呼雨哩河沿岸，把没有牲畜的穷困者编入布特哈八旗内，以使耕种。后又将布特哈·巴尔虎，迁移至墨尔根、齐齐哈尔等地。参见柳泽明《ホーチン＝バルガの起原と変遷》（《陈巴尔虎的起源与变迁》），《社会科学讨究》129，1999，第87～111页。

④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1－1731，雍正九年正月九日理藩院致黑龙江将军行文。

⑤ Ц. Цэрэндорж 在其论文中讨论关于噶尔丹部将丹津阿喇卜坦与乌梁海之间的关系时讲到，1667年左右，卫拉特僧格洪台吉与其叔父丹津和硕齐一同出征克木、克木齐克地方，从柯尔克孜处收取过贡赋。当时纳贡丹津和硕齐的柯尔克孜，后来可能从属于其侄丹津阿喇卜坦。

孜，于16世纪后期，接受了卫拉特的支配①。车凌旺布亡故后，继承其爵位的胞弟色布腾旺布，在谈及其属民柯尔克孜时说道：

> mini harangga kirgis ursei ahūn deo niyalma hūncihin labdu dulin gemu Kaldan cering i bade bisire jakanda ese daci encu gūnin jafafi mini jakada jidere cihakū be amba jiyanggiyūn hafu safi duleke aniya taiji lobdzangdasi jargūci Koliyang sede ilan tanggū cooha bufi esebe tuwašatame guribume yabure de jugūn i andala ci ubašafi ukaka. funcehe kirgis be enduringge ejen buya aha sebtenwangbu imbe gosime gūnifi dasame minde šangnaha.
>
> 我属民柯尔克孜人之兄弟、亲戚等，多半皆在噶尔丹策凌处，为此伊等一直身怀异心，不愿来我处。大将军明知此事，故去年委以台吉罗卜藏达什、扎尔固齐喀乌梁等三百兵，照看伊等之迁移时，途中叛逃而去。将剩下柯尔克孜，圣主仁慈小奴才色布腾旺布，仍旧赏赐与我矣。②

据此可知，居住在准噶尔的一部分柯尔克孜人，于雍正十年（1732）跟随了清军，另一部分则又逃回了准噶尔。对跟随过来的柯尔克孜，雍正帝赏给了其“主子”色布腾旺布。此事应理解为，清军虽然征服了柯尔克孜，但因色布腾旺布之父在归顺清朝之前，

---

① 据《清高宗实录》卷695，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壬午（二十八日）条记载，关于准噶尔之鄂托克，有“奇尔吉斯，有四宰桑，人四千户，为一鄂拓克”等语，可知柯尔克孜包括在准噶尔12鄂托克之内。今达尔扈特、明安特族内，亦有柯尔克孜敖布库。参见 С. Бадамхатан. Хөвсгөлийн дархад ястан（《库苏古尔的达尔扈特族》），Этнографийн судлал，Tomus III，Fasc I，УБ，1965，т. 72－73，Б. Сандаг. Мянгадын гарал үүслийн асуудлаас（《关于明安特的起源问题》），Этнографийн судлал，Tomus IY，FascY，1969，т. 92－93。

② 《奏折包》1480－001，038－257，雍正十一年三月十六日靖边大将军锡保奏折。

即已领有了柯尔克孜，故雍正帝也承认柯尔克孜为色布腾旺布属民之事实，而赏给了他。关于色布腾旺布所指的清朝军队前进至柯尔克孜故地一事，靖边大将军锡保上奏如下：

> amban be baicaci, ulet i wang sebtenwangbu i fejergi kirgis i tanggū funcere boigon i niyalma daci ederi i jergi bade nukteme tehe bihe. ese ceni ejen ci tehengge goro ojoro jakade fafun šajin be sarkū. kemuni eshun duleke aniya hūlhai cooha latunjiha ucuri kalkasai nukte gemu dosi gurihe bime. ese elemangga tulesi tes i konggor tolohai i bade nukteme tenere jakade amban meni baci cahar i nukte de bisire hafan cooha de ulhibufi seremšeme tuwašatabuha bihe. te kalkasai nukte gemu dosi goro gurihebi. damu kirgis i tanggū funcere boigon i teile tulergi de teci aika baita sita bici, labdu gūninjacuka.
>
> 据臣我等所查，厄鲁特王色布腾旺布属下柯尔克孜之百余户，一直住在额得里等地方。因伊等所居与其主子相距稍远，故不知法度，尚未驯化也。去年贼兵来犯，将喀尔喀等游牧，皆移向内边。且因伊等住居外特斯洪格尔套鲁海地方，故自臣我处指示察哈尔地方之官兵，以巡视照看伊等。现喀尔喀等之游牧，皆移向内边。只柯尔克孜百余户留住边外，若起事端，心中不免担忧矣。[①]

由此看来，在准噶尔军队来进攻时，喀尔喀向内躲避迁移，居住在额得里地方的柯尔克孜人却向外或朝特斯洪格尔套鲁海地方而去，清兵为此派遣察哈尔兵，给予照看。因不能只留柯尔克孜独自在边

① 《奏折包》1507 - 002，038 - 1081，雍正十年五月十八日靖边大将军锡保奏折。

境地区，故指示其领主色布腾旺布，将他们收拢回身边。当时，正要从推河迁至喀尔喀河流域的色布腾旺布派少数官兵试图将柯尔克孜人携来，但因柯尔克孜人坚决不迁移而将他们一并献给了可汗（清朝皇帝）。关于此，色布腾旺布奏言：

te minde šangnaha kirgis be dergi hese bė dahame amba jiyanggiyūn wang ni afabuha bithei songkoi mini gūsai aisilara taiji ubasi, faidan i da šabtuk sede ninju cooha bufi kirgis bohoi badai sembe guribime unggihe bihe. aisilara taiji ubasi sede kirgis bohoi badai sei haha hehe uhei alahangge. be generakū. genecibe bucere dabala semen alambi. ere kirgis be duleke aniya cooha tucibufi guribure de ukaka. te guribuki serede geli uttu gisurekebi. ese daci encu gūnin jafafi fuhali akdaci ojorakū urse. mini monggo talan i bada umai fu hūwa akū bime. jing coohai nashūn i ucuri Kaldan cering ni baita wajire unde esebe uthai hūsutuleme mini ubade gajicibe minde cihakū dade yabun facuhūn urse. geli aika baita tucibureheo semen bi ambula gelembi. bahaci ere kirgis i urse be enduringge ejen de jafaki.

现为赏给我之柯尔克孜事。谨遵谕旨，照大将军文书所记，遣我旗协理台吉渥巴什、长史沙布杜克等，委以六十名兵丁，以使迁移宝好伊、班第等柯尔克孜。柯尔克孜宝好伊、班第等之全体男妇向协理台吉渥巴什言：我等不去，前去既死矣，等语。此等柯尔克孜，去年遣兵迁移时逃过一次，现今迁移时又言如此。伊等一直身怀异心，乃是狡诈不可信之人。我等蒙古草地毫无遮拦，且京畿兵因目前噶尔丹策凌事还未完结，若将伊等强行携至我处，不但对我无好感，还因是大胆妄为之民，而恐又生事，为此

我甚担忧。若可，将此柯尔克孜人等，欲献给圣主。[1]

至此，大将军锡保等以色布腾旺布前去喀尔喀河流域已成定事，若将柯尔克孜留在喀尔喀地方管制则甚为麻烦为由，借鉴特楞古特、乌梁海的例子，提出了将其迁居齐齐哈尔的建议，对此雍正帝立即给予许可。[2] 于是，大学士马尔赛等着手筹备将柯尔克孜迁向齐齐哈尔的事务，对他们宣布如下：

suwe sebtenwangbu i jakada genere cihakū be dahame enduringge ejen kesi isibume suwembe enteheme jirgame banjikini semen dergi ergide guribufi ciyanliyang ulebume banjire hethe icihiyame bufi jirgabume tebumbi. tubai ba ne ongko muke umesi sain, ulha fusembure de tusa bime. moo bujan labdu, gurgu elgiyen. neneme guribufi tebuhe barhū, uriyanghai se teisu teisu gemu banjihabi. suwe isinaha manggi uthai bahafi sambi. suwe te harangga ejen ci tucibufi dergi amba ejen i niyalma oho be dahame damu ejen i kesi be hukšeme gingguleme fafun kooli be tuwakiyame joriha alban de kiceme yabuci juse omosi de isitala enteheme jirgambi. aika ekisaka banjirakū, balai ukara jailra baita degdeburengge bici, cohome beye ujen weile be baime yaburengge kai.

尔等因不愿前去色布腾旺布处，故圣主施恩为将尔等永远安逸过活，而要迁往东方住居，施给钱粮，筹给生计物产。彼地水土牧场皆好，利于养畜，且林木茂密，野兽

① 《奏折包》1507 - 002，038 - 1081，雍正十年五月十八日靖边大将军锡保奏折。
② 《奏折包》1507 - 002，038 - 1081，雍正十年五月十八日靖边大将军锡保奏折。

繁多。前有狩猎而生之巴尔虎、乌梁海等，各自皆能过活，尔等到彼之后，即可知矣。尔等现离别领主，已成上主子之人，故应只受主子之恩，谨遵法度。若慎行于所指公务，以至子孙，永永安逸而活。若不安稳度日，妄行逃走生事，此惟等于自找重罪也。[①]

同时，还指示黑龙江将军：

... aika jafatame kadalarakū sula tebuci geli balai baita degdebume jailame ukame yabure be akū obume muterakū. esebe uksin etubuci jafatara kadalara niyalma bimbime, biyadari ciyanliyang belen bahafi heo semen banjici ombi.

……若不加压制管理，使其任意而行，尚不能消除伊等之妄为生事逃走。可将伊等披甲，以此既有管辖之人，且获得钱粮，尽可以过活矣。[②]

由此可知，清朝明显在担心柯尔克孜人的逃跑，且不仅是对他们，对此前迁移的诸部也是一样。于是同年九月，喀尔喀官兵将276名柯尔克孜人遣送至黑龙江后，赏给他们物产、牲畜，使其分别驻守黑龙江、齐齐哈尔、墨尔根等城。[③]

---

①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3－1733，雍正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黑龙江将军衙门致靖边大将军锡保咨文。

②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3－1733，雍正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黑龙江将军衙门致靖边大将军锡保咨文。

③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3－1733，雍正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黑龙江将军衙门致靖边大将军锡保咨文。关于今中国黑龙江省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还有平定准噶尔之后或乾隆年间迁移的吉尔吉斯等，与此雍正年间迁移的柯尔克孜有无关系，请参见西脇《黒龍江省富裕県のキルギス族とその言語の特色》（《黑龙江省富裕县的吉尔吉斯族及其语言特征》），《岛根大学法文学部纪要文学科篇》6－1，第227～250页。

五　结语

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帝为了准备大进军，命进驻至阿尔泰山脉北部及唐努岭一带的清朝军队，招抚了一些突厥系的部族。其中，康熙五十九年将特楞古特，雍正元年将塔本、科勒萨哈勒，雍正七年将和托辉特之博贝所辖乌梁海，雍正十年将色布腾旺布所属柯尔克孜，陆续迁移至黑龙江，将其分别编入了驻守黑龙江各地的八旗。

康熙帝将特楞古特、乌梁海等从其领主色布腾分离出去迁往齐齐哈尔，是为了防备准噶尔的侵袭，并非将被认为是“不可信之人”留在边疆地区的政策所致。但是，对准噶尔采取和平交往方针的雍正帝，在与准噶尔及俄罗斯协商边界的过程中，巧妙利用居住在唐努岭的乌梁海等纳贡给蒙古王公的事实，将乌梁海地方或后来被称为“唐努乌梁海”的地区，纳入了清朝版图。又，1729～1731 年，为防止蒙古王公所属的乌梁海及其领主献给清朝可汗的柯尔克孜人等越界逃走，采取了将其迁往黑龙江的策略。

［本文原以《清朝边疆政策：关于唐努乌梁海纳入清朝版图及将特楞古特、塔本、科勒萨哈勒、柯尔克孜等移住黑龙江》为题，载于 *Acta Historica* (Journal of Mongolian Education University), Tomus Ⅸ, 2008, УБ, T. 150－163。此处由齐光译自蒙古国蒙文］

满文《乌喇等处地方图》考

承　志（Kicengge）*

一　引言

大清国[①]时期以多种语言绘制而成的舆图，是大清国时代史中尚未全面拓展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目前，随着舆图目录以及非汉文档案史料的进一步公开和整理出版，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和构筑大清国时代的历史。这个时代留给我们的资料非常丰富，记述的文种多种多样，为我们重构这个时代的历史提供了多方面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

迄今为止，大清国舆图史研究，可以说基本上是以汉文舆图为主，在中国很少能够看到非汉文舆图方面的论作。[②] 细读《中国古

* 日本追手门学院大学准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满文文献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① 1616 年，努尔哈赤（nurhaci）建立爱新国（aisin gurun，或译为金国）后，第二代汗皇太极于 1636 年正式建立大清国（daicing gurun），1644 年入关，直到宣统为止，当时人及其各档案资料和国际条约中，正式国家名称均称大清国（daicing gurun 或 amba daicing gurun）。考虑到名从主人的原则，本文使用大清国这一正式国家名称，意图理解大清国入关前后为一连贯的历史时期。

② 国内非汉文舆图研究参见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第 29 ~ 42 页。此外明代中外舆图研究，参见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清代满文舆图，参见拙作《ダイチン・グルンとそ

代地图集》（明代・清代）① 和最近出版的《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等舆图专集，② 也可以发现这种倾向。前者收入非汉文舆图极少，收入的个别满文舆图一般都简略而不详述，也没有全面介绍图中的满文及其具体内容。后者对涉及理解欧亚各地地理状况至关重要的满文地名，没有进行解读和介绍；索引部分也只录入汉地（nikan i ba）的汉字地名，未将满（manju i ba）、蒙（monggo i ba）、藏（wargi dzang ni ba）地方，甚至横跨欧亚北部的俄罗斯之地（oros i ba）以及中亚、西亚等地的满文地名收入。这些方法和视点对中国舆图史研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综览这些已出版的舆图专集和中国汉文舆图研究历程，或多或少也表明了人们对非汉文史料价值的忽略，殊不知恰恰是这些非汉文记载的舆图及档案资料，为我们研究大清国历史地理提供了大量的汉文资料没有记载的珍贵的历史资料，我们理应多方面利用这些非汉文资料，弥补汉籍史料的空白。研究非汉文文书及舆图资料，意义十分重大，其珍贵价值更不亚于汉籍史料，学界理应重视。

大清国留给后人的档案资料，从文种来看，除汉文外，还有满文、蒙古文（包括托忒文）、藏文、察合台文、阿拉伯文、缅文、俄文、英文、法文、拉丁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至少十种以上文字。我们研究大清国时代史，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多语言状态下的帝国统治问题。目前虽说所能看到的史料数量的多寡有

の时代—帝国の形成と八旗社会—》第 4、5、6 章等相关部分。新近介绍满文舆图的论作，参见吴雪娟《论满文翻译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清代满文舆图概述》，惜该文叙述过于简略，不足以窥探满文舆图的全貌。

① 曹婉如、郑锡煌、黄盛璋、钮仲勋、任金城、秦国经、胡榜波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和曹婉如、郑锡煌、黄盛璋、钮仲勋、任金城、秦国经、汪前进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

② 汪前进、刘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全 3 卷（《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图》《乾隆十三排图》）。

所差异，但在众多领域中，非汉文资料记述内容之丰富性，也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直至今日仍对新兴的中亚各国编纂国史起着重要的作用。① 所以，汉文之外用不同文种记述的舆图资料，其价值和汉文资料同等重要。解读研究这些不同文种的舆图资料，不仅给中国舆图史研究带来新的视野，也将有助于理解世界舆图史的发展历程。

早在1936年，刘官谔撰文介绍内务府舆图房所藏舆图时，专门提及大清国时代绘制的舆图所涉及的文种包括满文、汉文、满汉合璧、西洋文字上贴写汉文附笺等形式。②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的限制，很多以不同文字绘制的舆图资料，人们至今无法目睹全貌，许多收藏机构，唯恐涉及国家机密，秘而不宣。这些限制不仅给研究人员带来诸多不便，也限制了中国舆图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一些流散于世界各地的中国舆图资料，经近几年的编目和调查，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到海外所藏舆图状况，从中也可以发现大清国舆图内容的丰富性和形制的多样性。③ 我们期待进一步做跨国领域的合作研究，整理和出版相关舆图的各国综合性目录以及图录。

在进入主题前，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满文舆图研究的历史，以便更好地理解我们所要讨论的满文舆图在研究史上的地位和意义。需要说明的是，有关满文世界舆图以及《皇舆全览图》等方

---

① 《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第1、2册）等资料集的出版就是一例。

② 刘官谔：《内务府舆图房藏图纪要》，第135~146页。

③ 欧美图书馆收藏的中文舆图情况，参见李孝聪编著《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满文舆图目前还不见专目出版，各国收藏的有关满文图书目录中有个别满文舆图提要，可资参考。英国伦敦藏个别满文舆图参见 Simon, W. and H. Nelson, *Manchu Books in London: A Union Catalogue*, pp. 33－34。汉文舆图情况参见华林甫《英藏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国地图考释》，第66~77页；《英国国家档案馆藏中国近代舆图》，第28~33页。现又有《英国国家档案馆藏近代中文舆图》一书，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9。

面的研究，笔者将另外撰文论及，在此不赘述。

早期满文舆图的介绍，中外许多论著都有个别提及，但基本都不属专论。真正开始解读图内地名并展开深入探讨的研究之作，当推1909年内藤湖南撰写的《间岛问题调查书》，内藤在这个时期已开始利用满文舆图，专门研究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内藤的文章利用摹写的《满洲文长白山图调查书地图》第二（见本文附录图1，原图奉天宫殿翔凤阁藏）、《满洲文盛京图》（图2，原图奉天宫殿翔凤阁藏），分别详细解读了两张满文图中的全部地名，并注明满文、罗马字转写和对应的汉字地名，为满文舆图研究首开先河。[①] 通过内藤的研究也可以得知，当时的奉天故宫还存有其

---

① 《间岛ノ版图ニ关シ清韩两国纷议一件付属书内藤虎次郎调查报告》10；《间岛问题调查书》，第六/2；《满洲文长白山图》，第424页；《满洲文盛京图》，第441～442页。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1900年以前，论及满文舆图以及目录等中外著作亦有不少，泛论居多，故略而不记。内藤湖南研究东北史地的成就，早在1934年已引起中国国内学者瞩目，详情参见周一良《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第155～167页。关于康熙时代满文舆图表现的独特风格，1944年内藤湖南在《清朝史通论》第114～115页中提出："中国地图自古不把山绘成山脉，惟将山散放图中，不绘成山脉。但是，康熙时期的地图绘有山脉，也惟有康熙时期的地图中是如此。乾隆以后，复制地图时，山仅绘一座一座，不成山脉，因此，康熙时期绘制的地图为上乘。这也是利用西洋人的结果。"内藤在文中附带介绍自己在北京发现有关满洲、蒙古方面地图后摹写舆图的逸话。继而又介绍了为录入地名，彻夜不眠，花费三四天，尽悉抄录带回日本的事情。由此也不难想象当年内藤湖南对舆图资料情有独钟的一面。早在1910年9～10月，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就派遣内藤等三位教授、富冈等二位讲师，到北京学部调查敦煌发掘的古书以及内阁传来的古书。时年内阁古书还未曾整理，经许可初次开箱目睹了宋、元版古籍。当时，阅览了十多箱书籍，除珍本古书外，其中就有舆图资料。譬如内藤记录了以下几幅舆图：明代雁门关宁武关边垣图、明代东路边垣图说、明代甘肃镇战守图略、大清一统志稿本、清汉字甘肃图、浙江五府分图等；并介绍照相以及复写兴安岭地方、喀尔喀地方、哈密地方三幅图带回日本的经纬，高度评价这些舆图的研究价值。详情参见《目睹书潭·清国派遣教授学术视察报告》（狩野、小川、滨田、富冈诸位合作），《内藤湖南全集》第12卷，第188～211页。在该文末尾附有内藤阅览京师图书馆图书及亲笔抄写的书目，即《京师图书馆目睹书目》，上引书第209～211页。本文日文、满文等资料均为笔者译成汉文，以下同，不另加注。

他几幅满文舆图。[①]

1914 年，稻叶君山撰写的《清朝全史》（上册）一书中，叙述中俄关系初期的一节里，刊载了一幅拟名《康熙初年满洲地图》的满文舆图（后被称为《罗振玉旧藏地图》），但未对其内容进行解说。[①] 这幅满文舆图后来由德国的福克司（Walter Fuchs），日本的吉田金一、船越昭生等学者相继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很多鲜为人知的重要问题，但最终未能全面解释该图的来历、绘制经过以及绘制年代等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在后面做详细的叙述。

1925 年，俄罗斯学者巴托尔德（B. Бартольд，1869 - 1930）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俄罗斯和大清国之间的交涉过程，其中就涉及了绘制舆图的问题。文中虽未专门介绍满文舆图，但对西伯利亚舆图的绘制工作与康熙时代黑龙江地区的舆图绘制同步而行的叙述，自然而然地使人联想到康熙时期出现的全国大地测绘和满文舆图绘制问题。[②]

1930 年，在华德国学者福克司在北平国立文献馆查阅了各类舆图。1937 年，他的调查结果发表在 *Imago Mundi*（Vol. 2）上。该文介绍了国立文献馆庋藏的珍贵舆图转移到上海的原委，并提及当时北平还存有舆图 150 件左右。福克司从这些图中挑选自己颇感兴趣的有关中国北方地区的几幅舆图，并对其进行研究，提出中国

---

① 当年除奉天故宫收藏舆图之外，盛京将军衙门也藏有不同种类的舆图或图画资料。光绪年间，盛京将军衙门收藏舆图和战图的情况，参见《盛京典制备考》卷 1，光绪四年（1878）刊。其中载：将军衙门恭储“乾隆四十四年奉到《皇舆全图》一百零三篇，《回疆一带得胜图》三十四篇，乾隆五十一年奉到《金州全图》十六篇，盛京全图二轴；乾隆五十五年又奉到《台湾战图》十二篇，《安南国战图》六篇；嘉庆五十六年奉到《台湾战图》十二篇，《廓尔哈战图》八篇八折，《安南国战图》六篇六折；嘉庆十年奉到《云贵战图》一分四篇，《湖南战图》一分十六篇”。

① 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 534 页。

② B. Бартольд（1925）*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ав Европеи России: лекции читанные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и в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м институте живых восточных языков.*

曾有绘制东北各地舆图的计划，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绘制的这些舆图和俄罗斯绘制的舆图之间互有影响的问题，进而说明了中俄两国在舆图交流方面有过相互影响的重要问题。[①] 可惜福克司当时未能全面调查国立文献馆的舆图，也没有具体利用俄罗斯方面的舆图资料进行比较研究，但他指出的问题，直到今天也具有很深远的历史意义。

1933 年，福克司在日本的《满洲学报》第 2 期发表了一篇有关满文地图的专论，重点介绍了包括西伯利亚东北部地图在内的几幅满文地图。[②] 通过比较满文舆图中的里雅那江（liyana bira 或 liyana ula，汉文或维勒纳河）形状和俄罗斯的果都诺夫（Godunov）绘制的《西伯利亚地图》中的里雅那江相似，提出了两者相互关联的问题。福克司利用上述 1914 年稻叶君山在《清朝全史》中利用的《康熙初年满洲地图》，附图详述其内容，并解读了部分满文地名。福克司在文中附有满文舆图黑白照片，题名为《1690 年左右东北亚地图》，首次提出该图约绘制于 1690 年的问题，值得参考。福克斯在这篇论文中还分别论述了其他几幅满文舆图的概要和地名考释。他的研究无论从解读满文舆图的方法，还是从地名资料的引证方面，都为满文舆图研究提供了一个楷模。

1935 年，日本学者和田清在《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③] 中，专述满文舆图研究的重要价值。该文提及作者曾通过藤田博士得知罗振玉藏有一部分满文东北地图的事情。

另外，和田清介绍了 1908 年白鸟库吉在东北考察时，在浦盐斯德（即今符拉迪沃斯托克，昔称海参威）的东方学院图书馆发现满汉文历史地图的经过，该图由白鸟库吉费时十余天抄写携回日

① Walter Fuchs, " The Peking Map Collectin", pp. 21 - 22.

② Walter Fuchs, " Ueber einige Landkarten mit Mandjurischer Beschriftung", pp. 1 - 18. 日文梗概参见上引卫藤利夫抄译《满文地图に就いて要约》，第 1 ~ 3 页。

③ 大连图书馆藏，社团法人满洲文化协会于昭和十年（1925）刊行复印本。

本。后来和田清借出白鸟库吉手绘地图，经对照发现浦盐斯德东方学院的地图就是《盛京等处标记战迹舆图》。此图后来在《满洲历史地理》中以《盛京舆图》为题征引。该图亦可视为《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和田清称《盛京等处标记战迹舆图》）的抄本。这也说明了日本学界早就开始关注满文舆图的一段历史。和田清在文中进一步介绍当时奉职于奉天医科大学的福克司研究罗振玉所藏地图的成果，指出还有其他舆图存世的问题。通过福克司的研究，和田清也得知除北平故宫博物院外，奉天故宫亦藏一部《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预言今后会有新的舆图相继发现。[①] 同一时期，中国的王庸也已开始编辑出版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舆图目录，其中就包括了许多满文舆图，但此时并没有对满文舆图内容进行深入解读和研究。[②]

1937 年，当时的“满日文化协会”及“满铁”新京图书馆主持举办了东洋古地图展览，并发行了《建国五周年纪念　东洋古地图展览会陈列目录》（图 3），该目录分汉文之部和洋文之部，共陈列出 128 件地图，其中包括满文以及满汉合璧地图。除此之外，还有个别俄文地图。出品机构和人员包括当时的大连、奉天、新京、哈尔滨各“满铁”图书馆、“国立文化院”、“满日文化协会”等机关和黑田博士等个人。展览会先在当时的“满洲国首都新京”举办，后于同年 3 月 15 日，在奉天“国立博物馆”继续举行了一周的展览。[③]

1962 年，福克司在日本京都大学地理学史研究会主办的《地理学史研究》第 2 期发表了由织田武雄译成日文的《北京の明代

① 和田清：《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关于此图的满文、汉文地名索引参见今西春秋《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第 220 ~ 268 页。

② 王庸编《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 · 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新购舆图目录》。

③ 《日满文化协会关系杂件 · 设立关系附本邦ヨリ服部博士外 8 名渡满》（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H 门，东方文化事业 6 类，讲演 · 视察及助成），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世界图について》一文，首次介绍了满文《大明混一图》的概要，并附有《大明混一图》全图和《大明混一图》之“中国西南部和印度半岛”黑白照片。他指出此图和1402年在朝鲜绘制的中国舆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以及天理图书馆所藏《大明国图》、日本熊本县本妙寺所藏舆图出于同一类型，并进一步推定《大明混一图》即为《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中的《清字签一统图》。[①]

1963年，船越昭生撰文《康熙时代のシベリア地图—罗振玉旧藏地图について—》，高度评价罗振玉旧藏地图是“对未知的东北亚一角进行有组织的探险、测图活动展开之前的产物，显示了科学的地理认识飞跃的过渡阶段”，并进一步说明“这在中国地图史上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并非是继承宋、明两朝正统的中国地图的传统，也不显示出元朝地图及其影响下的西亚、朝鲜等地理知识相互结合的地图要素。也看不到中华世界的特色，更是难以发见同耶稣会士制作的各种舆图简单结合的要素”。船越经考证推定此图绘制于1673～1676年，进一步指出该满文舆图是在耶稣会士南怀仁（F. Verbiest）参与之下绘制而成的。[②]

此外，1964年，船越昭生在《ウイットセンの北东アジア地

① Walter Fuchs, “Notiz zur Pekinger Weltkarte der Ming-Zeit”, pp. 1－2. 日译文参见织田武雄《北京の明代世界图について》，第3～4页。除此之外，福克司还研究介绍了朱思本和广舆图，参见 Walter Fuchs, the “Mongol atlas” of China by Chu Ssu-pen and the Kuang-yü-t'u。另外《清字签一统图》在 Walter Fuchs, Ueber einige Landkarten mit Mandjurischer Beschriftung 第15页中已经提及，但此时还没有指出该图就是《大明混一图》的史实，到了1962年才正式提出《大明混一图》一说。最近专研《大明混一图》的论著，参见汪前进、胡启松、刘若芳《绢本彩绘大明混一图研究》，第51～55页；宫纪子：《モンゴル时代の出版文化》，第511～512页；刘若芳、汪前进：《〈大明混一图〉绘制时间再探讨》，第329～355页；宫纪子：《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图》，第285～293页。

② 船越昭生：《康熙时代のシベリア地图—罗振玉旧藏地图について—》，第199～218页。

图をめぐる二三の问题》一文中专门探讨尼古拉斯·威特森（Nicolas Witsen）的亚洲东北部地图，提及上述福克司于1933年介绍过的满文《1690年左右东北亚地图》，并提出无论从陆地轮廓还是里雅那江（即勒纳河）走向特征，都显示出同俄罗斯的果多诺夫地图相类似的要素，对福克司提出的1689年绘制一说提出质疑。船越昭生经研究提出绘制年代应为1674～1676年。[①] 船越论文旁征博引，利用了不少中外舆图资料。尽管如此，船越未能援引同满文《1690年左右东北亚地图》直接相关的资料，许多问题还处于推测阶段。此图后来下落不明。1980年，吉田金一撰文研究该图，推定绘制年代为1690年左右，支持福克司之说。[②] 经吉田介绍该图后，1986年，刘远图写信告知吉田，此图当时收藏在大连博物馆。[③] 对这幅满文舆图，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讨论，最终还未能全部解开最重要的地理知识来源以及绘制途径等最基本的问题。

1964年，鸳渊一利用《盛京舆图》（即《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专门对《满文老档》中出现的地名进行了一番深入研究，1979年发表其研究成果，为利用满文档案研究东北历史地理提供了一个范例。这篇文章至今也是研究大清国入关前历史地理的必读之作。[④]

1973年，著名地图学者列奥·巴格罗夫（Leo Bagrow）介绍了

---

① 船越昭生：《ウイットセンの北东アジア地图をめぐる二三の问题》，1964。

② 吉田金一：《郎谈の吉林九河图とネルチンスク条约》，第31～70页。中译文见刘显叔译《郎谈〈吉林九河图〉与〈尼布楚条约〉》。刘远图不同意福克司和吉田金一把罗振玉旧藏满文舆图的成图时间定在1690年。刘远图称："罗振玉旧藏地图应是1685年之后，1689年之前的作品。与同时期俄人绘制的西伯利亚地图相较，罗振玉旧藏地图也谈不到受俄国地图的影响。"参见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第67页。

③ 吉田金一：《ロシアと中国の东部国境をめぐる诸问题—ネルチンスク条约の研究—》，第54页。

④ 鸳渊一：《满文老档による盛京舆图の历史地理的研究》（一、二、三），第117～199页。

满文巡幸图和蒙古文地图各一幅,[①] 惜未对图内语文进行细致解读。但这些都或多或少地说明了中外各界舆图研究人员始终在关注满文舆图独有的研究价值。

通过以上简要回顾也可以看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满文舆图研究方面几乎是个空白，这一状况从80年代以后逐渐有所转变。

1980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的鞠德源在《关于明代奴尔干永宁寺碑记的考察和研究》一文中，介绍了满文舆图《黑龙江流域图》(鞠德源称之为《胡尔哈河入海图》)。据介绍，此图为康熙朝绘制满文图，“该图系用高丽纸墨绘而成，接一卷，后被修裱者分裱成二十小幅，并误题为《黑龙江流域图》，图幅高35厘米，每幅长短不等，合计总长21.92米。此图从胡尔哈河（今称牡丹江口）中游及布尔哈土城、尼堪城画起，一直画到混同江口(即黑龙江口）和东海”。该满文地图共二十幅，鞠德源附两幅原图黑白图片，介绍了其中的第一幅、第十九幅、第二十幅的局部，并推断此图绘制时间可能是在顺治十年（1653）前后。[②] 有关该系列满文舆图，至今还不见有人全面介绍和研究。[③]

---

① 西伯利亚地图研究，参见 Leo Bagrow, *The atlas of Siberia by Semyon U. Remezov*; 论及满文及蒙古文的著作参见 Leo Bagrow und R. A. Skelto, *Meister der Kartographie*, pp. 435 - 438。满文图标有汉文贴签，为1760年，疑为皇帝巡幸图。蒙古文地图为1734年准噶尔时期的舆图。该书在介绍亚洲地图时，除中文舆图外，专设一节满文以及中亚舆图部分，专门论及满洲舆图和准噶尔蒙古舆图。介绍列奥·巴格罗夫（Leo Bagrow）的地图学研究之作，参见石山洋《レオ・バクロフの地图学史研究》，第27~54页。

② 参见鞠德源《关于明代奴尔干永宁寺碑记的考察和研究》，第64~90、66~67页。

③ 中俄关系研究中，介绍舆图的论文参见吉田金一《ロシアと中国の东部国境をめぐる诸问题—ネルチンスク条约の研究—》，第51~65页。中俄边界问题专题研究，参见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最近研究有关18世纪西伯利亚地图的论文，参见 Shinobu Yamada-komeie, Mapping the Russian Far East: Cartography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Sakhalin, the Kurils, and Japan in the 18th century, pp. 55 - 65。

同年，吉田金一利用满文《吉林九河图》研究了该图和《尼布楚条约》之间的关系，对中外学界进一步利用满文舆图探讨重大历史事件有参考作用。[①] 吉田的研究发表之后，学界开始瞩目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舆图资料。但是，现在看来，吉田的研究内容存在很大的问题，尤其是推断《吉林九河图》为签订《尼布楚条约》参照地图之说，让后来不明该图真相的国内学者深信不疑，附会之说随处可见。很多讨论边界问题或者界碑问题的论著，都以吉田的研究为基础，立论陈说，可见其影响之甚。[②]

1993 年，薛虹利用 1948 年在吉林购入的一幅《满文黑龙江地图》，讨论中俄早期交涉过程中涉及的格尔必齐河位置问题。据介绍，该图有 541 处地名，根据记载的地名、驿道以及建置，推定该图为道光初年绘制。[③] 惜该文未附原图资料，从文末绘制的《黑龙江形势图（局部示意)》中，我们无法窥知原图的形制和绘法。

1997 年，松浦茂利用满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④] 介绍了九路“调查”的经过，但因其主要以黑龙江北岸“调查”为视点，且在考述康熙二十九年（1690）察边问题时，以康熙五十年重新绘制的《吉林九河图》为据，故许多问题还有必要重新探讨。所

---

① 吉田金一：《郎谈の吉林九河图とネルチンスク条约》，第 31 ~70 页；《ネルチンスク条约で定めた清とロシアの国境について》，第 62 ~87 页；以及《ロシアの东方进出とネルチンスク条约》。

② 参见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

③ 薛虹：《彩绘满文黑龙江地图和格尔必齐河的位置》，第 1 ~10、59 页（后该文收入《薛虹学术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第 371 ~382 页，但未收录原刊三幅示意图），其中论及一幅《彩绘满文黑龙江地图》，由薛虹于 1948 年在吉林市购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藏。此图纵 125cm，横 100cm，纸质，满文由刘厚生提供汉译，但不见满文转写地名等内容。

④ 简要介绍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的文章，参见吴雪娟《馆藏〈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的价值分析》，第 25 ~26 页。楠木贤道：《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からみた康熙 23 年の露清关系》，第 29 ~82 页。后者对康熙二十三年满文档案及中俄交涉综合论述之后，附有满文二十七件文书的罗马字转写和日译文，这些方法有助于读者了解满文档案的语言风格与文书原貌。

以，结合舆图资料和档案资料全面介绍康熙时代的察边问题，还有必要进一步继续深入探讨。[①] 除此之外，2007年，吴雪娟著有《康熙满文本〈九路图〉与清代巡边制度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一文，利用满文档案和舆图资料，详论有关巡边问题。遗憾的是该文也和吉田金一、松浦茂同出一辙，以为此图绘制于康熙二十九年，且也没有参照松浦茂十年以前就曾论及的相关问题。[②]

2001年，卢雪燕以《院藏康熙满文本〈黑龙江流域图〉考介》为题，专门介绍了满文舆图，再次引起学界瞩目。[③] 其后，2006年，孙喆发表了《从两幅地图看18世纪初期清人对黑龙江流域的认识》为题名的论文，重点介绍《黑龙江流域图》和《皇舆全览图》（《黑龙江源图》《黑龙江口图》《黑龙江中图》）的相互关系，推测出《黑龙江流域图》绘制时间"大概是在康熙三十一年至康熙四十八年之间"，并进一步推测此图可能就是传教士测量成果。[④] 目前，我们还看不到传教士利用这些舆图资料的相关档案等佐证，得出这一论点为时尚早，有些问题还需要今后进一步深入探讨。

多年来，笔者在查阅中外各地所藏满文档案文献的同时，多方收集满文舆图相关的档案资料。2007年撰文《满文〈黑龙江流域图〉》，结合同一时代的满文档案资料，介绍此图绘制的历史背景和绘制过程，阐明了此图是在编纂《大清一统志》过程中，调查

---

① 松浦茂首次介绍有关满文资料时，利用日文"调查"一词。原满文档案中为tuwaname genembi（视察），并未用满文 baicambi（调查）一词，故中文译为"视察"为宜。参见松浦茂《ネルチンスク条约直后清朝のアムール川左岸调查》，第76~106页。后收入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第1~40页，以下略称松浦茂（1997）。

② 有关《吉林九河图》，笔者将另外撰文介绍其绘制原委。

③ 《故宫文物月刊》第19卷第9期，第96~109页。

④ 《中国地方志》第6期，第55~60页。

黑龙江将军辖区山川河流之后绘制而成的。[①] 笔者今后将陆续介绍有关满文舆图对研究大清国历史的意义。

自内藤湖南到今天的满文舆图研究，其内容基本都以欧亚东北部为主，这也很容易造成一种误解，即以为绘制的满文舆图基本以东北部为主。目前能够公开阅览的满文舆图，还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满文舆图除大清国统治的东西南北各地之外，也包括各类世界舆图，以稿本、草稿、抄本、刊本等形式流传分藏于世界各地。

2003 年，郭美兰以《热河地图　清宫珍品》为题，介绍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图。据介绍，该馆藏有相关舆图共二十余件（册），百余画幅，形成时间起自康熙年间，最晚至民国。地图文种除汉文以外，还有少数满文或满汉合璧图。对这些地图的分类介绍，有助于了解第一历史档案馆现藏各种舆图的图样类型。

其后，2005 年，郭美兰在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主持召开的舆图国际会议上，以《清宫珍藏满文舆图》为题演讲，专门谈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满文舆图。据介绍，该馆现有近 300 件（册）满文舆图。文种有满文、满汉合璧、满蒙合璧、满藏合璧、满俄合璧等。郭氏还对馆藏多幅舆图加以分类，详细讲述了满文舆图的绘制特点和内容。[②]

从以上的简单回顾也可以看出，中外学者始终在关注满文舆图。但通过以往的这些研究，我们还远远不能窥见整个满文舆图的全貌。虽说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满文舆图数量有限，但随着满文舆图和满文档案资料的进一步公开出版，这一问题必将会得到进

① 《黑龙江流域图》的绘制背景及其绘制过程，参见承志《满洲语で记された“黑龙江流域图”》，第 195 ~ 222 页。

② 该演讲文章后收入郭美兰《明清档案与史地探微》，辽宁民族出版社，2012，第 78 ~ 87 页。

一步深入研究。满文舆图研究可以说刚刚起步，无论在利用舆图资料方面，还是在挖掘新资料方面，都有必要在今后继续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①]

本文探讨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满文《乌喇等处地方图》，就是试图填补这方面空白的一个尝试。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为行文方便，本文采用了 P. G. von Möllendorff 罗马字转写方式。因满文字母无大小写之别，故正文以及引文内满文地名、人名、图名的起首文字未采用大写方式。

二　《乌喇等处地方图》图名

1932 年，在王庸编写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十九）满洲”类中，介绍了十幅有关大清国东北地区的舆图。其中“（一六五）乌喇等处地方图二帧［青绿画，满文，纸本，75］”，附有说明如下：

> 二帧图画不同，似非出一人手。旧目“称康熙三十二年画本”，地名以红签注满文。一帧之背，贴有一白纸字条云“郎坦送来九大人图一幅，库内取来乌喇等处图一幅，纂修满丕画来图一幅，三幅共包一处”。九大人图为本目中“口外各路满文图”六帧之一。满丕所画，不知何图。惟库内之“乌喇图”只称一幅，不知是否以两

① 最近的蒙古绘画以及舆图研究，参见小长谷有纪、杨海英编著《草原の游牧文明—大モンゴル展によせて》。蒙古文地图研究参见 Futaki Hiroshi and Kamimura Akira（eds.），*Landscapes Reflected in Old Mongolian Maps*；杨海英：《清朝时代伊克昭盟盟长バダラホの奏凯图—“图开克迹”が描くオルドス七旗—》，第 626 ~ 657 页。

> 帧为一幅，抑两帧之一，来自库内而其一即满丕所画。因在该字条之上方又记有“编纂满丕出差画来舆图”字样也。至于此字条之来源，殆亦一统志馆所写贴。①

简明扼要的附记，实际上道出了《乌喇等处地方图》流传的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的绘制年代以及绘制舆图相关的历史人物、机构等。《乌喇等处地方图》一帧纸背贴写的白纸字条三幅图，即《郎坦送来九大人图》一幅，《乌喇等处图》一幅（库内取来），《纂修满丕画来图》一幅，三幅共包一处，也说明三幅图有可能在同一处保管。正如王庸附言，这些舆图和一统志编纂馆有关。事实上，通过康熙时期的有关满文档案，证明这些图与当年编纂《大清一统志》时对黑龙江、吉林等地人文地理状况进行的数次调查有直接的关系，在内阁一统志馆提供给黑龙江将军的资料中，就包括上述满文舆图的记载。②

---

① 王庸编《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新购舆图目录》，第45～72页（后以《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为名，于1934年出版）。此外，国立北平图书馆舆图资料参见王庸、茅乃文编《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和《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续编》等舆图目录。1931年，王庸由陈寅恪介绍出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兼舆图部主任。参见李小文《王庸先生和他的著作》。中国国家图书馆还藏有国立北平图书馆南京办事处编《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一册，油印本，1946，附新购特藏舆图目录，惜原文未寓目，俟查。

② 《黑龙江档》16～21，《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吏、兵部、理藩院、盛京兵部来文抄档》正月初四日卜魁驿丁齐阑宝递送文书记载 langtan sei nirufi gajiha uyun jugūn i nirugan（《郎谈等绘制带来九路图》），该图即为王庸所标注的《郎坦送来九大人图》。此外，《黑龙江档》16～24《康熙四十九年正月黑龙江副都统、墨尔根城协领、索伦总管、驿吏行文抄档》一月初七日令领催阿尔都哈（alduha）递送文书也有 dorgi amban bihe langtan sei baicafi gajiha nirugan（《原任内大臣郎谈等勘察带来图》）、dorgi amban bihe langtan sei nirufi gajiha nirugan（《原任内大臣郎谈等绘制带来图》）也有相关图名出现，均指同一幅图。凡本文引用档案全宗《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时，前一书名号内为档案全宗略称，数字16～21表示胶卷编号及拍摄顺序号，后一书名号内为册档全文名称，以下《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亦同，不另注明。所有满文档案，均由笔者汉译。

当然，这些舆图目前究竟以什么题名保存在何地，这也是本文首先要说明的一个基本问题。以下就针对舆图名称以及流传情况进行简要介绍。

众所周知，国立北平图书馆（原址位于北平文津街）前身为宣统二年（1910）成立的京师图书馆，民国十七年（1928）合并北海图书馆，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当时图书馆分设总务、采访、编纂、阅览、善本、期刊、舆图、金石八个部门。其中，舆图部收藏新旧舆图200幅。[①]

王庸编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新购舆图目录》，即为原京师图书馆藏清内阁大库藏舆图一百余种图之目录。这些舆图分别有民国七年（1918）四月和民国十五年（1926）十一月编订的目录。因七年本所记较详，王庸编目称之为旧目。从附记中的旧目“称康熙三十二年画本”来看，《乌喇等处地方图》可能亦有康熙三十二年绘制本。民国七年四月编订的舆图目录中有此年代记载，该目录目前笔者还未曾寓目。

王庸的目录出版后，1933年出版了李德启编《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满文书籍联合目录 manju bithe cagan i fiyelen i ton》，其中记《乌喇等处地方图》名称如下：

> 乌拉等处地图
> ula i jergi ba i nirugan 满文（补译）
> 二帧，青绿画纸本
> 长132cm，宽110cm；长115cm，宽87cm

汉文题名缺“方”字，满文为李德启“补译”。其补译的满文《乌

①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北平ニ于ケル国立重要学术机关》。

拉等处图》，其实就是王庸目录的满文《乌喇等处地方图》，只是增补译写了满文题名和舆图尺幅。除此之外，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存箱目录》（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打印稿，1985）中登记为“图六箱（15 幅）”，其具体内容如下：

乌喇等处地方图二幅，清代满文纸本彩绘，134×112 公分，116×88.5 公分，北平。①

上述各目录之中，舆图尺幅记载稍有区别，图名《乌拉等处地图》亦变为《乌喇等处地方图》，实际上均指同一幅地图，即《乌拉等处地图》。此图自从王庸介绍以来，一直未为研究人员提及，迄今也不见任何专论。从旧目附记“库内取来乌喇等处图一幅”来看，此图来源应该是内阁大库所藏舆图资料的一部分。② 从康熙年间档案记载来看，该图藏于内阁一统志编纂馆。

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清宫最早的舆图目录《天下舆图总折》（康熙朝）记载了相关的图目：

康熙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郎潭交来乌拉宁古塔口

① “图六箱”除《乌喇等处地方图》外，还包括了《黑龙江流域图》和《吉林九河图》。当时北平图书馆装箱整理放在一箱，也证明原先这些图都基本在同一处的事实。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舆图的详况，参见卢雪燕《地理之学非图不明——故宫所藏古地图探微》，第 109～124 页；李孝聪：《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清代舆图的初步整理与认识》，第 151～174 页。

② 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藏 6827 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第 1～2 页。该书“前言”记载：“（前略）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防不测，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和逐年购得的特藏地图随大批文物运往南京。其后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时，将 300 余种 8 大箱舆图运至台湾，存于台北中央图书馆。”有关舆图箱数，各资料记载有所不同，如《文献丛编》第 32 辑（1935 年），存沪文物点收事项记载为“舆图十六箱”。从运抵台北后整理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存箱目录》登记来看，共 18 箱，图共（幅、卷、册）817 件，还有 8 件未列入该目录。

外大小图五张

康熙四十七年正月十二日，奉旨交来乌拉图二张[①]

以上舆图，目前还无法推知其具体绘制内容。郎潭，即郎谈或郎坦，皆为满文 langtan 的汉字异写，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世代为内大臣，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奉命同彭春等前往打虎儿（dagūr）、索伦（solon）处，窥探俄罗斯情形。康熙二十四年（1685）特旨授监军副都统之职，协同宁古塔副都统萨布苏等统兵往征俄罗斯雅克萨城，迫使俄罗斯酋长求降。康熙二十八年（1689），郎谈协同议政大臣索额图等前往俄罗斯议界，议定疆界而还，这就是驰名中外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康熙三十四年（1695）五月初九日，郎谈卒于八虎口，是年 62 岁。[②]《天下舆图总折》中记载的康熙三十一年（1692）郎谈交来的有关乌拉、宁古塔的五张图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满文舆图有何关系，还需进一步调查研究。本文论及的《乌喇等处地方图》究竟是否和康熙四十七年（1708）正月十二日交来的图有关，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论证。

目前，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两幅《乌喇等处地方图》，整理编号具体如下：

1. 乌喇等处地方图　平图 021453　134 × 111 公分
2. 乌喇等处地方图　平图 021454　134 × 112 公分

本文仅探讨图 1，图 2 将另外撰文讨论。以下内容均以图 1 为主展开讨论。

有关《乌喇等处地方图》的图名，在乾隆年间编纂的舆图房

① 《天下舆图总折》。
② 参见《八旗通志初集》卷 153，郎谈传（满文，第 38b ~ 39b 页；汉文，第 3888 页）。

舆图目录《萝图荟萃》中亦不见其名，也许这些图当时不属于内务府舆图房。从该舆图记载的满文内容来看，该图为宁古塔将军辖区图，内容和目前的题名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亦非“乌喇”地方图，唯“乌喇”原为满文“ula”的汉字音写，意为“江河”。此图描绘内容以黑龙江下游以北江河（bira ula）为主，这也许是后来图名题为《乌喇等处地方图》的一个缘故。

2008 年 1 月，笔者有幸受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相邀，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郭美兰女士一起解读《乌喇等处地方图》满文原件，发现原图并无图名，也进一步证明此图汉文题名为后来整理者所题。

据康熙四十九年满文档案记载，此图一般有如下四种称呼：

（1）gūsai ejen bihe bahai nirufi gajiha nirugan（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

（2）gūsai ejen bihe bahai sei nirufi gajiha nirugan（原任都统巴海等绘制带来图）

（3）gūsai ejen bihe bahai nirufi benjihe nirugan（原任都统巴海绘制送来图）[①]

（4）bahai i nirufi gajiha nirugan（巴海绘制带来图）[②]

这四种称呼有些微的差异，但都是指同一张满文舆图。当时的图名译成汉文为《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由此看来，我们要讨论的《乌喇等处地方图》(图名，也确实是后来的整理人员或编目者

① 《黑龙江档》16~25《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奉天、宁古塔将军、伯都讷副都统、土谢图亲王、扎萨克图郡王、扎赉特、杜尔伯特贝子等行文抄档》九月二十二日笔帖式散珠（sanju）递送文书，十月二十一日令骁骑校卓尔库（jolkū）递送文书。

② 《黑龙江档》16~21《康熙四十九年一月吏、兵部、理藩院、盛京兵部来文抄档案》八月二十三日由齐兰宝（cilamboo）递来文书。

拟定而流传至今的。[①] 无独有偶，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也藏有一幅形制完全相同的满文舆图，该图现在整理图名为《黑龙江图》（满文，乾隆绘本，[②] 彩色，未注比例尺，1 幅，图纵 135 厘米，横 112 厘米），且图左上角注有满文“gūsai ejen bihe bahai nirufi bajiha nirugan”（即“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这两幅分藏北京和台北的满文地图，无论从形制、尺幅还是从图中河流名称来看，除满文笔迹有所差异之外，完全相同，后者于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复制而成，应为复制图。[③]

为证明不同名称的满文舆图是指同一张舆图的事实，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提出具体的绘制背景和绘制过程、图名考订等问题。

首先，本文从介绍鲜为人知的黑龙江以北地区的历史入手，探讨大清国对该地区的统治过程和地理知识的汇纂过程。然后进一步介绍《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康熙二十九年（1690）兵分九路视察黑龙江以北各地山河的具体经过和绘制舆图的问题。为此利用满文档案详细介绍康熙二十九年视察队伍的编队情况，揭示本文探讨的《乌喇等处地方图》和九路视察队伍之一的宁古塔将军巴海率领的视察队伍之间的关系，提出巴海等三路视察队伍亲临黑龙江下游以北的亨滚河、兔乎鲁河流域等地后绘制《乌喇等处地方图》的事实。此外，利用满文档案，依据档案文书描述的《乌喇等处地方图》内容，证明档案文书内记述的舆图内容和我们所要讨论的舆图内容的一致性，断定两者为同一舆图的事实。最后，利用各

① 目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将此图登录为《乌喇等处地方图》（平图 021453，平图 021454）。东北方面的满文地图，在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第 116 ~ 119 页，有《吉黑两省地图》《黑龙江图》《黑龙江全图》等舆图。

② 非乾隆绘本，应为康熙朝绘本，即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十三日。

③ 参见黄润华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第 364 页。拙文该处属 2013 年 1 月 15 日补记追叙资料。原文发表之际，惜国家图书馆藏《黑龙江图》原图笔者未能寓目。满文目录的出版，再次证明了笔者此前文章提出的“原任都统巴海等绘制带来图”的结论。唯该图录注明该图为“乾隆朝”，有误，应为“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十三日”绘制而成。

种舆图资料和新发现的第一手档案文书及中外编纂资料，考订汉字地名用字变化等问题。

三 《乌喇等处地方图》绘制的历史背景

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就已进兵黑龙江流域，招抚了黑龙江周边各部。更具体地将各部编为八旗基层牛录组织，主要是在天聪以后展开的。譬如，天聪四年（1630）十一月，即由承政兼梅勒章京宜苏（isun）奉命副左翼主帅萨木什喀（samsiha）等率兵远征索伦部落（solon i aiman），大获全胜，携来大量户口。天聪五年（1631）三月，又远征虎尔哈部落（hūrha aiman），攻取兀库尔城（ukur hoton）等地，进兵铎陈（duwecen）等地。[①] 到了崇德二年（1637），满洲正红旗大臣叶克舒（yekšu）率师远征黑龙江，击败博穆博古里（bombokur），攻取雅克萨城（yaksa hoton），进至萨哈尔（sahar）地方，俘获男子 640 名，家口 1720 名，马 156 匹，牛 104 头。[②]

崇德三年（1638）五月，索伦部落 337 户，男子 480 人来降。太宗特命尼堪（nikan）及每旗摆牙喇甲喇章京各一员，率每牛录摆牙喇各一人，携蟒缎、素缎、梭布前往迎索伦部落来降人员赏赐无数，在外藩蒙古郭尔罗斯部落（tulergi goloi monggo gorlos gurun），于吴库马尔（ukūmal）、格伦（geren）、额勒苏（elesu）、昂阿插喀（anggacaka）地方，驻扎耕种，任其移营。并视其中有能约束悖乱、堪为首领者，授为牛录章京，分编八个牛录而归。[③] 这也是原先属于蒙古领民（harangga）的索伦部（solon aiman）编

① 《八旗通志初集》卷 159，宜苏传（满文，第 6a ~ 6b 页；汉文，3981 页）。
② 《八旗通志初集》卷 157，叶克舒传（满文，第 14a ~ 14b 页；汉文，第 3957 页）。
③ 《八旗通志初集》卷 159，尼堪传（满文，第 44b ~ 45a 页；汉文，第 3992 页）。

入牛录之始。

崇德七年（1642）闰十一月，满洲镶白旗人朱马喇（jumara）同沙尔虎达（šarhūda）往征松花江（Sunggari giyang）之虎尔哈部落，招降喀尔喀木（kalkamu）、遮克特库（jekteku）、塔土库（tatuku）、福提希（futihi）、俄尔浑（orhon）、洼齐奇（waciki）、库巴查喇（kūbacara）、额提奇（etiki）、萨里（sali）、尼野尔北（niyerbe）十屯（gašan）人民，共计男子534人，妇女幼小924人。①

崇德八年（1643）三月，满洲镶白旗哈宁阿（haningga）同纛章京阿尔津（arjin），往征黑龙江之虎尔哈部落（sahaliyan ula），② 获波和里（bohori）、诺尔噶尔（norgal）、都里（duli）三处（gašan）男子725名，小噶尔达苏（ajige kaltasu）、大噶尔达苏（amba kaltasu）、绰库禅（cokūcan）、能吉尔（nenggil）四处（gašan）归顺男子324名，俘妇女幼小199口，获马317匹，牛402头，貂狐等皮张甚多。七月，率师凯旋。③

---

① 《清太宗实录》卷63，崇德七年闰十一月己酉。《八旗通志初集》卷160，朱马喇传（满文，第6a页；汉文，第3997页）。

② 满文为 jakūci aniya ilan/ biyade, tui janggin arjin i emgi hūrha aiman i/ sahaliyan ula be dailanara de。据满文原文，汉译文应为“往征虎尔哈部落之黑龙江”。故不从《清太宗实录》卷64，崇德八年三月庚戌记载的“往征黑龙江虎尔哈部落”。该处实录汉译文有误，依满文实录原文（ilan biyai juwan nadan de）tui janggin arjin, haningga sede/ janggin cooha be afabufi, hūrgai sahaliyan ula de cooha unggihe，应译为“（三月十七日）命护军统领阿尔津、哈宁噶等率将士，往征虎尔哈之黑龙江”。满文无部落等字，亦不见黑龙江之虎尔哈（sahaliyan ulai hūrga）之语。由此亦可窥见汉文实录译文之错讹，故征引不可全信汉文实录。另外，相关误译处参见《清太宗实录》卷65，崇德八年五月丁巳“往征黑龙江虎尔哈部落”（hūrga i sahaliyan 34b//35a ula de cooha genehe）。

③ 《八旗通志初集》卷159，哈宁阿传（满文，第21a~21b页；汉文，第3985页）。有关太祖、太宗时代远征松花江及黑龙江流域的研究，前人成果较多，参见阿南惟敬《露清対立の源流》和《清初军事史论考》，吉田金一：《ロシアと中国の东部国境をめぐる诸问题—ネルチンスク条约の研究—》。中文著作可参见孙文良、李治亭《清太宗全传》，第320~331页。

这些大规模的远征和编入八旗牛录的举措，大大推动了大清国对这些地区的有效统治。原先蒙古帝国的各蒙古领地以及领民，逐渐被收编为大清国的正规军团——八旗的一部分，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分别对游牧、狩猎、农耕等集团进行整编。在保持固有的生活方式的情况下，游猎为生的索伦等部，逐渐开始被编入牛录，定期贡纳一定数量的貂皮，并被赏赐各类物品。

顺治时期，俄罗斯人（罗刹）[①] 南抵黑龙江流域，并侵入呼马尔河周边地区，甚至在呼马尔建筑军事要塞。顺治十年（1653）为了防止俄罗斯南下，设置了防范俄罗斯的前线基地——宁古塔昂邦章京和副都统，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康熙元年（1662）改为宁古塔将军，由巴海首任将军。

康熙十年（1671）九月初三日，康熙皇帝出朝阳门，前往东北各地巡幸。同月二十八日，驻跸雅克萨，遣侍卫往宁古塔，赐将军巴海貂帽、貂袍、天马皮挂、镀金刀等物。[②] 同年十月初二日，驻跸达溪达尔巴。宁古塔将军前来朝见。初三日，康熙皇帝召见宁古塔将军巴海入内，问宁古塔及瓦儿喀、胡尔哈人民风俗，谕曰：

> 瓦儿喀、胡尔哈人皆暴戾奸诡，卿其善布教化，以副朕绥远至意。钦哉。[③]

皇帝如此面授机宜，为的是管理教育好宁古塔各地居民。此时提出

---

① 罗刹，满文为 loca 或 looca。罗刹出现在黑龙江流域时，满文档案中对其两种写法并存，一般均指活动在黑龙江南北各地的俄罗斯之领民（harangga）为罗刹。值得注意的是，罗刹妖魔化，并趋向和恶魔同义并称，基本上是以后来的汉文资料为主，满文资料不见如此记载。满文 loca，汉文记作老掐、老枪、老插、老羌、罗叉、罗禅、罗刹、罗察等，本文据《康熙起居注》汉文本，记作罗刹。为方便起见，原文引用一般按原文记载记为罗刹，正文叙述用俄罗斯，以示区别。

② 《康熙起居注》第 1 册，康熙十年九月二十八日，第 4 页。

③ 《康熙起居注》第 1 册，康熙十年十月初三日，第 5 页。

了俄罗斯属民的问题。同月十四日，康熙皇帝亲自召见宁古塔将军巴海面谕曰：

> 朕向闻卿贤能，今侍朕左右，朕益知卿矣。飞牙喀、黑折虽服，然其性暴戾，卿当善为防之。尤须广布教化，多方训迪，以副朕怀远至意。罗刹贼寇虽云投诚，尤当加意防御，操练士马，整备器械，毋堕狡计。至于地方应行大事，即行陈奏，毋得疑畏。卿膺边地重任，尚其黾勉，以报朕知遇之恩。钦哉。[①]

这种耳提面命的恳切教示，其实也反映了康熙皇帝对宁古塔居民以及俄罗斯居民在黑龙江各地出现的很多问题的忧虑。当时，巴海及时奏曰：

> 臣惟有钦奉纶音，拮据黾勉，以报殊恩。[②]

此后巴海积极整顿宁古塔各地部族，陆续编制新满洲佐领，为巩固宁古塔边防奠定了基础。康熙十三年（1674）十一月三十日乙丑，巴海赴京朝见康熙皇帝：

> 先是，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巴海等，以松阿里吴喇、诺罗河、吴苏里吴喇、木伦等处居住墨尔折勒氏部落，因骑射闲［娴］熟，投诚已久，自归依以来，气习渐改，颇守法制，将伊等族长、里长题授佐领饶［骁］骑校。至是，将军巴海率墨尔折勒氏新编佐领四十员并佐领下人丁来朝。[③]

① 《康熙起居注》第1册，康熙十年十月十四日，第6页。
② 《康熙起居注》第1册，康熙十年十月十四日，第6页。
③ 《康熙起居注》第1册，康熙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第185页。

这是巴海率领当地新满洲各佐领第一次前来拜见皇帝。他们在京城待到第二年。康熙十四年（1675）正月初四日癸亥：

> 赐镇守宁古塔地方将军巴海黑狐裘、貂镶朝衣各一袭，墨尔折勒氏佐领札奴科、布克托等衣、帽、靴带、弓箭、撒袋、鞍马、缎疋等物。未时，上御保和殿，赐将军巴海及札奴科等食毕，御观德殿，命札奴科等射。[①]

清廷一方面奖赏宁古塔将军以及各新满洲佐领头目，另一方面，多方积极派人探察俄罗斯动静，并不时派遣密探调查黑龙江北部地理状况。当时带路向导（gajarci）基本上是出生于当地的索伦、达斡尔以及鄂伦春人，还有早年归顺的俄罗斯人，这些人对大清国掌握了解黑龙江以北的地理状况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们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特别是黑龙江以北各地山脉河源，以及各地部族居住和生活状况。在前往探察之前，调查人员首先寻访各牛录耆老，探查此前是否有熟悉地理环境的人员，如有此等人员，将彼等偕同前往调查地细察。这些举措使大兴安岭等地一带地理状况进一步明确化，也为康熙二十年（1681）以后远征黑龙江以北地区，攻打盘踞各地的俄罗斯据点带来了便利。

《康熙十五年乌拉吉林来文档》四月十五日正蓝旗特乌勒（teole）牛录领催吴尔吉查（urgica）递送文书记载：

> 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副都统密咨都统白布善（baibušan）、萨布素（sabsu，萨布苏）等，为知照事。二月兵部秘咨，惟宁古塔设置官兵，虽为专防罗刹事，亦为

① 《康熙起居注》第1册，康熙十四年正月初四日，第189页。

保护居住松花江之瓦尔喀（warka）之民。现将松花江之民尽悉迁往宁古塔。余剩之半户之民，彼等收获完毕之后一并携来。等语。除将此严饬各牛录章京之外，交付副都统桧齐（kuwaici）、都统等将粮食运毕之后、遣官兵一并携来等。现内地未定，我等寻思如罗刹至松花江半户之地，居住宁古塔之官兵，率迁移之章京以及人民，保护人民迁移。逆溯至黑龙江之格依克勒（geikere）、赫哲（hejen）等国之地，此地人民不耕不种，避走各地，毋庸派兵前往。若兵进黑龙江，内地欲调遣之时，船只逆流而上，不能迅速抵达。再，若动用我处之军，不必驻扎盛京，愿往京城调用。盛京之兵调往京城，我等军调往盛京，双方出兵之时，兵马所需钱粮，又若家中支付钱粮，所需钱粮重复，故我等之兵，请径直调遣至京城。倘若有当，我等皆年轻有力，吾亲自率兵前往奋斗。等语。自部咨称，查得：宁古塔为要地，故将军不得率兵前来。等语，康熙十五年三月十二日奏，当月十四日奉旨：依议。钦此。为此咨行。罗刹有事，新设章京率领人民，退至宁古塔。为此知之。密奏。四月初八日。都统白布善、萨布素将此阅毕。喀齐喀抄写。[①]

康熙皇帝大加赞赏宁古塔将军巴海等分别迁移瓦尔喀部众之举。[②]当时，瓦尔喀内部不断有人聚众计谋叛逃，个别人员亦逃至索伦之地。其结果也往往被捕捉，送至京城处罚，并分别编入人员缺少的

①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以下，略称《宁古塔档》）1－1《康熙十五年乌拉吉林来文档》四月十五日正蓝旗特乌勒（teole）牛录领催吴尔吉査（urgica）送来文书。

② 《宁古塔档》1－1《康熙十五年乌拉吉林来文档》五月初七日沙兰（šaran）驿站人王瞎子（wang hiya dzi）送来文书。

八旗牛录披甲当差。[①]

康熙二十二年（1683）为编纂《大清一统志》，都统拜布善（baibušan）咨文署理将军事务之奉天副都统，报告宁古塔地理情形。这是一次有组织地调查宁古塔各地地理历史状况的重要活动。首先将山河、古迹、碑文、果实、禽兽、虫豸、异类等情，逐一详察，为尽速上报起见，负责该地区的各官兵，不分昼夜组织人员，迅速召集各地牛录耆老，问询辖内人文以及地理情形，兹将其具体调查过程节译如下：

（前略）不知朝鲜会宁城是否藏有文书，若有文书，今年到朝鲜贸易官员携来之后，日后送还。宁古塔城东北角四里之地，原先有觉罗（gioro）村落住地，村东界有一城。南三里之外，虎尔哈河（hūrha bira）沿岸有一城。宁古塔城之外，界内（jase dolo）南有一城。此等城皆废，只存壕迹，周围有五十、六十度，无城门形，无人居住。此等地方皆称觉罗。因何名之为觉罗，宁古塔因何称之为宁古塔，始祖皇帝龙兴之地如何称呼。等因。逐一详问耆老，皆答不知。自宁古塔城西北五十余里之外，海兰河（hairan bira）之南，有旧宁古塔石城。己卯年，大章京吴霸海（ubaha）巴图鲁督筑，周围一余里，东西门二。城外界门四，周围五余里，城内无人居住，周围屯耕居住。康熙五、六年，宁古塔迁至现驻之城。城以立松木高三度，建置木城，由将军巴海督筑，周围二余里。东南西门三，北无门，城中建有衙门，东库一，西仓一，衙门门外，东设炮四，城内东南角，置药（火药）房。西北置

① 《宁古塔档》1-1《康熙十五年乌拉吉林来文档》四月初一日云骑尉级章京布散（busan）送来文书。

> 有草场，城南界东北各二里，南北面各三里，门四。南面依呼尔哈河（hūrga bira）沿岸。城内副都统萨布素居之……宁古塔之地居民甚少，地理情势山多水少，寒冷（中略）近海处有蒙古（monggo）、尼堪文（nikan hergen 汉文）石碑，将其拓送前来。碑石在越过亨滚河（henggun bira）之海口。亨滚河罗刹居之，无兵不可至。宁古塔习俗：男女老少，种田为生，街无吵闹声，少诉讼盗窃，遵纪守法，人皆好骑射，性格朴实，无风流事，形制于古无别。清明不日后，方才耕种（后略）。[1]

原档案满文相当冗长，从节译部分也可以看出，当时的调查为编纂《大清一统志》宁古塔部分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了各种历史地理方面的信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越过亨滚河之海口见到的蒙古文、汉文石碑，疑为《敕修奴儿干永宁寺碑记》永乐十一年碑。康熙十五年（1676）此碑拓本送交一统志馆的迹象表明，康熙时期曾拓过该碑文。这比 1885 年曹廷杰访问此地带走的拓本还要早两个世纪。[2]

礼部发出编纂令后，具体由奉天将军派人到宁古塔等地收集历史地理资料。初步收集方法是首先寻访并召集当地各牛录耆老，问询记录具体的地理历史及古迹等情况，在此基础上将历史地理情况记录为文字资料，内容包括古迹遗址的构造、各衙门的设置状况、建筑构造、周围环境、村落位置、河流特征以及各城之间距离以及各部族集团生活方式等。这也是目前所能看到的首次调查宁古塔周边地理状况的满文文书。

---

① 《宁古塔档》1－9《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始行文乌拉等的抄档》十一月初六日正红旗多吉讷（dokine）牛录领催迪布吉斡（dibkio）送文。

② 最新的研究参见 A. P. Артемьев. *Буддийские храмы XV в. в низовьях Амура*。日译文参见菊池俊彦、中村和之监修《ヌルガン永宁寺遗迹と碑文—15 世纪の北东アジアとアイヌ民族》，垣内あと译。

其调查顺序依次为奉天府尹传达给副都统，副都统再传给协领，协领开始召集各地牛录耆老，问询调查地区的各种地理特征，展开具体的前期调查工作。最初，由协领拜布善咨文呈报奉天将军和副都统等后，发现有很多未能调查清楚的地方，次月再次下达了继续调查的命令。①

康熙二十二年（1683）正月，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密咨宁古塔将军及副都统等人，称康熙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有姓格依克勒之勒童额（letungge）报称：我去年秋季八月，至费雅喀地方交易，费雅喀噶善达（gašan da）噶克当阿（gakdangga）相告，有罗刹（loca）近60人，自北海越山而来，来到亨滚河猎貂费雅喀阿达萨尔村（adasal gašan），杀害苏勒忒库（sulteku）等3人，活捉一男子；又乘夜在吴克吞村（uktun gašan）杀害齐勒巴南之弟弟，塔克沁村（takcin gašan）一人。亨滚原先的噶善之5人全部被活捉，强令归附贡貂，放还4人，抓去一人。放还之4人，罗刹交付一文留下，罗刹带来奇勒尔人通事告知，明年我们大军顺黑龙江而来，各军溯流亨滚河，征讨费雅喀。若我等罗刹军前来，汝等迎降，提示我等文书，如此知道汝等为降民不与侵害。汝等将我等之言告知赫哲、费雅喀之人，务必贡纳貂皮，语毕而去。罗刹放还二人前来告知。②

萨布素亲自询问二人，其回答亦和噶克当阿相同。噶克当阿又告称：亨滚源流地区住人奇勒尔噶善达余希雅纳（yuhiyana），派布虎楚（buhucu）前来告称，罗刹前来尽捉子女而去，将此情形告知宁古塔副都统，等语。为此，萨布素预想康熙皇帝会问及地理情形，准备派遣牛录章京南岱前往调查。③ 这也说明了当地居民同

---

① 《宁古塔档》1-9《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始行文乌拉等的抄档》十二月十五日由驿站人常书（Cangšu）经驿站递送文书。

② 《宁古塔档》1-8，缺册名，康熙二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寄给牛录章京南岱（Nandai）文书。

③ 《宁古塔档》1-8，缺册名，康熙二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寄给牛录章京南岱（Nandai）文书。

宁古塔副都统之间的密切关系。

黑龙江地区设将军驻防，主要是为了防范俄罗斯侵犯黑龙江流域，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开始，议奏具体驻防事宜。《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载：

> 宁古塔将军巴海奏罗刹侵我费牙喀地方。兵部覆，爱浑、呼马尔两处，现议设兵驻防，应令将军巴海驻爱浑，副都统萨布苏驻呼马尔地方，仍遣人不时侦探。上曰：宁古塔地方距费牙喀三千余里，如何遣人不时侦探？用兵之道，全在为将者审势，相机酌量权变，未可遥度。该部并未详察情形，悬议将军、副都统驻扎地方，殊欠明晰！著将此本发回再议具奏。①

兵部首次提出设兵驻防爱浑和呼马尔等地，计划安排将军巴海驻扎爱浑，副都统萨布苏驻扎呼马尔，并不时遣人侦察俄罗斯情形。对兵部的这一议奏，康熙皇帝大为不满。原因是兵部并未详察具体情形，就轻易提出了设置将军驻守的方案。这也说明康熙皇帝对防卫该地区采取了周密谨慎的态度。②

与此同时，宁古塔副都统已经得知亨滚河源等地有俄罗斯人侵

---

① 《康熙起居注》第 2 册，第 961 页。

② 早期的中俄关系史研究，参见 Gaston Cahen，*Le livre de comptes de la caravane Russe a Pékin en 1727 – 1728*；Gaston Cahen，*Histoire de s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sous Pierre le Grand*（*1689 – 1730*）；英文参见 Gaston Cahen，*Some early Russo-Chinese relations*；日译文参见ガストン・カーエン著《露支交涉史序说》。中文论著参见何汉文《中俄外交史》；田鹏：《中俄邦交之研究》；韩儒林：《清初中俄交涉史札记》；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米镇波：《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姜长斌：《中俄国界东段的演变》。日文研究论著参见野见山温《露清外交の研究》；阿南惟敬：《露清对立の源流》、《清初军事史论考》；吉田金一：《近代露清关系史》、《ロシアと中国の东部国境をめぐる诸问题：ネルチンスク条约の研究》、《ロシアの东方进出とネルチンスク条约》。

犯当地居民，这些消息都是通过深受俄罗斯侵害的当地居民或者前往交易的商人口中探知其具体情况。同年五月，又接到更详细的情报，并得知俄罗斯大肆杀掠不纳貂皮之民特别是居住在亨滚河源等地居民的暴行之后，决意采取对策。

同年得知黑龙江以北地区的俄罗斯正在造船，积极准备顺亨滚河而下，溯流前来松花江、吉林等地居住的计划。故萨布素密咨宁古塔将军等人，提出若不歼灭俄罗斯，保护归附之赫哲、费雅喀、奇勒尔等人，恐日后愈加伤害各地居民，请求尽速调遣乌拉等地兵将前往征讨。[①]

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都统寄给牛录章京季道的文书中，已探明俄罗斯抵达亨滚河（henggun bira）流域，并杀害居住在亨滚河猎貂之费雅喀（fiyaka）阿达萨尔村（adasal gašan）之苏尔图库（sultuku）等人。[②]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左右，大清国方面积极努力探寻俄罗斯动静，仔细询问此次前来之俄罗斯是否从北海而来。[③] 在探寻俄罗斯消息的过程中，就涉及了黑龙江以北地区的自然地理方面的内容。此时档案中涉及的北海基本上指的是鄂霍次克海周边海域。

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始，在东北各地大举进行驿站建设，并开始丈量东北大地，设立自乌喇至爱浑一路驿站。[④] 驿站的设置，

---

① 《宁古塔档》1－8，缺册名，康熙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寄给镶白旗色蒙额（Semungge）牛录领催甘岱（Gandai）文书。

② 《宁古塔档》1－9《自康熙二十二年七月起行文乌拉等地抄档》八月十五日送给牛录章京季道（Jidao）文书。

③ 《宁古塔档》1－9《自康熙二十二年七月起行文乌拉等地抄档》八月十五日送给牛录章京季道（Jidao）文书。

④ 《康熙起居注》第2册，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第1137～1138页。"遣往设立乌喇至爱浑一路驿站之郎中保奇、能得、额尔赛等奏请谕旨。上谕曰：此乃创立驿站之始，关击紧要，尔等会同彼处将军、副都统询明熟识地方之人，详加确议安设。凡住驿人役及马匹生畜需用之物，并所食粮米，今年耕种不及，须要算至明年，加意料理。倘过于俭啬，食用或至匮乏。必须从长计议，使其久远可行，毋得狃于目前之见，草率了事。谕毕出。"

改变了信息的传递速度，也为迅速探听俄罗斯消息打下了基础。

康熙二十三年，大清国即派兵远征图乎鲁河周围地域，歼灭俄罗斯等占据领地，俘获甚多。据《八旗通志初集》卷 151 安珠瑚传记载：

> （康熙）二十三年，随都统公彭春（pungcon）往征罗刹（loca），黑龙江将军萨布素（sabsu）委为前锋章京，掠图乎鲁河（tuhūlu bira）有功。[①]

远征图乎鲁河的具体时间为康熙二十三年八月。以下文书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征战情况（全文参见文后附录之档案 1）。

> 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臣萨布素等谨题，为奏闻遣往亨滚之兵，降伏罗刹、奇勒尔事。营长杨古岱（yanggudai）、喀图虎（kathū）等派章京咨呈，五月十七日抵达亨滚河口，十八日溯亨滚河时，奇勒尔（kiler）之额木楚（emcu）、蒙努（mengnu）等告称：我等妻子为罗刹掠去，也许能逃出一两人，我等亲自在此守候。先前罗刹居住在亨滚（henggun）、都齐（duki）两河之洲。今春冰融时，乘坐独木舟，沿亨滚顺流而下，溯伊米勒（imile）河而上，自源流越过山岭，往流向东北海方向的图乎鲁河（tuhuru bira）方向行走。等语。六月初三日，抵达伊米勒河口，参领等一同商议，停止逆溯亨滚，溯流依米勒河行走六日，看得水流湍急，河床狭窄，船只不能运行。故询问奇勒尔之赫济讷（hejine）等，告称：自此至河源，皆依旧如此，船只不可运行。故交付正黄旗委署

① 《八旗通志初集》卷 151，安珠瑚传（满文，第 8b 页；汉文，第 3841 页）。

参领满舍吉（manšegi）、镶黄旗委署参领瓦喀纳（wakana）、镶红旗委署参领牛墨顺（niomošon）等官兵，一并乘坐我等独木舟、奇勒尔之桦皮船，溯流至河源察看。图乎鲁河之方向，探寻循陆路越过行走之地。有越过山岭之处，行抵图乎鲁河，查明有无罗刹，前来报告。当月初九日派遣。十日夜半，满舍吉等派人前来告称：罗刹在山岭附近之依米勒河驻守，地势密林丛生，是否筑城居住，未能看清。等语。我等亲率章京兵丁，携带神威将军（炮）四，十三日抵达满舍吉驻扎之地。翌日，前往包围罗刹居住之卡伦进行捕捉，交付镶红旗委署参领牛墨顺，正蓝旗委署参领博墨多（bomodo）等，正红旗委署闲散章京喀楚（kacu），镶白旗委署闲散章京马齐（maci），正黄旗委署骁骑校吉墨格里（gimgeri），正白旗委署骁骑校图木珠（tumju）兵丁六十人，编队遣往图乎鲁河方向埋伏于逾越之地。若罗刹败走经过时尽杀之。如若人数众多，分路突击追杀。等语。议定交付委署参领满舍吉、镶黄旗委署骁骑校哈喀喇、镶红旗委署领催博赫讷兵丁三十人，带领七品官斡福纳西（ofunasi）等人，率先越过罗刹卡伦，扎营河边，劝降罗刹。若罗刹不降，杀之。等语（中略）又，首次降伏原先未降之奇勒尔三十一户之九十九丁。罗刹见大军不动干戈就地降伏。深处山林，生如野兽之奇勒尔，闻知主上教化，众人倾心向化，此皆赖皇帝隆恩鸿福。罗刹抵达之后，送至轻车都尉玛喇处候旨。为此谨奏闻。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臣萨布素、副都统升一品大臣温岱、副都统臣雅秦纳。①

① 《黑龙江档》1－1《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起行文抄档》八月十八日镶红旗闲散章京牛墨顺（niomošon）带走文书。该文书率先由楠木贤道译成日文介绍，参见楠木贤道，1996，史料6。

此次远征营长杨古岱、喀忒虎等携带兵丁共618人。[①] 自亨滚河等地带来降伏俄罗斯47人，同年九月二十八日抵达镇守黑龙江等地副都统处，准备分批送俄罗斯人至京城。[②]

说到黑龙江流域的历史，不能不提及首任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萨布素的身世，日本学者增井宽也较早利用《陈学士文集》（乾隆十八年）卷10《萨布素传》，指出萨布素（富察氏）始祖为充舜，居住在瓦尔喀部约克通鄂城，该城位于图们江支流噶哈里河下游，为该部世袭大人（amban），曾祖哈木都及祖父哈尔苏时投靠努尔哈赤。[③] 可以说萨布素自祖上始，世代为约克通鄂城城主，他也是一位当地世族的后裔。[④] 有关萨布素传记，在后来的编纂汉籍史料中基本都略而不详。笔者在阅读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的过程中，读到有关萨布素的满文传记资料，具体册档名称为《雍正十一年行文档》。该档详细记载了萨布素的生平事迹，对我们理解黑龙江、吉林的历史沿革以及人文地理大有助益。因原文特别冗长，现节译如下（全文参见文后附录档案2）。

> 宁古塔副都统咨文将军衙门，为查送事。（中略）萨布素，宁古塔人，十八岁时，任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沙尔瑚达（šarhūda）衙门笔帖式（bithesi），在任笔帖式八年

---

① 《黑龙江档》1-1《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起行文抄档》八月二十五日骁骑校康苏（kangsu）持走文书。

② 《黑龙江档》1-1《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起行文抄档》九月十九日正蓝旗领催艾素持走文书。

③ 参见增井宽也《明末のワルカ部女直とその集团构造について》，第88~89页和《建州统一期のヌルハチ政权とボォイ＝ニヤルマ》，第6~7页。

④ 《清史稿》卷280，萨布素传。萨布素，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四世祖充顺巴本，以勇力闻，世为岳克通鄂城长。太祖时，其后人哈木都率所部来归，屯吉林，遂家焉。萨布素自领催授骁骑校，迁协领。康熙十六年，圣祖遣内大臣觉罗武默讷等瞻礼长白山，至吉林，欲得识路者导引。宁古塔将军巴海令萨布素率兵二百，携三月粮以从。水陆行，至长白山麓，成礼而还。事具武默讷传。除此之外，《碑传记》中也有比较详细的资料。

期间，宁古塔各地大小事务，章京等委任以及应派事务，尽心效力，大受赞赏。顺治十八年（1661），升任骁骑校（中略）。住西里木迪之俄罗斯，闻知大军进兵黑龙江，驻扎在额苏里，纷纷避走其国之乌第城（udi hoton）。萨布素闻知欲遣兵往追，但路途遥远，又无马匹，令居住西里木迪之鄂伦春族长（mukūn i da）吉尔木阿（girmungga）、里克丁阿（likdingga）等派人往俄罗斯行走之狭路处埋伏，俄罗斯行走之时，吉尔木阿、里克丁阿突然伏击全部射死。为此奏闻，大赏吉尔木阿、里克丁阿等人。同年将副都统萨布素任命镇守黑龙江将军。康熙二十三年，派章京往居住于精奇里江（jingkiri ula）之俄罗斯处，深入其地，尽悉降伏，俘获者送至京城。又派章京率兵往居住亨滚（henggun）之俄罗斯处，兵马未到之前，众皆逃窜至彼国乌第城（udi hoton）。

派章京率兵赴东海沿岸之居住图乎鲁河（tuguru bira》tuhuru bira）俄罗斯，亦深入其地尽悉降伏，捕送京城。原先未降伏之奇勒尔（kiler）百余户男丁，亦初次归降，约定贡貂。康熙二十四年攻取俄罗斯雅克萨城时，尽拿活捉俄罗斯两队哨兵，就地分水陆两地立营分攻，五月二十四日夜遣派火器营，二十五日乘夜将军萨布素亲率一队兵马，紧逼城西北角，放火箭急攻，及至巳时，降伏俄罗斯头目额里克谢耶（elikšei）等官兵六百余人。遵照谕旨，放回愿归彼国之人，自愿降伏之人，暂归头目伊凡（ifan）管理，续而降伏之头目巴实里（bašili）等四十余人，送至京城（后略）。①

① 《宁古塔档》2-9《雍正十一年行文档》八月十九日驿站丁陈子贵（cendzigui）经驿站送来之文。

此文书是雍正年间为编纂《大清一统志》而收集的文书的一部分，其中记载的内容多为其他汉籍资料所不记，不仅对黑龙江第一任将军萨布素的生平事迹多有专述，也详细记载了黑龙江以北地区诸部的主要活动，对深入了解黑龙江以北地区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康熙年间，俄罗斯人继续出没于黑龙江南北各地，康熙二十二年（1683）为防范俄罗斯设置了 sahaliyan ula i jergi babe tuwakiyara jiyanggiyūn（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由萨布素首任将军，成为名副其实的镇守黑龙江地区的军事基地。与此同时，俄罗斯同大清国之间出现了多次冲突，双方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原先由宁古塔将军辖理的俄罗斯事务，经黑龙江将军设置之后，开始由黑龙江将军负责管理黑龙江地区的俄罗斯事务，并协同兵部和理藩院处理具体案件。

黑龙江将军的设置，其主要原因除抵御俄罗斯的南下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不可忽视。那就是这一时期大清国想介入准噶尔和喀尔喀之间的纷争，充当调停者。后来，因严寒以及运粮不及、农田耕种季节有限等缘由，不得已把黑龙江将军从当初驻扎的黑龙江北岸的爱浑城，迁至江南的黑龙江城。康熙二十八年（1689）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康熙二十九年，黑龙江将军移驻墨尔根，其理由明记为："俄罗斯国（oros gurun）服主上德化，决定指定地方作为永远之疆界，将驻兵撤至墨尔根之地，筑室耕作。"①这说明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大清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为双方边界地区带来了和平与安定，两国关系进入新的进一步交流的阶段。

康熙三十八年（1699），大清国和噶尔丹之战结束后，将军衙

① 《黑龙江档》1－10《康熙二十九年吏、兵、刑部、督捕衙门、盛京刑部来文抄档》正月初四日由笔帖式定珠递来文书。

门从墨尔根移驻齐齐哈尔城。齐齐哈尔为蒙古、锡伯、索伦、达斡尔等部居住之战略要地，是前往兴安北部、呼伦等地的必经之路，也是直达尼布楚的重要捷径。所以，将军移驻齐齐哈尔考虑了兴安以北出现紧急情况时，迅速调兵遣将，随时可以前往应付的军事目的。

另外，齐齐哈尔周围地区有广大的牧场及农地，亦是驯养军马和屯垦的好地方，作为军事基地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①] 黑龙江将军衙门的移驻，其实是考虑了欧亚整体的政治格局和游牧民的动向而采取的措施。总而言之，黑龙江将军的移驻，不仅是针对俄罗斯，也是为应付势力日渐强大的准噶尔势力以及内外蒙古情势的变化而采取的行动。

在黑龙江将军衙门从爱浑移驻到墨尔根城的同时，也开始讨论如何视察黑龙江流域边境地区的问题。这样就展开了国境视察计划，这些计划由地方将军向朝廷提交了很详细的报告，其中理所当然也包括了沿着一定的路线视察国境地带的问题，随行人员中也就出现了画匠一词，从中可以知道绘制舆图也是当时的一个任务。

“视察”一词为满文 tuwaname genembi（直译为“去看”之意）的译文，在语意上不同于 baicame genembi（调查），且康熙二十九年档案记载基本都以 tuwaname genembi（视察）为主，故本文使用“视察”一词，以别于后来的 giyarime genembi（巡察）以及 baicame genembi（调查）等用语。

在康熙朝《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满文）中，对视察黑龙江流域国境地带的经过、报告书的提交以及舆图制作等过程有详细的记载。这些资料为我们研究这个时代的舆图史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例证。

① 《黑龙江档》2-6《康熙三十年正月吏部、刑部、督捕衙门、盛京兵、刑部行文抄档》正月十七日奏文及《宁古塔档》2-9《雍正十二年行文档》八月九日驿丁陈子贵经由驿站递送文书。

有关九路视察问题，1997 年，由松浦茂进行过研究。在此参照松浦茂的研究，并利用满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和《宁古塔副都统档案》的相关史料，考察这次黑龙江流域视察活动的具体实施情况，进而探讨当时绘制舆图的问题。

四　康熙二十九年九路视察队伍

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黑龙江地区迎来了安定和平。同年十二月，理藩院员外郎达赖（dalai）给康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引用了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给议政大臣咨文的内容，其中提及了准备在黑龙江北部地区进行多条路线视察，并言及视察边界的重要性等问题。这表明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大清国制定了对界定的边界进行全面视察的计划。对此次派出九路视察队的理由，松浦茂如此写道：

> （前略）北岸地区成为空白的可能性较大。为确认国境进行调查，对清朝来说成为优先的紧急课题。[①]

他明确提出调查计划开始的时间为康熙二十八年末，依据的是《黑龙江档》康熙二十九年正月初四日的档案，引用了其中的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奏文。原文书无年月日，康熙二十九年正月初四日是笔帖式定珠（dingju）递送文书的时间，其中包括其他文书多件。这一点松浦茂没有交代清楚。其内容如下：

> 兵部咨行黑龙江将军等。尔等（黑龙江将军等）咨

① 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第 6 页。

称：预备明年移驻将兵及家属至黑龙江（sahaliyan ula）和墨尔根（mergen）。若明年至额尔古纳（ergune）及格尔必齐（gerbici）之地立碑，到北兴安（amargi hinggan）视察（tuwanabure jergi baita）不生草的山梁之地等事，我等无暇派遣将兵移驻户口，为此知照兵部。等因。（兵部）查得：驻扎黑龙江、墨尔根将兵户口，来年秋季尽悉移内。且现议政大臣议奏，调查熟知自额尔古纳河口上溯到墨里勒肯（merilken），沿黑龙江对岸之格尔必齐河上溯到不长草的兴安山梁，直到海边之地之辈，应从几路（udu jurgan）前往视察之处，令索伦总管玛布岱（mabudai）、宁古塔将军佟宝（tungboo）等奏闻。等因。从几路前往视察，兵士如何随从等事，尚未议定。故将该将军等来文告知，兵将毫无闲暇一事，免议。将此回覆知会，为此咨行。该文无年月日。①

黑龙江将军对立碑事宜，回覆答称还没有充足的时间前往视察。为此兵部回覆了处理意见，即迁移位于黑龙江北岸的爱浑将军驻屯地到南岸的黑龙江城，并在墨尔根城留守一部分官兵。讨论移驻的同时，也提出了视察黑龙江以北地区的计划，该计划得到康熙皇帝的批准。

正如由上述档案所见，康熙二十八年已开始计划视察路线，并积极找寻熟知地理状况的人员。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的奏文中，详细论及该视察计划的路线和具体参加人员。理藩院员外郎达赖（dalai）于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奏文如下：

① 《黑龙江档》1－10《康熙二十九年吏、兵、刑部、督捕衙门、盛京刑部来文抄档》正月初四日由笔帖式定珠递来文书。该文书最后写有 ere bithe de，aniya biya inenggi akū（该文无年月日）。

理藩院员外郎臣达赖谨奏，为遵旨查奏事。议政王会议题奏，将军萨布素等奏称，查得：臣我等军中有人知道额尔古纳河（ergune bira）之墨里勒肯（merilken）之地，陆地行走之处。由此可派一路前往视察。自额尔古纳河口（ergune angga）上溯抵墨里勒肯之地，黑龙江北岸格尔必齐河（gerbici bira）上溯至不生草之地，沿兴安山梁（hinggan i mulu）直抵海边，无人知道。故自额尔古纳河口上溯到墨里勒肯为止，自北兴安（amargi hinggan）流出，汇流到黑龙江（sahaliyan ula）的精奇里河（jingkiri ula）、西里穆迪（silimdi）、牛满（nioman）等地源流附近，索伦总管玛布岱（mabudai）等管辖鄂伦春（oroncon）、索伦（solon）渔猎为生，查找熟悉人员，令玛布岱等题奏应通过几路（udu jurgan）前往视察等事。

黑龙江（sahaliyan）、松花江（sunggari ula）汇流处至海，自北兴安汇流至松花江的奇穆尼河（kimnin）、呼鲁（huru）、格林（gerin）、亨滚（henggun）等河源周边地区（sekiyereme），皆有宁古塔将军佟宝（tungboo）等统辖之奇勒尔（kiler），佟宝等查找熟悉人员，令佟宝题奏应通过几路（udu jurgan）前往视察事。

查得：视察立界之地（hešen ilibure ba）为要务。今总管玛布岱（mabudai）、将军佟宝等查找熟知地形之人具奏。如无熟知人员，往返费时，今即于此地派送官员二人，一人到将军萨布素、总管玛布岱处。一人到将军佟宝处。会集熟知地理人员详细查考，通过几路前往视察，或应编队前往视察等事宜，详细议论题奏之后，令该部为应派遣人员，题奏请旨。现应派人员，自该部引见题奏派遣。等因。于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题奏，当月十三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

会同大臣查找熟知黑龙江、北兴安等地人员。从墨尔根到额尔古纳之墨里勒肯为止，由正蓝旗达斡尔鄂鲁波沁牛录（elpecen niru）骁骑校席纳达依（sinadai）、正红旗达斡尔毕尔充额（bilcungge）牛录披甲阿西乌尔（asiul）熟知陆路。行走需二十多日。为此可于秋八月，可为一路前往视察。

熟知额尔古纳河口到墨里勒肯路之索伦特布忒牛录（teputei niru）的鄂尔呼特（erhute）言称：额尔古纳河口到墨里勒肯为止，乘独木舟（weihu），水路上溯需行走近二十日，此可为一路，自水路前往视察。

熟知精奇里河源方向之鄂伦春额勒必沁（erebkin）、绰坡尼（coponi）等言称：自墨尔根到精奇里河源，秋八月左右骑马行走需月余。自此至兴安山梁，一日即可抵达，有马可食牧场，自此为一路，可骑马前往视察。

熟知精奇里河源方向之鄂伦春苏蒙库（sumungku）、勒尔格儿（lerger）、哲京（jegin）等言称：自黑龙江城至西里穆迪源流之英肯河口（yengken birai angga）为止，秋八月骑马需一月左右。英肯河口之外，皆石多无牧草，不可骑马行走。若步行走四五日可抵兴安山梁。此可为一路前往视察。

格尔必齐河口（gerbici birai angga）到源流为止，去年在此地降伏之索伦奇斡喇（kiora），佟古尼（tungguni）言称：可骑马行走。自格尔必齐河口至源流，需十日左右，无马匹可食之牧草。自此之外，皆布满山崖乱石。

熟知牛满河源方向的索伦额尔德依牛录（ekidei niru）之玛兰丘（marancu）言称：自黑龙江城乘独木舟，抵牛满河源之渥伦奇河口（olongki birai angga），需行走一月有余。自此之外，皆为山崖乱石，步行骑马均不可通行。

> 为此谨奏。理藩院员外郎臣达赖（dalai）、镇守黑龙江将军臣萨布素（sabsu）、索伦总管玛布岱（mabudai）、总管臣贝勒里（beiler）。[①]

理藩院员外郎达赖和黑龙江将军、索伦总管玛布岱、总管贝勒里会议之后具奏文书，显然这件文书最初由黑龙江将军咨行中央，由议政大臣议复，奏报皇帝，经皇帝批准，传谕兵部，再由兵部咨行传令给黑龙江将军。同时，理藩院亦派员外郎达赖同黑龙江将军、索伦总管等协助会议上奏。

就如何进行视察、派几路人马前往等事宜，委任索伦总管玛布岱和宁古塔将军佟宝讨论决定。为了节省时间，由理藩院派主事萨鲁图到宁古塔将军处，另外派员外郎达赖直接同黑龙江将军协力进行选拔视察人员的调查工作，提出通过如下九路前往视察的计划。[②]

首先，由宁古塔将军和主事萨鲁图题奏以下路线。视察兴安的路线，因无人知道陆路，决定由水路派往。经调查得知格林、亨滚等河流皆源出兴安，可以在冰雪融化之后，派船只和独木舟赴（1）格林、（2）亨滚、（3）沿着海岸等三路前往视察。即提出了经三条水路前往调查的计划。[③]

其次，陆路可以由（4）墨尔根城到额尔古纳河的墨里勒肯，秋八月，一路前往视察；（5）墨尔根到精奇里河源流为止，秋八月，骑马前往视察；（6）从黑龙江城到西里穆迪河源的英肯河口为止，秋八月左右，骑马需一个月，英肯河之外，需四五日可徒

---

① 《黑龙江档》2-4《康熙二十九年正月户、礼、工部、理藩院、盛京户、工部等衙门行文抄档》正月二十八日咨行理藩院达赖（dalai）之文书。

② 松浦茂（1997），首次利用《黑龙江档》介绍了九路人员构成和视察经过。

③ 《黑龙江档》1-10《康熙二十九年吏、兵、刑部、督捕衙门、盛京刑部来文抄档》三月初五日由正黄旗领催松图（sungtu）递来文书。

步行抵兴安山梁；（7）格尔必齐河口到源流为止，秋八月左右，骑马可用十日左右抵达。此外皆为山崖岩石，徒步以及骑马皆不能穿行。除此之外，（8）从额尔古纳河口到墨里勒肯为止，可由水路视察；（9）从黑龙江乘独木舟，到牛满河源的渥伦吉河口，需一个月左右。此外都是山崖岩石，徒步骑马都不能通行。[①] 以上就是水陆总共兵分九路进行视察的具体路线。

提出九路视察的路线之后，黑龙江将军和宁古塔将军调查选拔熟知该地地理情况的当地人员，并提出可兵分九路前往视察，为此奏请皇帝任命派遣相关各路线参加人员。议政王于康熙二十九年二月十四日上奏，当月十七日传旨“依议。应派人员列名上奏”，得到皇帝的同意。[②]

五　视察队伍编队情况

据兵部咨行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文书来看，康熙二十九年二月十七日上奏九路视察队伍成员名单，同月二十二日决定了参加人员。即宁古塔三路由巴海、巴鲁塔、苏赫三人，墨尔根三路由郎谈、沙纳海、赵三、安珠瑚四人，黑龙江三路由穆图、诺敏、华善、纳秦四人，各自统领视察队。[③] 据同年三月十四日镶黄旗奇勒德牛录领催吴岱送来的兵部咨行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文书记载，参加视察队伍的所有成员全部由康熙皇帝亲自选拔。

① 该文书于三月十四日由镶黄旗奇勒德牛录领催吴达依递来。原文书日期为 ilan biyai ice（三月初一日）。

② 《黑龙江档》1-10《康熙二十九年吏、兵、刑部、督捕衙门、盛京刑部来文抄档》三月十四日由镶黄旗领催奇勒德牛录（kilede niru）领催吴岱（udai）递送文书。

③ 《黑龙江档》1-10《康熙二十九年吏、兵、刑部、督捕衙门、盛京刑部来文抄档》三月二十六日由镶白旗领催康吉纳（kanggina）递送文书。

同时，各队均配备画匠一名，显然这是专为绘制舆图派去的人员。另外，各队配备俄罗斯人（罗刹人，locai niyalma），即先前降服编入牛录的俄罗斯人一名，作为熟知黑龙江以北地理情形的向导（gajarci）加入视察队伍。

这样就拉开了国境地区实地调查的序幕。首先，宁古塔将军巴海率领的视察队伍，于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中旬出发，所有装备皆自办，抵达黑龙江城和墨尔根后，调配换乘当地马匹前往目的地。同时，上奏陈请理藩院派人参加，该要求也迅速得到康熙皇帝的许可。①

此后，宁古塔将军巴海同兵部商议，决定水陆并进。各视察队由章京 3 人，兵 50 人，水路由水手 50 人组成。宁古塔三路，由乌喇和宁古塔地方官兵、水手承担任务。墨尔根方面三路由索伦、达斡尔官兵组成。

在视察活动开始之前，首先了解地理状况，进行周到的事前准备。通过俄罗斯牛录的人员，问询九路地理状况，查明宁古塔和吉林方面的两条路线及墨尔根三路、黑龙江城至牛满河水源的渥罗奇河口为止的路线，没有人知道详情。

其后，水路方面也进行了查访，其中康熙二十九年三月的一份报告内领催席图班（situban）等言称：

（前略）亨滚河河口乘独木舟溯流而行二十日，抵达伊米勒河。自伊米勒河溯流而行五日，陆路续行四日，抵达图赫里河。自图赫里河（tuheri bira，即 tuhuru bira）通过陆路行走二十五日抵达乌第河。此二十五日期间，不长草木，尽布苔藓。亨滚、乌第之处，住有奇勒尔、鄂伦春

① 《黑龙江档》1－10《康熙二十九年吏、兵、刑部、督捕衙门、盛京刑部来文抄档》三月十四日由镶黄旗领催奇勒德牛录领催吴岱递送文书。

等人。图赫里河和乌第河之间，不长草，有攀山越岭可行之处。不知何地称之为兴安。①

另外，从雅克萨到西里木迪河之间的路线，据披甲拉萨里（lasari）前来报告如下：

自雅克萨乘船月余，曾抵达西里木迪河。其他情况不清。②

与此不同的另外一条路线，查明有人去过格尔必齐河口到水源之地。据领催斡里塔西（oltasi）报告如下：

格尔必齐河口到水源为止，步行需十一日即可抵达。自此之外，因遇冬雪季节，山崖乱石处，脚踏滑雪板（suntaha），七日抵达兔乎鲁河（tuhuru bira）。不知称为兴安之地。③

以上九路视察留下了大量的视察报告，其中也包括很多舆图资料。一般所谓的《九路图》或《九大人图》等名称的舆图，实际上都和康熙二十九年视察边界活动有关。也有个别舆图是按照当时的档案资料和舆图资料，在康熙末年重新绘制而成。流传至今的康熙年间绘制的有关黑龙江周边流域的舆图，明显都受这些舆图影响，或者摹绘这些舆图，重新贴写后来反复调查后得知的新的河川地名。

---

① 《黑龙江档》1－10《康熙二十九年吏、兵、刑部、督捕衙门、盛京刑部来文抄档》三月十四日由镶黄旗领催奇勒德牛录领催吴岱递送文书。

② 《黑龙江档》1－10《康熙二十九年吏、兵、刑部、督捕衙门、盛京刑部来文抄档》三月十四日由镶黄旗领催奇勒德牛录领催吴岱递送文书。

③ 《黑龙江档》1－10《康熙二十九年吏、兵、刑部、督捕衙门、盛京刑部来文抄档》三月十四日由镶黄旗领催奇勒德牛录领催吴岱递送文书。

所以，此次九路视察活动意义非常深远。

九路视察绘制的舆图，实际上和本文所要探讨的《乌喇等处地方图》有直接的关系。这里仅就《乌喇等处地方图》谈谈其具体流传过程。

六 《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的出现

1997 年，松浦茂首次利用满文档案研究九路视察的历史，他在文中指出“巴海绘制的地图至今不知所在”。[①] 究竟如何？我们现在看一下康熙二十九年宁古塔将军巴海视察之后提交的跟舆图有关的问题。目前，跟巴海视察直接有关的原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以《乌喇等处地方图》（编号 021453）题名登记收藏。另一幅复制图现在以《黑龙江图》（满文，乾隆绘本，彩色，未注比例尺，1 幅，图纵 135 厘米，横 112 厘米）为名，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②]

《乌喇等处地方图》描绘的区域是黑龙江下游北部的亨滚河和流入鄂霍次克海（Oxotckoe mope）的兔乎鲁河（tuhuru bira）流域，也是今天能够看到的有关该地区的一幅详细的区域图。此图标有满文四至［东、西、南、北，满文 dergi（东）脱落］，共绘有 21 条河流，两处山脉［乌叶肯山（uyeken alin）和庙湾山（miyoo wan alin）］，八处山峰绘有白雪状。全图用满文注记，无年代和绘制人名称等（详见《乌喇等处地方图地名对照表》）。其绘制方法与相关的满文舆图相比，绘法独特，耐人寻味。此图在不同角度观览，图形及树木山脉皆成正面，为其他舆图所不见（附录图 4）。

---

① 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第 26 页。

② 黄润华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第 364 页。

巴海等人在康熙二十九年视察之后如何绘制舆图，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还不能找到其具体的题奏文书，亦未能查到绘制舆图的具体情形等相关报告。当时视察之后绘制的舆图，到康熙四十九年左右，集中出现在满文档案中。出现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内阁一统志馆为编纂各地地志，传令各地将军协助调查。也就是说，在调查黑龙江以及宁古塔等处地理人文状况时，自内阁一统志馆及兵部寄来的文书中，出现用既往绘制的舆图重新订正并绘制舆图的资料。这样就出现了《巴海绘制带来图》《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同图异名的不同记载。

康熙四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在齐兰宝（cilamboo）咨文中，抄有自内阁一统志编纂馆咨行兵部司武厅的一份文书，其中主要涉及调查黑龙江地区山川、河流等情形，对考察黑龙江流域山川河流等地理问题非常重要，节译如下（全文参见附录档案3）：

> 内阁一统志书编纂馆咨行兵部司武厅，为前往视察事。黑龙江将军咨称：齐齐哈尔东方至海五千五百里处与海相接。看图（nirugan）内齐齐哈尔东方并无与海相接。东方疆界是否与海相连，详查送来。东南角至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处两千三百里，与宁古塔将军辖境相接。看图内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处，位于齐齐哈尔城东北。两江交汇处，是否可以齐齐哈尔城之东南为界，查清送来。东北角至入海之兔乎鲁河，有五千五百里，同俄罗斯接境。送来之档册中，称兔乎鲁河周围山河等诸项为宁古塔辖区，何故又以齐齐哈尔东北为界。以齐齐哈尔东北角等地为界，是否正确，查清送来。又，看送来的图内宁古塔、吉林乌喇、俄罗斯、蒙古等地山河等合并绘图送来。将此咨行黑龙江将军，命黑龙江将军绘来辖内之地，其他不必绘制（后略）。

又，看《大图》(amba nirugan)、《巴海绘制带来图》(bahai nirufi gajiha nirugan) 内齐齐哈尔城东北，亨滚河西有图吉河 (tugi bira)，此河自西东流，汇入亨滚河。亨滚河东源称之为赫门河 (hemen bira)，此河自西北流向东南，称为亨滚河。亨滚河之北有格尔必河 (gerbi bira)，此河自西南流向东北，汇入伊米勒河 (imile bira)。伊米勒河之东北有额墨尔河 (emel bira)，此河自东北流向西南，汇入伊米勒河。伊米勒河之东北有西穆尔河 (si mur bira)，此河自东北流向西南，汇入伊米勒河。亨滚河之南方有衣母河 (imu bira)，此河自西南流向东北，汇入亨滚河。亨滚河之北有鲁库河 (luku bira)，此河自北向南流，汇入亨滚河。亨滚河之北有萨穆尼河 (samnin bira)，此河自北南流，汇入亨滚河。窝而即河 (wergi bira weigi bira) 和阿萨里河 (asarni bira) 之间有钮瓦克塔河 (niowakta bira)，此河自西北流向东南，汇入兔乎鲁河。塔林河 (talin bira) 和磨尼可河 (munike bira) 之间有庙湾山 (miyoo wan alin)，穆尼克河之北有乜米勒恩河 (miyemilen bira)，此河自北南流，汇入穆尼克河。穆尼克河之东，有厄儿何恳河 (elgeken bira)，此河自北南流，汇入兔乎鲁河。以上山河若为黑龙江所属，绘入黑龙江图和档册之中，并查明送来在城之何方几里之外，源流出自何处，汇入什么河流。再，将《黑龙江将军绘制送来图》，《原任都统巴海绘制送来图》亦一并送来。等语。我等大臣等告知，依议。等因。为此告知汝等大臣，迅速送至黑龙江将军处，详细查明绘写记档送来。为此咨行。图两幅，七月三十日。收掌官[①] (bargiyara asarara hafan)

① 收掌官，位于次提调官，掌收储出版书籍以及文书、册籍等。

纳秦（nacin）、刘宝柱（liobooju）、敦柱（donju）。将军宗室杨福、副都统宗室勒色里（leseri）阅毕上述三项，交付委事协领德奇（deki），乌尔都（uldu），防御安奇（anci），骁骑校古勒特依（guretei）等。笔帖式王石达（wang ši da）记①。

由上可见，在利用档册和舆图查考黑龙江地理形势时，发现不少档册和舆图记载多有不同，也有很多山川河流名称没有记入其中，为此令黑龙江将军尽速查明重新绘制舆图记入档册内。该文书引用的《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描述的内容和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乌喇等处地方图》内容上完全一致。上引资料的画线文字部分，无论河流走向还是山脉名称，同《乌喇等处地方图》的内容也完全一致。所以，可以说，《乌喇等处地方图》即为康熙四十九年满文档案中出现的《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另外，档案中提及的《黑龙江将军绘制带来图》，其实目前也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题名为《黑龙江流域图》。

除此之外，还有一份能够直接证明《乌喇等处地方图》就是《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的文书。康熙四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骁骑校卓尔库（jorkū）递送的文书，节译如下（括弧内数字与《〈乌喇等处地方图〉与〈黑龙江图〉地名对照表》相对应，以示参照）：

（前略）又，看《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gūsai ejen bihe bahai nirufi gajiha nirugan）》，亨滚河（21）之北，

① 《黑龙江档》16－21《自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吏、兵、理藩院、盛京兵部行文抄档》康熙四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由齐兰宝递送文书。满文地名相应汉字采用《皇舆全览图》（汉文木版）内对应汉字。该文书部分日译文参见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第23～24页。

有格尔必河（18）。此河西南流向东北汇入伊米勒河（17）。伊米勒河之东北有阿玛尔河（19）。此河东北流向西南汇入伊米勒河。伊米勒河东北有西穆尔河（20）。此河东北流向西南汇入伊米勒河。亨滚河之南有伊穆河（24）。此河西南流向东北汇入亨滚河。亨滚河之北有鲁库河（22）。此河自北流向南汇入亨滚河。亨滚河之北有萨穆尼河（25）。此河自北南流，汇入亨滚河。空而即河（13）、阿萨里河之间（11），有钮瓦克塔河（12）。此河自西北流向东南，汇入兔乎鲁河（16）。阿萨里河和穆尼克河（8）之间，有塔林河（10）。此河自西北流向东南，汇入兔乎鲁河。塔林河和穆尼克河之间，有庙湾山（9）。穆尼克河之北，有乜米勒河（5）。此河自北南流汇入穆尼克河。穆尼克河之东，有额尔格肯河（7）。此河自北南流汇入兔乎鲁河。查清送来此等山河位于宁古塔何方，在几里之先。若为河流自何处流出，汇入何方河流等。以上山峰、河湖、岛屿、猎场、渡口、山梁之类，皆绘入舆图缮写档案送来。又，先前送来档案内，至东北费牙喀三千余里，同海相连界。现自兔乎鲁河之内之山河等类，皆称为宁古塔辖区。东北接境以兔乎鲁河为界是否正确，查定送来。原先调查山河等项之际，为便于参照送来《宁古塔图》、《原任内大臣郎谈绘制带来九路图》、《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均一并送来，行文告知大臣等。将此告知尔等大臣等，尽速行文宁古塔将军，缮写查清档案，绘制舆图送来。①

① 《黑龙江档》16－25《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奉天、宁古塔将军、伯都讷副都统、土谢图亲王、扎萨克图郡王、扎赉特、杜尔伯特贝子等行文抄档》十月二十一日骁骑校卓尔库递送文书。

康熙四十九年档案中的《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从记载的内容和河流走向的描述来看，其实就是本文论述的《乌喇等处地方图》的原图。这篇满文抄档原文相当冗长，详细记载了调查各地地理状况的过程和结果。征引内容的画线部分，和前引档案完全相同。毋庸置疑，当时阅览的都是同一张舆图。通过上引资料，也可以得知康熙四十九年左右，利用多幅满文舆图重新调查并利用旧图绘制宁古塔各地舆图的具体情况。其中一幅满文舆图，就是《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即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乌喇等处地方图》。

七 《乌喇等处地方图》山川名称

以下，按《〈乌喇等处地方图〉地名对照表》顺序，分别利用档案资料和编纂资料考订《乌喇等处地方图》山川名称等问题。具体引用资料名称，按年代顺序，兹列于下。

档案资料

(1)《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四十九年（1710），以下简称《黑龙江档》
(2)《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以下简称《宁古塔档》
(3)《雍正十二年行文档》
(4)《鄂多理城宁古塔城地域档》，登录号：167538，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该档册为《大清一统志》鄂多理、宁古塔部分满文稿本

舆图资料

(1)《口外九大人图》，平图021577，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2)《吉林九河图》，康熙五十年（1711）绘制，平图021457，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3) 汉文地名参照《皇舆全览图》，共35图，汉文木版，略称汉文《皇舆图》；满文地名参照《满汉合璧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共41图，满文铜版，略称满文《皇舆图》

(4) Carte general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dressée sur les cartes particulières faites sur les lieux par les RRPP Jesuites et sur les Memoires particulières du P. Gerbillion par le Sr. d'Anville, 1732，略称 d'Anville（1732）①

(5)《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乾隆四十三年（1778），略称《战迹图》②

(6)《黑龙江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十三日

编纂资料

(1)《盛京通志》，32卷，伊把汉、董秉忠等辑，孙成等纂，康熙二十三年（1684），略称《盛京通志 A》，《钦定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三年版，略称《盛京通志 B》

(2)《大清一统志》，乾隆九年，略称《一统志 A》及《钦定大清一统志》，乾隆二十九年（1764），四库全书所收，略称《一统志 B》

(3)《水道提纲》，齐召南编录，共28卷，乾隆四十一年（1776）

(4)《吉林通志》，共122卷，光绪十七年（1891）

上述资料不见之汉字地名，由笔者拟定，不一一注明。需要说

---

① 该图原版由应地利明教授（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提供阅览，谨致谢意。

② 该图原版由笔者指导教授砺波护教授（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提供阅览，特此致谢。

明的是，本文所附图 5《乌喇等处地方图》中，数字 1、14、15、27 为舆图方位词，与《黑龙江图》完全相同，唯《黑龙江图》“julergi”（南）脱落。以下方位词不在考订之内。

具体山川名称如下。

1. 拖伦河（toron bira）

《口外九大人图》作 toron bira，《黑龙江图》满文亦作 toron bira。

据康熙四十九年《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记载，《原任内大臣郎谈等绘制带来图》内黑龙江边界（jecen）附近，东北有奇勒非河（kilfi bira）、拖伦河（toron bira），东南有毕瞻河（bijan bira）。[①]

按：《原任内大臣郎谈等绘制带来图》为康熙二十九年绘制，说明早在康熙二十九年就已查过该河位置。

2. 奇勒非河（kilfi bira）

《口外九大人图》作 kilfi bira，《黑龙江图》满文亦作 kilfi bira。

3. 乌叶肯山（uyeken alin）

《口外九大人图》作 uyeken alin，《黑龙江图》满文亦作 uyeken alin。

据康熙四十九年《黑龙江档》记载，《原任内大臣郎谈绘制带来图》黑龙江将军辖区内，墨尔根城东方有喀穆尼峰（kamni hada）、苏喇西峰（sulasi hada），东北有扬山（yang alin）、岳温山（iowen alin）、都色山（deose alin）、乌叶肯山（uyeken alin）、青吉德山（cinggide alin）、鲁玛喀尔峰（lumakar hada）、亨滚河（henggun bira）[②]。

① 《黑龙江档》16 - 21《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吏部、兵部、理藩院、盛京兵部来文抄档》正月初四日由卜魁驿丁齐兰宝递送文书。

② 《黑龙江档》16 - 24《康熙四十九年正月黑龙江副都统、墨尔根城协领、索伦总管、驿站官行文抄档》一月初七日由领催阿尔图哈（altuha）递送文书。

关于乌叶肯山，松浦茂推定为《柳边纪略》卷1记载的“威伊克阿林”,① 否定了吉田金一和刘远图推定的地望。但是，本文探讨的《乌喇等处地方图》中不见绘有任何碑文形制，另外，松浦茂的这一推定也和当年派兵多路寻找石碑材料，并于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十九日报送未能找到适于制作石碑的报告互相矛盾。而《柳边纪略》中巴海等人兵分三路前往视察的记录，注有“时方六月”，显然和七月没有找到石材的报告互有抵触。当年记录的满文抄档作为第一手资料，比《柳边纪略》等后来的汉文资料更详细可靠。且界碑出现在舆图上的历史，并非是在康熙二十九年，而是康熙四十九年以后才开始出现在满文档案中，所以，《乌喇等处地方图》的出现，也是证明当年没有立碑的一个重要史实。② 多年来，争论不休的界碑问题，通过该图的出现，亦可更正前人的误解。

4. 乜米勒河（miyemile bira）

《吉林九河图》黄签作 miyemile bira，《黑龙江图》满文亦作 miyemile bira。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记载：汇入松花江之霍伦河（holon bira）、巴兰河（baran bira）、萨林河（sarin bira）等河流，在将军衙门二十二年调查志书（jy šu bithe）时，清楚地记录于档案之中。霍伦河、萨林河、巴兰河之间，有查喀喇库峰（cakarakū hada）、

---

① 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第24～25页。

② 《柳边纪略》卷1载：“威伊克阿林，极东北大山也。上无树木，惟生青苔，厚常三四尺。康熙庚午，与阿罗斯国分界，天子命镶蓝旗固山额真巴海等，分三道往视，一从亨乌喇入，一从格林必拉入，一从北海绕入，所见皆同〔时方六月，大东海尚冻〕。遂立碑于山上，碑刻满洲、阿罗斯、喀尔喀文。”有关分界碑，参见吉田金一《郎谈の吉林九河图とネルチンスク条约》，第62～63页；刘远图：《〈柳边纪略〉所记威伊克阿林界碑补证》，第132～135页；吉田金一：《ロシアと中国の东部国境をめぐる问题—ネルチンスク条约の研究—》，第102～104页。

华札哈塔尔哈（hūwajaha talha）。故将霍伦河、巴兰河、萨林河、查喀喇库峰、华札哈塔尔哈，绘入黑龙江之图有误。兔乎鲁河（tuhuru bira）、格尔必河（gerbi bira）、阿玛尔河（amal bira）、西穆尔河（si mur bira）、衣母河（imu bira）、鲁库河（luku bira）、萨穆尼河（samnin bira）、钮瓦克坦河（niowaktan bira）、阿萨里尼河（asarni bira）、磨尼可河（munike bira）、塔林河（talin bira）、庙湾山（miyoo wan alin）、乜米勒河（miyemile bira）、厄儿何恳河（elgeken bira）、毕瞻河（bijan bira）、多索米河（dosomi bira）、郭因鄂模（g'o in omo）、由瓦勒河（iowale bira）、他可亭河（taktin bira）、卓乞河（joki bira）、由温山（iowen alin）、乌车尔鸡河（ucergi bira）、无勒河（ule bira）、鲁马喀拉哈达（lumakar hada）、青吉特山（cinggite alin）、乞启琴河（cicakin bira）、窝而即河（wergi bira）、鄂尔奇勒山（elkire alin）、都奇河（duki bira）、斗色山（deose alin）、扬山（yang alin），位于我等（黑龙江将军）所属境外，属于将军属地之毕瞻河（bijan bira）、奇穆尼河（kimnin bira）、哈鲁河（huru bira）、吉林河（girin bira）、伊米勒河（imile bira）、亨滚河（henggun bira）之源流位于赫门河（hemen bira）汇入之哈打五而河（hada ul bira）东方，故未绘入我等图内。为此将军宗室杨福（yangfu）、副都统宗室勒色里（leseri）咨文。①

以上文书，明确说明了这些河流不属黑龙江将军辖区，属于境外，即属宁古塔将军辖区。所以，将 miyamile bira（乜米勒河）绘入宁古塔将军辖区的《乌喇等处地方图》内。汉文相关记载如下。

《一统志 B》卷 45，吉林载：额密勒河，在城东北三千八百七十八里，源亦出穆岱山。

又，《盛京通志 B》卷 27，山川，吉林各属：密密勒河，城东

---

① 《黑龙江档》16－25《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奉天、宁古塔将军、伯都讷副都统、土谢图亲王、扎萨克图郡王、扎赍特、杜尔伯特贝子等行文抄档》十月二十一日骁骑校卓尔库递送文书。

北三千八百七十八里，源出穆岱山。

按：两书记载用字略有区别，其余皆同。

5. 乞启琴河（cicakin bira）

《口外九大人图》作 cicakin bira，《黑龙江图》满文亦作 cicakin bira，《皇舆图》作乞启琴河。按满文可记为乞查琴河。d'Anville（1732）作 Tchitcha kim R。

此河属于宁古塔将军辖区。在《原任内大臣郎谈绘制带来图》内，乞启琴河位置略偏东北。①

康熙四十九年，黑龙江将军咨文宁古塔将军衙门称：兵部转来内阁一统志馆咨称，黑龙江将军送来之《九路图》（uyun jugūn i nirugan）中，鄂谟吞湖（omoton omo）、雅图河（yatu bira）、札里河（jari bira）、洪果河（honggo bira）、哈鲁河（halu bira）、札库达穆图河（jakdamtu bira）、吴穆鲁河（umulu bira）、哈穆齐河（hamci bira）、霍河（ho bira）、图鲁河（turu bira）、阿西克塔河（asikta bira）、毕瞻河（bijan bira）、奇穆尼河（kimnin bira）、瑚鲁河（huru bira）、吉林河（girin bira）……青吉特山（cinggite alin）、兔乎鲁河（tuhuru bira）、乞启琴河（cicakin bira）、磨尼可河（munike bira）、asarai 河、乫而即河（wergi bira）、伊米乐河（imile bira）、额尔奇勒山（elkire alin）、斗色山（deose alin）、扬山（yang alin）、哈打五而河（hada ul bira），此等山河皆为宁古塔将军统辖之奇勒尔（kileri）、赫真（hejen）、费雅喀（fiyaka）、格依克勒（geikele）、瑚什哈喇（husikar）姓之新满洲（ice manju）、瓜尔察（guwalca）等居住捕貂之处。②

① 《黑龙江档》16－21《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吏、兵部、理藩院、盛京兵部来文抄档》正月初四日由卜魁丁齐兰宝递送文书。

② 《黑龙江档》16－25《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奉天、宁古塔将军、伯都讷副都统、土谢图亲王、扎萨克图郡王、扎赉特、杜尔伯特贝子等行文抄档》九月二十二日笔帖式散珠递送文书。

6. 厄儿何恳河（elgeken bira）

《吉林九河图》黄签作 elgeken bira，《黑龙江图》满文亦作 elgeken bira，《皇舆图》作厄儿何恳河，《一统志 A》作二格恳河，《战迹图》作额勒赫恳河。

康熙四十九年《黑龙江档》载：《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内磨尼克河之东，有厄儿何恳河，此河自北向南，流入兔乎鲁河。[①]

《一统志 B》卷 45，吉林载：额勒赫肯河，在城东北三千九百四里，源出催马山，俱东流入图呼尔河。

《盛京通志 B》卷 27，山川，吉林各属：额勒赫肯河，国语，额勒赫肯，从容也。城东北三千九百四里，源出催马山，东流入图呼尔河。

按：《盛京通志 B》补国语释义，其余皆与《一统志 B》同。

7. 磨尼可河（munike bira）

《口外九大人图》作 munike bira，《吉林九河图》作 munike bira，《黑龙江图》满文亦作 munike bira，《皇舆图》作磨尼可河，d'Anville（1732）作 Monike R。

康熙四十九年《黑龙江档》载：《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内磨尼克河之北，有乜米勒河，此河自北向南，流入磨尼克河。[②]

《一统志 B》卷 45，吉林载：穆尼克河，在城东北三千八百四十八里，源出穆岱山。

《盛京通志 B》卷 27，山川，吉林各属记载与《一统志 B》同。

---

① 《黑龙江档》16 - 25《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奉天、宁古塔将军、伯都讷副都统、土谢图亲王、扎萨克图郡王、扎赉特、杜尔伯特贝子等行文抄档》九月二十二日笔帖式散珠递送文书。

② 《黑龙江档》16 - 25《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奉天、宁古塔将军、伯都讷副都统、土谢图亲王、扎萨克图郡王、扎赉特、杜尔伯特贝子等行文抄档》九月二十二日笔帖式散珠递送文书。

8. 庙湾山（miyoo wan alin）

《吉林九河图》黄签作 miyoo wan alin，《黑龙江图》满文亦作 miyoo wan alin。

康熙四十九年《黑龙江档》载：《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内塔林河和穆尼克河之间，有庙湾山。①

庙湾山为塔林河源流，具体见以下资料。

《一统志 A》卷 35，宁古塔载：又塔林河，在城东北三千七百八十五里，源出庙湾山。

《一统志 B》卷 45，吉林载：塔林河，在城东北三千七百八十五百里，源出庙湾山。又《吉林通志》卷 19，舆地志，三姓城载：庙湾山，三姓界，在宁古塔城东北三千八百三十七里。混同江口之北，即庙儿山也。

9. 塔林河（talin bira）

《吉林九河图》黄签作 talin bira，《黑龙江图》满文亦作 talin bira，《一统志 A》作塔林河，《一统志 B》作塔林河。

康熙四十九年《黑龙江档》载：《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内阿萨里尼河、穆尼克河之间，有塔林河。此河自西北向东南，流入兔乎鲁河。②

另见上述 9《一统志 A、B》记载。

《盛京通志 B》卷 27，山川，吉林各属记载与《一统志 B》同。

10. 阿萨里尼河（asarni bira）

《口外九大人图》作 asarni bira，《吉林九河图》作 asarni bira，

---

① 《黑龙江档》16－25《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奉天、宁古塔将军、伯都讷副都统、土谢图亲王、扎萨克图郡王、扎赉特、杜尔伯特贝子等行文抄档》九月二十二日笔帖式散珠递送文书。

② 《黑龙江档》16－25《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奉天、宁古塔将军、伯都讷副都统、土谢图亲王、扎萨克图郡王、扎赉特、杜尔伯特贝子等行文抄档》九月二十二日笔帖式散珠递送文书。

《黑龙江图》满文亦作 asarni bira，d'Anville（1732）作 Asserni R，《一统志》作阿萨里河。

据《乌喇等处地方图》，该河位于塔林河西，自北向南流入兔乎鲁河。

11. 钮瓦克塔河（niowakta bira）

《吉林九河图》黄签作 niowakta bira，按满文汉字可记为钮瓦可塔河。《黑龙江图》满文亦作 niowakta bira，《一统志 A》作牛瓦塔河。

康熙四十九年《黑龙江档》载：《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内（中略）乞而即河和阿萨里尼河之间，有钮瓦科塔河。此河自西北向东南，流入兔乎鲁河。①

《一统志 A》卷 35，宁古塔载：牛瓦塔河，在城东北三千七百四十五里，源出库木纳神山，东流入图乎鲁河。

《一统志 B》卷 45，吉林载：钮斡哩河，在宁古塔城东北三千七百四十五里，源出库穆讷神山，东流入图呼勒河。

《盛京通志 B》卷 27，山川，吉林各属：钮斡哩河，国语，钮斡哩，青绿也。城东北三千七百四十五里，源出库穆讷神山，东入图呼勒河。

按：该河名称，最早为 niowakta bira，到后期逐渐衍生为钮斡里河。皆为同一河流之不同时代异称。《盛京通志 B》补国语释义，牵强附会。其余皆与《一统志 B》同。

12. 乞而即河（weigi bira）

《口外九大人图》作 wergi bira，《黑龙江图》满文亦作 wergi bira，《皇舆图》满文作 wergi bira，汉文作乞而即河，d'Anville

① 《黑龙江档》16－25《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奉天、宁古塔将军、伯都讷副都统、土谢图亲王、扎萨克图郡王、扎赉特、杜尔伯特贝子等行文抄档》九月二十二日笔帖式散珠递送文书。

(1732) 作 Ouergui R。此外,《黑龙江档》康熙四十九年前后各册档皆记为 wergi bira,[①] 唯该图记作 weigi bira,疑为笔误。

据《乌喇等处地方图》,该河位于钮瓦克塔河之南,自北向南流入兔乎鲁河。

13. 兔乎鲁河 (tuhuru bira)

《口外九大人图》作 tuhuru bira,满文标注在源流处,与他图迥异。《吉林九河图》作 tuguru bira,《黑龙江图》满文亦作 tuhuru bira,《皇舆图》作兔乎鲁河,d'Anville (1732) 作 Touhourou Pira,《一统志 A》作图乎鲁河,《战迹图》作图瑚噜河,《一统志》作图呼勒河,《吉林通志》作图瑚鲁河。以上不同汉字,皆为满文同音异写。

康熙三十四年《黑龙江档》载:自墨尔根城东南角至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处二千里。东北角至入海至兔乎鲁河五千里。[②]

《一统志 A》卷 35,宁古塔载:图乎鲁河,在城东北三千六百余里,混同江口之北,源出东北无名山,东南流,会牛瓦塔、阿萨尔泥等河,折东北入于海。

《一统志 B》卷 45,吉林载:图呼勒河,在宁古塔城东北三千六百余里,混同江口之北。源出东北无名山,东南流会钮斡哩、阿尔萨尼等河,折东北入于海。

《盛京通志 B》卷 27,山川,吉林各属:图呼勒河,蒙古语,图呼勒,牛犊也。东北三千六百余里,混同江口之北,源出东北无名山,东南流,会钮斡哩、阿尔萨尼等河,折东北入于海。

按:《盛京通志 B》补蒙古语释义,其余皆与《一统志 B》同。

---

① 《黑龙江档》16-25《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奉天、宁古塔将军、伯都讷副都统、土谢图亲王、扎萨克图郡王、扎赉特、杜尔伯特贝子等行文抄档》,十月二十一日骁骑校卓尔库递送文书。

② 《黑龙江档》5-4《康熙三十四年正月吏、刑、理藩院、盛京兵、刑部行文抄档》五月十二日令领催法莱 (falai) 递送文书。

14. 伊米勒河（imile bira）

《口外九大人图》作 imile bira，《吉林九河图》作 imilen bira，《黑龙江图》满文亦作 imile bira，《皇舆图》作厄米勒河，按满文可记为伊米勒河。d'Anville（1732）作 Ymile Pira，《一统志 A》作衣密勒河，《水道提纲》作厄米勒河。《吉林通志》卷 20 作额弥勒河。

康熙四十九年《黑龙江档》载：《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内亨滚河之北，有格尔必河。此河自西南向东北，流入伊米勒河（imile bira）。伊米勒河东北有阿玛河（ama bira），此河自东北向西南，流入伊米勒河。伊米勒河东北有西穆尔河（si mur bira），此河自东北向西南，流入伊米勒河。[①]

《一统志 A》卷 35，宁古塔载：衣密勒河，在城东北三千四百四十一里，源出宁捏山，东南流入亨滚河。

按：图中绘为流入穆尼克河。

《盛京通志 B》卷 27，山川，吉林各属：额密勒河，国语额密勒，雄也。城东北三千四百四十一里，源出宁聂哩神山，东南入兴衮河。

满文 imile bira，从原来记载的汉文衣密勒河，逐渐统一成额密勒河，其词义也以假托满文 emilen（雄）来注释，渐趋牵强附会。

《黑龙江档》康熙二十三年记载了大清国远征军进兵亨滚河时，得知俄罗斯此春溯亨滚河攀越山岭向北海逃去的消息后，当年六月初八日大军抵达伊米勒河口，续而抵达河源，探访奇勒尔人，了解地理情形的史实。[②]

① 《黑龙江档》16－25《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奉天、宁古塔将军、伯都讷副都统、土谢图亲王、扎萨克图郡王、扎赉特、杜尔伯特贝子等行文抄档》九月二十二日笔帖式散珠递送文书。

② 《黑龙江档》1－1《自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起行文抄档》八月十八日镶红旗闲散章京牛莫顺（niomošon）递送文书。

15. 格尔毕河（gerbi bira）

《吉林九河图》黄签作 gerbi bira，《黑龙江图》满文亦作 gerbi bira，《一统志 A》作葛尔必河。

康熙四十九年《黑龙江档》载：亨滚河之北，有格尔毕河。此河自西南向东北，流入伊勒河。[1]

《一统志 A》卷 35，宁古塔载：葛尔必河，在城东北三千四百六十七里，源出傲西克特山，东北流入衣密勒河。

《一统志 B》卷 45，吉林载：噶勒毕河，在东北三千四百六十七里，源出鄂锡克特山，东北流入额蜜勒河。

《盛京通志 B》卷 27，山川，吉林各属：噶勒毕河，国语，噶勒毕，耳聪也。城东北三千四百六十七里，源出鄂锡克塔山，东北流入额密勒河。

按：《盛京通志 B》补国语释义，其余皆与《一统志 B》同。

16. 阿玛尔河（amal bira）

《吉林九河图》黄签作 amal bira，《黑龙江图》满文亦作 amal bira。

《一统志 B》卷 45，吉林载：阿穆尔河，在城东北三千五百六里，源出玛库山，西流入额密勒河。

《盛京通志 B》卷 27，山川，吉林各属：阿穆尔河，蒙古语，阿穆尔，平安也。城东北三千五百六里，源出玛库山，西流入额密勒河。

按：《盛京通志 B》补蒙古语释义，其余皆与《一统志 B》同。

17. 西穆尔河（si mur bira）

《吉林九河图》黄签作 si mur bira，《黑龙江图》满文亦作 si

① 《黑龙江档》16－21《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吏、兵部、理藩院、盛京兵部来文抄档》八月二十三日由齐兰宝递送文书。

mur bira。

康熙四十九年《黑龙江档》载：伊米勒河东北、有西穆尔河。此河自东北向西南，流入伊米勒河。[①]

据《乌喇等处地方图》，该河位于阿玛尔河南，源出玛库山，西流入额密勒河。

18. 亨滚河（henggun bira）

《黑龙江图》满文亦作 henggun bira，《盛京通志 A》卷 9，山川志作亨滚河，《口外九大人图》作 henggun bira，《吉林九河图》作 henggun bira，《皇舆图》作亨滚河，d'Anville（1732）作 Henkon Pira，《一统志 A》作亨滚河，《战迹图》作兴衮河，满文作 hing gun bira，《水道提纲》及《吉林通志》均作亨滚河。

康熙四十九年《黑龙江档》载：《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内（中略）亨滚河以西，有都奇河（duki bira），此河自西向东，流入亨滚河。再，亨滚河东源称之为赫门河（hemen bira）。此河自西北向东南流，成为亨滚河。[②]

都奇河、赫门河二河未绘入《乌喇等处地方图》内。

《盛京通志 A》卷 9，山川志载：亨滚河〔在夏哩河之东，其源莫考，南流入混同江〕。

《雍正十二年行文档》记载：亨滚河，距宁古塔两千八百里。乘船由水路溯流而上五十五日，顺流二十八日路程。源自东北二千七百五十里之亨滚窝集（henggun i weji）南流至宁古塔二千八百里，汇合至松花江〔源流自陆路五百里，水路七百里〕。[③]

《鄂多理城宁古塔城地域档》记载：亨滚河（henggun），位于

---

① 《黑龙江档》16－21《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吏、兵部、理藩院、盛京兵部来文抄档》八月二十三日由齐兰宝递送文书。

② 《黑龙江档》16－21《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吏、兵部、理藩院、盛京兵部来文抄档》八月二十三日由齐兰宝递送文书。

③ 《宁古塔档》2－9《雍正十二年行文档》。

夏哩河（hiyari bira）之东，向东北流入黑龙江。

《一统志 A》卷 35，宁古塔载：亨滚河，在城东北二千七百三十里，源出卓尔齐山，东南流，会诸小水，入混同江，当混同江入海之处，此水亦甚大。

《一统志 B》卷 45，吉林载：兴衮河，在宁古塔城东北二千七百三十四里，源出卓哩奇山，东南流，会诸小水，入混同江，当混同江入海之处，此水亦甚大。

《盛京通志 B》卷 27，山川，吉林各属记载同《一统志 B》。

《水道提纲》卷 24，黑龙江载：亨滚河，出羊山之东，隔岭东麓曰亨滚色禽，东流二百余里，合北来一水，东南流百数十里，合西南来一水。又东百余里，合北来一水，行松漠中，东南二百余里，有哈打五而河，西南自松林东流，合南水四，北水三，而东北流七百余里来会。又东北行松林间，曲曲八百里，有厄米勒河，自西北合数水，东南流七百余里来会，又东行二百里稍北，经衣思科路必而忒地之南，又东百余里，至莽阿臣噶山之南，东入黑龙江。此水自东十七度八分，至东二十四度，源流几千里。

《吉林通志》卷 22，舆地志 10，山川载：又东北亨滚河，合数大水自西北来注之。亨滚河或曰恒滚或曰兴滚，一曰亨庚，出扬山。其北即外兴安岭南麓，北即康熙中与俄罗斯分界处也。河出扬山之东，隔岭东麓曰亨滚尼河。源东流二百余里，合北来一水，东南流百数十里，而合有哈达乌呼河，自南来注之〔河出尼满河源之北，中隔大岭，自岭北麓北流有西来二水合为一，东注之。次北又一水自西来注之。又北三百余里注兴滚河〕。又东南流有额弥勒河，自西北来注之〔河一作厄弥勒，盛京通志别出之，以为二水，非也。源出宁聂哩神山，南流百余里，有亨庚窝集之水合二水，自西北来合为一。东南流百余里入兴滚河。亨庚窝集水盖兴滚河之别流也〕。又东南流有鲁库河〔河出楚查馨河〕、萨穆尼河〔河出九文山〕。自北来伊穆河〔河出扬古岱山〕、达拉哈河〔河出库尔布

山〕，自南来左右交注之，又东南流经集达特噶城之东南，注混同江源流几二千里。[①]

最早介绍亨滚河有关的满文档案，当推楠木贤道《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からみた康熙23年の露清关系》中的史料6、12、15、16、21、22、26（罗马字转写和日译文）。该文书时间为康熙23年10月20日，由笔帖式霍托（hoto）递送文书。其中详述大清国远征亨滚河俄罗斯时，远征军在冰天雪地中，迎面遭受狂风大雪，受困无法前行，未能按期返回的窘迫情形。[②]

19. 鲁库河（luku bira）

《吉林九河图》黄签作 luku bira，《黑龙江图》满文亦作 luku bira，均系康熙四十九年调查地名。《一统志 A》作鲁库河，《吉林通志》卷20作鲁库河。

康熙四十九年《黑龙江档》载：《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内（中略）亨滚河之北，有鲁库河。此河自北向南，流入亨滚河[③]。

《宁古塔档》《雍正十二年行文档》八月十九日，驿丁陈子贵由驿站递送文书载：亨滚河，位于宁古塔城二千八百里之外，水路由独木舟上溯五十五日日程，顺流二十八日程，源自东北二千七百五十里之亨滚窝集，向南流出，注入自宁古塔二千八百里处之松花江〔源流自陆路五百里，水路七百里〕。[④]

---

① 以上引文中，〔〕内为原文按语。

② 《历史人类》第24号，第29~82页。

③ 《黑龙江档》16-25《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奉天、宁古塔将军、伯都讷副都统、土谢图亲王、扎萨克图郡王、扎赉特、杜尔伯特贝子等行文抄档》九月二十二日笔帖式散珠递送文书。

④ 《宁古塔档》2-9《雍正十二年行文档》八月十九日驿丁陈子贵由驿站递送文书。原文：henggun bira，ninggutai hoton i juwe minggan jakūn tanggū bai dubede bi，muke i jugūn weihu i wesime/ susai sunja inenggi，wasime orin jakūn inenggi on，sekiyen/ dergi amargi juwe minggan nadan tanggū susai bai henggun i / weji ci tucifi，julergi baru eyeme，ningguta ci juwe minggan jakūn/ tanggū ba i sunggari ula de acaha，〔sekiyen olgon jugūn sunja tanggū ba，/ muke i jugūn nadan tanggū ba〕。

《一统志 A》卷 35，宁古塔载：鲁库河，在城东北三千二百八十三里，源出楚查琴山，南流入亨滚河。

《一统志 B》卷 45，吉林载：鲁库河，在城东北三千二百八十三里，源出楚察馨山，南流入兴衮河。

《盛京通志 B》卷 27，山川，吉林各属：鲁库河，国语。林茂草密也。城东北三千二百八十三里，源出楚察馨山，南流入兴衮河。

按：《盛京通志 B》除补国语词义外，其余记载同《一统志 B》。

《吉林通志》卷 22，舆地志 10，山川载：又东南流有鲁库河〔河出楚查馨河〕。

20. 哈打五而河（hada ul bira）

《口外九大人图》作 hada ul bira，《吉林九河图》作 hada ul bira，《黑龙江图》满文亦作 hada ul bira，《皇舆图》作哈打五而河，d'Anville（1732）作 Hataoul Pira，《战迹图》作哈达武勒河，《吉林通志》卷 20，作哈达乌埒〔哈达，峰也。乌埒，灰条菜也〕。

康熙四十九年《黑龙江档》载：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咨文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中略）齐齐哈尔城之东松花江、黑龙江交汇。北岸有将军所属毕瞻河（bijan bira）接境。以东北角为将军所属，会同俄罗斯为界之兔乎鲁河之西南，与哈打五而河源接境。等因。绘入图中。①

据《乌喇等处地方图》记载，此河位于伊穆河北，东北流入亨滚河。

21. 衣母河（imu bira）

《吉林九河图》黄签作 imu bira，《黑龙江图》满文亦作 imu

① 《黑龙江档》16-25《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奉天、宁古塔将军、伯都讷副都统、土谢图亲王、扎萨克图郡王、扎赉特、杜尔伯特贝子等行文抄档》十月二十一日骁骑校卓尔库递送文书。

bira，《皇舆图》作衣母河，《一统志 A》作衣母河，《战迹图》作伊穆河，《吉林通志》卷 20 作伊穆河。

康熙四十九年《黑龙江档》载：看《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内……亨滚河之南，有衣母河。此河自西南向东北，流入亨滚河①。

《一统志 A》卷 35，宁古塔载：衣母河，在城东北三千一百四十八里，源出阳武喀山，东北流入亨滚河。

《一统志 B》卷 45，吉林载：伊穆河，在城东北三千一百四十八里，源出扬古岱山，东北流入兴衮河。

《盛京通志 B》卷 27，山川，吉林各属内容同《一统志 B》。

22. 萨穆尼河（samnin bira）

《吉林九河图》黄签作 samnin bira，《黑龙江图》满文亦作 samnin bira，《一统志 A》作萨木宁河，《吉林通志》作萨穆尼河。

康熙四十九年《黑龙江档》载：看《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内……亨滚河之北，有萨穆尼河。此河自北向南，流入亨滚河。②

《一统志 A》卷 35，宁古塔载：萨木宁河，在城东北三千八十八里，源出九文山，俱南流入亨滚河。

《一统志 B》卷 45，吉林载：萨穆尼河，在城东北三千八十八里，源出九文山，俱南流入兴衮河。

《盛京通志 B》卷 27，山川，吉林各属：萨穆尼河记载同《一统志 B》。

---

① 《黑龙江档》16-25《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奉天、宁古塔将军、伯都讷副都统、土谢图亲王、扎萨克图郡王、扎赉特、杜尔伯特贝子等行文抄档》，九月二十二日笔帖式散珠递送文书。

② 《黑龙江档》16-25《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奉天、宁古塔将军、伯都讷副都统、土谢图亲王、扎萨克图郡王、扎赉特、杜尔伯特贝子等行文抄档》，九月二十二日笔帖式散珠递送文书。

23. 萨哈连乌喇 (sahaliyan ula)

《黑龙江图》满文亦作 sahaliyan ula,《皇舆图》作黑龙江、萨哈连乌喇。杜赫德《中华帝国志》第 4 卷,第 9 图西北部,黑龙江南岸注有法文"该河莫斯科瓦人称之为阿穆尔(Amur),中国人(Chinois)称黑龙江(He long kiang),中国鞑旦人(Tartares Chinois)称萨哈连乌喇(Saghalien oula)"。《战迹图》作黑龙江。

《盛京通志 A》卷 9,山川志载:黑龙江,城东北一千二百余里,即萨哈连江也。明一统志云:黑龙江源出北山,南流入松花江。今按,此江源出西北塞外,山名莫考。东南流并混同江入海。又按,金史帝纪:混同江,一名黑龙江,水微黑,故名。然混同江之源出自长白,黑龙江出自塞北,前史就二水河流之处言之也。

《雍正十二年行文档》八月十九日驿丁陈子贵由驿站递送文书载:黑龙江,位于宁古塔城一千二百里之外,单骑十二日程,独木舟上溯十六日程,顺流十一日程,自西北流入松花江。①

《一统志 B》卷 45,吉林载:黑龙江,在宁古塔城东北一千二百里,自黑龙江将军界流入,至此与混同江会流入海。

上述山川,自康熙二十九年巴海视察之后,到康熙四十九年又进行了黑龙江及宁古塔方面的地理状况的调查。一个主要原因是,在编纂《大清一统志》时,发现了不少记载遗漏和矛盾之处,故又令各地开始重新复查。从康熙四十九年二月黑龙江将军衙门咨文墨尔根副都统六哥等人的一份文书,可以了解到具体的探访调查工作。略译如下:

---

① 《宁古塔档》2-9《雍正十二年行文档》八月十九日驿丁陈子贵由驿站递送文书。原文:sahaliyan ula, ningguta i hoton i emu minggan juwe tanggū bai dube de bi, / kaidu morin i juwan juwe inenggi on, weihu i wesime juwan 337//338 ninggun inenggi, wasime juwan emu inenggi on, wargi amargi ci eyeme/ sunggari ula de acaha, 〔ubade loca be seremšeme/ karun tebuhe bihe〕。

亨滚河（中略）哈打五而河、伊米勒河、窝而即河、阿萨里尼河、穆尼克河、乞启琴河（中略）乌第河、兔乎鲁河等河未曾调查送来。又汝等调查十八城时，送来里数外，未记源流至汇合处里数。此等文书寄达后，尽速查清送来。为此咨文①。

由将军衙门传令黑龙江副都统等人调查十八城，并寄来道里程数，又因未记河流的源流到汇合处里数等由，复令尽速查明。此外，同月，将军、副都统咨文黑龙江副都统的文书中如此写道：

（前略）多索米河（dosomi bira）、哈打五而河（hada ul bira）、亨滚河（henggun bira）、塔克提河（taktin bira）、伊米勒河（imile bira）（中略）窝而即河（wergi bira）、阿萨尼河（asarni bira）、穆尼克河（munike bira）、乞启琴河（cicakin bira）、兔乎鲁河（tuhuru bira）以及黑龙江源流（sahaliyan ulai sekiyen），众人皆称不知。查核自部送来《原任内大臣郎谈调查九路图》（dorgi amban bihe langtan i baicaha uyun jugūn i nirugan）之事，为内廷要务，不得以不知敷衍。此等事宜访问查清随行原任内大臣郎谈之文武官员，传文送来。再，倘前往之人言称不知，连夜尽速送来。为此咨文。②

康熙四十九年的地理调查，不仅参考《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

① 《黑龙江档》16-24《康熙四十九年正月黑龙江副都统、墨尔根城协领、索伦总管、驿吏等行文抄档》二月初九日咨行笔帖式卜魁驿丁齐兰宝。

② 《黑龙江档》16-24《康熙四十九年正月黑龙江副都统、墨尔根城协领、索伦总管、驿吏等行文抄档》二月二十六日咨行笔帖式伯尔赫（berhe）。

图》，还参照《原任内大臣郎谈调查九路图》进行了复查河流的工作，并不时访谈康熙二十九年随同郎谈等人前往视察的人员，了解具体情况。康熙四十九年十月，黑龙江将军咨文宁古塔将军的一份文书中如此记载：

> 兔乎鲁河、格尔必河、阿玛尔河、西穆尔河、伊穆河、鲁库河、萨穆尼河、钮瓦可塔河、阿萨里尼河、穆尼克河、塔林河、庙湾山、乜米勒河、厄尔何恳河、毕瞻河（中略）乞启琴河、它而即河（中略）为我等境外，属于（宁古塔）将军辖地。毕瞻河位于亨滚河源之赫门河，流入哈打五而河之东。我等未绘入图内。为此将军宗室杨福、副都统宗室勒色里咨文。[①]

这说明上述山川皆为宁古塔将军辖区，这些地区为宁古塔将军管辖下的奇勒尔（kileri）、赫真（hejen）、费雅喀（fiyaka）、格依克勒（geikele）、瑚什哈喇（husikar）姓之新满洲（ice manju）、瓜尔察（guwalca）等人居住、捕貂之处。

对以上山川名称，康熙四十九年时，重新调查该地位于宁古塔城何方，几里之先。若河川勘清源流，并记述流入什么河流，吩咐相关人员，将以上山川河流、湖泊津渡等项查清后，尽悉增补绘入舆图内，缮写成档。如此反复调查东北各地地理状况，新的调查资料不断送到编纂一统志馆，逐渐形成了大量的有关东北各地的方志资料，其中就包括了各种舆图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年间视察及反复调查的黑龙江等地的人文、地理等资料，并未反映在同一时代的汉文编纂资料以及方志资

① 《黑龙江档》16－25《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奉天、宁古塔将军、伯都讷副都统、土谢图亲王、扎萨克图郡王、扎赉特、杜尔伯特贝子等行文抄档》十月二十一日骁骑校卓尔库递送文书。

料之中。特别是满文档案内容，基本未编入汉文编纂资料之中，由此来看，有必要继续深入挖掘相关资料。

八　结语

综上所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乌喇等处地方图》即为康熙二十九年巴海等人经三路视察黑龙江东北兔乎鲁河流域后绘制而成。康熙时期的满文档案一般称康熙二十九年初次视察之后绘制的原图为《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这一满文标题与我们现在看到的后人整理补加的汉文标题《乌喇等处地方图》有别。依据满文档案，图名亦可回复原名，称为《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统一图文名称，便于后人读档，亦不致混淆图名。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乌喇等处地方图》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黑龙江图》同属一图，内容相同。不同的是，《黑龙江图》左上注有满文“gūsai ejen bihe bahai nirufi gajiha nirugan”（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即为该图名称，图纸背面左下注有汉字“原任都统巴海画来图，五十年十二月十三日”，证明该图是以《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原图为基础绘制的一幅重绘图，图内注明的年代恰好与另外一幅满文地图《原任都统郎谈等人绘制带来图》（即《吉林九河图》）的汉文年代“五十年十二月十三日”相符，这说明《黑龙江图》与《吉林九河图》属同一年重绘而成。这些重绘图在绘制时，均补写了图名和重绘年代。康熙四十九年调查该地区之后，重新发现了一些新的河流名称。[①] 此后，我们可以把这幅迄今为止以不同名称收藏的地图，名正言顺地称为《原

① 历来中外学者误解《吉林九河图》的问题，参见承志《ダイチン・グルンとその时代—帝国の形成と八旗社会—》，第五章“描绘版图——黑龙江流域‘国境’探险”，第 212 ~ 213 页。

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或《原任都统巴海画来图》。两幅舆图地名的详细对照，可参见本文附录之图 4、图 5、图 6 及《乌喇等处地方图》与《黑龙江图》地名对照表。

另外，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该图在满文档案中虽然出现“巴海绘制”等字样，其实巴海只是负责监督绘制任务，并非亲自绘制，原因是康熙二十九年巴海等人三路前往查勘图中河流山川时，随队带有画匠等专业画手。可惜的是，档案资料未能给我们留下当年画匠的名字。当时如何招募画匠绘制舆图等一系列问题，有待将来深入研究。

《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大清国实施边界视察制度，定期派出军队，专门视察是否有俄罗斯人越境进入大清国领土生活。这种定期视察边境的活动，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其后衍生为整个帝国处理边界问题的一个模范。黑龙江以北地区的地理问题，也由此逐渐趋于明确化。不仅使河流走向反源流，河流里数，山脉特征、民俗以及农耕等各种人文地理方面要素有据可查，也为后人反复调查各地方志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康熙二十九年，巴海等人三路查勘兔乎鲁河流域，在大清国政治史以及外交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从此也决定了大清国在兔乎鲁河流域的领土意识。康熙二十九年大清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交涉之后，如何妥善处理国境问题，一直是贯通整个大清国时代的一个重要课题。《乌喇等处地方图》给我们展示了大清国在黑龙江下游东北部一带的山川地貌，也为多年来议论不休的界碑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加可信、直观的有力证据，即所谓的界碑，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满文舆图的出现，使得亚洲东北部、外兴安岭南北的地理状况逐渐明朗，使之进入世界舆图画册中。所以，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各种满文舆图，不仅给中国舆图史带来新的资料，也为重新思考和构筑大清国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形象直观的实物材料。

不久的将来，随着解读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相信这些深藏宫内、封尘已久的满文舆图，将逐渐揭开神秘面纱，导引我们走进其背后秘藏的遥远的历史时空。

附录〔一〕档案

1.《黑龙江档》1-1《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起行文抄档》八月十八日镶红旗闲散章京牛墨顺（niomošon）带走文书。

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臣萨布素等谨题，为奏闻遣往亨滚之兵，降伏罗刹、奇勒尔事。营长杨古岱（yanggudai）、喀图虎（kathū）等派章京咨呈，五月十七日抵达亨滚河口，十八日溯亨滚河时，奇勒尔（kiler）之额木楚（emcu）、蒙努（mengnu）等告称：我等妻子为罗刹掠去，若逃出一两人，我等亲自在此守候。先前罗刹居住在亨滚（henggun）、都齐（duki）两河之洲。今春冰融时，乘坐独木舟，沿亨滚顺流而下，溯伊米勒（imile）河而上，自源流越过山岭，往流向东北海方向的图乎鲁河（tuhuru bira）方向行走。等语。六月初三日，抵达伊米勒河口，参领等一同商议，停止逆溯亨滚，溯流依米勒河行走六日，看得水流湍急，河床狭窄，船只不能运行。故询问奇勒尔之赫济讷（hejine）等，告称：自此至河源，皆依旧如此，船只不可运行。故交付正黄旗委署参领满舍吉（manšegi）、镶黄旗委署参领瓦喀纳（wakana）、镶红旗委署参领牛墨顺（niomošon）等官兵，一并乘坐我等独木舟、奇勒尔之桦皮船，溯流至河源察看。图乎鲁河之方向，探寻循陆路越过行走之地。有越过山岭之处，行抵图乎鲁河，查明有无罗刹，前来报告。当月初九日派遣。十日夜半，满舍吉等派人前来告称：罗刹在山岭附近之依米勒河驻守，地势密林丛生，是否筑城居住，未能清楚见得。等语。我等亲率章京兵丁，携带神威将军（炮）四，十三日抵达满舍吉驻扎之地。翌日，前往包围罗刹居住之卡伦进行捕捉，

镶红旗委署参领牛墨顺，正蓝旗委署参领博墨多（bomodo）等，正红旗委署闲散章京喀楚（kacu），镶白旗委署闲散章京马齐（maci），正黄旗委署骁骑校吉墨格里（gimgeri），正白旗委署骁骑校图木珠（tumju）交付兵丁六十人，编队遣往兔乎鲁河方向埋伏于逾越之地。若罗刹败走经过时尽杀之。如若人数众多，分路突进追杀。等语。决定交付委署参领满舍吉、镶黄旗委署骁骑校哈喀喇、镶红旗委署领催博赫讷兵丁三十人、带领七品官斡福纳西（ofunasi）等人，率先越过罗刹卡伦，扎营河边，劝降罗刹，若罗刹不降，杀之。等语。

由水路遣派正黄旗骑都尉安珠瑚（anjuhū）、正蓝旗委署骁骑惠沙（hoiša），交付兵丁三十人、携骁骑校伊凡（ifan）前往。并吩咐若遇罗刹即可劝降，如若不降，杀之。等语。

我等亲自率领章京兵丁同时并进，各自同时抵达罗刹卡伦驻地，视之，罗刹察知尽皆逃窜。委署参领牛墨顺等前来告称：我等越岭抵达其地，罗刹十余人察知逃跑，追踪活捉二人，其余乘独木舟渡河，进入森林逃走。等语。

将抓获二人送至我处，讯问：尔等何人？答曰：我等原驻扎兔乎鲁河之奇勒尔（kiler），跟同罗刹一起前来捕鱼。遇军被抓，此河之地区无罗刹居住。自此处步行，翌日可达有罗刹之兔乎鲁河，有五十余罗刹人筑室而居。等语。交付委署参领满舍吉、委署骁骑校哈喀喇、博赫讷、骁骑校伊凡（ifan）、七品官斡福纳西（ofonasi）等兵丁四十人，先前派遣埋伏。同委署参领牛墨顺等一同抵达罗刹驻地包围家舍，派伊凡、斡福纳西等宣谕皇帝仁恩，说服降从。若不从，不得妄自攻伐，告知我等随即抵达。等语，遣人告知。当日满舍吉，牛墨顺等前来告称：渡兔乎鲁河行走时，遇持枪罗刹一人，奇勒尔男丁一人，将其活捉。等语。

我等亲自率领章京兵丁，翌日寻满舍吉等踪迹，突进之时，遇罗刹一人持鸟枪前来，劝言降伏，不从，欲举枪击射，杀之。日落

之后，安营驻扎。满舍吉又派人前来相告：我等今日抵达罗刹驻地，遣伊凡、斡福纳西等前去降伏罗刹，众人皆归顺。降伏罗刹共四十七人，获鸟枪五十一支，罗刹捉获奇勒尔男丁一人，妻二，男子十二，女子三等。告知满舍吉在原地等候。抵达之后，讯问降伏罗刹：汝等伙计有近一百人，其余罗刹都在何处？答曰：「哈费里喇（hafirila）之伙计近五十人罗刹越过大兴安岭（amba hinggan dabagan）前往找寻东北方之雅库斯科义（yagūsekei）」。将罗刹抓获之妻子，若带送至大军驻地，恐道路遥远，奇勒尔等不易各自将妻子带去。故宣谕主上恩威，交付给其父兄、丈夫等。

又，首次降伏原先未降之奇勒尔三十一户之九十九丁。罗刹见大军不动干戈就地降伏。深处山林，生如野兽之奇勒尔，闻知主上教化，众人倾心向化，此皆赖皇帝隆恩鸿福。罗刹抵达之后，送至轻车都尉玛喇处候旨。为此谨奏闻。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臣萨布素、副都统升一品大臣温岱、副都统臣雅秦纳。

2.《宁古塔档》2-9《雍正十一年行文档》八月十九日驿站丁陈子贵（cen dzi gui）乘驿送来之文。

宁古塔副都统咨文将军衙门，为查送事……萨布素，宁古塔人，十八岁时，任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沙尔瑚达（šarhūda）衙门笔帖式（bithesi），在任笔帖式八年期间，宁古塔各地大小事务，章京等委任以及应派事务，尽心效力，大受赞赏。顺治十八年，升任骁骑校。

康熙三年，随将军巴海从征俄罗斯（oros），五月初二日，赫哲（heje）赫喇素弥村（hilasumi gašan）地，俄罗斯船兵沿江扎营，萨布素首冲鏖战，俘获船一。此战委派萨布素领兵，收服未降之费雅喀人（fiyaka gurun）。首次降伏东海沿江居住索弥抳村（somnin gašan）等九十九户费雅喀人。此举为将军巴海、副都统尼喀里（nikari）大加赞赏，后牛录章京（nirui janggin）出缺，不必

由京城派遣，预先行文兵部，拟将萨布素升任牛录章京。后牛录章京出缺，即保举奏闻引见，任命牛录章京……康熙九年保举奏闻引见，任命为都统。

康熙十五年，迁移东部（dergi golo）新满洲姓长（ice manju halai da）扎努喀（januka）、布克托（bukteo）等户至宁古塔之际，威济肯河（weijiken bira）内居住之辈，人丁健壮众多，恐其辈不愿迁徙作乱，特遣萨布素迁移居住在威济肯河之克喇特（kelate）等人之户口，皆迁至宁古塔。此年迁移户口两千，男丁三千，人口共八千有余。其新迁来之户口，每户提供住居、器皿、耕种农籽、每月口粮等杂物诸事，对有关刑问及驻防设置卡伦（karun）、堆铺（juce）等事，昼夜不休，处理得当，从未有误。萨布素亲自率兵，前往诺罗（noro）、西喇沁（sirahin）、木伦（muren）等地居住之姓长透车（teoce）、达布图（dabtu）等五百余户，尽收迁移至宁古塔。闻知何耶姓（heye hala）骁骑校岩祺喀（yancika）之伙计（hoki）十五户之人相商叛离，乘夜派兵前往镇压，尽获之，送至京城。

康熙十八年，上谕招萨布素至京城引见奏闻，升任副都统。康熙二十二年，副都统萨布素征讨俄罗斯，率兵首次溯黑龙江出征。前往占据雅克萨城至亨滚等地之俄罗斯之八艘船兵，在特尔德尼城（teldeni hoton）相遇，就地包围。宣谕圣上恩威，全部降伏，皆送至京城。进至额苏里地，筑土城以备越冬时，派遣鄂伦春（oroncon）之朱尔铿额（jurkungge）、巴哈尔达（bahalda）等人到各处鄂伦春之地，晓谕圣上遣发大兵，迁来歼灭俄罗斯。汝等现在不得为俄罗斯贡貂，逮捕或歼灭前来征貂皮，或前来汝等住所掠夺渔猎之俄罗斯杀之，将鸟枪送来，视鸟枪给予赏赐等。各地杀俄罗斯四十余人，前来送交鸟枪，杀人者皆赏赐衣服一件等送之。

住西里木迪之俄罗斯，闻知大军进兵黑龙江，驻扎在额苏里，纷纷避走其国之乌第城（udi hoton）。萨布素闻知欲遣兵往

追，但路途遥远，又无马匹，令居住西里木迪之鄂伦春族长（mukūn i da）吉尔木阿（girmungga）、里克丁阿（likdingga）等派人往俄罗斯行走之狭路处埋伏，俄罗斯行走之时，吉尔木阿、里克丁阿突然伏击全部射死。为此奏闻，大赏吉尔木阿、里克丁阿等人。同年将副都统萨布素任命镇守黑龙江将军。康熙二十三年，派章京往居住于精奇里江（jingkiri ula）之俄罗斯处，深入其地，尽悉降伏，俘获者送至京城。又派章京率兵往居住亨滚（henggun）之俄罗斯处，兵马未到之前，众皆逃窜至彼国乌第城。

派章京率兵赴东海沿岸之居住兔乎鲁河（tuguru bira，tuhuru bira）俄罗斯，亦深入其地尽悉降伏，捕送京城。原先未降伏之奇勒尔（kiler）百余户男丁，亦初次归降，约定贡貂。康熙二十四年攻取俄罗斯雅克萨城时，尽拿活捉俄罗斯两队哨兵，就地分水陆两地立营分攻，五月二十四日夜遣派火器营，二十五日乘夜将军萨布素亲率一队兵马，紧逼城西北角，放火箭急攻，及至巳时，降伏俄罗斯头目额里克谢耶（elikšei）等官兵六百余人。遵照谕旨，放回愿归彼国之人，自愿降伏之人，暂归头目伊凡（ifan）管理，续而降伏之头目巴实里（bašili）等四十余人，送至京城……

3.《黑龙江档》16－21《自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吏、兵、理藩院、盛京兵部行文抄档》康熙四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由齐兰宝（cilamboo）递送文书。

内阁一统志书编纂馆咨行兵部司武厅，为前往视察事。黑龙江将军咨称：齐齐哈尔东方至海五千五百里处与海相接。看图（nirugan）内齐齐哈尔东方并无与海相接。东方疆界是否与海相连，详查送来。东南角至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处，两千三百里，与宁古塔将军辖境相接。看图内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处，位于齐齐哈尔城东北。两江交汇处，是否可以齐齐哈尔城之东南为界，查清送

来。东北角至入海之兔乎鲁河，有五千五百里，同俄罗斯接境。送来之档册中，称兔乎鲁河周围山河等诸项为宁古塔辖区，何故又以齐齐哈尔东北为界。以齐齐哈尔东北角等地为界，是否正确，查清送来。又，看送来的图内宁古塔、吉林乌喇、俄罗斯、蒙古等地山河等合并绘图送来。将此咨行黑龙江将军，命黑龙江将军绘来辖内之地，其他不必绘制。档册内记载，魁山（kui alin）位于城西，哭勒乞勒河（kurkiru bira）位于城西北。看图内魁山位于哭勒乞勒河之北，查清送来魁山、哭勒乞勒河位于城之何方。档册内记载，西南角至科尔沁、扎赉特界之哈达汉河（hadaikan bira）二百里，同扎赉特接境。又，哈达汉河出自城西之呀克山（yak alin），向东南流二百余里，在城西之一百三十里外，同雅儿河（yal bira）交汇。哈达汉河或位于二百里外，或位于一百三十里之外，或位于城之西南，或位于城西之处，查明送来。记载拖里儿哈达（toril hada）为九百六十里，博库里山（bokūri alin）为七百里。看图内拖里儿哈达、博库里山均位于黑龙江沿岸，相隔不远，而里数悬殊迥异，查明里数送来。翁厄河（ungge bira）记在城东。看图内位于东北，孰谓正确，查明送来。殿牛河（tiyenio bira），琴都（kindu）、泥泞（ningni）三河均记为二千七百里之外，三河之间是否相隔不到二里。看图内其间远近亦相隔有别，查清里数送来。二哥河（elge bira）、博鲁母打河（boromda bira）均记在东北方，看图内在北方。究竟在何方查明送来。在格尔必齐河源流（gerbici bira i sekiyen）处，有同俄罗斯（oros）议定分界石碑。此石碑位于齐齐哈尔城何方几里之外？位于格尔必齐河之何方岸边，将此查明，绘写增入图内送来。西北角至厄勒枯挪河（ergune bira）为止二千里。又记厄勒枯挪河在城之西北二千九百里之外，流入黑龙江（sahaliyan ula）。厄勒枯挪河位于二千里之外，或位于二千九百里之外，将此查明送来。喀尔喀河（kalka bira）、乌顺河（ušun bira）、乌蓝掭拉克泉（ulan bulak šeri）均记为位于一千三百里之

外，此等河流、湖泊，是否确为相隔二里？看图内亦远近相隔有别，查明里数送来。图内只绘呼伦鄂模（hulun omo）、布育里鄂模（buyur omo）、忒里库勒哈达（terkule hada）、术得赫山（judehe alin）、苏库都里奇山（sukduliki alin）、图勒尔山（tuler alin）、拖呵河（tok bira）、呀克山（yak alin）、衣儿呼里山（ilhūri alin）、嫩泥乌喇（non i ula），档册内未记位于齐齐哈尔城之何方几里之外，以上山、峰、江、河位于城之何方几里之外？又，拖呵河源流出自何方？流向何方汇入何地，一并查清送来。又，黑龙江将军辖区内之河流，已送来河口之里数，未将河床位于齐齐哈尔城之几里之外写来。查清河床位于城之何方，几里之外，增写入档送来。将董鄂罗河源（donggoro birai sekiyen）记为出自东北兴安（hinggan），喀那河源（kana birai sekiyen）记为出自北兴安。看图内此二河源均为同向，何以记为二种？究竟出自何方，查明送来。记衣克古克达山（ike gokdo alin）位于兴安山梁（hinggan i mulu），此山或位于兴安山梁，或位于兴安山（hinggan i alin），何方之山称为兴安山梁，何方之山称为兴安山？查清送来。看图内敖肯河（oken bira）位于齐齐哈尔城近处七百里，而远处查克达齐山（jakdaci alin）记为六百六十里。多浦哭里河（dobkūr bira）又远，记为六百三十里，各泥河（geni bira）且近，而记为七百里。必拉河（bira bira）近，而记为八百里。奇威儿河（giwel bira）远，而记为七百里。牛满河（nioman bira）近，反而记为一千七百五十里，西札儿满河（sijarman bira）远而记为一千三百七十里。斡伦奇河（olongki bira）且远，而记为一千里。喀罗里（kalur bira）近，而记为一千二百里。衣克车勒克齐鄂模（ikecelekci omo）远，而记为一千里。详查自此以上山河、湖泊之里数具送。看大图（amba nirugan）内，齐齐哈尔城东北之罗拉喀河（lolaka bira）东有纳岩城。纳岩城之东有乌得楞河（udelen bira），此河自北向南流入纳莫里河（nemer bira），甲里河（giyar bira）之东，有查衣河

(jai bira)，此河自西南向东北流入黑龙江。苏儿西哈达（sulasi hada）之东，有麒麟河（kilin bira），此河自北向南流入黑龙江。麒麟河之东，有茂哈达（moo hada）。枯育鲁河（kūyur bira）之东，有酥鲁河（sur bira），此河自北向南流入黑龙江。必占河（bijan bira）之东，乞母泥河（kimnin bira）之西有莫里河（moli bira），此河自黑龙江分出东流，复流入黑龙江。牛满河源之东，有西里母的河（silimdi bira），此河自东北向西流入牛满河。牛满河源之西有乌尔噶勒河（urgal bira），此河自北向南流入牛满河。黑龙江之北，锦衣里江（jingkiri ula）之西，有阿拉尔山（aral alin），黑龙江之北，有厄苏里（esuri），此为对面一河分自黑龙江向东流，复汇入黑龙江。齐齐哈尔城北之多斯哈达（dosy hada）之东，有模林河（morin bira），此河自东北向西南流入黑龙江。二哥河之东有必勒潭河（birtan bira），此河自西北向东南流入黑龙江。锦衣里河之东，有乌勒格河（urge bira），此河自北向南流入锦衣里河。呼马拉河（hūmar bira）流入黑龙江。河口之东有呼马拉城。呼马拉河之南，有枯尔喀河（kūrka bira）。枯尔喀河之西有窝勒克河（weleke bira），此二河均自南向北汇聚在一起，流入呼马拉河。窝勒克河之西，有他哈河（taha bira），此河自西南向东北流入呼马拉河。嫩泥乌喇（non i ula）之东，有米乞里河（micil bira）。此河自北向南会同莫鲁里河，流入嫩泥乌喇。齐齐哈尔城西南之戳儿河（col bira）之北，有戳儿城（col hoton）。以上山、峰、河、城等未曾绘写入档册、舆图内，将此咨行黑龙江将军，若为山、峰，将其位于齐齐哈尔城之何方？几里？若为河流，源流出自何处？流入什么河流？在城之何方？几里之外？若为城，在城之何方？几里之外？周围几里？几个城门？或砖城，或为木城，何国筑建？尽行查明送来。又，厄苏里或为河名，或地名，一并查来。将戳儿河、戳儿城划为科尔沁之扎赉特贝子旗之领地送来。此等戳儿河、戳儿城、或为扎赉特旗之地，或为黑龙江之

地，查明送来。

又，看《大图》（amba nirugan）、《巴海绘制带来图》（bahai nirufi gajiha nirugan）内，齐齐哈尔城东北，亨滚河西有图吉河（tugi bira），此河自西东流，汇入亨滚河。亨滚河东源称为赫门河（hemen bira），此河自西北流向东南，成为亨滚河。亨滚河之北方有格尔必河（gerbi bira），此河自西南流向东北，汇入伊米勒河（imile bira）。伊米勒河之东北有额墨尔河（emel bira），此河自东北流向西南，汇入伊米勒河。伊米勒河之东北有西穆尔河（si mur bira），此河自东北流向西南，汇入伊米勒河。亨滚河之南方有衣母河（imu bira），此河自西南流向东北，汇入亨滚河。亨滚河之北有鲁库河（luku bira），此河自北向南流，汇入亨滚河。亨滚河之北有萨穆尼河（samnin bira），此河自北南流，汇入亨滚河。乞而即河（wergi bira）和阿萨里河（asarni bira）之间有钮瓦克塔河（niowakta bira），此河自西北流向东南，汇入兔乎鲁河。塔林河（talin bira）和磨尼可河（munike bira）之间有庙湾山（miyoo wan alin），穆尼克河之北有乜米勒恩河（miyemilen bira），此河自北南流，汇入穆尼克河。穆尼克河之东，有厄儿何恳河（elgeken bira），此河自北南流，汇入兔乎鲁河。以上山河若为黑龙江所属，绘入黑龙江图和档册之中，并查明送来在城之何方几里之外，源流出自何处，汇入什么河流。再，将《黑龙江将军绘制带来图》、《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gūsai ejen bihe bahai nirufi benjihe nirugan）亦一并送来。等语。我等大臣等告知，依议。等因。为此告知汝等大臣，迅速送至黑龙江将军处，详细查明绘写记档送来。为此咨行。图两幅，七月三十日。收掌官（bargiyara asarara hafan）纳秦（nacin）、刘宝柱（liobooju）、敦柱（donju）。将军宗室杨福、副都统宗室勒色里（leseri）阅毕上述三项，交付委事协领德奇（deki），乌尔都（uldu），防御安奇（anci），骁骑校古勒特依（guretei）等。笔帖式王石达（wang ši da）记。

附录〔二〕图

图 1　满文《长白山图》译文，内藤湖南摹写释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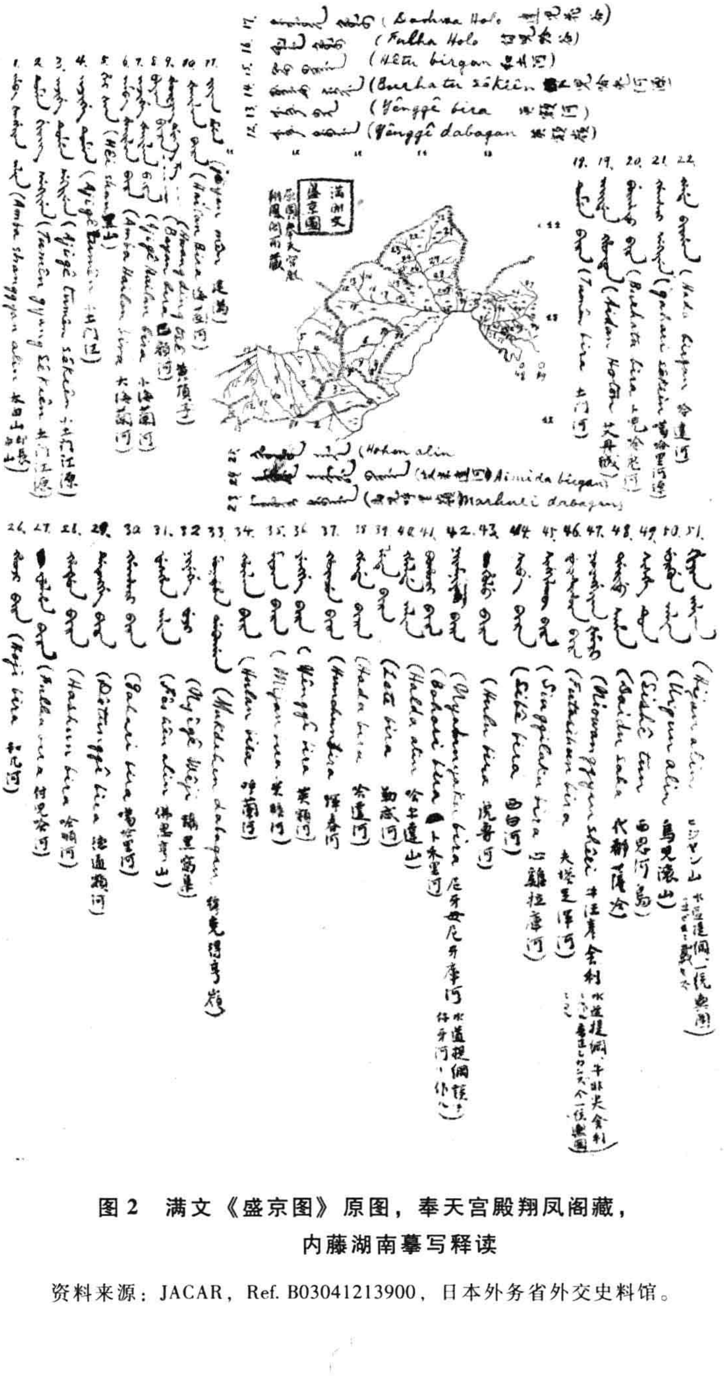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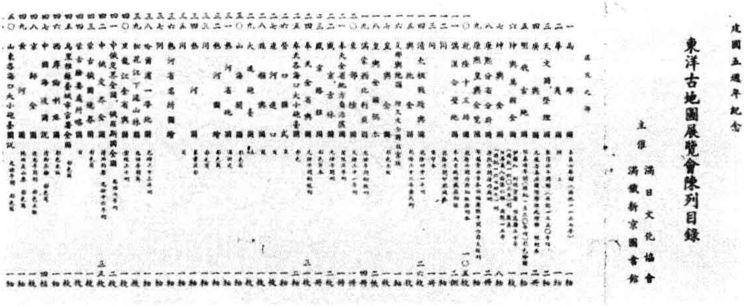


图 2 满文《盛京图》原图，奉天宫殿翔凤阁藏，内藤湖南摹写释读

资料来源：JACAR，Ref. B03041213900，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建國五週年紀念

東洋古地圖展覽會陳列目錄

主催 滿日文化協會 滿鐵新京圖書館

图 3　东洋古地图展览会陈列目录（局部）

资料来源：JACAR，Ref. B05016056200，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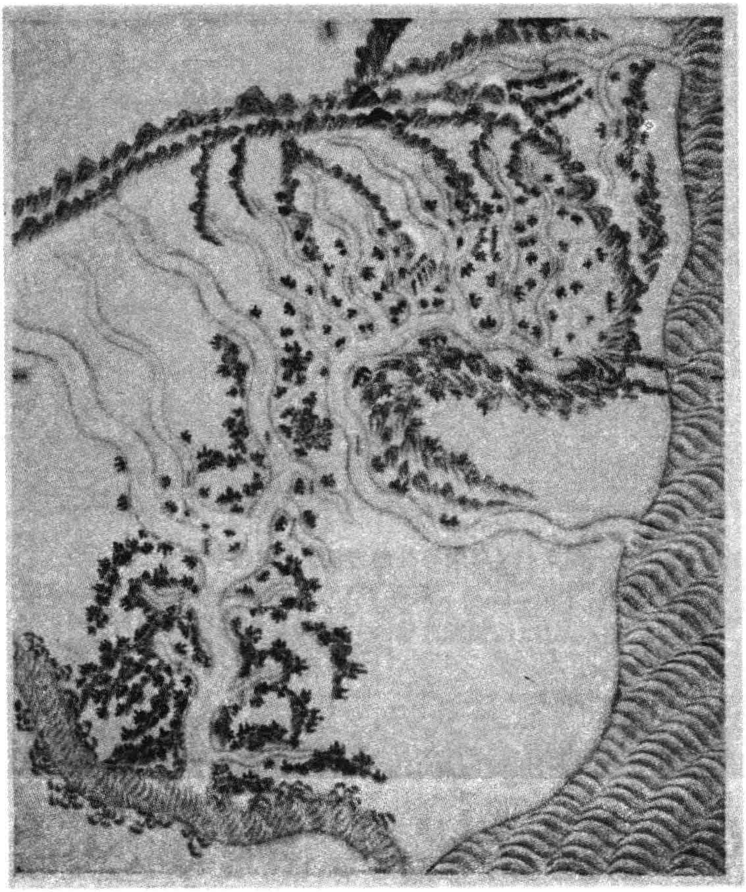


图 4　《乌喇等处地方图》（彩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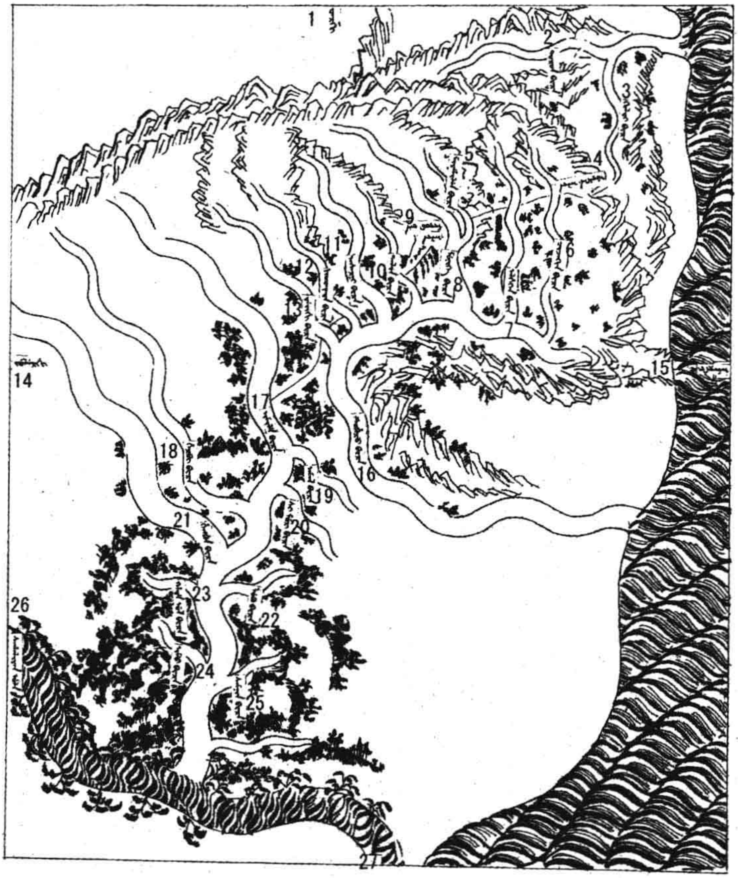


图 5　《乌喇等处地方图》（笔者摹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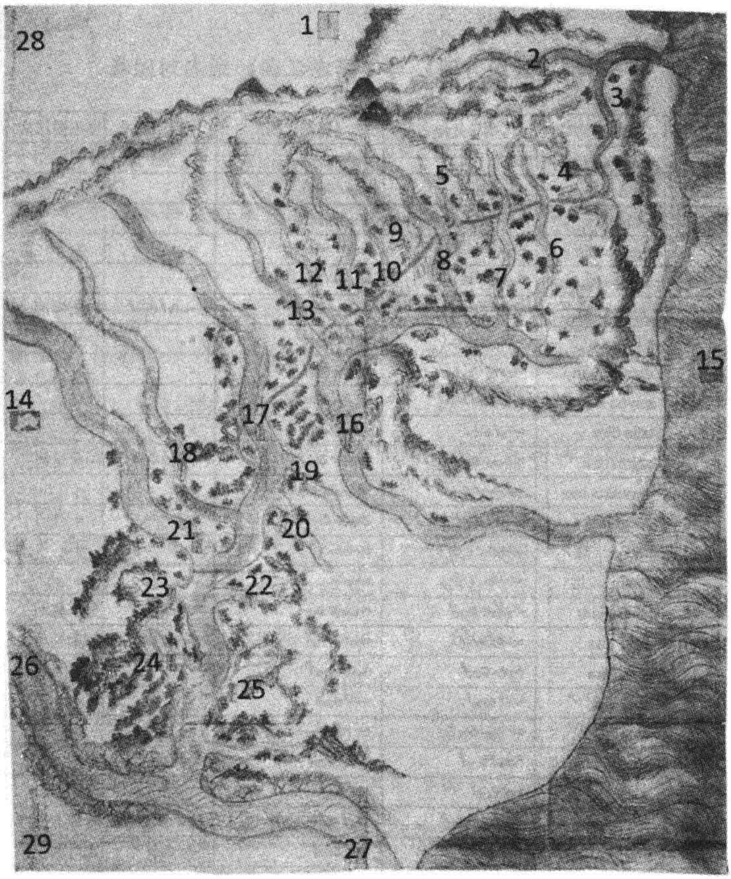


图 6 《黑龙江图》，满文，纵 135 厘米，横 112 厘米，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为笔者所加）

附录〔三〕表

《乌喇等处地方图》与《黑龙江图》地名对照表

编号	罗马字转写	《乌喇等处地方图》	《黑龙江图》	皇舆图满文	皇舆图汉文
1	wargi（西）	ᠸᠠᡵᡤᡳ（西）	ᠸᠠᡵᡤᡳ	×	×
2	toron bira	ᡨᠣᡵᠣᠨ ᠪᡳᡵᠠ	ᡨᠣᡵᠣᠨ ᠪᡳᡵᠠ	×	×
3	kilfi bira	ᡴᡳᠯᡶᡳ ᠪᡳᡵᠠ	ᡴᡳᠯᡶᡳ ᠪᡳᡵᠠ	×	×
4	uyeken alin	ᡠᠶᡝᡴᡝᠨ ᠠᠯᡳᠨ	ᡠᠶᡝᡴᡝᠨ ᠠᠯᡳᠨ	×	×
5	miyemilen bira	ᠮᡳᠶᡝᠮᡳᠯᡝᠨ ᠪᡳᡵᠠ	ᠮᡳᠶᡝᠮᡳᠯᡝᠨ ᠪᡳᡵᠠ	×	×
6	cicakin bira	ᠴᡳᠴᠠᡴᡳᠨ ᠪᡳᡵᠠ	ᠴᡳᠴᠠᡴᡳᠨ ᠪᡳᡵᠠ	ᠴᡳᠴᠠᡴᡳᠨ ᠪᡳᡵᠠ	乞晷琴河
7	elgeken bira	ᡝᠯᡤᡝᡴᡝᠨ ᠪᡳᡵᠠ	ᡝᠯᡤᡝᡴᡝᠨ ᠪᡳᡵᠠ	×	×
8	munike bira	ᠮᡠᠨᡳᡴᡝ ᠪᡳᡵᠠ	ᠮᡠᠨᡳᡴᡝ ᠪᡳᡵᠠ	×	×
9	miyoo wan bira	ᠮᡳᠶᠣᠣ ᠸᠠᠨ ᠪᡳᡵᠠ	ᠮᡳᠶᠣᠣ ᠸᠠᠨ ᠪᡳᡵᠠ	×	×
10	talin bira	ᡨᠠᠯᡳᠨ ᠪᡳᡵᠠ	ᡨᠠᠯᡳᠨ ᠪᡳᡵᠠ	×	×
11	asami bira	ᠠᠰᠠᠮᡳ ᠪᡳᡵᠠ	ᠠᠰᠠᠮᡳ ᠪᡳᡵᠠ	ᠠᠰᠠᠮᡳ ᠪᡳᡵᠠ	阿薩里河
12	niowakta bira	ᠨᡳᠣᠸᠠᡴᡨᠠ ᠪᡳᡵᠠ	ᠨᡳᠣᠸᠠᡴᡨᠠ ᠪᡳᡵᠠ	×	×
13	weigi bira	ᠸᡝᡳᡤᡳ ᠪᡳᡵᠠ	ᠸᡝᡳᡤᡳ ᠪᡳᡵᠠ	×	×
14	julergi（南）	ᠵᡠᠯᡝᡵᡤᡳ（南）	ᠵᡠᠯᡝᡵᡤᡳ	×	×
15	amargi（北）	ᠠᠮᠠᡵᡤᡳ（北）	ᠠᠮᠠᡵᡤᡳ	×	×
16	tuhuru bira	ᡨᡠᡥᡠᡵᡠ ᠪᡳᡵᠠ	ᡨᡠᡥᡠᡵᡠ ᠪᡳᡵᠠ	ᡨᡠᡥᡠᡵᡠ ᠪᡳᡵᠠ	兔乎鲁河
17	imile bira	ᡳᠮᡳᠯᡝ ᠪᡳᡵᠠ	ᡳᠮᡳᠯᡝ ᠪᡳᡵᠠ	ᡳᠮᡳᠯᡝ ᠪᡳᡵᠠ	厄米勒河
18	gerbi bira	ᡤᡝᡵᠪᡳ ᠪᡳᡵᠠ	ᡤᡝᡵᠪᡳ ᠪᡳᡵᠠ	×	×
19	amal bira	ᠠᠮᠠᠯ ᠪᡳᡵᠠ	ᠠᠮᠠᠯ ᠪᡳᡵᠠ	×	×
20	si mur bira	ᠰᡳ ᠮᡠᡵ ᠪᡳᡵᠠ	ᠰᡳ ᠮᡠᡵ ᠪᡳᡵᠠ	×	×
21	henggun bira	ᡥᡝᠩᡤᡠᠨ ᠪᡳᡵᠠ	ᡥᡝᠩᡤᡠᠨ ᠪᡳᡵᠠ	ᡥᡝᠩᡤᡠᠨ ᠪᡳᡵᠠ	亨滚河
22	luku bira	ᠯᡠᡴᡠ ᠪᡳᡵᠠ	ᠯᡠᡴᡠ ᠪᡳᡵᠠ	×	×
23	hada ul bira	ᡥᠠᡩᠠ ᡠᠯ ᠪᡳᡵᠠ	ᡥᠠᡩᠠ ᡠᠯ ᠪᡳᡵᠠ	ᡥᠠᡩᠠ ᡠᠯ ᠪᡳᡵᠠ	哈打五而河
24	imu bira	ᡳᠮᡠ ᠪᡳᡵᠠ	ᡳᠮᡠ ᠪᡳᡵᠠ	ᡳᠮᡠ ᠪᡳᡵᠠ	衣母河
25	samnin bira	ᠰᠠᠮᠨᡳᠨ ᠪᡳᡵᠠ	ᠰᠠᠮᠨᡳᠨ ᠪᡳᡵᠠ	×	×
26	sahaliyan ula	ᠰᠠᡥᠠᠯᡳᠶᠠᠨ ᡠᠯᠠ	ᠰᠠᡥᠠᠯᡳᠶᠠᠨ ᡠᠯᠠ	ᠰᠠᡥᠠᠯᡳᠶᠠᠨ ᡠᠯᠠ	薩哈連烏喇
27	缺（* dergi）（东）	缺（* ᡩᡝᡵᡤᡳ）（东）	ᡩᡝᡵᡤᡳ	×	×
28	缺	缺	[illegible] （原任都统巴海绘制带来图）	×	×
29	缺	缺	原任都统巴海画来图 五十年十二月十三日	×	×

说明：《乌喇等处地方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黑龙江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皇舆图 = 皇舆全览图（康熙朝，满文、汉文），括弧内内汉字为笔者补译字，括弧内“ * ”表示原图该处文字残缺，满文为笔者拟定。

参考文献

一　传统文献

（清）伊把汉等纂《盛京通志》32 卷，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近卫文库藏，康熙二十三年（1684）

（清）阿桂等撰《钦定盛京通志》130 卷，乾隆四十三年（1778）

（清）齐召南编录《水道提纲》28 卷，乾隆四十一年（1776）

（清）杨宾：《柳边纪略》，商务印书馆，1936

（清）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8 册，东洋文库满文版；东北师范大学，1985 年汉文版

（清）钱仪吉等编《清朝碑传全集》1～5，中文出版社，198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3 册，中华书局，1984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48 册，中华书局，1976

（清）《大清一统志》342 卷，乾隆九年

（清）《天下舆图总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日满文化协会关系杂件・设立关系附本邦ヨリ服部博士外 8 名渡满》，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5016055200，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北平ニ于ケル国立重要学术机关》，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1937，H－0917

（清）《吉林通志》122 卷，光绪十七年（1891）

《盛京典制备考》，光绪四年（1878）刊

《清太宗实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版；中华书局，1997 年汉文版

《钦定大清一统志》424 卷，乾隆二十九年（1764）

《黑龙江档》，满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胶片

《宁古塔档》，满文《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胶片

《鄂多理城宁古塔城地域档》，满文，登录号 167538，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

《口外九大人图》，满文，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吉林九河图》，满文，康熙五十年（1711）绘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皇舆全览图》35 幅，汉文木版

《满汉合璧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41 幅，满文铜版

《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满汉合璧，乾隆四十三年（1778）版，大连图书馆藏

Carte general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dressée sur les cartes particulières faites sur les lieux par les RRPP Jesuites et sur les Memoires particulières du P. Gerbillion par le Sr. d'Anville. 1732.

二　近代论著

《国立北平图书馆存箱目录》，台北故宫博物院藏，1985

王庸编《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新购舆图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 6 卷第 4 号，1932 年 7 ~ 8 月

王庸、茅乃文编《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

王庸、茅乃文编《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续编》，国立北平图书馆，1937

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藏 6827 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田鹏:《中俄邦交之研究》，正中书局，1937

米镇波:《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何汉文:《中俄外交史》，中华书局，1935

吴雪娟:《馆藏〈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的价值分析》，《黑龙江档案》1995 年第 1 期

吴雪娟:《论满文翻译的历史与现状》，《满语研究》2005 年第 1 期

吴雪娟:《清代满文舆图概述》，《满语研究》2006 年第 2 期

吴雪娟:《康熙满文本〈九路图〉与清代巡边制度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李小文:《王庸先生和他的著作》，《文津流觞》第 16 期，2006

李孝聪编著《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

李孝聪编著《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文物出版社，2004

李孝聪：《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清代舆图的初步整理与认识》，《故宫学术季刊》第25卷第1期，2007年9月

李德启编《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满文书籍联合目录（Manju bithe cagan i fiyelen i ton）》，国立北平图书馆及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合印，1933

汪前进、胡启松、刘若芳：《绢本彩绘大明混一图研究》，《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5

汪前进、刘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全3卷（《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图》、《乾隆十三排图》），外文出版社，2007

周一良：《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史学年报》第2卷第1期，1934年9月

姜长斌：《中俄国界东段的演变》，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孙文良、李治亭：《清太宗全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3

孙喆：《从两幅地图看18世纪初期清人对黑龙江流域的认识》，《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6期

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后收入《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曹婉如、郑锡煌、黄盛璋、钮仲勋、任金城、秦国经、胡榜波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5

曹婉如、郑锡煌、黄盛璋、钮仲勋、任金城、秦国经、汪前进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文物出版社，1997

郭美兰：《热河地图　清宫珍品》，《中国档案报》2003年9月26日，后收入郭美兰《明清档案与史地探微》，辽宁民族出版社，2012

郭美兰：《清宫珍藏满文舆图》，后收入郭美兰《明清档案与史地探微》，辽宁民族出版社，2012

华林甫：《英藏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国地图考释》，《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华林甫：《英国国家档案馆藏中国近代舆图》，《地图》2005年第1期

黄润华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刘官谔：《内务府舆图房藏图纪要》，《文献论丛》，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1936

刘若芳、汪前进：《〈大明混一图〉绘制时间再探讨》，《明史研究》，2007

刘远图：《〈柳边纪略〉所记威伊克阿林界碑补证》，《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6期

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商务印书馆，1958

卢雪燕：《院藏康熙满文本〈黑龙江流域图〉考介》，《故宫文物月刊》第19卷第9期，2001

卢雪燕：《地理之学　非图不明——故宫所藏古地图探微》，《地图》2007年第17期

薛虹：《彩绘满文黑龙江地图和格尔必齐河的位置》，《清史研究》1993年第4期，后收入《薛虹学术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

鞠德源：《关于明代奴尔干永宁寺碑记的考察和研究》，文献丛刊编辑部编《文献》1980年第1辑

韩儒林：《清初中俄交涉史札记》，原载《学思》第2卷第2期，1941，后收入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韩儒林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小长谷有纪、杨海英编著《草原の游牧文明—大モンゴル展によせて》，财团法人千里文化财团，1998

内藤虎次郎著《清朝史通论》，弘文堂书房，1944

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12卷，筑摩书房，1970

今西春秋：《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东方学纪要1》，天理大学おやさと研究所，1959

石山洋：《レオ・バクロフの地图学史研究》，《东海大学纪要》，课程资格教育センター6，1996

吉田金一：《近代露清关系史》，近藤出版社，1974

吉田金一：《郎谈の吉林九河图とネルチンスク条约》，《东洋学报》第

62 卷第 1、2 号，1980。中译文见刘显叔《郎谈〈吉林九河图〉与尼布楚条约》,《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第 13 卷第 1 期

吉田金一:《ネルチンスク条约で定めた清とロシアの国境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第 42 卷第 1 号，1983

吉田金一:《ロシアの东方进出とネルチンスク条约》，近代中国研究センター，1984

吉田金一:《ロシアと中国の东部国境をめぐる诸问题—ネルチンスク条约の研究—》，环翠堂，1992

阿南惟敬:《露清对立の源流》，甲阳书房，1979

阿南惟敬:《清初军事史论考》，甲阳书房，1980

和田清:《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社团法人满洲文化协会，1935，大连图书馆藏，后收入和田清《东亚史论薮》，生活社刊，1942

松浦茂:《ネルチンスク条约直后清朝のアムール川左岸调査》,《史林》第 80 卷第 5 号，1997，后收入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6

承志:《满洲语で记された〈黑龙江流域图〉》，藤井让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编《大地の肖像—绘图・地图が语る世界》，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7

承志:《ダイチン・グルンとその时代—帝国の形成と八旗社会—》，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9

宫纪子:《モンゴル时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

宫纪子:《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图》，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07

野见山温:《露清外交の研究》，酒井书店，1977

船越昭生:《康熙时代のシベリア地图—罗振玉旧藏地图について—》,《东方学报》第 33 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3

船越昭生:《ウイットセンの北东アジア地图をめぐる二三の问题》,《史林》第 47 卷第 1 号，1964

楠木贤道:《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からみた康熙 23 年の露清关系》,《历史人类》第 24 号，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发行，1996

杨海英:《清朝时代伊克昭盟盟长バダラホの奏凯图— “图开克迹” が

描くオルドス七旗一》，《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第32卷第4号，2008

鸳渊一：《满文老档による盛京舆图の历史地理的研究》（一、二、三），内陆アジア史学会编《内陆アジア史论集》第2号，国书刊行会，1979

增井宽也：《明末のワルカ部女直とその集团构造について》，《立命馆文学》第562号，1999

增井宽也：《建州统一期のヌルハチ政权とボォイ＝ニヤルマ》，《立命馆文学》第587号，2004

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14

《满文地图に就いて要约》，卫藤利夫抄译，《满洲学报》第2号，1933

Bagrow, Leo. *The atlas of Siberia by Semyon U. Remezov* , Gravenhage: Mouton, 1958

Bagrow, Leo. und R. A. Skelto, *Meister der Kartographie*, Berlin: Safari-Verlag, 1973

Cahen, Gaston. Le livre de comptes de la caravane Russe a Pékin en *1727 - 1728: texte, traduction, commentaire*, Paris: Félix Alcan, 1911

Cahen, Gaston.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sous Pierre le Grand (1689 - 1730)*, Paris : Alcan , 1912. 英文参见 Gaston Cahen, *Some early Russo-Chinese relation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W. Sheldon Ridge, "The National Review", 1914。日译参见ガストン・カーエン著《露支交涉史序说》，东亚外交史研究会译，生活社，1941

Fuchs, Walter. "Ueber einige Landkarten mit Mandjurischer Beschriftung", 《满洲学报》第2号，1933

Fuchs, Walter. "The Peking Map Collection", *Imago Mundi*, Vol. 2, 1937

Fuchs, Walter. "The 'Mongol atlas' of China by Chu Ssu-pen and the Kuang-yü-t'u", *Monumenta Serica*, Vol. 1, Peiping: Fu Jen University, 1946

Fuchs, Walter. "Notiz zur Pekinger Weltkarte der Ming-Zeit", Chiri Gakushi-Kenkyu, Kyoto: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es in the History of Geography, 1962. 日译文参见织田武雄《北京の明代世界图について》，《地理学史研究》第2号，地理学史研究会，1962；地理历史研究会编《地理历史研究》，柳原书店，1962

Futaki Hiroshi and Kamimura Akira (eds.), *Landscapes Reflected in Old Mongolian Maps*, Tokyo: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005

Shinobu Yamada-komeie, "Mapping the Russian Far East: Cartography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Sakhalin, the Kurils, and Japan in the 18th century",《法政大学文学部纪要》第 54 号, 2006

Simon, W. and H. Nelson. *Manchu Books in London: A Union Catalogue*,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77

Артемьев А. Р. *Буддийские храмы XV в. в низовьях Амур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05. 日译文参见 A. R. アルテーミエフ著《ヌルガン永宁寺遗迹と碑文—15世纪の北东アジアとアイヌ民族》，菊池俊彦、中村和之监修，垣内あと译，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08

Бартольд, В.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в Европе и России : лекции читанные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и в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м институте живых восточных языков*, Изд. 2 – е. Издания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живых восточных языков; 7. 1925г. 日译文参见日本外务省调查部译，バルトリド著《欧洲殊に露西亚に于ける东洋研究史》，外务省调查部，1937，生活社，1939 年再版。

（原载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学术季刊》第 26 卷第 4 期，2009 年，第 1～74 页。收入该书之际，修改并补充了一些新解读的满文档案资料）

尼布楚条约界碑图的幻影

——满文《黑龙江流域图》研究

承　志（Kicengge）

一　引言

16世纪，生活在欧亚大陆东方的女真人（jušen，女真、朱申、诸申，后改称manju，满洲），在1644年入关之前，他们就已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来自蒙古、汉地、朝鲜的各种地理知识。他们试图将汉文《两仪玄览图》等世界地图译成无圈点老满文的文化活动，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日后横跨欧亚大陆的新兴帝国。

我们目前能够亲眼看到的舆图，除了几幅用无圈点满文绘制之外，大部分都是顺治（1644～1661）以后绘制而成，这些地图长期保存在宫中，很少为外界所知。研究满洲、蒙古文等非汉文舆图的内容，对于重新认识和评价大清国时代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迄今这仍是一个很少为研究者瞩目的研究领域。本文不揣谫陋，试图通过介绍舆图做一些初步的探讨，希望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用无圈点满文绘制的一幅舆图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在题名为《盛京满文老档》的档案之中，以《满文地图》（一件一幅，墨绘）为题归类。该图用初期无圈点

满文书写而成，可以推断绘制于天聪六年（1632）以前。图幅尺寸，纵 76 厘米，横 93.5 厘米。图上绘有 yooju（耀州）、gaiju（盖州）、dungjing（东京）、simyan（沈阳）、niojan（牛庄）、cuwanceng（船城）、fusi（抚顺）等当时的盛京以及辽阳周边地区地名。另外，该图左上还注有"julergi jasei tai be sunja ba tubade tebu；tai jakade usin i ambula komso be tuwame，tai fejile gašan tebu"（南界之台设在五里之外。视台之周边农田多寡，在台下设庄）。图右下注有"amargi jasai tai fe an i uthai bikini；/ tai jakade usin i ambula komso be tuwame tai fejile gašan tebu"（北界之台依照原样，视台之周边农田多寡，在台下设庄）。所以，可以说这是一幅说明当时设置墩台以及村落位置的舆图。

另外，在明代出版的舆图中，汉字旁注有满文的有《两仪玄览图》、《九边图》（辽宁省博物馆藏）、《大明混一图》[①]（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用无圈点满文标记的《两仪玄览图》，此图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刊行，图中汉文旁译注满文。此图的出现，是表明女真人在天聪六年以前就已通过自己的语言文字试图译介和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的例证。同时，这也说明 1644 年入关以前的满洲人在翻译工作上不仅仅限于汉籍史书方面，而且还将视野投向了新的地理知识的翻译介绍。图中的汉字虽然没有全部译成满文，但从对译的地名也可以看出他们眼中的世界遍及全球。我们来看看他们翻译的具体地名。

亚洲东部及东南亚

鞑靼 monggo gūrun、长白山 šanggiyan alin、五国城 sunja gurun i hecen、大明国 nikan gūrun、大明海 nikan i

① 《大明混一图》在汉文地名上贴有满文浮笺。

mederi、南京 nan jing、京师 be jing、大明一统 nikan gurun、吕宋 lio song、小东洋 ajige dergi mederi、日本 ose、日本海 osei mederi、朝鲜 solko、女直 nioiji

欧洲及西亚、非洲

冰海 jūhei mederi、新曾白腊 sin seng be la、地中海 na i dulimbai mederi、欧逻巴 eo lo ba、利未亚 li ui ya、卧蓝的亚大州 o lan di ya、回回 hūidzi

北美、南美及太平洋

北海 amargi mederi、北亚墨利加 amargi ya me li giya、南亚墨利加 jūlergi ya me li giya、大东洋 amba dergi mederi、小西洋 ajige wargi mederi

除了这些地名之外，“昼长线”（inenggi golmin sirge）、“昼短线”（ineenggi foholon sirge）、“昼夜等线”（inenggi dobori gese sirge）、“赤道北地半球之图”（fulgiyan amargi na i hontoho muheliyen i nirugan）等也都译成了满文。[①] 努尔哈赤、皇太极时

① 题名为《两仪玄览图》的舆图，目前能够看到的只有两幅。一幅为辽宁省博物馆所藏（注有无圈点老满文），另一幅为韩国收藏（无满文）。辽宁省博物馆所藏《两仪玄览图》图版，参见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图 57、图 58、图 59。详情参见同书王绵厚的解说（图 59）和《论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上的序跋题识》一文（同书，第 107～111 页）。遗憾的是，王绵厚的解说只说明注有满文，并没有试读满文内容。日本学界对韩国藏《两仪玄览图》的研究，参见鲇泽信太郎《利瑪竇の両儀玄覧図に就いて》，《歴史教育》，11－7，1936 年；《マテオ. リッチの両儀玄覧図について》，收于地理学史研究会编《地理学史研究古地図特集》；以及最近的铃木信昭《朝鮮に伝来した利瑪竇〈両儀玄覧図〉》，《朝鮮学報》，201，2006 年，第 1～30 页；《利瑪竇〈両儀玄覧図〉攷》，《朝鮮学報》，206，2008 年，第 21～60 页等论文。除此之外，鈴木信昭还著有《朝鮮粛宗三十四年描画入り〈坤輿萬國全圖〉攷》，

期，在明朝人绘制的舆图上，满洲人为方便理解世界地图，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了对译，且对译的满文地名涉及世界各地，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了解当时女真人世界意识地图。

目前，满文舆图分藏在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世界各地。其中，保存最多的是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据邹爱莲介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机关，总计藏有一万件以上的舆图。这些舆图上书写的文字除了汉文之外，还有满文、蒙古文（包括托忒文）、俄文、察合台文、英文、法文、拉丁文等多语种。这些舆图可以说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① 迄今为止，满文舆图方面的研究，只有个别地图研究者有所论及。先行研究基本上都属地图内容的介绍和年代推定，我们还看不到通过论述最基本的地图绘制机构的沿革，来详述舆图绘制的历史背景及意义的论说；甚至也看不到通过当时的舆图目录编辑与国家历史资料编纂等问题来进行综合研究的论作。最近，有关内务府档案的陆续出版，给舆图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实际上，我们通过当时的宫廷画师以及匠人制作舆图的具体过程，已经具备了深入研究的条件。②

《史苑》，63（2），2003，第6~35页等一系列研究朝鲜地图的论文，其所论考证详尽，尤值参考。辽宁省博物馆《两仪玄览图》和韩国藏版是否同出一版，俟考。

① 邹爱莲：《关于清宫舆图》，《明清论丛》第2辑（后收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选（1994.10~2004.10）》），介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舆图7000件（册）。除此之外，齐秀梅、杨玉良等《清宫藏书》，也介绍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有舆图“2700余种2900余件、6000余张又49卷122册”。这些舆图的具体内容，需要将来进一步调查核实。

② 早期介绍满文舆图的文章，参见日本学者青山定雄《古地誌地図等の調査》，第122~181页，其中，第二章地图，第146~147页，介绍了意大利公使馆员Rose氏购入中国地图数百种，这些地图藏在当时的大连图书馆。满文舆图介绍了大连图书馆藏《满文支那地图》《满汉文战迹舆图》等地图的名称。除此之外，满文舆图研究可参见福克司（Walter Fuchs），“Ueber einige Landkarten mit mandjurischer Beschriftung”，《满洲学报》第2期，1933，第1~17页，日译文概要参见同书衛藤利夫摘译《満文地図に就いて要約》，第1~3页；福克司，

大清国时代绘制的舆图可以说目前大部分收藏在中国，但也有不少舆图流散在世界各地，也有很多下落不明。最近出版的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以及华林甫《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等海外舆图目录，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基本资料，使我们对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国舆图逐渐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我们衷心期待今后进一步继续深入调查研究。

总之，迄今为止，大清国时代的舆图，还远远没有能够充分得到整理和研究，特别是最基本的使用满文等非汉文绘制的中国舆图制作以及目录编纂的历史，迄今为止更是无人进行全面系统的介绍。目前，有关资料陆续公开出版，逐渐使我们具备了对个别舆图进行深入分析的可能性。有关舆图制作和目录编纂的历史，已有另文专述，此处不再赘言。以下，主要探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满文《黑龙江流域图》。

为行文方便，本文满文拉丁字转写采用 P. G. von Möllendorff 方式。因满文没有大、小写之别，故人名、地名罗马字转写起首字母没有采用大写字母。斜线“/”表示满文改行，逗号“,”表示满文句中一点，分号“;”表示满文句末两点，“+”后表示文书内的增补文字；文书破损部分以“□”表示。

此外，康熙时期的满文地名、人名对应的汉字，主要以同一时期的康熙《皇舆全览图》汉文木版图为据，该图没有的地名，利

“Notiz zur Pekinger Weltkarte der Ming-Zeit”，日译文见織田武雄《北京の明代世界図について》，《地理学史研究》第2集；日本学者和田清《盛京吉林黒龍江等処標注戦蹟輿図について》，《東亜史論藪》；美国学者 Mark C. Elliott, The limits of Tartary, Manchuria in imperial and national geograph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 33, pp. 603-646,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00；等文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的出版，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舆图绘制过程中选材及购置材料等方面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用汉文《大清圣祖实录》与《康熙起居注》的相关地名与人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本文没有采用后来雍正、乾隆时期以后的统一的汉字地名。

二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黑龙江流域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满文地图归入本文附录表1，以备参考。这些图目按《萝图荟萃》的分类来看，以河川为中心绘制的舆图，应属于河道图目类。[①]

表1中列入的29件满文舆图为原先“国立北平图书馆”移交管理的部分舆图，同1932年王庸编写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　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新购舆图目录》[②]的目录基本一致。但是，所谓的《吉林九河图》和《黑龙江流域图》（见附录图1）不包括在王庸的目录之中。《故宫北平图书馆舆图存箱目录》（打印稿，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吉林九河图》注有“原四边破碎，民国六十年六月全重裱背，故宫博物院裱”，《黑龙江流域图》注有“原四边破碎，民国五十九年九月全重裱背，故宫博物院裱”等字样。这也说明原先破损的舆图后来经重新装裱而成现在的状态。并且，该目录也明确记载《吉林九河图》与《黑龙江流域图》同《乌拉等处地方图》（二幅）一并装入“图六箱”之中。[③]

---

① 辑录《萝图荟萃》的《国朝宫史续编》卷100，河道图目内有《黑龙江源图》一幅。从尺幅来看，与《黑龙江流域图》大小不同，估计不是同一幅舆图。有关《萝图荟萃》的编纂以及故宫整理舆图的问题，参见承志《ダイチン.グルンとその時代：帝国の形成と八旗社会》（清朝及其时代：帝国形成与八旗社会），第6章“堆积如山的舆图：舆图房与编纂舆图目录”，第197～244页。

② 王庸编《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　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新购舆图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6－4，1932，第56～72页。

③ 1932年，王庸编《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　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新购舆图目录》归类的“十九　满洲”中，有以下图目：

本文介绍的《黑龙江流域图》，目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纵159.2厘米，横139.2厘米。图左上注有汉文“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共计有137个地名和河流名称。以往出版的舆图目

(一六三)《盛京五路总图》，一大帧，青绿画，满文，纸本，绫边。七年旧目不记编号，满文地名以白签帖注。
(一六四)《盛京五路总图》，一大帧，墨描，满汉文，纸本。地名或单注汉文，或单注满文，不必一地兼注满汉二文字。
(一六五)《乌喇等处地方图》，二帧，青绿画，满文，纸本。
二帧图画不同，似非出一人手。旧目“称康熙三十二年画本”地名以红签，注满文。一帧之背，贴有一白纸字条，云：“郎坦送来《九大人图》一幅。库内取来《乌拉等处图》一幅，纂修满丕画来图一幅，三幅共包一处。”《九大人图》为本目中《口外各路满文图》六帧之一。满丕所画不知何图。唯库内之《乌喇图》只称一幅，不知是否以两帧为一幅，抑两帧之一来自库内，而其一即满丕所画。因在该字条之上方，又记有“纂修满丕出差画来舆图”字样也。至于此字条之来源，殆亦一统志馆所写贴。
(一六六)《宁古塔地图》一帧，墨描，满汉文，纸本。汉文地名以红签贴注。
(一六七)《宁古塔图》一帧，青绿画，满文，纸本。
(一六八)《口外九大人图》仝右。
此二图为下一七四号《口外各路图》六帧之二。上列《乌喇等处地方图》两帧之一，背面字有“郎坦送来《九大人图》字样，当即此《口外九大人图》也”。
(一七四)《口外各路图》四帧，青绿画，满文，纸本。
旧目称《口外各路满文图》并谓康熙三十二年画本。旧本共有六帧，据各图背面所写各图地域为“宁古塔”，一称《口外九大人图》，一为《鄂尔多苏》，一为《独石口》，余两图为《张家口》。兹《口外九大人图》及《宁古塔图》提归“满洲”类，故只有四帧。除《独石口》一图注有汉文外，其他皆单记满文，《独石口图》之汉文，疑非原有，而为后人所添注。据此诸图之形式及装裱式样，疑皆一统志馆送储四十九图之一部分。
王庸的目录出版之后，1933年，李德启编、于道泉校《国立北平图书馆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满文书籍联合目录》中录有如下图目：(1)《盛京五路总图 mukden i sunja jugūn i uheri nirugan》，满文（补译），一帧，青绿画，纸本，长300cm，宽960cm。(2)《盛京五路总图 mukden i sunja jugūn i uheri nirugan》，满汉（补译），一帧，墨描，纸本，长300cm，宽510cm。(3)《乌喇等处地图 ula i jergi ba i nirugan》满文（补译），二帧，青绿画，纸本，长132cm，宽110cm，长115cm，宽87cm。(4)《宁古塔地图 ningguta i ba i nirugan》满汉（补译），一帧，墨描，纸本，长300cm，宽300cm。(5)《宁古塔图 ningguta i nirugan》满文（补译），一帧，青绿画，纸本，长229cm，宽248cm。汉文图名完全相同，补译了满文图名与图幅大小。实际上，这些满文地图上没有题写任何文种的图名。王庸图目中的汉文图名，后来由李德启补译成满文。参见李德启编、于道泉校上引书目凡例。

录中，查不到同一名称的舆图。在《国立北平图书馆舆图存箱目录》（打印稿）中记有“黑龙江流域图　北平”等字样，可以推断该图是当年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图。有关黑龙江的舆图，目前从各种舆图目录和图书馆藏图目录的调查来看，确实有不同名称的舆图存世。① 该图在台北出版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增订本（一）中，归入史部舆图类的“河流之属”之中。②

最初简单介绍台北《黑龙江流域图》的是日本学者吉田金一。1980 年，吉田金一在介绍《吉林九河图》之时，就提到过《康熙四十九年黑龙江流域图》。但是，当时只论及该图在格尔必齐河畔绘有“界碑”图，没有专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③

①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库也藏有如下有关黑龙江方面的地图：（1）黑龙江口图，典藏号：SB/981.345/6036，彩绘本，折叶，2 折册（1 函），汉文；（2）黑龙江源图，典藏号：SB/981.345/6033，彩绘本，折叶，1 折册（1 函），汉文；（3）黑龙江中图，典藏号：SB/981.345/6035，彩绘本，折叶，2 折册（1 函），汉文。另外，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内也有如下相关图目：（1）吉黑两省地图（满文），不著制者名氏，清绘本，一幅（墨绘），不注比例，板框 152.6cm × 200.5cm；（2）黑龙江图（满文），不著制者名氏，清绘本，一幅（色绘），不注比例，板框 135.0cm × 112.0cm；（3）黑龙江全图（满文），不著制者名氏，清绘本，一幅（色绘），不注比例，板框 212.6cm × 241.0cm。从以上列举的图名也可以看出，还有不少有关黑龙江的舆图存世。但是，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内记载的满文地图，目前下落不明，所以还不能进行比较研究。除此之外，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也藏有两幅以黑龙江题名的地图。这些舆图资料，留待今后继续调查。

② 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增订本（一），第 342 页。但是，该目录将“吉林九河图一幅”误记为“吉林入河图一幅”。有关这一点，已由吉田金一指出“入”为“九”之误记。参见吉田金一《郎談の〈吉林九河図〉とネルチンスク条約》，《東洋学報》第 62 卷第 1、2 号，1980，第 65 页，注 1。有关《吉林九河图》，参见吉田金一《ネルチンスク条約で定めた清とロシアの国境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42（1），1983，第 62 ~ 87 页；松浦茂：《ネルチンスク条約直後清朝のアムール川左岸調査》，《史林》80（5），1997，第 714 ~ 744 页。

③ 吉田金一《ロシアの東方進出とネルチンスク条約》第 9 章的注解内注有“满文，纸本彩绘，160cm × 140cm，黑龙江将军辖地地图，估计是乾隆元年版《盛京通志》黑龙江将军所属形势图的原图”的推测。吉田的这个推测显然误解了《黑龙江流域图》的绘制年代。吉田记载的图幅大小同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尺幅略有不同。另外，吉田金一《ロシアと中国の東部国境をめぐる諸問題：ネルチンスク条約の研究》中附有《第十六图　康熙四十九年黑龙江六图图西北部》摹绘图。

此后，2001年，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卢雪燕发表了题为《院藏康熙满文本〈黑龙江流域图〉考介》一文，将该图上汉文注记的“康熙四十九年”为绘制年代，指出了舆图内容和绘制范围，并通过与乾隆版《皇舆全览图》进行比较，论述了该图的绘制意义及价值。该文认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前，有关黑龙江流域不存在详细地图”，并且举出康熙五十五年（1716）的《龙沙纪略》为黑龙江流域最早的书籍，并以康熙二十二年（1683）编纂[①]《盛京通志》的黑龙江流域记载较少为理由，推测《黑龙江流域图》绘制于康熙二十八年到康熙五十五年之间。文中指出：“经由比对，可知两图在内容上具有联贯性，其中《黑龙江流域图》虽为中国传统山水技法绘画，但绘法上已明显受到西方制图技法的影响，省略了一些传统山水地图技法，融入了抽象、示意的线条与符号，如河川的水纹等，呈现出与同时期山水地图迥异的风格。”[②] 卢雪燕以制图技法上省略了中国山水地图的技法，利用抽象、示意的线条和符号——具体是“河川水纹”与同时期的山水地图风格迥异——为由，认为其深受西洋技法的影响，所以与具有东西方技法风格的《皇舆全览图》（乾隆十三年排图）有关联，并推导出《黑龙江流域图》是《皇舆全览图》的草稿之一的结论。[③] 但是，正如后面所述，笔者对此持有疑问。

---

① 按：应为康熙二十三年。

② 卢雪燕：《院藏康熙满文本〈黑龙江流域图〉考介》，《故宫文物月刊》第19卷第9期（225），2001，第105页。

③ 卢雪燕一文标出的满文有个别误读。如第100页“山（ilan）”应为“alin”，第108页注13“oros emgi hesen be waksilame ilibuha wehe bei”应为“oros emgi hešen be/ faksalame ilibuha/ wehe bei”。吉田金一：《ロシアの東方進出とネルチンスク条約》中也将“hešen”（界、境界）误读为“hese”（圣旨）。参见该书300页，图D。在后来出版的吉田金一《ロシアと中国の東部国境をめぐる諸問題：ネルチンスク条約の研究》中，《第十六图　康熙四十九年黑龙江六图图西北部》摹绘图满文部分也如此。另外，罗盛吉、吴雪娟《康熙〈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图〉考释》一文，提出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出现的oros i emgi jecen be faksalame ilibuha wehe bei和《黑龙江流域图》相似的内容。但是，此

其后，2006年，吴雪娟发表《清代满文舆图概述》一文，提出："康熙四十九年《黑龙江流域图》实际上应为康熙年间查报《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分省资料的成果"，主张应称之为《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图》。① 我们查阅清朝时期出版的《大清一统志》的任何一种版本都可以发现，黑龙江部分的舆图没有一种版本与《黑龙江流域图》有相似之处。所以，将《黑龙江流域图》更名为《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图》，还需要进一步商榷。另外，编纂《大清一统志》时，收集的相关第一手资料，并没有具体反映在后来刊刻的《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图内，这也说明后来刊刻的《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图部分，同《黑龙江流域图》完全不同（参见附录图1、图2）。

另外，2006年，孙喆发表《从两幅地图看18世纪初期清人对黑龙江流域的认识》② 一文，通过比较《黑龙江流域图》和康熙《皇舆全览图》两幅舆图，提出前一图"画法采用中国传统的彩绘"，并进一步指出"虽然图上标有'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字样，但并不能因此充分确定其为该图的绘制时间，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恐怕就是因全图皆为满文标示，唯有此处为汉字，不相协调"③。孙喆推测绘制年代"大概是在康熙三十一年至四十一年之间"。显

处记为jecen，有误，原图应为hešen，汉文译为"同俄罗斯分界设立石碑"（第66页）。档案中出现的不是hešen，而是jecen，这需要特别注意。此外，该文以《康熙〈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图〉考释》为题，在《中国地方志》上发表，内容完全相同。

① 吴雪娟：《清代满文舆图概述》，《满语研究》2006年第2期，第49～52页。

② 孙喆：《从两幅地图看18世纪初期清人对黑龙江流域的认识》，《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6期，第55～60页。在该文中，界碑满文转写为"oros emgi hešen be fakslame ilibuha wehe bei"（俄罗斯共立分界石碑），其中fakslame应为faksalame，缺一元音a。其汉文也未译出满文emgi（同，与）之意。汉译文"俄罗斯共立分界石碑"与满文迥然有别，应译为"同俄罗斯分界设立之石碑"。孙喆文章满文拉丁字母转写多处有误，譬如，erguna bira应为ergune bira，hūlon应为hūlun，omo tun应为omo ton，cicihar hoton应为cicigar hoton等，或许她所用的复印件不很清晰。

③ 孙喆：《从两幅地图看18世纪初期清人对黑龙江流域的认识》，《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6期，第56页。

然，这一推测误解了《黑龙江流域图》具体的绘制过程和绘制年代。

2009年，罗盛吉、吴雪娟发表《康熙〈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图〉考释》一文，亦再次主张："我们不应再使用《黑龙江流域图》这样的泛称，而应称呼其为康熙《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图》。"① 这篇文章利用了一些舆图资料与编纂《大清一统志》有关的满文档案资料。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乾隆九年版《大清一统志》中的黑龙江图，与《黑龙江流域图》相比，明显是两幅迥然相异的地图。在《黑龙江档》（康熙朝）中出现的与《黑龙江流域图》相关的满文档案，一般出现在编纂《大清一统志》的来往文书之中。但是，这些档案中并没有所谓"《康熙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图》"的图名。通读《黑龙江档》（康熙朝），我们从现存的满文档案中看不到同一名称的舆图，这也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证明这一问题，行之有效的一个办法是，解读所有舆图内的地名，然后和档案以及图像资料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我们就能发现档案当中出现的舆图内容与现在我们看到的《黑龙江流域图》在内容上的一致性。有关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专门进行讨论。

此外，雍正十二年（1734）十二月十六日的户部咨文内称"内阁一统志馆咨称：本馆奉钦命纂修一统志，已经十载之久，尚未成书。实缘外省志书未齐，无从稽考，是以旷日经时，虚靡币费，迄无就绪。"② 这份资料充分说明《大清一统志》到雍正十二年还处在编纂之中的事实。

据乾隆九年《大清一统志》卷30《黑龙江图》（第6b~7a页，原图参见附录图1，摹写图参见附录图3）的记载来看，无论从地名数量，还是从图形上，我们都可以明显看出两者迥然相异。通过满文档案内容，也可以知道，康熙年间调查的各种地理知识，

① 罗盛吉、吴雪娟：《康熙〈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图〉考释》，第67页。

② 户部咨文（满汉文），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登录号：108316，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阁大库藏。

后来并没有反映在《大清一统志》的黑龙江图中。所以，不能简单地推断《黑龙江流域图》就是康熙《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图》。我们只能说康熙时代编纂《大清一统志》之初，曾详细调查过黑龙江南北各地的山川河流，也曾绘制过相关的舆图资料。但是，当时在黑龙江地区进行调查后绘制的舆图内容，并没有编入《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图》之中。

这幅《黑龙江流域图》（参见附录图2、图3）的内容以黑龙江北岸为中心，记载了14条河流的源流，即阿儿吉河源（argi birai sekiyen）、戳儿河源（col birai sekiyen）、甘河源（g'an birai sekiyen）、呼马拉河源（hūmar birai sekiyen）、伊密河源（imi birai sekiyen）、锦衣里乌喇源流（jingkiri ulai sekiyen）、纳都尔河源（nadur birai sekiyen）、泞泥河源（ningni birai sekiyen）、牛满河源（nioman birai sekiyen）、嫩江源（non i ulai sekiyen）、诺民河源（numin birai sekiyen）、西尼克河源（sinike birai sekiyen）、孙河源（sun birai sekiyen）、雅尔河源（yal birai sekiyen）等。同《吉林九河图》相比，明显河源记载较多。《吉林九河图》中仅绘有精奇里河、西里木迪河、牛满河三条河源。且《吉林九河图》在黑龙江和松花江交汇处及其周围的河流附近有贴签，上面注有满文，且这几处地名的标注方式与其他直接写在图上的地名标注方式不同。由此可以看出，这些贴签上的地名另有故事。有满文档案资料证明这些贴签上的地名是康熙四十九年重新进行地理调查之后，补写在图上的地名。[①]

---

① 濮德培（Perdue，Peter C.）因袭吉田金一的推测，亦以为《吉林九河图》是清朝在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参照的地图，参见 Perdue，Peter C.，*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 171。孙喆甚至以为《尼布楚条约》谈判之际，清廷官员参加谈判所携带的地图就是郎谈的《吉林九河图》，这显然误解了《吉林九河图》的绘制年代和目的。参见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第108页。有关《吉林九河图》实际上并非在《尼布楚条约》谈判之际使用的问题，笔者将另外撰文进行详细讨论。

通过比较《黑龙江流域图》（154 处地名）和《吉林九河图》（215 处地名）的地名，发现《黑龙江流域图》中的 99 处地名，在《吉林九河图》上没有记载，这表明两张地图在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除了“河道图”的绘画技法上比较接近之外，《吉林九河图》记载的范围较广。其四至南为宁古塔城，北为勒纳河（liyana bira）[①]，西为鄂嫩河（onon bira），东为黑龙江东流入海处，描绘的内容基本依照当时宁古塔将军辖境为主的包括黑龙江地区以及勒纳河流域的广域的地图。但是，《黑龙江流域图》只是把视线集中在黑龙江流域的水源地区，描绘的地理范围相对较狭，描绘的内容也主要以黑龙江将军辖区为主。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吉林九河图》的北方绘有勒纳河，这是《黑龙江流域图》所没有的内容。有关中国舆图中出现勒纳河的问题，还没有成为中国地图发展史研究中的一个论题。这条河流出现在满文地图上，象征着中国舆图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图相互影响的一个重要时期，有关这些问题，笔者将另外撰文详细考究。

黑龙江，满文记为 sahaliyan ula，sahaliyan 意为黑色，ula 意为江，直译是黑江。同汉文的黑龙江相比，满文中并没有“龙”字。《黑龙江流域图》是一幅以描绘山川地名以及当时的八旗驻军基地为中心而绘制的彩色地图，利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技法绘制而成。其表现方式以单线四方形“□”表示规模较小的城（hoton），形制较大的呼马拉河（hūmar hoton，呼玛尔）以及将军、副都统驻扎的黑龙江城（sahaliyan ulai hoton）、古爱浑城（julgei aihūn hoton，瑷浑城、艾浑城、爱浑城）、乞察哈里城（cicigar hoton）[②] 被描绘成双线四方。图上下左右，分别用满文记 amargi（北）、juleri

① 满文 liyana bira，汉文作勒纳河或里雅那江等。

② cicigar hoton 又作 cicihar hoton，汉文又作齐齐哈尔城。

（南）、dergi（东）、wargi（西）[①] 等方位。满文地名、河流名称，请参见附录表2。通过表2也可以发现，《黑龙江流域图》的满文地名与《皇舆全览图》的满文地名在写法上略有不同。如dobkūr bira（多蒲哭里）在《皇舆全览图》中记为dobkor bira，ihe gokdo（衣克古克达）记为ike gūkda等。另外，不少河流名称在《皇舆全览图》中没有记载。详情参见附录表2、表3的相关地名。

《黑龙江流域图》共有154处地名，《皇舆全览图》中与其相同的地名只有55处，大部分地名在《皇舆全览图》中没有记载。与《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表3，略称为《战迹图》）相比，也只有56处地名相一致。所以，无法说明在绘制《皇舆全览图》和《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时，参照过《黑龙江流域图》的事实。

此外，《黑龙江流域图》还具体描绘了黑龙江北岸的雅克萨城（yaksa hoton）[②] 和古爱浑城，还有位于呼马拉河西南的呼马拉城、黑龙江南岸的黑龙江城、嫩江以东的乞察哈里城等城。爱浑城和黑龙江城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建造，[③] 乞察哈里城建于康

---

① 其他用满文标示方向的地图，譬如，《□画澳门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一国两制研究中心选编《澳门历史地图精选》）的上东下西、左北右南的图例。我们可以知道不同风格的标注方位的图样。

② 雅克萨城曾在崇德二年（1637）被固山额真叶克舒攻取。据《八旗通志初集》卷157叶克舒传（汉文，第3957页；满文，第13~18页）记载："叶克舒，满洲正红旗人，姓惠和氏，世居尼玛察地方……（崇德）二年七月，率师远征黑龙江（sahaliyan ula），击败博穆博古里（bombokur），攻取雅克萨城（yaksa hoton），进至萨哈尔（sahar）地方，俘获男子六百四十名，家口一千七百二十名，马一百五十六匹，牛一百四只。论功授牛录章京世职。"

③ 《八旗通志初集》卷24，营建志二，八旗驻防衙署营房（汉文，第455页；满文，第42~43页）载黑龙江驻防："康熙二十三年，黑龙江建造木城，周围一千三十尺，高一丈八尺，内外立木，中间填土，四面四楼门成造。本年驻防将军萨布苏建造衙署，大堂五间，司房十二间，二门一间，大门三间。二十九年，将军移驻墨尔根，其衙署遂为副都统衙署。雍正十三年，于城南二里旧仓地内，新修仓厫十二座，每座三间，共三十六间。"

熙三十一年（1692）。有关雅克萨城和爱浑城，我们将在下节进行叙述。

满文《黑龙江流域图》地名对照表，参见附录表2、表3。

三 《黑龙江流域图》绘制的时代背景

大清国与俄罗斯初次交锋是在顺治年间（1644～1661）。此时，俄罗斯已经东进西伯利亚，继而南下深入黑龙江周边地区。顺治四年，海色以佐领驻防宁古塔。[①] 到顺治九年（1652）大清国派遣宁古塔章京海色（haise，海塞），捕牲翼长希福（hife），率兵同俄罗斯在黑龙江地区交战。其结果是清军大败而归，宁古塔章京被海色处以极刑，翼长希福免职，仍留宁古塔。[②]

顺治十年（1653），清廷初战失利后，开始讨论是否在宁古塔以北设立副都统沙尔虎达（šarhūda）的问题。[③] 兵部尚书噶达洪等经过详细议论之后，决定任命副都统沙尔虎达驻守宁古塔地方，将兵力从最初的四百披甲，增兵到千人[④]。同年五月，升昂邦

另外，《钦定大清一统志》卷48：“齐齐哈尔城，曰奇察哈哩。城周五百丈，内外植木为坛，中实以土。门四周一千步有奇，环城有重濠，广一丈五尺。本嫩江南伯克伊庄地。本朝康熙三十一年建城，取嫩江北达呼哩等所居之庄为名。三十八年将军驻于此……爱浑城，在黑龙江城东北十二里，周九百四十步，门五。不知何国所筑，本朝康熙二十二年初修筑此城，设将军镇守。三十八年移镇齐齐哈尔城。”黑龙江城东南有札哈苏城、齐赫特城、额尔德尼城，西北有哈玛尔城、雅克萨城，俱未详里数。

① 《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序）卷14，职官，乌喇，宁古塔将军衙门海色，镶蓝旗人，顺治四年以佐领驻防。

② 《清世祖实录》卷68，顺治九年九月丙戌：“以驻防宁古塔章京海塞遣捕牲翼长希福等，率兵往黑龙江，与罗刹战，败绩。海塞伏诛，希福革去翼长，鞭一百，仍令留在宁古塔。”《清史稿》卷280，列传67，郎坦传内亦有同一内容，可一并参考。

③ 《兵科·顺治十年三月档子一册》，满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④ 《兵科·顺治十年三月档子一册》，满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章京[1]。顺治十年（1653），宁古塔设昂邦章京一员，副都统二员，佐领八员，骁骑校八员，开始加强驻防宁古塔地方[2]。顺治十一年（1654）十一月，清廷再次派遣固山额真明安达理前往征讨俄罗斯。[3] 顺治十一年的中俄之战，中国方面为中国与朝鲜的联合部队，当时，大清国派使者韩巨源到朝鲜要求派出援兵，清廷要求选鸟枪善手一百人，由会宁府听昂邦章京率领，前往征讨俄罗斯，希望顺治十一年三月初十日抵达宁古塔[4]。李朝孝宗皇帝听取领议政郑太和的建议，同意派出援军。派咸镜道兵马虞侯边岌为领队，带兵参加了同俄罗斯的战斗，最终联合清兵击破俄罗斯。[5] 这是朝鲜第一次联合清军征伐俄罗斯。

到顺治十五年（1658）七月，镇守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奏报击败俄罗斯，获其人口甲仗等物。[6] 此次战胜俄罗斯，也有朝鲜咸镜北道兵马虞侯申浏率精锐火器部队二百多人前来援助。顺治

---

① 满文 šarhūda，汉文沙尔虎达，又作沙尔虎大，为同音异译，均指一人。《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序）卷 14，职官，乌喇，宁古塔将军衙门，沙尔虎大，镶蓝旗人，顺治十年以昂邦章京驻防。

② 《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序）卷 14，职官，乌喇，宁古塔。

③ 《清世祖实录》卷 87，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丁丑命固山额真明安达理统率官属兵丁，往征罗刹于黑龙江。

④ 《李朝孝宗实录》卷 12，顺治 11 年（1654）2 月癸亥："清差韩巨源入京，上接见于便殿，大臣亦入侍。巨源进礼部咨，其咨曰：朝鲜选鸟枪善手一百人，由会宁府，听昂邦章率领，往征罗禅，以三月初十日到宁古塔云。巨源避席而拜，上慰谕之，仍赐茶。上曰：罗禅是何国也？巨源曰：宁古塔之傍，有别种，此乃罗禅也。巨源请受回咨，领议政郑太和曰：领将当以何官定送乎？巨源曰：以北道边将，守令差遣似便。巨源辞退，太和曰：我军渡江之后，彼若不给军食，则必有窘急之患。计其道路，赍粮以送为当矣。上曰：然。太和曰：北虞候边岌，可合领将矣。"

⑤ 《李朝孝宗实录》卷 13，顺治十一年（1654）七月己丑："北虞候边岌，与清兵击破罗禅，领兵还到宁古塔。"

⑥ 《清世祖实录》卷 119，顺治十五年七月庚戌："镇守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等疏报：击败罗刹兵，获其人口甲仗等物。命兵部察叙，以所俘获，分赐有功将士。"同一内容另见《八旗通志初集》卷 167，沙尔虎达传（汉文，第 4130 页；满文，第 29～34 页）："十五年，击败罗刹兵，获其人口甲仗等物（下略）。"

十六年正月，沙尔虎达病故，顺治皇帝谕吏部，特命沙尔虎达之子巴海代其父为昂邦章京前往宁古塔驻防。[①]

顺治十七年七月，镇守宁古塔总管巴海率兵到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处，歼击俄罗斯驻军，斩首六十余级，俘获妇女 47 口及大炮、甲胄等，并报告招抚费牙喀部落 15 村 120 余户的事情。[②] 康熙元年改宁古塔昂邦章京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首任将军为沙尔虎达之子巴海。[③] 自顺治时期以来，大清国和俄罗斯为了争夺黑龙江以北的贡纳貂皮等各族部众的权益，相继发生了多次冲突，黑龙江南北各地到沿海一带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从统治方法和经济利益方面来看，以较为松散、自由、自主管理的传统方式生活的各族部众，面临着如何抉择国家，或者如何被编入中俄两国的国家体制的问题。[④]

进入康熙时代（1662～1722）之后，大清国面临着内忧外患，国内相继出现内乱，为强行镇压地方叛乱势力，大清国中央政府集中兵力，首先全力平定了各地叛乱，特别是镇压整顿了中国南方各地发生的动荡局面。这一时期，也恰好是西北准噶尔帝国的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和喀尔喀蒙古开战的时期。

---

① 《八旗通志初集》卷 167，沙尔虎达传（汉文，第 4130 页；满文，第 29～34 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 138，顺治十七年七月丁丑："镇守宁古塔总管巴海等疏报：臣等率兵至萨哈连、松噶里两江合处，侦闻罗刹贼众在费牙喀部落西界。随同副都统尼哈里、海塔等领兵前进。至使犬地方，伏兵船于两岸，有贼艘奄至，伏发，贼即回遁，我兵追袭，贼弃舟登岸败走，斩首六十余级，淹死者甚众，获妇女四十七口，并火炮盔甲器械等物。招抚费牙喀部落一十五村，一百二十余户。捷闻，命所司察叙。"此外，费牙喀，又作费雅喀、飞牙喀，均为满文 fiyaka 之异译。

③ 《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序）卷 14，职官，乌喇，宁古塔将军衙门巴海，镶蓝旗人，顺治十六年以昂邦章京驻防，康熙元年升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

④ 顺治到康熙年间的中俄交涉过程，相关研究参见吉田金一《近代露清関係史》及《ロシアの東方進出とネルチンスク条約》、《ロシアと中国の東部国境をめぐる諸問題：ネルチンスク条約の研究》利用俄文、汉文等史料有较为详细的研究，也是目前较好的一部中俄交涉史的典范。

在平定南方各地的叛乱势力之后，康熙皇帝开始考虑如何利用西藏的宗教势力，牵制日益锋芒毕露的准噶尔势力。所以，首先把注意力转向了协调处理黑龙江流域的俄罗斯问题。

康熙二十二年大清国方面开始积极备战，从康熙二十一年开始修理战船，且派来投诚入旗的福建人林兴珠承当教习，训练水师。《康熙起居注》如此记载当年的备战情形：

> 又宁古塔将军巴海等移咨：康熙十六年大修过二十二双大船，应于来年小修，所需铁料等项，俱令来年二月内送至工部，议准事。上曰：宁古塔地方与罗刹甚近，战船关系紧要。要应遣堂官一员，带领良匠前往修理。前投诚入旗林兴珠等福建人，令着彼前往演习，庶有裨益。明珠等奏曰：诚如圣谕，谅林兴珠亦愿效力。上曰：伊等前去操演，事竣即回，岂有不愿此事。着户兵工三部会同详议具奏。[①]

① 汉文本《清圣祖起居注稿》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登录号：167019－001，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当年内阁大库藏。相应的满文本《清圣祖起居注稿》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一日至二十九日，登录号：167302－001：

geli ninggutai jiyanggiyūn bahai se, elhe/ taifin i juwan jakūci aniya ambarame dasataha, orin juwe/ amba cuwan be, jidere aniya buyarame dasatara de, baibure/ selei jergi jaka be, gemu ishun aniya juwe biyai dorgide/ benjibureo seme bithe benjihebe, weile jurgan ci yabubume/ gisurehe baita be dacilame wesimbuhede, / * dele hendume, ninggutai ba, loca de umesi hanci, afara/ cuwan holbobuhangge umesi oyonggo, [+ tang ni hafan emke tucibufi] mangga faksisa be/ [+ gamame genefi] dasatame weilebufi, [+ dahaha] lin hing ju i jergi gūsa de// dosimbuha fugiyan i niyalma be unggifi, urebume tacibuha de/ ambula tusa ombi, mingju sei wesimbuhengge, / * ejen i hese umesi inu, lin hing ju inu bahafi faššame/ yabuki sembidere, / * dele hendume, ese genefi urebume tacibufi, uthai/ jidere be dahame, cihakū doro bio, ere baita be/ boigon, cooha, weilere, ilan jurgan acafi kimcime gisurefi/ wesimbukini sehe, /。

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尽速将进军到黑龙江下游地区的俄罗斯情形上奏给康熙皇帝。康熙二十二年（1683），宁古塔将军巴海上奏俄罗斯侵入费牙喀地方，兵部议奏在爱浑和呼马拉进驻军队进行驻防的措施。但是，康熙皇帝较为谨慎："宁古塔地方距费牙喀三千余里，如何遣人不时侦探，用兵之道，全在为将者审势相机，酌量权变，未可遥度。该部并未详察情形，悬议将军、副都统驻扎地方，殊欠明晰。着将此本发回，再议具奏。"① 为此，宁古塔副都统瓦

① 《康熙起居注》（第2册），康熙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第961页。同一内容的汉文亦可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07，康熙二十二年二月乙未：宁古塔副都统瓦礼祜奏请往黑龙江、呼马尔地方效力。得旨：瓦礼祜奏请军前效力可嘉，但乌喇、宁古塔地方甚属紧要，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既领兵前往，瓦礼祜仍着驻守本处，严缉地方，加意哨探，抚绥军民，勤力田亩。

此外，萨布素在汉文官书档案中，又作"萨布苏"或"萨不苏"，汉文《八旗通志初集》卷145又记为samsu（萨穆素），均为满文sabsu之同音异译。因《八旗通志初集》卷145记载较为特殊，特在此处征引原文。萨布素传记在《八旗通志初集》卷145，名臣列传五，镶黄旗满洲世职大臣五，记为萨穆素，其内容如下：萨穆素，满洲镶黄旗人，其祖名宠纯。国初率三百丁壮来归，太祖高皇帝赐与金牌，寻以从征卒于军。萨穆素初任牛录章京，累有迁转。顺治九年，从固山额真噶达洪征鄂尔多斯，以奇喇秘奇河为界，得地五千余里，在事有功。康熙二十年，升为乌喇等处镇守将军。三十七年议叙前功，加授世职为一等阿达哈哈番。（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6册，第3762页）满文如下：samsu, kubuhe suwayan i manju gūsai niyalma, erei/ mafa cungcūn, / * gurun i sucungga fonde ilan tanggū haha be gaifi/ dahame jihe manggi, / * taidzu dergi hūwangdi aisin i pai šangnaha, amala cooha de/ genefi akū oho, samsu sucungga tušan nirui/ janggin bihe, siran siran i wesike forgošoho babi, / ijishūn dasan i uyuci aniya, gūsai ejen gadahūn be 38b//39a dahame ordos be dailanafi, kiramiki bira be jecen/ obufi, sunja minggan funcere ba na be badarambuha, / faššame yabuha seme, elhe taifin i orici aniya, / ulai jergi babe seremšeme tuwakiyara jiyanggiyūn de/ wesike, gūsin nadaci aniya nenehe gung be ilgame/ gisurefi, jalan sirara uju jergi adaha hafan/ obuha; /（第38b~39a页）。

汉文记载的萨布素与萨穆素，判若二人。从其记载康熙二十年，萨穆素升为乌喇等处镇守将军来看，显然是康熙二十二年之误。康熙二十二年底，萨布素才从宁古塔副都统，被任命为镇守爱浑等处将军。从内容来看，显然萨穆素就是萨布素，两者指一人。萨布苏曾从康熙十七年起任宁古塔副都统，参见《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序），卷114，职官，乌喇、宁古塔将军衙门，副都统，萨布苏，镶红旗人，康熙十七年任。

里虎自请前往爱浑、呼马尔地方效力。康熙皇帝说："瓦里虎奏请军前效力，可嘉。但乌喇、宁古塔地方甚属紧要。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苏既而领兵前往，瓦里虎仍着驻守本处，严缉地方，加意哨探，抚绥军民，勤力田亩。可另拟票签来看。"①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兵部提案设置镇守爱浑等处将军，时任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被提升为镇守爱浑等处将军。② 据《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记载，康熙二十二年左右，清军已经抵达精奇里江水源地区，降服了当时认为是俄罗斯属民的罗刹人（loca 或 looca）。所以，大清国方面已有比较了解精奇里江水源周边地区地理环境的人员。③ 如此，治理黑龙江流域当地各族民众和防范俄罗斯的重任，自然而然也就落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肩上。

萨布素，宁古塔人，18 岁时，任镇守宁古塔等处昂邦章京沙尔虎达衙门的笔帖式，其后八年之内，积极处理宁古塔地方大小事宜，勤于值勤，奋发向上。顺治十八年，任命为骁骑校。康熙三年，宁古塔将军巴海率军出征俄罗斯，五月初二日，在赫哲之喜拉苏米噶善（hilasumi gašan）地方，列营同俄罗斯船兵对阵，萨布素首当其冲，酣战多时，俘获众多俄罗斯人。随后，萨布素前往收服未降之费牙喀人，首次降服东海沿岸居住之苏木宁噶善（sumini

① 《康熙起居注》（第 2 册），康熙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第 961 页。

② 《康熙起居注》（第 2 册），康熙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第 1090 页。大学士、学士随捧折本面奏请旨，为兵部题设镇守爱浑等处将军，开列副都统席忒库等职名。上顾大学士等曰：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为人甚优，以补此缺何如。明珠奏曰：萨布素甚优，与将军职任相宜。上命以萨布素补授将军。又题设爱珲等处左翼副都统，开列侍郎额星格等职名。

③ 《黑龙江档》1 -4《康熙二十四年七月行文抄档》十月十三日牛录章京钮莫顺（niomošon）送来文书：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咨文兵部。正蓝旗佐领哦罗顺因年老，请求退职。康熙二十二年，将军萨布苏领兵，降服黑龙江罗刹时，抵达精奇里江源流，降服罗刹。为此哦罗顺亲自领兵前往，抓来一罗刹。在官三十四年，从军四十多年。《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为全宗名称，本文略称《黑龙江档》，其后数字表示胶片编号，其次为册档名称，汉译文均由笔者翻译，以下同，不另注。

gašan）等地 90 户费牙喀人。将军巴海及副都统尼喀里大加赞赏，预先寄信给兵部，言称若今后牛录章京出缺，不必自京城派人补缺，应将萨布苏充任牛录章京。后被引见任命为牛录章京。康熙九年，升任协领。康熙十八年，到京城被康熙皇帝召见，升为副都统。康熙二十二年，萨布素率师出征俄罗斯，首次溯上黑龙江，将前往占领自雅克萨到亨滚等地的俄罗斯八艘船舰，合围在特尔德尼城（teldeni hoton），宣示圣恩，全部抓获之后，送至京师。大军抵达厄苏里地，筑土城越冬之际，派鄂伦春朱儿空格（jurkungge）、巴哈尔达（bahalda）等人，招抚各地鄂伦春人。萨布素得知，在西里母的河①居住的俄罗斯人闻知大军抵黑龙江，驻守在额苏里等地，准备返回无底城（udi hoton）。若派兵征讨，路途遥远，且无足够的马匹，随即吩咐西里母的河附近之鄂伦春族长吉尔蒙阿（girmungga）与立克顶格（likdingga），派人在俄罗斯返回之路进行伏击，预先埋伏在狭路，尽行射杀俄罗斯返回之众。为此大赏鄂伦春族长吉尔蒙阿与立克顶格。同年，萨布素被任命为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康熙二十三年，派章京尽行降服了居住在精奇里江的俄罗斯人，并将他们全部送到京城。②

康熙二十三年八月，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又派人前往亨滚河周边地区降服了罗刹人和奇勒尔人。实际上，同年五月十五日，清军抵达亨滚河口，通过奇勒尔人探知了罗刹的行踪。③ 同年十一月开始议论攻略雅克萨的问题，决意从驻扎在黑龙江的 1500 人之中挑选

---

① silimdi bira，汉文又作西里木迪河。

②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2-9《雍正十二年行文档》（hūwaliyasun tob i juwan juweci aniya yabubuha dangse）八月十九日驿丁陈子贵驰驿送文。《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为档案全宗名称，2-9 为档案胶片号码，其后为册档名称。

③ 《黑龙江档》1-1《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行文抄档》八月十八日，镶红旗闲散章京钮莫顺（niomošon）持来文书。楠木贤道率先公布了这件档案内容的罗马字转写和日译文，参见楠木贤道《黑龍江将軍衙門档案からみた康熙 23 年の露清関係》，《歷史人類》24，1996，第 33～35、54～56 页，〔史料 6〕。

300 人守城。翌年四月，1700 人通过水、陆两路齐进雅克萨城。[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清军水陆并进，主动出击雅克萨城，烧毁了从额尔古纳河[②]到雅克萨城之间的俄罗斯房舍（参见附录图 4、图 5）。当时，大清国为此次作战挑选了国内最精锐的部队，除从遥远的台湾带来的降服人员之外，还号令直隶、山东、河南、山西、河南巡抚，挑选出各省精熟于火器技艺的士兵 250 名，健壮有才的游击以上的官员各一名，守备以下官员四名，命令他们准备骑乘，携带火器前往京城齐集，操练阵式，准备迎战。也就是说，准备在黑龙江周边地区调集当时最强的火器部队。

据康熙二十年大清国调查记载："观其城，以木筑栅栏，宽十五余庹，长二十余，四周筑有枪眼，城南门留一庹余空地，于一庹处钉有木桩，再至一庹处有两排木栏。有男丁三百余人。"[③] 另外，据康熙二十七年七月十四日的奏折，乌木布尔泰（umburtai）等人于同年三月二十四日前来报告雅克萨情形："当时登上雅克萨城南对岸之高山察看，见雅克萨木城重新修筑。城之东门、北门之上盖有房屋。除城东之旧木塔外，城西又新建一木塔。城南之旧屋仍在，城北除原有三座房屋外，又增房屋四座。城南辟有旷野，以木为栏，马牛皆圈其内。间或有一二人穿行于牲畜之中。"[④] 从图 4 可以看出，大清国水军横渡黑龙江，雅克萨城周边被八旗军队全面包围的攻略阵势。从中可以了解到该图描绘的

① 《黑龙江档》1-1《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行文抄档》十二月二十九日牛录章京斡色（ose）送来文书之言。首次将此档案满文罗马字转写和日译文介绍的论文，参见楠木贤道《黒龍江将軍衙門档案からみた康熙 23 年の露清関係》，《歴史人類》24，1996，第 47~52、69~74 页，〔史料 27〕。

② 满文作 ergune bira，汉文又作厄勒枯挪河、额勒姑纳、厄里古纳河等，均为满文 ergune bira 之异译。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 1 编上册，中华书局，1981，第 90 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 1 编上册，第 97 页。

是康熙二十三年以后，清朝与俄罗斯开战前的剑拔弩张的紧迫情形。①

此外，图 5《清军包围雅克萨要塞图》（1686 ~ 1687）与图 4 相得益彰，大清国与俄罗斯在黑龙江流域的冲突，也深深吸引了欧洲探寻欧亚东方的目光。②

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之后，康熙二十八年，大清国和俄罗斯最终在尼布楚进行了确定国境的谈判，其结果是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本文讨论的《黑龙江流域图》描绘了中俄议定的格尔必齐河东岸的国境碑位置，所以，可以说是一幅重要的地图。但是，这个国境碑是如何出现在舆图资料之上的呢？

四 从满文史料所见的历史事实

（一）国境碑的幻影

《黑龙江流域图》的西北方面的格尔必齐河与黑龙江交汇处，格尔必齐河东岸绘有石碑形状。石碑上用满文注有“oros emgi hešen be/ faksalame ilibuha/ wehe bei（同俄罗斯分界设立之石碑）”

---

①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2. 1686 - 1691 . М. Наука. 1972, стр. 676 - 677. Китайский рисунок, изображающий осаду Албазина.

② Nicolaes Witsen, *Noord en oost Tartarye*, Amsterdam, 1692. p. 662. 图内说明均由笔者译自荷兰文，原图数字较小，不易辨识，为了便于对照，笔者依原图重加了数字。该书全称如下：Noord en Oost Tartarye ofte bondig ontwerp van eenige dier landen en volken, welke voormaels bekent zijn geweest. Beneffens verscheide tot noch toe onbekende, en meest noolt voorheen beschreve Tartersche en nabuurige gewesten, landstreeken, steden, rivieren, en plaetzen, in de noorder en oosterlykste gedeelten van Asia en Europa。

（参见附录图6）。[①] 实际上围绕这个石碑是否存在的问题，中俄两国的研究人员从最初开始研究的时候，就充满了疑问，这也是多年来中外各国学者议论不休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大清国时期到今天为止，各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②] 最近的研究主要有吉田金一和

① 对此句满文各家译文略有不同。孙喆汉译为“俄罗斯共立分界石碑”，参见孙喆《从两幅地图看18世纪初期清人对黑龙江流域的认识》，第58页。孙喆论文将“faksalame”记为“fakslame”有误，原图应为“faksalame”。

② 中国研究中俄国界的代表作有翁文灏《中俄国界史地考》，《地学杂志》第1～2期，1928，第83～120页。中苏关系恶化之后陆续出版的论作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四卷，1978～1990；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张维华、孙西：《清前期中俄关系》；李齐芳：《中俄关系史》。从刘远图到张维华、孙西的研究都没有利用第一手档案资料，内容上多属重复前人之说。中国台湾出版的李齐芳《中俄关系史》，虽然是从17世纪叙述到20世纪初期的通史性论著，也大量参考了前人的研究，但是也没有利用外交档案等第一手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此外，吉林与俄罗斯分界问题，可参见《吉林通志》（光绪十七年序）卷55，武备志6，分界。

日本方面，早期论及《尼布楚条约》的代表作有增田忠雄《ネルチンスク条約の国境に就て》，《史林》26－1，1941（该论文实际上1940年写成，1941年发表），第52～68页。该文利用《清圣祖实录》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的记载，指出七月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到十二月之间，由中方设立界碑。另外，增田忠雄著、満鐵弘報課編《満洲国境問題》，第35～42页，也论及《尼布楚条约》界碑问题，指出当年十二月在格尔必齐河口东岸设立界碑。但是，增田忠雄对康维尔地图在大格尔必齐河口绘有界碑，是否就是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设立的位置，持有疑问。此外，还可以参见入江啓四郎《ネルチンスク条約の研究》，英修道、入江啓四郎：《中国をめぐる国境紛争》，野見山温：《露清外交の研究》，吉田金一：《ロシアの東方進出とネルチンスク条約》、《ロシアと中国の東部国境をめぐる諸問題：ネルチンスク条約の研究》。对吉田金一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的综述，可参见柳澤明《吉田金一先生の業績と露清関係史研究の現状》，《内陸アジア史研究》18，2003，第79～86页。

新近通过多种语言的第一手档案资料进行研究的专论，可参见涩谷浩一的一系列研究，譬如，《露清関係とローレンツ.ランゲ——キャフタ条約締結に向けて》，《東洋学報》，72（3/4），1991，第199～234页；《中国第一歴史档案館所蔵“康熙朝満文硃批奏摺”中の露清関係史史料について》，《北大史学》，33，1993，第52～61页；《キャフタ条約以前のロシアの北京貿易——清側の受入れ体制を中心にして》，《東洋学報》，75（3/4），1994，第261～293页；《モスクワの露清関係史史料について》，《満族研究通讯》（東洋文庫清代史研究室満族史研究会），8，1999，第60～70页；《キャフタ条約締結過程の研究：国境貿易条項の成立と清側ロシア文条約》，《茨城大学人文学部紀要》（人

松浦茂的文章。

吉田金一（1984）通过比较《黑龙江流域图》与杜赫德《中

文学科論集)，Vol. 40，2003，第 57 ~ 75 页；《キャフタ条約の文書通信に関する条項について：条約締結後の清側によるロシア側書簡受領拒否問題をめぐって》，《茨城大学人文学部紀要》（人文学科論集），Vol. 45，2006，第 33 ~ 56 页；《ウンコフスキー使節団と一七二〇年代前半におけるジューン＝ガル、ロシア、清の相互関係》，《茨城大学人文学部紀要》（人文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科論集），Vol. 2，2007，第 107 ~ 128 页；《康熙年間の清のトルグート遣使とロシア》，《史朋》（北海道大学東洋史談話会），39，2007，第 69 ~ 87 页；等等。

此外，还有柳澤明的一系列论作，譬如，《キャフタ条約への道程——清の通商停止政策とイズマイロフ使節団》，《東洋学報》，69（1/2），1988，第158 ~ 133 页；《キャフタ条約以前の外モンゴル—ロシア国境地帯》，《東方学》，77，1989，第 70 ~ 84 页；《"理藩院尚書アリンガの書簡"と，ジュンガル問題をめぐる清朝の対ロシア政策》，《早稲田大学教育学部学術研究》地理学・歴史学・社会科学編（38），1989，第 99 ~ 109 页；《中国第一歴史档案館所蔵のロシア関係満文档案について》，《满族史研究通讯》，10，2001，第 38 ~ 57 页；《1768 年の"キャフタ條約追加條項"をめぐる清とロシアの交渉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62（3），2003，第 600 ~ 568 页；等等，可资参考。涩谷浩一、柳泽明等学者的研究，展示了新一代日本学者开阔的视野和利用多种语言进行综合研究的潜力。新近引人注目的研究，参见森永貴子《ロシアの拡大と毛皮交易：16 ~ 19 世紀シベリア・北太平洋の商人世界》。该著作大量利用俄罗斯国立伊尔库斯科州古文书馆（伊尔库茨克）、俄罗斯国立古文书馆（莫斯科）、俄罗斯国立历史古文书馆（圣彼得堡）等地第一手古文书资料和俄罗斯的新旧研究论作，描述从日本和俄罗斯邂逅相遇到俄罗斯征服西伯利亚以及俄罗斯在北太平洋地区的毛皮贸易、俄罗斯、美国设立公司等跨国贸易问题。

其他 20 世纪以后的欧美研究可参见 S. C. M. Paine. *Imperial Rivals: China, Russia, and their Disputed Frontier.* New York & London: M. E. Sharpe, 1996。俄罗斯学者的研究参见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Империя Цин и Рус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XVII веке.* Хабаровск, 1987.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 Россия во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уро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 1993. В. С. Мясников.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400 лет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Lewinson（N. Y.）etc., 2001。以上论著中，特别是 В. С. Мясников（2001）的最新著作，强调有关尼布楚条约是国境条约，是基于不明确的地理知识，作为国境分界指出的分水岭，事实上是无法特定具体的山岭的（同书，第 127 页）。柳澤明也指出这个问题。参见柳澤明《吉田金一先生の業績と露清関係史研究の現状》，《内陸アジア研究》，18，2003，第 79 ~ 86 页。В. С. Мясников（2001）阐述的有关边境问题，将另外撰文介绍，在此不赘述。

华帝国志》[①]、《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上明确记载格尔必齐河界碑的事例，断定康熙四十九年（1710）界碑确实存在。

文末附录的图6《黑龙江流域图》中绘示的界碑图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幅舆图，格尔必齐河东岸绘有界碑图，且有档案资料可以佐证。图左上为 gerbici bira（格尔必齐河），右中为 jolokci bira（卓罗克其河），右上为 amba gerbici bira（昂巴哥里比其河，大格尔必齐河）。右下为 ergune bira（额尔古纳河）。但是，通过后来搜寻界碑却一直无法找到的调查报告来看，我们不得不怀疑建造界碑的可能性。期待将来全面解读雍正朝、乾隆朝时期的相关满文档案。如何客观地阐释历史图像以及文献资料的真实性，这也是赋予历史工作者继续探索的一个重大课题。

俄文《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史料集》（第2卷）卷首，由 V. S. Myasnikov 执笔的《满洲人侵入黑龙江（阿穆尔河）及1689年尼布楚条约》为题的解说中，总结出八个问题，其中，第五个问题如下：

> 额尔古纳（Аргуни）河口附近设立的俄文、中文、蒙古文、满文、拉丁文条约刻制的石碑，与其说是界标，不如说是纪念碑。但是，条约文字并不完备。当时的清政府及其继承者也都在单方面对条约进行解释之外，以侵犯条约为目的，正如文字显然是走向伪造，删除了与未确定的无底河沿岸的土地相关的条约项目。除此之外，满洲人还将国境擅自移动到200公里以外的位于西方的小格尔必

---

① Jean-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nrichie des cartes générales et particulieres de ces pays, de la carte générale et des cartes particulieres du Thibet, & de la Corée; & ornée d'un grand nombre de figures & de vignettes gravées en tailledouce.*

齐河。[①]

对此，吉田金一进行了批评论证，否定了他的观点。[②] 显然，我们讨论的《黑龙江流域图》在额尔古纳河口附近并没有绘制石碑形制。

松浦茂利用《吉林九河图》指出："有关国境碑，郎谈的地图上不见任何记述，但是，康熙四十九年当时石碑确实在格尔必齐河东岸。"[③] 松浦茂的证据大概是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黑龙江将军咨文兵部文书。这个文书中确实如此写道："格尔必齐河在（齐齐哈尔）城北二千五百里之外，源出西北兴安向东南流入黑龙江。与俄罗斯分界设立的石碑在城之西北五百里之外，格尔必齐河河口东岸。"但是，笔者认为这一报告内容很值得怀疑。松浦茂对吉田金一"郎谈设立的国境碑是假设的东西，清朝后来才重新设立"这一见解，提出"这个说法没有任何根据，我认为三个地方的国境碑原来都在远方，清朝并没有将其重新设立"的意见。[④] 但

---

① В. С. Мясников,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2. 1686 – 1691. стр. 53 – 55. 也有人针对格尔必齐河位置的问题指出：在清代官书与官绘地图中，都记载有大小格尔必齐河两条河，格尔必齐河应在绰尔河以东不远处。清代《康熙皇舆全图》与乾隆《内府舆图》（《十三排图》）等图籍向以"昂巴格尔必齐河"（大格尔必齐河，即今尼布楚东 30 余公里的库恩卡河）为中俄分界水，河口标注有分界石碑。但此河在绰尔纳河以西 120 余公里，方位与里距不符条约文字，又与索额图奏稿及果罗文报告中所谈及格尔必齐河的方位不符，又无别的有力资料证明其为正确，故亦不取。参见谭其骧主编，张锡彤、王钟翰、贾敬颜、郭毅生、陈连开等著《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　东北卷》2，黑龙江诸河川定位说明简表，格尔必齐河，第 361 页。

② 吉田金一：《ロシアと中国の東部国境をめぐる諸問題：ネルチンスク条約の研究》第 12 ~ 13 页及第 33 ~ 44 页有详细的论述，否定了米勒的观点。

③ 松浦茂：《ネルチンスク条約直後清朝のアムール河左岸調査》，《史林》第 80 卷第 5 号，1997，第 101 页。后收入《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第 30 页。

④ 此注解内容在松浦茂《ネルチンスク条約直後清朝のアムール河左岸調査》（《史林》第 80 卷第 5 号，1997 年）内不见。在后来出版的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第 1 章，注解（30）内增补了这一注解。

是，两人都没有提出更具体的证据。

此外，孙喆以《尼布楚条约》所言和工部咨文内的碑文内容不同为由，得出“该图所绘界碑碑文并非真实的碑文，只可看作是绘图者对石碑的说明文字”的结论；并指出“这是标有中俄界碑的第一幅中国地图”；最后总结为“在康熙朝，中俄之间的界碑只有一块。应为《皇舆全览图》实测后绘制而成，没有存在两块界碑而不绘出之理”。[①] 这一结论也不免过于武断草率。

我们先来看《黑龙江流域图》上石碑满文与档案中出现的较为微妙的不同之处。

《黑龙江流域图》石碑满文在语法上有些不自然的部分，首先我们怀疑有遗漏的字句。按上下文意，满文应为 oros i emgi hešen be/ faksalame ilibuha/ wehe bei，句中应补加格助词 i，方可符合满文文意。这一点从满文档案也可以得到证明。譬如在康熙四十九年的档案中，有以下几个例证：

(1) oros i emgi jecen be faksalame ilibuha wehe bei ai gebungge bade // bisire；(同俄罗斯分界设立之石碑在何处？)[②]

(2) ere bithe isinahai，henggun，gerbici/ bira de oros i emgi jecen be faksalame ilibuha wehe i bei de/ isibume；(此文收到之后，抵恒滚、格尔必齐河同俄罗斯分界设立之石碑处。)[③]

---

① 孙喆：《从两幅地图看18世纪初期清人对黑龙江流域的认识》，第58～59页。

② 《黑龙江档》16－24《康熙四十九年正月黑龙江副都统、墨尔根城协领、索伦总管、驿站官咨文抄档》康熙四十九年一月初七日领催阿尔都哈（alduha）送文。

③ 《黑龙江档》16－24《康熙四十九年正月黑龙江副都统、墨尔根城协领、索伦总管、驿站官咨文抄档》康熙四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牛录章京阿里雅（ariya）送文。

(3) gerbici bira i sekiyen de oros i emgi jecen be faksalame ilibuha/ wehe i bei, gerbici birai ya ergi dalin de bisire; (在格尔必齐河源，同俄罗斯分界设立之石碑，在格尔必齐河之哪一岸边?)①

(4) gerbici bira i sekiyen de oros i emgi jecen be faksalame ilibuha/ wehe i bei bi sehebi, ere wehe bei cicigar hoton i ya ergi udu ba i/ dubede bisire, gerbici bira ya ergi dalin de bisire be getukeleme/ baicafi nirugan de nonggime nirufi benjiki; (在格尔必齐河源，有同俄罗斯分界设立之石碑。此石碑自齐齐哈尔城之何方几里之外? 在格尔必齐河之哪一岸边? 将此查清，增补绘入图中送来。)②

(5) oros i emgi jecen be faksalame ilibuha/ wehe bei hoton i wargi amargi juwe minggan sunja tangū ba i dubede bi, / gerbici birai anggai dergi dalin de bi; (同俄罗斯分界设立之石碑，在城西北两千五百里之外，位于格尔必齐河东岸。)③

非常明显，满文档案中在 oros 之后，均有属格助词 i 字。可以断言，《黑龙江流域图》中的界碑满文，略去了理解语意上至关重要的一个属格助词。这也是讨论这幅舆图的文章中，经常忽略的一个问题。

---

① 《黑龙江档》16-24《康熙四十九年正月黑龙江副都统、墨尔根城协领、索伦总管、驿站官咨文抄档》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初二日笔帖式王四达（wang sy da）送文。

② 《黑龙江档》16-22《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吏、兵部、理藩院、盛京兵部咨文抄档》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笔帖式散珠（sanju）送文。

③ 《黑龙江档》16-22《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吏、兵部、理藩院、盛京兵部咨文抄档》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笔帖式散珠（sanju）送文。

事实上，到了乾隆时代，有关这个石碑有非常详细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为我们思考界碑是否存在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史料基础。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初三日的奏文为我们提供了搜寻界碑石材的详细报告。我们不妨将全文译成汉文，看看具体内容。

> 工部咨行黑龙江将军，为请旨事。本部为此事上奏，理藩院咨文内称：议政王等议奏，现定边界（hešen）在厄勒枯挪（即额尔古纳）（河）口（eruhune i angga）、哥里比其（即格尔必齐）河口立碑石（bei wehe），除制以满洲文（manju bithe）、俄罗斯文（oros bithe）、拉丁〔+国〕文（latino〔+gurun i〕bithe）外，亦应制以蒙古（monggo）、汉文（nikan bithe），将此交付工部制碑（bei weilebuki）。等语。翰林院（bithei yamun）作五种文字之文，咨〔+文〕前往去取规制。现自翰林院已送来拟写之碑文及规制。臣等查得：翰林院送来在厄勒枯挪河口、哥里比其河口立碑时，碑阳勒以满洲、蒙古、尼勘（汉文）文，碑阴勒俄罗斯文、拉丁国文。文字规制，碑额按准子（sun dzi），则需高八尺，宽三尺一寸，厚八寸之石两块。按准子需两块高两尺二寸，宽三尺六寸，厚一尺三寸之石。若从此处（京城）制作带去，唯恐道路遥远，难以运抵。故将此咨行盛京、宁古塔、黑龙江将军等，令其查何处有如此适合尺寸之石。此外，亦令由两路前往厄勒枯挪、哥里比其视察立界大臣等，查看在厄勒枯挪、哥里比其一带，是否有适合该尺寸之石。又于此两处周边远近之山，查看是否有适于镌刻之处，将此查报前来之际，再行议奏。等因。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初三日，缮折具题。是日，奉旨：依议。钦此。为此咨行知照。将此遵旨查照

依行。三月初五日。[①]

说明在额尔古纳河口与格尔必齐河口分别设立碑石，也就是共计两块碑石。黑龙江将军收到工部的来文之后，为了设立高达256厘米的石碑，开始令副都统等前往探察石材。同年四月二十四日，派墨尔根驿丁马二哥（ma elge）给副都统送去如下文书：

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萨布素咨行副都统等，工部来文内称（此处引用了工部上引文书内容，从略）钦遵。阅此书内情，咨文令其查看黑龙江地区是否有适合制作碑石（bei wehe）尺寸之石（材）。[②]

通过这个内容，我们也知道黑龙江将军委派副都统等在黑龙江周边地区探寻石材的事实。对此，副都统温岱、纳秦于五月二十日向黑龙江将军报告探寻石材的结果：

镇守黑龙江等处副都统温岱、纳秦咨行将军，为此事

① 《黑龙江档》2-3《康熙二十九年正月户、礼、工、理藩院、盛京户、工部来文抄档》四月十五日依尔喀（ilka）驿丁赫孙（hesun）送来文书。原文书日期为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五日。满文原件影印及转写参见附录。

除此之外，《黑龙江档》2-4《自康熙二十九年正月户部、礼部、工部、理藩院、盛京户部、工部等衙门咨文档》亦有同一内容的萨布素来文抄录的工部咨文内容，日期为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十九日。另外，据笔者调查，《俄罗斯藏黑龙江抄档》（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亦有同一内容的满文，可一并参考。从《黑龙江档》满文译成汉文的有关碑文以及碑石的一件史料，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上册，第125页。其中的汉译文，同笔者所译略有不同。需要指出的是，吉田金一《ロシアの東方進出とネルチンスク条約》也注意到了《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内的这份重要资料。

② 《黑龙江档》1-14《康熙二十九年正月至四月寄给奉天、宁古塔将军、索伦总管、驿站官等行文抄档》四月二十四日遣墨尔根驿丁马二哥（ma elge）寄送文书。

宜。将军咨文内称（此处引用了上引工部来文，从略——笔者注）阅此书内情，咨文查看黑龙江地区是否有适合制作碑石（bei wehe）尺寸之石材。等语。收到将军咨文后，即遣汉军五品章京朱斯（ju sy）至屋鲁苏木丹（ulusu mudan）、牛满（nioman）等处，查看适合制作碑石尺寸之石材。朱斯回来报称：前往查看乌鲁斯穆丹、牛满等处，无适合制作碑石之石材。为此行文知照。五月二十日。[①]

接到这个报告之后，同年七月，将军萨布素咨文工部回覆如下：

（档案起首引用原工部来文，从略——笔者注）收到之后，前往探寻适合制作碑石尺寸之石材，沿嫩江方面曾派遣由领催麦鲁（mailu），努敏河方面派云骑尉章京阚珠（kanju），甘河方面派云骑尉章京波尔和（berhe），旺阿山（wangga alin）方面派云骑尉章京甄特依（jentei）等人，前往探寻有石材之处。麦鲁、阚珠、波尔和、甄特依等回来报告：我等前往探寻之处，山崖（等处）尽为不良碎石，并无适合制碑之石材。等语。副都统温岱等来文告称：为探寻适合制碑尺寸之石材，派遣汉军五品章京朱斯前往乌鲁斯穆丹、牛满探寻。朱斯前来报告：至乌鲁斯穆丹、牛满之处，并无适于制碑之石材。等语。嫩江及黑龙江周围亦派人寻查，（报称）并无适合制作碑石之石材。为此知照。依里布抄写。[②]

---

① 《黑龙江档》1－13《康熙二十九年五月奉天、宁古塔将军、黑龙江副都统、索伦总管、驿站官来文抄档》五月二十一日廓罗尔（korol）驿丁赵儿（joo el）送来文书。

② 《黑龙江档》2－4《康熙二十九年正月户、礼、工部、理藩院、盛京户、工部等衙门行文抄档》七月十九日正黄旗汉军二哥（elge）牛录披甲五十八（usiba）持送文书。

如此，康熙二十九年七月，黑龙江将军咨文工部告称黑龙江地区并没有适合制作碑石的材料。除此之外，还有一份资料证实当时未能立碑的事实。康熙三十年十二月的档案记载，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的国境相接之地设立界碑的事情，因喀尔喀蒙古之事未能确定，暂停立碑。其内容也寄文通知了俄罗斯在尼布楚的官员。[①] 从以上征引的资料来看，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到康熙三十年十二月期间，并没有设立国境碑，这一点可以说非常明确。[②] 所以，后来编纂的《八旗通志初集》卷153，郎谈传记载的康熙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行抵格尔必齐河口设立石牌的事情，明显与我们上引的资料有矛盾。[③] 并且，吉田金一（1980）和松浦茂（1997）均以《八旗通志初集》的汉文版为据，未能深究其中存在的问题，这也是导致了后来的研究人员信从其说，坚信设立石碑（石牌）的一个原因。[④] 我们从《黑龙江档》的记载可以断言，因缺乏石材和外在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上册，第141～142页，索额图等为严禁俄人至喀尔喀行猎并暂停立界碑事致尼布楚长官咨文，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初一日："（上略）再，尔我曾约定即刻在于我等业经划定之格尔毕齐、额尔古纳等交界处立碑一事，现因喀尔喀事宜未定，应予暂停。俟喀尔喀事宜议定后，再行立碑。为此咨行。"

② 宁古塔将军巴海巡视兔乎鲁河流域后绘制的舆图（今以题名《乌喇等处地方图》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上也看不到界碑形制，参见拙文《满文〈乌喇等处地方图〉考》，《故宫学术季刊》第26卷第4期，2009年6月，第1～74页。

③ 最早论究石碑的是何秋涛《北徼界碑考》和曹廷杰《分界碑文考》及《界碑地考》。但是，他们都没有征引康熙二十九年七月没有找到石材的满文资料。详情参见《朔方备乘》卷8，考2和《曹廷杰集》（丛佩远、赵鸣岐编），第50～51、55～58页。日本学者今西春秋《校注异域录》第164～165页注解（214）中记载"现在，此碑同格尔必齐河之碑，其所在不明"。

④ 《八旗通志初集》卷153郎谈传（langtan）（满文版，日本东洋文库藏），原文如下：orin uyuci aniya ilan biyade，/ * hese be dahame meiren i janggin joosan i emgi erguna birai angga de/ hešen i pai ilibume genehe；sunja biyai tofohon de，mergen/ hoton deri hinggan dabagan be dabafi tuwaci，juwan/ udu giyan loca i boo bi usin de jalu jeku/ tarihabi，ceni da basili be hūlame tucibufi turgun be/ fonjici，jaburengge，duleke aniya nibcu hoton i da，/ membe amasi bedere seme doron gidaha bithe benjihe/ mende boo gurire hūsun akū ofi，tuttu bucere be/ funtume，ubade majige usin be tarifi，use bargiyara be/ kicembi，ambasa gosime oncodoreo seme baire de，

的喀尔喀蒙古问题的困扰，康熙二十九年到三十年确实未能立碑。

---

langtan, ceni boo be efulefi, hūda bufi, jeku be hadufi gama/ sehe manggi, loca se urgunjeme hengkilefi, dabagan be/ dabafi genehe; orin emu de, erguna de isinafi, birai/ anggai girin i wehe de foloho manju, nikan, oros, /monggo, lidino sunja hacin i hergen i pai be ilibufi/ amasi jihe；汉文版《八旗通志初集》卷153，名臣列传13，正白旗满洲世职大臣二，郎谈传，“（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奉旨同副都统诏三往厄里谷纳河口立交界牌。五月十五日，经墨尔根城越兴安岭，见罗刹犹有屋十余间，田禾满地。因呼其酋长巴什里问其故，对曰：去岁尼布抽城长有印信来，令我等回去，因我等移家力量不足，故冒死于此地少种田禾，意为收种之计，并乞大人怜宥。郎谈使毁其屋，给其资，允其刈禾载归。罗刹等悦拜，度岭而去。二十一日，至厄里谷纳，立牌于河口石壁上，镌清、汉、鄂罗斯、蒙古、里的诺五样字，毕而还。”

显然，这里说的并非“碑”，而是“牌”（pai），满文版记为“wehe de foloho”（石刻）。由此来看，首先刻在石牌上，然后设立在此地。另外，《吉林通志》（光绪十七年序）卷92，郎坦“二十九年，奉旨偕副都统诏三往额尔古纳河口立交界牌，道出默尔根城，越兴安岭，见俄罗斯屋十数，筑有田禾。呼其酋长巴什里问故，对去岁尼布楚城长有印文，令我等归，我等力不能移，故冒禁暂留。此地少种田禾，乞大人怜宥。因使毁其屋，给资，并允刈禾载归，遂逾岭去。至额尔古纳，立牌河口石壁上，镌满、汉、俄罗斯、蒙古、里的诺五种字而还”。内容同《八旗通志初集》大同小异，也称其为牌。与吉田金一、松浦茂相同的观点，参见船越昭生《北方図の歴史》，第105页。此外，中文概论参见复旦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编写组编《沙俄侵华史》，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张维华、孙西：《清前期中俄关系》，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上述各家均主张康熙年间设立国境碑。最近的姜长斌《中俄国界东段的演变》也沿袭了以上中文著作的观点。

刘民声、孟宪章、步平编《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史资料》第520～521页指出，根据档案资料，《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并未立即立碑。但也有一些资料记载当时即已立碑，如杨宾《柳边记略》立碑资料及《八旗通志初集》郎谈传中的立牌（该书误记为碑，第521页）资料，提出“中国方面在边界上至少是于石壁上镌刻文字以标志边界”的观点。

除此之外，以石碑文字最初“照此议定，用满文、俄罗斯文、拉丁文镌刻之于石。置于两国交界之处，永为标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上册，第123～124页，索额图题会同俄使格洛文勘定边界本，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来看，最初清朝方面的提议只有满文、俄文、拉丁文三种文字，后来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初三日的理藩院咨文内成为五种文字。这说明后来镌刻文中有所增加。但是，这些审议过程具体如何，目前还看不到进一步证实这些问题的档案，有待今后继续查考。

此外，郎谈传俄文译注，参见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2. 1686 - 1691. М. Наука. 1972, Биография Лантаня, pp. 689 - 701。该书利用《八旗通志初集》和《八旗通志》郎谈传

此外，康熙四十九年也调查过石碑的所在。《黑龙江档》康熙四十九年一月初七日领催阿尔都哈（alduha）送来的文书记载了查问石碑的具体位置：

（上略）同俄罗斯定界设立之石碑，在何处？在齐齐哈尔之何方？几里之外，将此查清送来。①

同年十一月十二日，笔帖式散珠送来的文书进一步记载了查清石碑、绘图增补送来的内容：

（上略）据说，在格尔必齐河之河源，有与俄罗斯分界设立之石碑。此石碑在齐齐哈尔城之何方，几里之外？格尔必齐河之哪一方的岸边？查清绘图增补送来（下略）。②

这份档案说明据说石碑在格尔必齐河之河源，并不是在河口。但石碑是否确切存在，此时还无从所知。康熙四十九年调查过格尔必齐

资料，按年代顺序进行了详细解说，其中也将石牌译为“каменную стелус”（石碑），交界牌译为“стелы о пограничном размежевании”（即划分边界石碑）。

① 《黑龙江档》16－24《康熙四十九年正月黑龙江副都统、墨尔根城协领、索伦总管、驿站官等咨文抄档》康熙四十九年一月初七日领催阿尔都哈（alduha）送来文书。原文如下：oros i emgi jecen be faksalame ilibuha wehe bei ai gebungge bade // bisire，cicigar hoton i ya ergide bisire，udu ba i dubede bisire be inu/ getukeleme baicafi benjikini。

② 《黑龙江档》16－22《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吏、兵部、理藩院、盛京兵部咨文抄档》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笔帖式散珠送来之文。对应的满文如下：gerbici bira i sekiyen de oros i emgi jecen be faksalame ilibuha/wehe i bei bi sehebi，ere wehe bei cicigar hoton i ya ergi udu ba i/ dubede bisire，gerbici bira ya ergi dalin de bisire be getukeleme/ baicafi nirugan de nonggime nirufi benjiki。除此之外，同一内容的档案，还可以参见《黑龙江档》16－25《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奉天、宁古塔将军、伯都纳副都统、土谢图亲王、扎萨克图郡王、扎赉特、杜尔伯特等咨文抄档》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初二日笔帖式王四达送文。

河源与俄罗斯分界设立的石碑，并且绘图送来，说明界碑图是在这个时期绘制而成。同年十一月十二日的奏文内报告石碑所在的具体位置：

> 格尔必齐河在（齐齐哈尔）城北二千五百里之外，源出西北兴安东南流，汇入黑龙江。与俄罗斯分界设立之石碑在城西北二千五百里之外，位于格尔必齐河河口之东岸。[①]

如若上述档案可信，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出，康熙四十九年曾经专门调查报告石碑的所在位置是：齐齐哈尔城西北二千五百里之外，位于格尔必齐河河口之东岸。我们在后来的满文档案中发现，乾隆十八年曾经分水、陆三路巡察额尔古纳河口以及设立定界碣石（eldengge wehe）的格尔必齐河口等处：

> 为谨遵上谕，奏报巡边事。乾隆十八年，齐齐哈尔城协领西林太（sirentai）带领官兵，自墨里勒肯河口到额尔古纳河源呼伦湖为止。墨尔根城协领波木伯护带领官兵，自墨里勒肯河口到额尔古纳为止。署理黑龙江协领纳

① 《黑龙江档》16－22《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吏、兵部、理藩院、盛京兵部咨文抄档》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笔帖式散珠送来之文书。满文具体如下：gerbici bira hoton i amargi ergi juwe minggan sunja tanggū ba i/ dubede bi，sekiyen wargi amargi hinggan ci tucifi dergi julergi baru eyeme // sahaliyan ula de dosikabi，oros i emgi jecen be faksalame ilibuha/ wehe bei hoton i wargi amargi juwe minggan sunja tanggū ba i dubede bi，/ gerbici birai anggai dergi dalin de bi。松浦茂也指出：“另一方面，有关国境碑，郎谈地图（即《吉林九河图》）上没有任何记载，但是康熙四十九年当时，石碑确实是在格尔必齐河河口东岸存在。”松浦茂利用的也是《黑龙江档》（第291册）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的资料。但是没有将前后文译出。参见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第30页及第38～39页注解（55）、（64）。

尔泰（nartai）带领官兵，自黑龙江沿水路到额尔古纳河口，至设立定界碣石（hešen toktobuha eldengge wehe）格尔必齐河口为止。派出水、陆路三路巡察定界之处（后略）。①

这说明乾隆十八年派人巡边到格尔必齐河口定界碣石处，但没有说明是否看到定界碣石。当然，这和最初议论设立的国界碑是否属于同一界碑，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有关康熙四十九年之前界碑存在的问题，笔者对此持有疑问。因为，界碑到了后来的乾隆时代亦一直未能找到。乾隆三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富僧阿（fusengga）的奏折记载了视察石碑的具体情况，因原文内容较为重要，特举汉译文如下：

奴才富僧阿、鄂木布、瑚尔起谨奏，为巡视俄罗斯接界格尔毕齐等四河源流之兴堪山（即兴安岭）之地，查明绘图贴写，为谨奏览事。今年青草长出，呼伦贝尔地方副都统级尼西海（nisihai）、总管耀屯（yeotun）前往查勘自珠尔泰卡伦（jurtai karun）向北应设卡伦之地。向北视察额尔古纳河口之时，路途泥泞，森林茂密，砍伐为路，行走三百里左右，无法前行，只得返回。冬季结冰之后，沿河床之冰前往视察。等因。前来报告之后，臣等富

① 《黑龙江档》50－22，《乾隆十九年元月至六月兵部、都统衙门、盛京兵部来文档》。满文原文如下：dergi hese be gingguleme dahafi，hešen giyarime baicaha be boolara jalin，abkai wehiyehe i jakūci aniya cicigar hoton i gūsai da/ sirentai de hafan cooha adabufi，merilke birai angga ci/ ergune i sekiyen hulun omo de isibume，mergen hoton i/ gūsai da bombohū de hafan cooha adabufi，merilke angga ci/ ergune bira de isibume sahaliyan ulai daiselaha gvsai da/ narantai de hafan cooha adabufi sahaliyan ula ci mukei jugūn i ergune birai angga de hešen toktobuha，eldengge wehe/ ilibuha，（后略）。

僧阿详议，自珠尔泰卡伦向北至哈拉尔（halar）河口设卡伦一处，至墨里勒肯（merilke）河口增设伦一处。索波尔干霍硕（soborgan hošo）之处设立鄂博，[①] 卡伦将兵每日追踪巡察，叶奥屯（yeotun）查看应设立卡伦之处，已绘图一并奏览。本年冬季河水结冰之后，叶奥屯前往额尔古纳河口，详细调查地方形势，前来报告之际，另行奏闻。

又，以水路前往派员视察格尔毕齐等四河源与外兴堪山（即 tulergi amba hinggan mulu，外兴安岭）等地理之四路（duin jugūn），尽行抵达之后，谨遵上谕，将视察地方明晰绘图一并上奏。等语。谨缮奏折。今年六月二十八日，派员上奏时，朱批：旨：军机大臣议奏。钦此。钦遵。军机大臣议奏之后，再行处理之外，今年八月初五日，前往视察格尔毕齐等四河源之地的副都统瑚尔起，副都统级协领阿迪木保（adimboo）、协领纳林布（naribu）、伟保（oiboo）等陆续到来。前往视察格尔毕齐河源之地的副都统瑚尔起称：今年四月十日，我带领官兵前往视察俄罗斯界（oros hešen），自黑龙江城乘坐舟艇出发，溯流黑龙江向西北船行四十三日，抵达流入黑龙江之格尔毕齐河口，格尔毕齐河狭窄水浅，舟艇无法行走。是故，裁汰官兵背负行粮，劈开密林为路，不行两日，抵达格尔毕齐河源流，自此行走四日，抵达大兴堪山（大兴安岭）。搜寻四周查看，并无标示碣石（eldengge wehe）亦无垒堆鄂博。是故，于山岭形胜之处，设立鄂博，写明视察年月日之文，坚包白桦皮之内，置于鄂博之内。放眼兴堪山阴处，尽是深山河流及密林，并无俄罗斯人之行踪。亦不见

① 敖包（obu、obo），原为蒙古语借入满洲语，意为石堆，汉字音写为鄂博。

任何烟火。放眼兴堪山阳之我等所属之地，山峰叠嶂，密林丛生。回到格尔毕齐河源山峰处，垒石鄂博，明记文内，埋入其内。并未寻得在此处原先订立边界时设立之碣石。我等测得自黑龙江城至格尔毕齐河口之间，水路一千六百九十七余里，格尔毕齐河口至兴堪山之间，陆路二百四十七里。不见俄罗斯人在我等境内狩猎之踪迹。自黑龙江城至格尔毕齐河，峰峦叠嶂、山峰、山沟、森林相继，河流湿地泥泞之地甚多，自陆路骑马无法抵达格尔毕齐河。故将视察地形、河流名称，尽行详细绘写前来。[①]

从以上满文档案的汉译文也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乾隆年间巡视黑龙江地区边界时，到达格尔必齐河源流以及大兴安岭山上都没有看

① 《俄罗斯藏黑龙江档抄本》乾隆三十年八月二十二日，满文，册档无题名，此名由笔者拟定。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以下略称《俄藏黑龙江档》)。将这一满文档翻译后，编入实录的部分，参见《清高宗实录》卷743，乾隆三十年八月癸亥："黑龙江将军富僧阿等奏：据往探格尔毕齐河源之副都统瑚尔起禀称：自黑龙江至格尔毕齐河口，计水程一千六百九十七里。自河口行陆路二百四十七里，至兴堪山。其间并无人烟踪迹。又，往探精奇哩江源之协领纳林布称，自黑龙江入精奇哩江，北行至托克河口，计水程一千五百八十七里。自河口行陆路二百四十里，至兴堪山。其地苦寒，无水草禽兽。又，往探西里木第河源之协领伟保称，自黑龙江经精奇哩江，入西里木第河口，复过英肯河，计水程一千三百五里。自英肯河口行陆路一百八十里，至兴堪山，地亦苦寒，无水草禽兽。又，往探钮曼河源之协领阿迪木保称，自黑龙江入钮曼河，复经西里木第河入乌默勒河口，计水程一千六百十五里。自河口行陆路四百五十六里，至兴堪山，各处俱无俄罗斯偷越。等语。查呼伦贝尔与俄罗斯接壤之额尔古讷河西岸，系俄罗斯地界，东岸俱我国地界，处处设有卞座，直至珠尔特地方。现复自珠尔特至莫哩勒克河口，添设二卡。于索博尔罕添立鄂博，逐日巡查。俄罗斯蒲玛尔断难偷越。其黑龙江城与俄罗斯接壤处，有兴堪山绵亘至海，亦断难乘马偷越。第自康熙二十九年与俄罗斯定界，查勘各河源后从未往查。嗣后请饬打牲总管，每年派章京、骁骑校、兵丁、六月由水路与捕貂人，同至托克、英肯两河口及鄂勒希、西里木第两河间遍查，回报总管，转报将军三年，派副总管、佐领、骁骑校于冰解后，由水路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回时呈报。其黑龙江官兵，每年巡查格尔毕齐河口，照此三年亦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年终报部，得旨：如所议行。"

到标示的碣石，这说明始终还是未能找到石碑的事实。通过这个详细的察边报告，也可以知道当时也绘有包含地形、河川名称的有关黑龙江流域的地图。上述史料中记载的“原先订立边界时设立之碣石”，也指的是康熙年间的石碑。

我们在康熙二十九年九路调查黑龙江以北地区的《郎谈等九路大人绘制带来图》（即《口外九大人图》）以及《乌喇等处地方图》等当年绘制而成的地图上看不到任何界碑的形制。此外，按照《郎谈等九路大人绘制带来图》为母本重新补充调查地名绘制而成的《吉林九河图》（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十三日）上，也没有任何碑文形制的图案。这说明碑文图形在地图上出现的年代，只能是在康熙四十九年以后，这样才符合目前的史料内容及舆图资料。所以，可以说界碑在地图上出现的年代，应该是在康熙四十九年以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黑龙江流域图》的界碑图可以说是其中年代最早的一幅。该地图以康熙二十九年视察的边界报告和舆图资料为基础，为编修《大清一统志》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十一月二十五日绘制而成。也就是说，书写在《黑龙江流域图》左上角的年代，即为绘制年代。

除了满文档案等文字资料之外，我们再来看看中外舆图资料中，如何绘示界碑图及格尔必齐河位置的问题。首先，我们看一看大清国方面的早期满文舆图，按格尔必齐河绘示的方位，具体可以分三类。

第一，雅克萨城东西方绘有两条同一名称的格尔必齐河。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福克司介绍的康熙二十九年左右绘制的满文《东北亚地图》（参见附录图 7－1、图 7－2）中，图 7－2 绘示了两条格尔必齐河，在邻近 nibcu（尼布楚城）[①] 东侧，绘有 gerbici bira（格尔必齐河），其西部为 corna bira（绰尔纳河），而

① 汉文又作“泥扑处城”或“尼布潮城”。

在 yaksa（雅克萨城）的西部，又绘有一条 gerbici bira（格尔必齐河）。[①] 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最早的一幅绘示格尔必齐河的满文地图上。这处格尔必齐河到后来逐渐出现不同，即所谓的昂巴哥里比齐河（即大格尔必齐河）与阿吉格格尔必齐河（即小格尔必齐河）在不同的地图上绘示的位置不同。目前，两河同名的地图只发现这一幅。

第二，黑龙江上游西北部为格尔必齐河，东北部为昂巴格尔必齐河（即大格尔必齐河）。

就目前所知，有一幅康熙二十九年绘制的满文地图，以《口外九大人图》为编目，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该图上黑龙江上游地区，沿着黑龙江北部，自西向东绘有 nibcu bira（尼布楚河）、nibcu hoton（尼布楚城）、kuyunggu bira（枯永古河）、kurengge bira（枯楞格河）、corna bira（绰尔纳河）、gerbici bira（格尔必齐河）、jolokeci bira（卓罗克其河）、amba gerbici bira（大格尔必齐河）。也就是说，在额尔古纳河同黑龙江交汇处东北部绘有 amba gerbici bira（大格尔必齐河）。[②] 这也说明东北部为昂巴格尔必齐河（即大格尔必齐河）。

此外，耶稣会士托玛斯（P. Thomas）康熙二十九年在北京绘制的《东方地图》（Tabula Geog'raphica Orientis）中，黑龙江记为 se'ga'lien en vla 的萨哈连乌喇。黑龙江自西向东流去，上游绘有 Nipchu（尼布楚城），其东注有 Albasim everta（毁坏的阿尔巴津城，即雅克萨城）；黑龙江南部绘示了 Aig'u（爱浑城）、Merghen（墨尔根城）及 Ningota（宁古塔城）；黑龙江上游河北，雅克萨城

① 参见福克司（W. Fuchs），*Ueber einige Landkarten mit mandjurischer Beschriftung*。此外，依福克司附图摹写并转写满文地名的研究参见吉田金一《ロシアと中国の東部国境をめぐる諸問題：ネルチンスク条約の研究》，第 12 ~ 13 页，附图第 7 图。该图原图现在下落不明。

② 原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关此图，笔者将另外撰文讨论其绘制过程。

西部，绘有流入黑龙江的 Kerbichi fl.（格尔必齐河）；同时，有条河流自南而往注入黑龙江，此河即为额尔古纳河。沿黑龙江南部的额尔古纳河与河北的格尔必齐河西部，注有 Limites Sinici Imperii（中华帝国疆界）说明。很明显，该图的格尔必齐河位置与《黑龙江流域图》相同。[①] 该图没有标注大格尔必齐河的位置。船越昭生指出，托马斯的地图可以说是 17 世纪中期西欧绘制的世界地图与初期西伯利亚地图的地理知识结合而成的特别的地图。[②] 该图确实存在经纬度与俄罗斯传统地图绘制方法相结合的一面。具体可参见附录图 8－1、图 8－2。

此外，本文重点探讨的康熙四十九年绘制的《黑龙江流域图》上，黑龙江上游，在 gerbici bira（格尔必齐河）东岸绘有界碑图，amba gerbici bira（昂巴哥里比其河，大格尔必齐河）绘示在 jolokci bira（卓罗克其河）之东。其位置和上述 1690 年绘制的满文《东北亚地图》与《口外九大人图》，在尼布楚城西部绘有格尔必齐河的位置相同。而雅克萨城西部绘示的格尔必齐河，在《黑龙江流域图》中绘示在卓罗克其河之东部，河流名称记为昂巴格尔必齐河，也证明卓罗克其河东部应为昂巴哥里必其河（大格尔必齐河）的位置（参见附录图 2、图 3）。

附录图 9 中间一幅《异域录》附图[③]与最上一幅《异域录》附图[④]两者属不同版本（最下一幅为满文版），我们从汉字形态和界碑形状，可以看出右上图与左上图有所不同。且在额尔古纳河上游

---

① 参见 Joseph S. Sebes,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 (1689): The Diary of Thomas Pereira*，与吉田金一《ロシアと中国の東部国境をめぐる諸問題》，第 11 图解说。

② 船越昭生：《北方図の歴史》，講談社，第 85 页。

③ 《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哈尔滨地图出版社，1998。《异域录》一书附图，纵 25.6 厘米，横 26 厘米。

④ 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第 152 图，《异域录图》，解说由汪前进撰写，未注明所藏图书馆，只是文末附带注明“北京图书馆等单位收藏有《异域录》”。

呼伦湖西部刻有界碑图，旁注“界碑”，中国国家图书馆版本没有“界碑”二字。下中图，满文《异域录》（法国国家博物馆藏），gerbici bira（格尔必齐河）绘有界碑图，旁注满文“bei”（碑），额尔古纳河中游，呼伦湖西部的界碑图旁，亦注有满文“bei”，同汉文版的“界碑”略有不同。

此外，2007 年吴雪娟发表的《新发现的满文〈黑龙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图〉》一文的附图中，格尔必齐河与大格尔比齐河的位置，与《黑龙江流域图》相同。[①]

在《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即《康熙皇舆全览图》（铜版图）第一排第三号图中，黑龙江上游的 amba gerbici bira（昂巴哥里比其河，即昂巴格尔必齐河或大格尔必齐河）河口东岸绘有界碑图，注有满文“bei”（碑）字。其东部依次绘有 jolokci bira（卓罗克其河）和 gerbici bira（哥里比其河）。从此以后，舆图中格尔必齐河的位置就变为绘示到东部，昂巴哥里比其河就取代了《黑龙江流域图》中的格尔必齐河的位置。[②]。额尔古纳河河口附近也看不到界碑图样。原图形制参见附录图 10－1，界碑图放大部分，参见附录图10－2。

我们在满文《清内府一统舆图》黑龙江全图内（参见附录图 10－1）可以看到，在 amba gerbici bira（昂巴格尔必齐河，即大

---

① 参见吴雪娟《新发现的满文〈黑龙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图〉》，《东北史地》2007 年第 3 期，第 82～85 页。后收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上册，第 63～70 页。

② 刘远图认为《康熙皇舆全览图》正式在格尔必齐河口东侧绘示界碑。之后，清代绘制的所有涉及黑龙江流域的舆图，均绘示格尔必齐河界碑，其位置与《康熙皇舆全览图》一致。显然这是误读了该图地名。我们看到的《康熙皇舆全览图》（满文铜版图和汉文木版图）都没有在哥里比其河（格尔必齐河）绘有界碑，相反在昂巴哥里比其河（即大格尔必齐河）东岸绘有界碑。刘远图误认为是格尔必齐河河口东侧绘有界碑，正确的应该是在昂巴格尔必齐河绘有界碑。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第 292～295 页。刘远图书中大量利用了中外研究著作，但参照的外文著作或其中译文都有不少误读，甚至以讹传讹之处，利用者需特别注意。

格尔必齐河）东岸绘有界碑图，界碑形制旁注有满文“bei”，即碑。但是，额尔古纳河（ergune bira）河口西岸看不到界碑形制。在满文《皇舆全览图》稿本中也注有满文 amba gerbici bira 字样和界碑形制，唯一不同的是稿本界碑旁未注明满文“bei”字。这幅图又称为《康熙皇舆全览图》，据笔者调查所知，目前世界各地存有各种稿本，日本国内也存有两部。自福克司的研究问世以来，有关《康熙皇舆全览图》很少有深入研究的论作。目前出版的史料状况和舆图开放程度，已具备了重新理解和深入研究的条件。

《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第一排三号）界碑图（参见附录图 10 -2）中，在 sahaliyan ula（黑龙江）上游，自北向南流入黑龙江的 amba gerbici bira（昂巴哥里比其河，大格尔比齐河），河东岸绘有界碑，注有满文“bei”（碑）字。其东部有 jolokci bira（卓罗克齐河），其次为 gerbici bira（哥里必齐河，格尔必齐河）。实际上应该是相反的位置，即西北部的 amba gerbici bira（昂巴哥里比其河）应为 gerbici bira（哥里比齐河，格尔必齐河），东北部的 gerbici bira（哥里必齐河，格尔必齐河）应为 amba gerbici bira。从此以后，官方刊行的舆图，误导了各种刊刻的舆图中的格尔必齐河位置。该河的位置也为后来的研究人员带来了谜团。《黑龙江流域图》中出现的格尔必齐河与界碑图，同满文档案资料中对格尔必齐河的描述，无论界碑是否真实存在，都为我们思考格尔必齐河的位置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

汉文《康熙皇舆全览图》（木版图，参见附录图 11 -1、图 11 -2），据福克司研究，绘制于 1709 年，绘制者为传教士雷孝思（Regis）、杜德美（Jartoux）、费隐（Fridelli）。[①] 在黑龙江上游的昂巴哥里比其河汇入黑龙江河口东岸绘有界碑形制，但没有注明任

---

① Walter Fuchs,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nebst Namensindices für die Karten der Mandjurei, Mongolei, Ostturkestan und Tibet: mit Wiedergabe der Jesuiten-Karten in Originalgrösse.* p. 9.

何文字。在厄勒枯挪河（即额尔古纳河）河口西岸也没有界碑形制。而卓罗克其河西部的哥里比其河（即格尔必齐河）附近也没有绘示界碑。满文铜版图的第三排第三号图与木版《康熙皇舆全览图》黑龙江中图上的哥里比其河位置相同。

汉文木版《康熙皇舆全览图》黑龙江中图界碑图（参见附录图 11－2）同满文《康熙皇舆全览图》黑龙江上游部分相同，汉文图内昂巴哥里比其河东岸绘有界碑图样，但无任何文字注记。这是满文铜版图与汉文木版图的不同部分，同样给后人呈现了在昂巴哥里比其河（昂巴格尔必齐河）东岸设有界碑的幻影。这也是致使众多的中外学者深信界碑存在的一个因素。

杜赫德《中华帝国志》第 4 卷第 9 图内绘有界碑图（参见附录图 12－1、图 12－2）。这幅图参照耶稣会士进呈康熙皇帝的《皇舆全览图》系列地图，也照旧绘有界碑图，界碑绘制在黑龙江上游同黑龙江交汇的大格尔必齐河（Amba kerbetchi pira）的河口东岸。该图在黑龙江南岸沿边缘记有“此河莫斯科人称之为阿穆尔，中国人称之为黑龙江，中国鞑靼人称之为萨哈连乌喇”（Ce Fleuve est apelle' Amur par les Moscovites, He'-long Kiang par les Chinois, et Saghalien Oula par les Tartares Chinois）。且在黑龙江和额尔古纳河之间记有“额尔古纳河同阿吉格格尔必齐河，经尼布楚条约，成为莫斯科和中国鞑靼人的境界”（La Riviere d'Ergone, et celle d'Agigue-Kerbetchi servent de Limites aucc Moscovites et aux Tartares Chinois par le Traite' de Niptchou）等文字。将格尔必齐河称为阿吉格格尔必齐河（Agigue-Kerbetchi Pira，Agigue 即满文 ajige，意为小），这一记载是《康熙皇舆全览图》铜版图和木版图中所没有的。究竟为何加入满文 ajige（Agigue），目前还无从所知，也许是参见的图稿不同所致。尤其重要的是，在 Amba kerbetchi pira（昂巴哥里比其河）东绘有 Tcholoctchi Pira（卓罗克其河），其东绘示了 Agigue-Kerbetchi Pira（即小格尔必齐河），此河西侧注有 aux

Moscovites（莫斯科），河东注有 aux Tartares Chinois（中国鞑靼）的文字，明显这是中俄两国边界以 Agigue-Kerbetchi Pira（即阿吉格格尔必齐河、小格尔必齐河）为界的标示。这一标示是其他舆图所罕见的。更有意味的是，在黑龙江上游绘示 Amba kerbetchi pira（昂巴哥里比其河），其东岸绘有界碑图，但没有文字说明。从其地理位置上来看，明显同《黑龙江流域图》中在格尔必齐河东岸绘示的界碑图方位一致。杜赫德地图中误记的小格尔必齐河，也是使原来的格尔必齐河成为小格尔必齐河的一个原因，其结果导致其他舆图绘示的边界从昂巴格尔必齐河（即大格尔必齐河），开始移到小格尔必齐河。这同康熙三十年到四十九年之间，黑龙江将军派人到边界巡边的满文档案与《黑龙江流域图》的记载完全相反。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杜赫德图中的界碑绘示在昂巴哥里比其河东岸，与其解说部分互相矛盾。图内出现的这些问题，中国学界至今都很少有人注意。杜赫德的地图在西方影响深远，从另一方面也误导了西方学界对《尼布楚条约》界定的边界的认识。详细研究解读这幅地图，对考察国界碑的历史，研究 17 世纪欧亚国境、边界概念具有发人深思的意义。吉田金一曾经指出米勒（G. F. Miller）利用耶稣会士的地图，主张界碑在小哥里比其河的错误观点，[①] 并同时指出后来的 V. S. Myasnikov 也受到米勒的影响，主张界碑在小哥里比其河的错误观点。[②]

此外，杜赫德《中华帝国志》第 4 卷第 4 图的总图（参见附录图 13 - 1、图 13 - 2）上，我们可以看到 Amba Kerbichi Pira（昂巴格尔必齐河）东岸没有绘示界碑，小格尔必齐河误记为 Aigue' Kerbetchi Pira，按同书其他地图记载，应为 Agigue' Kerbetchi Pira。

① 吉田金一:《ロシアと中国の東部国境をめぐる諸問題：ネルチンスク条約の研究》，第 12 ~ 13、33 ~ 44、45 ~ 49 页。

②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2. 1686 - 1691, стр. 53 - 55.

该图还在雅克萨河附近注有"Yacsa Place Russienne de truité en vertu du Traité de Niptchou 雅克萨，经尼布楚条约破坏了的俄罗斯雅克萨城"。这一部分内容同耶稣会士托玛斯于康熙二十九年在北京绘制的《东方地图》（参见附录图 8 - 1、图 8 - 2）注释 Albasim everta（毁坏的阿尔巴津城，即雅克萨城）有相似之处。

在满文《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相关地图中我们看不到相关的内容。

《雍正十排图》四排东一图内绘有界碑图部分，其绘制方法沿袭了《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相关内容（参见附录图 14 - 1、图14 - 2）。在 Amba gerbici bira（昂巴哥里比其河）东岸绘有界碑图，旁注有"bei"（碑）字，其东部绘有 jolokci bira（卓罗克其河），次为 corna sere urum bira（称为绰尔纳的厄鲁母河，又作乌鲁木河），其东绘有 gerbici bira（格尔必齐河），这个位置正好是《黑龙江流域图》内 amba gerbici bira（昂巴哥里比其河）的位置。黑龙江南部的 erguna bira（额尔古纳河）周边也不见界碑图形。其中，"称之为绰尔纳的厄鲁母河"，是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系列舆图中所见不到的新内容。这一内容正好是《尼布楚条约》中的第一项："sahaliyan ula de amargici dosinjiha corna sere/ urum birai hanci bisire gerbici bira be，jecen obufi，ere/ birai sekiyen i ergi wehe noho emba hinggan i mudun be/ jafahai mederi de niketele antu i ergi sahaliyan ula de/ dosikala bira birgan be gemu dulimbai gurun i harangga obume. . ."汉译为："将由北流入黑龙江之称之为绰尔纳的厄鲁母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界，循此河之源流之方，以尽为石之大兴安之山梁至相接于海，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归中国所属"。[①]《雍正十排图》这句"称之为绰尔纳的厄鲁母河"，道出了明显以《尼布楚

① 《尼布楚条约》满文原件影印件，参见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Том 2. 1686 - 1691，стр. 651 - 655。汉译文由笔者通过满文直译。

条约》为参照基准绘制而成的意图。但是，这却给学术界带来了更大的谜团，那个时代为何会将国土尤其是两国之间的边界画错？这也不得不使人反思，当时人们想到的边界，是否同我们现代人所想象的、近代以来划定的国界相同？我们总是无法舍弃现代人的思想和目光，试图以此去看待历史或叙述历史。

雍正元年刻印的《异域录》舆图中，在葛尔必齐河（格尔必齐）口东岸绘有界碑图，并注有汉字“界碑”二字。满文版也在gerbici bira（哥尔必齐河，格尔必齐河）河口绘有界碑图样，注有满文“bei”（碑）字。而在额尔古纳河上游，呼伦湖西部绘有界碑图样，并注有“界碑”字样（中国国家图书馆版本有界碑图样，而无“界碑”二字，其他版本可以看到“界碑”字样），这说明额尔古纳河周边绘示界碑的图样自雍正时期开始出现，并非如刘远图所说的“从乾隆内府舆图开始，清代的各种大型舆图中，才在格尔必齐河界碑之外，增绘额尔古纳河口界碑”。[①] 在葛尔必齐河（即格尔必齐河）河口东岸绘有界碑图，葛尔必齐河西注有泥布楚城，即尼布楚城，这同《黑龙江流域图》的格尔必齐河地理位置一致。[②]

乾隆二十五年绘制的铜版《大清一统舆图》（又称《乾隆十三排图》），在六排东一部分，黑龙江上游昂巴格尔必齐必拉（即格尔必齐河，必拉为满语“河”）河口东岸，绘有界碑图，注有汉字“额尔登额倭赫”，即满文 eldengge wehe，意为碣石，界碑的标注方式转变为满文。且在额尔古纳必拉（额尔古纳河）汇入黑龙江之河口西岸，亦绘有界碑图，注有“额尔登额倭赫”字。这同雍正元年的《异域录》舆图相同，但标注位置有所不同。《异域录》标注在呼伦湖西部。而《大清一统舆图》标注在额尔古纳河河口

---

① 参见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第 293 页。

② 有关《异域录》翻译及校注研究，参见今西春秋撰《校注异域录》、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等。

西岸。相反在安巴格尔必齐必拉东部，汇入黑龙江的格尔必齐必拉东西河岸，均不见任何界碑形制。这种绘法也和当初康熙朝满文档案中的“界碑在格尔必齐河东岸”相矛盾。① 此外，还有一个较为特别的地名，即将《雍正十排图》中的满文地名注释“corna sere urum bira”（称为绰尔纳的厄鲁母河）直译为汉文“绰尔纳色勒乌鲁穆必拉”，竟将这一满文注释全部理解成一个固有名词，显然这容易给不懂满文的人带来误解。格尔必齐必拉绘示在距安巴格尔必齐必拉以东的黑龙江以北地区，这明显沿袭了《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绘示传统（参见附录图 15）。

乾隆四十三年敕撰的《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② 也依旧承继了《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绘示方法，将大格尔必齐河位置放在尼布楚城附近，且河口东岸绘示界碑形制，注有满文和汉文“eldengge wehe，碑碣”，而在额尔古纳河口西岸也绘示了界碑形制，注有满文“eldengge wehe”和汉文“碑碣”。格尔必齐河绘示在额尔古纳河同黑龙江交汇处下游的东北部。《雍正十排图》中的“称为绰尔纳的厄鲁母河”也更正为“urum bira”乌鲁木河（参见附录图 16－1、图 16－2）。

比较以上不同种类的舆图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官方刊行的舆图同手绘的满文舆图相比，明显以讹传讹的格尔必齐河位置一直都未曾有所改变。但官方手绘舆图或者在民间发现的手绘舆图，往往表现出早期地理调查中正确的地理位置。究竟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还有待于解读大量的舆图。期待国内舆图收藏机构能够及早向研究人员开放所有珍藏的舆图，以便深入地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除此之外，我们再来谈一谈早期的俄文西伯利亚地图中格尔必齐河及界碑图的位置问题。

---

① 据张其昀监修《大清一统舆图》，国防研究院印行，1966。

② 《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乾隆四十三年敕撰，和田清撰解说，1935 年，大连满洲文化协会，笔者藏。

1667 年绘制的俄文《西伯利亚地图》（*Чертеж Сибири*，参见附录图 17），其方向较为特别，为上南下北。该图表现出俄罗斯早期西伯利亚地图的明显特征，黑龙江周边地区地名较少，基本没有绘记河流名称。黑龙江周边比较引人瞩目的地名有：图左中 1. р. Амур（阿穆尔河，即黑龙江），2. Восток（东），3. О. Каилар（海拉尔湖），[①] 4. Г. лапкаев（拉夫凯城），5. Нерчинской（尼布楚）等。拉夫凯城绘为城堡形，尼布楚附近没有城形，我们看不到格尔必齐河的位置。这是现存最早的一幅西伯利亚地图。据推测是在当时西伯利亚的行政中心托波尔斯科的长官果多诺夫（Годунов）监绘之下，由列麦佐夫（С. У. Ремезов）刊行。[②]

到了 1673 年的《西伯利亚地图》（*Чертеж Сибири*，Годунов 制，参见附录图 18），黑龙江南北各地河流名称逐渐增多，包括：1. Царства Никансое（尼堪帝国，即辽东），2. Царства Китайское（中华帝国），3. Албасин（阿尔巴津，即雅克萨），4. Нерчь（尼布楚），5. Восток（东），6. Озеро великое Байкал（大贝加尔湖）等，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河流名称，因字迹模糊无法释读，故略而未记。[③]

《西伯利亚地图》（*Чертеж Сибири*，1684 ~ 1685 年，参见附录图 19 - 1、图 19 - 2）内，我们初步释读格尔必齐河周边地名，可以看到 1. Горбица（格尔必齐河），2. Нерчин（尼布楚），3. Щилка（石勒喀河），4. Черна（绰尔纳河），5. От Нерчинска

① 从位置上来看应为呼伦湖。

② 图引自 *Атлас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ткрытий в Сибири и в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й Америке XVII – XVIII вв*（《17 ~ 18 世纪西伯利亚及美国西北部地理发现地图册》）（Москва：Наука，1964），第 28 页。该图的解说，参见 Baddeley，John F. Russia，Mongolia，China. pp. CXXV-CXXX。

③ 图引自 *Атлас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ткрытий в Сибири и в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й Америке XVII-XVIII вв*（Москва：Наука，1964），第 30 页。地名释读参考了 *Атлас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ткрытий в Сибири и в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й Америке XVII-XVIII вв.* 解说部分，第 19 页。

до Албазина х［од］［6］д［ней］［从尼布楚到阿尔巴津（雅克萨）需6天］。[1] 俄罗斯很早就开始公开研究本国所藏各种古地图，特别是巴格洛夫的一系列研究论作，使我们可以看到早期西伯利亚地图的发展历程。

附录图 20 - 1、图 20 - 2，是 1701 年列麦佐夫（С. У. Ремезов）[2] 的《西伯利亚地图集》（*Чертежная книга Сибири*）中的一幅地图，明确注明格尔必齐河为国界，格尔必齐河源附近注有河名"р. Го［+р］бица"（格尔必齐河），附近注有"Та поставлена граница"（在此设立境界），格尔必齐河河口西岸有国界标识，旁注"Гра［+н］ичяская"（境界?）。这一记载符合《尼布楚条约》的内容，也证实中俄两国以格尔必齐河为界的事实，以此也可以表示后来绘制的包括《康熙皇舆全览图》等一系列的中外舆图存在的问题，以及后来绘示在尼布楚附近的"昂巴格尔必齐河"，应为"格尔必齐河"之误。列麦佐夫的《西伯利亚图》上，在额尔古纳河口附近看不到界碑图。这也和后来的满文、汉文图不同。

在《阿穆尔地图》（1701 年，参见附录图 20 - 2）格尔必齐河附近局部放大图中，左中河边的城图是尼布楚城，数字 1 为俄文格尔必齐河，2 为在此设立境界，3 无法正确释读，也许是标识物的说明，图案看似界标或者界碑，绘示在格尔必齐河西部。

另外一幅列麦佐夫（С. У. Ремезов）1701 年绘制的《［西伯利亚］各城、河流及各地地图》（*чертеж всех*[3]*горадов и реки и*

---

① 图引自 *Атлас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ткрытий в Сибири и в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й Америке XVII-XVIII вв*，第 34 页。

② 列麦佐夫绘制，*Чертеж течения Амура по "Хор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чертежной книге"*（地势地图册）*С. У. Ремезова начала XVIII в.* 转引自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2. 1686 - 1691.* М. Наука. 1972，стр. 524 - 525，插图。其他汉译论著中又作雷米佐夫。

③ 原引用书该处缺 Сибири（西伯利亚）一词，疑有遗漏。故汉译文补译西伯利亚。

земель，参见附录图 21）上，Горбица（格尔必齐河）绘示在黑龙江上游的西北部地区，并在格尔必齐河上注有“Граница”（边界、疆界），其绘示位置同满文《黑龙江流域图》相同。[①]

此外，贝顿（Afanasy von Beiton）的地图中（参见附录图 22－1、图 22－2），也在 2. Нерчин（尼布楚城）东，中间隔 4. 绰尔纳河，其东部绘有 5. Горбица（格尔必齐河）。[②] 解读图 22－2 如下：1. Ц. Китайское（中华帝国），2. р. Аргуна（额尔古纳河），3. Нерчин（尼布楚），4. Черна（绰尔纳），5. Р. Горбица（格尔必齐河），6. Граница（边界、疆界），7. Албазин（雅克萨城）。可以看出，这里不是以绰尔纳河西部的格尔必齐河为边界，而以绰尔纳河东部的格尔必齐河为边界。

此外，还有个别的西伯利亚地图把格尔比齐河绘示在雅克萨城东部。譬如同样是列麦佐夫 1701 年绘制的以 *Чертеж земли Нерчинского города* 为名的地图就是如此（参见附录图 23－1、图 23－2）。[③] 这幅舆图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俄罗斯地图绘制者对格尔必齐河的位置也存有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是基于另外一些地图母本而产生的误解。这幅地图的另一幅抄本，也同样绘示出在小格尔必齐河附近为国界的意图。

以上是俄文地图的一些介绍。当然，绘示格尔必齐河等地及界碑图的中外舆图，不胜枚举，这里就不逐一论及。

如上所述，中俄两国舆图绘制者都未必对格尔必齐河的准确位置有所把握，中国舆图中出现的格尔必齐河绘示位置不同的问题，也同样出现在俄罗斯的早期西伯利亚地图上。尤其特别的是，到了

① 参见 *Атлас*: *Туран на старинных картах*：*образ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образов*：*Казахстан*，*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Прикаспий*，*Приуралье*，*Западная Сибирь*，*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Балх*，*Хорасан*，2008. с. 368－369。

② 引自 Leo Bagrow，*A History of the Cartography of Russia Up to 1800*，Walker Press，1975，p. 39。

③ Служебная чертежная книга：Семен Ремезов и сыновя，Тобольска，2006.

清代后期，甚至出现了格尔必齐河绘示在尼布楚城西部的情况。[①] 这些存在差异或错误的地图，也是导致两国学者长期争议其具体位置的一个原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问题的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整个清代都忽略了康熙二十九年以来定期巡视探察黑龙江流域地理状况的满文档案。特别是汉籍史料编纂者，基本上没有人关注满文档案中的重要价值，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这一状况迄今未有大的改进，期待更多的研究人员参与解读多种语言的档案史料。

在先行研究中一直以为康熙年间存在的国境碑，实际上在乾隆年间的视察中也没有能够发现。这个石碑后来在中外各国的各种地图和编纂史料中都有所记载，并成为世界史上的一个明确的事实——界定俄罗斯和大清国国境的象征。但是，它究竟以何种方式编入地图及编纂史料，至今还很少有人利用满文资料进行研究，所以，也导致了很多人对此坚信不疑。

以上这些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由于图画作品或地图所包含的政治性，它所展示的世界，是否就是历史事实？我们是否过于无条件地坚信图像资料？这幅《黑龙江流域图》带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意味深远、触及历史研究根本的问题。今后我们有必要对此继续探究和深思。

（二）爱浑城

让我们重新回到舆图，图中记载的有关西里母的河，康熙二十三年一月，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派遣三人到过此地。[②] 地图上的古爱浑城，从康熙二十三年三月开始议论建城计划，黑龙江将军提出“向兵部提出为征讨俄罗斯，现在准备移居爱浑之地，欲筑建木

---

① 《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1810 年绘制）就把格尔必齐河绘示在牛布秋城（即尼布楚城）的西部。参见《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第 211 页。

② 《俄藏黑龙江档》，康熙二十三年一月十一日纳哈布（nahabu）持来文书。

城”，并提及以前在穆鲁苏苏（mulu susu）之地建造的土城是依旧放置还是要摧毁的事情。[①] 同年四月十三日，委署营长楠岱（nandai）持来文书记载：

> 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谨奏，为奏闻筑城事。谨遵旨意，臣等亲自到爱浑之地，看古爱浑城（julgei fe hoton），见筑城之地被洪水冲坏。城西至河岸有五、六丈，船□无之处。此处无法指正。□□南十三里之东□□□□□□，从此至南十□□可□□。是故，在此处立四丈之木，正中捣以土，筑造木城。为此谨奏闻。[②]

为了建城，黑龙江将军亲赴现场进行了实地调查，提议建造木城事宜。除此之外，因爱浑之地异常寒冷，特报告黑龙江冰雪的厚度和地域的寒冷程度。黑龙江将军也报告了不知道此地何时为耕作季节。康熙二十三年元月二十九日，索伦副都统布克依（būkei）咨文报称：

> 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萨布素咨行钦差轻车都尉玛拉（mala）。尔咨文内称：达斡尔官兵及送给大军之牛、种子送至爱浑（aigūn = aihun）之地，几月几日可以送达？约定月日，尔等之处派出接送人员派来，将在约定之期前往。等语。查看黑龙江冰冻之状，结冰七尺厚余。看此结冰情形，三月之后，定当流动，至四月十、十五日。又，地方情势异常寒冷，地融之时同内地大相径庭，不知几月几日适合耕作，故预测有难。爱浑、讷地苏苏（nedi

① 《俄藏黑龙江档》，康熙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委参领吴色（use）持来文书。

② 《俄藏黑龙江档》，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委营长楠岱（nandai）持来文书。

susu）等地，询问原先居住之达斡尔等，几月几日可以耕种，预测耕作时节，送来牛、种子等事，预先咨文与我等，我处预期派遣前往接应人马。又，若有达斡尔将兵砍伐造屋木材前来，彼等乘隙前来，耕作之种突然前来，此处无可供食之物，是故，唯恐牛等瘦羸，耽误耕作。故应预先传信告知。为此咨文。①

此外，据同年二月二十五日参领苏纳喀（sunaka）持来的文书，为了存储谷物，各旗建造了储存粮食作物的仓库。汉文资料中有关爱浑城的记载非常有限，通过上引档案，也可以看出爱浑城当初建有储藏谷物的仓库的事实。② 后来，随着建设新的爱浑城，旧城也不再继续使用，为防止意外，命人将其毁坏。

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萨布素、副都统温岱、雅秦纳咨行兵部。为咨文事。尔等部咨文内称：查得，曾奏闻爱浑之地筑城进驻将兵，欲将在穆鲁苏苏之地建筑之土城尽行破坏之时，圣旨曰：咨文将军萨布素，次穆鲁苏苏之地之建筑若有必要留下尽可留下，若无必要，尽行破坏。等语。穆鲁苏苏之地之房屋无必要，尽行毁坏。为此知照咨行。③

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始建新的爱浑城，到六月已全部竣工。在《艾浑之地图》为题的图的左方（参见附录图 24），绘有木造的内外城、共四个城门的爱浑城。城内十字大道有四位人物交臂行走，

① 《俄藏黑龙江档》，康熙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索伦副都统布克依（būkei）持来文书。

② 《俄藏黑龙江档》，康熙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参领苏纳喀（sunaka）持来文书。

③ 《俄藏黑龙江档》，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初九日委散骑郎参领尼喀塔持来文书及《俄藏黑龙江档》，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初四日正红旗领催阿西塔带来文书。

屋室井然有序，图右上可见到疾驰的奔马、设有马鞍的备马。城外还有木栅，河岸还可以看到建筑设施。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清军帆船乘风破浪，在爱浑城附近的黑龙江上操演水军，如实地反映了当时两国交战前的紧张局面。[①]

康熙二十九年，为了应对日益迫近的噶尔丹势力，康熙帝在国内利用各种手段，从各方面对噶尔丹的活动进行了调查。同年五月，从投奔到大清国的准噶尔人口中得知，噶尔丹想借用俄罗斯的势力，准备攻打喀尔喀蒙古。[②] 康熙皇帝立即向前来北京的俄罗斯使者格利高里、伊万诺维奇下旨，派遣在京的俄罗斯人瓦西里告曰："噶尔丹迫于内乱向俄罗斯借兵准备攻击喀尔喀蒙古，因喀尔喀蒙古已归顺大清国，此话不可信。尽速派遣二人，前往尼布楚城头目伊万相告，告知俄罗斯之民。"[③] 如此，为了阻止噶尔丹势力的迅速东进并占领喀尔喀蒙古和俄罗斯南下侵害黑龙江诸部，在首先解决俄罗斯问题，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开始了定期视察黑龙江周边地区的活动，这一活动后来也成为大清国巡查边界的一个制度，汉文称为察边。其后，迅速将对外政策转向了准噶尔。有关这一点，已有专文讨论，此处不赘言。

五　康熙时期视察黑龙江以北各地河流

在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前，清廷对黑龙江流域进行过调查。

---

① 据李孝聪编著《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彩图十四《艾浑之地图》。

② 《清圣祖实录》卷146，康熙二十九年五月癸丑："上闻噶尔丹将借兵鄂罗斯。时鄂罗斯使人吉里古里、伊法尼齐等在京。上传谕之曰：噶尔丹迫于内乱、食尽无归、内向行劫。今乃扬言会汝兵同侵喀尔喀。喀尔喀已归顺本朝，倘误信其言，是负信誓，而开兵端也。尔等可疾遣善驰者二人，归告尼布潮头目伊凡，遍谕鄂罗斯之众。随命鄂罗斯瓦什力、齐克满驰驿先往。越三日，遣吉里古里、伊法尼齐等归。"

③ 《清圣祖实录》卷146，康熙二十九年五月癸丑。

康熙二十三年六月，通过利用鄂伦春人对大兴安岭与乌第河河源进行了调查。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初九日，委散骑郎参领尼喀塔（nikata）持来的文书记载：

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谨密奏，为奏闻事。鄂伦春之立克顶格（likdingge）前来报告：以前罗刹前来抓捕我等伙计吉尔蒙阿（girmungga），带至罗刹自己住地，途中吉尔蒙阿被杀等事，曾遣叶尔莫楞（yermelen）告知大军。同吉尔蒙阿一同被抓带走的迪阿旺阿（diyawangga）回来报告：罗刹派我前来通知，罗刹声称，尽速将我等伙计鄂伦春全部子女合并带来彼等城里。若前来，即可将人质吉尔蒙阿等给予汝等。若不来，就不给。等语。为此派遣前来。吉尔蒙阿没有被杀，现在还在。等因。前来告知。是故，我亲自前来告知。等语。询问立克顶格：汝等原先在居住何处？若罗刹前来侵害汝等，汝等前来我等军前居住。等因。（立克顶格）答称：我等原先并无固定的住所，我等每年同达斡尔易米一次，约定在西里木迪之地易米。得米之后，乘驮角鹿，我等随心所欲，越过罗刹居住之乌第尔河（udir bira），游牧打牲行走至海。若前来军队驻扎之处，没有喂食我等角鹿之青苔，我等唯有依靠角鹿生活，所以，无法前来此地。等语。询问罗刹筑城居住之处间，答称：自爱浑之地至我等现在游牧之西里木迪处，为了同达斡尔等人易米，原来骑马行走二十日可以抵达，自西里木迪之地，至北海之间的兴安岭，我等骑角鹿行走七日可以抵达。期间三日路程，没有马可以食用的草。自（兴安）岭向北海方向走去时，第七日可以抵达叟里河（seoli bira），行走的道路，尽为湿地泥巴。自叟里河向外，山峰众多，依山峰险处寻路，避险而行，第六

日可以抵达罗刹居住之乌第尔河城。等语。询问以前降服的罗刹费利浦（filib），答称：我自西里木迪向外行走直抵叟里河，尽为丛林泥巴。若夏季，因道路泥泞，无法骑马行走。冬季大雪，没有马可以食用的草。等语。为此臣等商议：罗刹居住之乌第尔河城之处，水路可通。若有可用马运抵红衣炮之路，我等遵照应派大军前往。鄂伦春等先前无定居之地，与达斡尔等易米时，在西里木迪约定地点，一年贸易一次。贸易结束后，游牧打猎，越过罗刹，返回到海的游牧之人。没有水路运送红衣炮，通往罗刹居住之乌第尔河之城。所以，不可派兵。故合并将立克顶格前来报告之语奏闻，敬谨密奏。

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臣萨布素

副都统加一品臣温岱

副都统臣雅秦纳①

这份报告生动地再现了俄罗斯属人罗刹和鄂伦春人之间的关系。西里木迪河周边地区是达斡尔人和鄂伦春人定期贸易的地区，在没有界定国界的时代，鄂伦春人乘骑马鹿游牧到北海地区，这一地区是他们自由往来的生活区域，不仅满洲人同他们交往，俄罗斯的属民罗刹人也同他们进行贸易往来。所以，康熙二十三年，如何征讨远在乌第河的罗刹部众，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从此也就开始了远征乌第河的计划。

① 《俄藏黑龙江档》，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初九日委散骑郎参领尼喀塔持来文书。此外相关内容的资料可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21，康熙二十四年七月己卯载："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疏报：无底儿河罗刹鄂衣多里，遣罗刹宜番等四人，来诱鄂罗春立克顶格等，被擒送到。上谕：罗刹宜番等，应即置之重典，但大兵攻克雅克萨，势迫来归之罗刹，既悉加宽宥，不行诛戮。今宜番等亦免死，晓以前此释归罗刹之故，并用罗刹字作书，令彼送还我吉尔蒙阿等，毋得再犯边境，其书即给与宜番等持去，立克顶格等，所司照例奖赏。"

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萨布素谨密奏闻，为请旨事。兵部来文内称：议政王等议奏，将军萨布素等，为此事宜。康熙二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奏，四月初二日，得旨：议政王、贝勒、官员等会议上奏。钦此。钦遵。臣我等议得，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萨布素奏称：居住西里木迪河之鄂伦春立克顶格前来告称：二月内，有罗刹前来我等游牧之地，向我等言称：我等在海的方向的无底儿河筑城居住。汝等杀我罗刹，故我等八十人前来，在从此处有一日路程之外等候（汝等）。汝等按原先贡纳。我等抓捕汝等子女为人质。言称之际，我等无法与彼等对抗，故送我子为人质。罗刹自北海之方向，翻山而来，将立克顶格等鄂伦春之子为人质，唯恐他们在西里木迪居住，派遣营长二人，将兵三百人，携带神威将军（大炮），派去船只。若罗刹在西里木迪，说服彼等降服。若不降，酌情攻取。若罗刹将质子带去，撤回彼等城内，前往之兵应撤回。等语。查得：将军萨布素等称，罗刹自北海越山而来，唯恐在西里木迪居住。派出将兵，携带神威将军乘船前往，钦此。钦遵。依奏。严训前往将兵，西里木迪之地，若有罗刹，巧言劝降。若不降，尽行歼灭。若罗刹不在西里木迪，撤回前往，居住在何处？如何前往之处，详细如实探明，将兵撤回。将探信奏闻。等语。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初四日奏，是月初七日，旨：官兵前往，若有罗刹，见机行事，书内称罗刹自北海越山而来等事，自何处之北海越山而来？撤回之时，又越过何处之海，前往彼地？将此明白查询，将军萨布素等查来奏闻。其他依议。钦此。钦遵。[1]

---

① 《俄藏黑龙江档》，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初九日委散骑郎参领尼喀塔持来文书。

针对康熙皇帝的一番问语，将军萨布素再次重申了立克顶格的回话。

> 查得，先前鄂伦春立克顶格声称：罗刹越北海而来，曾遵照立克顶格之言上奏。现询问立克顶格：罗刹从何处之北海而来？撤走之时从何北海而走？答称：罗刹非越海而来，我等现在游牧之西里木迪河源之北，有大兴安岭（amba hinggan dabagan），兴安之外有海。原先在海岸之乌第儿河筑城居住，罗刹翻越兴安岭前来我等游牧之地，撤走时，亦按彼等来时返回。乌第儿河有城。等语。询问立克顶格，彼大概指示罗刹居住之乌第儿河城及有海的方向，彼指向东方。为此谨详奏闻。①

清朝通过鄂伦春人第一次了解到有关兴安岭的具体位置是在西里木迪河源流以北的地方。简而言之，黑龙江以北的高山地带称为兴安。兴安之名本来是各地所在高山的泛称。康熙年间出现的兴安一词，毫无疑问是指黑龙江以北的大兴安岭地带。

有关在黑龙江以北地区进行调查一事，1997 年松浦茂发表的文章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专论。② 他在文中论及郎谈的《吉林九河

---

① 《俄藏黑龙江档》，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初九日委散骑郎参领尼喀塔持来文书。鄂罗春（即鄂伦春）人名及地名汉字，据《清圣祖实录》卷 121，康熙二十四年七月己卯条。

② 松浦茂：《ネルチンスク条约直后清朝のアムール河左岸调查》，第 101 页。后收入《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第 30 页。英译文参见 Matsuura Shigeru, The Qing Surveys of the Left Bank of the Amur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Treaty of Nerchinsk,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 68. 2010. pp. 1 – 33。松浦茂使用“调查”一词，但是，满文的调查为 baicambi（调查、查照）。原档使用的满文为 tuwanabure（前往视察、前去观看），故本文译为“视察”。近来，吴雪娟撰文介绍九路巡边事迹，但未参照松浦茂的研究，且吴雪娟以为《吉林九河图》就是康熙二十九年绘制的《九路图》，这一结论有待进一步商榷。

图》相关问题，总结认为："同时清朝人在阿穆尔（黑龙江）地方的地理知识，是以康熙二十九年的调查为顶点……所以，北岸地区调查的相关地理知识，此后几乎没有任何进步，整个清代都没有出现超过郎谈的地图。"显然，这是没有对北岸调查以及巡视国境时留下的档案文书资料和绘画、地图进行全面解读而导出的结论。实际上，康熙以后的各个时代都进行过深入的调查工作。我们从乾隆时代的一份满文档案可以窥见一斑。现介绍如下。

乾隆三十年八月二十二日，黑龙江将军富僧额（fusengga）、斡木布（ombu）、瑚尔其（hūrki）的奏折具体记载：

> 前往精奇哩江（康熙朝又记为 jingkiri ula，锦衣里江——引者注。以下括号内同）河源视察之协领纳林布（naribu）称：今年四月初四日，我率将兵自黑龙江城出发，乘小刀船、独木舟，溯上黑龙江抵精奇哩江口，向北步行四十九日，至托克河（拖呵河）口。精奇哩江河身弯曲狭窄，水险且浅。舟艇无法前行，背负行粮步行穿越山峰、山后密林、狭沟泥泞之地。时有伐木为道，行八日，至精奇哩江源，探寻周围，不见设立垒堆标示之碣石之鄂博。自此处行一日，抵兴堪山（满文记为大兴安岭，下同），探寻周围亦不见设立垒堆标示之碣石、鄂博，故在山梁形胜处，堆立石鄂博，明记视察年月日，以桦皮坚包，埋于鄂博之内。查看兴堪山山阴之处，放眼尽处不见山脉，尽生大片森林。处处亦可见湖水，我等攀登之兴堪山山阴之处，不见俄罗斯踪迹，亦不见烟火。自托克河口至兴堪，地方寒冷无牧地，不见禽兽。夏秋不可骑行。自托克河口下至精奇哩江口，夏季亦不可骑行。若冬季小雪，有些地方可骑行，有些地方不可骑行。我等绳量查得，自黑龙江城以水路至流入精奇哩江之托克河口，共一

千五百八十七里，托克河口至兴堪山，陆路二百四十里，故我等呈报查看地理、河流绘画。

前往视察西里木第河之协领伟保（oiboo）等称："我率将兵，于本年四月初一日，自黑龙江城出发，乘舟艇，溯上黑龙江，进黑龙江，自精奇哩江进入西里木第河口，直溯东北方，行四十四日，跨越流入西里木第河之英肯河（yengge bira，英额河）河口行走二十里，河流湍急多石，独木舟、刀船无法行进。故背负行粮，步行三日，至西里木第河源。探寻查看河源周围，并无堆立碣石为鄂博之处。自西里木第河源步行三日，至兴堪山。探寻查看周围，亦无堆立碣石为鄂博之处，故在山梁形胜之处，堆立石鄂博，记视察年月日为文，以桦皮坚包，埋置于鄂博之内。登高望远，兴堪山梁之西，辟出两处山梁，我等登之兴堪山梁，为南部山梁，延伸为南方。北方之一山梁，伸向兴堪山梁之东。两座山梁在兴堪山之间，自西方有一河流向东方。询问鄂伦春向导（gajarci）等，告知称之为乌第河。查看我等攀登之兴堪山山阴处，并无俄罗斯人踪迹，亦不见烟火。自英肯河口溯流至兴堪山梁山阳处，山峰险峻，山沟众多，树木森林茂密，地方寒冷，无牧场。偶见堪达汉踪迹，全然不见禽兽。夏冬均无法骑行。自英肯河口溯流而上至西里木第河口，山峰、河溪、森林皆甚茂密，道路泥泞。但若冬季雪少，亦可骑行。夏季时分，无法骑行。我等绳量得知，水路自黑龙江城至英肯河口二十里之外，共一千三百五十里。自陆路至兴堪山一百八十里。故我等呈报查看地形、河流名称绘写地图。"

前往视察纽曼河（即牛满河）源之副都统级协领阿迪木保（adimboo）等称："（我等）率将兵，于四月初一日，从黑龙江城出发，乘舟艇溯流黑龙江，进纽曼河口直

溯而上，第二十六日，至纽曼河口往下喀母泥口。喀母泥地窄，河流弯曲激流，处处为岩石，无法以木船、独木舟前往。故驻留十三日，以桦木为舟，内装行粮，行走十三日，出纽曼河上流喀母泥。行七日，抵鄂尔喜（olhi）、西里木第两河汇流之泥牙母善（niyamšan）。”鄂伦春等向导告称：“此两河交汇之泥牙母善，即为牛满河源。我等布特哈索伦、达斡尔、鄂伦春等唯抵此处猎貂行走，此外之地，尽为恶处。进两河交汇处详查，得知并无堆立标示之碣石、鄂博。极力溯流强行西里木第河，行六日，抵乌默勒德（umelde）河口视察，河窄弯曲，尽布巨石，草木丛生，桦木船无法前行。故我等将兵将行粮，背负背物架步行，深山幽峰，岩石林立，沿着山沟而上，伐山后密林为道，深陷泥泞之处。时有以鄂伦春语称之为布尔吉库塔（bulgikta）之木头，自一寸至四、五寸不等。叶形如松叶，匐地连绵。手持杖木，行走十八日，抵兴堪山之顶。寻查周围，亦无堆立标示之碣石、鄂博。放眼兴堪山山阴地，向外连绵荒山野岭，尽生密林，不见河流，亦不见人踪，更不见烟火。故在山梁形胜处堆立石鄂博，将视察年月日，缮写文书，以桦皮坚包，埋置鄂博之内。问鄂伦春向导如何前往东海之方。彼等答称不但自己不知，亦未听祖父说起过。故自兴堪山下山，挑选士兵，解除背负行粮，前往寻海。沿兴堪山麓两日，向东方手持杖木，步行于岩石、荒山野岭及山沟之处，全然无水。搜寻洼地空穴，到处掘地，找到少许冰块，用以炊事。又登兴堪山高处远望，放眼尽处尽为山，不见河流，亦不见海。因不得水，率领将兵循原路返回。自纽曼河上溯喀母泥口抵兴堪山，夏冬均不可骑行。乌默勒德河口向至外兴堪山，亦无鸟兽。我等自黑龙江城绳量至乌默勒河口，水路一千六百

> 一十五里。自乌默勒德河口至兴堪山（大兴安岭），陆路四百五十六里，故呈报我等视察地方、河流之名绘写地图。①

显然，通过以上档案资料可以知道，在黑龙江以北地区，乾隆年间也进行过视察活动，这些活动结束之后，也制作过详细绘写地名与河流名称的地图。期待今后这些地图在满文地图整理研究过程中能够得到发现。

如此，《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提出视察黑龙江北岸的路线方案。这时已提出了视察黑龙江以北地区的详细计划包括两条路线方案。

1. 索伦总管玛布岱率领视察队伍，视察从额尔古纳河口上溯到墨里勒肯，从北方兴安流入黑龙江以及汇流的精奇里、西里木迪、牛满等处的河源。具体由熟悉当地地理环境的鄂伦春人和索伦人负责向导。

2. 宁古塔将军佟宝等视察队伍，负责视察从黑龙江和松花江汇流之处到墨尔根，从北方的兴安流入松花江的奇木尼（kimnin）、库鲁（kuru）、吉林（girin）、恒滚（henggun）等地水源。由奇勒尔人负责向导。

以上两路的向导都由在当地有过生活经验的人员组成。确定视察路线之后，重新奏议了对视察队伍的整编问题。② 最初就决定以视察黑龙江流域的各地河源为具体内容。③ 经多方议论之后，康熙二十九年二月十四日，决定编制九路前往视察的人马和视察的详细

① 《俄藏黑龙江档》，乾隆三十年八月二十二日。部分人名、地名汉字采用了《清高宗实录》卷743，乾隆三十年八月癸亥条记载的相关汉字。

② 《黑龙江档》1－10《康熙二十九年吏、兵、刑部、督捕衙门、盛京刑部来文抄档》正月初四日笔帖式德珠持来文书。

③ 《黑龙江档》1－10《康熙二十九年吏、兵、刑部、督捕衙门、盛京刑部来文抄档》三月初五日正黄旗领催宋图（sungtu）咨文。

路线。同年二月二十二日记载：

> 奉旨：宁古塔三路由巴海（bahai）①、巴尔达（balda）、苏赫（suhe）行走。墨尔根三路由郎谈（langtan）②、沙纳海（šanahai）、诏三（joosan）③、安珠瑚（anjuhū）④ 行走。黑龙江三路由穆图（mutu）⑤、诺敏（nomin）⑥、华善（hūwašan）、纳沁（nacin）行走，等语。⑦

在这九路之中，前往宁古塔的三路为：都统巴海带领亲兵，披甲六人，笔帖式一人，三等侍卫一人，俄罗斯领催一人；副都统苏赫带

---

① 《八旗通志初集》卷 167，巴海传（汉文，第 4130～4131 页；满文，第 34～37 页）及《满汉名臣传》卷 10，巴海传。前者记巴海于康熙二十五年病殁，实际应为三十五年。有关此点，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第 36 页注（17）已经指出。有关巴海探察的路线，杨宾撰《柳边纪略》卷 1 记载："威伊克阿林，极东北大山也。上无树木，惟生青苔，厚常三四尺。康熙庚午与阿罗斯国分界，天子命镶蓝旗固山额真巴海等分三道往视，一从亨乌喇入，一从格林必拉入，一从北海绕入，所见皆同，时方六月，大东海尚冻，遂立碑于山上，碑刻满洲、阿罗斯、喀尔喀文。"

康熙庚午为康熙二十九年，我们从巴海探察后绘制的《乌喇等处地方图》来看，图上并没有绘制界碑。汉文史料记载的立碑且碑刻满洲、阿罗斯、喀尔喀文一事，从当年的满文档案及舆图资料中无法得到证实。详情参见承志《满文〈乌喇等处地方图〉考》，《故宫学术季刊》第 26 卷第 4 期，2009，第 1～74 页。

② 《八旗通志初集》卷 153，郎谈传（汉文，第 3882～3893 页；满文，第 18～56 页）。

③ 诏三，又作兆三，均为满文 joosan 之异译。

④ 《八旗通志初集》卷 151，安珠瑚传（汉文，第 3840～3841 页；满文，第 4～9 页）。安珠瑚，康熙十七年曾任盛京将军。参见《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序）卷 14，职官，将军衙门，安珠瑚，满洲人，康熙十七年任。此外，安珠瑚，正黄旗人，于康熙六年曾任宁古塔副都统。亦可参见《吉林通志》（光绪十七年序）卷 87，安珠瑚传，第 27～31 页。其内容为其他资料所不见。

⑤ 参见《八旗通志初集》卷 205，穆图传（汉文，第 4753 页；满文，第 10～11 页）。

⑥ 参见《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 275，诺敏传。

⑦ 《黑龙江档》1－10《康熙二十九年吏、兵、刑部、督捕衙门、盛京刑部来文抄档》三月十四日镶黄旗奇勒德（kilede）牛录领催吴岱（udai）送来文书。

领亲兵，披甲二人，俄罗斯领催一人；副都统巴尔达带领俄罗斯领催一人。前往视察的方法是通过陆路和水路，每个视察队伍的人数包括章京各三人，士兵各五十人。① 从参加人员的数字可见其规模之大。

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兵部咨文决定从墨尔根三路前往视察，具体由都统郎谈、副都统沙纳海，副都统诏三、索伦总管安珠瑚等带领船只和匠人。②

安珠瑚，满洲正黄旗人，姓瓜尔佳氏，世居苏完地方。安珠瑚兼通满汉文，选入翰林院，任检讨。康熙二年调参领，康熙六年升宁古塔副都统，寻调吉林乌喇。康熙十七年，圣祖特谕：安珠瑚实心办事，殚谋竭虑，诚为称职。将扎努喀等各姓新满洲及席北等，编为牛录，使人各得所，于国大有裨益，深属可嘉。着加世职为一等阿达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是年升奉天将军。康熙二十二年，以疾乞休忤旨，销去本身所得官，以原袭拜他喇布勒哈番，在吉林乌喇地方效力行走。二十三年，随都统彭春往征罗察，黑龙江将军委为前锋章京，掠图虎鲁河有功。二十四年，复随彭春攻雅克萨城，降六百余人，以功授索伦地方总管，督索伦、打虎儿等于墨尔根、波尔多开垦田亩。康熙三十二年，以年老致仕。③ 所以，可以说安珠瑚等人熟悉黑龙江地区的地理形势。

康熙二十九年五月初一日，郎谈等人到达索伦、达斡尔居住之墨尔根之地。墨尔根三路分别为：都统郎谈带领亲兵，披甲八人，笔帖式一人，俄罗斯领催一人；副都统沙纳海带领亲兵，披甲二人，俄罗斯领催一人；副都统诏三带领亲兵，披甲三人，俄罗斯

---

① 《黑龙江档》1－10《康熙二十九年吏、兵、刑部、督捕衙门、盛京刑部来文抄档》三月十四日镶黄旗奇勒德牛录领催吴岱送来文书及三月二十六日镶白旗领催康吉纳（kanggina）送来文书。

② 《黑龙江档》1－10《康熙二十九年吏、兵、刑部、督捕衙门、盛京刑部来文抄档》三月二十六日镶白旗领催康吉纳送来文书。

③ 《八旗通志初集》卷151，安珠瑚传（汉文，第3840～3841页；满文，第4～9页）。

披甲一人。其后进一步确定了具体的人马和路线：都统郎谈视察从墨里勒肯（merilken）、额尔古纳等地的疆界之地，参加人员有库图勒（kutulen）[①] 九名，笔帖式秀常（siocang）、罗刹骁骑校乌戈番（ugefan），亲丁四名，画匠一名，石匠两名；副都统兆三带库图勒八名，亲丁三名，罗刹一名，画匠一名，由黑龙江仓库发给一个月的食物；副都统沙纳海视察到精奇里方面的疆界，带领库图勒八名，亲丁两名，罗刹领催一名，库图勒一名，画匠一名，亦从黑龙江仓库发给四个月的口粮。

黑龙江三路中，确定镶黄旗前锋统领穆图前往视察西里木迪方面的疆界，令其率领亲丁四名，罗刹一名，画匠一名，库图勒五名，由黑龙江仓库提供四个月的口粮。其余两路，都统诺敏、副都统华善率领的巡查路线以及人数、何处供应口粮等问题，此时还未能最终确定。[②]

康熙二十九年开始的国境巡视制度和黑龙江流域巡视报告的详情，笔者将另文进行详细讨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这些地理调查活动同大清国的政治、军事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后继续进行的地理调查和绘制地图的具体活动，据我所知，有如下几次。康熙三十二年，黑龙江将军越过兴安岭，直下海拉尔河（kailar bira），抵达额尔古纳，从达兰多滚（dalan dogon）之地向西，到呼伦贝尔、乌尔孙（ursun）、克鲁伦（kerilun）、喀尔喀河（kalka）等地进行了调查工作。康熙三十三年，越过索岳尔济山（soyolji alin），抵达喀尔（kar）、布尔（bur）、依本（iben）、霍奇（hoki）等河流进行了调查。[③] 还有康熙三十四年，开始着手调查

---

① 旗人的随从，也可以是自己的兄弟以及亲属人员。

② 《黑龙江档》1－15《康熙二十九年五月奉天、宁古塔将军、黑龙江副都统、索伦总管、驿站官行文抄档》五月十五日正红旗鄂尔古勒（ergule）牛录披甲顿珠（donju）咨文。

③ 《黑龙江档》5－4《康熙三十四年正月吏、兵、刑、理藩院、盛京兵、刑部行文抄档》正月初四日领催达力布（daribu）送来文书。

黑龙江上游的克鲁伦河源流以及肯特汗山、布尔巴图汗山、杭爱汗山的地理环境。[①] 其目的是全面详细测量所有的调查区域的道里远近以及地形地势，同时对军事上重要的地区采取了安设卡伦，驻军防守的措施。这些活动也为康熙三十四、三十五年阻止逐渐逼近的准噶尔势力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之前进行的黑龙江上游以及蒙古高原的地理调查，其实都为后来采取的战略计划做好了一个前期准备。不仅如此，也为后来的全国性测绘事业和绘制《皇舆全览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黑龙江流域也在康熙三十年、三十四年以及后来的四十六年、四十九年、五十年，陆续进行过河源视察，这些活动都留下了大量的满文奏折。这些奏折至今没有得到全面解读和研究。笔者准备今后逐一详细介绍，供学界研究参考。

如上所述，康熙二十九年，大清国对黑龙江流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调查。康熙四十九年绘制《黑龙江流域图》后，康熙五十年三月十二日，黑龙江将军及副都统咨文通知三姓姓长坎岱(kandai)，告知已派出火药章京[②]（tuwai janggin ）卓尔阔（jolko）前往察看鄂模吞湖、巴蓝河、华扎哈塔尔哈、察喀拉库哈达、西林河等山峰、河流、湖泊。命令三姓姓长等人，至卓尔阔抵达后，派出熟知此等山峰、河流、湖泊之向导（gajarci)，由驿传递派出，毋得耽误。[③] 说明当时非常重视地理调查活动。康熙五十年七月二十日，笔帖式散珠带来的文书记载了绘制《黑龙江流域图》后，又按照图内的地名调查将军驻扎的齐齐哈尔城与河流之间的里程，

---

① 《黑龙江档》5-7《康熙三十四年正月奉天将军、宁古塔将军、伯都讷副都统、齐齐哈尔城副都统级总管来文抄档》十二月十四日领催乌鲁依送来文书。

② 满文原文记为 tuwai janggin，具体不明，在此暂且译为火药章京，存疑。

③ 《黑龙江档》17-17《康熙五十年正月奉天、宁古塔将军、伯都讷副都统、土谢图亲王、扎萨克图郡王、扎赉特、杜尔伯特等行文抄档》三月十二日寄给骁骑校卓尔阔（jolko）之文。估计骁骑校卓尔阔与火药章京（tuwai janggin）卓尔阔同属一人。

其具体工作由骁骑校卓尔阔负责。调查结果可参见本文附录之表4。[①]

这一文书中指出，绘制《黑龙江流域图》之际，上述地区中的河流、湖泊、山峰与齐齐哈尔城之间的距离还不太明了。所以到康熙五十年专门派骁骑校卓尔阔到鄂模吞湖附近调查，并吩咐三姓姓长派出向导协助调查。这也说明了当时的地理调查，一般由将军衙门派专人到地方，由地方协派熟知地方地理情形的向导协助调查的事实。

六　结语

《黑龙江流域图》以《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于康熙二十九年开始的国境立碑计划和一系列的水源巡察为背景绘制而成，是当时绘制的多幅舆图之一。具体的绘制工作是在黑龙江将军的指挥之下，由以狩猎为职业的布特哈八旗的索伦、达斡尔、鄂伦春以及康熙年间被编入八旗佐领的俄罗斯旗人的协助下绘制而成。他们熟知当地的地理环境以及各地河流、水源的详细路线。地图上注明的汉字“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应该是绘制年代，这同笔者查阅的《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吏、兵部、理藩院、盛京兵部行文抄档》十一月十二日笔帖式散珠（sanju）送来文书的记载相一致。可以知道，这幅地图是遵从兵部之令“将黑龙江将军辖地绘送前来”的指示绘制的。[②] 另外，《黑龙江档》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初二日笔帖式王斯达（wang sy da）送来文书记载：“额苏里是河名还

① 《黑龙江档》17－13《康熙五十年元月吏、兵、理藩院、盛京兵部行文抄档》七月二十日笔帖式散珠送来之文。

② 《黑龙江档》16－22《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吏、兵部、理藩院、盛京兵部行文抄档》十一月十二日笔帖式散珠（sanju）咨文。

是地名?"[1] 针对这一疑问回覆的《黑龙江档》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十二日笔帖式王斯达送来的文书记载:"额苏里为地名。"[2] 这一内容亦恰好在《黑龙江流域图》内同样记载为"额苏里为地名"(参见附录表2之85及表3)。从中也可以知道,绘制《黑龙江流域图》所依据的奏折和地图的绘制年代完全一致。其目的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编纂《大清一统志》的黑龙江将军辖地,图上注明的年代,也道出了该图绘制于"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从绘制方法来看,它是传统的中国山水画风格的地图。从其巨大的尺幅和着色这两点来看,是在同奏折和地图一并奏闻皇帝之后,在宫中绘制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它是不同于《皇舆全览图》的一幅重要的满文地图。目前,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多幅康熙时期的满文舆图,同黑龙江有关的舆图还有十几幅,今后有必要将这些舆图和其他国家收藏的相关舆图进行综合比较研究,这些都留待今后继续查考。

本文限于考察康熙时期绘制的《黑龙江流域图》,通过本文所利用的满文档案,可以发现,将来我们有必要深入全面解读包括《黑龙江档》等在内的满文档案。解读和分析这些资料,对全面研究考察大清国历史,必将带来一个新的视野。这些工作也是我们理解大清帝国的关键所在。

---

① 《黑龙江档》16-24《康熙四十九年正月黑龙江副都统、墨尔根城协领、索伦总管、驿站官行文抄档》九月初二日笔帖式王斯达咨文。

② 《黑龙江档》16-23《康熙四十九年正月黑龙江副都统衙门、墨尔根城协领、索伦总管、驿站官来文抄档》九月十二日笔帖式王斯达送来文书:"esuri sahaliyan ulai hoton i amargi juwe tanggū ba i/ dubede sahaliyan ulai dergi dalin de bi, esuri serengge bai gebu, / esuri teisu emu bira bi sehebi"(额苏里,在黑龙江北二百里之外,位于黑龙江东岸,额苏里为地名。额苏里对面有一条河);另外,《黑龙江档》16-22《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吏、兵部、理藩院、盛京兵部行文抄档》十一月十二日笔帖式散珠送来文书:"esuri serengge ba i gebu. esuri teisu bisire bira be/ herel bira sembi."(额苏里为地名,额苏里对面之河,称为赫勒里河)

附录［一］档案

满文《黑龙江档》

资料来源：《黑龙江档》2－3，第143～145页。

说明:《康熙二十九年元月户、吏、工、理藩院、盛京户部、工部来文抄档》,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依尔喀(ilka)驿丁赫孙(hesun)送来之文(elhe taifin i orin uyuci aniya aniya biyaci boigon, dorolon, weiler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mukden i boigon, weilere jurgan ci isinjiha bithe be araha dangse)

原件上题头墨字字迹不同,应为后来补写。转写采用了以下符号表示文书原貌://表示册档页码,/表示行末,[+]表示补充,[#]表示涂抹删除,[* *]表示文书该处抬头。

满文转写:

[#er] gune, [+b] a/ be/

weilere jurgan i bithe, sahaliyan ulai jiyanggiyūn de unggihe, / * * hese be baire jalin, meni jurgan ci, ere baitai jalin, wesimbuhengge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ci benjihe bithede, hebei wang se gisurefi wesimbuhengge, ne toktobuha/ hešen erhune i angga, gerbici birai angga de ilibure bei wehe de, manju/ bithe, oros bithe, latino [+ gurun i] bithe araraci tulgiyen, jai monggo, nikan bithe/ inu araci acambi, erebe weilere jurgan de afabufi, bei weilebuki sehebe, bithei 143//144 yamun de sunja hacin i bithe be arame bakdara kemun be ganame bithe [+ unggihe] bihe, / te bithei yamun ci bei hergen be arafi kemun benjihebi, amban be baicaci, / bithei yamun ci benjihe erhune i angga, gerbici birai angga de ilibure bei de/ arara manju, monggo, nikan bithe be, bei julegi ergide foloro, oros bithe/ latino gurun i bithe be, bei fisa [#de] ergide foloro bithei kemun ci, bei uju/ sun dzi sindame weileci, den jakūn cy, onco ilan cy emu tsun, jiramin jakūn/ tsun i wehe juwe farsi, tsun dzi weilere de den juwe cy juwe tsun, onco ilan/ cy ninggun tsun, jiramin emu cy ilan sun, wehe juwe farsi baibumbi, ubaci/ weilefi gamaci, jugūn goro isibure de

mangga be dahame, erebe 144// 145 * * mukden, ningguta, sahaliyan ulai jiyanggiyūn sede bithe unggifi, ya bade ere cy/ tsun de acanara wehe bisire babe baicabume, jai ehune, gerbici ere juwe/ jugūn de hešen ilibuha be tuwaname genere ambasa inu erhune, gerbici/ šurdeme ere cy tsun de acanara wehe bisire akū, jai ere juwe ba i/ šurdeme hanciki alin be sacifi bithe foloci ojoro ojorakū babe tuwafi/ isinjiha erinde jai gisurefi wesimbuki sembi seme elhe taifin i orin uyuci/ aniya ilan biyai ice ilan de jedzi de arafi wesimbuhe, ineku inenggi, / * * hese gisurehe songkoi obu sehe; erei jalin sakini seme unggihe, / * * hesei dorgi baita be baicame tuwafi gingguleme dahafi yabubureo; ilan biyai ice sunja; 145//146.

附录［二］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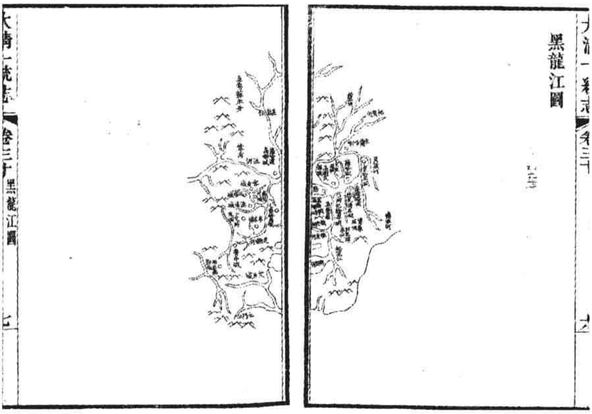


图 1 《大清一统志》卷 30 黑龙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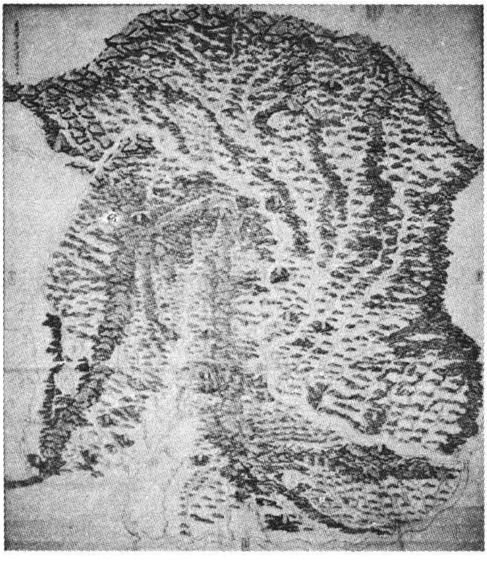


图 2 《黑龙江流域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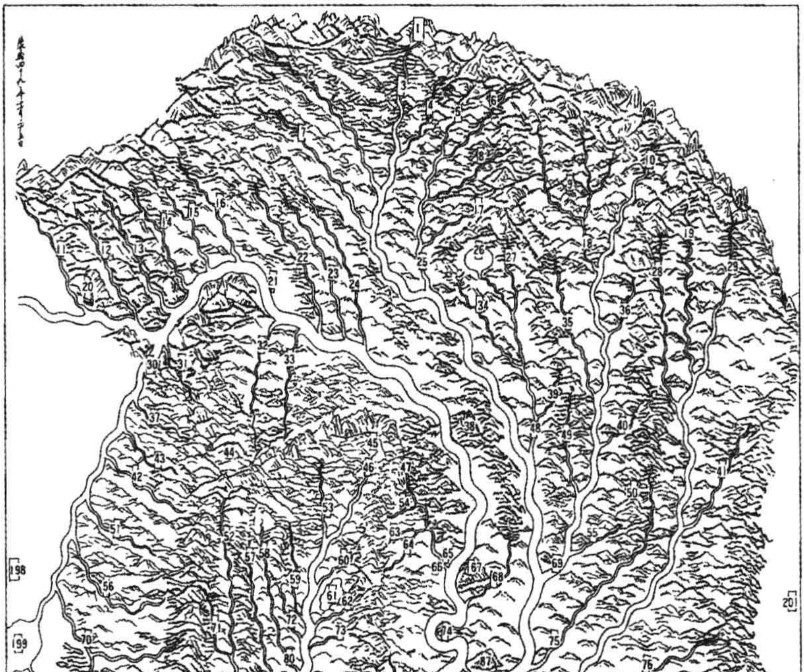


图 3　《黑龙江流域图》，笔者摹写、编号，地名对照见表 2、表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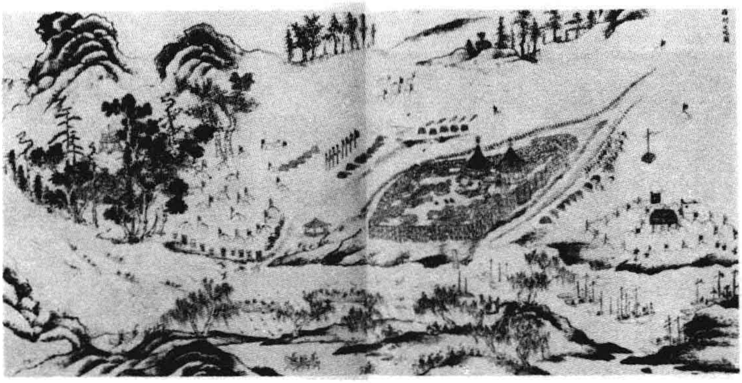


图 4　康熙年间的雅克萨城，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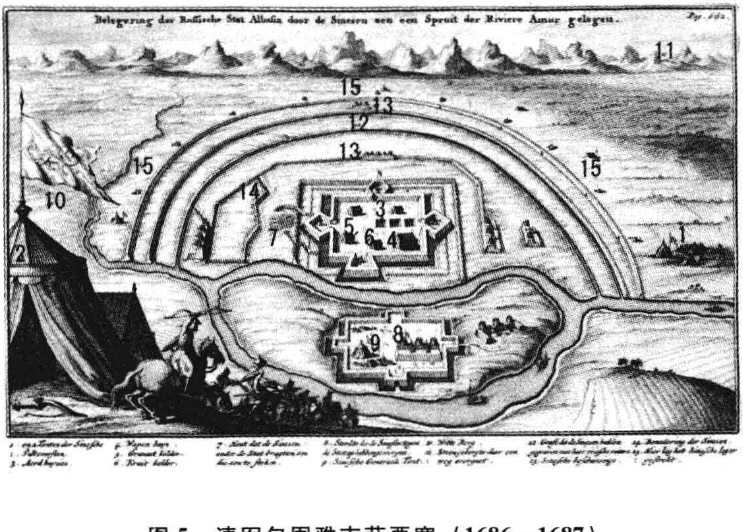


图 5　清军包围雅克萨要塞（1686 ~ 1687）

1、2. 清军之帐　3. 堑壕　4. 武器库　5. 榴弹库　6. 火药库　7. 清军准备的烧毁要塞的薪柴　8. 雅克萨对面的清军堡垒　9. 清军将领之帐　10. 白山　11. 石山　12. 渠沟　13. 堑壕　14. 清军接近阵地　15. 清军宿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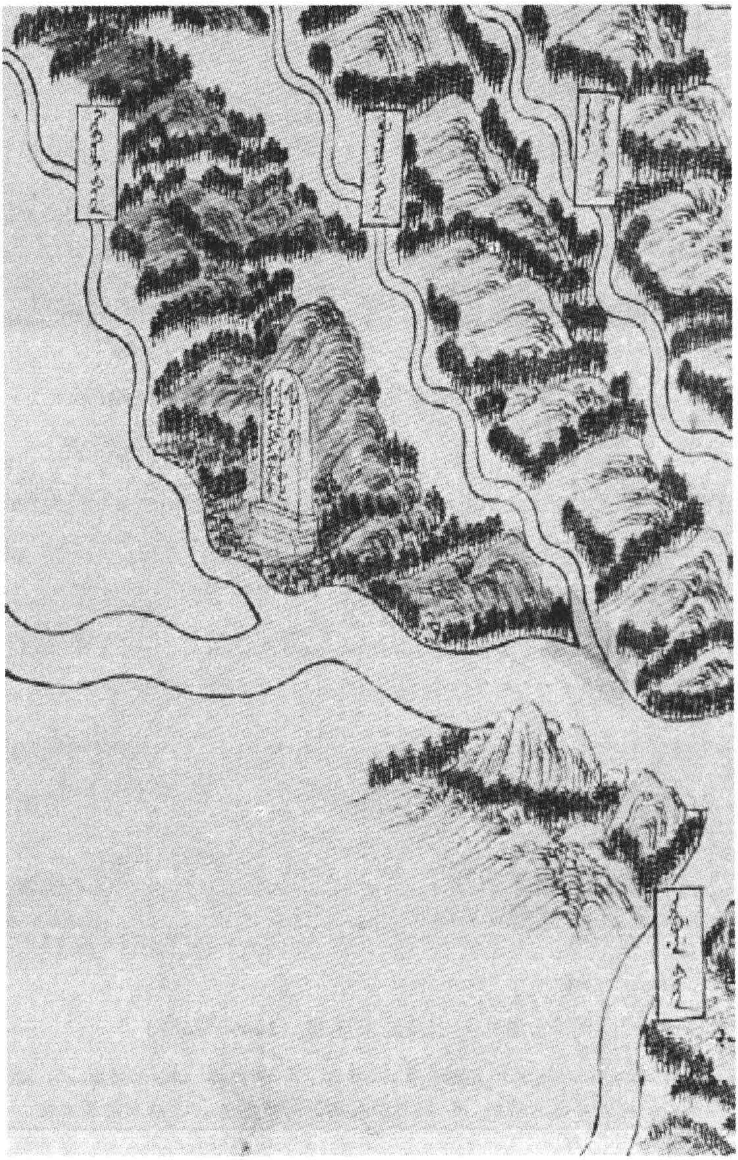


图 6　《黑龙江流域图》局部放大　界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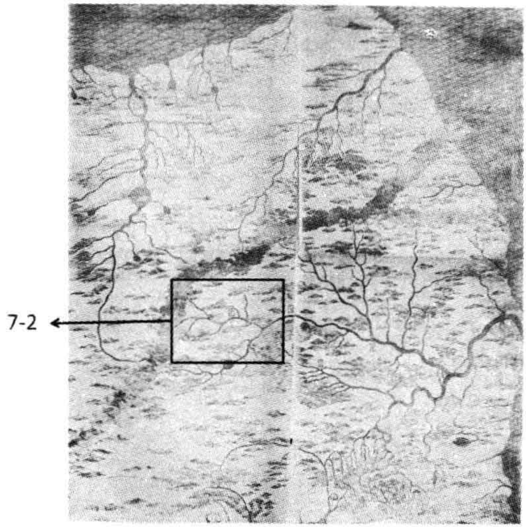


图 7－1　满文《东北亚地图》

资料来源：Fuchs，Walter（福克司），Ueber Einige Landkarten mit mandjurischer Beschriftung，《满洲学报》第 2 期，满洲学会，1933，第 1～1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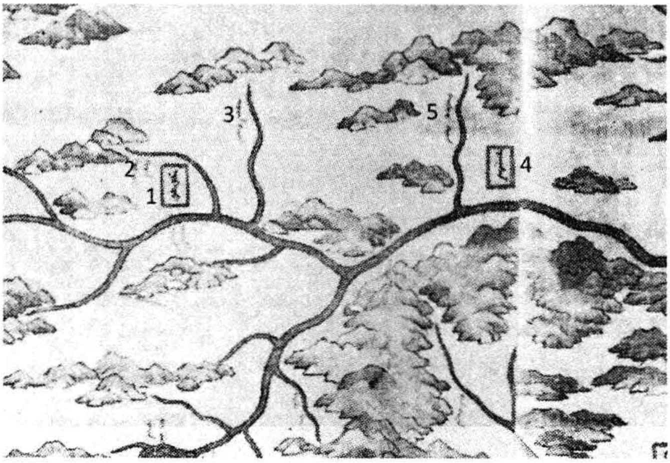


图 7－2　局部放大　两条格尔必齐河

1. nibcu（尼布楚）　2. gerbici bira（格尔必齐河）　3. corna bira（绰尔纳河）　4. yaksa（雅克萨）　5. gerbici bira（格尔必齐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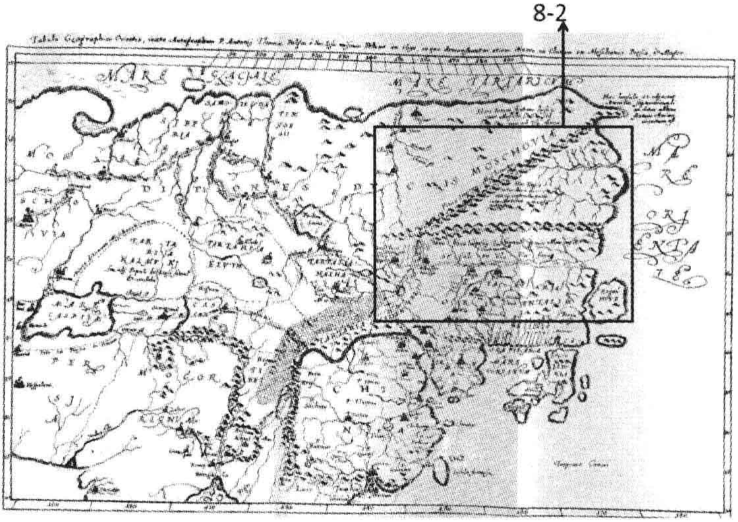


图 8－1　托马斯《东方地图》

资料来源：Joseph S. Sebes,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 (1689): The Diary of Thomas Pereira*, SJ, Bibliotheca Instituti Historici Societatis Jesu, No. 18 (Rome, 1961)，第 321 页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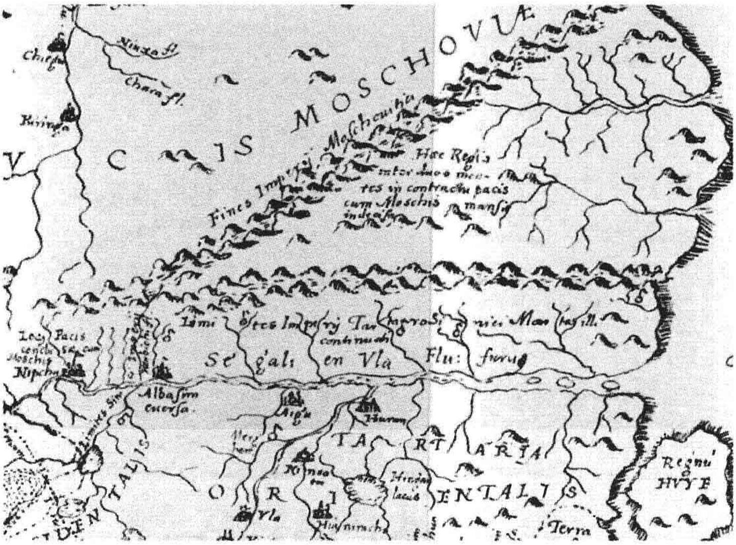


图 8－2　局部放大　格尔必齐河

图 9　满汉文《异域录》舆图局部放大　界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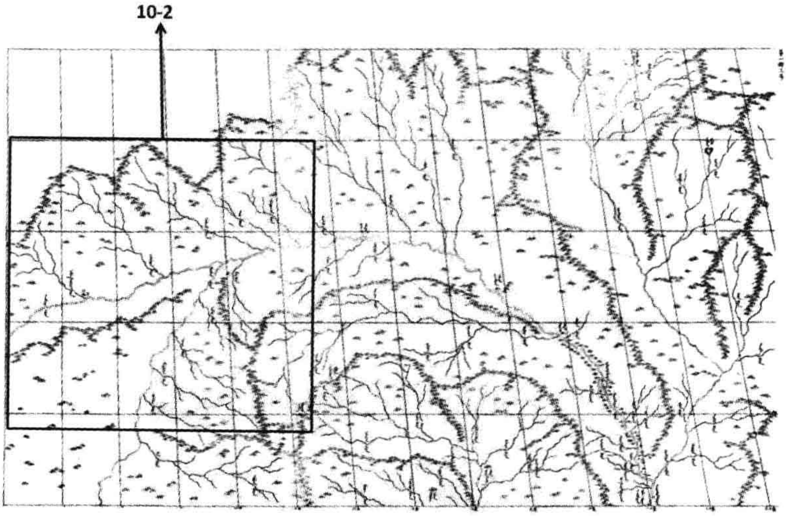


图 10－1　《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第一排三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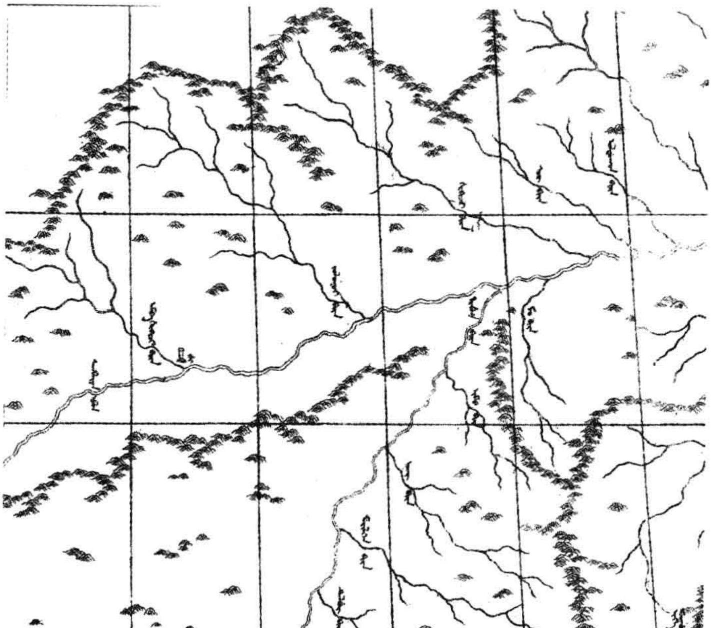


图 10－2　局部放大　界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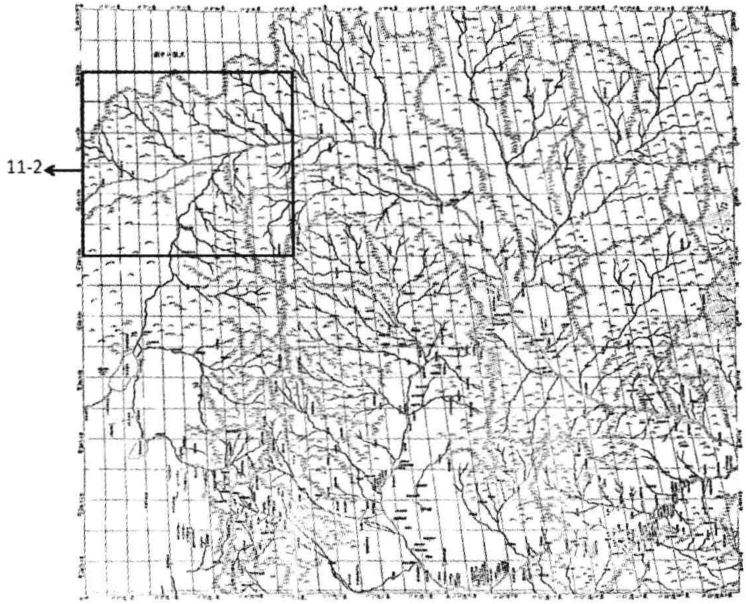


图 11－1　《康熙皇舆全览图》汉文木刻本　黑龙江中图　171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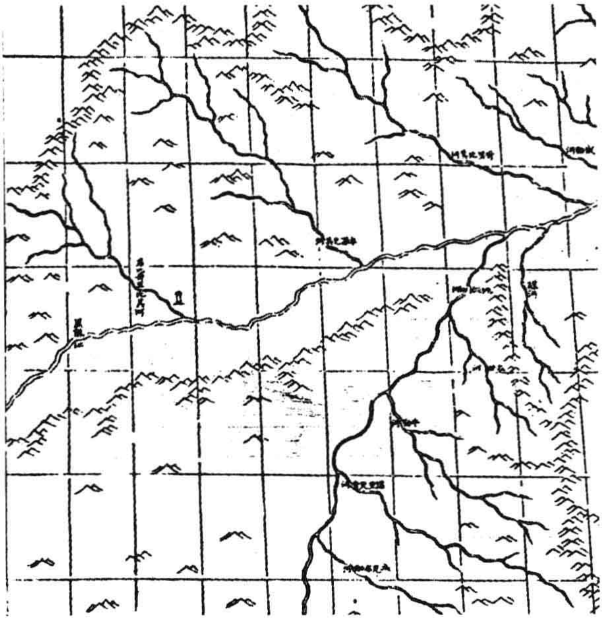


图 11－2　局部放大　界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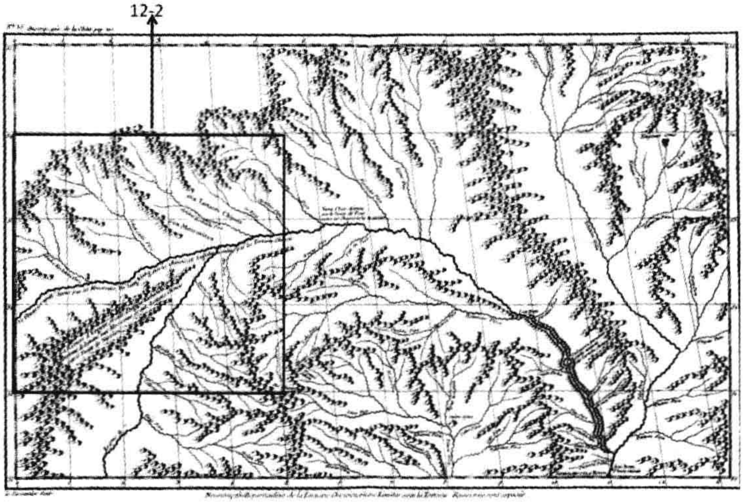


图 12－1　杜赫德《中华帝国志》第 4 卷第 9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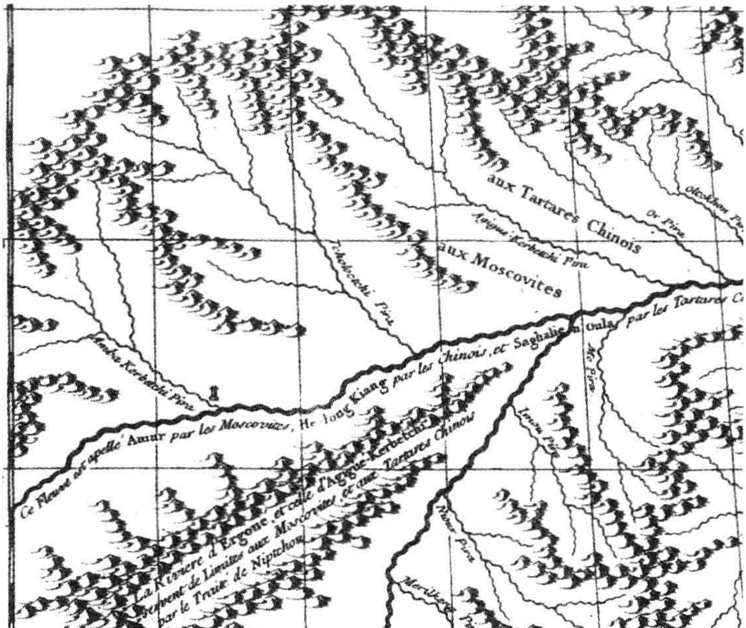


图 12－2　局部放大　界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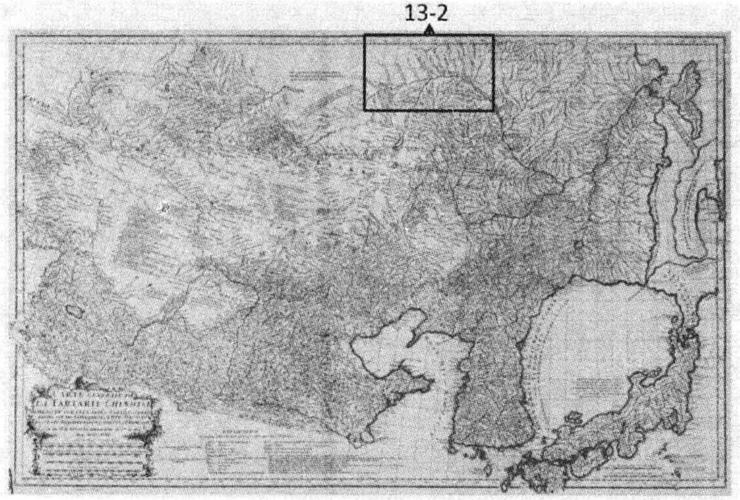


图 13－1 杜赫德《中华帝国志》第 4 卷第 4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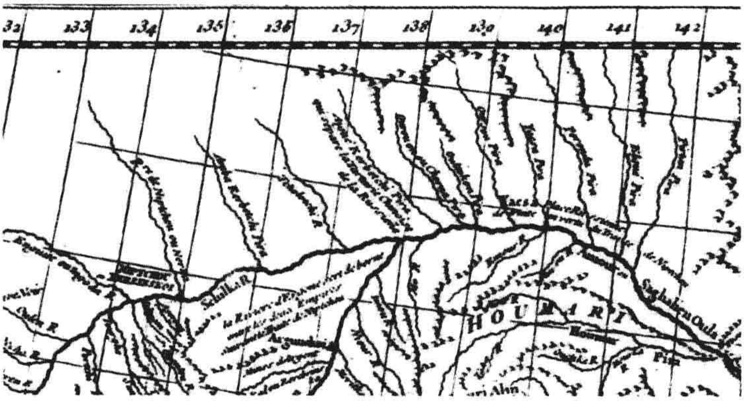


图 13－2 局部放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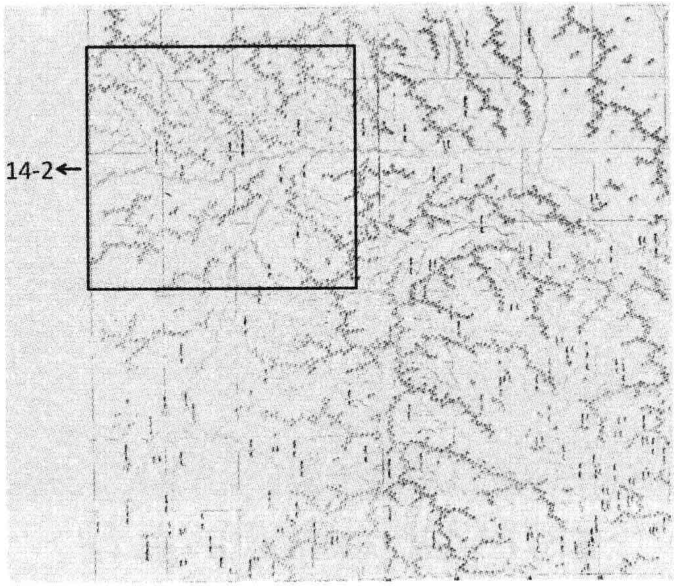


图 14－1 《雍正十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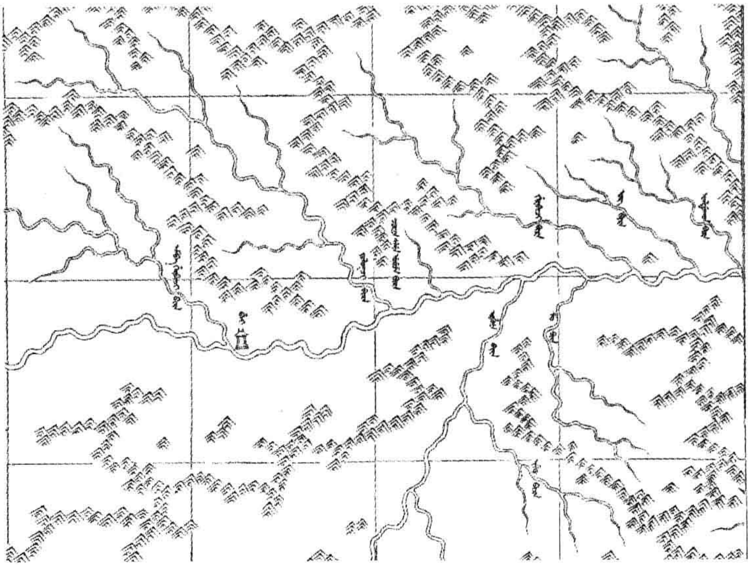


图 14－2 局部放大 界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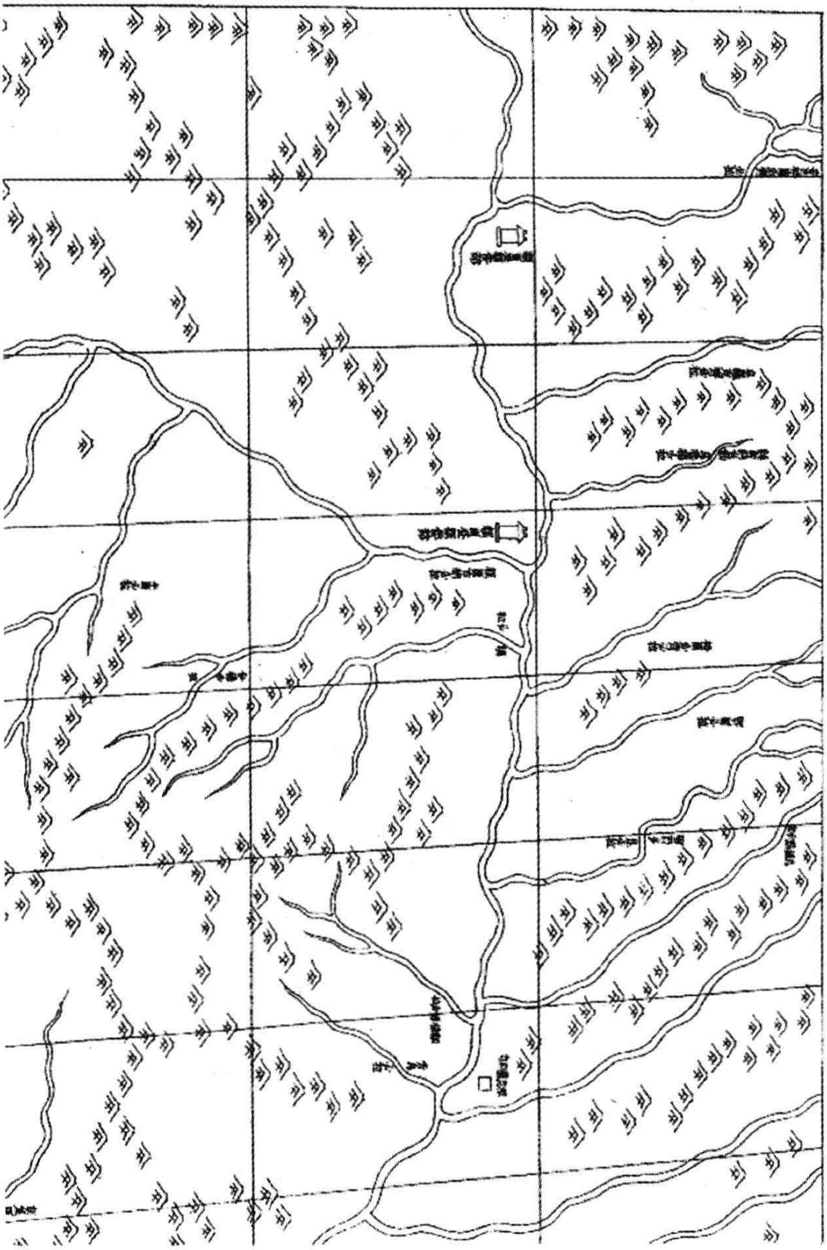


图 15　《大清一统舆图》界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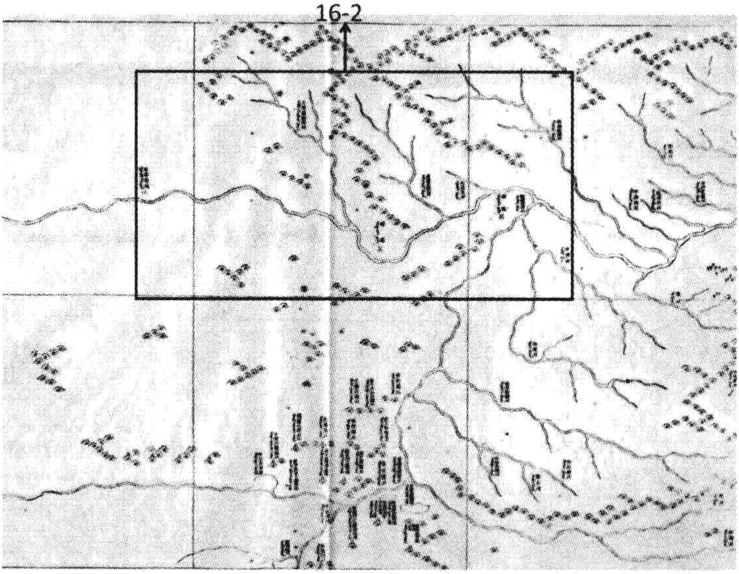


图 16 -1 《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第五排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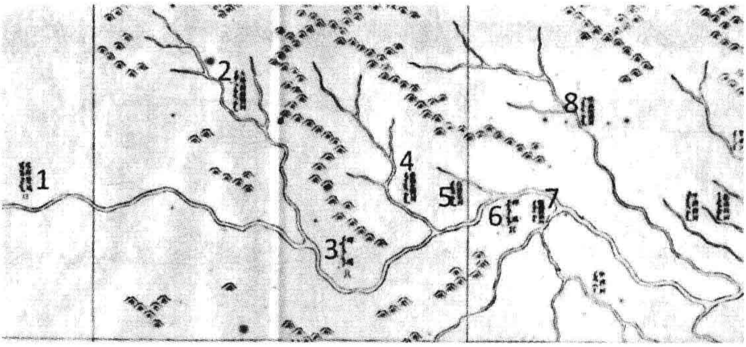


图 16 -2 局部放大 界碑

1. nibcu hoton 尼布楚城 2. amba gerbici bira 大格尔必齐河 3. eldengge wehe 碑碣 4. jolokci bira 卓罗克齐河 5. urum bira 乌鲁木河 6. ergune bira 额尔古纳河 7. eldengge wehe 碑碣 8. gerbici bira 格尔必齐河

图 17　《西伯利亚地图》　果都诺夫监绘　166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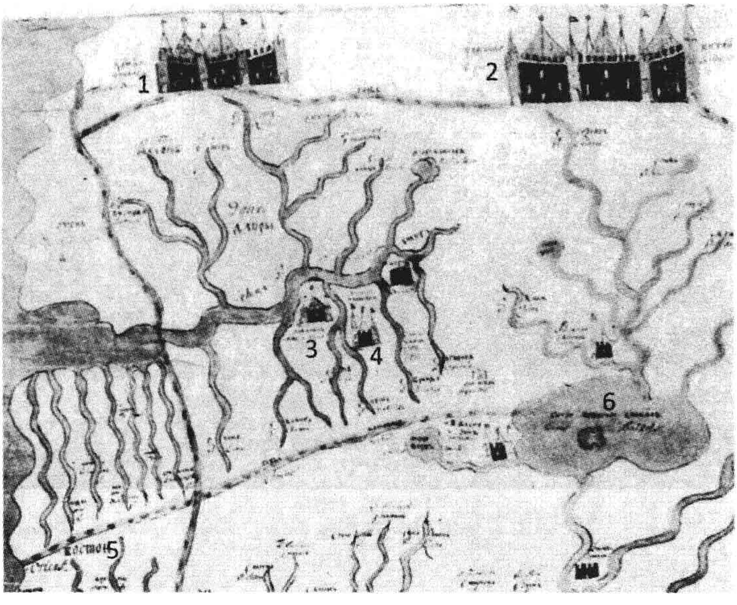


图 18　《西伯利亚地图》　167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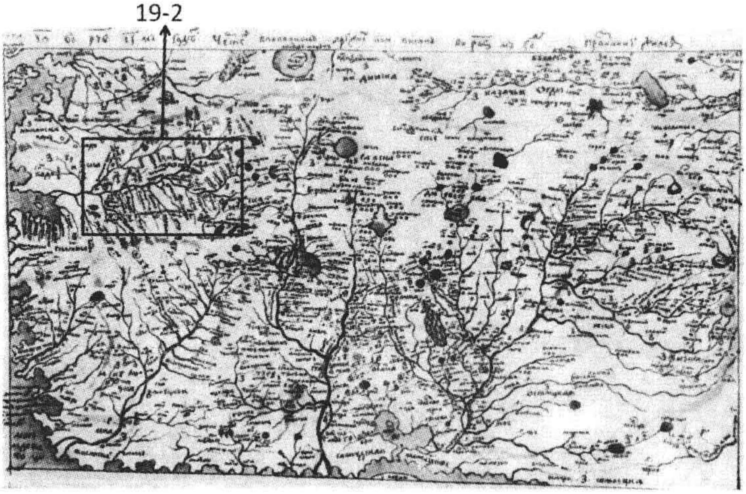


图 19－1　《西伯利亚地图》　1684～1685 年

图 19－2　局部放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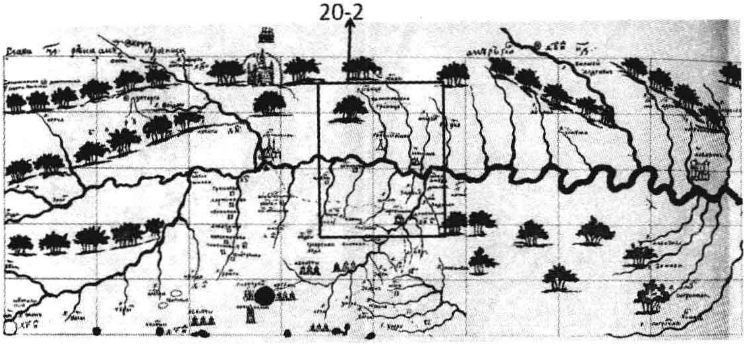


图 20－1 《阿穆尔地图》 170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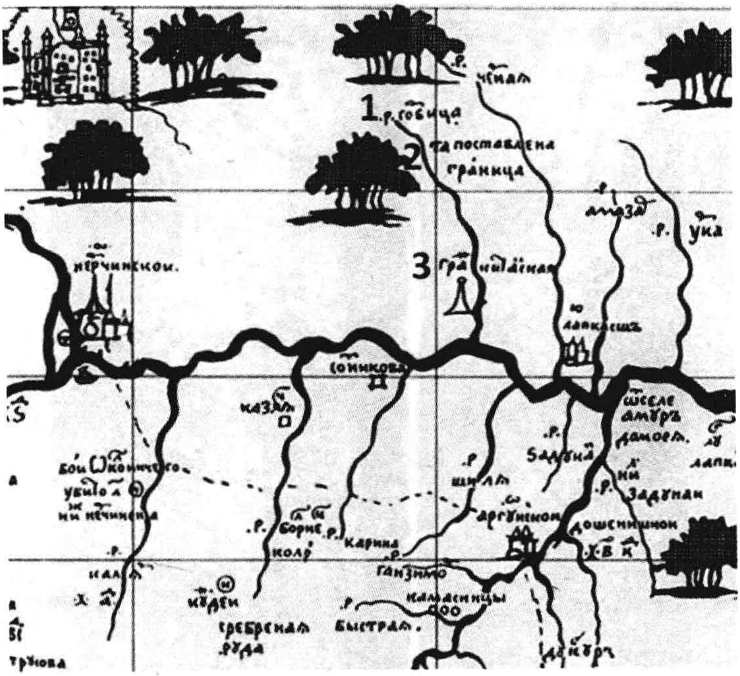


图 20－2 局部放大 格尔必齐河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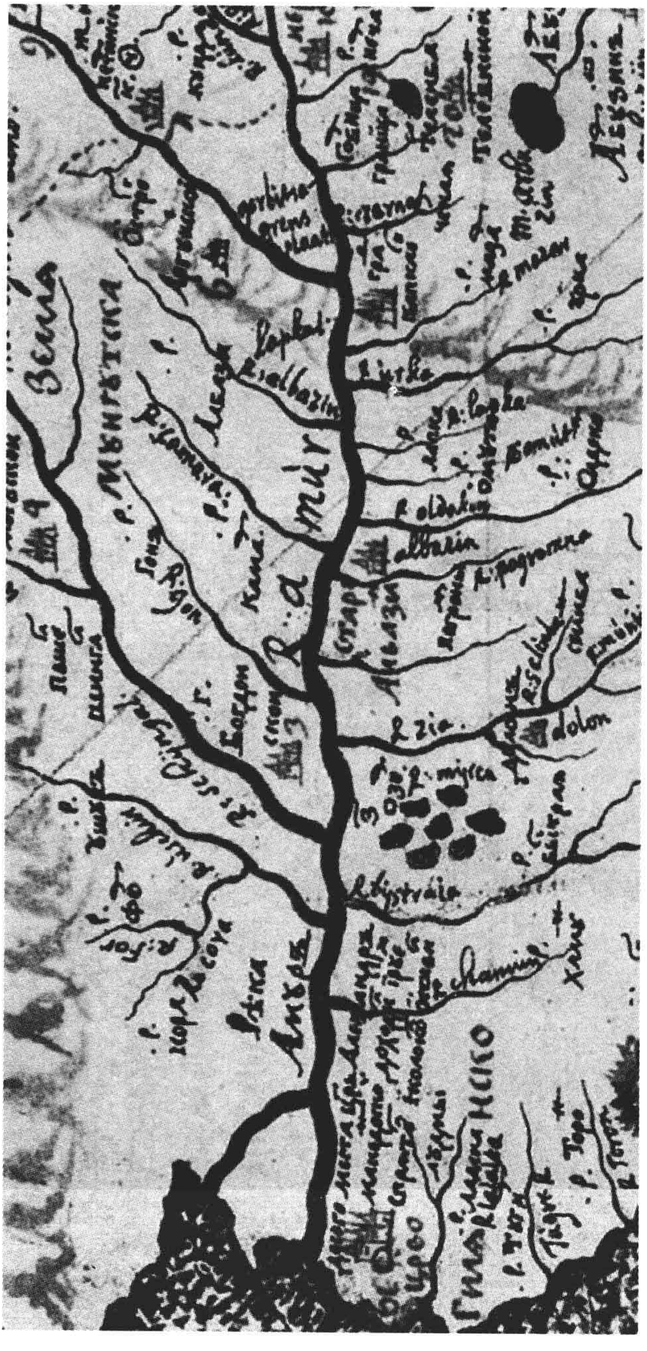


图 21　《〔西伯利亚〕各城、河流及各地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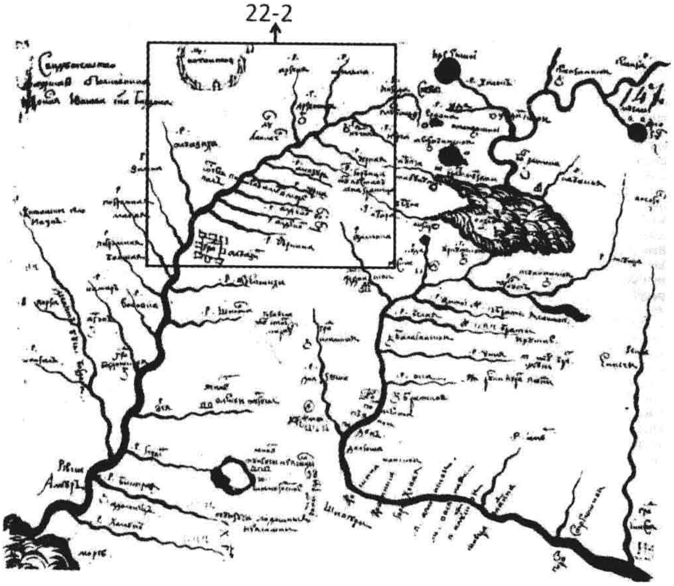


图 22－1　贝顿图（Afanasy von Beiton）　黑龙江流域

图 22－2　局部放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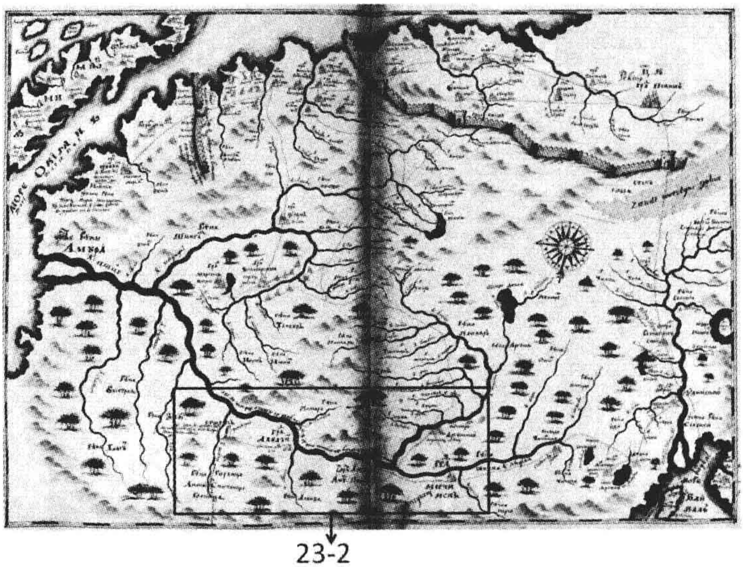


图 23－1　《尼布楚城图》（*Чертеж земли Нерчинского город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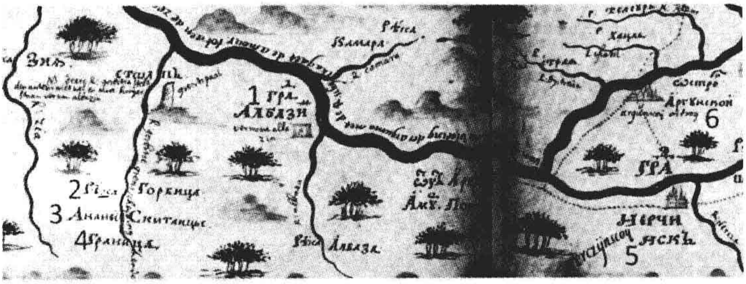


图 23－2　局部放大　小格尔必齐河

1. Албази［＋н］（阿尔巴津，即雅克萨城）　2. Речка Горбица（小格尔必齐河）　3. А нани С китаицы（？至中国）　4. Граница（边界、疆界）　5. Нерчинскь（尼布楚城）　6. Аргунской（额尔古纳）。亦可将 3、4 连读为“至中国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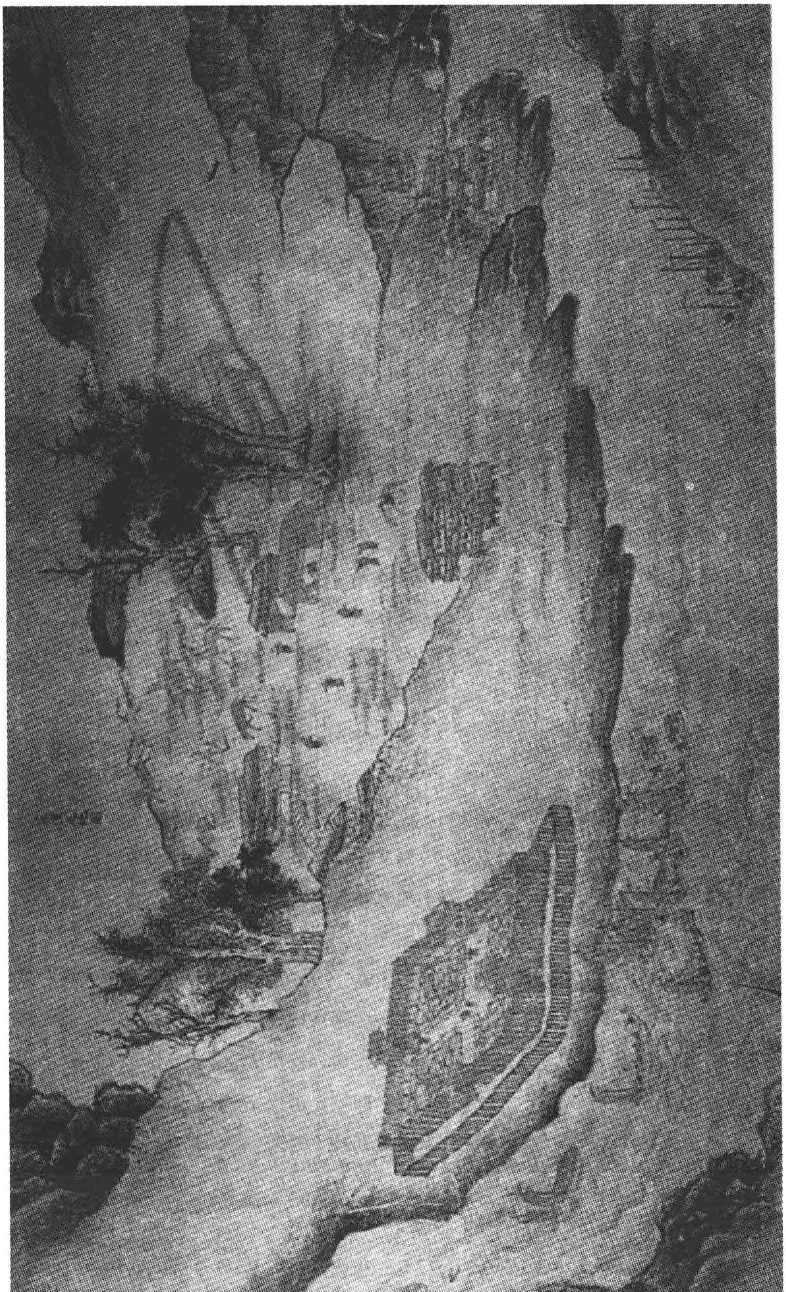


图24 《艾浑之地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附录［三］表

表1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满文舆图一览

	图　名	原始编号	箱　号	备　考	王庸(1932)
1	张家口外各路图二幅	2981	图一箱	满文,绢本彩绘	×
2	张家口外图二幅	2982	图一箱	满文,纸本彩绘	○
3	独石口外各路图一幅	2983	图一箱	满汉文,绢本彩绘	×
4	独石口外图一幅	2984	图一箱	满汉文,纸本彩绘	○
5	杀虎口外图一幅	2985	图一箱	满汉文,纸本彩绘	○
6	内外蒙古图二十幅	3019	图二箱	满汉文,纸本墨书	○
7	盛京城图一幅	3062	图四箱	满汉文,纸本彩绘	○
8	喜峰口外图一幅	3075	图四箱	满汉文,纸本彩绘	○
9	陕甘全省道里总图二幅	3098	图六箱	满汉文,纸本彩绘	○
10	乌拉等处地方图二幅	3103	图六箱	满汉文,纸本彩绘	○
11	黑龙江流域图一幅	3105	图六箱	满汉文,纸本彩绘	×
12	吉林九河图	3106	图六箱	满汉文,纸本彩绘	×
13	甘肃秦州图一幅	3112	图七箱	满汉文,绢本彩绘	○
14	宁古塔地图二幅	3113	图七箱	满汉文,纸本彩绘	○
15	哈密图一幅	3114	图七箱	满汉文,纸本彩绘	○
16	古北口科尔沁二幅	3115	图七箱	满汉文,纸本彩绘	○
17	直隶图一幅	3120	图八箱	满汉文,绢本彩绘	○
18	黄河图一幅	3141	图九箱	满汉文,纸本彩绘	○
19	云南军营图一幅	3146	图九箱	满文,纸本彩绘	×
20	甘肃地图二幅	3150	图十箱	满汉文,纸本彩绘	○
21	喀尔喀图一幅	3169	图十二箱	满汉文,纸本墨绘	○
22	盛京五路图三幅	3182	图十三箱	满汉文,纸本墨绘	○
23	北洋海岸图一幅	3186	图十四箱	满汉文,纸本墨绘	○
24	宁古塔图一幅	3194	图十五箱	满文,纸本墨绘	○
25	盛京五路图四幅	3196	图十五箱	满汉文,纸本彩绘	○
26	喀尔喀图一幅	3198	图十六箱	满汉文,纸本墨绘	○
27	口外九大人图一幅	3203	图十六箱	满汉文,纸本彩绘	○
28	口外五路总图四幅	3209	图十七箱	满文,纸本彩绘	○
29	口外各路图一幅	3223	图十八箱	满文,绢本彩绘	○

表 2 《黑龙江流域图》地名对照表

1	[illegible]	amargi (北)	52	[illegible]	g'an birai/ sekiyen
2	[illegible]	nelhesuhi bira	53	[illegible]	donggoro bira
3	[illegible]	jingkiri ulai/ sekiyen	54	[illegible]	taha bira
4	[illegible]	urge bira	55	[illegible]	ungge bira
5	[illegible]	argi birai/ sekiyen	56	[illegible]	ben bira
6	[illegible]	elge bira	57	[illegible]	dobkūr birai/ sekiyen
7	[illegible]	tok bira	58	[illegible]	nadur birai/ sekiyen
8	[illegible]	unen bira	59	[illegible]	kana bira
9	[illegible]	daltiša alin	60	[illegible]	nayur bira
10	[illegible]	silimdi birai/ sekiyen	61	[illegible]	ikcelekci omo
11	[illegible]	gerbici bira	62	[illegible]	kalur bira
12	[illegible]	jolokci bira	63	[illegible]	weleke bira
13	[illegible]	amba/ gerbici bira	64	[illegible]	kūrka bira
14	[illegible]	or bira	65	[illegible]	hūmar bira
15	[illegible]	oldokon/ bira	66	[illegible]	hūmar hoton
16	[illegible]	ursu bira	67	[illegible]	dosy hada
17	[illegible]	urkan bira	68	[illegible]	morin bira
18	[illegible]	yengken bira	69	[illegible]	silimdi bira
19	[illegible]	ulungki bira	70	[illegible]	kailari bira
20	[illegible]	oros emgi hešen be/ faksalame ilibiha/ wehe bei	71	[illegible]	giwel bira
			72	[illegible]	gulungken bira
21	[illegible]	yaksa hoton	73	[illegible]	odo bira
22	[illegible]	boromda bira	74	[illegible]	ulusu mudan
23	[illegible]	elge bira	75	[illegible]	tomon bira
24	[illegible]	birtan bira	76	[illegible]	sitarman bira
25	[illegible]	argi bira	77	[illegible]	ulan bulak/ šeri
26	[illegible]	engguri omo	78	[illegible]	imi bira
27	[illegible]	ningni bira/ sekiyen	79	[illegible]	numin birai/ sekiyen
28	[illegible]	urgal bira	80	[illegible]	nadur bira
29	[illegible]	nioman birai/ sekiyen	81	[illegible]	jakdaci alin
30	[illegible]	ergune bira	82	[illegible]	dobkor bira
31	[illegible]	mo bira	83	[illegible]	erekel alin
32	[illegible]	emur bira	84	[illegible]	kudin bira
33	[illegible]	panggū bira	85	[illegible]	esuri/ ba i gebu
34	[illegible]	kindu bira	86	[illegible]	herel bira
35	[illegible]	nara bira	87	[illegible]	aral alin
36	[illegible]	biša bira	88	[illegible]	tuler alin
37	[illegible]	imu bira	89	[illegible]	ušun bira
38	[illegible]	cagayan hada	90	[illegible]	sinike kara/ hūjir omo
39	[illegible]	tiyenio bira	91	[illegible]	sinike bira
40	[illegible]	ormolko bira	92	[illegible]	oken bira
41	[illegible]	silimdi bira	93	[illegible]	micil bira
42	[illegible]	merilken bira	94	[illegible]	melur bira
43	[illegible]	nior bira	95	[illegible]	sahaliyan ula
44	[illegible]	ihe gokdo	96	[illegible]	jingkiri ula
45	[illegible]	ilhūr alin	97	[illegible]	judehe alin
46	[illegible]	non i ulai/ sekiyen	98	[illegible]	dalbin omo
47	[illegible]	hūmar birai/ sekiyen	99	[illegible]	bira bira
48	[illegible]	ningni bira	100	[illegible]	g'an bira
49	[illegible]	mumin bira	101	[illegible]	horol bira
50	[illegible]	sukduliki alin	102	[illegible]	munar bira
51	[illegible]	telbur bira	103	[illegible]	wangga alin

续表

104		sun birai/ sekiyen	153		sahaliyan/ ulai angga
105		gon bira	154		sunggari/ ulai angga
106		sahaliyan/ ulai hoton	155		yerbehe bira
107		julgei aihūn/ hoton	156		nemuhe bira
108		mermin bira	157		moktor alin
109		boton bira	158		tosin bira
110		koi bira	159		onoi omo
111		kara hūjir/ omo	160		yak alin
112		imi birai/ sekiyen	161		jicin bira
113		arum birai/ sekiyen	162		koi alin
114		geni bira	163		arum bira
115		tukur alin	164		coogar alin
116		mergen i hoton	165		hadaikan bira
117		mergen bira	166		kurkiru bira
118		utali alin	167		yal bira
119		horol birai/ sekiyen	168		tagar bira
120		kumur alin	169		cicigar hoton
121		toril hada	170		huyur bira
122		bolhori omo	171		susu
123		nioman bira	172		karkaltu alin
124		hara bira	173		tungken bira
125		gelin bira	174		omo ton
126		kumnu bira	175		jakdamtu bira
127		jucun bira	176		umulu bira
128		kūyur bira	177		hamci bira
129		sur bira	178		ho bira
130		kalka bira	179		musun bira
131		col birai/ sekiyen	180		turu bira
132		yal birai/ sekiyen	181		asiktan bira
133		terkule hada	182		delen bira
134		eherul alin	183		utun bira
135		numin bira	184		dulu bira
136		susu	185		non i ula
137		ulkan bira	186		sunggari ula
138		nemer bira	187		holun bira
139		nayan hoton	188		sarin bira
140		udelen bira	189		hūwajaha talha
141		holdonggi alin	190		julergi (南)
142		jan bira	191		cakarakū hada
143		bokori alin	192		baran bira
144		sun bira	193		yaru bira
145		korfin bira	194		jari bira
146		uin bira	195		honggo bira
147		sulasi hada	196		halu bira
148		meo hada	197		ton bira
149		giyari bira	198		wargi (西)
150		fu bira	199		hulun
151		jai bira	200		boir omo
152		kamni hada	201		dergi (東)

表 3 《黑龙江流域图》与其他地图地名对照表

H	J	HM	HH	ZH
amba gerbici bira	amba gerbici bira	amba gerbici bira	昂巴哥里比其河	amba gerbici bira 大格尔必齐河
aral alin	×	×	×	×
argi birai sekiyen	argi bira	argi bira	阿儿即河	argi bira 阿尔吉河
asiktan bira	asiktan bira	asiktan bira	阿西克潭河	asiktan bira 阿什克坦河
ben bira	×	×	×	×
biran bira	×	bira bira	必拉河	bira bira 毕喇河
birtan bira	×	birtan bira	毕勒谭河	×
boir omo	boir	buir omo	布育里鄂模	buir omo 贝尔池
bolhori omo	×	bolhori bira	博儿豁里鄂模	bolhori omo 博勒和哩鄂谟
boromda bira	boromda bira	boromda bira	博鲁日打河	boromda bira 博罗木达河
boton bira	×	boton bira	博吞河	boton bira 博吞河
cagayan hada	×	cahayan hada	察哈言哈达	cahayan hada 察哈颜峰
cakarakū hada	cakarakū	×	×	cakarku alin 察喀拉库山
cicigar hoton	×	cicagar hoton	乞察哈里城	cicihar hoton 齐齐哈尔城
col birai sekiyen	col bira	col bira	戳儿色禽	col bira 绰勒河
dalbi omo	×	×	×	×
delen bira	×	×	×	delen bira 德勒恩河
dobkūr bira	×	dobkor bira	多蒲哭里	dobkor bira 多布科尔河
donggor bira	donggoro bira	donggo bira	董鄂	donggo bira 栋鄂河
dosy bira	×	×	×	×
dulu bira	×	dul bira	杜儿河	dul bira 都勒河
elge bira	elge bira	elge bira	二哥河	elge bira 额勒格河
emur bira	emur bira	emur bira	厄毋里河	emur bira 额穆尔河
engguri omo	engguri	×	×	×
erekel alin	×	×	×	erekel alin 额呼克勒山
ergi bira	×	×	×	×
ergune bira	ergune bira	ergune bira	厄勒枯挪河	erugune bira 额尔固讷河
esuri ba i gebu (额苏里为地名)	×	×	×	esuri 额苏哩?
fu bira	×	fu bira	富河	fu bira 福河

续表

H	J	HM	HH	ZH
g'an birai sekiyen	g'an bira	g'an sekiyen	甘色禽	g'an sekiyen 甘河源
gerbici bira	gerbici bira	gerbici bira	哥里比其河	gerbici bira 格尔弼齐河
gilin bira	×	gerin bira?	格林河?	×
giwel bira	×	×	×	×
giyari bira	×	giyari bira	甲里河	giyari bira 嘉哩河
gulurken bira	×	×	×	×
halu bira	halu bira	haho bira	哈罗河	halu bira 哈鲁河
hara bira	hara bira	hara bira	哈拉河	hara bira 哈喇河
herel bira	×	×	×	×
ho bira	ho bira	ho bira	活河	ho bira 霍河
holun bira	×	holon bira	呼轮河	hulun bira 呼伦池
Hulun	hulun	×	×	×
huyur bira	×	huyur bira	枯育里河	huyur bira 呼裕尔河
hūjir omo	×	hūjir bira	呼即里河	hūjir bira 呼济尔河
hūmar birai sekiyen	hūmar bira	×	×	×
hūmar hoton	×	×	×	hūmar hoton 呼玛尔城
hūwajaha talha	×	×	×	×
ihe gokdo	ihe gokdo	ike gūkda	衣克古克达	ike gokda alin 伊克郭克达山
ilhūr alin	×	ilhūri alin	衣儿呼里山	ilhūri ali 伊勒护哩山
imi bira	×	×	×	×
imi birai sekiyen	×	×	×	×
imu bira	imu bira	imu bira	衣母河	imu bira 伊穆河
jai bira	jai bira	jai bira	查衣河	jai bira 翟河
jakdaci alin	×	jakdaci alin	查克达里山	jakdaci alin 扎克达齐山
jan bira	×	jan bira	占河	jan bira 瞻河
jan i bira	×	jan bira	占河	jan bira 瞻河
jikecelekci omo	×	×	×	×
jingkiri ula	jingkiri	jingkiri ula	锦衣里江，锦衣里乌喇	jingkiri ula 精奇哩江
jingkiri ulai sekiyen	jingkiri sekiyen	×	×	jingkiri ulai sekiyen 精奇哩江源
jolokci bira	×	jolokci bira	卓罗克其河	jolonki bira 卓栾奇河

续表

H	J	HM	HH	ZH
jucun bira	×	jucun bira	术春河	×
judehe alin	×	judehe alin	术得赫山	judehe bira 珠德赫山
julgei aihūn hoton	×	×	×	×
kailari bira	kailari bira	kailar bira	开拉里河	×
kalka bira	×	kalka bira	喀儿喀河	kalka bira 喀尔喀河
kalur bira	×	kalūr bira	喀罗里河	×
kamni hada	kamni hada	kamni hada	喀母泥哈达	kamni hada 喀木尼峰
kana bira	×	kanai bira?	喀你河?	×
kara birai omo	×	×	×	×
kara hūjir omo	×	×	×	×
karkaltu alin	×	karkaltu alin	喀勒喀尔图	karkaltu alin 喀尔喀勒图山
kindu bira	kindu bira	kindu bira	琴都河	kindu bira 勤都河
koi bira	×	×	×	×
koika bira	×	×	×	×
korfin bira	×	korfin bira	科尔芬河	korfin bira 科尔费音河
kudin bira	×	kuding bira	苦丁河	kuding bira 库鼎河
kumnu bira	×	kumnu bira	枯母奴河	kumnu bira 库木努河
kumur alin	×	kumur alin	枯母勒山	kumur alin 库穆尔山
kūyur bira	×	kuyuru bira	枯育鲁河	×
melur bira	×	melur bira	莫鲁里河	melur bira 墨鲁尔河
meo hada	×	meo hada	谋哈达	×
merilken bira	merilke bira	merilken bira	谋里儿肯河	merilken bira 墨哩勒恳河
mermin bira	×	×	×	×
micil bira	×	micir bira	米乞里河	micir bira 密齐尔河
mo bira	mo bira	mo bira	谋河	mo bira 摩河
moktor alin	×	×	×	×
morin bira	×	×	×	×
mumin bira	×	×	×	mumin bira 穆敏河
musun bira	musun bira	musun bira	穆孙河	musun bira 穆逊河
nacur bira	×	×	×	×
nadur bira	×	×	×	×
nadur birai sekiyen	×	×	×	×

续表

H	J	HM	HH	ZH
nayur bira	×	nayor bira	那药里河	nayur bira 纳裕尔河
nelhesuhi bira	×	nelhesuhe bira	挪儿和苏希河	×
nemurhe bira	nemurhe bira	×	×	nemerhen bira 讷墨尔亨河
ningni bira	ningni bira	ningni bira	泥泞河	ningni bira 宁尼河
ningni birai sekiyen	×	×	×	×
nioman bira	nioman bira	nioman bira	牛满河	nioman bira 钮满河
nioman birai sekiyen	nioman i sekiyen	nioman sekiyen	牛满色禽	nioman sekiyen 钮满河源
nior bira	nior bira	nior bira	牛勒河	nior bira 钮尔河
non i ulai sekiyen	non i sekiyen	non sekiyen	嫩色禽	non sekiyen 嫩江源
non ula	non i ula	non i ula	嫩泥乌喇	non ula 嫩江
numin birai sekiyen	numin i bira	nomin sekiyen	诺民色禽	×
odo bira	×	odo bira	敖多河	odo bira 鄂多河
oken bira	×	oken bira	敖肯河	oken bira 鄂恳河
oldokon bira	oldokon bira	oldokon bira	敖儿多荤河	oldokon bira 鄂勒多宽河
omo ton	omo ton	omo ton	鄂模吞	omo tun 鄂谟屯
omulko bira	×	×	×	×
on bira	×	×	×	×
onoi omo	×	×	×	ono bira 鄂诺河
oros emgi hešen be/faksalame ilibuha/wehe bei	×	×	×	×
panggū bira	panggū bira	panggū bira	傍库河	×
sahaliyan ula	sahaliyan ula	sahaliyan ula	萨哈连乌喇,黑龙江	sahaliyan ula 黑龙江
sahaliyan ulai angga	×	×	×	×
sahaliyan ulai hoton	×	sahaliyan ulai hoton	萨哈连乌喇城	sahaliyan ulai hoton 黑龙江城
sarin bira	×	sarin bira	西林河	sarin bira 萨璘河

续表

H	J	HM	HH	ZH
silimdir bira	silimdi bira	silimdi bira	西里母的河	silimdi bira 西里木第河
sinike bira	×	×	×	×
sinike birai sekiyen	×	×	×	×
sinikemoktor alin	×	×	×	×
siyarman bira	×	×	×	×
sukduaki alin	×	×	×	×
sulakei hada	×	×	×	×
sun bira	×	sun bira	×	sun bira 逊河
sun birai sekiyen	×	sun sekiyen	孙河	sun birai sekiyen 逊河源
sunggari ula	sunggari ula	sunggari ula	孙色沁	sunggari ula 松花江
sunggari ulai angga	×	×	松花江，松嘎里乌喇	×
sur bira	×	×	×	suru bira 苏噜河
Susu	susu	suru bira	酥鲁河	×
tagar bira	×	×	×	×
taha bira	taha bira	taha bira	他哈河	taha bira 塔哈河
telbur bira	telbur bura	telbur bira	忒儿布勒河	telbur bura 特勒布尔河
tok bira	tok bira	tok bira	拖呵河	tok bira 托克河
tomon bira	×	tomo bira	托莫河	tomo bira 托摩河
ton bira	×	ton bira	吞河	tono bira 托诺河？
toril hada	×	toril hada	拖里儿哈达	toril hada 托哩勒峰
tosin bira	×	×	×	tosin bira 托新河
tuler bira	×	×	×	(tuler alin 图埒尔山?)
tungken bira	×	tungken bira	通肯河	tungken bira 通悬河
turu bira	×	×	×	turu alin 图噜山
uin bira	×	ui bira?	乌衣?	×
ulan bulak šeri	ulan bulak	ulan bulak	乌蓝拖拉克	ulan bulak šeri 乌兰布拉克泉
ulusu mudan	×	ulusu mudan	屋鲁苏木丹	ulusu mudan 乌鲁苏河湾
umulu bira	umolu bira	umolu bira	乌摸鲁河	umulu bira 乌木鲁河
unen bira	unen bira	unen bira	乌挪河	×
ungge bira	ungge bira	ungge bira	翁厄河	ungge bira 翁格河

续表

H	J	HM	HH	ZH
urge bira	×	×	×	×
urkan bira	urkan bira	urkan bira	乌拉喀河	urkan bira 乌尔堪河
ursu bira	×	ursu bira	乌里苏河	ursu bira 乌尔苏河
ušun bira	×	×	×	×
utun bira	utun bira	utun bira	乌吞河	utun bira 武屯河
weleke bira	weleke bira	weleke bira	窝勒可河	weleke bira 沃埒克河
yak alin	×	yak alin	呀克山	yak alin 雅克山
yal bira	×	yal bira	雅儿河	yal bira 雅勒河
yal birai sekiyen	×	yal sekiyen	雅儿色禽	yal sekiyen 雅勒河源
yerbehe bira	yerbehe bira	×	×	×

说明：× 表示没有该地名。

H：《黑龙江流域图》，1710 年，满文，彩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J：《吉林九河图》，1711 年，满文，彩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HM：《皇舆全览图》，1721 年，铜版，满文，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藏。

HH：《皇舆全览图》（《黑龙江口图》，1709 年，《黑龙江中图》，1710 年，《黑龙江源图》，1711 年）1709 年，木版，汉文，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藏。

ZH：《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1776 年，木版，满汉合璧，满洲文化协会印，1936 年，笔者藏。

表 4 卓尔阔调查《黑龙江流域图》河流一览

河流名称	距城	源出及流向
yerbehe bira(155)	城东 2270 里之外	源出黑龙江南流，分为两支汇入松花江
dulu bira(184)	城东 2200 里之外	源出东兴安，流向东南汇入松花江
utun bira(183)	城东 2100 里之外	源出东兴安，流向东南汇入松花江
delen bira(182)	城东 2050 里之外	源出东兴安，流向东南汇入松花江
omo ton omo(174)	城东 1100 里之外	源出湖本身，流向东南汇入松花江
asiktan bira(181)	城东 1900 里之外	源出东兴安，南流汇入鄂模吞河
turu bira(180)	城东 1750 里之外	源出东兴安，南流汇入鄂模吞河
musun bira(179)	城东 1700 里之外	源出东兴安，南流汇入鄂模吞河
ho bira(178)	城东 1700 里之外	源出东兴安，南流汇入鄂模吞河
hamci bira(177)	城东 1600 里之外	源出兴安，南流汇入鄂模吞河

续表

河流名称	距城	源出及流向
umolo[umulu] bira(176)	城东1400里之外	源出东兴安,南流汇入鄂模吞河
jakdamtu bira(175)	城东1200里之外	源出东兴安,南流汇入鄂模吞河
yaro[yaru] bira(193)	城东1100里之外	源出东兴安,东流汇入鄂模吞河
jari bira(194)	城东1250里之外	源出东兴安,东流汇入鄂模吞河
honggo bira(195)	城东1300里之外	源出东兴安,东流汇入鄂模吞河
halu bira(196)	城东1450里之外	源出东兴安,东流汇入鄂模吞河
baran bira(192)	城东750里之外	源出东兴安,东南流汇入松花江
cakarakū hada(191)	城南900里之外	
hūwajaha talha(189)	城南800里之外	南流汇入松花江
sarin bira(188)	城东南720里之外	源出东兴安,南流汇入松花江
holon bira(187)	城东600里之外	源出东兴安,南流汇入松花江

说明：据《黑龙江档》17-13《康熙五十年元月吏、兵、理藩院、盛京兵部行文抄档》七月二十日笔帖式散珠送来之文内容制表。表内河流名称后数字，同表2《黑龙江流域图》地名对照表与图3《黑龙江流域图》相对应。[ ] 内地名为《黑龙江流域图》地名，与档案满文地名略有区别，可一并参照。

参考文献

一 传统文献

（清）阿桂等：《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乾隆四十三年敕撰，和田清解说，满洲文化协会，1935

《八旗通志初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东洋文库藏

《清世祖实录》，台北：华文出版社，1964

萧奭著《永宪录》，朱南铣校点，中华书局，1959

长顺、讷钦修《吉林通志》，光绪十七年序

《兵科·顺治十年三月档子一册》，满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李朝孝宗实录》，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3

《俄罗斯藏黑龙江抄档》，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

何秋涛纂辑《朔方备乘》，光绪七年跋

《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1984

《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

《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序，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近卫文库藏

《钦定八旗通志》，李洵、赵德贵、周毓方、薛虹主校点，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略称《黑龙江档》康熙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藏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汉文本《清圣祖起居注稿》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登录号：167019-001，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当年内阁大库藏。满文本《清圣祖起居注稿》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一日至二十九日，登录号：167302-001

《萝图荟萃》，收于《国朝宫史续编》卷10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人民出版社，200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中华书局，1981

《户部咨文》（满汉文），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登录号：108316，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阁大库藏

乾隆九年御制序《大清一统志》，蒋廷锡奉敕撰，京都大学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藏

杨宾：《柳边记略》，商务印书馆，1936

丛佩远、赵鸣岐编《曹廷杰集》，中华书局，1985

二　近代论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78～199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一国两制研究中心选编《澳门历史地图精选》，华文出版社，200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新华出版社，2008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编《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哈尔滨地图出版社，1998

王庸编《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　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新购舆图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6－4，1932年

吴雪娟：《清代满文舆图概述》，《满语研究》2006年第2期

吴雪娟：《新发现的满文〈黑龙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图〉》，《东北史地》2007年第3期

吴雪娟：《康熙〈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图〉考释》《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11期，第37～41页

李孝聪编著《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

李孝聪编著《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文物出版社，2004

李孝聪：《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清代舆图的初步整理与认识》，“清代档案整理与馆际合作：第三届清代档案学术研讨会”，台北：故宫博物院，2006

李齐：《中俄关系史》，台北：联经出版社，2000

李德启编、于道泉校《国立北平图书馆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满文书籍联

合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33

承志：《满文〈乌喇等处地方图〉考》，《故宫学术季刊》第26卷第4期，2009年

姜长斌：《中俄国界东段的演变》，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孙喆：《从两幅地图看18世纪初期清人对黑龙江流域的认识》，《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6期

翁文灏：《中俄国界史地考》，《地学杂志》第1~2期，1928

《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增订本（一），台北：中央图书馆，1967

张维华、孙西：《清前期中俄关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5

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文物出版社，1997

庄吉发校注《满汉异域录校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

复旦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编写组《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华林甫：《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邹爱莲：《关于清宫舆图》，《明清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后收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选（1994.10~2004.10）》，新华出版社，2005

齐秀梅、杨玉良等：《清宫藏书》，紫禁城出版社，2005

刘民声、孟宪章、步平编《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史资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

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商务印书馆，1958

卢雪燕：《院藏康熙满文本〈黑龙江流域图〉考介》，《故宫文物月刊》第19卷第9期（225），2001

罗盛吉、吴雪娟：《康熙〈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图〉考释》，《满语研究》2009年第1期

谭其骧主编，张锡彤、王钟翰、贾敬颜、郭毅生、陈连开等著《中国历

史地图集释文汇编　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鮎澤信太郎：《マテオ.リッチの両儀玄覧図について》，地理学史研究会编《地理学史研究》第1集古地図特集，柳原書店，1957

鮎澤信太郎：《利瑪竇の両儀玄覧図に就いて》，《歴史教育》，11－7，1936

衛藤利夫譯：《満文地図に就いて要約》，《満洲学報》第2期，満洲学会，1933

吉田金一：《ネルチンスク条約で定めた清とロシアの国境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42（1），1983

吉田金一：《郎談の〈吉林九河図〉とネルチンスク条約》，《東洋学報》，第62卷1、2号，1980

吉田金一：《ロシアと中国の東部国境をめぐる諸問題：ネルチンスク条約の研究》，環翠堂，1992

吉田金一：《ロシアの東方進出とネルチンスク条約》，近代中国研究センター，1984

吉田金一：《近代露清関係史》，近藤出版社，1974

今西春秋：《校注異域録》，天理大學おやさと研究所，1964

渋谷浩一：《ウンコフスキー使節団と一七二〇年代前半におけるジューン＝ガル、ロシア、清の相互関係》，《茨城大学人文学部紀要》（人文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科論集），Vol. 2，2007

渋谷浩一：《キャフタ条約の文書通信に関する条項について：条約締結後の清側によるロシア側書簡受領拒否問題をめぐって》，《茨城大学人文学部紀要》（人文学科論集），Vol. 45，2006

渋谷浩一：《キャフタ条約以前のロシアの北京貿易——清側の受入れ体制を中心にして》，《東洋学報》，75（3/4），1994

渋谷浩一：《キャフタ条約締結過程の研究：国境貿易条項の成立と清側ロシア文条約》，《茨城大学人文学部紀要》（人文学科論集），Vol. 40，2003

渋谷浩一：《モスクワの露清関係史史料について》，《満族研究通讯》（東洋文庫清代史研究室満族史研究会），8，1999

渋谷浩一：《康熙年間の清のトルグート遣使とロシア》，《史朋》（北海

道大学東洋史談話会), 39, 2007

渋谷浩一:《中国第一歴史档案館所蔵〈康熙朝満文硃批奏摺〉中の露清関係史史料について》,《北大史学》, 33, 1993

渋谷浩一:《露清関係とローレンツ.ランゲ——キャフタ条約締結に向けて》,《東洋学報》, 72 (3/4), 1991

承志:《ダイチン.グルンとその時代: 帝国の形成と八旗社会《大清国及其时代: 帝国形成与八旗社会》,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09

松浦茂:《ネルチンスク条約直後清朝のアムール川左岸調査》,《史林》, 80 (5), 1997。后收入《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 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2006; 英译文参见 Matsuura, Shigeru. *The Qing Surveys of the Left Bank of the Amur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Treaty of Nerchinsk*,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 68. 2010

森永貴子:《ロシアの拡大と毛皮交易: 16~19 世紀シベリア・北太平洋の商人世界》, 彩流社, 2008

青山定雄:《古地誌地図等の調査》,《東方学報》北支満鮮調査旅行報告, 第 5 册続編, 1935

船越昭生:《北方図の歴史》, 講談社, 1976

藤井讓治、金田章裕、杉山正明編《大地の肖像——絵図・地図が語る世界》, 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2007

楠木賢道:《黒龍江将軍衙門档案からみた康熙 23 年の露清関係》,《歴史人類》24, 1996

入江啓四郎:《ネルチンスク条約の研究》, 英修道、入江啓四郎:《中国をめぐる国境紛争》, 巌南堂書店, 1967

福克司: "Notiz zur Pekinger Weltkarte der Ming-Zeit", 織田武雄譯,《北京の明代世界図について》, 地理学史研究会編《地理学史研究》第 2 集, 柳原書店, 1962

野見山温:《露清外交の研究》, 酒井書店, 1977

柳澤明:《1768 年の〈キャフタ條約追加條項〉をめぐる清とロシアの交渉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 62 (3), 2003

柳澤明:《〈理藩院尚書アリンガの書簡〉と, ジュンガル問題をめぐる

清朝の対ロシア政策》,《早稲田大学教育学部学術研究》地理学・歴史学・社会科学編 (38), 1989

柳澤明:《キャフタ条約への道程——清の通商停止政策とイズマイロフ使節団》,《東洋学報》, 69 (1/2), 1988

柳澤明:《キャフタ条約以前の外モンゴル—ロシア国境地帯》,《東方学》, 77, 1989

柳澤明:《吉田金一先生の業績と露清関係史研究の現状》,《内陸アジア史研究》, 18, 2003

柳澤明:《中国第一歴史档案館所蔵のロシア関係満文档案について》,《満族史研究通讯》, 10, 2001

鈴木信昭:《朝鮮に伝来した利瑪竇〈両儀玄覧図〉》,《朝鮮学報》, 201, 2006

鈴木信昭:《朝鮮粛宗三十四年描画入り〈坤輿萬國全圖〉攷》,《史苑立教大学史学会》63 (2), 2003

鈴木信昭:《利瑪竇〈両儀玄覧図〉攷》,《朝鮮学報》, 206, 2008

和田清:《盛京吉林黒龍江等処標注戦蹟輿図について》,《東亜史論藪》, 生活社, 1942

増田忠雄:《ネルチンスク条約の国境に就て》,《史林》26 - 1, 1941

増田忠雄著、滿鐵弘報課編《満洲国境問題》, 中央公論社, 1941

Baddeley, John F. *Russia, Mongolia, China.*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1919.

Du Halde, Jean-Baptist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nrichie des cartes générales et particulieres de ces pays, de la carte générale et des cartes particulieres du Thibet, & de la Corée; & ornée d'un grand nombre de figures & de vignettes gravées en tailledouce.* La Haye: H. Scheurleer, 1736.

Elliott, Mark C. *The limits of Tartary, Manchuria in imperial and national geograph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 33, 603 - 646,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00.

Fuchs, Walter (福克司). Ueber einige Landkarten mit mandjurischer

Beschriftung,《滿洲学報》第 2 期，滿洲学会，1933

Paine, S. C. M. *Imperial Rivals: China, Russia, and their Disputed Frontier.* New York & London: M. E. Sharpe, 1996.

Perdue, Peter C.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Sebes, Joseph S.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 (1689): *The Diary of Thomas Pereira, SJ*, Bibliotheca Instituti Historici Societatis Jesu, No. 18. Rome: Instituti Historici Societatis Jesu, 1961.

Walter Fuchs,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nebst Namensindices für die Karten der Mandjurei, Mongolei, Ostturkestan und Tibet: mit Wiedergabe der Jesuiten-Karten in Originalgrösse.* Peking: Fu-Jen-Universität, 1943.

Атлас: Туран на старинных картах: образ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образов: Казахстан,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Прикаспий, Приуралье, Западная Сибирь,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Балх, Хорасан. Феория: Дизайн. Информация. Картография, 2008.

Ефимов, А. В. *Атлас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ткрытий в Сибири и в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й Америке XVII-XVIII вв*,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4.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400 лет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Lewinson (N. Y.) etc., 2001.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Империя Цин и Рус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XVII веке.* Хабаровск, 1987.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 Россия во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уро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 1993.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2. 1686－1691. М. Наука. 1972.

（原载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学术季刊》第 29 卷第 1 期，2011 年）